

# 土地問題

考茨基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К. Каутски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летарий»  
1926

本書根據蘇聯“無產者”出版社一九二六年俄  
文版轉譯。原著以德文出版，原作者是 Karl  
Kautsky，原著名稱是 Die Agrarfrage，  
德國斯圖加特萊茲出版社一八九九年出版。本  
書俄譯本序言未譯，著者序係譯自德文原版。

土地問題

(德)考茨基著  
梁琳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115·850×1168 $\frac{1}{32}$ ·16 $\frac{1}{4}$ 印張·2插頁·386,000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定價：(7)2.04元

# 目 次

著者序 .....	5
-----------	---

## 上卷 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經濟的發展

第一章 緒論 .....	13
第二章 農民與工業 .....	17
第三章 封建時代的農村經濟 .....	25
第四章 現代的農村經濟 .....	43
第五章 現代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 .....	72
第六章 大生產與小生產 .....	116
第七章 資本主義農村經濟的界限 .....	160
第八章 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	200
第九章 商品性農業所遇困難的激增 .....	233
第十章 生活資料生產中的海外競爭 及農村經濟的工業化 .....	276
第十一章 前途的展望 .....	345

## 下卷 社會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策

第一章 社會民主黨是否需要土地政綱 .....	359
第二章 保護農業無產階級 .....	399
第三章 保護農業底利益 .....	448
第四章 保護農業人口 .....	472
第五章 社會革命與剝奪土地所有者 .....	509



## 著者序

本書之作乃造因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土地政綱的爭論。這一政綱曾向法蘭克福黨大會提出，但爲布累斯勞大會所否決。無論對於這些爭論的意見怎樣，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在這些爭論中無論德國社會民主黨或國際社會民主黨對於現代農業發展之趨勢都缺乏一致的意見，因此也就缺乏一種無可爭論的原則，足以作爲一定的土地政綱的基礎。

因此在布勒斯拉夫黨大會上，一致承認有徹底研究土地關係的必要。

自然，引起我對農業問題的興趣的，並不一定是這個原因。在我黨活動開始時，我已經很熱烈的研究這個問題了。一八七八年，當我還是用假名 Symmachos 寫作的時候，我在維也納“社會主義者”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論文，題爲“農民與社會主義”。我原擬將其中某幾篇印成鼓動的小冊出版，但是所有的版本都被沒收了。一八七九年我完成了我的著作“人類繁殖對社會進步的影響”(Der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在這本書內，生活資料生產的問題，佔一明顯的地位；一八八〇年“呂赫特年鑑”發表了我論農民中的鼓動的論文；一八八一年在“政治論文集”(Staatswirtschaftliche Abhandlungen)內，我研究了在生活資料生產方面的海外競爭問題。除此以外，在那時我曾編輯了許多讀物，

如“美國大叔”(Der Onkel aus Amerika)之類，專為農民閱讀。

因此在這十年(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中，農業問題已引起了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注意，而在我這不過是回復到舊相識——我向來完全不會間斷過的舊相識而已。

時間才是給這一問題以很大實際及理論的意義。我黨的發展及農業危機，使這一問題和社會民主黨所接觸的最重要的實際問題，立於同等地位。雖然馬克思主義已到處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對地租問題作了完善研究的“資本論”第三卷亦已出版；但是，同時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已形成某些現象，似乎與馬克思底學說不相符合。於是就給農業問題以非常的理論興趣。我在研究早已熟知的問題的時候，可望無特殊的困難，我願意盡可能迅速地將我的著作問世，因為這並不是學院式的問題，而是急切的實際問題。但是本書的出版，畢竟是經過了三年之久。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於我的職業的羈累，我不得不研究一些最迫切的問題，而恩格斯逝世以及馬克思遺著之出版，又常常使我不得不擱置我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想利用關於農村經濟狀況的最近材料作為我研究的根據，如：最近英國國會農村委員會的調查，一八九〇年美洲農業調查錄第三卷，一八九二年法國農業調查以及一八九五年德國農業經營的統計；所有這些材料在一八九七年甚至到一八九八年才公佈出來。

但是工作繼續下去，就表現出我所規劃的小冊子的範圍，對於本書是太狹隘了。我以為問題不是要用我這一著作以增加現有關於農業問題之不少專著及調查的數目。這一類的著作可供參考，且不缺乏，統治階級的政府、學者以及政論家每年大批發表這一類的著作。我們所實際需要的研究，是要能在全部混亂的事實中，發現其間的聯系，闡明隱藏在現象裏面及決定現象的性質的諸根本傾向。直到現

在，一般農業問題之部分的問題，如大生產與小生產間之關係、債務承繼權、勞動者的缺乏、海外競爭之類都是當作獨立的現象，孤離地加以研究；現在就得將它們當作單一與一般過程的局部現象來觀察。

這個任務很困難，題目也很廣泛；除此以外，在現有的文獻中我不曾見有一本從現代社會主義的立場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巨著。自然，社會民主黨的先進理論家都是從事於工業發展的研究的。我們在恩格斯著作中，尤其在馬克思著作中，雖然可以找到關於農業問題的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但大都為一些偶爾的筆記及短篇論文。“資本論”第三卷中地租篇可說是例外，但是它仍然是未完成的。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的全部著作就逝世了。

即使馬克思完成了他全部著作，他還是沒有解決在現時使我們發生興趣的一切問題。照他的工作計劃，他只是研究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現時我們主要是注意資本主義社會內資本主義前期及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形態之作用。

然而“資本論”對於我們研究農村經濟關係，却是最可寶貴的，這不僅就他的結果而言，他的方法論也是足以使我們在這一領域內順利地繼續這一已經開始的工作。如果在這本書內我能够發展一些新的有益思想，那首先便應歸功於我這兩位偉大的先生。我特別願意聲明這點，因為從某個時候起，甚至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已有一種議論，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觀點是陳舊了。這些人說，固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是創造了一些完全值得注意的東西，固然，在現時他們的著作還能推動思想，但是誰不願意拘守教條，誰就不必完全屈服於他們的影響之下；他們只可作為達到較高點的過渡階段。他們說，這是從馬克思辯證法觀點中得出的結論，馬克思辯證法說，永久的真理是沒有的，一切的發展是經過現實的否定來完成的。

這似乎是合於哲學的看法。但是這種看法同時產生出很有趣味

的結論：即馬克思之不正確就是因為他的正確，辯證法之不可靠，就是因為辯證法的可靠。在這個結論中無可爭論的只有一點：即辯證法的虛妄，但不是馬克思辯證法的虛妄。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第三版，第一三三頁）一書中曾指出，把消滅的否定當作辯證過程底分子是何等的妄謬。無論如何發展之經過否定並不是說否定一切的存在，它是以那發展中的事物的繼續存在為前提。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否定，但不是人類社會的毀滅，而只是它的某一發展狀態中某幾方面的毀滅而已。但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別於前期社會形態底各方面並不加以毀滅。如果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之否定，那末社會主義的制度就是“否定之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重新恢復個人的財產，但這種財產是以“資本主義時代之收穫為根據的”（馬克思：“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第七九三頁）。如果發展不是簡單地否定、消滅，而且還是保存；如果在現有的應當毀滅的東西以內，發現出值得保存的東西，這時發展才是一種進步。進步就是以前諸發展時代底收穫之積累。有機體之發展不僅由於適應，而且由於遺傳，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階級鬥爭不僅在於毀滅和重新創造，而且在於征服，也就是說在於現存的保存；科學之成功，若不承襲原先的收穫，又不對原先的收穫取批評的態度，就沒有可能；藝術之進步並不是單單基於一種不承認有任何遺傳的天才的稟賦上面，而且也基於對前輩底典型的著作之理解上面。

只有實際底研究，才使我們能夠判斷什麼應該毀滅，什麼應該保存；辯證法在這裏就絕對地不相宜，它不能作為代替此種研究的尺度。它只是幫助研究系統化及磨鍊研究者之見解的一種手段。它的最高的價值就在此。然而它並不直接提供現成的結果。

從馬克思學說本身中推論出它必須為較高的學說所代替，這種意見是由於對馬克思的辯證法有了錯誤的了解所致。在這一學說中



何者是錯誤的，何者為科學之永久的收穫，這個問題之解決不是引用辯證法，而是要研究各種事實。但是從我的觀點看來，這種研究直到現在無論如何都不會達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地步。我只看見一些猶豫和懷疑，但沒有看見一種能夠超越馬克思學說的新真理。

但是單單猶豫和懷疑，在辯證法意義上還不算是否定，還不算是超越現有知識界限的繼續發展，也不算是勝過現有的理論。懷疑的原因，照我的意見，如其說是由於被懷疑的學說，勿寧說是由於懷疑者的本身。我想這不僅根據研究這些懷疑的結果是如此，就是根據個人的經驗也是如此。

在我研究社會主義的初期，我極不同情馬克思的理論。我對於馬克思理論曾採取批評的和不信任的態度，正如現在那些譏諷我盲目拘守教條的人一樣。但是我反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了。那時，以及後來每當我在基本問題上有了任何懷疑，最後我總是看出，其罪在我，而不是在我的先生；對問題加深研究就使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樣看來，每一次新的研究，每一次再考察的企圖都使我更加信服，更加承認那種學說，這學說底應用及推廣成了我畢生的責任。

農村經濟發展底現象引起了極嚴重的對“馬克思教條”的懷疑。本書就是要指出，這些懷疑究竟有什麼根據。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於柏林



# 上 卷

## 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經濟的發展



## 第一章 緒 論

在現代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與僱傭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是對我們這一世紀發生影響底動力。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存在於現代社會內的唯一的生產形態。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外，還可遇到保存到現代的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式的殘餘，另一方面，在國家或公社經濟的某些形態與協同組合內，已經發見新的較高的生產方式的萌芽。資本家階級與僱傭無產階級間的矛盾還不是現代的唯一社會矛盾。除這兩個階級以外及在這兩個階級之間還存在着許多其他的階級——在它們之間，有社會的上層與社會的渣滓：一方面有君主和他的廷臣，另一方面有各種游民。他們一部分是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形態的產物，一部分是資本主義本身底需要所產生的，或最低限度是資本主義在其成長中所保留下來的。這些一部分正在發展的，一部分正在垂死中的階級的極其複雜與不斷變化的利益，以極複雜的形式，一方面和資本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和無產階級的利益相交錯，但並不與任何一個基本階級的利益完全相結合。這些中間階級使我們今天的政治鬥爭具有動搖的、充滿各種奇怪的意外的性質。

要想研究支配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律的理論家，不應當因為這些現象的龐雜而感到困惑。他應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純粹的形態中，在完全擺脫圍繞它的其他生產形式的殘餘與萌芽的典型形態

中去研究它。反之，實際政治家如果以為資本家及無產者是現代社會中活動的唯一因素，而不注意所有其他的階級，那就會陷於極大的錯誤。

馬克思底“資本論”僅論述資本家及無產者。但在同一作者底“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及“德國革命與反革命”<sup>①</sup>兩書中，就與此相反，除了資本家及無產者外，君主與游民，農民與小資產者，官僚與兵士，教授與學生同樣起着作用。

在所有中間階級中，不久以前尚佔我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民，經常引起本世紀民主的及革命的政黨之特殊注意。城市的政黨以為農民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甚至有時引起災禍的東西。以前和教會、王侯、貴族進行過頑強鬥爭的農民，現在却很緊固地依靠這些制度。農民常常用像其他階級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那樣力量替自己的剝削者盡力。民主制所給予他的武器，他却往往用來反對他自己。

社會民主黨起初不大注意農民。社會民主黨並不是資產階級字義上的民主主義人民黨，企圖滿足人民各階級的利益（不管他們的利益是如何的矛盾）的世界恩人，而是階級鬥爭底政黨。社會民主黨在其生存的最初幾年中完全致力於城市無產階級之組織。社會民主黨會期待經濟的發展會替它清洗農村中的地盤，有如在城市中一樣，也期待大生產與小生產間的鬥爭，將使後者從它們之中排擠出去，於是，純粹無產者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到後來就很容易爭取農民羣衆。

現時社會民主黨已如此健全地成長了，城市對於它已經不是十分廣大的活動場所了；但是社會民主黨一走進農村去，立刻就碰到那種曾經使以前的民主革命黨驚惶失措的神秘力量。社會民主黨看見，在農村經濟中小生產的消滅，絕不是馬上可以實現的，較大的農

<sup>①</sup> “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著者不是馬克思，而是恩格斯。考茨基在一八九八年時還不知道這件事。——俄譯本編者

業企業只是緩慢地佔有那種不得不讓出的地位。社會民主黨所依據的全部經濟理論在應用到農業方面的時候好像是不正確似的。但是如果事實上這種理論在對農業的關係上是不合實際的，那末這當然不僅應該完全改變原有的策略，而且要完全改變社會民主黨底一切原則。這個問題，宗巴特在其最近著作中很尖銳地提出來了：“如果在經濟生活中，尚有未曾經過社會化底過程的諸領域，而且正由於那種原因，即小生產在某些場合中比大生產有更大的意義、更能生產；那怎麼辦呢？這裏便包含整個問題，它是以土地問題形式提出在社會民主黨之前的。是不是在原則上要強迫農民改變社會經濟底觀念以及從這種觀念產生出的政綱呢？我們假定，實際上得出的結論是，在農業的發展中並沒有走向大生產的傾向，而恰恰相反，在農業發展底範圍以內，大生產並不常是較高的生產形式。於是我們就提出一個有決定性的問題：我們應不應做那種意義的民主黨人，爲了爭取小生產者，相當地改變我們的政綱，並放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目的；抑或我們應當仍爲無產階級的政黨，保持這種社會經濟的觀念及目的，因而將其他分子從我們的運動中排斥出去？

“我之所以說‘如果’、‘假定’等等，這是因爲直到現在就我所知道的，尚無把握可以確定，何種發展的傾向存在於農業之內，何種生產形式在農業中是較高的，以及一般地講來，一定的生產形式在這一領域內是不是較高的。可是我可以斷定，馬克思學說的主要點在此地是不適用的；我可以斷定，馬克思底推斷若不加以繼續研究就搬到農業底領域內是不行的。他關於土地問題曾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但是他關於發展的理論，是以大生產之發展、羣衆之無產階級化爲根據的，他的理論，係從這種發展中得出社會主義之必然性的結論，對於工業的發展是毫無疑義的，但對於農業的發展就不然。我覺得，只有科學的研究才能填補馬克思理論中的這種缺陷。”<sup>①</sup>

我們只怕在這一方面我們不得不長時期地等待着。關於何種地產更能生產：大地產抑小地產？這一爭論問題一世紀來許多經濟學者都想法來解決，並且這一爭論的結局還不能判然分明。可是這並不妨礙在理論家不斷爭論關於農業中小經營及大經營之優勢的時候，農業已沿着發展底道路邁步前進了，這種發展是無可爭論的，而且是可以很明顯地被描畫出來的。但是要研究這種發展，無須特別注意於大生產與小生產間的鬥爭，及離開社會生產底整個進程而單獨觀察農業本身。

無疑地——而且我們認為這是老早就證明了的——農業並不是沿着像工業一樣的模式發展起來的。農業遵循着自己的規律，但這絕不是說農業的發展與工業的發展相對立，並與之不相容，恰恰相反，我們打算指出，它們兩者是向着一個目標進行的。不應當把它們彼此孤立起來，而是必須把它們視為一個同一過程不可分離的要素。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理論，不只是將這一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歸納為下述的公式：“大生產排擠小生產”，好像用心記住了這一公式的人，就已經把握着了解全部現代經濟的關鍵似的。

為要以馬克思理論的精神來研究土地問題，只是回答小生產在農業中是否有前途的問題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農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所起的一切變化。我們必須研究，資本是否掌握農業，假如掌握住，那末是怎樣掌握的；農業是否產生一種變革，是否搗壞舊的生產形態，是否引出新的生產形態。

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決定，馬克思底理論是否適用於農業，是否註定要使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過程恰好就在一切生產資料中最重要生產資料——土地之前停止下來。

我們的任務很明顯地是要說明所有這些問題。

① 宗巴特：“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德文版，第一一一頁。



## 第二章 農民與工業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通常(某些殖民地除外)首先在城市內，首先在工業內發展起來。農業大部分長期地仍為非資本主義的，並且農業的生產在工業發展影響之下已帶有別的性質。

中世紀的農民家族完全是，或幾乎完全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公社，它不僅生產自己消費的食料，而且自己建築自己的住宅，自己製造傢具及家用器具，自己做大部分自己的簡單的工具、鞣製皮革、加工製造亞麻及毛、自己縫自己的衣服等等。農民自然出現在市場上，但是在市場上他出賣的僅僅是他生產出的剩餘品，而購買的(除鐵以外)僅僅是奢侈品，在這種情形下，他盡可能地省吃儉用。可以依靠於市場狀況的，是他的生活上的方便或奢侈品，但不是他的生存。

此種自給自足的公社是不易破壞的。可以使它陷入最壞境地的，是歉收、火災、敵軍的侵襲。但是甚至這些命運的打擊，還只是暫時的災難：它們並未毀滅了生存的來源。堆放在倉庫內的大量儲蓄品往往預防了歉收的後果；牲畜供給乳與肉；森林及水也供給生活資料。在森林裏就有建築用的木料，以便在已焚毀的家宅的地基上建起新的房屋。農民為避免敵人常和牲畜及其他可以運走的財產躲到森林裏，等到敵人離開以後再轉回來，敵人的侵襲無論怎樣劫掠一空，但總不能毀滅田園、牧場、森林這些農民生存的基礎。只要有必需的勞動力，只要人與牲畜仍舊無恙，那末一切損失馬上就

會恢復起來。

在我們這一世紀——十九世紀內，保守的經濟學者西斯蒙德就描畫了此種獨立農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此種獨立農民的地位便是他的理想，“農村的幸福——意大利及希臘光榮時代的歷史已將農村幸福描畫給我們——在我們的時代並非不知道的。凡是可以找到農民土地私有權的地方，那種幸福、那種安全、那種信賴將來、那種同時保障幸福及美德的獨立性，到處都可同樣地遇到。因自己兒女的幫助在一小塊祖遺土地上做全部勞作的農民，既不付租金給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又不付工錢給地位比他低的人。他使自己的生產適合於自己的消費，吃自己的麵包、喝自己的酒、穿家內做的毛衣及他自己培植的亞麻製的衣服。這樣的農民不大關心市場的價格，因為他很少做買賣，而且向來就不會因商業危機而遭破壞。他絕不畏懼將來，他把將來想像為美景；其實他為自己的兒女底利益着想，甚至可以說為來世着想，總要利用他日常勞作空閒的每一瞬間。他需要一些時間，以便將種子撒在地裏，經過一百年後就長成碩大的樹木，他開掘溝渠，永遠使他的田地乾爽，引導泉水，不倦地往復勞作，縮短他休息的時間以改善一切圍繞着他的各種牲畜及植物。他的小的遺留的地產，便是真正的儲蓄銀行，它常常準備接收他全部零星的節餘，把他休息的片刻時間都變為價值。自然界的永久活動力使他的土地肥沃，而且百倍地報償他的勞動。農民很敏活地感覺到和他的私有財產相關聯的幸福。”（見西斯蒙德：“政治經濟學研究”，第一卷，第一七〇、一七一頁）

六十年前一個最著名的經濟學者，在他那個時候還能夠用這樣鮮明的色調描畫小農的幸福。自然，人們可以承認，這種情形被描畫得太漂亮，其實這不是農民底一般狀況的描畫。西斯蒙德主要是看到瑞士及上意大利的某些區域，——但是無論如何，他所描畫的情景

不是想出來的，而是一個銳敏的觀察者從實際生活中攝取來的。

拿整個歐洲，包括瑞士在內的現代農民的狀況和上述情景比較起來，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過去這個時期內，曾經發生了極巨大的經濟變革。

農民手工業主要為城市工商業所排擠就是此種經濟變革的第一步。

農民家族內部只能有不甚顯著的分工，此種分工甚至並未達到男女間的分工。無怪城市工業迅速地超過了農民手工業，並且替農民製造其所不能完全製造的，甚至往往完全不能製造的家具及工具。但是工商業的發展在城市中產生了新的需要，這些新的需要，如像新的改善了的工具一樣，假若城市與鄉村間的交通愈靈活，則其侵入鄉村亦愈迅速，愈難阻遏；——農民的工業已不能滿足這些需要。呢製衣服代替了麻布短衣及羊皮短外套、草鞋被皮鞋所排擠等等。軍國主義把農民的子弟吸引到城市去使他們認識城市的需要，亦異常有力地促進這一過程。煙草及燒酒消費的普遍主要為軍國主義所造成。城市工業最後在某幾部門內已達到這樣卓越的地步，即將農民工業底生產物變為奢侈品，省吃儉用的農民不讓自己消費這些東西，於是就停止了這些東西的生產。例如，比印花布更加廉價的棉織業的發展，到處都受了限制，並且在許多地方完全消滅了為農民自己消費而種植亞麻。

為滿足自己消費而生產的農民的工業之衰落，在中世紀由於城市手工業的發生就開始了。但是後者只慢慢地侵入了農村，它的勢力限於城市近郊，且並不明顯地接觸到農民的生活條件。就在西斯蒙德頌揚農民幸福的那個時期，伊麥曼（在其“空談”〔Münchhausen〕一書中）就描寫了西凡尼亞一個大農家長的神情，這個家長說：“誰要是向鐵匠定做自己能做的東西，他便是一個蠢才，”並且作者敘述這

個家長，說他“親自動手修理家內一切門窗戶壁，修理抽屜及箱籠，或者在方便的時候，就重新去做這些東西。我想，如果他願意，他會成爲一個精巧的木匠並且會做真正的櫥櫃。”在冰島就在現時也沒有一種當得起這種名稱的特殊的手工業。那裏的農民在現在還是他自家的手工業者。

只有資本主義的工業才強大到這個地步，它迅速地排擠供自己消費的農民家庭生產，而且只有資本主義的交通制度用它的鐵路、郵政、報紙才將城市的觀念及生產品帶到國內極偏僻的地方，於是不僅將城市近郊的人口，而且將全體農村人口都帶進資本主義發展底過程以內。

這一過程愈前進，則原始的農民家庭生產亦愈加崩潰，農民感覺貨幣缺乏的痛苦亦愈厲害；他現在需要貨幣不僅是爲了購買並非第一等必需的物品或奢侈品，而且爲了購買必要的，他不能不用的物品。沒有貨幣他就不能再進行自己的經營，他就不能再生存下去。

但是，那些剝削農民的領主們、那些封建貴族、王侯及其他掌握國家政權的人們，對貨幣的需要也同時發展了而且增加了。大家知道，這種情形使農民實物貢賦變爲貨幣貢賦，但同時，又產生了一種傾向，更加增高這些貢賦，因而農民對貨幣的需要就更加增加了。

農民用以獲得貨幣的唯一方法，就在於把自己的生產品轉化爲商品，拿到市場上並在市場上出賣。不言而喻，他能迅速找到買主的生產品，並不是他的落後工業的製造品，而是城市工業所不製造的那些生產品。這樣看來，農民最後必然成爲我們現時在字義上所理解的純粹的農業生產者，但他起初絕不是這種字義上的純粹的農業生產者。可是他愈是成爲純粹的農業生產者，工業愈是與農業分離，則西斯蒙德在有自由農民的地方所遇到的農民生活中的獨立性，有保障及自由自在也就愈加消失了。

# 143745

農民現在已陷於依靠市場的地位，市場顯得比天氣還更難掌握和更不可靠。農民最低限度對於天時之不測還能夠預防到某種程度。藉排水渠的幫助他可以調節過於潮濕的夏季的影響，他用灌溉設備可以抵抗過分的乾旱，他用柴火堆的煙可以預防自己的葡萄園不受春天的冰凍等等。但是他在價格低落的前面就完全無能為力，他毫無辦法出賣找不到主顧的麵包。而且那種從前對他是可稱慶的事——好收成——現在對他反成爲可咀咒的了。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初期特別顯著地表現於西歐，尤其是在農業一般地已帶有商品生產性質，而交通工具仍然還是不完備及不能以別一地方之剩餘來彌補這一地方之不足的地方。歉收迅速地提高了穀物價格就和豐收降低了穀物價格一樣。在法國小麥收穫提供了如下的收入：

年 代	一公頃的平均收穫 (單位百公升)	一百公升的價格 (單位法郎)
1816	9.73	28.31
1817	—	36.16
1821	12.25	17.79
1822	—	15.49

法國農業經營者在一八二一——一八二二年有三倍多收成的時候，一公頃所得收入約爲二百法郎，還不及一八一六——一八一七年三分之一。無足奇怪的，那時法國國王對於用任何法律均不足以“預防由於過度的豐收所招致的損失”的情形向議會表示自己的惋惜。

農業生產愈是成爲商品生產，則農業生產愈加不能停止在生產者直接出賣商品給消費者的這一原始階段上。市場——農業生產者爲它而生產——相隔愈遠，擴張愈大，則直接賣給消費者愈益不可能，生產者亦愈益需要仲介人。商人就是介於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他比較生產者更能了解市場情況，他能在某種程度上支配市場並且

利用這一點來剝削農民。

高利貸者很快和穀物及牲畜商人結合起來；其實，這常常就是一個同一的人。農民的貨幣收入在不好的年成不夠彌補他對貨幣的需要；他除了利用借貸，抵押自己的土地外，別無其他辦法。他陷於新的依賴，他受到的新剝削，其中最壞的是高利貸資本的剝削開始了，他只有加倍的勞動才能避免高利貸的剝削。這種情形不是常常做得到的；新的負擔對於他往往顯得太沉重，結果，不得不拍賣他的祖遺的土地，以所得價款滿足高利貸者及收稅吏。從前，荒年、火災及敵人的侵襲不能使他淪落到的地步，現在穀物及牲畜市場上的危機，却可以使他淪落到這個地步。市場上的危機對於農民不僅帶來暫時的窮乏，而且能夠從農民手中奪去他的生活源泉——土地，最後完全使農民和土地分離，使農民變為無產者。在農民的自給的家庭工業消滅的地方及在貨幣貢賦負擔加在農民身上的地方，自由農民之幸福、獨立及保障就這樣完結了。

但是，城市工業的發展同樣亦為原始農民家族的崩潰打下一個基礎。以前農戶所有的土地，足夠維持家庭的生活，而且在有租稅的地方，亦足夠支付這種租稅。

但是由於農民對於市場依賴性的加強，由於他對貨幣需要的增加，即是說由於他必須為出賣而生產的生活資料的剩餘之增加，此種均衡就逐漸被破壞了。在生產關係不變的時候，農民為了滿足全家需要的土地就覺得太少了。可是，他不能隨意變更已經確立的生產方式及擴大其土地使用底面積。自然，他可以任意縮小他的家庭，如果他的家庭太大的話，讓過多的勞動力離開自己的家庭去做農業勞動者，去當兵，或去做城市的無產者，或移往於美洲，在那裏他們找到了新的故鄉。農民家庭曾經盡可能縮減它的人數。

另一情況亦曾有同樣的影響，農業並不是需要經常同樣數量的

人類勞動力的一種事業。有時，在農忙的時候，尤其是在收穫時候，它需要很多的勞動力，在別的時候又差不多完全不需要勞動力。夏季農業中勞動力之需要比冬季多一倍、兩倍、甚至常常多三倍。

當農民手工工業存在的時候，農業中對勞動力需要的這種差別並不顯著，如果沒有田作或田作不關重要，農民的家庭就可分出大部分時間在家內勞作。這種情形因農民手工業的消滅而終止了。這便是農民把他的家庭人數減縮到最小限度的第二種原因，因為這樣，在冬季他便可以不養一個閒人了。

我們在這裏只談農民家庭生產消滅底影響。農業生產中的變化也可以使這種影響麻痺，例如從間田法過渡到需要更多勞動強度的牧畜業；但是，反之，其他的變化則能夠使這種影響加強。例如，打穀是在冬季進行的一種最重要的農業勞作。打穀機之採用就終止了這種勞動，因而對於農民家庭之繼續減少是一種強有力的動力。

留在家庭中的人在夏天自然必須更加努力工作，可是他們的力量雖極度緊張，却不能完全代替離去的人底勞動力。他們不得不招請外力來幫助，招請僱傭勞動者，但只是在農忙期才僱用他們，而在不再需要他們的時候就可以把他們解僱。付給他們的工資無論怎樣多，但這總比整年養活他們所代替的家庭成員的費用要便宜得多，這樣的僱傭勞動者是由無產階級化的農民，而同樣由尋找副業的農民以及那些在自己家內，多餘的農民子女供給的。

這一同一的過程，一方面創造了對於僱傭勞動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則促成他們的出現。這一過程使有些農民無產化，這一過程，像我們看見的，縮小農民的土地並把那些對於農民成爲多餘的，農民的子女投到勞動市場上。最後，這一過程使最小的農民除了自家的經營以外尚須尋找副業。他們只有很少的土地，其生產品除滿足家庭需要以外再無剩餘；他們沒有農業生產品可以拿到市場上出賣。他

們可以出賣的唯一的商品就是他們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只能斷續的全部用於自己的經營。在最大的農業經營者方面去做僱工，便是把勞動力轉化為貨幣的一種手段。

十七世紀前我們只在很少的場合看到日工、僱工及女工在農民方面勞作。只是從這時候起僱用他們才成為普遍的現象。但是家庭成員之為僱傭勞動者所代替，也影響到那仍舊留在自己家庭中的勞動力的地位。他們同樣更加降到替家長服役的僱傭勞動者底地位，在那個時候，如家族的遺產，農民的田宅，同時更加成為家庭代表者專有的財產。

從前農民的家庭協作組合，係專用自家的力量管理自己的土地，這種地位現時在較大的農民經營內，則為僱傭勞動者所佔據，他們在土地所有者監視之下耕種他的土地，飼養他的牲畜，收穫他的穀物。

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階級對立侵入農村，甚至侵入農民的家庭並且破壞了利益之舊的和諧及共同性。

我們已經說過，整個過程還在中世紀時就開始了，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加速這一過程，使其到處對於農村人口之生活條件表示出決定的影響。可是這個過程還沒有完結，而且現在繼續發展，它征取一切新的地方，它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更加把自給的農民生產之不同部門轉化為商品生產部門，加強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用僱傭勞動來代替家庭勞動。這樣看來，城市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就已經能夠使從前農民生存底基礎發生完全的變革，即使資本還未侵入農村經濟內，即使大生產與小生產間之對立還未表現出來。

資本並不是把它的勢力限於城市工業。資本一旦充分地加強起來，它便使農業屈服於自己。



## 第三章 封建時代的農村經濟

### 一 三田制的經營

這裏沒有篇幅來研究農民所有制發生底條件。我們的目的是要充分說明農民所有制底狀況和那些生產關係，它們是在日耳曼人所佔領的國家內、在民族急劇遷徙時代以後發展起來的，這些生產關係在那裏除少數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還保存到十八世紀末葉，而有些地方還保存到我們的時代，這些關係是在農民的牧畜經濟所需要的公社土地佔有制，與適應農民的農業需要的土地私有制之間的一種調和。

像每一個農民的家庭代表着自足自給的家族組合體一樣，每一個村落都代表着在經濟關係上，一個閉塞的獨立滿足一切自己需要的公社組合。

我們在這裏並不把聚落的形式視為分散的個別的農莊，不是把它視為閉塞的農村；這一種形式長期地被認為是原始的，但在實際上，像現在所確定的，這種形式只是一種例外的形態，而且是由於歷史的及地形的特性發生的。農村是聚落之正常的及典型的制度，我們在下面的敘述中就要說到。

已轉變為私有財產的田它是農民經濟底出發點。除住宅及必要的經濟建築物以外，周圍用籬笆圍起來的土地都屬於他們。這種籬

笆圍着菜園，在菜園裏種植宜於食用的植物、蔬菜、亞麻及果樹之類。農村就是由多數或少數這樣的田宅構成的。村後有分爲許多塊的公社土地、耕地。在三田制盛行的地方（三田制在大多數場合下存在的），這些土地被分爲三塊地或三塊田。每一塊地又被分爲不同的長方形或三角形的地，即是分爲若干塊耕地，按照地形及土質而彼此不同。每個田宅在每一耕地中都有它的份地。在份地後面有不加劃分的公社土地，（阿爾門德<sup>①</sup>公地）即森林與牧場。

在未分配的公社土地上面進行着共同的經營。在耕地上每個家族專爲自己而耕種自己的土地，但不能隨己意經營。在田地上種植穀物以養活人，但是牧畜業——牧場經營——在整個農村經濟生產中還有主要的意義。如果農業成爲各個家族底私事，那末牧畜經濟還仍舊由全公社共同管理。這種經濟形式對於財產關係是有影響的。耕地，是私有財產，牧場則是公共的。事實上，每一塊田地收穫以後就作爲牧場，土地使用權於是就轉到公社手裏，農村公社將全部田地用作公共的牧場。收穫後的田地及開田都變爲全村牲口的公共牧場。農村公社底每一成員要照着適合於自己願望的制度去經營自己的土地，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講來是強制的輪種法在支配着；在每塊土地內或在每一塊田畝上，份地所有者必須以同一的方法經營。每年三塊田中有一塊空閒着，另一塊田種植冬麥，第三塊田種春穀。田地的耕作每年輪換着。牲畜的飼料，除利用收穫後的田及開田之外，則由草地，經常的牧場及森林供給；此種牲畜底勞動力、糞料、乳及肉對於農民的經濟都是同樣的重要。

日耳曼民族定居的地方，到處都是此種農村經濟的生產制度支配着。至於農民是否能夠保證自己完全的自由，抑或他們遷居在大

---

① 阿爾門德爲中世紀日耳曼及瑞士的農民公社。——譯者

地主底土地上，而納給他租稅，他們是否因為強有力的統治者底保護而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抑或因暴力而陷於依賴，——這些問題，都是沒有關係的。

此種保守的與防衛的（在好的字義上）生產制度，其特徵就在於它具有極大的力量及穩固性。農民底幸福及安全基礎，並不亞於手工業者，這種基礎，便是公社制度。有森林及牧場的三田制不需要任何外來的東西。它自己生產了土地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及保存地質所必要的肥料。除此以外，牧場及耕地之公用，造成了農村公社社員間的堅固結合。這便是保障他不受外力方面的過分剝削。

但是這種經濟制度無論怎樣堅固，城市工業及貨幣經濟之發展已給它以致命的打擊，就和給農民手工業以致命打擊一樣。

## 二 三田制爲大地主經濟所束縛

我們已經看到，城市工業也怎樣增加了那些完全或部分地吸取民脂民膏的權力，即封建貴族及已經發展起來的國家對於貨幣的需要。我們同樣看見了，在這種影響之下，農民不得不生產糧食來出賣，他們的市場便是日益發達的城市。由於這種情形，農村公社中之均衡就動搖了，因為公社的整個經濟制度是要自己滿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不從外邊得到絲毫的東西而且也不拿絲毫的（最少，不拿大批的）東西到外面去。

起初差不多在所有的農村公社內，假若不得到公社負責人的允許要把各種消費品如：乾柴、乾草、稻稈、糞料之類運出公社或轉讓到公社範圍以外，那是嚴格禁止的。種植在公社以內的穀物必須盡可能在公社內進行加工和消費。這種情形也適用於在公社內飼養的動物；在公社內飼養的豬不許賣到外邊去。同樣根本規定，在公社底土

地上生長的穀物要在公社內打磨、燒烤及食用，要自行用葡萄釀酒，要自行飲用葡萄酒，可不許拿出公社以外；在許多農村公社內，封建法律就是從這種習俗中發展出來的。不運出絲毫東西而且全部消費在自己的農村內，這種傾向在封建剝削時代往往採取了異乎尋常的形態。

馮·毛萊爾 (G. L. Fon-Maurer) 在“農村公社史” (“Geschichte der Dorfuverfassung”, 第一卷, 第三一六頁) 中敘述一個埃爾薩斯的地主, 在一五四〇年爲要空出酒甕來裝新收糧食釀造的好酒, 曾強迫自己的農民當作一種勞役去飲乾甕中所有已經酸化的葡萄酒, 根據毛萊爾的報道, 在一本舊的紀事錄中說: “他們必須在一星期內飲葡萄酒三次, 方可用麵包及乳酪代替交納地主的租稅。農民喝得酩酊大醉以後, 他們彼此鬧吵起架來, 地主就處罰他們的無禮, 而且這樣地得到比他出賣葡萄酒時還要更多的酒錢。”我國釀酒的貴族地主應當豎立紀念碑, 紀念這位果敢的基督教德國的英雄, 他在很早時期就有這樣的毅力捍衛酗酒之風、捍衛自己的利益及符合於基督教社會的秩序。

一旦爲市場而生產對於農民已成爲必要的時候, 封建法律所制定的諸限制即已難於實行或已變爲無益的障礙了。但是那種不再回復到土地的食品之不斷的輸出到城市, 是和土地之逐漸的枯竭與貧瘠並行的。

同時公社經濟的平衡之被破壞, 還有完全不同的形式。由於土地生產物變爲商品, 獲得了市場的價值, 土地本身也隨之變爲一種具有價值的商品。一旦農村經濟內商品的生產採取了更廣大的範圍 (即在新時代的開始), 土地底過剩消滅了。此種過剩, 在日耳曼人已成爲土著的居民, 並代替游牧人的牧畜經濟 (此種經濟附帶有廣泛發展的狩獵及不甚重要的原始農業), 採取了三田制經濟的時候, 還可

看到關於三田制經濟，正是我們在這裏談到的。

一定的領土能够養活一定的最大限度人口，是與每一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日耳曼人到民族遷徙時代是否達到了這個最大限度，人口之過剩或無保障是否迫使他們侵入羅馬帝國，這仍舊是待爭論的問題。我們所知道的，只是過渡到較高的農業制度（他們應當歸功於與羅馬文化的接觸），異常地擴大了日耳曼民族在民族遷移後一時期所佔有的領土之食糧的容量。極少的人口不足以滿足新生產方式之需要。然而這種生產方式很有益於許多後代人的生存。所以急劇的民族遷移及其結果一旦停止了，並且在歐洲和平及安全穩固到了某種程度，人口就開始迅速地增加了。人口之增加很容易在廣大而無人居住的地面上找到自己必要的土地。由於農村居民人數之增加，耕地面積或者將共同使用的土地之一部分和它結合而增大起來，或者將共同使用的土地之某幾部分分出來，這樣就使新公社——這種新公社就是發生在舊公社鄰近的小農村——得到了它的土地。另一方面諸侯賜給寺院及其武士團中之貴族以極大的且幾乎完全未耕種過的地面，這些土地所有者又將這些土地授與移民使他們繳納些許的租稅。由於斯拉夫人不斷地被逐到東方去，日耳曼的拓殖者便獲得許多新的領域了。

十五世紀初期在捷克古希特戰爭以及在波蘭條頓族武士團的政權之傾覆，完結了日耳曼向東方拓殖的繼續擴張。同時中歐的人口，雖然還未達到在當時經營方法之下可能達到的最大限度，可是已大大繁殖了，已不再感到人口的缺乏，勞動力的缺乏了，土地已經不像先前不給價的土地那樣豐富了。於是，壟斷一切生產資料中最重要生產資料就有了可能，同時也表現為一種傾向了。從此發生了農民與封建貴族間最殘酷的和頑強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最近的時期，而且從來沒有中斷過，雖然在德國這兩個階級間堅決的鬥爭還是在十

六世紀才發生。他們鬥爭的結局差不多到處都是有利於封建貴族，封建貴族服從強固的國家政權，因此在反對農民的鬥爭中得到了國家政權的幫助。

勝利的貴族開始自己製造商品，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方式乃是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之奇怪的混合物。勝利的貴族在自己的大經營內開始生產出剩餘價值，但通常不是在僱傭勞動的幫助之下，而是在封建強制的幫助之下。在經營森林業、牧畜業及農業的特種方法幫助之下，貴族們減少了農民土地底面積並破壞了三田制的基礎。

森林業更易適合於封建資本主義剝削的目的，適合於大地產中商品生產的目的。一旦城市的發達使木材成爲暢銷的商品，而在木材還沒有爲石炭或鐵所代替的時候，它作爲燃料及建築材料之用，其數量比現在多得多，——地主們就設法去霸佔森林；他們或者將森林從農村公社手裏（森林是屬於農村公社所有的）奪過來，或者在森林從前就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的地方，盡可能限制屬諸公社的柴薪及森林刈草場的使用權，也限制了森林內的牧畜權。

還在一五二五年的時候，起義農民在其所提出的十二條中的第五條，宣告：“第五，我們在砍伐柴薪時很受壓迫，因爲我們的領主霸佔了全部森林專供自己之用，窮人要是需要，他就得出雙倍價錢去買。我們的意見是這樣，僧俗界的全部森林，如果一向是屬於他們，而不是購買來的，就應當成爲全體公社底財產，而且公社的每一個社員爲了自己家庭的需要，應當有權無阻礙地和無代價地使用它們，同樣，公社每一社員若是需要，他可以無代價地去取木材來做木工，不過，爲要保護森林使不致爲人竊用起見，就要讓公社所選舉的人知道。”

農民喪失森林使用權，同樣是狩獵的發展所造成。

最初狩獵所用的武器同戰爭時所用的一樣，狩獵本身只是戰爭的預備學校，狩獵與戰爭是緊密地聯系着。當狩獵爲滿足一切自由的

人底需要成爲必要的時候，人同時就是一個戰士。當作爲獲得食物的來源的狩獵，讓位於農業的時候，“獲取生活資料的階層”與“保衛的階層”間之分工就成爲必要的了，這種分工自然還有別的原因。反過來說，戰爭愈成爲貴族底專職，則狩獵亦愈變爲貴族專有的娛樂。

當貴族成爲不必要的，並且現代國家從貴族手中奪去他在中世紀時進行戰爭、施行裁判及警察職務等等作用的時候，貴族就成了廷臣；貴族爲了要過愉快的生活和掠奪國家，都聚集在王宮內，如果貴族偶爾去巡視他的地產，那他就不知道在那裏有比狩獵更好的娛樂了。

可是，娛樂的狩獵和繁榮的農業是彼此不相容的。無數野禽只能棲息於濃密而廣大的森林內；除此以外，野禽是爲害和損傷農民之經常的源泉。

貴族愈是無用、愈是妄自尊大，則在農業與狩獵利益衝突的時候，他就愈益堅決地站在後一方面。農業的進步迫使野禽減少是有限度的，森林地之焚毀已被禁止，在大筆罰款底威脅之下農民們就不能從事狩獵，甚至不許他們殺害那些傷害他們田地的野禽。

一五二五年農民所提的十二條就證明這種情形；其中第四條說：“第四，以前有過這樣的慣例，窮人沒有打野獸、飛禽及在河流中捕魚的權利；我們覺得這是恥辱的，非人道的和違反神意的。有些地方領主們飼養野禽傷害我們，對於我們有很大的害處，上帝爲人類的需要而創造的全部穀物及青草，無益地爲無理智的動物所食盡，我們還得靜默地忍受這種其實是違反神意和反對同胞的罪惡。”

在往後幾世紀內農民的狀況還更不幸。在法國，只有大革命才算完結了這種不幸。但在德國經過一百年後普魯土地主貴族們還在帝國議會內大胆要求，農民們應當用自己的捲心菜餵他們的小兔，然而這種情形並沒有遇到大多數議員有力的反對。

在開闢了銷售木料市場的地方，把森林變為私有財產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簡單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經營雖然還帶有封建形式，却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進行的；在牧畜業的生產品（尤其是對於獸毛）有了廣大市場的地方及在土壤與氣候容許的地方，像森林業一樣，尤其是牧畜業既不需要大量的僱傭勞動者，又不需要耗費很多的資本，而它的技術方面，也很簡單，——在這樣的地方要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牧畜業豈不是更容易，更簡單嗎？像資本主義的森林業一樣，廣泛的資本主義的牧畜業也差不多只需要使廣大的牧場成為私有財產，並且地主們用盡心機在上述鼓勵他們這樣做的地方，盡力創造這種私有財產。十五和十六世紀在英國及西班牙，往後在北德意志底某些地方都是對牧羊業有優良條件的地方。地主壟斷牧羊業底權利，即壟斷牧羊於公共牧場之權。就是這種牧畜業底最和緩的形式。在德國農民戰爭完結後就開始對此發出怨言。但是牧羊業底收益往往鼓勵了地主們將公共牧場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有時甚至侵佔農民的土地並將耕地變為牧場。

在替農業生產品開拓了市場的地方，封建領主就設法在自己原有的經營內生產這些生產品。這當然不像森林業及牧畜業那樣簡單。農業需要很少附加的土地，但，反之，它却需要很多附加的勞動力及資本之相當的耗費。

中世紀每個地主，通常只在自己土地底某幾部分上親自或經過管理者去進行自己的經營。他把自己土地的其餘部分給予農奴，農奴應當一部分以實物作租稅繳納給他，一部分在他的經營內，在他的家內執行勞役。我們已經看見，一旦糧食市場在城市中出現，一方面形成了一種可能，另一方面發展了將這些租稅轉變為貨幣稅的那種趨勢。但是在地主經濟開始為出賣而生產的地方，這種傾向就和別的傾向衝突起來；僱傭勞動還不怎樣普遍，地主土地上的經營全靠



農奴底強制勞動。地主的土地應當生產的生活資料之剩餘愈多，則他對勞動力之需要亦愈大，所需的土地亦愈多。這一方面，就引起一種趨勢：以縮小公社土地之不可分的一部分，特別是牧場，或者直接以驅逐農民，使他們遷出的辦法來擴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就是增加勞役，相當的限制農民的遷出，因為農村中農民愈少，則地主經濟中之勞動力亦愈少；但是農民之遷出本來就有力地激起勞役底增加，因為地產中勞動者愈少，則加在每個勞動者身上的勞動亦愈多。

所以，我們就看見，商品生產底發展在農業中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傾向，一切傾向最後都這樣地發生影響：即在真正的人口過剩尚未到來以前，即是說，在人口還沒有達到那樣的密度（這種密度使農民在農業中佔支配的生產制度之下已不可能過活）的時候，農民即已缺乏耕地，尤其缺乏草地及森林。

農民生活底一切方式已徹底為這些傾向所動搖。農民的生存條件內所發生的深刻的變革已經在農民的食物中表現出來了。

### 三 農民開始過半飽生活

我們在這裏要稍微離開本題，來討論一個題目，這個題目雖然和我們的主要問題只有很疏遠的聯系，可是我們覺得，它對於我們的主要問題多少能有些幫助。

現時很流行的學派，憑藉着康德及斯賓塞的學說，不作深遠的研究，而喜歡把自然界底規律應用到社會歷史方面。自然科學的許多成就在我們這一世紀是這樣光輝，它們很容易使自然科學家相信，似乎現在在他們的錦囊裏有了妙計足以解決那些甚至離他們很遠的領域中的一切的謎。另一方面，簡單地把正確地被確定了的自然規律推廣到社會生活方面而不作複雜的研究，以發見社會生活中特殊的

固有的規律，這對於某些社會學家倒是很方便的。

其中承認氣候與食物間有緊密的聯系，即屬此種自然科學的社會學原理。黎比赫說：“即使我們在寒帶及溫帶地方消費同一數量的食物，然而天道以其無窮盡的聰明造成這種食物本身含有完全不同量的碳素。南方人吃的水果，在新鮮的時候含有的碳素至多百分之一二，而北極地帶的居民在食物內所消費的脂肪及鯨油，則含有百分之六六——八〇的碳素”（見“化學書簡”〔Chemische Briefe〕，第五卷，第二四六頁）。

波克爾由此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印度之奴隸制就是此種民族之“自然”狀態，他把這種狀態“奉為不可超越的自然律”（“文化史”，德文譯本，魯格譯，第一卷，第一七一頁）似乎因為氣候使他們成為肉食者，植物在熱帶生長得很豐富，而這就促成人口之繁殖及“勞動市場”之充斥。

自然我們並不想否認大家公認的生理學論據：即人類在寒冷氣候中較之溫帶地方需要多量的碳素物，即是說，需要多量的肉食。

但是這種差別並不像普通所想像的那樣大。人類在北極圈內也以植物為食物。諾爾金希爾德說：“除魚和肉以外楚科特人消費極大數量的蔬菜及其他可食的植物……有些作家把楚科特人說成這樣一種民族，只以動物類為可食之物，他們就陷於極大的錯誤。恰恰相反，在一年中有些時候楚科特人，在我覺得是‘草食者’，較之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的民族更甚”（“乘‘維格’號大船環遊歐亞記”，第二卷，第一〇八頁）。另一方面，在熱帶地方普通食物並不是像波克爾所想的“完全是水果、米及其他植物”（見第五四頁）。完全肉食在那裏是例外。布赫涅這樣說：“在非洲肉的需要較少，這直然是一種謊話”（見“喀墨龍”〔Kamerun〕第一五三頁、一一六頁），並且許多事實都證實他的觀察。全非洲肉的消費很普遍。斯文佛爾特敘述黑人波果族愛

自然屈服於自己的技巧，一言以蔽之，依賴於他的生產方式。氣候，地面的結構以及其他物理條件之影響和這些比較起來簡直是無足輕重。如果我們舉出幾個處於同一文化程度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各個野蠻部落為例，那末我們就看見，就一般及整個而言，他們無論在大平原或在多岩的山上，在亞馬孫河或在密蘇里河差不多以同一比例把魚、野禽及植物作為食物而消費；顯著的差別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以氣候之影響來說明，而只能以地方條件，如河中魚產或豐富或不豐富等等來說明。

一民族的食物隨着他的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改變，雖然氣候仍舊完全不變。如果現代那不勒斯的拉薩羅林人以通心粉、鱈魚及蒜頭為滿足，那末他們之以此為滿足並不是因為他生活在優良的氣候內。在同樣的氣候內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像我們從“依里亞德”及“奧吉塞”<sup>①</sup>中所知道的，他們找到了享樂是在於他們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肉，而且耗費了“光溜溜的”脂肪——即滿足了愛斯基摩人的那種食物。

印度人同樣並不永遠是菜食者。在他們侵入恆河流域，成為那裏的土著以前，他們已是牧人——遊牧民，主要是以成為他們的畜羣的那些動物的乳和肉為食。只是在他們的生產方式改變（因為恆河流域對於農業而不是對於廣泛的牧畜業表現了有利的條件）以後，在廣泛的牧畜業為農業所排擠以後，拖犁及供給乳的牛之殺害，才漸漸地被認為是一種犯罪的浪費行為。

在農民飲食中類似的革命的改變，在我們的國家內十五世紀就開始了。還在十四世紀時森林、牧場、水以及家禽供給了豐富的肉

---

<sup>①</sup> “依里亞德”為古代希臘的詩，“奧吉塞”為古代希臘史詩，相傳為荷馬所作。——譯者

食。肉是當時全德國每個平民的日常食品。一天兩三盤肉，在日工看來一點不稀奇。

克賴登斯底統計指出，在當時肉的消費是怎樣的普遍。根據他的統計，一三〇八年在法蘭克福、奧得河一帶，肉的消費最低限度達到了每人二百五十磅，而柏林現時肉的消費每人在一三〇——一五〇磅之間。布勒斯勞於一八八〇——一九八九年間每個居民總共消費八十六磅。

在十六世紀各種情況都是不利於農民的。森林及水利，農民是享受不到的；野禽不是供給農民作食物而是毀滅農民的生活資料的。牧場受了限制：如果農民還飼養牲畜及家禽，那末，除了力畜以外，他必須將所有的牲畜與家禽在城市中出賣，以便獲得必需的金錢。德國農民的飲食很快變為貧乏，農民自己成為菜食者，像印度人一樣。

一五五〇年時瑞比亞人（Swabian）格呂赫·姆賴爾（Genrich Muller）悲傷地說：“回想起我的父親，他是一個農民，那時飲食絕不像現在一樣。那時每天都有肉及各種食物，在祭神日及宴會日，桌上擺得滿滿的；他們喝酒像喝水一樣，他們吃得很飽而且要多少還可拿多少去，因為各種東西都很充足。現在這種情形改變了。不幸的時代來臨已經有好多年了，一切都很昂貴，甚至富裕農民底食物也比從前苦工和日工底食物壞得多了。”

牧畜業之衰落很快地就引起穀物生產之衰落，因為牲畜愈少，則糞料亦愈少。在牧畜業之衰落引起耕牛減少的地方，土地的耕種就更加惡劣。以個人的勞動或以馬來担負的封建勞役之增加亦使土地的耕種，更加惡劣。正是在勞動力在農民自己經營內特別需要的那個時候，勞役使地主經濟奪去了農民底勞動力。

由於銷售在城市內的農業生產品數量底增加，就必須以特別的施肥及土地底深耕來彌補因此種增加而引起的虧空，但是恰恰從這

個時候起，肥料却更加減少，而耕種却更加惡劣。其結果就是農民經濟衰落，土地枯竭，收成銳減。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有好年成，農民也難於出入相抵：要使農民完全破產，只消一個荒年或一次敵人的侵入（在從前只是造成暫時的窮困）就夠了。

我們看見了，農民在十六世紀時已是菜食者；在十七及十八世紀農民在某些國家內一般講來已不能飽食了。大家都知道，拉布魯耶爾描寫了革命前一百年間法國農民的情況，他寫道：“存在着一種人形的動物，雄的、雌的、污穢的，被陽光蒸曬變為虛弱的；他們住在農村內並且株守在他們所堅忍耐勞地挖掘和耕種着的土地上。他們具有一種好像分得出字音的語言，在他們直立起來的時候，才現出人的面容。實際上，這就是人：他們在夜間爬進自己的洞裏，在洞裏吃黑麵包、菜根及水。”在某些農村內農民只吃青草及野生果實。克乃爾姆-菲拉（Klermon-Ferran）的主教馬西僚在一七四〇年寫信給弗賴爾道：“我國農民，生活在可怕的貧困之中……大多數在半年期間甚至缺乏成為他們唯一食品的大麥及燕麥製的麵包。”

在往往因為土地貧瘠的增大而重複出現的荒年內，情況尤為悲慘。從一六九八年至一七一五年法國的人口因為窮困底增加，從一千九百萬減至一千六百萬。

路易十五的統治較之路易十四的統治更為和平些，軍事的負擔在路易十五統治之下也比較輕些，但是封建貢賦的壓迫仍舊一樣。這些貢賦令人難以忍受；許多農民寧願拋棄了不能使他們免於貧困的土地，他們覺得做一個傭傭勞動者甚至做一個窮人或強盜還要好些。在一七五〇年時凱涅就已經說過，四分之一宜於耕種的土地仍舊荒着；阿爾塔爾·永格就在法國革命之前說，全部耕地三分之一（九百萬公頃以上）都空閒着！根據萊茵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報告看來，布勒塔尼三分之二的土地都空閒着。

境況並不是到處都像法國一樣的惡劣，在法國，政府當局無限制地統治了農民，而政權又完全操在十分傲慢的、粗野的、貪婪的和近視的宮廷貴族之手。在德國，農民已處於可憐的境地，且從自己的土地逃亡已成了常有的現象。

#### 四 三田制成爲農業所難忍受的鎖鏈

甚至在任何一個傲慢的地主貴族都不會強暴地縮小食糧地區的容積（即在農業中佔統治的經濟制度之下可能的容積）的那些地方，這種制度（三田制）在十八世紀期間就已更加變成了煩重的鎖鏈。有些地方人口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密度，即設法過渡到更高的經濟制度來擴大領土的容積。這樣的制度已經在英國發展了，英國因爲特殊的關係，封建的農業底基礎已爲一系列的革命——從亨利第八的改革起至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止，——所破壞，並且在英國已經替資本主義的、集約經營農業底發展清除出一條道路，資本主義的集約經營農業使牲畜飼養於廄內，種植飼料以代替牧場上牲畜之飼養，並且除穀物外還種植果樹。但是在歐洲大陸上要想在各處不經過革命就在既存的土地私有制關係內採用這種制度，那是不可能的。地塊零散現象和強制的耕作使任何革新在歷來的三田制內都成爲不可能。由於個別的農業經營者過渡到新植物，例如馬鈴薯底栽培，他們都是在自己的菜園內種植的，在菜園內，強制的輪種是不適用的，或者是在大塊土地上種植，這大塊土地是從公社中劃出來的。

除了有需要去擴大生活資料的生產以外也有需要使生產適應市場的要求，而傳統的生產方式要做到這一步，最低限度，對於最大的經營者，——他們爲市場而生產了大量的剩餘生產品——是不可能的。

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很能適合平等的人底協同組合之需要，他們大家過着同樣的生活方式並且都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那時大家都

有公社的田地可以使春麥、冬麥及閒田不斷輪換着，那是很方便的。一旦市場發生了不同的需要，於是在公社成員之間，便發展了不平等。他們當中有些人很難從自己土地中獲得他們自己所必需的東西，而別的人則生產了剩餘。一些人是最窮的，照舊只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他們牢牢地抓緊公社。對於別的人，公社就成爲一種鎖鏈，因爲市場無論需要什麼，他們却不能在自己土地上生產公社規定以外的東西。

在公共牧場殘存的時候，利益底矛盾也完全發展起來了。小農需要這種牧場，他無法過渡到更高的生產形式，公共牧場底分割差不多就使他喪失了飼養牲畜的可能。爲了土地施肥他必需盡可能有更多的糞料，公共牧場底分割雖稍稍增加了他的土地面積，但却減少了肥料的數量，因爲這種分割就迫使他飼養較少的牲畜。反之，大農把他們因爲自己有款項，可以更實際地利用的土地變作牧場，認爲是一種罪惡和浪費。許多理論家在英國已發展了的更高生產方式底擁護者都贊成他們。

爲了要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就必須消滅公社的土地與土地私有制之間的折衷辦法，中世紀的生產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妥協辦法，規定完全的私有制，分配公共牧場，廢除公用的土地及強制的輪種法，取消分散在不同地區的田畝的零散現象，把它們連結起來，並且就這樣使土地所有者成爲他自己土地（連結爲一整塊的土地）底完全的私有者，他可以在它上面進行經營，專門適合於競爭及市場之需要，這是必要的。

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方面這種革命無論怎樣必要，經濟的發展在農村人口當中並沒有創造出這樣一個階級，能夠傾向於這種革命並

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完成這個革命。

農業在現時並不是社會生活內的這樣一種完全孤立的現象；它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系。農村經濟不能從自身中產生的，那種革命的發端、那種力量，乃是從城市帶到農村中來的。城市經濟的發展完全改變了農村中的經濟關係，並使私有財產方面的變革成爲必要。也正是此種發展在城市中創造了那些革命的階級，他們自己舉行起義反對封建國家而把政治的及法律的變革帶進農村去，在農村中他們往往在農村居民羣衆的歡欣鼓舞之下，而有時甚至不顧農村居民的反抗去實現了早已成爲必要的那些關係的變革。

城市的官僚在開明專制時代最先企圖完成這種改革，但做得並不常常成功，往往照老套去做，在大多數場合內，不管他的高調唱得如何，總是做得很不堅決而且很可憐。只是一七八九年在政治上爲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巴黎革命的各階級舉行起義的時候，巴士的獄之佔領對於被奴役的農民是一個信號，使他把封建的羈絆從自己身上擺脫的時候，那時和土地私有制有關聯的諸關係內之變革，起初在法國本國內，隨後在它的影響之下，在鄰國內，才進行得異常迅速、異常堅決。

在法國，變革乃是用違法的、暴力的方法完成的，這就是說，農民不僅免除了自己的義務，而且還從教堂及亡命者沒收過來的地產中獲得了土地，因爲資產階級並未霸佔了這種土地。

普魯士由於在耶那的失敗不得不作這樣的改革。這種改革在那裏，——在德國一般講來都是如此，——是用和平的及合法的方法完成的，就是說官僚們很遲緩很不堅決地實行了早已成爲必要的改革，還盡可能耗費了勞力和金錢，因官僚們經常害怕激起地主貴族的不滿，拖延到一八四八年的一切訟訴手續的完結，終究是有利於地主貴族的。農民因爲實行這種和平的、合法的方法，而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們曾在長期之內用現金，用自己土地的一部分以及用新的稅款，償付地主貴族。

“農民爲免除非法課加的貢賦而付給貴族和國庫的總額，最低限度計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台勒 (taler)，也可以說有十億馬克之多。

十億馬克僅僅是使四百年前貴族所霸佔的土地之極小一部分解除了貢賦！只是極小一部分，因爲貴族和國庫仍舊以嫡長繼承及其他騎士地產和邸宅的形態保留了極大一部分”（見恩格斯對維蓋爾曼·瓦爾弗的“西里細亞的幾十億”這篇極卓越的論文所作的序言，這篇論文最初於一八四九年登載於“新萊茵報”上，後於一八八六年在蘇黎克 [Zurich] 出單行本。）後來的研究只是證實了瓦爾弗底敘述。

俄國農業是在克里米戰爭以後才被改革成現代的形式。農民不僅從農奴的從屬地位解放出來而且解放出自己的較好的一部分土地。

但是凡革命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方法進行的地方，這種革命完成得無論怎樣可憐，它的最終的結果總是一樣：一方面，封建貢賦的取消，另一方面，原始的土地共產制的殘餘之廢除，即是土地私有制之完全確立。它替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開闢了一條道路。

## 第四章 現代的農村經濟

### 一 肉的消費及生產

一方面，增加肥料，即是說，在種植飼草面積縮小情形下飼養大量的牲畜，另一方面，對於市場底需要之較大的適應，這就是站在新的農業面前的兩種主要要求，資產階級的革命替它（新的農業）的發展創造了合法的地位，是在技術的及社會的先決條件對於這種發展已經存在以後。

但是 牲畜數量底增加 不僅符合農業的需要 而且 符合市場底需要。自然，從十六世紀起，肉的消費在城市中減少了，可是和城市人口的數量比較起來，這種減少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反之，城市人口異常迅速地增加了，城市中肉的消費之相對的減少絕不像農村中那樣大。我們且置一切窮困不講，城市中生活程度畢竟還是很高，一部分是受了城市中靠剝削勞苦大眾的果實為生的資本家及貴族之較高生活程度的影響，一部分是因為僱傭勞動者之集中容易使他們為要求增加工資而鬥爭；然而，除此以外，還因為城市中生活方式及勞動條件是與健康的極大損害有關係的，因而城市中勞動力之再生產在這種影響之下就比在農村中需要更高的生活程度。市民，在關閉着的場所勞作，其神經比筋肉更為單方面的緊張，如果他要想仍舊能夠勞作的話，他就得比農作者需要更易消化的肉食物。鐵道的

敷設就使牲畜成爲那些農產品之一，它們(活的農產品)容易運輸到遠方去，這種情形也促進了肉的消費較之農村更爲普遍；住在離市場很遠的農民也可以很迅速地供給牲畜到市場上去。

根據柴特干斯特所說的，鐵路運費在現時對商品價值的百分比，以一公担及一英里計爲：稻稈爲百分之一五，馬鈴薯爲百分之一〇，乾草爲百分之七·五〇，牛乳及新鮮果品爲百分之三·七五，裸麥、大麥、燕麥爲百分之二，小麥及有莢植物爲百分之一·五〇，活的牲畜爲〇·二五。在活的牲畜及其他生產品，甚至小麥底供應上，其用費的差別是很大的。

在法國城市與鄉村在肉的消費中的差異都有數字統計。根據一八八二年調查的材料看來，在這一年內法國每一個人消費的肉爲：

巴黎.....	79.31公斤
其他城市.....	58.87公斤
農村中.....	21.89公斤
全法國.....	33.05公斤

可是，從一八八二年起在法國城市與鄉村在肉的消費上表現出差異減少的趨勢。城市中此種消費被減少，農村中則增加了。根據一八九二年調查的材料，城市居民所消費的肉和一八八二年比較起來已從六四·六〇降至五八·一二公斤，即是每人減少了六·四八公斤，而當時農村居民中此種消費從二一·八九增至二六·二五公斤，即增加了四·三六公斤。

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及交通工具愈迅速地發展，城市愈發達，則肉的消費亦必然迅速地增加，即使城市與農村人口之幸福並未提高。肉的消費甚至在城市或農村內，或同時在城市與農村內幸福降低的時候也可以增加起來，只要城市十分迅速發達的話。現存制度辯護者的經濟學家很高興指出，肉的消費的增加，並不能作爲國民幸福增長

的無誤的標誌。肉的消費底增加，因為它是一般發生着的，可以用最無可爭辯的和顯著的事實，即農村人口之相對地而往往是絕對地減少與乎城市人口之絕對地和相對地迅速增加來說明。生殖率之降低，即是說食肉的成年人的百分比的增加及很少食肉或完全不食肉的人口，即兒童人數之減少，也必然促成肉的消費的增加。

在“政治學辭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內海爾拉赫(Gerlach)論“肉之消費及其價格”中引了許多城市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十九世紀前半期，肉的消費一般地講來並未增加，而是減少了。在慕尼黑每年消費的牛肉、小牛肉、羊肉及豬肉每人為：

1809—1819年	111公斤
1819—1829年	104公斤
1829—1839年	93公斤
1839—1849年	86公斤
1849—1859年	75公斤

從這個時候起消費稍稍增加了。

在漢堡每年一家所消費的，平均為：

1821—1825年	538磅	1841—1845年	429磅
1826—1830年	523磅	1846—1850年	339磅
1831—1835年	452磅	1851—	年
1836—1840年	443磅	1852—	年

最近期間巴黎是肉的消費減少之最顯著的例子，巴黎的人口從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六年增加了三十萬人，而這時每年肉的消費在同一期間則從一億八千五百萬磅降至一億七千三百萬磅。實言之，肉的消費的減少在此地不僅是相對的而且甚至是絕對的。可是，這是特殊的現象。平常大城市的發展來得很迅速，因而在城市中及全國

〇〇磅。

根據一八九二年法國農村經濟調查的材料看來，屠宰的牲畜之平均重量等於：

	壯牛、牝牛、崗牛	犏牛	羊	豬
1862年	225公斤	39公斤	18公斤	88公斤
1892年	262公斤	50公斤	20公斤	94公斤

穀物的生產隨着肉的生產之增加而同時增加了。此種現象可以在法國，從一七八九年革命起，極其明顯地觀察出來。在下述的表中我們引證所生產的生產品之數量，以一億公升為單位：

	1789年	1815年	1843年
小麥	84	44	70
裸麥及其他穀物	46	44	40
馬鈴薯	2	20	100

## 二 換種經營、分工

這些顯著的結果從何而來呢？它們是整個農村經濟生產中變革的產物，此種產物在英國是隨着十七世紀革命之後，而在歐洲大陸上則是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及受其影響而來的。

自土地成爲完全私有財產以後，強制的輪種，正如收穫後及閒田作爲牲畜之公共牧場一樣，已被廢除，而公社的土地已被分割，沒有什麼東西能勉強土地所有者將牲畜放在牧場上了。技術的條件對於更高形式的牧畜業已經存在了，同時亦已採行了各種飼草的種植，此種種植可以從同一地面得到比牧場更多的飼料。把牧場轉變爲耕地並拿它來種植飼草以後，就可以將牲畜飼養在廄內，在夏天也無須將牲畜放在草地上，因此在同一土地上可以飼養更多的牲畜，絲毫不會

減少種植穀物的地面。反之，種植飼草及廐養牲畜結果是這樣好，即沒有任何必要將從牧場轉變為耕地的全部土地用來種植飼草。種植飼草只需土地（轉化為耕地的土地）底一部分，而仍舊可以增加牲畜底數量。這樣節省下來的其餘一部分土地就可用來種植穀物。

用這樣的方法替穀物底種植解放出來的土地面積是很大的。根據羅賽爾（Rosher）的意見，在三田制經營之下可以種植穀類植物的中等土地約為公社土地的百分之二〇，而當時丘寧以為，在換種經營及廐養牲畜情形之下可以將同一數量的土地百分之五五——六〇用來種植穀物。

同時牲畜底增殖對於耕地却提供了更多的糞肥而且增加了牲畜底勞動力底數量。單是這種情形，土地就更好地被耕作了。由於這種變革不僅增加了種植穀物的面積，而且提高了土地底生產力。在法國根據上述農村經濟調查的材料一公頃所得的小麥平均收成如下：

年 代	百公升	年 代	百公升	年 代	百公升
1816—1820	10.22	1821—1830	11.90	1831—1840	12.77
1841—1850	13.68	1851—1860	13.99	1861—1870	14.28
1871—1880	14.60	1881—1890	15.65	1891—1895	15.83

但是變革之影響於生產方式者，並不以此為限。

自從土地所有者獲得了他自己土地的完全私有財產權的那時候起，他並不一定要在不用於飼養牲畜的那部分土地上種植穀物。他可以種植市場上所需要的別的植物，而市場底需要就更加成為農業的決定因素。他開始栽培出舊的三田制時代平常不能種植的或完全不能種植的或只能在自己菜園內栽培的植物；這種植物或者是作為食物用的植物，例如馬鈴薯和有莢植物，或者是工藝植物（油質類如油菜、罌粟及其他，纖維類如亞麻、或苧麻，顏料類如茜草，菘藍之類，

香料, 酵母花, 齒香或其他工藝植物如煙草)。

在各種植物連續種植及以穀物和飼草輪種的情形之下就發見了, 它們並不完全同樣地使土地枯竭, 而在合理的連續種植的時候, 收成能够大大地提高。有一些植物, 穀物、油質植物及纖維植物主要是從土地底表皮層吸取養料, 它們就會使土地枯竭。其他的植物則節省地力, 甚至在某幾方面使地質改善, 由於濃密的陰蔭, 不使雜草叢生, 以自己深埋的根吸取地下層的養料並使土地輕鬆; 最後, 另外一些植物(金花菜及有莢植物)由於積累起從空氣中吸取出的氮素更良好地影響着地質。

換種底良好效果古代羅馬人就已經知道。但是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在英國才第一次大規模地着手有系統的採用它, 換種經營從英國傳播到德國及法國。在十九世紀它才成了普遍的現象。

換種經營讓極多數的配合種適於耕種及市場底變動條件; 這些配合種數目是隨着交通的便利而增加, 科學的研究使歐洲農業認識了新作物, 根據海克的推斷, 中歐的農業從它存在的那時候起, 就有了百十種栽培的植物。

但是在個別的農業企業之間, 極其發達的分工, 是和換種經營底發展聯系並進的。三田制的經營是在於滿足農民及地主自身的需要, 因此在整個中歐, 它到處都有同一的特點。每個農村、每個農民平常都不依賴於地質的條件而只生產同一的農產物。現在發生了為市場同時為競爭的生產。這就有了一種意義, 就是每個農業經營者一定是只生產那些市場上所需要的生產品, 即他靠地質、地勢及自己地產底大小、交通工具、資本底多寡等而能更廉價生產的生產品。在不同的地產內發展了農村經濟底各個部門, 在一些部門內農業佔優勢, 在別的部門內, 牧畜業佔優勢, 而在第三個部門內則園藝或釀酒業佔優勢。農作者與牧畜者又再分為若干部分。即如, 有些牧畜者經營乳酪業, 別

的人從事專供屠宰的牲畜底飼養，又一部分人則飼養幼畜等等。

在英國及美國分工特別完善。“英國每一種家畜加以更進一步的劃分；例如，在乳酪經營內牛乳爲出賣而生產與爲製造牛油而生產及爲製造乾酪而生產分開。對於每一個別的目的，則利用特種的牲畜並採用特別的方法照料它們……北美洲應當算是農村經濟中細密分工底典型的國家”（巴克霍慈：“農村經濟中之分工”〔Conradsche Jahrbücher〕，一八九四年，第三一四頁）。

在優良的環境之下（有適宜的氣候及土壤、高額工資、好的銷路），這種分工可以引起畜牧經濟底復興，不過這種復興是在更高的、更強度的、資本主義的形態上，這與大量的耗費在牢固的設備上、補助的肥料上、農業勞作上以及優種牲畜之飼養上是相關聯的。例如，在英國的南部，我們就發現類似現代資本主義的牧畜經濟。可是，它和三田制絕無共通之點。除了各個經營之間的分工外，就在經營本身內部，最低限度在最大的企業內，分工也發展起來了。

在封建的農村經濟內，大企業在這一方面本質上和小企業沒有什麼區別。勞動力（人與獸的勞動力）之大部分由農奴供給地主經濟，農奴以私有的用具、工具、荷車、犁之類去盡自己的義務。

大經營與小經營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前者有較好的設備及極細密的分工，而是在於服勞役的農民，在別人的經營內盡可能怠慢而且懶惰地去執行強制的勞動，可是在他自己的小經營內以同樣的工具他却是很賣力和很勤苦地勞作，盡可能只爲自己和自己家庭勞作。

只有在現代農村經濟內無論在大企業內或在小企業內農業主都是用自家的工具，自家的牲畜，自家的勞動者來生產；所以只有現代的經濟才能在大企業內發展分工，較之農民經濟內的分工更多。

無論是在一種經濟內部或在各種經濟之間的分工，農作物底多樣性以及耕作方法一定會引起工作者的改進，工具及用具、種子及



畜類之改善。但它同時也異常加強了農業經營者對仲介人——商人——底依賴。

現時農民不僅像工業家，而且像農業經營者一樣自己不再生產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他不僅要購買比以前貴的大量工具，而且要購買一部分生活資料，這些東西（工具及一部分生活資料）在他的專業化的經濟內，不再生產或者即使生產也為數不多。由於分工底發達，農業經營者尤其是最小的農業經營者底數目也隨之增加了，他們幾乎停止了穀物底種植，因而必須購買穀物及麵粉。有時他們在自己的經營內不再生產種子也不繁殖牲畜，至少不飼養大的牲畜；特種的經營專門從事於種子底種植及改良或家畜改良種底飼養，農業經營者向他們購買的正是那種在某一時期最適合於他的經營底需要的東西。另一方面，他自己部分地出賣對他無用的牲畜，——例如乳酪業出賣已不能充分供給乳汁的牝牛，或者出賣已達成年的，適於特種經營目的的牲畜，例如在飼養幼畜的經營內，當牲畜已宜於勞作或宜於乳酪業的時候，就將它出賣。經營愈專門化，愈是只需要這一種或那一種牲畜，則交換亦愈迅速地完成。商人的仲介作用亦愈發達，而特別使那些不能追隨市場及處境困難的小農對他依賴。

農民對市場的依賴性隨着貿易及一般交通的發展，隨着資本積累引起交通方法的變革而增加。

為城市資本所產生的這種改革，加強着農業經營者對市場的依賴，但同時也不斷地替農業經營者改變着市場底條件。在附近的市場和世界市場僅由驛站運輸的方法連結起來，以前有利的生產部門，就成為無利的，而且必須代以別的生产部門，如果在這些地方有鐵道通行，用鐵道運來最廉價的穀物，因而穀物的生產就不佔便宜了，但同時却替乳酪生產品開闢了銷售底可能。隨着國內交換的發展就出現了新的或改良過的栽培的植物，純種的耕畜從極遠的地方輸入也

便當了。純種的牲畜在現時從英國輸出到世界各地。屠宰的牲畜運送到極遠距離的地方，究竟到什麼樣的限度，這可由對牲畜所課的關稅及地主階級對關稅之必須提高所發的牢騷，就很好地顯示給我們了，雖然牲畜之輸入不僅供屠宰之用，且供農業之用，如瘦的牲畜養肥、擠乳的牲畜、馬匹等。

農村經濟底現代改革過程，是在城市中在現代自然科學、機械學、化學、動植物生理學領域內所成就的許多發明底結果被移置到農村以後，就特別加強了。

### 三 農村經濟中的機器

在這種情形(農業的改革)之下首先應指出機器制。工業中應用機器所達到的光輝的結果一定會令人聯想到採用機器於農業內，而況現代的大生產已替這事創造了諸必要的條件。這樣的條件第一，就是分工——一方面勞動者分爲粗工與熟練工人，另一方面，工具及器械之專門化，它們適於執行個別的機能；第二，就是大量的生產到市場上。

但是機器的生產在農業內不得不克服比工業中更大的障礙，首先就是技術方面的障礙。在工業內工作底地方，工廠，建造得很合式，而且宜於機器的裝置。在農村經濟內，大部分機器都在露天中工作，因此機器一定要適合地方性。但這不是常常辦得到的，而有時是完全不可能的。土地耕種之較高階段大半要以農業中採用機器爲前提。

可是農業中機器底採用，不僅碰到技術上的困難，而且碰到經濟上的困難。大多數機器在農業中一年只有一個短時期被使用，而在工業方面一年到頭都可使用。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由於應用機器，勞動力之節省在工業內當然很大。假如有兩架機器，每架在一日內代

替十個勞動力，但是其中有一架機器只做十天，而別的一架做三百天，那末每年勞動的積蓄有一架機器爲一百個勞動日，而其他一架爲三千個勞動日。如果每架機器可用五年，那末農業機器中全部節省的勞動達五〇〇個勞動日，而工業機器達一五、〇〇〇個勞動日，這就是說，假如每架機器之價值等於一、〇〇〇個勞動日，工業機器之採用可節省一四、〇〇〇個勞動日，而農業機器則相反，它要多費五〇〇個勞動日。

此種關係對於農村經濟之所以惡劣，是因爲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機器的目的不是在節省勞動力而是在節省勞動工資。工資愈低，則採用機器亦愈困難。但通常農村中的工資因許多原因比城市中要低得多，因而，用機器代替人的勞動力，這種動機在農村中也比較弱。

此外在工業與農業之間還有其他的差別。機器工業通常並不比手工業或作坊需要更有知識、更熟練的工人。被組織在以大工業爲前提的生產方式之下的那些勞動力就可以完全滿足它（機器工業）。同樣整年在一個同一的機器上勞作的工人在管理機器上很快就獲得優越的技能。

農業機器則另是一回事。它們往往很複雜，而且要管理它們就需要相當的知識。但是恰恰在農村中對於民衆教育及智力發展底條件在最近幾世紀殊爲不利。機器在農村中往往找不到它所需要的勞動力。

此外，農村勞動者並不是整年在一架同一的機器上勞作，因此他不能像製造工業中的勞動者那樣容易駕馭它。

最後，農業企業和大工廠相反，往往離鐵道及機械工廠很遠；因此笨重機器底運輸，尤其是複雜機械底修理對於農業企業就很困難而且所費很貴。

雖然有這些困難，可是農業中機器之採用却迅速地增加着，——這就是它們達到的那種成就底證明。

對於法國，三十年來我們有一些關於機器生產發展的比較數字。在法國農業上計有：

種 類	1862年	1882年	1892年
蒸汽機及輕機車	2,849	9,288	12,037
打穀機	100,733	211,015	234,380
播種機	10,853	29,391	47,193
刈割機及捆束機	18,349	35,172	62,185

在德意志帝國內農業企業所採用的機器計有：

種 類	1882年	1895年
汽犁	836	1,606
播種機	63,842	20,673
刈割機	19,634	35,084
汽力打穀機	75,690	259,069
其他打穀機	298,367	596,869

這樣看來，各種機器的數目，尤其是打穀機的數目有很大的增加；只有播種機是例外，它為條播機所排擠；條播機，在一八八二年時完全不需要；在一八九五年就有一四〇、七九二個農場採用了條播機。

英國是農業機器生產底故鄉，工業中機器制度在英國比在其他國家更早就發展了；在英國採用機器於農業生產，有了極優良的條件。根據培雷爾斯（Perels）的意見，這些條件如下：國內文化狀況差不多到處都很高；農業經營者大半都是資本家；國內有許多機械工廠，甚至在小城市內最低限度都有一個機械工廠，因而機器底修理不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除英國外，美國採用機器於農村經濟也發展了，這是由於農業勞動者底缺乏以及他們在工資方面的苛求而激成的。機器底應用因美國工人有高度的智力的發展尚覺容易，但是因土地之不良的耕作及大多數農場遠離機械工廠而大感困難。因此美國的農業機器，比起英國來，就有另外一種形態；美國農業機器極其簡單，構造極為堅實，但是它們的工作並不常常像英國一樣的完善。

在德國農業機器生產底發展條件並不良好。在西部及南部土地過於零碎；在東部雖然大生產佔優勢，但是那裏農村勞動者的生活水準及文化程度太低，機械工廠離得很遠。薩克森省的條件最好，在那裏我們看到大的經營，有知識的勞動人口及許多機械工廠。在巴爾登 (Barden) 全省只有一個汽犁，在溫敦堡 (Wittenburg) 連一個都沒有；反之在薩克森省有四百二十八個經營使用汽犁。但是在德國其餘的部分內機器很勝利地克服那些阻撓着它的障礙，這證明——除上面所引的統計表外——農業機器生產之迅速發達。除了仍舊在英國精製的汽犁及大部分從美國輸入的刈割機以外，德國本國也製造出為現時農村經濟所需要的無數的機器。

採用機器底唯一目的並不是節省勞動力。在農業中節省勞動力有時在其他目的之前反退居次要的地位。在採用打穀機的時候，節省勞動力才被注意到。許多農學家，例如馮·德·郭爾慈，把農村荒蕪的決定性的影響歸咎於打穀機底採用。“打穀機對於農村經濟的生產無論怎樣有益和必要，但是它的推廣對於農村勞動者的地位表現了有害的影響。用連枷打穀是早先農村勞動者在冬季的主要工作。機器打穀就需要很少的勞動者；爲了要很迅速地獲得大量穀物以之出賣，於是打穀大部分已於秋季開始，尤其是在應用汽力打穀機的地方”。

爲了要解救這種不幸，馮·德·郭爾慈，就提議“限制打穀機，尤

其是汽力打穀機的使用”，很顯然地，爲勞動者的利益，實際上也爲地主的利益，在他們看來，正如他自己說的：“爲這些限制所引起的損失，即使不是在目前，那末也會在將來，由於他們在夏季支配的勞動力底增加，而得到額外的補償。”（“農村工人階級與普魯士國家”〔Die C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第一四四、一四五頁）

幸而，對勞動者這種保守主義的善意不是別的，而是一種反動的烏托邦。地主不肯爲着“將來的”利益甘心情願放棄打穀機的應用，因爲打穀機“在目前”太有利了。因此打穀機底革命的行動將會繼續下去；它將驅逐農業勞動者到城市去；它一方面，會成爲提高農村中工資的有力的手段，另一方面，它會促進農業機器生產的繼續發展。

像上面引證已經表明，打穀機之重要不僅因爲它節省勞動力，而且也因爲它工作得比人更迅速。工作底速度自從爲市場而生產代替了爲自家的消費而生產的那時候起就有了不少的意義。現在重要的是迅速地利用市場底景氣，而穀物生產者當他的穀物愈是迅速地準備好了出賣，即是說穀物打磨得愈迅速，則他亦愈易利用市場底景氣。如果打穀一向是農民在冬季和家庭工業一同從事的工作，那末現在因採用汽力打穀機，打穀更可直接在收穫後在露天的田場上進行，因而節省運輸的時間並可減少穀粒分散的損失，這種損失在某些生產品，如油菜之類的裝運及卸下時是經常會發生的。培雷爾斯在其著作“論機器對於農業的意義”中指出這樣的情形，“當時購買汽力打穀機的大筆費用是用第一次很迅速地爲市場準備的商品底出賣所得來支付的”。

刈割機比起打穀機除了節省勞動以外，還更能加速工作。全年生產底結果要看收穫如何進行。穀物一定要在幾天之內趕快收穫。每次時間底拖延可以發生很大損失。縮短收穫時間的機器便得到很高

的價值；勞動及時間底節省又可使農業經營者更不依賴他的工人，工人們一到收穫時期就成爲異常必要，因而他們在這時期要求更高工資並且動輒實行罷工。很明顯地，甚至收穫仍舊用手來進行的那些農場有時也得到幾架刈割機，但這不是爲着使用它們，而是爲着藉它們作護符來反對同盟罷工。即如，凱爾格爾（Kerger）在其所著“論農業的季候工作”中就敘述着，在薩克森省所有種植甜菜的地產內都用刈割機，但是它們主要是當作一種手段使工人的罷工感到困難。在工人很多而且他們很聽話的時候，就用手收穫，因爲穀物多量施肥的結果常常僵臥下去，應用機器就成爲不可能。可是，從凱爾格爾描寫了這種情形的時候（一八九〇年）起，就發明了許多機器，可以刈割極柔軟的穀物。

但是機器不單是代替人，機器也執行着人所不能執行的，或者執行得絕不會這樣圓滿的作用。機器能達到這個地步，是因爲它有極大的正確性，或者就是因爲它有極大的力量。

播種機，撒播肥料的機器及洗濯種子的機器則屬於第一種機器（即有極大的正確性）。

用機器播種比用手播種好得多。因此用機器播種就排擠了用手播種，甚至在用手播種比較廉價的地方也是如此。

條播機及完善的簸穀機首先便使在較大面積上順次播種成爲可能；由於這些機器就達到了在用手撒種時所不能達到的結果。“最高的收成只有在仔細地進行順次播種的時候才能得到”（柴特干斯特說的話）。

穀物精選及分類的機器（排除一切雜草的種子及其他不相干的混雜物，除去麥角，按照大小、重量及形式把穀物分類，供給市場以良好的穀物及同質的純粹的商品）代替了用篩子簸穀，“別的信奉正教的農民現在仍然用篩子簸穀，堅信它能提供上好的穀物”。

機器中(其重要性主要是決定於它們能發揮較大的力量), 汽犁應佔據第一位。

深耕對於穀物底豐收, 並不是絕對必要的。所以在三田制支配的時候耕耘並不很深。埃卡爾特在其“實驗經濟學”(一七五四年)一書中把犁溝深度在二又二分之一——三吋叫做最好的耕地, 最深的為四吋, 這還要看地質如何而定, 至於因土地的特質容許犁溝深度為五——六吋, 這只是例外的形態。他堅決地警告不要太深的耕作。甚至西凱(G. G. Ciken)的“普通經濟學辭典”(一七八〇年, 第五版)也有這樣的說法(見馮·德·郭爾慈:“農業”, 載“政治學辭典”, 第一卷, 第二八頁)。但是由於換種經營底發生很快就發現了, 有些重新採用的植物——金花菜、馬鈴薯、甜菜——在最深耕種時生長得最好。爲了要深耕, 就發明了新犁, 加強了聯畜, 並且發現了這種情形很有利地反映到穀物底種植上。深耕減少着過度潮濕及連續乾旱底影響。除此以外, 凡深耕的土地總是比淺耕的土地較易變暖, 而且不易使雜草叢生。

但是深耕有一個目的, 主要是供給植物底根以較前更多的鬆軟的土地, 植物在鬆軟的土地內才能很好地生長起來。

在每個合理的農場內現在都比十九世紀初期耕作得更深。如果在那時犁溝普通深度為四吋, 則現在犁溝深度增了一倍, 而在特別深耕的時候, 犁溝深度竟達一二——一五吋以上。

“我國農業底前途全賴深耕……但是爲了要使深耕得到廣泛的推廣, 比獸力有更經常的和更有力的作用的生產力是必要的。”(培雷爾斯語)汽力的機器就供給了這樣的生產力。

我們不只一次引證的培雷爾斯, 可以說, 他是極力提倡在德國普遍使用汽犁的一個人, 關於這一點他寫道:

“汽力耕種和藉助聯畜的耕種比較起來, 其優劣可在下述的情形



中看出：

一，汽犁的工作較之聯畜的工作無比地好，這是用不着懷疑也用不着爭論的。

汽犁底良好工作表現在最高的收成及其較大的安全性之內；在汽犁於幾年內已被應用於農場的地方，到處都證實了這種情形。

再則，汽犁底優點在於，可以及時開始土地底耕作而完結於晚秋到來之前。在大多數農場對於耕作既不具備勞動者，又不具備牲畜時，且有可能直接在收割之後開始耕作……，在晚秋，當工作通常已經停頓起來的時候，汽犁還可工作着而無特殊困難，因而土地底耕作在冬天到來以前就可完結。有些地方，冬季開始得很早，汽犁底這種優點當然會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農業中蒸汽力底應用”，第三〇七——三〇九頁）

我們且置這些優點不講，如果汽犁在許多地方未曾得到普遍的應用，那末其原因是在於，上述的障礙對於機器在農業中的應用，在汽犁方面比對於其他各種機器有更大的意義。在地方性對於汽犁底應用有很大困難的地方，在田地內遇到許多大塊石頭的地方，在沼澤的耕地上以及在極其分碎的土地內，汽犁都不適用。教勞動者去運用汽犁就不大容易，因此就必須常常修理它。但是採用汽犁的最主要的障礙乃是它的價值太大。有兩個發動機的一架汽犁值四〇、〇〇〇馬克，而且也較為合用，有一個發動機的汽犁就不大合用，但也值三〇、〇〇〇馬克以上。利用汽犁，的確像利用汽力打穀機一樣，要能租用它，就比較容易普遍。

在汽犁出產地的英國，汽犁使用得最多。最初在五十年代初期，就發明了宜於實際使用的汽犁。一八六七年汽力耕作，根據皇家農業學會的報告，只被應用於一百三十五個地產內。一八七一年在瓦爾費爾哈普頓關於博覽會所公佈的正式數字，則與此相反，這些數字

證明，到這個時期，在英國已經使用了兩千多架汽犁。反之，在德國，汽犁在當時只有二十四架；但在一八八二年這裏總計已有八三六個採用汽犁的農場，而在一八九五年則有一、六九六個農場。在薩克森省的大農場內汽犁亦已普遍地使用。

在奧匈最大地產內，汽犁也同樣得到普遍的應用。

但是農業上需要汽力機器，不僅為耕耘之用，而且也為剷平耕地，耙鬆土壤等等之用。在打穀的時候就表現出蒸汽機遠勝於用馬曳的機器——至於手工捲揚機更說不上了。在薩克森的甜菜業（集約耕作真正的模範）內，全部穀物，除黑麥（麥稈可作捆束之用）以外，常常用機器（以汽力使之運轉）來打磨。甚至農民的捲揚機在使用打穀機的時候幾乎完全為牽引機車所排擠（凱爾格爾著前書，第一三頁）。

蒸汽機在灌溉及排水工作時當作抽水機用，是很能盡職的，最後，它可用來給牲畜準備飼料並用來壓搾飼料，它被用於磨粉廠、鋸木廠、切草機及其他方面。

在郭爾慈的“農業辭典”（第二卷，第七二一頁）內，弗斯特申述：“雖然不善利用熱能，但蒸汽機對於農村經濟總是最廉價而又差不多到處都可應用的力。”

農業中蒸汽機的數量在迅速地增加。在普魯士不移動的與移動的蒸汽機計有：

應用機器的地方	1879年		1897年		增加的百分數	
	機器數	馬力	機器數	馬力	機器數	馬力
在 農 業	2,731	24,310	12,856	132,805	470	546
在採礦、製造及運輸工業中（鐵道及汽船除外）	32,506	910,574	68,204	2,743,994	209	320

從這裏很明顯地看到，蒸汽機數量底增加在農業中不僅絕對地

大，而且比其餘的工業部門增加得更快。

但是在這一領域內電氣注定了要比蒸汽得到更大的勝利；一方面，從電氣佔據了的那幾種工作中排擠了蒸汽，另一方面，代替了它以前所不能達到的那些勞動範圍內人和獸的勞動力。在牽引機車及力底傳導經過無限的皮帶均不能應用的地方，電力都容易傳送到那裏。此外電力極易分割，並且對於自己的活動不一定需要煤。有些地方，工作藉助於汽力，由於煤的開採地方相隔太遠，以致得不償失，但是在水力便宜的地方電氣就能使機械犁底應用成爲有利。此外，電犁比汽犁極其輕便。有五十匹馬力的大汽犁在現成工作的情況下，即是說加上水和煤，約重二十二噸，較小的犁至少也要有一四——一六噸。二十匹馬力的電犁重八噸，五十匹馬力的電犁重十二噸。“電犁的主要優點和汽犁比較起來就在於前者重量甚小，因爲重量小，在別の場合，即是在丘陵的和有柔軟土質的地方，用機器的方法耕種，一般說來是可能的；除此以外，即使有同一的重量，電犁也比汽犁要有更大的生產能力。”（凱特金：“電氣技術在其發展底現代情況之下能不能有根據希望在提高經營純收入底目的上爲農業服務？”，載吉勒編：“農業年鑑”，第二十六卷，第四、五期）

電氣已經常常地並且現在實際上被應用於農業上。有一個我們私交很好的專門家告訴我們在塔爾省（法國）有一位勃蘭先生的地產內應用電氣的情形。

發揮三十匹馬力能力的瀑布可以旋轉和發動機相聯的渦輪水車。被使用於這種場合內的發動機能夠供給四十安培與三七五伏特的電流。在全部地產上普通是在電桿上裝設電綫。從這些電綫上分取電流於需要的地方。

直到現在電力差不多專用於耕耘方面，藉有十八匹馬力的聯合發動機底幫助。

電力底應用除其他的優點外還有一種好處，就是整個田莊可以用電氣照明。這種情形使人能够在緊急的時機，例如，在收割時期，甚至夜間都可進行田作；自然，這裏的利益對於地主比對於他的勞動者要大得多。

甚至在德國也已經有應用電氣的地產。從柯貝爾格來的消息甚至說到有人企圖從一個中央電站供給六十個田莊以電力，其目的在使農業生產改善及廉價。可是關於這一企圖底結果，我們却毫無所聞。

輕便鐵道可以和機器一同歸併到節省人力底耗費的機械設備方面。運費在農村經濟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農村經濟內要把價值相當小的大量生產品：肥料、稻稈、乾草、甜菜、馬鈴薯之類運到很遠的地方去。敷設較好的道路所費很貴，同時又要佔許多地方。

但甚至在較好的田野道路上爲了要克服磨擦所發生的反作用也得費許多力量。因此輕便鐵道就很有用處。一對曳重的聯畜沿田道路綫走比它在碎石道上走能多運四倍多的貨物。況且輕便鐵道無須特別準備和勞動就能安置在普通道路不可能修築的地方，在泥濘的地方，在耕種過的田地上，在卑濕的草地上以及諸如此類的地方。輕便鐵道不僅節省曳重獸底勞動，——而且常常因爲有輕便鐵道遂使大批貨物底運輸成爲可能，沒有它，有些農業改良就不能實現。

農業改良中最主要的改良——灌溉及排水——也有賴於農村經濟中機械的補助工具。這和我們剛才說過的一切不同，因爲它們（灌溉及排水）是很早就發生了的。在東方，我們發現這類的設備是在有史以前的時期就有了的。但是在歐洲，從阿爾卑斯山到北部，在三田制經濟之下農業改良就可憐得很。氣候並未引起灌溉設備底必要；卑濕的土地被委棄爲草地；當時還有許多宜於耕種而未接觸的土地、森林、牧場，對於改良土壤（狹義的說）並不是一種刺激而且也未得到

勞動力。但是當人口底密度增加了的時候，封建貢賦就壓迫了農民並從農民那裏奪去改良土壤的能力及工具，土壤改良底必要的前提條件只有革命才能創造出來。

現代土壤改良中特別重要的是排水法，即是用焦土製的地下水管，排乾地上的水，此種改良，由於煉瓦術之進步，最先就成爲可能的了。排水法使土地更乾燥、更柔和、更鬆軟，並且使土地的耕作更容易；土地容易保暖且長期保持着溫度，“所以排水底結果等於氣候底改變”（哈姆語）。蘇格蘭的經驗證明，在排過水的土地上，收割普通比在沒有排過水的土地上早十天或十五天。

在英國排水法提高了已往耕種過的土地底總收益，平均爲百分之二〇——三〇，而在某些場合收益底增高達到了百分之一〇〇——二〇〇。許多田地，就因爲有排水法，遂宜於種植穀物及飼草。

#### 四 肥料、細菌

化學家及生理學家（後者在顯微鏡幫助之下）促進農業底改革，不亞於工程師。

在三田制經營之下，全部牲畜絕無例外地必須以草地及牧場所供給的那些飼料來滿足。在現時，由於交通發達，農業經營者就可擁有那些他自己生產的以及購買工業底生產品或廢料，因而都是很廉價的各種不同的飼料，於是在他看來，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別種植物而不種植飼料是更有利得多。同時動物生理學指示他各種飼料底價值，教他適當地準備和使用飼料以適合於牲畜底年齡、性別、種類及使用飼料底方法，在這樣情形之下，如我們已經看見的，機器就起着很大的作用；由於這種情形，牲畜便長期地保持着工作能力並更有效地工作着。

另一方面，爲了使穀類能提供豐富的、經常的收成而不致過分耗費物資，時間及人力，植物生理學就介紹農業經營者去認識那些對於穀類所必須的條件。這些條件除土地底機械耕作外，像我們所知道的，在機器起着極大作用的地方，第一位就屬於肥料，即是說，要關心到使土地在適當的比例內含有那些可溶解的物質，即植物自身的生長所需要的溶解物。化學不僅使農業經營者認識這些溶解物，甚至以人工的方法製造那些土壤中所缺乏的和農業經營者自己的力量所不能充分製造的溶解物而無需過分的耗費。

在爲市場而生產的以及爲這樣的市場（它不復將它所獲得的極大部分營養物回復到土地去）而生產的現代農業上，要維持地質底均衡，單單廄內的糞料是不夠的。

土地因此會更加缺乏那些栽培植物所賴以營養的礦物成分。改善了的耕作方法、種植深根的飼草、深耕等等固然增加了土地底收穫量，但這只是更加強度的和迅速的剝削土地，使土地更加枯竭而已。“土地底肥沃，自然可以因強度的施肥、機械的耙鬆土地、應用石灰質的肥料等等，藉以漸進的改善土地底物理性能，使土地含有多量的營養物而大大地增高。可是，這種方法的繼續應用，不僅引起土地底貧瘠，而且終於引起土地肥沃底減低。”（維爾涅〔Werner〕語）

黎比赫（Liebich）底不朽功績之一就在於，他暴露了這個事實並且堅決地起來反對集約經營的掠奪式的農業，即是十九世紀前半期改良了的土地耕作法本身所代表的。他堅持着那種見解，認爲我國土地底肥沃，要繼續下去並經常地增加，只有在那種場合內，即市場以農業生產品的形態從土地中取去的成分又重新回復到土地中來。城市底廢物應當供給農村經濟。在他所著“應用於農業的化學與生理學”（第一編，“植物營養底化學過程”）一書中寫道：“各種偶然情況底湊合（三葉草底栽培，海鳥糞底發現，種植馬鈴薯及應用石膏粉肥料）

增加了所有歐洲國家居民底人數；它與現有的生產力不相適合；人口底增加大得極不自然而且已達到這樣的高度，使其在現代經濟制度內，只有在兩種假定之下，才能維持下去：

“1. 如果因為某種神的奇蹟，土地重新獲得它原有的（為愚昧和無知所奪去的）收穫量。

2. 如果糞料或海鳥糞底蘊藏 將被發現，大約等於英國的石炭層。

很顯然地，沒有一個聰明人會把這些假定底實現當作真實的或可能的……

在英國大多數城市內廁所底規定就有着那樣的後果，每年無可挽回地喪失了決定三百萬人食物底再生產的物資。

英國每年所輸入的大批肥料大部分又經過河流被沖入海，而賴此種肥料生產出的生產品，不足以供應人口增殖底需要。

一切不幸在於，這一自行毀滅底過程在歐洲各國都發生着，雖然不像英國那樣大規模的發生。在大陸上的各大城市內，政府當局每年要耗費大筆款子於田地肥沃底恢復與保持的條件上面，這是農業所辦不到的。

國家財富及幸福底保護、文化及文明底進步，是依賴於從城市排出不潔之物這一問題底解決。”（第一二五、一二八、一二九、一五三頁）

這些道理在五十年前就已經被黎比赫說過了。人類排泄物當作肥料底較高價值，以及把它們回復到農業方面的必要性從那時候起就得到了一般的承認。但是排除污穢的問題在現時離黎比赫所要求的這一問題底解決為期尚遠。直到現在還不會發明出將人類排泄物從大城市移出底辦法，這種辦法無需過分的耗費，既可滿足衛生底要求，又可滿足農業底利益。柏林所採用的灌溉土地的方法，從衛生

學的觀點說來，我們覺得是直到現在所應用的一切方法中最合理的一種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可免除河流為經過溝渠排出去的不潔物所傳染。

自然，灌溉一兩塊田，在每個城市附近是可能的，可是不能視為這便補償了從農業中取去的東西。在現代技術條件之下只要用灌溉的方法，這個問題就可以很簡單地無須過多的費用，甚至還很有利地加以解決，假如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已被廢除，假如人口十分均勻地在全國分佈。但是在目前的生產方式之下，關於這一層連想都不會想到。

農業愈是不能利用城市中人們的排泄物，同時因上述集約經營的方法及為市場生產底增加，土地愈是貧瘦，則科學與實踐為了要把從土地中取去的營養物回復到土地去，就愈加求助於治標的辦法，努力尋求並製造補助的肥料，此種肥料就供給了土地以它對各種植物底生長所缺乏的營養物，以便植物容易攝取這些營養物。從國外輸入的或由工廠製造的這類肥料——為數是很多的（磷酸鹽、鉀、硝酸鉀以及氮氣肥料），而且它們的數量還在增加着；對於每一類土地，每一種耕種方法，每一種植物，用混合法製造出特種的肥料；由於這種情形，不僅可以保持土地的豐饒而且使它高度地增加；此外，人造肥料在某種情形之下使農村經營者不用換種制不用廄中的糞料就可以經營，使自己的種植專門適合於市場的需要並將自己的全部耕地用於為市場而生產。在這樣自由的農村經濟內，現代的農業在技術上及經濟上達到了它的最高點。在農業中不僅機械工廠及化學實驗室，就是光學器械工廠都產生一種變革。我們在此將不詳細敘述分光鏡的分析對於某幾種物質發現底意義，有極性器械對於製糖工業的意義以及照相術對於辨別種類及一般對於牧畜業底意義；我們只指出對於農業最重要的光學器械——顯微鏡。



哈姆(Hamm)說：“經過好多時間——人們就會使此種在現時必要的儀器底應用成爲實用的；現時儀器的重要性已爲大家所公認，尤其農業要是沒有它就不能經營。在現代情況之下人們藉助於顯微鏡開始分析土壤底成分。植物底內部組織，細胞底本質及其內在物，澱粉粒及其他組織底形式和差別只有藉助顯微鏡才使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應當把隱花植物如何增殖，無數的菌（它們以生鏽或發霉底形態，以馬鈴薯菌或葡萄菌底形態去腐蝕栽培的植物及傷害它們常常到收成完全毀滅的地步）是些什麼，這一切知識歸功於顯微鏡。只有藉助於顯微鏡才能確定各種纖維底區別，毛髮底構造，才能發現農業上無數的活敵，如細菌，小麥底螺蛭孤菌，甜菜底綫蟲等等一類的微生物。在檢查種子方面，顯微鏡也表現出特殊的功用。在有經驗的人底手裏顯微鏡在分別真的和假的，分別種子和混雜物時就表現出很大的功用”（“論農村經濟中的自然力”〔Die Naturkräfte in der Landwirtschaft〕，第一四二——一四五頁）。

從哈姆寫這本書（一八七六年）的時候起，由於細菌學研究底發展，顯微鏡更大大地促進了農業底進步。

由於此種進步，農業經營者可以或者完全使動植物免掉某幾種毀滅性的疾病的危險，如炭疽病、丹毒症、結核病、葡萄蟲病，或者治療它們，或者最低限度可以識別它們。

在過去十年（八十年代）的下半期，人們發現一樁事實，就是豆類植物（有莢植物及三葉草植物），和其他栽培的植物不同，它們差不多不從土地中而從空氣中取得全部對於它們所必需的氮素量，因此豆類植物不僅不使土地因氮素物而更加貧瘠，反而使土地因這類氮素物而豐饒。但是它們只有在那種場合之內具備這些特質，即在土地內有一些微生物棲息在這些植物的根上。在沒有微生物的地方，可以用適當的移殖法將它們分佈在土地內，然後拿豆類植物種植在土

地上，這樣就可以使缺乏氮素物的土地，變爲富於氮素物的土地，就好像用這種方法替別種植物對土地施肥一樣。豆類植物，平常和適當的礦物肥料（磷酸礦物及磷酸鉀肥料）結合，在長時期內不用施以糞料就可以獲得較高的收成。只有由於這種發現，自由經營才獲得十分穩固的基礎。

## 五 農業是一門科學

封建時代的三田制與十九世紀末葉獨立的農業之間是何等尖銳的對照喲！此種變革大部分完成於最近幾十年。黎比赫開闢了新方法的研究成果，發表於一八四〇年，可是新的研究在五十年代才得到了一般的承認，就在那時蒸汽機已開始在農業中應用，而細菌學在農業中已達到了它的初步實驗的成功（一八三七年發現了蠶底斑點病及醱酵菌底桿狀細菌，到一八四九年發現了炭疽病底桿狀細菌）。

農業在從前是一切生產中最保守的，幾千年來差不多就沒有什麼進步，幾世紀來其地位絕對沒有變動，可是在幾十年之內却變成了現代生產中一種最革命的生產。農業和由父傳子的習以爲常的手工業中的這些變革同時，變成了一門科學，或迅速地變成各科學（它們按照它們所把握的諸現象底範圍及按照理論了解底深度而迅速地發展起來）底集合體。農業經營者不認識這些科學，而是純粹的“實際家”，就會孤立無援地站在一切革新之前，同時他又不能停滯在舊的，即依照已嘗試過的祖父和曾祖父的方法去經營。

農業變爲一門科學已在農業教育發展史上，尤其是在高等學校內強有力地反映出來了。不僅教材的範圍及內容，就是國外農業學院底歷史也指示出科學的農業底進步。查爾研究了已改進的英國農業（十八世紀末葉及十九世紀初期），企圖給農業以科學的論證並介紹

到德國來，他第一個承認農業專門學院底必要性。一七九八年在他的著作“英國農村經濟概論”[*Einleitung zur Kenntniss der englischen Landwirtschaft*])中，他宣傳“創立農業學院的思想”，過了幾年之後就成立了第一個這一類的學院（一八〇二年在柴爾 [Chell]，一八〇四年在美格林 [Meglin]）；隨後在最近十年之內又開辦了其他的學校，其中霍亨蓋姆於一八一八年在維爾登堡所開辦的則是頭等的學院。這些高等學院中每一個都與模範的農業經營相結合，由於這種情形它們都設在城外。只有這樣辦法才能和“灰色的理論”一道給學生以理論應用底必要的顯著的實例，因為合理經營底數目在當時還很少。

但是這一類情形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就改變了，上述的學院在這一改變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極大多數的大田莊已過渡到合理的、基於科學的耕種方法，年輕的農業經營者要研究應用理論於實際也不再需要學院底模範經營了。

農業學校的教材在上述的變革（在機械學、化學、生理學及一般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內）底影響之下隨着合理的經營數底增加而擴充和加深了。高等農業學校開始要求更多的科學的輔助科目；更高深的精神的氣氛對科學是必要的；而散處在農村內的，孤立的學院已不大適合擺在它們面前的任務了。

黎比赫在這一領域內開闢出新的道路；他以巴伐利亞科學院院長的資格於一八六一年在慕尼黑發表了一篇鄭重的演說，在這篇演說內他尖銳地指責在農村內設立農業學院底諸多缺點，他要求把它們移到設有大學的城市中來。他的這一要求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像黎比赫的地肥與地瘠的理論所引起的爭論一樣。但是在這一次這位偉大的學者在爭論中是一個勝利者像前次一樣，他的要求到處都得到了滿足。除霍亨蓋姆的農業學校以外，所有高等農業學校現在都設

在有大學的城市內，不僅在德國，就是在奧地利、法國、意大利，都是如此。在這些國家內農業學院或者成爲大學的一系或者爲獨立的高等學院（如在柏林、維也納、巴黎）。

農業在較大城市內都被研究！這當然可作爲下一事實底最明顯的說明，即是農業在各方面已表示出完全依賴城市，農業本身的進步也全靠城市。

自然，農業經營者不能僅以自己的大學知識爲滿足。現時把經驗高於科學這種成語應用於農村經濟，是多麼可笑，但以爲科學就是一切，這也是很可笑的想法。在農業中科學與經驗結合，較之在工業內更爲重要，因爲應用理論的實際條件在這裏比在工業方面還要更異樣更複雜。這裏必須進行研究，搜集各種調查材料，但首先關於這一異常廣泛的領域底每一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概念，而這種情形又只有藉助精密的和合理的簿記學才有可能。

在三田制經濟（主要是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之下，農業經營者並不需要簿記學。當時對於某一地方底一切經營，一般講來，各種條件都是一樣的，自遠古以來就是同樣簡單而且明瞭的。現代農村經濟底情況就完全不同。現代農村經濟有着生產與交換，購買與販賣底極複雜的，各種各樣的而且經常變化的條件。它要是沒有精密的和正確的簿記就會陷於無望的混亂。後者（精密的和正確的簿記）在現代生產方式之下對於每一種大經營的企業都是必要的，但是在農業方面比在工業方面尤其必要。現代的工業企業只生產一種生產品，而每種農村經濟本身就是各種不同的個別生產底總和：如牧畜業、農業、園藝、蔬菜業、飼禽之類，其中每一種生產都提供不同的生產品。工業企業平常要購買自己的全部生產資料，而出賣自己的全部生產品。在農村經濟中，自然，向來就不會有這種情形。它只購買一部分生產資料，其他一部分是自己生產，如牲畜、牲畜的飼料、肥料；種子

一部分是購買來的，一部分是在自己農場內生產出來的；工資一部分用貨幣支付，一部分用實物支付。為適應這種情形，只有一部分生產品運到市場上出賣，而其中某幾部分生產品則被消費於自己的農場內。最後，在農業上不像在工業上那樣容易考查這一種或那一種生產資料或生產方式應用底結果。有時應用生產方式所得底結果在各方面明顯地表現出來以前總要經過好幾年。這就使巨細不遺的精密而正確的簿記對於農村經濟成為不可少的；簿記不僅從商業的，就是從科學的觀點說來也必須要採用，因為農業經營者不僅要處理資本及資本的利潤，而且也要處理土地及地租；地租因為是級差地租，要靠土地底豐饒；要完整地儘可能地保持土地的豐饒，甚至要增加土地的豐饒，——正如最有利的投資一樣，這必然是現代優良的農業經營者底一種任務。

可以說，要指出現代農村經濟的特徵，沒有比簿記再好的了，簿記是以科學的商業的記載為根據的。科學與商業之緊密的聯系乃是整個現代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特徵，這種聯系，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農村經濟內表現得那樣明顯。這是唯一的工業部門，它的簿記在各大學內都有專門的研究。

## 第五章 現代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

### 一 價 值

爲了要使農村經濟從封建時代的那個階段提高到它的現代的高度，並且使它繼續不斷地受正在改善的技術及經濟進步底支配，則在過去和現在都需要貨幣，需要更多的貨幣。這是用不着證明也用不着解釋的。只要指出在英國單單在排水設備上從一八三五年到一八四二年就耗費了一萬萬馬克以上，從一八四六年到一八五五年又耗費了五千萬馬克以上就夠了。這五千萬馬克就使一、三六五、〇〇〇英畝土地有了排水設備，但是需要排水設備的土地還有二一、五二五、〇〇〇英畝。

現代的農業企業要是沒有貨幣，或者可以說，要是沒有資本就無法經營，因爲在現代生產方式之下，每一筆款子，只要不是作爲個人消費之用，就可以變爲，而且往往會變爲資本，變爲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

因此，現代的農村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它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一切特徵，不過在農村經濟內這些特徵則具有特殊的形式。爲了要說明這一點，讓我們在這裏稍稍涉及抽象的政治經濟學領域並簡略地敘述一下我們的理論觀點，即馬克思的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利潤及地租底理論。自然，我們在這裏只限於最主要的部分，

並且使那些還不熟習“資本論”的讀者去研究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如果他們願意更詳細地鑽研本章底主要論題的話。

考察了現代的農村經濟以後，我們發現出兩個基本的事實：土地私有制及農業生產底商品性質。這兩個事實中前者我們在它的發生中已經研究過；後者及其一切後果——這就是我們在這裏所要研究的。商品是人類勞動底產品，它不是爲生產者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的，也不是爲無報酬的供給別人、供給家庭成員、供給地主等等而生產的，它對於生產者自己是不需要的，因而要讓給別人以交換生產者所需要的生產品。

拿一定量的一種商品去交換一定量的另一種商品，這種關係在起初完全是偶然的。但是隨着商品生產底發展，隨着交換成爲正常重複的現象，在交換關係內就愈加消失其偶然性，在它裏面就愈加表現出某種規律性；每一種商品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就得到一定的交換價值。交換愈往前發展就變成出賣，就是說，任何一種特殊的商品就變成貨幣商品，變成每個人都需要的，這樣的商品，每個人都願意拿自己的生產品去和它交換，並且用它來計量一切別的商品底價值。因一定的商品而獲得的一定數量的貨幣商品——金或銀，——就叫作這種商品的價格。

商品價值只是表現爲一種傾向，一種合規律的意圖，交換或買賣底過程要受它的支配。真正的交換關係，在某一時期實際獲得的價格，就是這一過程底結果。規律及其結果，自然是兩件不同的東西。在自然界或社會內正在完成的諸過程底研究者，應當把這兩件事分隔開來，如果他希望發現它們受支配的一些規律。他應當考察每一過程在其純粹形式內，把它和足以破壞它的正確性的那些附帶的情況分開來。只有用這樣方法他才能了解作爲一切現象底基礎的規律；知道了這些規律，就不難了解現象本身。用相反的方法，兩者都不能

了解。這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情形已說過無數次，可是常常被人忽視，尤其是在研究價值論的時候。

交換價值，兩種商品底一定的合規律的交換關係是用什麼來決定的？交換發生於分工。商品生產是這樣的一種生產形式，在這種生產形式之下，不同勞動部門的彼此獨立的勞動者都是替別人生產。在社會主義社會內，他們就可以直接相互勞作；但是作為各自獨立的生產者，他們只有經過互相交換自己勞動底生產品才能相互生產。他們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只有在這樣的生產者之間，真正的商品交換才有可能。在他們的一部分依賴別一部分的地方，只能說是強奪或搶劫，而說不上是交換。一個自由的人不願白白地替別人勞作，他不願把多於自己所得的勞動給予別人。於是，我們就看見發生這樣一種傾向：需要耗費同等勞動的生產品在交換時彼此對立起來，商品的價值由生產這種商品所耗費的平均必需勞動量來決定。但是生產者是否在市場上實現商品底價值，是否真正按它的價格，最低限度，得到他的勞動的代價，這是依賴於若干的情況，它們可以結合在需要與供給底總標題之下。

商品底價值決定於商品生產所耗費的社會必需勞動量，這一理論；引起了現代大學激烈的科學爭論。但是這一理論的一切反駁，如果把它們仔細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反駁的意見是把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或者與商品價格弄混淆了。一切學院派的價值理論都可歸結到這一點，就是他們認為價值底因素除了勞動底耗費以外，還有生產品底效用以及對生產品的需要。

不言而喻，每種生產品要使它成為商品，獲得價值，就一定是有用的生產品，一定適合某種（真實的或想像的）需要。使用價值就是商品價值底先決條件，但是商品價值的大小並不由它來決定。每一種交換是以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為前提的，否則交換就失掉了意義。



但是在不同性質底使用價值之間不能像交換價值一樣作純粹數量上的比較。如果我說一尺布比一磅鐵貴十倍，有人要是以為一尺布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比一磅鐵大十倍之故，或者比一磅鐵多十倍的效用，那簡直是荒謬之談。因為這一種商品的效用和別一種商品的效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不能相互較量的概念。

對於同類的各種商品自然可以決定其使用價值底高低，一雙較牢實的鞋子比一雙不甚牢實的鞋子有較大的使用價值，一杯路德斯海姆 (Rüdesheimer) 地方製的酒比一杯格龍堡 (Grunberger) 地方製的酒含有較大的使用價值。人們對於使用價值較大的商品總願意比對於使用價值較小的商品付價多些；因此，使用價值總是商品價值的一種因素。話固然可以這樣說，但是發生一個問題：如果較大的使用價值可以造出更高的商品價值，那末為什麼某種商品底每個生產者不單單製造品質較好的生產品呢？為什麼每個鞋匠不單單縫製很牢實的鞋子呢？為什麼每個釀酒者不單單釀造上等的酒呢？答案很簡單。如果我們不去注意製造者個人的特長，原料上、工具上以及諸如此類對討論底結果不發生影響的這些條件上的差別，那末一雙質量較好的鞋子就是一種更結實的工作底結果，即是說費了較多勞動的結果。決定質量較好的生產品底最高商品價值的，是此種費了較多的勞動，而不是較大的使用價值。俗話說：最貴的商品就是最廉價的，即是說最貴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超過質量較壞的商品底使用價值的程度，比起它們的商品價值上的差異還要大得多。值十二馬克的一雙鞋子可以說比一雙十馬克的鞋子經穿一倍。

但是約翰尼斯堡 (Johannisberger) 或路德斯海姆地方的酒有較大的價格，是由於這一類的酒並不是到處都能釀造。在這樣的場合內價值的規律一般講來就失掉它的意義，因為在這裏有一種壟斷的關係，而價值底規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

在同一類的商品因品質上的差異而形成價格上的差異的地方，它們往往可以用所費勞動的多寡及壟斷關係來解釋。在不受這兩種因素影響的地方若以為每個具有中等能力——同樣是假定的——的人不生產品質較好的商品，這種想法是很愚蠢的。

對商品或多或少的需要，同商品的或大或小的效用是一樣的。同一類商品底價格——不是價值——為什麼今天高而明天低，這種情形，自然可以用供需的變化來解釋；但是不能用供需的變化來說明為什麼在一個長時期內某一類商品底價格比別一類商品底價格高過一定的倍數，例如，為什麼一磅金子——價格雖時有漲落——在幾世紀期間比一磅銀子平均差不多貴十三倍呢？這種情形只能這樣來解釋，就是這兩種金屬底生產條件在幾世紀期間仍舊是一樣。若以為對金子的需要永遠超過對銀子的需要十三倍，這是很可笑的。

在這裏——我不知道，是第幾次了，——再重複所有這些解釋真有些慚愧，可是在說到價值論時，這些解釋又往往是必要的，因為價值論的反對者每每不辭辛苦提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論調來反對價值論。例如路易·勃萊塔諾（Lui-Brentano）教授在他的近著“土地政策”（第一編，“土地政策的理論導言”）中講到地租學說，同時講到這一學說的前提，即價值論。我們在他的書中讀到：“李嘉圖及其學派曾說到自然價值，並且把自然價值理解為耗費在製造某種物質資料上的成本費底總額。社會民主黨將這一學說繼續發展下去就把製造某種物質資料所必要的社會的勞動時間底總額稱為自然價值。”我們不知道勃萊塔諾把“社會勞動時間”理解成什麼。“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勃萊塔諾繼續說：“兩種價值論李嘉圖及馬克思現時在科學上可算是已被推翻了的。黑爾曼（Herman）揭穿了這兩種價值論毫無根據，證明了成本費只是決定價格的許多條件之一，除了成本費以外，需要底迫切，生產品底適宜消費，支付的能力，在別處得

到的可能性，賣者出售的必要，支付手段底交換價值，以及購買者所提出的各種利益，而同樣在別處銷售的可能性，在價格底規定上都起着作用。”（見“土地政策”，第八四頁）

因此，馬克思的價值論“在科學上被推翻了”，因為價格不單由勞動的耗費來決定。

李嘉圖，甚至還有亞丹斯密都說過“自然價格”。勃萊塔諾却將“自然價值”這一術語推到他們身上，甚至推到馬克思身上！在這寥寥數行的文字內價格和價值就被混亂到如此地步！

如果除去引起價格漲落的諸因素，那末在勃萊塔諾的論據中就只剩下一個決定的條件——即勞動的耗費，或者像勃萊塔諾“修正的”說是生產成本費。可是這種修正是極其可疑的。

生產成本費首先是以它們應當說明價值為前提。那末用什麼來決定生產成本費呢？生產成本費的總額就是被耗費了的價值底總額。因此，起初價值是用生產成本費來說明，然後生產成本費又用價值來說明！這樣看來，就等於沒有解釋！

可是，商品的價值用它的生產成本費來決定，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是從大學的經濟學家那裏我們可就不知道，在什麼條件之下這種說法才有意義。為要說明這些條件，我們應當說明簡單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之間的差異。

## 二 剩餘價值與利潤

簡單的商品生產就是此種生產方式底原始形態。它的特徵，就是生產者不僅彼此作為自由的和平等的生產者彼此對立，而且都是自己生產資料底所有者。

像一切其他經濟發展的大時代一樣，簡單商品生產從來就不會

成爲唯一統治的生產，不會有純粹的形式，它往往和別的經濟形式，和自然的、封建的、行會的、壟斷的經濟相混合。因此價值規律在這種商品經濟中只是部分地表現出來，因爲在這一範圍內正常的生產是在生產者彼此自由競爭的市場上發展起來的。

在發展底一定階段上簡單的商品生產就爲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所代替，即是說勞動者已不是自己生產資料底所有者。資本家現在出來和已成爲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對立而成爲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勞動者不再直接爲消費者勞作，他必須爲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勞作，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企業家，他成爲工錢勞動者。

只有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下商品生產才成爲普遍的，或最低限度，成爲統治的生產形式，自然經濟很快地消滅，封建的剝削和行會的壟斷成爲不可能，生產者底自由和平等成爲普遍的原則。

但正是這種生產方式（最先創造出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價值規律獲得普遍的意義），引起價值與市場價格間中間要素底出現，這中間要素隱蔽着價值規律並改變着價值的作用。這一中間要素，就是生產成本費，即是說，爲製造某種商品所需耗費貨幣的總數。

在簡單商品生產之下，用商品生產成本費來決定已製成的商品底價格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原始的農民兼紡織者，他自己替自己生產原料並且自己替自己製造紡織機。對於自己的生產他不必花一文錢；他的生產品除了勞動以外，對於他簡直什麼都不值。

在生產者由於分工的結果，要購買生產資料的地方，用生產成本費來決定價格是並不怎樣荒謬的。像在原始的紡織者手中一樣，手工業者手中麻布底價值是用勞動時間，即對於麻布的製造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但是這種情形現在是不會這樣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因爲紡織的手工業者並不自己生產麻紗並且也不是自己

替自己製造紡織機，——這些都是他買來的。這些東西的價值就構成他的生產成本費，這些生產成本費就加入到生產品底價值內即完全改製過的麻紗底價值，和紡織機在製造麻布時所耗損的價值。但是這些生產成本費不是構成麻布底全部價值；要獲得全部價值，必須將紡織者底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加到生產成本費上。

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之下，事情就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形態。生產資料底佔有者和勞動者已成爲兩種不同的人。如果資本家要想開始生產，他不僅要購買原料和工具，如前例所舉的麻布紡織者一樣，而且要購買勞動者本人底勞動力。因此，對於資本家，生產底一切要素就變爲貨幣的費用，變爲生產成本費，但這只是對於他才是如此。他認爲商品生產花費的，不是勞動，而是貨幣，在他看來，決定價格的是生產成本費，是貨幣的耗費，而不是勞動。然而只有盲目的人才不去注意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之間的差異，把用生產成本費決定價格宣告爲商品生產底普遍規律並且就這樣地“修正”勞動價值的理論。

可是，資本家認爲決定價格的生產成本費，並不和實際的生產成本費相符合。如果商品價格等於資本家在製造這種商品時所耗費的貨幣總額，那末他在出賣商品時就得不到絲毫的利益。可是利益是資本主義生產底動力。如果資本家把自己的貨幣投到任何一種企業內，而從這種企業內得不到一點利益，那末他把這些貨幣用在個人的消費上，在他看來，是更爲有利些。正是這種利益，即利潤，把貨幣額變爲資本。因此不論多少貨幣只要如此用來產生利潤的，就是資本。

因此，資本家在生產上對自己的耗費數額做了一種附加；如果他最低限度連國內通常的利潤都得不到，他就認爲是虧本了。他的生產費用的總數加上國內通常的利潤，這才構成他的生產成本費；爲了賺得成本費，他決定應當獲得的價格，要與它們（生產費用的總數加

上國內通常的利潤)相符合。

這是資本主義的實際中很明顯的事實，而且也是早已為大家所知道的事實。

亞丹斯密已經區別了在簡單商品生產下為市場價格漲落之唯一基礎的勞動價值，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因生產成本費底影響而產生的價值底變態，生產成本費構成自然價格，而不是構成價值(如勃萊塔諾所轉述的)即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現代大學的政治經濟學之優於這些“陳舊的”經濟學家就在於現代大學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把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淆，而且把價值，自然價格及市場價格攪作一團並且宣告古典的價值論已被推翻，因為“自然價值”並未說明價格底漲落。

亞丹斯密在他的“國富論”第一卷第六章中說：“在原始社會內在土地尚未變為私有財產，和資本尚未形成以前，為製造各種不同的生產品所必需的勞動數量間的關係，很顯然地是用以調節此等生產品的交換的唯一尺度……。”

“但是一旦在各個人手裏積聚了資本，其中有少數的人自然開始將資本使用於僱用手藝方面最有經驗的人，有資本在手的人供給被僱用的人工作的原料及生活資料，其目的在由出賣他們的生產品或價值(由於他們的勞動被附加到原料上去)而獲得利潤。”

這裏就劃出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之間的嚴格區別。隨後在第七章內，亞丹斯密又指出，在每個社會內及在每個國家內都存在着工資、利潤及地租底平均水準，——關於地租我們很快就要詳細地說到，因此在這裏我們不去考察它。這一平均水準可以稱為它們的自然率。亞丹斯密說：“如果商品價格不多不少恰等於為補償地租、工資及用在商品生產上，用在商品的最後完工和供給到市場上的資本底利潤底自然率所必需的貨幣總額，那就可以說，商品是按照

它的自然價格出賣的。”

利潤底“自然”率和價值相似，只能當作一種傾向而存在；像價格傾向於價值一樣，利潤則傾向於“自然的”或平均的利潤。

此種“自然的”，或如人們說的“國內通常的”利潤底高度是用什麼來決定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從亞丹斯密那裏，正如從李嘉圖那裏以及從任何其他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那裏很少見到說明；他們在這方面所指示的，如或大或小的冒險、或高或低的工資等等，這一切只說明實際利潤和平均利潤的偏差，正如需要與供給只說明市場價格與價值或與生產價格的偏差一樣，但這並不說明平均利潤底一定高度；固然可以用這些來說明，為什麼利潤有時達到百分之一九，有時達到百分之二一，而不是平均百分之二〇，但這並不說明為什麼平均利潤恰等於百分之二〇，而不是百分之二〇〇或二、〇〇〇。只有馬克思用自己的剩餘價值理論才給以說明。

自然，馬克思發現的並不是剩餘價值這一事實本身，而且他也絕無必要從湯姆生 (Thompson) 那裏抄襲這個事實，因為這種事實早已由亞丹斯密指出來了，亞丹斯密在上述“國富論”（第一卷）第六章中說：“因此，勞動者對勞動的原料上所加的價值，在這種場合內（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被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工資，另一部分構成企業家購買原料及僱傭勞動者時所耗費的全部資本的利潤。”

剩餘價值在這裏已經被理解了，而且正確地被規定了。湯姆生對於這一理解並未加上絲毫新的東西，他只是從經濟的事實中引伸出這一可疑的價值底法律上的要求而已。他也像亞丹斯密及馬克思底先驅者中任何一個經濟學者一樣不大能夠利用剩餘價值來解釋經濟的現象。剩餘價值供湯姆生用來指責利潤，而不是用來說明利潤。只有馬克思才能精密而有系統地指出，剩餘價值如何發生和

如何起作用，而安東·邁格爾輩對於這一理論却不曾添加上絲毫的東西。

剩餘價值是那一事實底結果，即人的勞動力在技術發展底一定高度能够生產出爲勞動力的維持及繁殖所必需的生產品數額以上的剩餘。人類勞動力從遠古時候起就能產出這樣的剩餘，即剩餘生產品，而且文化底整個進步，由於技術底改善，就建立在此種剩餘底逐漸增長上。

在簡單的商品生產之下剩餘生產品採取着商品底形態，獲得某種價值，可是還不能將此種價值稱爲剩餘價值，因爲勞動力在這個階段上固然創造出價值，但勞動力本身，不是一種商品，還沒有任何的價值。

從剩餘生產品中所得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歸諸勞動者：他可以用之於他的家庭幸福底提高，用之於大小粗細的享樂，可以節省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以財寶（如金銀之類）的形式儲存起來，或花費在改良自己的生產資料上。但是除此之外，他還得將剩餘生產品中所得利益的大部或小部以賦稅的形式繳給國家、公社、地主，當他處境困難的時候，還得從中付一部分利息給高利貸者。他的剩餘生產品底價值部分或全部直接被剝奪，也是常有的事。

自由勞動者一時的貧困，不僅爲高利貸者所利用，而且在某種市場情況之下也會爲商人所利用，商人往往同時就是高利貸者。商人底利潤在簡單商品生產之下不僅可以從他出賣商品（高於商品的價值出賣）中獲得，而且可以從他購買低於商品價值的商品中獲得。在商品市場上競爭愈烈以及生產者的處境愈窘迫，則利潤底第二種來源（即購買低於價值的商品）也就愈加有意義。在生產底這一階段內只要再前進一步，我們就踏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領域。

很顯然地，商人不從自由生產者身上榨取低於它的價值的生產



品，他寧願利用勞動者底窘迫的境況，使勞動者成爲替資本家服務的生產者，即成爲工錢勞動者。工錢勞動者生產商品不是在自己的企業內，而是在資本家的企業內，並且不是靠出賣自己的生產品，而是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爲生。

勞動力現在成爲一種商品，而且它本身獲得一種價值，等於爲勞動力的維持及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底價值。勞動者所生產的在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以上的多餘的價值，現在就成爲剩餘價值。

工業資本家將他的工錢勞動者所生產的全部生產品據爲己有。這種生產品底價值等於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原料、機器及建築物上耗損的部分等等——底價值加上勞動者底勞動力底價值，簡而言之，他的工資加上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就構成利潤。但是剩餘價值之變爲利潤，手續比價值之變爲價格簡單。

資本家加進生產過程中的並不是自己的勞動，而是自己的資本。利潤在資本家看來並不是他的勞動者底剩餘勞動底產物，而是他的資本底產物。他計算他的利潤率並不是按照他所消耗的勞動量而是按照他所投的資本之大小。由此得出結論，如果若干企業產生同一的剩餘價值率，那末，假如在這些企業中所投的資本數量不同，它們就一定會產生不同的利潤率。

我們且舉一個最簡單的例來說明這種情形。假定有三個企業，不僅有同一的剩餘價值率，即是說對勞動者的剝削相同，而且資本的周轉亦相同。資本家根據他的企業在一年內所產生的利潤量與在同一時期所耗費的資本的大小兩者的關係來計算利潤率。如果在兩個企業內，在同一的剩餘價值率及同一的資本量底條件之下，資本周轉的時期不同，那末它們的利潤率也隨之不同。

如果一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資本在每一次周轉中得出一〇、〇〇〇馬克的剩餘價值，又如果資本在一年以內周轉一次，那末這一年的

剩餘價值與資本之間的比例，是一與一〇之比；如果資本周轉十次，那末此種比例，將爲一〇與一〇之比；在前一種場合，利潤率就等於百分之一〇，在後一種場合，則等於百分之百。

這裏我們且把這種差異丟開一邊不講，因爲這種差異會將問題弄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舉出三個企業具有同一的剩餘價值率，同一的資本周轉時期及同一的勞動者人數。在這三個企業內所不同的只是爲容納同一人數的勞動者所必需的資本的數量。在這裏還得要指出，馬克思將資本劃分爲兩種——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可變資本是花費在工資上的，它就是在耗費後創造出剩餘價值的資本。這一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增長着，它不是不變的，而是可變的。反之，投入建築物、機器、原料及其他東西以內的，也就是說，投入生產資料中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並未改變其價值的大小，它的價值毫無變化地表現在從它製成的生產品內，因而它是不變的。在我們所舉的例子裏面，我們就從這個假定出發，即是在這三個企業內投入同一數量的可變資本；而投入不同數量的不變資本。其中有一個企業，它的不變資本非常少；假定這是一個木作業，在那裏沒有什麼建築物和機器，只是用簡單的工具在製造廉價的建築木材。在第二個企業內投下很多的不變資本；假定這是一個化學工廠，有非常寬大的，堅固的房屋及很多的機器，但只有比較少數的勞動者。最後，第三個企業假定是製造傢具的工廠，在這個企業裏面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例是平均的。

我們還必須再做一個假定以便盡可能使我們的例子弄得更簡單些——我們假定全部不變資本在一年內全被消費了並在生產品的價值中重新表現出來。很顯然地，實際上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碰到的。建築物及機器不會耗損得這樣快；如果某一架機器

可以用十年，那末在一年之內它轉移於因它之助而生產出的生產品上去的，只是它的價值的十分之一。可是如果我們不做這樣假定，那末，我們只是不必要地把我們的例子弄得很複雜，而在最後的結果上並未有絲毫的改變。這三個企業中每個企業都用一百個工人，每個工人一年所得的工資為一千馬克。剩餘價值率在每個企業內達到百分之百，則剩餘價值量就為十萬馬克。但是不變資本在本作企業A內為十萬馬克，在傢具製造廠B內為三十萬馬克，在化學工廠C內為五十萬馬克。在每個企業內資本一年周轉一次。於是我們便可列出如下的表：

企 業	資 本			剩餘價值 馬 克	剩餘價值 與資本總 額的比例
	可變資本	不變資本	總 額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A	100,000	100,000	200,000	100,000	一與二之比
B	100,000	300,000	400,000	100,000	一與四之比
C	100,000	500,000	600,000	100,000	一與六之比

如果商品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賣的，那末A就產生了百分之五〇的利潤，B——百分之二五，C——百分之一六·六，那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要的金科玉律不是人底平等，而是利潤底平等，就會極粗暴地被破壞了。資本家就會把C項企業當作黑死病一樣避開它，反而羣趨於A項企業。在C項企業中生產品底供給就迅速降落了，因而價格就被提高到價值水準之上；在A項企業中則發生了相反的情形；最後在A與C兩項企業中，就達到這樣的水準，在這水準下它們都提供了像資本平均構成的B項一樣的利潤率。此種利潤率就是平均利潤率，它決定生產價格。

於是我們又可列出如下的表：

企 業	全部資本	剩餘價值	一年內生產品 的全部價值	利潤率	利 潤	一年中生產品與 全部生產價格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百分數	馬 克	馬 克
A	200,000	100,000	300,000	25	50,000	230,000
B	400,000	100,000	500,000	25	100,000	500,000
C	600,000	100,000	700,000	25	150,000	750,000
總 計	1,200,000	300,000	1,500,000	25	300,000	1,500,000

所以，爲“生產成本費”所決定的生產價格與生產品的價值多少總有點偏差，但是價值規律並不因此而被破壞，而只是變了形而已。價值規律仍舊是調整生產價格，在背後影響生產價格的因素，並且對於全部商品及對剩餘價值的總額保持着絕對的意義，其結果它還是成爲價格及利潤率的堅固的基礎，價格及利潤率要是沒有它就會遭受到無法阻止的漲落。

大學的政治經濟學以輕視的態度來看早已爲所謂“科學”所摒棄的馬克思的價值論；但是這當然並不妨礙那些經濟學家還以爲必須年復一年的造出一大堆厚書和論文對早已推翻了的理論作新的反駁，這些著作的價值並不常常適合於在它們的製造上所花的勞動；但是他們爲說明平均利潤率的高度，除了“國內通常的”一句空話以外還能提出別的什麼來呢？

### 三 級差地租

在說明了“國內通常的”、“確定的”利潤以後，我們就進而研究地租。

地租的來源之一就是資本家除“通常的”、“確定的”利潤以外，還

能獲得額外的利潤那種情況的結果。這裏，在額外利潤各種形式中引起我們興趣的，只有一種利潤形式，這種利潤形式是在生產的領域內，是工業企業家因為只有他才能獲得特別有利的生產資料，而以較少於居支配地位的生產條件下一般所必需的成本費用生產出來的。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此種額外利潤底性質。我們在這裏可以做出像上面所引的例子一樣的簡單說明。

例如，我們拿一個城市內兩個製鞋工廠來說。一個工廠——穆勒廠是用通常應用的機器來工作；另一個工廠——蘇爾茲廠能夠得到極好的機器。穆勒廠化了三二〇、〇〇〇馬克資本，每年製造四〇、〇〇〇雙鞋子。平均利潤率等於百分之二十五。因此，穆勒廠在它的值三二〇、〇〇〇馬克的四〇、〇〇〇雙鞋子上應當定出這樣的價格，使他能夠得到八〇、〇〇〇馬克的利潤。只有得到了這個數額以後，照資本主義的概念來說，他才認為生產不會虧本。這樣看來，穆勒廠就把四〇、〇〇〇雙鞋子的生產價格決定為四〇〇、〇〇〇馬克，而每一雙鞋子的價格為十馬克。

反之，蘇爾茲廠化了三二〇、〇〇〇馬克的資本，由於自己的優良的機器，製造出四五、〇〇〇雙鞋子。它的每一雙鞋子底個別的真實的生產價格不是十馬克，而只是八·八八馬克。但它可以照一般的生產價格把鞋子出賣，像它的競爭者一樣，每雙賣十馬克。因此他出賣鞋子時可以得到四五〇、〇〇〇馬克；除了八〇、〇〇〇馬克為一般確定的利潤以外，它還將整整五〇、〇〇〇馬克當作額外利潤放進自己的荷包裏。

現在我們將這種場合應用到農業方面。我們試舉兩塊肥瘠不同的土地（例如每塊為二〇公頃）來代替兩個工廠，資本主義企業家在這兩塊土地上進行他們的經營。一塊地花費三、二〇〇馬克資本得到四〇〇公担麥子；另一塊地花了同樣的資本得到四五〇公担麥子。

假定一公担麥子的生產成本費爲八馬克，又假定平均利潤率爲百分之二五，第一塊地底所有者，如果要想得到通常的利潤，就得加上二馬克，於是生產價格就定爲十馬克，而農業經營者的利潤就爲八〇〇馬克。第二個農業經營者也是照一公担十馬克的價格出賣他的麥子，他就得到四、五〇〇馬克，因此除掉平均利潤以外他還得到五〇〇馬克的額外利潤。

很顯然地，這完全和我們在工業領域內所舉的例子一樣；可是在他們之間存在着極深刻的差別。這裏所觀察的農業內額外利潤底形態要受完全特殊的規律的支配，因此構成特殊的經濟範疇：地租。

土地——必須包括“成爲土地不可分離的屬性”(馬克思語)的一切生產力，例如，瀑布及流水底力量，就是一種十分特殊的生產資料。不能任意把水力增大，水力絕不是到處都具有同一的性質；某幾塊特殊土地底許多特殊的性質都和它們相連結而不能隨意轉移。反之，機器和工具底數目却可以隨便增加，可以移動而且可以有同一的質量。

如果工業資本家，由於非常有利的生產條件而得到額外利潤，那末他必然歸功於個人的特長或非常幸運的機會，特殊的經驗，知識或能力，或者握有極多的資本。但是他的額外利潤立刻使別的資本家眼紅也想得到同樣的利潤，他們都爭先恐後地趨赴有同樣生產條件底企業，這樣一來特別有利的生產條件遲早就會成爲普遍的條件，貨物加緊運到市場，就使價格低落，而首先改善生產條件的資本家底額外利潤也就因之消失。

由於特別有利的生產條件而獲得的額外利潤，在製造工業中往往只是一種例外的和暫時的現象。

在農業中由於各種土質底生產能力不同而獲得的額外利潤，情形就完全不一樣。此種不一樣的生產能力是自然條件底結果，並且在技術底一定條件之下提供一定的數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生產條

件對於各個農業經營者完全一樣，而土質底差異總是不能消滅。因此地租並不是暫時的現象，像製造工業中的額外利潤那樣，而是經常的現象。

此外，像我們知道的，工業生產產品底生產價格是由國內的通常利潤及在某種條件之下平均必需的生產成本費所決定的，即是說由爲製造生產產品所必需的資本底耗費所決定的。有一種企業其個別的生產成本費少於“社會必需”的生產成本費，就產生額外利潤；如果生產所費過多，該項企業所得的利潤就少於國內通常的利潤，在某些條件之下甚至還要虧本。

反之，在農業中生產成本費不是由中等質量底土地所需要的費用來決定的。如果除了好的土地外還耕種很大面積的壞的土地，那末，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就不應歸咎於非常的情況或農業經營者底個人的特性。這是由於單是好的土地不够生產爲居民底營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資本家——此地我們只談資本主義的農業——從自己的企業中除了補償他的生產成本費之外，還想得到通常的利潤。因此資本家只有在那種情形下才會在壞的土地上進行經營，如果因供應不足而提高食品的價格，即壞的土地底耕種也是合算的。這就是說在農業內生產價格不是由中等質量的土地上的生產成本費來決定，而是由壞的耕地上普通必需的生產成本費來決定。

地租與工業利潤間除了這兩種差別外還有第三種差別，它是前兩種差別底結果。在工業發展的地方人口特別增多，同時對於食品的需要亦隨之增加。這些又引起新地耕種底必要。其結果各塊耕地底生產能力的差異，便隨着經濟發展的進程而增大起來，地租亦隨之增加。

爲了要明顯指出這種情形，我們只須繼續我們上面所引的例子。爲了更加明瞭起見我們就用表式來說明，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假定從第一例中所述的劣等土地——花了三、二〇〇馬克的資本，生產出四

○○公担的麥子——轉到耕種更壞的土地，此種土地在同等地面上化了同量的資本而只生產出三二〇公担的麥子。

第一表

土地 類別	生產品： 小麥	所消耗 的資本	利潤率	個別的生產價格		一般的生產價格		地 租
				全部生產品 每公担		全部生產品 每公担		
				馬 克	馬克	馬 克	馬克	
A	450	3,200	25	4,000	8.88	4,500	10	500
B	400	3,200	25	4,000	10.00	4,000	10	——

第二表

A	450	3,200	25	4,000	8.88	5,650 <sup>①</sup>	12.50	1,650 <sup>②</sup>
B	400	3,200	25	4,000	10.00	5,000	12.50	1,000
C	320	3,200	25	4,000	12.50	4,000	12.50	——

我們可以看出，由於生產底擴大及過渡到劣等的土質，A類土質底地租便從五〇〇增到一、六〇〇<sup>③</sup>馬克；B類土質先前沒有產生任何地租，現在却產生一、〇〇〇馬克的地租。

利潤率隨着經濟發展底進程有向下降低的趨勢。我們在這裏不去說此種現象底原因，可是這一現象本身是無容爭辯的。反之，地租却有上升的趨勢。可是這並不是說，某塊土地的地租在一切場合內都一定增高。在舊文明國家內，農業，實際上往往因從膏腴的土壤過渡到劣等土壤而擴大起來。在新興國家內常常發生相反的情形，因為在那裏首先開始耕種的不是最好的土地，而是最接近的土地。如果假定，由於農業底擴大，拿去耕種的不是較壞的土地而是較好的土地，

① 此處應作五、六二五。——譯者

② 此處應作一、六二五。——譯者

③ 此處應作一、六二五。——譯者



那末我們的表就採取如下的形式。

第 三 表

土地 類別	生產品: 小麥	所消耗 的資本	利潤率	個別的生產價格		一般的生產價格		地 租
				全部生產品	每一 公担	全部生產品	每一 公担	
	公担	馬 克	百分數	馬 克	馬克	馬 克	馬克	馬克
X	500	3,200	25	4,000	8.00	5,000	10	1,000
A	450	3,200	25	4,000	8.88	4,500	10	500
B	400	3,200	25	4,000	10.00	4,000	10	——

在這個場合內，A類土地的地租並沒有增加，但是X類土地，先前並不產生地租，現在却產生一、〇〇〇馬克的地租。地租的總額，歸於土地所有者的，和第一表中所引的比較起來，而且就其對所消耗的資本總額的比例講來，是絕對地增加了。

在某種條件之下可耕種的土地有這樣多而且地質有這樣好，至使糧食的價格跌落，在耕地中最壞的土地上的農業經營就成爲毫無利益而必須停止。在這種場合內，某些土地底地租就會降落，但是地租的總額仍然可以絕對地增加，就是就其對投入農業中的資本總數的比例而言，也是如此。這點可以用下表來說明：

第 四 表

土地 類別	生產品: 小麥	所消耗 的資本	利潤率	個別的生產價格		一般的生產價格		地 租
				全部生產品	每一 公担	全部生產品	每一 公担	
	公担	馬 克	百分數	馬 克	馬克	馬 克	馬克	馬克
Y	600	3,200	25	4,000	6.66	5,328	8.88	1,328
X	500	3,200	25	4,000	8.00	4,410	8.88	440
A	450	3,200	25	4,000	8.88	4,000	8.88	——

生產價格降低了，在B類土地上經營完全停止了，A類土地已不

能產生地租，在X類土地上地租從一、〇〇〇馬克降至四四〇馬克，可是地租總額仍然從一、五〇〇馬克(第三表)增至一、七六八馬克(第四表)。

在我們所舉的例子內，即使拿任何一個國家或甚至全世界經營底各種土地來代替個別的地塊，也不會有什麼變化。這只是拿幾百個或幾千個百萬來代替幾百幾千而已。

但是構成地租的不僅是土地肥沃上的差異，而且是它們的位置及離市場遠近的差異。那些成爲食品市場的地方，其人口愈增加，對於食品的需要亦隨之增加，必需供給市場的食品，其距離亦愈遠。但是遠距離的土地，要在糧食價格提高到使它除償付生產成本費之外，還能償付運輸費用，並能產生出資本的平均利潤的時候，才爲市場而耕種。這種情形同時就替在市場附近的土地創造出一種地租。

假定有三塊土地，距離市場各不相同，但爲簡單起見，我們假定這三塊土地的肥沃程度相同。生產品，例如小麥的運費每一公担、每一公里爲一蒲非林(德國幣名，約爲百分之一馬克)。在這樣的場合之內，我們便有：

第 四 表 (a)

各塊土地	離市場的遠近	小麥的生產額	當地個別的 生產價格	運 費	四〇〇公担小 麥的市場價格	地 租
	公 里	公 担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A	5	400	4,000	20	4,400	380
B	50	400	4,000	200	4,100	200
C	100	400	4,000	400	4,100	---

此種形式的地租隨着人口底增加而有增高的趨勢。但是交通道路底改善，使糧食的運費減低，也能發生相反的作用。

最後，地租底第三種形態還是可能的，它是舊文明國家內最重要

的形態。糧食底生產可以擴大，不僅由於新土地底開墾，而且由於舊的已經耕種過的土地底耕作方法上的改善，由於對這些土地底耕作有大量勞動底供給，簡言之，由於資本底大量耗費（工資、牲畜、肥料、工具等等底費用）。如果投入較好土地去的這一額外資本，和從那些剛需要開始耕種的最壞土地所得的收入比較起來，能產生出更高的收入，那末收入底這樣增高就形成新的額外利潤、新的地租。

爲說明這種情況，我們就回到第一表去看一看。在第一表中我們列舉着兩塊大小相等的土地 A 與 B。B 屬於最壞的土質，它的生產價格（一公担小麥爲十馬克）就是市場上固定的生產價格。我們假定，A 塊土地上耗了額外的資本，即是原有的資本增加了一倍；即使新投下的資本不像第一次那麼樣能生產，但總比投在壞的土地上更能生產些。這時我們便可得如下的表：

第五表

所投的 資本	生產品： 小麥	資本的數量	利潤率	生產成本費	市場價格		地租
					每公担	全部生產品	
	公担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馬克
A <sup>1</sup>	450	3,200	25	4,000	10	4,500	500
A <sup>2</sup>	420	3,200	25	4,000	10	4,200	200
總計	870	6,400	25	8,000	10	8,700	700
B	400	3,200	25	4,000	10	4,000	—

這樣看來，從 A 塊土地所得的地租總額，由於資本 A<sub>2</sub> 底額外消耗而增加了。

此地所觀察的地租底形態無論怎樣不同，它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都是從各塊土地底肥沃或位置上的差異中發生的，它們就是級差地租。

級差地租究竟爲誰所得的呢？

工業中的額外利潤(是大大地超過平均勞動生產率底結果)歸資本家所有，雖然資本家所賴以制勝他的競爭者的精良的機器不是他發明的，而只是將這種精良的機器據為己有，雖然表現出較大的勞動生產率不是他的功績，這勞動生產率是發生於他有巨額的資本因而可以在廣大的範圍內進行他的經營。由於土地之較大的肥沃或更有利的位置而獲得的額外利潤，在資本家看來並不怎樣好。

如果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農業經營者，那末，自然，他要把額外利潤放進自己荷包裏。在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者與土地所有者是兩個不同的人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那裏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者只是別人的土地底租佃者。土地不能任意增大或轉移。農業經營者如果不是土地所有者，不得到土地所有者底許可就不能進行經營，他必須讓出他的額外利潤，即地租，來買得這種允許。超過這種額外利潤以上，土地所有者平常就不能再向租佃者要求什麼(最低限度是在那種場合內，即在此地所假定的租佃者進行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的時候)。如果資本家沒有希望得到通常的利潤，那他就停止經營，土地所有者也就找不到租佃者了。反之，如果租金少於地租，那末所得的額外利潤底一部分就留在租佃者手裏，他就得到比平均利潤更多的利潤；這種情形就會使競爭加劇，而競爭又引起租金底增高。

#### 四 絕對地租

土地所有者底壟斷(沒有他的允許就不能進行農業經營)也以另外一種方式使人們感覺到它。在先我們把最壞的土地當作不產生多餘的利潤，可是如果資本主義式製造的商品，其市場價格是直接為它們的價值所決定，而不是為生產價格所決定，那時在資本主義農業內額外利潤就在最壞的土地上也可以得到。

爲說明這點起見，我們再製一個指明三個不同企業內剩餘價值對資本總額比例的表：

企 業	資 本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對資 本總額的比例
	可變資本	不變資本	總 額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馬 克	
A	100,000	100,000	200,000	100,000	一比二
B	100,000	300,000	400,000	100,000	一比四
C	100,000	500,000	600,000	100,000	一比六

這裏有A、B、C三個企業，它所具有像馬克思說的“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馬克思所以稱它爲“資本底構成”，因爲資本底構成是“爲技術的構成所決定而且反映出這種技術的構成的”（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一二四頁）。不變資本的部分比可變資本的部分愈少，則資本底構成愈低。我們且假定在這三個企業內對工人的剝削，也就是說，剩餘價值率是一樣的。

如果商品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即是說如果剩餘價值的總額，在每個個別的場合內等於利潤的總額，那末A項企業，在B項企業有着平均構成底資本條件之下，就產生了違反平均利潤率的額外利潤。A項企業底利潤等於百分之五〇，B項企業底利潤等於百分之二五。因此A項企業就得到了百分之二五的額外利潤。

如果A項企業是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生產，那末他就不能替自己保持這種額外利潤，這種額外利潤就只有暫時的性質。如果A項企業佔有特殊的地位，如果它能够避免競爭到某種程度，那末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種情形恰恰在農業內就有它的地位。在任何國家土地所有都成了一種壟斷，土地所有者就有可能將他的土地不拿去耕種，如果他的土地不產生地租的話。在人們都迷醉於愛情的地方，卡爾

洛斯就不能憎惡，在每個土地所有者都能取得地租的地方，那裏不能產生級差地租的最壞土質底所有者也想把租金放進荷包裏。在糧食價格並未超過生產價格因而在他不能得到額外利潤以前，他就不允許耕種他的土地。

可是對於此種額外利潤底產生，並不需將穀物底生產價格提高到它的價值以上。因為農業乃是屬於那些工業部門，它們差不多不再加工製造它們所生產出的原料，因而它們只需要低級的資本構成，最低限度，在沒有達到某種程度的技術發展時。羅伯爾塔斯(Rodbertus)底功績就在於他第一個指出了從低級的資本構成產生出的農業上的額外利潤，乃是地租的泉源，——但他以為農業資本底低級的構成為事物底本性所形成，而且在任何場合內都是必然如此的，他的想法就錯了。如果農業消費的原料比其他資本主義生產部門為少，那末，從另一方面說，耗費原料於機器及建築物上——倉庫，牲畜的廄舍灌溉工作等等之上——就隨着技術底進步而不斷地增加。若說集約的農村經濟在現時就其資本底有機構成而言，還是在平均的水準以下，那是很可懷疑的。

可是，在計算利潤的時候，就必須注意到資本周轉底時間；關於這一點我們到現在還不曾說過，為的是使我們的研究不致弄得很複雜，但是現在我們却不能不來研究一下。資本家計算他的利潤率，是按照他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年)所得到的利潤額與所消耗的資本總額底比例計算的。在同樣的有機構成及同樣的生產範圍之下資本底周轉完成得愈慢，則資本底總額亦愈大。在農業中資本底周轉特別慢，因此，如果周轉底速率低於平均的速率，則從其他泉源中得出的額外利潤，就會消失。

我們且假定，在上面我們所引的表中A、B、C三個企業各有不同的資本周轉期。為了要獲得一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剩餘價值，第一個

企業要耗費二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資本，第二個企業耗費四〇〇、〇〇〇馬克，第三個企業耗費六〇〇、〇〇〇馬克。假定資本周轉期第一個企業為一年（我們在這裏且把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的差異擱置不講），第二個企業的周轉期為六個月，第三個企業的周轉期為三個月。對於投資在四〇〇、〇〇〇馬克的B企業現在只需二〇〇、〇〇〇馬克，而C企業在一年周轉一次的時候需要六〇〇、〇〇〇馬克，現在只要有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就可以經營。

於是我們就可列出如下的表：

企 業	資 本 總 額	剩 餘 價 值	剩餘價值與資本總額的比例(百分數)
	馬 克	馬 克	
A	200,000	100,000	50.0
B	200,000	100,000	50.0
C	150,000	100,000	66.6

資本極迅速的周轉，就可使上表中C企業因其高度的資本構成所受的損失得到補償，且有盈餘。

這樣看來，羅伯爾屠斯斷定，似乎由於農業資本底低度構成，一旦農業生產品只要按照它們的價值出賣，就自然而然地會得到額外利潤，那就錯了。一方面，此種低度構成不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它的影響更易為農業中資本周轉底緩慢性所麻痺。

可是如果羅伯爾屠斯證明似乎由於農業資本底低度構成一定發生特種形式的地租雖不正確，那末他總算是指出了此種地租如何能發生的一條道路。馬克思仍然研究了這一特種地租底規律，他把這種地租叫做絕對地租。

像一切壟斷的價格一樣，為土地所有底壟斷所造成的糧食價格，

可以提高到它們的價值以上。這一提高底程度要看在壟斷範圍內競爭底規律還能起多少作用而定。此種提高的程度，是由土地所有者彼此之間及與國外土地所有者的競爭來決定。它甚至要看在價格提高影響之下附加的資本被投入到較好的土地及因此而使生產增大的那些限度如何而定；最後——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由人民的購買力來決定。糧食價格愈高，則消費者亦愈少，不能支付這樣的價格因而不得不限制自己消費的人數亦愈多；這當然會引起對代用物需要的增加及代用物生產底擴大。如果用這樣的方法還不能供給人民以充分的食料，那末最後就會發生劇烈的移民及死亡率增高，即是人口的減少。這樣看來，土地所有者先生們就不能任意增加絕對地租，但是只要可以榨取的，他們就榨取。

只要從最壞的土地中都可得到絕對地租，那末從其他一切土地中也一定可得到此項地租。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試回憶上述的第二表，那裏最壞的土地C在一公担小麥的價格為一二·五〇馬克的條件之下，並不產出地租。我們且來觀察，如果C土地在小麥價格未提高到一二·五〇馬克以上的時候，就不用來耕種，那末這個表將如何變化。我們假定小麥的價格提得很高，甚至重新耕種C土地，並因此運到市場的小麥亦同時增加，並不使麥價降到一五馬克以下。那末我們就可得出如下的表：

土地的 種類	生產品： 小麥	每一公担的生產價格		一公担的 市場價格	級差地租	絕對地租	地租總額
		個別生 產價格	一般生 產價格				
		公 担	馬 克				
A	450	8.88	12.50	15	1,650①	1,125	2,750②
B	400	10.00	12.50	15	1,000	1,000	2,000
C	320	12.50	12.50	15	—	800	800



C土地的所有者或所有者們，是一些很實際的基督教徒，他們用提高小麥價格的辦法不僅替自己創造了地租，而且將自己同伴底地租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他們賴以達到此種目的的手段，即通常的各種卡特爾手段，——縮小生產來提高價格。它和工業的卡特爾所不同的，只是在於土地所有者先生們底自然的壟斷，在提高價格上，比他們必須人爲地替自己創造壟斷的工商業同伴更容易些。

自然這並不妨礙土地所有者去攻擊穀物的高利貸行爲及小麥販賣人底卡特爾，——他們也禁止“猶太人式的”定期買賣，因爲這種買賣妨礙穀物價格提高。地租之所以放進土地所有者荷包裏，完全靠了他的土地所有權。如果土地所有者將他的土地租給租佃者，他不消費吹灰之力就可坐享他的地租。資本主義企業家雖不多參加生產，但爲了要實現利潤（他的工人替他生產出來的），最低限度，他也得在商品流通範圍內，在買賣上表現自己的活動，或最低限度，只要股份公司在這一範圍內他的活動也不致成爲枉費，他就應當做這樣的活動。但要使地租不僅源源而來，而且還不斷增加，土地所有者就只要掌握着自己的土地就够了。

我們不應當將資本主義的地租和先前封建地主加在農民身上的貢賦弄混淆了。地主所執行的那些重要的機能在整個中世紀期間本來或多或少與這些貢賦相適應，這些機能後來就由國家取而代之。因此現在農民就以賦稅代替貢賦交給國家。地主必然關心裁判底組織，供養警察，代表自己的農奴在領地以外的利益，用武力來保護它們，爲它們作軍事上的服務。

資本主義社會底土地所有者却不關心這一類的事。因爲地租若

---

① 此處應爲一、六二九。——譯者

② 此處應爲二、七五四。——譯者

是級差地租，它是由競爭產生的，因為地租是絕對地租，它是由壟斷造成的。地租歸於土地所有者這一事實，無論是在這一場合和另一場合都不是任何社會機能底結果，而是土地私有權唯一的結果。

實際上地租是分不開的；我們看不出它的哪些部分是級差地租，哪些部分是絕對地租。地租平常還和土地所有者在進行那些改良時所耗費的資本底利息相結合。在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農業經營者的地方，地租就作為農業利潤底組成部分。可是這兩種地租形態底差別却有着很大的意義。

級差地租是從生產底資本主義的特性中發生的，而不是從土地私有權發生的；即使土地被宣佈為國有財產——這是土地改革底主張者所願望的，——而在農業中仍保存着資本主義生產的時候，此種級差地租是不會消滅的；不過在那時級差地租已不是歸個別的私人所有而是歸社會所有。

絕對地租是從土地私有權中發生的，是從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利益處於相反地位中發生的。土地國有就有可能使絕對地租消滅並因之適當地降低農業生產品底價格。

級差地租——在這裏又含有它和絕對地租的第二種區別——不影響於農產品價格底決定，絕對地租對於農產品價格底決定却有影響。前者發生於生產成本費，後者發生於市場價格底增加超過生產成本費。前者由於盈餘，由於額外利潤而構成，這些額外利潤是較大的勞動生產率在良好的土地及地產底優良位置上產生出來的。後者，則相反，它不是從農業勞動在個別場合的額外收益中發生的：它只可以由土地所有者為自己的利益從剩餘價值總額中扣出的一部分，即是說由降低利潤或縮小工資底手段構成的。如果工資和糧食價格一同增高，則資本的利潤就要降落。如果糧食價格增高了而工資沒有隨之相應增高，則工人就要遭受窘迫。

最後，還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實際上也是常常有的情形——就是工人和資本家共同來承擔絕對地租對他們所造成的損失。

幸而，絕對地租底增長有一定的限度。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土地所有者不能任意規定絕對地租的大小。誠然，直到最近時期，——絕對地租，像級差地租一樣，由於人口底增加，更加銳利地在歐洲不斷地增加了土地所有底壟斷性質。可是海外的競爭給這一壟斷以強有力的打擊。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去肯定級差地租在歐洲，除英國某幾部分外，在海外競爭影響之下也遭受了打擊。照例，無論任何地方，我們從沒有看到土地任其荒蕪而不加耕種；最壞的土地還是有人開墾，所變更的至多只是開墾方法，而決不是土地開墾底強度。

絕對地租降落了，這首先是有利於勞動階級的。如果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英國從七十年代起已大大地改善了，那末這樣的結果主要應歸功於絕對地租底降落，其次，自然要歸功於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權力底加強，不讓資本家階級單獨利用這種有利的情況。

可是不利的情形也隨着有利的情形而來。地租底降落引起了農村經濟中的危機，這種危機不是暫時性的，像工商業中那樣，而是經常性的，這種危機恰恰發生在那些地方，——在大多數國家內都是如此——那裏土地所有者與農業經營者同是一個人，因而前者底每次損失就是後者底損失，並且那裏地租被規定在土地價格以內。

土地私有權在海外競爭沒有出現以前，由於地租底增加，就成爲勞動階級貧困底最大的泉源之一，從海外競爭出現以後就變爲土地所有者及農業經營者貧困底泉源。任何企圖要想阻遏這一個泉源，就一定會迫使另一股水流更加洶湧。

## 五 土地價格

在土地私有制及商品的農業生產統治之下，各塊土地本身就是商品。隨着生產資料變為資本，人們也就不難開始將土地視為資本。可是土地決不是這樣的資本。我們無論怎樣稱土地為資本，土地所有者並不因此就富起來。固然他的土地已成為有一定價格及市場價值的一種商品。但是這種價值要受完全不同的規律的支配，與普通的商品價值不同。土地不是人類勞動底產品，因此它的價格既不能用它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來決定，也不能用生產成本費來決定。土地價格只能由地租來決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土地的價值等於資本（產生和地租分量相等的利息的資本）底價值。此種資本底數量就是土地底市場價值。

這樣看來，土地底市場價值，一方面是由地租底大小來決定，另一方面是由“國內通常的”資本利息底高低來決定。

資本的利息就是資本主義企業家為利用資本所有者底資本而付給他的那一部分利潤；或者換句話說，就是資本家單靠他的資本所有權這一赤裸裸的事實（他沒有積極地在工商業中做一個獨立的企業家），就能分享的那部分利潤。這不僅指借貸資本而言，而且也指股份資本而言。原始的借貸資本底諸形式及生產範圍以外的借貸資本，在目前對於我們都沒有多大意義。

資本的利息率也像利潤率一樣有趨於相互均衡的傾向。在利息高於平均率付出的地方，新的資本就會流到那裏去，而在所付出的利息低於平均率的地方，資本就從那裏流出去，——自然，這要在其他條件相等，機會相等以及諸如此類的情形之下才行。可是，“利息底數量，不論是平均的利息，或每次為市場所決定的利息，決不是均等

的，一定的和感覺得到的分量，像一般的利潤率那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第三四九頁）。利息率的均衡比利潤率的均衡來得更快。利潤率的均衡是由一國全生產過程底變化，由生產在這一部門擴大，在另一部門縮小而達到的。貨幣資本要達到利息底均衡却非常便當，要使利息均衡實現，並不需很多的時間。

在貨幣證券買賣的市場上，其中產生利息高於平均率的那些證券估價就相當地高，反之，提供較低利息的那些證券其估價也就低。如果我以二百馬克購買的股票提供百分之一〇的股息，而在國內通行的利息等於百分之五，那末我就能够以四百馬克出賣我的股票，而完全不依賴於它所代表的生產資料底價值。

土地也可以被視為同樣一種貨幣證券，它是按照給自己土地所有者帶來多少地租估價的。

但是如果許多經濟學者根據這一點就把土地當做資本，那末他們就完全忽視了存在於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投入工業企業中的貨幣資本所產生的極高的利息率——在自由競爭條件之下，也可以說，在鐵道礦山等等事業中的壟斷關係不存在的條件之下，——像極高的利潤率一樣，不能常久繼續下去。因此貨幣證券底估價高於生產價格可以說只是暫時的現象。

在規定土地價格的時候這些就完全談不到，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土地本身是沒有生產價格的。利息一般的低落，決不牽動貨幣資本底市場價值，而對於土地底市場價值却有影響。產生六、〇〇〇馬克地租的一塊土地在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六的時候，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在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四的時候，就值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反之，若希望目前產生百分之六利息的借貸資本或股分資本一〇〇、〇〇〇馬克，在利息一般的降落到百分之四的時候，能够得到一五〇、〇〇〇馬克的價值，那就可笑極了。由於資本底轉換或加緊

流入適當的生產部門內，馬上，這項資本就不會產生百分之六的利息，而只產生百分之四，這樣資本才保持着它原有的價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利息率一般的低落提高土地底市場價值，但不是提高貨幣資本底市場價值。自然的資本被投到土地內，這是可能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大部分也的確是如此。可是，這種情形只把問題弄複雜，却絲毫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土地所有者在農業的剩餘價值內所得那一份，不僅包括地租而且也包括資本的利息，而土地的價格，除包括資本化的地租以外，還包括資本底資本化的利息，在通常的條件下亦即資本的本身。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單拿資本的利息來說明土地價格，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時候，甚至沒有投過資本的土地，完全沒有耕種過的土地，都能得到價格。這裏我們就看出土地與資本之間的第二種區別。貨幣資本底價格在貨幣市場上是按照它真正生產出的利息來計算的；土地的價格是按照它能夠產生出的地租來計算。這裏還有第三種區別：人類勞動所創造的生產資料，逐漸被消磨（物質上及精神上被消磨，後者係由於各種新發明的結果）並且遲早總要停止它的存在。它們必須不斷地更新。反之，土地不會被毀滅，最低限度，從人類社會的觀點看來，土地是永久的。

後兩種情況就指明，如果工業企業底所有者不使工業企業開工，那是多麼的荒謬。在土地所有者看來，這種停滯在地租增高的時候（尤其是在城市內）決不是荒謬的。把土地荒廢不耕種對於他們往往是很有利的。

把土地稱為資本的時候，這一切的差別就被抹煞了。然而直到現在許多經濟學者還堅持着這種同一（即把土地與資本同樣看待），——例如勃萊塔諾在其屢次為我們所引證的“土地政策”一書中就是如此看待的。照他的意見，資本投入土地中以及羅伯爾屠斯將城市

建築物視為資本這一類事實就可作為擁護這一觀點的證明，“雖然在其上面建有房屋的地面是自然界底壟斷的賜物……這樣看來，土地在現時就是資本。但是，當然，土地有別於其他的資本，因為它是自然界底壟斷的賜物。可是，不僅作為農業用的土地是資本，就是關作建築房屋用的土地，或作為工業用的土地也都是資本，同樣瀑布、礦山、鐵路之類也是資本。”（見“土地政策”，第一三頁）很顯然地，這一點證明的，並非土地是資本，而是城市的土地、瀑布、礦山都能產生地租。至於說到鐵路，那就得要具有極其熱情的幻想才會把它們當作“自然界底賜物”。這其實是像多格貝爾（Dogberry）說的：“美貌是命運底賜物，而能寫能讀則是自然界底賜物”一樣。

無論怎樣稱土地為資本，可是土地所有者並不因此成為資本家。

在決定地產價格的時候，除地租外，自然，還要注意到其他的因素；除“土地資本”外，即是說，除資本化的地租外，還必須計算到真正投入農業生產中的資本：建築物、技術的設備、耕畜和農具。此種資本底市場價值，是照生產價格（減去已經消耗的部分）來計算的。

可是，在田莊內也可以有滿足奢侈目的的各種設備，這在大田莊內是常有情形。和生產沒有絲毫關係的這些設備，當然會增加土地底價格，但不是增加地租。這些奢侈的設備的價格愈高，則“土地資本”的利息必愈低，如果把前者也歸併到後者（“土地資本”）去的話。如果，仍用前例，假定一塊土地能提供六、〇〇〇馬克的地租，那末在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三的時候，它的價格就是二〇〇、〇〇〇馬克。如果土地所有者在它上面建築一座礪碾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那末土地底市場價值就提高到三〇〇、〇〇〇馬克；但這就是說“土地資本”只能提供百分之二的利息，比普通資本的利息要少得多。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論斷，似乎土地資本具有一種顯著的特性，它能提供任何其他資本不能產生的特別低的利息。這種論斷是完全不

對的。

如我們看到的，土地資本是不存在的；這不過是一種虛構而已；實際上存在的是地租，“土地資本”所得的收入只有照地租來計算。誠然，在這種計算下資本化地租通常要高於平均利息，但這不是因為“土地資本”具有奧妙的特性能產生較少的利息，而是因為資本家具有很顯明的特性把土地——生產地租的場所——視為具有特別優點的投資場所。這種場所，大部分是十分穩固的。不反映到地租上去的物質的與非物質的利益如擁有別墅及碉堡，這一點我們指出過，為自家消費的日常生活品底生產、行獵、政治影響都往往與土地私有相聯系；直到最近期間地租在歐洲與資本的利息正相反，曾經有過——而在城市及城市附近，直到現在還有——上升的趨勢。為着這些希望，資本家在購買土地時，當然要特別多花些錢。

可是，這一切辦法都沒有使土地所有者本身變為資本家。自然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土地所有者又是資本家，可是我們在這裏不談這一點。買和賣使土地所有權成為投資場所，但並不使它成為資本；十八世紀法官的位置雖是花了資本才獲得的，但位置並不成為資本。固然，土地所有者可以出賣自己的土地並因此而成為資本家；但是當他成為資本家的時候，他已不是土地所有者了。反之，用自己的全部資本購買土地的資本家，在他成為土地所有者的那個時候起，他已不是資本家了。

土地所有者不是資本家，英國的地主們首先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們比大陸上的地主們更早廢除了自己農奴底封建貢賦而且不得不更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經營。他們的企圖仍舊是一種企圖，因為當時信用事業還沒有發展。他們不得不（在十五世紀已經就是如此）把自己的地產分為大塊、小塊的土地，並且把這些土地租給農業經營者，農業經營者手裏有耕種土地所必需的耕畜及農具。土地租給資本主義的



租佃者，這就開闢了他們把必要的資本投到農業方面去的一條道路。

在歐洲大陸上，尤其是在阿爾卑斯山迤北，現代資本主義租佃制都不及英國那樣的發達。

一八九五年時在英國全部耕地面積中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的只有四、六四〇、〇〇〇英畝，佃戶經營的則有二七、九四〇、〇〇〇英畝。在自己土地上經營的農戶計有六一、〇一四戶，而在租地上經營的則有四五九、〇九二戶。

在德國和法國我們看見的是另一種情形。但是在這裏租佃制總是在發展着。在德意志帝國內租地經營戶數，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從二、三二二、八九九增至二、六〇七、二一〇，即是增加了二八四、三一一，可是在自己土地上的經營農戶數，則從二、九五三、四四五降至二、九五—、一〇七。在法國農業經營者計有：

年 代	在自己土地上經營	在租地上經營
1882	3,525,842	1,809,904
1892	3,387,245	1,405,569
減(-)或增(+)	(-)138,097	(+)95,665

甚至在合衆國租佃制也在發展着。那裏的農戶計有：

年 代	在自己土地上的	在租地上的
1880	2,984,036 75%	1,024,601 25%
1890	3,269,728 72%	1,294,919 28%

在合衆國底東北各州中我們看到土地所有的農戶數，不僅是相對的減少，而且像昔日的歐洲一樣，是絕對的減少。那裏的農戶數如下：

年 代	在自己土地上的	在租地上的
1880	584,847	111,292
1890	537,376	121,198
增(+ )或減(-)	(-)47,471	(+)9,901

可是在所有這些國家內在私有土地上經營的還是佔極大優勢。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只有從城市資本及隨之而起的信用制度大大發展起來的那時候起，才開始具有意義。這一點就替農業開闢了走向資本的第二條道路，——利用信用制度的道路。信用一部分是個人的，一部分是物品的或抵押的。這裏使我們注意的只是抵押信用。土地所有者爲了進行必要的改良，購置牲畜、機器、肥料等等必要的花費，不得不出於典質之一途，即是說，把自己的地租抵押出去以獲得金錢。

在資本主義租佃制下資本主義社會收入底三個主要集團是嚴格地劃分開來的。土地所有者及其他生產資料底所有者，即資本家，是兩種不同的人，而被資本家剝削的僱傭勞動者和他們又是對立的。僱傭勞動者得到工資，資本家得到企業利潤，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土地所有者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完全是多餘的；他既沒有商業上的作用，又沒有資本主義企業家所執行的那種組織上的作用。他除了從資本家那裏儘可能榨取更高的租金並且和他的寄生蟲共同吞食這項租金之外，他就無所事事了。

在抵押制之下事情便沒有這樣明顯和簡單，但在根本上仍舊一樣。這裏我們看見土地所有者與企業者分離，的確是隱蔽在特殊的法律形式之下的。在租佃制之下爲土地所有者所據爲已有的地租，在抵押制之下就落到抵押受取人手裏。後者（抵押受取人）就是地租底所有者，因而也就是事實上的土地所有者。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他同時獲得企業利潤及地租，却把這種地租以利息的形式付給抵押受取人。如果他的企業失敗了，如果他無力償付地租，那末他就喪失自己表面上的所有權，就如不能按時交付租金的租佃者失掉他所租的土地一樣；抵押受取人往往以拒絕抵押的辦法甚至有權把一個不合意的經營者從大地產中趕出去，正如土地所有者以拒絕租約底辦法所做的一樣。租佃制與抵押制間的區

別，只是在抵押制下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被稱為資本家，而實際上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則被稱為土地所有者。實際上執行資本主義機能的農業經營者利用這些誤解 qui pro quo，喜歡憤恨“流動資本”對他們的剝削，憤恨抵押受取人，憤恨在租佃制下土地所有者所起的那種作用實際上落到他們的身上。

在所有文明的國家內我們發現抵押債務底迅速增加。普魯士農村土地上負擔的新債務總額超過清償總額。

(單位百萬馬克)	(單位百萬馬克)
在1886——1887年……………133	1891——1892年……………207
1887——1888年…………… 88	1892——1893年……………209
1888——1889年……………121	1893——1894年……………228
1889——1890年……………179	1894——1895年……………258
1890——1891年……………150	

在這不多的幾年當中，借款竟增加了十五億馬克！

借款底這一迅速增長，其意義就是說到處（雖然是在另一形式之下）都完成了英國早已經過了的同一過程——農業經營者脫離土地所有權的過程。但是農業經營者並不因此就成為無產者，正如英國的農戶並不就是無產者一樣。他們像英國的佃農一樣除了土地以外還有一切生產資料（這裏我們只涉及抵押的債務，而不涉及私人的債務）。

同樣，抵押債務底增加，並不一定就表示農村經濟底窮迫狀況。抵押債務可以從這種狀況中發生，因為改良和提高生產的要求並不是抵押債務底唯一原因。我們以後還能認識到別的原因。但是農村經濟底進步及繁榮也可以在抵押債務底增加中表現出來，第一是因為對資本的要求增加，這是為農村經濟底改進所引起的，其次是因為地租底增加，它使農業信用底擴大成為可能。

在奧地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好的統計，抵押債款底增加（加里西亞、布哥維納以及沿海區域不計）情形如下：

（單位古爾特）		（單位雷爾特）	
1871年.....	46,740,617	1881年.....	10,034,671
1872年.....	107,621,663	1882年.....	22,626,080
1873年.....	202,458,692	1883年.....	34,289,210
1874年.....	156,127,016	1884年.....	57,241,240
1875年.....	136,632,565	1885年.....	53,871,264
1876年.....	99,276,440	1886年.....	52,708,237
1877年.....	24,694,812	1887年.....	56,330,623
1878年.....	44,160,203	1888年.....	56,934,250
1879年.....	22,765,037	1889年.....	52,738,749
1880年.....	18,404,585		

正是在農村經濟（以及城市的土地所有制）最興旺的年代，即在七十年代初期，抵押債款增加得最多。

有土地的農業經營者分為土地所有者與企業者，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土地私有制底自然而必然的結果。但是這種分割就使土地私有制底消滅成為可能，即使農業中其餘生產資料消滅的條件尚未具備。在租佃制佔支配的區域內這可以用土地國有制或公有制的方法來完成，而在抵押制佔支配的區域內則可以用抵押的國有化方法來完成。

土地所有權（在租佃制之下）或抵押（在獨立經濟之下）愈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則消滅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亦愈順利。可惜，我們很難用統計來證明許多國家及長時期內這種集中的情形。如果我們有着主要的農業統計，那末抵押方面的統計直到現在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而土地所有權底統計也不能根據它來作出各個時代底比較及研

究各處個別土地所有權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的過程。

在普魯士各省内土地所有權集中底例子，我們在下面說到別的問題時再講。

一般講來，在租佃數量及租地面積增加的地方，土地所有權就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因為只有那些不需要經營自己的土地和擁有多餘的土地的人，才會想到把土地全部或部分租出去。租佃制極發達的國家同時也就是大土地所有制佔優勢的國家。

在德國抵押制比租佃制更為重要。在這裏土地所有制底集中過程，或者更正確些說，地租底集中過程表現得很明顯。我們還看到許多小的農村高利貸者日益被排擠，而讓位於大規模集中的資本主義的機構或壟斷着抵押貸款的合作社。

根據黑希特（F. Hecht）在“德國國營的及省營的農業貸款機關”一書中所載的數字看來，德國農業貸款機關所發行的抵押票據總數，到一八八八年末已超過四十七億五千萬馬克了。其中屬於合作社的有十九億馬克，屬於國營或省營機關的有四億二千萬馬克，屬於抵押的股份銀行的則有二十五億馬克。

固然，股份銀行底抵押信貸主要是盛行於城市中的地產方面。但以後其他大規模的機關：儲蓄銀行、保險公司、各種機關及合作社都促進着抵押信貸底集中化。三十五個德國人壽保險公司把自己百分之八〇的基金投放在抵押中，普魯士的儲蓄銀行投放在抵押中的基金也在百分之五〇以上。在普魯士儲蓄銀行底農村抵押財產在一八九二年估計總數有十億馬克；在普魯士皇族手裏的十七個土地信用合作社在一八八七年發行了十六億五千萬馬克的抵押票據，同時在普魯士有十一個私人的土地信用機關在一八八六年接收了七億三千五百萬馬克的抵押債務。

這些數字就已經指明地租大量的集中在少數中心機構內，而且

這種集中繼續迅速地往前發展。一八七五年時德國的抵押銀行發行了九億馬克的抵押票據，一八八八年發行了二十五億馬克。到一八九二年時集中在三十一個銀行（在一八七五年為二十七個）手裏的這種抵押票據總額竟增至三十四億馬克了。

海爾邁斯（Hermes）在他的“論地方自治會”一文中（見“政治學辭典”續編，第二卷）他列舉了幾個例子，說明普魯士大地主與抵押借款如何迅速地集中在土地信用合作社中。庫爾曼和尼馬爾貴族的信用機關發行了抵押票據（扣去已清償的）其總額為：

	（單位馬克）
1805	11,527,000
1855	38,295,000
1875	82,204,000
1894	180,621,000

一八六九年創立的新勃蘭登堡信用機關發行了抵押票據（扣去已清償的）其總額為：

	（單位馬克）
1870	48,000
1880	3,695,000
1890	74,273,000
1895	101,434,000

這些數字十分明顯地表明“馬克思的教條”對於土地財產所具有的意義並不亞於對於資本所具有的意義。其實在這一方面“馬克思的教條”的意義，是沒有誰爭論的。可是有人說馬克思的教條似乎不適用於農業生產方面。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我們還要詳細地考察這一問題。這裏所講的只是關於土地財產及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採取的那兩種形式。

我們看見，租佃制和抵押制彼此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它們却表現出很大的差別。

最重要的差別就在於租金的漲落是隨着地租的漲落而來的。反之，抵押的利息就不是如此。固然，抵押利息底大小也有變化，雖然比起租金來有更大的困難，但是它的漲落並不依賴於地租底漲落，而是依賴於受完全不同規律支配的資本利息底運動。地租與利息可以同時在直接相反的方向內漲落。資本的利息可以降低，地租反而可以增高。直到最近時期這兩者底經常的變動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古老國家內還是如此。

從這裏得到的利益在租佃制之下是土地所有者所享受。反之，在抵押制之下實際的農業企業家與名義的土地所有者將增加的地租放進自己荷包裏或者用它再去獲得新的抵押資本。

抵押債權人很少享有土地財產中這種利益，正如他們很少享有上述的增加土地財產底市場價值及減低“土地資本”底利息中所得的其他利益一樣。因此抵押債權人最低限度在增高地租時就要求其資本的利息要比“土地資本”所產生的利息更高；這就是說，以利息形式吸取全部地租的抵押資本，其總數要少於擔負債務的土地底市場價值。

我們再用上述的那個能夠提供六、〇〇〇馬克地租的地產的例子來說明。假定平均利息率等於百分之四，那時資本化的地租便等於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可是，我們已經講過，擁有地產就附帶有許多利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地租增高。因此土地所有者就要求其地產的地租多於一五〇、〇〇〇馬克，假定是二〇〇、〇〇〇馬克。這就是說，“土地資本”只提供百分之三的利息。抵押債權人則要求百分之四的平均利息率，可是農業經營者付給他的抵押利息總共只是六、〇〇〇馬克。這樣看來，抵押債款不能超過一五〇、〇〇〇馬克

以上，只能等於土地價值四分之三，但它仍然可以吞取全部地租。

我們現在且假定在地租增高情形之下抵押制對於農業經營者比租佃制更為有利。可是事情有好就有壞，壞的方面在地租低落的時候就會表現出來。

那時租佃者，最低限度是資本主義的租佃者，便把自己的損失轉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固然，土地所有者不是不爭鬥，但在相當時期反抗以後也就不得不同意租金底減低。反之，自己進行經營的土地所有者就必須自己承受因地租降落所受的一切不利的後果：他不能簡單地把這一切不利的後果轉嫁於抵押債權人的身上。

如果在租佃制下地租底低落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後對於土地所有才成爲不幸，那末在抵押制下地租底低落往往引起農業企業家，或者說“農村經濟”底窘迫狀況。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抵押債權人並不受到地租低落的影響。固然，抵押利息率可以隨着地租底低落而同時降低，但這並不依賴於農村經濟受壓迫的狀態，而是依賴於一般資本利息底降低，依賴於使全部借貸資本受損失的現象。這一點我們現在暫且不去說它。抵押利息率是爲資本的一般利息率所決定，任何農村經濟底窘迫都不能強使它降低到一般水準以下。反之，農業經營者愈貧困，則他不得不付出的保險金亦愈大，他不得不適應的利息率（至少在借新債的時候）亦愈高，他拿自己的地產去作抵押，所得的最大款額比起地產底價格亦愈少。

在抵押制下農業適應地租底低落與在租佃制下所完成的不同，即不是用降低利息的辦法，而是使企業家破產及抵押債權人損失資本來完成的；無論如何這種辦法不是全然無痛苦的，也不是很合理的。

除租佃制和抵押制以外，還可能有第三種情形，當土地所有者同時又是資本家的時候，即是說，當他除了土地以外，還有充分的金錢，



拿他自己的金錢來進行完全現代式的農業，於是，除了企業利潤以外，他還將全部地租放進自己的荷包裏。

可是，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合爲一人，這在歷史上是僅有的一種例外；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往前發展，它仍舊是一種例外。要找出這個原因，第一，就在於大生產優於小生產；第二，在於土地私有制。

## 第六章 大生產與小生產

### 一 大經營在技術上的優越性

農村經濟愈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則它愈益發展着大生產與小生產間技術之質的差異。

如果不算農場制及其他類似的生產形式的話，在前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內，此種差異並未明顯地表現出來，關於這種農場制及這一類生產形式，我們在這裏不加以考察。地主靠自己的農奴底勞動、牲畜及工具來耕種自己的土地。地主自己所供給的，是在數量上微不足道，而在質量上也並不優於農民的生產資料。大多數僕役首先是爲滿足地主家庭經濟底最大需要而服務，對於土地底耕種方法不生影響。地主的土地，就其零散性而言和農民的土地沒有什麼區別。地主的許多小塊土地，像農民的土地一樣，散處在農村的田野間，而且同等地受強制輪種制的支配。農民經濟與地主經濟間唯一的差別，像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就在於地主經濟要靠不自由的奴隸勞動者來經營，這些不自由的奴隸勞動者竭力使自己的牲畜和本人不過度勞作。地主經濟的特點就是勞動時間及勞動工具方面異常的浪費。

當封建勞役已被取消，土地所有者成爲自己土地底自由的所有者，他盡可能把自己的土地化成整數，並以私有的生產工具、私有的牲畜、私有的僱傭勞動者，按照自己的計劃去耕種的時候，這一切的

情形也就改變了。那時大生產就採取了與小生產完全不同的形式，小生產現在已經開始不事生產地浪費勞動時間和生產工具了。

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差異首先當然是表現在家內、戶內、家庭經濟內；家庭經濟自從用私有的牲畜、私有的生產工具以及自己僱傭勞動者來生產的時候起，對於大生產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

工業與農業間一個最重要的差異，就是在農村經濟內私有的生產與家庭經濟彼此間總是有緊密的聯系，構成不可分離的整體，而在工業內除了某些殘存的以外，它們彼此是完全不相依賴的。沒有一個農業企業可以沒有和它相聯系的家庭經濟。反過來說，在農村中沒有一個獨立的家庭經濟不是同時從事於農業的。

大的家庭經濟在節省勞動力及物資方面優於小的家庭經濟，這個情況是不需要證明的。拿一個大地產和五十個小農經濟（假定大地產佔有的土地和五十個小農經濟佔有的一樣多）來比較，我們就可看到大地產只消一個廚房和一個竈，小農經濟就要五十個廚房和五十個竈。這裏需要五個女廚子，那裏就需要五十個。這裏在冬季有五間住屋生火取暖，點五盞燈，那裏就須五十間住屋生火取暖，點五十盞燈。這裏煤油、菊苣、人造牛油都可躉買，而在那裏則要零買等等。

如果我們從家內轉到戶外，那末在大經營中我們便看到，一個廄舍可容五〇——一〇〇頭牛，而在小經營內就要五十個廄舍，每個廄舍只容一兩頭牛；在大經營內有一個積穀倉、一眼井，而在小經營內就要五十個積穀倉、五十眼井。其次在大經營內我們還可看到從戶外到田間的道路——田間輕便鐵道一般講來在農民是辦不到的——也相當的短，籬笆和圍牆也少，田界也少。

地塊愈小，則就其地面而言，界綫亦愈長。一塊方形的土地，以一公畝為單位，其界綫底長度在面積大小不同情形之下將如下表：

10公頃	5公頃	1公頃	50公畝	25公畝	10公畝	5公畝	1公畝
1.26公尺	1.79公尺	4公尺	5.66公尺	8公尺	12.43公尺	17.89公尺	40公尺

要用籬笆圍起五十塊地，每塊各為二〇公畝，則所需的材料及勞動比圍一塊一〇公頃的土地要多到七倍。

如果田界底寬度為二〇公分，則一塊方形的土地所浪費的土地，其面積為：

10公頃	5公頃	1公頃	50公畝	25公畝	10公畝	5公畝	1公畝
0.25	0.36	0.80	1.113	1.69	2.53	3.58	8.00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一〇公頃一塊地的田界只耗費二又二分之一公畝，而五十塊地（每塊各為二〇公畝）的田界則浪費一八公畝。

地塊的界綫越長，則在用手播種時，必然地要撒落在田邊的種子損失就越多，耕種土地時勞動底耗費也更多。克雷邁爾在郭爾慈：“農業指導”（Handbuch der Landwirtschaft），第一九八頁中說：“用犁、除草器、耙、鋤、鏟、耨之類耕種土地與用機器播種，就同一的面積而言則地塊愈小，耗費越大。在小塊土地上費用的增加，乃由於在耕種這一類土地時時間上極大的浪費。在田的終端犁頭每次迴轉，在橫耕從地塊的窄的一邊所剩下的寬度不同（要看駕具長短）的邊上的地段，以及在犁所不能達到的終端用手耕作等等條件之下，時間就經常地受到損失。”

何況五十家農戶同樣需要五十把犁，五十個耙，五十輛大車等等，而大經營所需要的在數量上就可以少十分之九。在同一的生產方式之下大經營因此就大大地節省了農具。這種情形同樣為農業機器的統計所證實。有些機器、小生產和大生產差不多一樣備辦得到的就是打穀機。在一八八三年每一、〇〇〇公頃耕地的經營面積計有：

從二——一〇〇公頃需二·八四汽力打穀機、一二·九三別

種打穀機。

一〇〇公頃以上需一·〇八汽力打穀機，一·九三別種打穀機。

自然，誰都不會從這裏做出結論說，在小經營內汽力打穀機比在大經營的更為普遍。

在同一的生產方式之下，雖然農具較為節省，在大生產內農具的耗費可以說不僅是絕對的，而且是相對地高，因為生產方式在大生產內仍舊沒有改變。有許多生產工具，尤其是機器，只能順利地應用於大生產內。農民就不能適當地利用它們。根據克拉佛特關於農業生產的學說，機器的完全利用只有在如下的應用才有可能：

馬犁應用於……………三〇公頃耕地上  
條播機、割草機、打穀機應用於……………七〇公頃耕地上  
汽力打穀機應用於……………二五〇公頃耕地上  
汽犁應用於……………一、〇〇〇公頃耕地上

電力也只有在大經營內才能順利地應用。“此刻還不能認為應用電力是提高一切農業企業，尤其是小企業收益的手段。甚至就在一、〇〇〇莫爾根<sup>①</sup>這樣大的耕地的地產而言，成功（指應用電力而言）還是可疑的。只有在更大的經營內才表現出最有利的條件”（凱特金（Köttgen）：“電氣技術的實質？”〔Ist die Elektrotechnik?〕，載吉勒：“農業年鑑”〔Thiels, Landw.lahrb.〕，第二十六卷，第六七二頁）。如果回憶一下，在德國一八八五年時，五、五五八、三一七農業企業中只有三〇六、八二八個企業在二〇公頃以上，只有二五、〇六一在一〇〇公頃以上，這些數字就得到正確的說明了。絕大多數農業經營小得連馬犁都不能使用，更不用說使用機器了。

---

① 莫爾根（Morgen）是農地的單位，在荷蘭、南非洲及美國之一部有二英畝多；在挪威、丹麥及普魯士則約一英畝三分之二。——譯者

美國政府在一八八四年要求他的領事報告美國農業機器在國外銷售的情況。從小土地所有佔優勢的一切國家收到了一致的意見書，都認為經營太小不能採用機器甚至改良的工具。從威登堡（Württemberg）、黑森（Hessen）、比利時、法國等國家都得到了這樣的報告。吉費爾領事從斯德丁（Stettin）寄來的報告說，用類似印第安人的戰斧的斧頭來砍柴，這在美國人看起來是何等的可笑。謨哲爾領事從約翰涅斯堡（Johannesburg）寄的報告說：“在條靈吉亞地方農業工具完全是原始的。我最近考察了古代的彫刻，它刻畫出十五世紀時這個地方農業生活的情景，而且令人吃驚的是那裏所刻畫的工具和現代的相似到什麼程度。最新式工具差不多只在模範的經營內才可看到。”駐尼亞（Nicea）領事威爾遜關於法國南部也有同樣的報告：“國內羅馬時代的古犁，只能耙土，不能挖溝，它雖不是經常使用的東西，但也是時常使用的。”（“美國駐外領事關於農業機器的報告” [Reports from the consu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agricultural machinery]，第五一〇、五二四、六二一頁）

每百個農業企業——就它們的範圍而言是屬於同一類的——在德國一八九五年時採用機器的情況如下：

企 業	一般的 機 器	汽 車	條播機	刈割機	打 穀 機	
					汽 力 打穀機	其 他 打穀機
二公頃以下	2.03	0.00	0.46	0.1	1.03	0.49
從二至五公頃	13.81	0.00	1.29	0.30	5.20	6.56
從五至二〇公頃	45.80	0.01	4.88	0.68	10.95	31.89
從二〇至一〇〇公頃	78.79	0.10	17.69	6.93	16.60	64.69
一〇〇公頃以上	94.16	5.29	57.82	31.75	61.22	60.53

大生產在應用機器方面到處都前進得很遠。在小生產中機器之

應用，除打穀機外，並不顯著。

首先發生推動與推進作用的人力、獸力和其他力，其情形正如工具、器械、機器一樣。

爲了要獲得一個同一的結果，小經營就必須比大經營更大量地應用這些力；除此以外，他們就不能充分地利用和加強他們的生產能力。在我們所舉的例子內小農的五十把犁和五十輛大車需要五十付駕具、五十個趕牲畜的人，而在大生產內五把犁和五輛大車就只需要五付駕具和五個趕牲畜的人。無疑的，這五十個小農每一把犁要套上一頭牛，而這時在大經營內一把犁可用四匹馬來套，但問題並不因此而起變化。兩個犁頭的犁用一個工作者和三四馬完成這樣多的工作，像兩把簡單的犁每個用兩匹馬所完成的一樣多。三個犁頭的犁用一個工人和四匹馬可以完成這樣多的工作，像三把簡單的犁用兩個工人和六匹馬所完成的一樣多。

照雷林格的話看來（引自羅賽爾：“農業國民經濟”〔Nationalökonomie des Ackerbaus〕，第一六四頁），一八六〇年薩克森王國每一〇〇英畝農民的土地上要用三、三匹馬，而在一、〇〇〇公頃地主土地上只用一、五匹馬。

根據一八八三年的調查在德國一、〇〇〇公頃耕地面積就有：

	馬	牝牛	牝牛
從二至一〇〇公頃的經營內	111	101	451
一〇〇公頃以上的經營內	75	60	137

大家都知道，農民的母牛往往不只用來榨乳和繁殖，而且還把它當作耕牛。在小經營內大多數母牛大半應當歸之於那種情況，即是農民比起大經營來更多從事於牧畜業，而更少從事於農業；反之，在馬匹數量上的差異就不能用這些來說明。

在大不列顛根據一八八〇年的生產統計，以每一千英畝土地爲

單位，各種畝數經營的情況如下：

面 積	1—5 英畝	5—20 英畝	20—50 英畝	50—100 英畝	100—200 英畝
馬 匹	72	58	54	49	43
牛	395	336	284	242	196
面 積	300—500 英畝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馬 匹	37		32		24
存 角 獸	153		113		81

上面所引的例子很明顯地指出，大生產除節省獸力之外還節省人力，且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之下，需要較少的牲畜、較少的工具，採用較多省力的機器，給予宜於耕作的土地以最合理的形式及範圍等等。

但如果各個大經營在同樣的耕種方法之下相對地（就面積的大小而言）需要較少的耕畜和農具以及較少的勞動力，那他們比各個小經營就絕對地常常大量地應用它們。這就是說，他們比小經營更會大規模地利用分工的優點。只有他們單獨有可能性充分推行那種專門化及使工具和器具適合各個機能，這就是現代的經營所以勝過前資本主義經營的地方。對於獸類，情形也是如此。小農將自己的牝牛用來榨乳，耕田及繁殖。關於自然選擇及物種和飼養之適合於特殊的條件是談不到的。同樣小農也很少能夠將自己經營底各種機能分配在各個人之間。但在另一方面，這種情形對於大生產是完全做得到的，並且它還能由此得到各種利益。大生產把工作分成需要特別熟練和特別仔細的工作及分成只需要機械力的工作。它把需要特別熟練和特別精密的工作分配於它的有特殊心得和勤勉的勞動者之間，勞動者的熟練及經驗是由於他們專門從事於某種工作的緣故而增加的。由於分工及大規模生產底結果，每個人都長期地做自己的工作，並不常常改變工作，因此又可減少由於每次轉換工作的種類和位置



而造成的時間及精力的浪費。最後，許多人爲達到某種結果有計劃的通力合作所得的利益，也只有大生產才能得到。

還在一七七三年時，有一個英國的農業經營者就注意到了這種優點。他曾指出，一個農人在三百英畝土地上使用同一數量的工人，像十個農人每人經營三〇英畝土地時所使用的一樣多，這個農夫“在利用僱工的勞力中就會獲得只有實際家才能領會的那種利益。如果一與四之比等於三與十二之比是很明顯的話，那末實際告訴我們的是另一回事：因爲在收割及需要同樣速度的其他工作之下，在同時使用許多人手的條件之下，工作就會完成得更好和更快。例如，在收割的時候，兩個人駕車、兩個人卸貨、兩個人裝貨、兩個人收集穀物以及別的在禾堆旁邊和放置稻草處工作的人，一道工作，他們的成就，要比分散在許多經營內的同一數量的工人多兩倍”（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第三三四頁）。

經營底擴大同樣給專業者以可能很好很迅速的完成各部門工作，這些工作農民自己完成得不好而且很慢，並且爲要完成這些工作他往往在長時期遲延以後在極迫切的情況下才去求援於住得很遠的專業人材；可是大經營就有自己的鐵工場、馬具和馬車工廠來修理和製造簡單的器具、工具及補助工具。

但是，大生產因使用大量的勞動者而獲得的最重要的優點，就是體力和智力的分工。我們已經看見，科學指導對於農村經濟是何等的重要，我們已經看見，只有科學指導才使有計劃的經營成爲可能，在有計劃的經營之下就可免掉各種損失，土地的分割，並得到最良好的效果，只有受過科學教育的農業經營者用合理的、正確的簿記才會常常找出在一定的時機適合於科學與市場之不斷變化需要的播種法、肥料、機器、牲畜的種類、各種飼料。但是在現社會內體力勞動與科學教育彼此嚴格地分開來。只有十分龐大的經營才能利用具有充

分科學修養的農業家來爲他效勞，使他們的勞動力專門從事於對經營的管理和監督。

在一定條件之下地產的大小是老早就知道的。它的變化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在集約經營時，例如，釀酒業，地產可以減到三公頃，而在粗放經營時，例如牧畜業，則可增至五百公頃。在中歐可以求得平均數，即是在最集約的經營之下，爲八〇——一〇〇公頃的地產，而在最粗放的經營之下，一〇〇——一二五公頃的地產才能有專門人材，專做地產的管理工作。

只有從這些範圍着手，一般講來，我們才能有一種經營，在科學基礎上進行和管理。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國五、五五八、三一七農業經營中只有二五、〇六一個農業經營有一〇〇多公頃！農業之合理經營還這樣少見，這是不足奇怪的！郭爾慈說：平均收成“和從劣等土地中（要在最努力耕作的條件之下）所能獲得的且實際獲得的收成比較，並不很大。如果我說，優良的耕作可以使一公頃平均多增四——八公担，我想，我不致遇到有豐富經驗的實際家——農業經營者方面的反對。實際上，據我看來，收成提高底可能性還要更大，但我故意取那種爲任何一個專門家所不能爭辯的數字來講”（“農村工人階級與普魯士國家”〔Die l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第一六五頁）。根據這段話，德國在較好的耕作之下，不消增加耕種的面積，就可生產出比現在多一億公担的穀物。

在初級農業學校內，人們竭力供給較小地產管理者和所有者（他們並不專門從事管理，他們自己也直接參加各種工作）以較高的教育，比國民學校所能做的爲多。我們不像別人一樣偏於爭論這些學校之有用無用；但很顯然的，他們傳授的知識，就其性質而言，與高級學校所授的知識沒有多大不同。據我們看來，農業學校很快地適於以廉價的低級職員供給大經營，這比較供給獨立的（就現代的意義而

言) 農學家確能減少管理上的費用。中等農業學校就不然。有一個專門家抱怨說,在中等農業學校裏面最容易“沾染一種生活習慣,不適合於中等農業經營者,尤其不適合於小農業經營者;參觀這些學校的結果,就是學生後來也感覺自己不適宜於小經營的條件或者不能與小經營相處,於是從學校參觀中得出的結論,就是這些學校對於整個生活無益而有害”(見吉爾赫涅爾在郭爾慈:“農業指導”,第一卷,第四二一頁上說的話)。

在學校內培養學生的習慣和道德,吉爾赫涅爾很擔憂會有這樣的結果,但是領會這些外在的特徵,是由於農業學校所引起的內部變革的結果。較高的教育與滿足,是與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不相容的,許多受教育的人,主要是來自資產階級,他們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要求逐漸增高,而且照環境影響的自然規律而言,也使那些從下層提拔上來的受過教育的階層受到習染。在使農民、手工業者、工業勞動者得到差堪溫飽的生活的收入情形之下,靠知識勞動謀生的人就會在體力上和道德上(而往往是在體力上和道德上)逐漸墮落下去。那些保守黨人的意見不是全無根據的,他們聲言高等教育使農民不適宜於完成他的使命。但若把這種觀點誇大,說我國國民學校所提供的那些片斷的知識與農民的生活不相容,這種誇大,雖不致令人討厭,也是很可笑的。這就是說,一方面,把農民降低到動物的水平綫,另一方面剝奪農民建立自己的稍微合理的經營的最後可能性。

但是十分合理的經營所需要的那種高等教育,實際上,很難和現代農民的生活條件相結合。很顯然地,這不能歸咎於高等教育而應歸咎於農民的生活條件。由此只能說,農民經營能夠對抗大經營,不是靠自己的高度的生產能力,而是由於自己的極低的需要。首先,大經營應當比小經營生產得更多,以便獲得同樣多的收入,因為不僅把供養農村的,而且把供養城市的資產階級的勞動力的費用(貨幣及實

物)都算在他的用費預算內。

中等地產在這方面；情形最壞，在管理上它們的費用相當的高。它們隨着經營的增大而迅速地衰弱。一百公頃的地產需要一個受過教育的管理人，所有者或承租人；四百公頃的地產，除管理人外，還需要一個助手；它的收入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多到四倍，則管理費就多到一倍半。

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大農經營優於小農經營；在一定限度的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內，情形也是如此，關於這一點往後再說。相反，農民生產與大生產的界限，照黑格爾的說法，發生着量變爲質，其結果，在這個界限上，農民的經營即使不是在技術方面，那末也會在經濟方面，稍稍高於農學專家所管理的大經營。用科學方法管理經營就使小地主的地產負擔着超過他的收入以上的費用。管理經營的知識的獲得，不是科學的，而簡單是貴族地主的方式，就會常常遇到這樣的情形。在後一情況內生產效力愈少，奢望愈大。

反之，大農優於小農，大地主的地產優於小地主的地產，這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是不言自明的。

大生產超過小生產除了許多技術上的優點之外，還有一些在大的設備中表現出來的優點，這些優點只有在它們擁有廣大面積的時候才能成功地運用，這就是灌溉和排水設備。灌溉較小的地面往往完全不可能而且也往往沒有多大意義。平常也只有極大的地面才需要排水。據邁岑所說的，普魯士於一八五五年時在一七八、〇一二個最大的地產內都作過排水工作，而在最小的地產內作過排水工作的總共是二〇、八七七個地產。輕便鐵道也只適用於綿延不斷的廣大地面上。

大經營在生產領域內除了這些優點之外，在信用和商業領域內還有許多優點。

大生產之優於小生產，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沒有像在商業方面那麼大。“大數的計算並不比小數的計算多佔時間。買十次東西每次用英幣一百鎊，比買一次東西用英幣一千鎊所需時間多到十倍。同樣一個機能，無論在較小的或較大的範圍內執行，在商業中往往比在工業中更需要勞動時間之同樣的耗費”(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第二七九頁)。

運費，尤其是鐵路運費，對於大批商品，也要少些。誰要躉批購買，他就可以比在零買時得到更價廉物美的商品；誰要躉批出賣，他就可以在同樣有利的或甚至更有利的條件之下廉價出賣，經得起競爭。但是大商人不僅有比小商人(和自己的流通範圍比較而言)更少的用費，而且他能操縱市場，他有極遠大的商業眼光且善於了解市場條件。這種情形首先涉及商人，但同樣也涉及工業企業家和農業經營者，因為他們也是商品的買者和賣者，就不得不執行商人的作用。上述的對市場有很小的支配作用及其很小的意義，對於不能養活一個做生意的人，可是又不得不以商人資格出現的小手工業者就有着比對於小商人更大的意義；但它(即對市場有極小的支配作用及其極小的意義)對於處在農村的孤立狀態中的農民更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在商品市場上一切買者與賣者之間，農民的地位最不利，他的商業知識最貧乏；他比任何人都不能迅速利用有利的條件，或預見及預防不利的情況。而且他的經營比城市手工業者更複雜地包括着很多的生產部門，並因此迫着他去做各種各樣的買賣。鞋匠，除了工具之外，只要買皮、綫、釘子；他要賣的也只是鞋子。農民，除了工具之外，要買牲畜、種子、飼料、人造肥料，而出賣牲畜、麵包、牛乳、牛油、雞蛋之類。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處於這樣的依賴商業仲介人的地位的。

當仲介人同時又是高利貸者的時候，當迫切需要金錢用來繳納賦稅及債務強迫農民照極便宜的價格出賣自己的商品，或者他們在

準備好出賣以前就出賣了自己的商品的時候，這種依慣性是最殘酷而且最致命的。

這裏我們還要提到一點，就在這一點上大經營也是優於小經營的；這就是信貸。

在前一章內我們已經看見新興的農業經營沒有資本就不能進行。我們同樣看見了，在租佃制不佔支配地位的地方，抵押在農業經營者看來是獲得貨幣的主要泉源。除此以外，他還可以利用私人貸款，或者出賣一部分自己的地產，以便獲得貨幣來進行其餘部分的經營。但是後一方法（出賣一部分土地）不是常常辦得到的，而且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因為地產一減少，所有者就要失掉大經營的優點。除此以外他又無法使下剩的那一部分的價格提高（價格的提高是因為地租的增高及利息率的降低）。因此，私人貸款及抵押在他看來仍舊是獲得貨幣的主要泉源。

當問題是涉及固定資本（農業中之改良土壤、建築物——這裏我們不涉及作為抵押債務原因的所有者的更替）底獲得時，人們就採取抵押貸款，當問題是涉及獲得流動資本、肥料、種子、工資等等時，就採取私人貸款。

在從前，窮困是土地所有者負債的原因，但這種負債是不常有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地主和農業經營者都是一個法定的人，這種負債就成為從生產過程本身產生的必然現象。這裏土地所有制底債務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同時成為農業生產底重要因素。

這種情形對於小經營與對於大經營都是一樣。但在利用信用借款的時候，後者（大經營）就有各種不同的優先權。完成二〇〇、〇〇〇馬克的抵押借款並不比完成二、〇〇〇馬克的抵押借款，需要更多的麻煩和費用。付出二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百個地方比付出到一個地方要麻煩到一〇〇倍。

拉發格在其著名的論文“論法國小土地所有制”(“新時代”,第一卷,第三四八頁)內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抵押借款之下借款愈少,用款的時期愈短,則費用亦比較愈多;例如,納稅及通常用費在抵押借款爲三〇〇法郎時,就有如下的情形:

公證稅	五法郎
備置兩份合同的用費	三法郎
登記費	三法郎
印花稅	一法郎九五生丁
每百法郎抽一法郎一〇生丁的稅	三法郎三〇生丁
押款局中登記費	三法郎
最小限度的利息(按5%計)	一五法郎
還清時的用費	一四法郎二五生丁
總計	四八法郎五〇生丁

這樣看來,借款人在抵押借款的時候名義上是得三〇〇法郎,實際上只得二五一法郎五〇生丁。

在德國情形也是如此。在一八九四年普魯士中央土地信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報(公佈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中,我們讀到:“最近幾年來我們特別努力使小的和中等的所有者容易獲得貸款。如果中等所有者此刻還向私人、機關以及儲蓄銀行方面負擔着高利息的抵押,那末其原因是在於土地信用機關,大部分在付出貸款時對於較小的地產不能不加以估價,而借款者方面作爲抵償的估價的費用甚至在少數借款之下都不符合於貸款的數額。爲了取消此種惡習起見,我們在兩年以前就實行了一種特定的估價。按照這種估價,獲得貸款的人,在估價時,並不顧慮實際生產費用的高度,一千借款上付百分之二,可是不能少於三十馬克,也不能多於三百馬克。在借款由一、五〇〇馬克(我們的章程所許可的最少數的貸款)到一五、〇〇〇馬克

時，應繳估價費及手續費為數不過三〇馬克”。此種“社會改革”，就貸款為一、五〇〇馬克時所出的估價費與借款為一五、〇〇〇馬克時一樣計算！少於一、五〇〇馬克的貸款一般都不出貨。抵押貸款對於很小的土地所有者一般講來都是沒有份的。因此，他們是如此幸運，他們得免於債務的拖累！

在普魯士，根據邁岑的研究在一八八四年，大地產受抵押借款的拖累多於小地產。對擁有應稅純收入之地產，債務與地產價值之百分比如下：

五〇〇及五〇〇塔勒(德銀幣)以上為……………百分之五三·八  
一〇〇——五〇〇塔勒 以上 為……………百分之二七·九  
三〇——一〇〇塔勒 以上 為……………百分之二四·一

這證明完全不是什麼大的地產有很大的需要，而是證明抵押貸款對於農民有很大的困難。因而農民更加需要私人貸款。

私人貸款，情形比抵押貸款還壞。大的農業經營者直接在廣大市場上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他和市場有經常的聯系，因此他在經濟中心(在這經濟中心存放着找尋投資地的大量借貸資本)像商人或工業家一樣容易找到貸款，只要他是一個正直的經營者。

大市場對於處在孤立地位只有少數生產品出賣的農民並不接近。農民只有和住在城市附近或來尋訪他的仲介人成交他的買賣。農民在城市中沒有銀行家(他可以把自己的存款存放給銀行家而銀行家也能貸款給他)，農民的交易契約，完全不為城市的大的借貸資本所明瞭。農民需要的是錢，——他不得不求助於附近的農業資本家，而且在這裏農民沒有多的選擇，因為在農村中這類資本家為數不多。這些資本家本身往往就是仲介人，農業經營者或農村的富農，——他們很熟悉農民的情形而且不厭棄用小數目的借款，竭力吸取較多的利益，因為對資本的需要遠勝於供給，農民的需要往往很迫切，以及



資本家在經濟上佔很大的優勢。當大地主(最低限度,他如果是聰明而有才幹的農業經營者)看來,高利貸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採取着現代生產貸款的形態,在此種貸款形態之下,利息適合於現存的標準時,農民則聽任於中世紀掠奪式的高利貸形式,這種高利貸儘量榨取、收取利息,完全不顧及利息率,並且它不是鼓勵生產而是完全危害債務者的生存。資本主義的發展既驅使農民又驅使大地主到負債的境地,但由於小的經營,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把前者(農民)像後者(大地主)一樣,從和大生產的需要不相容的中世紀的高利貸形式中拯救出來。

如果衡量一下農業中大生產底這些優點:在耕種面積上較少的損失,耕畜和農具的節省,更充分地利用這些農具,能夠採用小經營所辦不到的機器,分工,科學的指導經營,商業上的優越,獲得貨幣的簡便方法,——那末,就很難理解柴林格教授底下述確定的論斷:“用不着有絲毫的懷疑,農業的每一部門在中小生產內就如在大生產內一定可以同樣合理地經營,而且甚至和工業的發展相反,農業中集約耕作就使小經營較大經營有極大優越性。”(見“論東德土地的墾殖”[Die innere Kolonisation in Östlichen Deutschland],第九一頁)

由於這種“極大優越性”也許可以期待,柴林格教授要求把大地產加以分割。可是他離這個思想太遠。他緊接着上面所引的論斷說:“從大地主是經濟進步的領導者這一事實出發,我們應當說,如果大生產在東部完全絕跡,那我國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失。絕對的平均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得到益處,差別才是一切發展的前提;我國東部土地貴族底不僅政治的而且經濟的功績,在使差別底保全成爲國家的必需。”

因此在合理進行經營這一問題上,小經營在一切領域內對大經營有很大的優越性,甚至經營愈集約化,則此種優越性亦愈大;可是

雖然如此，而東厄爾巴大地產經濟的功績，却使大地產的保全成爲國家的必需。

我們往後便可看到，應當怎樣去了解這樣同時對大小經營的熱愛，這裏只斷定，甚至小經營底熱烈擁護者，像柴林格這樣的人，也並不決定繼續發展自己的觀點和要求廢除大生產，因爲他怕這將破壞農村經濟底發展。

可是，公正的裁判者，對於小經營，就很少有這樣熱情的崇拜。克雷邁爾，絕不是農民底反對者，他正確地理解（見郭爾慈：“農業指導”，第一卷，第一九六頁）大生產底優點：“很明顯地，小生產對建築物、耕畜、農具負擔不相稱的較高費用；有些日常的需要，如暖氣設備和燈火所費的，都比大經營內貴得多。有些經濟工作底性質，是這些工作只有在廣大地面上才能順利地大規模地完成。這裏所指的，就是牲畜底繁殖，技術生產，機器底採用，改良土壤等等。在這樣的領域內大生產總是佔便宜。在銷售生產品及利用貸款的時候，大生產也得到同樣的利益。但是大生產最重要的優越性，是在於根據它的情況和任務，一定的計劃可以作爲企業的基礎，這種計劃便於監督經營並有計劃的指導經營；應用重要的和合目的的集中及分工原則，用各方面管理的方法，就可以使經濟力發展到具有高度的生產效能。無疑的，現代農村經濟發展正是提供大生產以最豐富的科學和技術手段，這些手段使大生產有可能在受過專門教育的經濟工作者幫助之下保證自己在各方面的優越。”

此種說法比起柴林格教授先生的論斷，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 二 小經營的過度勞動與消費不足

小經營拿什麼來對抗大經營的優越性呢？那就是勞動者最大的

勤勞和努力(他和僱農不同，他是爲自己而勞作)以及小農業經營者之極低的需要(比僱農的需要還更低)。

穆勒是一個小耕作之熱烈的擁護者，他指出小耕作勞動者不倦的勤勞是小耕作最重要的特點。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他引用一個英國作者關於普法爾次 Pfalz 農民所說的話：“他們從很早到深夜極熱心地勞作，因爲他們知道，他們是爲自己而勞作。他們一天復一天，一年復一年受盡折磨，他們比馱重的動物更能忍耐，更勤勞不倦，更堅忍。英國的平民如果能看見德國人以何等的勞動去得到燒柴，那他一定會驚愕不置。”他又說到小農底“超人的勤勞”，這種勤勞使所有的考察者產生強烈的印象。從對“一切馱重動物中最忍耐和勤勞不倦的人”的觀察中所得的印象是不是高尙的，這一點是很可懷疑的。

但是小農不僅催促自己去工作，而且也催促自己的家庭去工作。在農業生產中家庭經濟和生產是緊相聯系的，而一切勞動者中最無保障的兒童也得經常供人驅使！正如在家庭工業內那樣，在小農經濟內，兒童在家內勞作比替外人作僱傭勞動還要有害些。有一個記者從威斯特發里尼寄來的通訊說：“婦女和兒童的僱傭勞動是很少見的，而且也不會引起什麼害處，甚至還會有良好的影響。”有時父母使自己的兒童疲憊到這樣程度，即記者指出在招募新兵時所表現出來的那些有害的結果。別一個記者則鎮靜地寫道：“在令人擔憂的限度以內，應用兒童勞動，這從父母方面和只出衣食代價而僱用兒童的那些人方面是最常見的。”（“德國西北部農業工人狀況”〔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 in Nordwestdeutschland〕，政治學會集刊，第一卷，第八三、一三二頁）

真是，太鎮靜了！

一定是小農經濟底最熱烈的崇拜者才會在此種強制勞動中看出

優點來，小土地所有制把這種強制勞動加在自己的勞動者身上，使他們變為沉重的牲畜，它的全部生活，除睡覺吃飯的時間以外，都在勞動。

工作底熱狂本來就不是自古以來農民底天性所固有的性質。在某些天主教國家內一直保存到現在的中世紀底許多節日就已經否定了這種說法(即工作底熱狂是農民的天性)。羅賽爾引下巴伐利亞一個地方為例，在那裏每年共有二百零四個節日(其中四十天是聖餐節及聖餐節後的日子，十二天是習射日)，並且那裏的工作在節期前一天的午後四時就停止了！一年三百個勞動日一日八小時勞動的要求和這些比較起來那是何等的謙遜呵！

只有在為市場而勞動代替了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勞動的那個限度以內，勞動力之過度緊張才會發展起來。競爭底影響也造成勞動力底過度緊張。但是以增加勞動時間為手段的競爭，往往和生產技術落後性攜手並進，後者使前者失敗，反之亦然。生產要是不能拿技術的改良來對抗競爭，就不得不以勞動力之極度緊張為手段來鬥爭。另一方面，勞動力的緊張可以達到極度的那種生產，比起勞動者在其中對自己的疲勞加以限制的那種生產就更少需要進行技術的改良。

延長勞動時間的可能性，是技術進步的主要障礙。

兒童勞動之更充分的利用，也能阻礙技術的進步。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農村經濟之合理的經營若無相當的科學準備是不可能的。中等農業學校及農業補習學校，當然不能代替自然科學及經濟科學方面較高的基本教育，但它們總還能給在它們裏面學習過的農民以指導經營的可能，即使不是無可非難的，那也比無知無識的農民要合理得多。但在經營上需要盡可能更早和更充分剝削家庭成員，這必然與需要更多知識相衝突。在巴伐利亞及奧地利有些區域，農民覺

得義務學校教育到十四歲似乎太長，他們堅持義務教育底年齡到十二歲或至多到十三歲，並且他們極力這樣主張。

隨着農村經濟成爲一門科學以及在合理的農業與舊式的農業之間競爭的加強，於是就增加從者(舊式的農業)在強度剝削兒童勞動及限制兒童教育方面的需要。

這樣看來，不僅從倫理的觀點說，就是從純粹經濟觀點說，我們都不能把獨立的小農業經營者及其家庭勞動之過度緊張當作是小生產底優點。

小農需要的水平較低這種情形，並不比他們很喜歡勞動好些。

我們已經看見，大生產比小生產處於不利的地位，是在於大生產除支付體力勞動力的報酬之外，還要支付智力勞動的報酬，此種智力勞動提出比前者更高的要求。但是對於體力勞動，大生產也得供給比小農較好的生活條件。使農民比一無所有的僱農更加疲困的財產，同樣迫使農民把自己的生活要求降低到僱農底要求水平以下，把生活要求減少到最低限度。

但是這一現象同前一現象一樣不能說在一切條件之下都是農民經濟底結果。中世紀時期，知道有這麼多的節日，看見過農民的豐富而愉快的生活，他們像在現時一樣並不放棄自己的吃喝。在中世紀的條件或最低限度，中世紀的傳統還被保存到現在的地方，那裏的農民在現在還不是一個吝嗇的人。

但在農民的經濟受競爭的壓迫而衰落下去的地方，他就會變成這樣吝嗇的人。

法國的農民(他是自由的私有者，他比別國的農民更長期地遭受了自由競爭的影響)可以作爲這種情形底例證。

有一個英國的研究者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說，我們很難想像有比法國農民的生活更可憐的。他們的住宅就像豬圈一樣。他描寫法國

的一間小農舍：“窩子完全沒有，只有兩個通氣口，打開通氣口，就擋住了門，門關起來的時候既沒有光，又沒有空氣。長椅、桌子、櫥櫃全都看不見；地板上放着蔥、襪衣服、麵包、麻袋以及難以想像的一大堆垃圾……

婦女、男子、小孩和牲畜差不多都是睡在一起。設備底缺乏並不常常是貧窮底結果。這些人大都沒有什麼禮節的觀念，他們除了想到節省燃料之外，什麼都想不到。”

作者在別處又說：“他們的吝嗇變為庸俗，他們好像無力享樂，他們只要能夠節省一文錢，他們就放棄自己的滿足而愉快的生活。書籍或報紙、牆上掛的畫片或雕刻、一片磁器、一點裝飾、一些好的傢具、掛鐘，英國農民引以為驕傲的，在他們那裏全都看不到。我們真不能想像出這樣喪失了一切前途沒有一點快樂的生活。在最必需的用品上每次花費一文錢，總要叫罵一頓。結果這種慳吝的、可憐的、令人厭惡的生活，除了努力把一些小錢藏在舊襪統裏以外，就沒有別的念頭。”

在英國小農經營內情形也不見得好。小農經營的所有者及租佃者怎樣勞作和生活，最近英國國會農業委員會（一八九七年）的報告已告訴了我們。這個報告說：“在整個區域內（昆布蘭〔Cumberland〕）農民的子女都無代價地勞作。我知道沒有一個地方父親會給他的兒女報酬。他們只給兒子一兩先令買煙。”有一個林肯縣（Lincoln）的小農說：“我養活了家屬，但後來却失掉了家屬。我的兒女說：‘父親，我們不願在此停留以至疲累到死，’於是他們就到工廠去了，剩下我和妻子聽憑命運的擺布。”另一個小農說：“我們和兒女有時一天工作十八小時，平均總在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我住在這裏有二十年。我們只靠勞動過活。去年我們丟了錢。我們吃很少一點鮮肉。”第三個說：“我們比僱農做得多，簡直像奴隸一樣。唯一的優點，就在於我們

是自由的。我們很枯燥地生活着”等等。

李德向委員會陳述農業區域內小農的狀況說：“維持自己唯一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就是做兩個人所做的工作而耗費不及一個人所耗費的多。他們的兒女比僱農的兒女更加疲弱，營養更惡”（“皇家農業委員會最後報告”〔Roy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final report〕，第三四、三五七頁）。

只有在果樹業、園藝業佔優勢的地方或者有可能獲得副業的那些地方，報告就說得不那麼樣悽慘。

在德國許多地方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一個研究者從黑森寄來的信（見“新時代”，第十三卷，第一期，第四七一頁）說：“小農過着牛馬生活。農村僱農的狀況要好得多，因為他們靠主人的麵包生活。他們的收入已經不怎樣依靠天氣的變化了，如果把荒年時營養的惡化不算的話。”“爲要獲得優良的勞動者，唯一的誘惑，就是良好的營養”，這個條件就是日工有較好營養的原因。主要的營養資料就是馬鈴薯。“小農的住宅非常骯髒，房屋通常是用木或黏土，毫無體裁的建築術建築的，並且在近來建造得更加馬乎。在這種情形之下住宅的佈置極其簡陋，——桌子、長凳、幾把小椅子、有帳子的睡床、櫥櫃——這大半就是全部財富”。

布亨貝爾格告訴我們巴登(Baden)大公國農民吃不飽可以導致小農在經濟上佔優勢的例子。他拿比梭芬金公社內較大的農田地產——一公頃和五·五公頃的地產作比較。前者因爲特殊的情況，不得不單單使用僱傭勞動者，情形是很不利的，因爲要使大經營底利益能夠補償從僱傭勞動中產生的不利，這個地產就太小了。較小的地產完全由所有者及其家庭（妻子及六個成年的孩子）來耕作。在較大的經營內要虧空九百三十三馬克，在次大的經營內，則盈餘一百九十一馬克。此種差異底主要原因應當在那裏去找，即在使用僱傭勞動者

的經營內有了較好的營養——一天一個人大約要一馬克的價值，而在有家庭成員勞作的經營內，食物每人一天只費四十八蒲非林，即是說，比僱傭勞動者花費少二分之一（“德國農民狀況”，社會政治學會發表的報告，〔Bäuerliche Zustände in Deutschland〕 Berichte, veröffentlicht vom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第三卷，第二七六頁）。

如果小經營底農民家庭像較大經營底僱農一樣營養很好，那時他就不是有一百九十一馬克的盈餘，而是有一千二百五十馬克的虧空！他不是從充實的倉庫而是從空虛的肚皮取得他的盈餘！

這幅圖畫又為威馬爾(Weimar)區的報告所補充。這個報告說：“我們暫且不提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如果拍賣不常發生，那末這只是因為我國小農業經營者為着自己的獨立不得不忍受料想不到的損失。有整個的階級，他們的鮮肉（僱農在地產內所得的鮮肉一星期至少有兩次），只有在盛大的節日才擺在桌上，至於新鮮牛油則是最可口的美味了。當這些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於小經營方面，而還要去作日工，他們只要和全部力量供諸私有經營而過着枯燥無味的生活一比較，就覺得不壞”（同書，第九二頁）。這裏又明顯地看出，大經營底僱傭的勞動者生活狀況，比獨立的小私有者好得多。

最後，還可以指出一些情況，這些情況是我們在古柏特·阿烏哈金“論農村經濟中的大生產與小生產”（吉勒：“農業年鑑”，一八九六年）一文中看到的，阿烏哈金拿兩個經營作比較，一個為四·六公頃，另一個為二六·五公頃，這種比較是按照它們的收入而不是按照投到它們裏面的勞動力底生產效能。他替較小的經營計算出大的收益。

但是這是怎樣得到的呢？小經營有兒童幫助，大經營要僱用兒童就得花錢。“小農底兒童剛一長成，就得到他們的實際幫助。兒童底幫助，往往是在他們會跑的時候即已開始”。



在上面所研究的情況內，小農強迫自己兒童從七歲起就去勞作。兒童上學一年要花四馬克的學費。大農把子女送進學校。他的十四歲的兒子在中學讀書，一年要花七百馬克，比小農全家所花的還多。小經營是怎樣的優越呵！

在小經營內，除了最年輕的以外，老年人也有很大的幫助。“我常常看見在經營內有七十歲以上的勞動者，他們還能夠代替完全的勞動力，並且是在較高限度內幫助了經營的成功”。自然，年富力強的人更能勞動。“僱農，尤其在大經營內，對於自己的工作，總想：趕快休息吧！小農，最低限度，在收割時期，總想：讓日子多延長兩點鐘吧！……如果一定的時間對於許多應做的工作特別有利，那末在小經營內就會很早起身並且不間斷地和緊張地勞作，來利用這個有利的時間，而在這時，大經營的勞動者則不願比平常更長時間勞作和更早起身。

但是此種過度的操勞總有相當的結果。農民以最可憐的生活為滿足。阿烏哈金很驚訝地向我們敘述德赤克涅爾區中的一個農民：“他住在一間九公尺長，七·五公尺寬的小土窰內。當中一道門，直通住屋。這間住屋同時又作寢室，丈夫、妻子和四個孩子都睡在它裏面。從這裏開一道門進小廚房內，廚房和用人的住屋隔開，這個用人是經營中唯一的外人。最後一間住屋是屋子裏最好的一間。因為用人有權利希望有一間像他在別處可以得到的住屋。房屋的建築費為八百六十馬克。這個數額只用以支付木匠，製傢具的木工及鍋竈匠；所有其餘的部分都由家屬和親戚來建造。娶來妻子有十七年，這樣長時間總共穿過一雙鞋子，夏天和冬天她都是赤着腳走路或者拖一雙木拖鞋。她替自己和自己的丈夫紡織。馬鈴薯、牛奶、很少的青魚就是他們的食品。只有在每禮拜日，主人才用煙斗抽煙。這些人並不意識到他們過着非常簡單（好簡單呵！——著者）的生活，他們生活下去

而且並不抱怨自己的境況。在自己十分簡單的生活方式下這些人差不多每年都從自己的經營中獲得些須的盈餘。當我問他們的經營值多少錢時，他們就回答我，他們同意至少以八千馬克將他們的經營出賣。”

這是何等得意揚揚的讚美小經營的勝利（小經營只是由於在最簡單的條件之下生活，即是說，在最骯髒和最卑賤的需要之下生活才能生產出剩餘來），僱傭勞動者覺得自己在農村中也是一個人而不是馱重的牲畜，他比小農有更高的需要，他是最高文化的代表者。於是打倒僱傭勞動者，即是說，打倒大生產，無限優越的小生產萬歲！

從我們的觀點說來，小農底非人的營養，正如他的超人的勤勞一樣，並不能證明小經營的優越。無寧說兩者證明小經營的落後性，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障礙。正因為它們，小土地私有制才成爲創造“在社會以外的”野蠻階級的手段，“原始社會形式的粗野在社會內就與文明國家的一切苦痛和貧乏相融合”（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篇，第三四七頁，德文版。參照“法蘭西階級鬥爭”〔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第五〇、五一頁）。保守的政治家用盡一切方法保存這個野蠻狀態，當作資本主義文化底最後支柱，這自然是很明顯的。

農民的努力奮發情況是比他們的勤勞和低度的需要好些。努力奮發在農業生產中一般講來比在工業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無疑的，爲自己而勞作的人比僱傭勞動者容易具有這種特徵。即使不就一切大經營而言，就是單就資本主義的經營而言，努力奮發確是小經營的優點。但是我們不必要過分重視這一點。小生產反對大生產的另外一些鬥爭工具，——過度勞動，營養不足以及愚昧都可使他的熱忱減低。勞動者工作愈多，營養愈壞以及對自己的教育所耗的金錢及時間愈少則他的熱忱亦愈小。當他沒有多餘時間來照顧牲畜和收拾厩

舍，當他不能不像自己一樣使他的耕畜（他常常以乳牛來代替耕畜）疲勞，而且一樣很壞地飼養耕畜的時候，那末最大的熱忱能夠給他些什麼呢。

關於邁爾慈格地方（屬特里爾區〔Trier〕管轄）的小農，沙爾布爾格農業學校校長巴爾台斯（Bartels）說：“這些小私有者差不多專吃馬鈴薯及裸麥麵包；肉和脂肪的消費為數很小。可以大胆地斷定，他們的營養是不足的，意志力因之特別受到損害。後輩人變得很愚鈍，他們漠不關心，無力正確認識他們自己事業的原因和結果”（“農民的狀況”〔Bäuerliche Zustände〕，第一卷，第二一二頁）。

在小經營一點也不能養活它的所有者的地方，在所有者爲了要生存，不得不求助於副業的地方，小經營的生存就極可憐了。例如霍亨蓋姆的教授海慈（A. Heisz）關於司徒嘉德（Stuttgart）斯瓦比亞區（Swabia）、貝布里金（Beblingen）及海雷堡等處的小農寫道：“造成大產業中較高收成的就是深耕，細心照料田地，增高土地生產物的質量，更好的營養及好好的照料家畜，——所有這些只是很慢很困難地爲農民所接受，因爲農民就沒有這樣勇氣，也沒有那麼多金錢。同樣，在別處早已採用的許多機器，農民差不多就不大知道……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是在近代的條件內有其深厚的根源的。我們最低限度是可以把真實的勤勞與堅忍精神中被非難的許多缺點，不歸咎於民族的本性而歸咎於小土地所有制。我們承認，完全不同的職業之結合是會把事情弄糟的。如果小商人和小行商對緊張的農業勞動喪失好感與能力，那末農民大部分是不好的手工業者，正如手工業者是不好的農民一樣”（“農民的狀況”，第三卷，第二二七頁）。

下述的數字就指出，此種情形對於德國的農村經濟究有何種意義。

根據一八九五年的戶口調查，五〇二、〇〇〇個（即是百分之二

○) 獨立的農業經營者都有副業，七一七、〇〇〇個經營屬於農業經營者，七九一、〇〇〇個屬於工業僱傭勞動者，七〇四、〇〇〇個屬於獨立的工業者，絕大部分屬於手工業者。

五、六〇〇、〇〇〇個農業經營者中只有二百萬，即是說，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獨立農業經營者沒有副業；三、二三六、〇〇〇個農業經營底所有者(其經營所佔面積不到二公頃)中沒有副業的獨立農業經營者只有四一七、〇〇〇個，即佔百分之十三，而一四七、〇〇〇個小經營屬於有副業的獨立農業經營者，六九〇、〇〇〇個屬於農業勞動者，七四三、〇〇〇個屬於工業勞動者，五三四、〇〇〇個屬於手工業者。

這樣看來，可憐的小經營為數是很大的。

如果大多數小農業經營所處的地位，決不適於發揮特殊的勤勉精神，那末，在另一方面，大經營倒能夠從僱傭勞動者得到熱心的勞動。工資優厚，營養充足，待遇很好就已經有很大的意義。“營養不足、報酬很低的勞動者會以自然的或故意的疏忽，使經營受到比節省工資更大的損失，而那些給工人以充足工資的經營，經驗告訴我們，反能使收入增多”(吉爾赫涅爾在郭爾慈：“農業指導”，第一卷，第四三五頁上說)。營養好、報酬高而且又有知識的勞動者是合理的大經營底必要條件。無疑的，此種先決條件在現時大部分都還不存在，若要期待大經營者的“開明專制”來改善勞動者的狀況那是很愚蠢的；正如在工業中一樣，在農業中，此種先決條件應由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強迫企業家接受，或直接或間接經過政府的干涉。工人運動的任務是以農村無產階級的道德和物質的提高及和農村野蠻鬥爭來創造合理的農村經濟之重要的先決條件，並消滅小經營底最後一個支柱。

但是除了優厚的工資以外，大生產還有別的手段從勞動者得到更勤勉的勞動。例如，丘寧(Тюнен)舉分紅制度為例，因為這種制

度，地產底全體經常的勞動者都分得了某種最小限度的紅利。但是爲得到勞動者底更大熱心和誠實，分工制到處普遍實行了。有大量勞動者工作的大經營，像上面已經指出的，就有可能替自己選擇特別熟練的、誠實的、有知識的勞動者，擔當以質量爲主的工作，選擇粗工或細工、監工等。

最後，應當指出，正是在最重要的農村經濟部門內，首先在農業內，機器不僅比用簡單工具工作的手工業者做得快，而且做得好；也只有機器才能得出這樣的結果。這些結果是手工業者即使有極大的熱心也不能得到的。我們已經看見，機器耕種、播種、刈割（除軟攤的穀物以外）、打穀、簸穀、分類，比農民用簡單工具或器具好得多。不管柴林格教授怎樣說，我們還不曾遇見一位專門家，他會堅持那種意見，認爲小經營在農業中能夠像大經營一樣合理地經營。但是有些專門家認爲在最簡單的生產部門內小經營還是能夠經得起競爭的。

克雷邁爾教授說，某一類經營寧可要大生產，別一類經營則寧可要小生產。小生產在問題涉及“需要個別勞動者特別注意複雜而有價值的耕作的地方”……就有它的地位。“正是在這些目的內就發生最適當的時機來合目的的利用空間時間，而同樣應用企業者家庭中最弱的力量（小孩吧?!——著者）及廉價的完成小經營中的工作，園藝、葡萄種植及某些工藝植物種植底成功，更其證明了這一點”（郭爾慈：“農業指導”，第一卷，第一九七頁）。

一八八九年德國種植工藝植物的面積爲一六一、四〇八公頃，種植葡萄的面積爲一二〇、九三五公頃；反之，種植飼料及青草的面積爲八、五三三、七九〇公頃，種植穀物的面積爲一三、八九八、〇五八公頃，種植馬鈴薯的面積約三百萬公頃。以上數字證明，這些在目前就農業及牧畜業比較起來對小經營還是有利的幾種作物有什麼意義。

但是，在園藝及釀酒業內就有順利進行的大經營。

不過用來種植許多工藝植物的面積是減少了。種植煙草的面積在一八八一年為二七、二四八公頃，在一八九三年就減到一五、一九八公頃。從那時候起，種植煙草的面積又稍稍增加了（一八九六年為二二、〇七六公頃），但比起它在一八八一年的範圍還是相差很遠。亞麻及苧麻的種植也減少了。種植亞麻及苧麻的面積，在一八七八年為一五五、一〇〇公頃，一八八三年為一二三、六〇〇公頃，一八九三年則為六八、九〇〇公頃。

種植蛇麻的情形稍微好些，它的種植面積從四〇、八〇〇公頃增至四五、四〇〇公頃，但後來又減到四二、一〇〇公頃（一八九三年）。

寧可種植工藝植物，這對於農民，有時是迫不得已的。德里爾博士寫道：“說到捷克，大家都知道，在蛇麻種植的區域內，農民差不多專門從事蛇麻的種植，他們的整個命運就繫於這一種植物。但這簡直就是一種賭博，因為蛇麻價格極其漲落不定。在捷克只要蛇麻有一兩次收成不好，整個農村就陷於貧困的境地”（“論東德土地問題”〔Die Agrarfrage in Oesterreich〕，第二四頁）。

根據克拉佛特的“生產論”（第八二頁），蛇麻價格的漲落竟達百分之一、〇〇〇以上。

如果一般地講到農村經濟，那末無須特別注意小生產在其中超過大生產的那幾種作物，因此可以大胆地說，大經營必然高於小經營。

“實際家”也承認這一事實。他們往往以為與其管理同一價值的小而不負債的地產，勿寧管理大而負債的地產。抵押債務大部分是發生於“實際家”所偏愛的大生產。

誰要想花費五〇、〇〇〇馬克購置地產，那他寧可以五〇、〇〇〇馬克的抵押，去購買價值一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地產，而不願以五

〇、〇〇〇馬克的現金去購買價值五〇、〇〇〇馬克的地產。但是實際家所承認大生產底優越還表現於另一方面：表現於他們所創立的合作社內。合作社生產就是大生產。

### 三 合作社

我們不想否定合作社的意義。問題只在於，在大生產優於小生產的一切領域內，合作社大經營底優點，農民是否能夠得到？這種優點是怎樣普及的？

首先我們要注意，農業合作社的活動直到現在差不多只限於借貸及貿易方面。個別合作社底工業企業，如牛乳場、製糖工廠之類，我們在此且不去說它。關於它們對小經營的意義，我們將在下面考察農業的工業時再說。這裏所說的農村經濟是就這個字的本意而言。這裏只能指土壤改良的合作社，它是對生產有直接關係的一種組合。所有其他的農業合作社，像上面所說的，主要是以借貸及仲介的貿易為目的。

但是在這些領域內合作社不僅給小經營帶來利益，而且也給大經營帶來利益。

對於合作社組織有利的條件無論什麼地方，都不像在農民當中發展得那麼微弱，因為生活和勞動條件使農民孤立，限制着他的眼界，剝奪他對於合作社管理所必需的閒暇時間。更壞的是在警察制的國家內官僚政治的監護和壓迫統治幾世紀以來完全戕害了合作社民主組織的習慣。政治的壓迫和愚昧無知同是對農民幸福惡意的鞭策。在家長制的傳統還未被動搖，而且“王位和祭壇”的基石還屹立不動的地方，要喚起農民去組織合作社就更加困難。

設立合作社的條件，在大土地所有者方面，更其便利，大土地所

有者爲數很少，而且他們有充分的閒暇時間，有廣泛的聯系、有私人的或僱員的商業經驗。

所以，我們看見，在這裏，正如在農村經濟領域內一切其他進步現象之下一樣，大經營總是居先。合作社對於農民是必要的，但在大多數場合內不是當作一種手段，把許多小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勞作以對抗大地主的經營，而是爲了不讓大生產完全享有合作社的一切優點，也替自己攫取一部分。

在抵押貸款範圍內，大經營第一個因運用合作社而取得了許多利益。普魯士的地方自治會在十八世紀就已經有了。起初這只是各省貴族地產爲得到抵押貸款的一些強制性的合作社。本世紀（十九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它們一個跟一個開始也爲非貴族的地產服務。但是像那些爲了利益而貸款的抵押機關一樣，它們絕不願和較小的地產來往，以免很多麻煩和費用。

對於負擔土地稅的純收入少於一定數額（在薩克森省、什列斯威·好斯敦、威斯特發里尼、勃蘭登堡等地，爲一百五十馬克，在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爲二百四十馬克），或它們的估價低於某一數額（在坡茲南爲六、〇〇〇馬克）的地產，就不予貸款。

這裏，根據合作社原則建立的組織，是給予最大地產以許多利益的一種手段，這些利益是小地產所得不到的。

黑希特在其論“德國國家及各省土地信用機關”一書（我們在上面已引用過）的緒論中說：“除極少的例外，可以說，在合作社原則上建立的土地信用組織，主要是給大地產帶來利益。”

信用合作社，對於小農主要是有私人貸款的意義。信用合作社可以由有現代資本主義條件的城市巨額貨幣資本方面獲得貸款，此種貸款，是個別農民得不到的。如果個別農民的借款太小，要使大資本有利可圖，那末整個合作社底借款就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放款



給它所完全不知道的農民對於城市銀行是一件很冒險的事，那末合作社社員的連環担保就會使此種危險減到最小限度。這樣看來，由於信用合作社，農民就有可能以相當的利息而獲得貨幣，這些利息，只要他不破產，他有了貸款的幫助來改善他的經營，就可支付。無疑的，信用合作社對於農民有很大的意義，當作經濟進步的一種手段，誠然，此種進步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像人們所想像的），而是走向資本主義，但它們確是表現出很大的經濟價值。

顯而易見的，——只有在它們被培植和欣欣向榮的地方才是如此。可是這種情形並不常常這樣發生。它們的創立和管理對於普通農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就有問題發生，在廣大農民羣衆中，對經驗沒有付過很高代價，這些合作社的推廣是否可能？哪一種組織最適合於農村經濟的特性，一直到現在還在進行熱烈的爭論，這一派的擁護者往往非難他們的反對者，說他們對農村經濟不能提供什麼。

雷費岑地方的一些錢莊是在僧侶的保護之下成立的，在蘇爾慈·戴里其地方的錢莊內，手工業者佔優勢。但是組織最完善的貸款儲蓄銀行也只能對一部分農民有利。並不是每一個農業經營者在他需要款項的時候都能得到貸款。要使合作社不受很大的損失，就得要謹慎將事。那些沒有支付能力，而又最感需要的農民，像從前一樣，就落到農村高利貸者的魔掌裏。可是信用合作社（關於農業的工業合作社這裏不去講它）對於農民就有極大的重要性。而且這一類合作社正迅速地增長着。根據柴林格所說（見“論合作社及普魯士中央合作社的發展”，普魯士農業經濟學院討論集1897年），德國於一八七一年時共計有一〇〇個農業放款銀行，一八九一年有二、一三四個，一八九六年有六、三九一個。在普魯士，根據中央銀行的統計受它支配的，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一日，共計約有五、〇〇〇個合作儲蓄銀行，一八九七年十月三十日已經有七、六三六個合作儲蓄銀行。其

中自然也有著名的“信用合作社”(Pumpgenossenschaften)。大地主不需要這一類機關。他有支付能力，他就能用最簡便的方法找到貸款。

土壤改良合作社，像抵押借貸合作社一樣，對於小經營也不相宜；就是購銷合作社也是如此。

買賣、排斥競爭者於市場之外，吸引主顧及利用時機——這些活動方式，完全不宜於合作社。獨立的、不和誰計較的、極熱中於利益的個別企業家，在這裏就進行得比合作社的職員順利得多。

在出賣個別商品方面，供給與需要，像生產品質量一樣愈不均衡，則此種情形(指貿易、排斥競爭者等等而言)亦愈有意義。根據合作社原則進行牲畜的出賣，是這樣困難。這主要應歸咎於此種不均衡性。德國在這一方面的一切企圖差不多都失敗了。當銷售合作社是由許多在不同條件之下用不同方法生產的小農組成的，那末在這種合作社內就比在每個都合理經營的幾個大經營所組成的合作社內更有力地感覺到生產品的種類繁多。例如邁德爾·斯太費爾斯的通訊就是這樣說：“根據合作社原則銷售牛油，凡是在出賣同一質量的大量牛油，即是說，出賣乳酪合作社或大地主的商品的地方，都被保存下來。但是在合作社一定要出賣許多小生產者的牛油的地方，那裏合作社就往往遭到破產”(“政治學辭典”，第四卷，第九五〇頁)。

我們就要說明乳酪合作社對於小農的意義，像下面所說的。這裏我們只想確定，平常只有那些從大經營而非從小經營組成的銷售合作社才很興旺。這種情形不僅在出賣牛油方面為然，即在出賣牲畜、穀物及火酒方面亦是如此。最近期間在德國北部發達起來的售賣火酒合作社，仔細考查一下，不是別的，而是釀酒廠為維持火酒最高價格的卡特爾。

如果每個社員都照一個計劃並用同樣的手段去生產，那時銷售

合作社才能更有利於小經營。可是希望很小，而且似乎德國的農民並不打算在這一方面多作嘗試。要希望最近將來在這方面農民的合作社迅速發展那是不行的。

這裏還只是剛摸索出地盤，剛做出初步的經驗。

反之，共同購買人造肥料、飼料、種子、牲畜、機器等等的合作社情形就好得多。此等合作社的數量迅速增加。購置原料的農業組合，一八七五年爲五六個，一八八〇年爲六八個，一八八八年爲八四三個，一八九四年爲一、〇七一個，一八九六年爲一、〇八五個。

除這些合作社外一八九四年計有二一四個購置農業工具及機器的農業合作社。

在購買原料及機器範圍內，農業合作社能夠發揮着極有效的活動。這裏關係比較簡單。市場的情況是明瞭的，合作社社員自己做訂貨；而賣東西給合作社的不是零星的小生產，而是大的工業企業，或大的農業經營（例如從事牧畜業的農業經營）。我們不能否定這些合作社對於農業經營者的好處。它們節省了仲介人的費用；誠然，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業經營者所得的，就是仲介人所失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沒有一個人像地主階級那樣奮起反對大商號及消費合作社（替勞動者減低消費資料的消費合作社）的，他們力圖消滅仲介作用，因爲仲介作用引起商品價格的抬高，使官吏、軍官和土地所有者蒙受不利。

除了節省仲介人的費用以外，農村購買合作社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它們保障農業經營者不致購到假貨。但是這裏又有一個問題，在這裏大經營不是比小經營更佔便宜嗎？

例如，如果柏林的主要合作社把煤送給大地主的蒸汽機是很有利的話，那末煤的供給對於小經營就不會有特殊的意義。同樣將出賣或出租的機器供給其社員的合作社，其社員所需的機器愈多，經營

愈大，則所得的利益亦愈多，這是很顯然的。從購置汽犁的合作社中得到最大利益的，顯然不是小農而是大農和大地主。

在薩克森省的大經營內差不多到處都用汽犁耕種。但是其中只有少數的大經營有自己的汽犁，大部分汽犁都屬於合作社。

在耶爾福 (Erfurt) 舉行的國家社會黨的代表大會上(一八九七年九月)，海爾牧師在其關於合作社的演說中已表示憂慮，即大生產把持農業合作社並使之專供自己之用。一八九六年在斯德丁 Stettin 農業合作社代表大會上，主席團完全操在大地主手裏。四十一個演說者中只有四個小地主說了幾句很簡短的話。

一八九七年在德勒斯登 (Dresden) 舉行的合作社代表大會也完全處於貴族地主影響下。在上面所引的報告中，柴林格向農村經濟委員會唱着讚美歌來祝賀合作社是“利益與勞動之新的共同性”的創立者，和這件事呼應着。

“我們在這裏找到農民與大地主、僧侶與教師，僱主與勞動者底共同活動及互相負責”。

這已經足夠證明，合作社對於現代農業雖有很大意義，但無論如何，它們不是一種手段，能夠消滅大經營對於小經營的優越性，甚至就是在合作社很順利進行的那些部門內也是如此。反之，它們倒往往是加強大經營優越性的一種手段。它們帶給中等經營的利益更多，帶給小經營的利益更少。

但是農業活動底最重要部門，是個別獨立經營底合作社所望塵莫及的。

我們已經看見，汽犁(還有別的機器，如條播機之類)不適用於小的農業經營。同樣別的機器對於獨立的農業經營者之共同使用也不相宜。這就是那些只應用於某一短時期的機器。如果刈草期一到，大家都要忙着刈草，那末合作社的刈草機有什麼用處呢？甚至打穀機

的共同使用也可引起爭吵和招致損失。自己有汽力打穀機的大農業經營者就有那種優越性，他可以在田間打磨剛割下的穀物；他節省未打磨過的穀物的運輸和保管的費用，他的穀物直接在收穫之後就可出賣，因此他能夠利用一切時機，這些利益對於合作社社員是沒有的，合作社社員一定要把自己的穀物（未曾打磨過的）運出並且要等着輪到他打磨的時候。

此種合作社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大的耕種面積、分工、有科學教育的人的管理所提供的優點——這正是大經營底最重要的優點。給予小農業經營者。因此若希望合作社使小生產有可能像在大生產內一樣進行其合理的經營，那就是懷抱着空的希望。如果小農業經營者真正要想藉助於合作社而得到大經營的優點，那末他們就不應當走迂迴的路，而應當直接趨向目的，他們不應當僅限於商業和高利貸方面，而應當注意到對於農業經營者最重要的農業生產方面。無疑地，大的合作經營可以利用大生產的一切利益，這些利益一部分是許多為獲得原料、機器、信用及購銷合作社完全不能提供的，一部分即使能提供也是不關重要的。

同時為自己的利益而勞作遠勝於僱傭勞動，這就帶給合作經營一種好處。這一類合作社不僅可與資本主義的經營抗衡，而且還超過資本主義的經營。但奇怪的是：正是這一類合作社得不到農業經營者的注意。我們可以把飼養牲畜的合作社（例如飼養小馬的合作社）視為明顯的過渡到這類合作經營。農民往往沒有適當的地方來飼養自己的小馬，過早地使它們馱重，因此就傷害了它們。除此以外，農民不能給它們以適當的照料、適當的馬廄，且往往給它們以不好的飼料。一八九五年在依林瓦爾創立的飼養小馬合作社就消除了這種害處，社員們把自己的小馬放置在那裏，供給它們合於衛生的馬廄，寬大的練馬場及仔細的照顧。但是這一類合作社，雖然它們是農業生

產，也只是農業的附屬部門並且只是消除農民經濟的孤立性及限制性底個別結果的緩衝劑，而不是消滅它的這些本質。

農民甚至不打算把合作社的原則應用到他的經濟底主要部門，其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他們只限於這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緩和劑呢？

有人企圖以農業勞動就其性質而言不是社會的，因此不會鼓勵進行共同經營來解釋此種情形。但這是把在某種場合正需要說明的現象拿來作爲此種情形的唯一證明而已。

不明白爲什麼適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農村經濟，却不同樣適宜於合作社的生產。是不是因爲後者還未曾試驗過？這是不妥當的解釋，因爲有許多試辦的合作社生產都已經做得很成功。

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內，當時偉大的思想家即已認爲結束資本主義剝削的手段，不是小生產，而是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但是當時沒有人能了解，社會主義的大生產要能大規模地發生與發展，需要許多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知識的前提條件，那時有不少的空想家，其中第一個最偉大的空想家，羅伯特·歐文曾企圖創立社會主義實驗區及合作社來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並不是所有的企圖都成功了的，而那些已成功的，也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萌芽。但有一點却是無可非難地證明：社會生產底可能性，以社會制度代替個人資本家底可能性。

這些企圖大多數自然是在工業領域內做成的。但有一種是在農村經濟領域內做成的。這就是在刺拉根的合作社，這個合作社很卓絕地成功了，後來只是因爲不幸的偶然才遭失敗。合作社底這個經驗十分有趣，可是不大爲人所知，我們關於這個合作社的敘述，完全是從我們的材料中引來的。我們從查理士·布雷的“論必要的哲學”(Philosophy of Necessity)，第二卷，第五八一頁中引用這些資料。

勃萊塔諾也把它們引用到他對威伯夫人的“英國合作社運動”一書所作的註釋中(見該書,第二二九頁)。

布雷告訴我們:“在愛爾蘭,萬達勒爾先生在其屬於克萊爾伯爵領地的刺拉根地產內曾做過一次成功的經驗。他的農夫屬於下層的愛爾蘭人;他們貧窮、不滿意,性情乖張而且易於憤怒。萬達勒爾很想改善他們的性格和他們的地位:爲他私人的利益設想要有經常的和有用的勞動者;因此他在一八三〇年決定根據歐文的原則稍加修改以適合於客觀情況來做一次實驗。當時約有四十個農村勞動者同意他的計劃,於是他把他們組織成一個會社在他個人領導與監督之下。他把他的刺拉根地產租給這個會社,刺拉根地產佔有六一八英畝(一英畝等於四〇·四九公畝),其中約有二六七英畝爲牧場,二八五英畝爲耕地,六十三英畝半爲沼澤,二英畝半爲花園。地質平均是優良的,只有一些地方是沙地。此地有六間茅屋及一所舊的莊宅,作爲住屋分給結婚的人居住,同樣還有別的經濟的建築物、豬圈倉庫等等,這些建築物一部分拿來作食堂、會議室、學校及兒童和未婚者的寢室之用。他把所有這些建築物以每年租金七百金鎊租出,這些建築物中還包括有鋸木廠、水力打穀機以及作爲工廠和紡織工廠用的房屋,但是沒有機器。在迫近收割前爲備置力畜和農具,爲供給飲食和衣服,社員們還要付出二百金鎊。他們必須住在公共的適當的房屋內,並以公共的資金爲公共的利益而共同勞作。剩餘物當然是十七歲以上全體社員的財產,並在男子與婦女,已婚者與未婚者之間平均分配。工具、器具及機器必須保管得能用,而損壞的就得換上新的;牲畜的數量和價值不得減低。租金必須用地產的出產物來支付;第一年租金照里摩黎克地方的市價計算,以後幾年裸麥、牛肉、豬肉、牛油等等的數量同第一年一樣;一定要用實物支付;無論這個會社進行了何種改良地租都不能增高;它還被允諾訂立一個地租相同的長期租約,他

們就馬上積聚足以購買農具的資本。

直到現在萬達勒爾仍舊是地產的所有者。租金比他從前得到的高得多了。一八三一年租金收入爲九〇〇金鎊，一八三二年收入幾等於一、七〇〇金鎊；購買食物、衣服、種子等等，會社在這一年花了五五〇金鎊。建築房屋的緊急貸款、備辦傢具以及這一類的事就把剩餘花光了；但是福利增加了，成功與幸福的基礎被奠定了。

社員們必須同樣長期勞作並從公共出納處獲得好像他們假定是簡單的僱傭勞動者同樣的工資，他們並不積聚自己的資金。會社的書記因此每天要把每個人做了多少工作，記入工作簿內，在一星期末每個人在他的工作上都得到從前萬達勒爾付給的那樣多。分紅的希望是對工作一種強有力的鼓勵，人們一天生產的比附近的僱工多兩倍。公共出納處付出的工資是一種勞動券，這種勞動券只用在他們自己的消費店內。這就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進行經營，而無須現款，並且抵制了酗酒，因爲在消費店內不許有酒精飲料，而在旅館內又不收用勞動券。

消費店只有上等的貨物，這些貨物都照批發價格出賣。照愛爾蘭的風俗習慣，馬鈴薯和牛乳是主要的食品，而由公共出納處付出的總額比較小；但是社員們從自己的組合中得到那些便宜，却把他們的地位大大地提高到他們階級的生活水平綫以上。男子每星期得四先令。他們的用費，是菜蔬，即馬鈴薯一先令，牛乳(十夸特)十辨士，洗衣服等等二辨士，醫藥費二辨士，衣服一先令十辨士。婦女每星期得到二先令六辨士；她們用在菜蔬上六辨士，牛乳八辨士，洗衣服等等二辨士，醫藥費一又四分之一辨士，衣服一先令又四分之三辨士。已婚的社員，單獨居住，每星期付給公社六辨士的宿費及約二辨士的取暖費。所有兒童其年齡從十四個月起，就由公共出納處撫養，用費不由父母負擔。到八、九歲就送入兒童學校，以後就和未婚者一起居住。



剛成年的人並不從自己的工資中支付宿費、取暖費、講義費、學費及娛樂費。他們購買貨物要賤一半(百分之五〇),而且在自己的消費店內得到比任何地方都好的貨物。每個社員都能常常指望着工作及經常的工資,生活資料的價格在消費店中仍舊不變。病人及殘廢者從醫院的出納處得到全部工資。父親死後家屬也有了保障。

社員人數漸漸增多到兩倍。住宅及設備都很整潔而舒適,食物精良而簡單,並且還儘可能採用機器於每個生產部門。公社中凡年在十七歲左右的男女青年都要輪流服務。勞動時間在夏天從早上六點繼續到晚上六點,中膳時有一小時休息。每天晚上召開管理委員會,以便規定次日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儘可能斟酌個人的愛好和能力。要求年青人除學習農作之外還要學習一種有用的手藝,並且每個人,無論他在公社內的經常職務是怎樣,都應幫助田間的勞作,尤其在收穫時期。商店經理分配食物、衣服等等,園工則分配果品。萬達勒爾出賣剩餘生產品而購買對於經營及消費商店所必需的生產品。一切爭端都由公斷法庭解決,三年以來的共同生活不曾有過一次求助於律師或公斷人。克賴格是萬達勒爾的熱心而有能力的助手,他敘述刺拉根的參觀者在這種制度前面表現出何等的驚訝,這種制度能夠把處於貧困、傭儼、窮苦地位的野蠻的愛爾蘭人加以馴化,使他們養成整潔,健康和幸福的習慣。

他很痛心地敘述,這個公社正當它有了迅速成功的時候,怎樣忽然地被破壞了,破壞的原因是怎樣令人悲痛。萬達勒爾是一個貴族,他雖然有一切優點,却擁有貴族的那一種缺點。賭博使他、他的家庭、他的事業破產。他逃出他的故鄉,他的債權人查封了他的全部財產,他們不調查刺拉根勞動者在這上面的權利,而竭力追求賠償。公社未經註冊,萬達勒爾也未曾和他們訂過租約,因此法律不予這個公社以任何保障。”

北美洲的共產主義公社同樣地證明，農村經濟中協作生產能夠達到何種優越的結果其可信程度不亞於刺拉根。諾爾德霍夫在其論這些公社的書中屢次指出，這些公社的經營在強度勞作及合理的利用現有力量方面都遠勝於它們的鄰人。優越的農業園藝大大地促進它們（這些公社的經營）的成功。諾爾德霍夫關於亞馬公社說：“他們都是優秀的農業經營者，他們有良好的牲畜，他們像德國人那樣的精細來照管這些牲畜，冬天他們把牲畜飼養在廄內”（第四〇頁）。震教徒①“平常有很好的倉庫，和對工作的一切設備都佈置得最好而又最方便……他們對於農業不惜任何的勞苦；他們長期地，年復一年地在土地上耕作，清除土地上的沙石，以便得到良好的耕地。他們愛做需要仔細照顧的種植，如園藝種子的栽培。他們有肥壯的牲畜，他們的經營所需建築物一般都很能適宜於勞作的節省”（第一四九頁）。

“美洲的至善論者②的農場管理得很好”（第二七八頁）。“我不應當對這個事實默而不言，（在亞佛羅爾公社內）公園、葡萄園及花園都培植得很好而且很合理……我不懷疑，亞佛羅爾公社的經營，它的果樹園和其他有價值的種植都比所有私人的企業要便宜一倍”（第三一九、三二三頁）。

畢索·吉爾拓殖區“在一八五九年佔有一〇、〇〇〇英畝土地，用籬笆圍起來以示區別，且處於最優良的地位。它的社員都有國內很好的牲畜”（第三四六頁）。這種情形並不是例外。諾爾德霍夫在其緒論中宣稱：“農村經濟的優良狀況是共產主義拓殖區所有的特徵之一”（第四一五頁）（見“美國共產主義公社”〔The Communistic societies

---

① 震教徒是十八世紀美國發生的基督教的派，——譯者

② 即“聖經共產主義者”，一八三一年在美國發生的一種教派，排斥聖禮，不承認教會的組織，認為一切的成員都是平等的並規定財產、妻子和兒女的公有；他們住在紐約；從一八七九年起結婚方式也為他們所取締。——譯者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已經足夠證明，農業勞動並不與經營底合作形式立於矛盾地位。雖然如此，如果說農民並不認真打算把合作經營的形式應用到他的活動範圍，那末要找它的原因，並不困難。

誰都不會斷言，工業勞動不必在協同組合的原則上也能極順利地進行。可是我們却看見，手工業者像農民一樣，並未從孤立的生產過渡到合作的生產。只是在商品流通及信用範圍內，他們才企圖在合作社組織的幫助之下利用大生產的好處。在這裏也和在別處一樣，合作的大生產只能作為維持不合理的小生產生存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用大生產來代替小生產。

這是十分明顯的。手工業者不放棄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就不能過渡到合作的生產，他們佔有的財產愈多，他們愈是能夠用自己的組合創立資本充足的能夠支持競爭的大生產，那他們把自己的私有財產放進公共出納部的願望就愈小。在現代社會內各種類似的企業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突變，這是一種經驗，每個成員在這種經驗裏面都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像勇敢的商人在自己做投機事業時一樣；他的成功全靠大家的能力，休戚相關及嚴守紀律，全靠這些性質，可是這些性質中最後兩個在孤立勞作的手工業者方面却最不發達的。

所有這些條件在農民方面比在手工業者方面更不發達。農民是私有財產的迷信者，這種意見，人們認為是一種侮辱，但它却表現出一般的事實。農民留戀自己的土地比手工業者留戀自己的孤立的作坊還要厲害。對土地的需要，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農民對自己的小塊土地的留戀亦隨之增長。在美洲農民為了要跑到西方去，因為那裏還有許多自由的土地，他就滿不在乎地拋棄或至少在不久以前拋棄了他的出息少的地產。在德國和法國農民為了要保存自己的土地，他情願過困苦生活，為了要使土地增加，他不惜出任何代價。我

們應當想像，在這樣必要的和有利的辦法之下，如將處於和別人的地產犬牙相錯的土地聯爲一連綿不斷的地面會發生怎樣的困難。

這裏我們只說到地段的交換，這種交換對於一切參加者都是有利的。這種辦法可以強迫公社底少數反對者接受。過去一世紀在這一方面曾出現了“開明的”專制，有時並不受拘束。但是在現時德國離普遍的廢除地塊零散現象還很遠。我們可以想像到，要想創立農民的生產合作社，合作社社員不應互相交換土地而應將自己的土地交給合作社，這種企圖是怎樣沒有希望，這種辦法是多麼困難，因爲不可能強迫反對分子接受。

農民把他固有的不信任轉移到合作社，因爲目前生活和勞動條件都使他比手工業者更加孤立，合作的美德在農民當中比在手工業者當中還更不發達。

只有那些除了自己的鎖鏈以外，什麼也沒有失掉的分子，那些在資本主義生產內，經過了共同的社會勞動的學校，爲社會的勞動有組織地和資本主義的剝削鬥爭，養成了合作的美德，同志間休戚與共，對公共事業忠實，極能服從紀律的分子，才能將合作社的原則採行於生產之內。

不能跳過任何一個發展的階段。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不能在正常的條件之下從手工業的或農民的經營直接過渡到合作的大生產。生產工具的私有在這裏就是一種障礙。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替大的合作經營創造出先決條件，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創造出喪失了生產工具私有權的工人階級，而且也使生產過程成爲社會的(生產過程)，引起了並加劇了資本家與僱傭勞動者之間的階級衝突，使僱傭勞動者力圖以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去代替資本家的私有。

不是私有者，而是無產者才能促進這種轉變。但是這一論據不

應理解爲似乎農民與手工業者若要走向合作的生產，其唯一道路須經過無產階級存在的過渡階段，似乎他們必不可免地應當受資本的剝奪，似乎在農民與手工業者還存在的時候，社會的生產就不可能。這是再錯誤沒有的了。上述論據只是確定，只有一個勝利的無產階級才能够成爲社會生產的開創者，並且也替手工業者及農民創造出不是像現在所理想的，而是實際的過渡到大規模合作生產的條件。

當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那時已不再說是無產階級的合作社了)證實一切希望並消滅在現時還威脅着一切企業的危機，當土地的喪失不再威脅農民無產階級化的時候，農民就會懂得，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對他只是過渡到較高經濟形式的一種障礙，他就願意擺脫的一種障礙。

反之，期待農民在現代社會內轉到合作的經營那是荒謬的。這就是說，對於農民要想藉助於合作社以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大經營的一切優點並藉此鞏固其土地私有權，即鞏固此種正在動搖的現存制度的支柱，那是沒有可能的。農民一旦懂得，只有在合作的農業生產幫助之下才能生存，他也就會認識這樣的經濟(即合作經濟)對於他，只有在無產階級能够根據自己的利益組織社會關係的地方才能達到。

可是到那時候農民也就成爲社會民主黨人了。

## 第七章 資本主義農村經濟的界限

### 一 統計材料

前章所研究的結果是這樣：在農村經濟的一切重要部門內，大生產在技術上總是高於小生產（雖然不像在工業的主要部門內所達到的那樣程度）。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真理。差不多在十八世紀中葉，當時農業中機器的應用剛剛開始，而農業底自然科學的基礎尚未被人研究，重農學派的開山祖凱恩在其“農業國經濟政策的一般原則”（*Maximes Généralis du gouvernement économique d'un royaume agricole*）中，即已表示了他的希望：“要使預定為農業之用的土地盡可能聯合為能由財力富足的農業經營者來經營的大農場，因為在大的農業生產之下生活及修葺建築物的用費，其生產成本費要比小生產更低，而純收入（*Produit net*）則比小生產更高。”

同樣在那時的英國，許多經濟學家大都是大生產的擁護者，例如楊格（A. Yung）。亞丹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發表了一種意見，認為大地主在農村經濟內很少能進行重要的改良，他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的大生產，而是反對有無數小農場的封建大地產，這些小農場要擔負一切可能的勞役和義務，因此它們完全依賴地主的意志。他稱讚自由農民的所有權底優越性而反對封建的地產。但是他補充說：“每個國家內在小的土地所有者之後，富足的大農是改良農業的主要先

導者”(第三卷,第二頁)。

大的資本主義的(而非封建的)農業產出最高的收益,這很快就成爲公認的事實。但是英國的經濟雖可作爲歐洲的模範,英國的制度倒不常是模範的制度。剝削農民以利大生產對於君主及政治家尤爲危險,因爲農民已成了軍隊的核心。英國人並未供養大批軍隊,他們沒有農民也行。但是大陸國家沒有農民就很難抵抗有強大農民的鄰人。此外還有一種說法:在英國農民已爲無數既窮困而又暴躁的無產階級所代替,無產階級不能和小所有主勞動者階級作任何對比。資產階級隊伍中的慈善家(他們沒有那麼大胆,像空想家一樣接近社會主義),正如資本主義剝削底擁護者一樣,努力以人民的資格提供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可靠支柱,所以他們就成了農業小生產的辯護者,——西斯蒙德和彌爾也正如“純粹的自由貿易論”者及他們的反對者——地主階級那樣。在任何情況內他們通常都不承認小經營具有技術的優越,但是他們一方面同意大生產能得到較多的利益,同時又指出它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危險性。西斯蒙德在其“政治經濟學概論”(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一書中感嘆地說:“一方面,最新的經濟學家,另一方面,最有經驗的農學家都不斷稱讚財力充足且有知識的農人,進行大經營;他們對於這些農人底建築規模,工具及器械的改良,牲畜的肥美都很驚訝。他們只注意物,而忘記人,對於人他們甚至忘記計算在內。英國一平方哩計有六四〇英畝;這就是英國最富的農莊底大概範圍。從前的經營,一家的成員就能勝任,沒有僱工,沒有外人幫助而且也沒有假日,這些經營,保證家庭每個人在一年內每天都有工作,經營所佔地面每個至多六十四英畝。爲了要從這些經營中構成一個新的(經營),就需要十個這樣的經營。爲了把位置給予新制度的一個農人,十個農民家庭就被驅逐。”西斯蒙德反對大生產,是因爲它造成無產者,而不是因爲小生產能夠提供大

量優良的生產品。

從那時候起新興的大農業更加發展了，但是有些經濟學家承認農業小生產和大生產有平等權利，甚至那些經濟學家在七十年代自己預言了農業小生產無生存能力，恰恰在現在預言大生產的毀滅，例如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就是這樣，或者他們承認，何種生產形式為最合理，至少還是一個待爭論的問題。在本書緒論內我們曾引了宗巴特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這位研究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公正態度是誰都不會否認的，如果他的意見沒有顯著事實的根據，他自己便不會加以引述。

事實又是怎樣的呢？這些事實不是在農學範圍內找出，而是取之於統計學中。統計學指出，農業小生產在和大生產鬥爭中並未迅速消滅。大陸上自從大規模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即大約從五十年代起，有人就期待或恐懼照英國的樣子，農業小生產會迅速消滅。然而相反，在某些地方小生產所佔的土地面積甚至有迅速擴大的趨勢。例如，在德國的生產統計中我們就找到了這樣情形。

農業經營	經營數		增加或減少	農業生產的面積 (單位公頃)		增加或減少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2 公頃以下	3,061,831	3,236,367	(+) 174,536	1,825,938	1,808,444	(-) 17,494
2—5 公頃	931,407	1,016,318	(+) 34,911	3,190,203	3,285,984	(+) 95,781
5—20公頃	926,605	998,804	(+) 72,199	9,158,398	9,721,875	(+) 563,477
20—100 公頃	281,510	281,767	(+) 257	9,908,170	9,869,837	(-) 38,333
100 公頃以上	24,991	25,061	(+) 70	7,786,263	7,831,801	(+) 45,538

在法國並不完全在同一方向內發展。那裏的統計如下：



農業經營	經營數		增加或減少	農業生產的面積 (單位公頃)		增加或減少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 公頃以下	2,167,667	2,295,405	(+) 67,738	1,083,833	1,327,253	(+) 243,420
1—5 公頃	1,865,878	1,829,259	(-) 36,619	5,597,634	5,489,200	(-) 108,434
5—10 公頃	769,152	788,299	(+) 19,147	5,768,640	5,755,500	(-) 13,140
10—40 公頃	727,222	711,118	(-) 16,104	14,845,650	14,313,417	(-) 532,233
40 公頃以上	142,088	138,671	(-) 3,417	22,296,105	22,498,393	(+) 197,288

在德國中等的(就它們所佔的面積而言)經營在大多數場合之內都增加了的那時候,在法國所增加的則是最大與最小經營底面積。中等經營就數量而言和就面積而言都減少了。但是此種減少並不大。自然這裏要把自耕農的經營(一〇——四〇公頃)除外。無論如何演進不是很快的。

在大不列顛我們看到:

農 業 經 營	經營數		增加 或減少	農業生產的面積 (單位公頃)		增加 或減少
	1885年	1895年		1885年	1895年	
1-5 英畝(0.40-2 公頃)	135,736	117,968	(-) 17,768	389,677	366,792	(-) 22,885
5-20 英畝( 2-8 公頃)	148,806	149,818	(+) 1,012	1,656,767	1,667,647	(+) 10,880
20-50 英畝( 8-20 公頃)	84,149	85,663	(+) 1,514	2,824,527	2,864,976	(+) 40,449
50-100英畝( 20-40 公頃)	61,715	66,625	(+) 1,910	4,746,520	4,885,203	(+) 138,683
100-300英畝( 40-120公頃)	79,573	81,245	(+) 1,672	13,658,495	13,875,914	(+) 217,419
300-500英畝( 120-200公頃)	13,875	13,568	(-) 307	5,241,168	5,113,945	(-) 127,223
500 英畝以上(200 公頃以上)	5,489	5,219	(-) 270	4,029,843	3,803,036	(-) 226,807

像德國一樣,我們在英國也看出中等經營的增加。可是在德國就所佔的面積而言,增加最多的是從五至二〇公頃的經營,而在英國

則是從四〇至一二〇公頃的經營，自然誰都不會把它們算作小經營。最小的經營減少了，這和德國相反，而一二〇公頃以上的最大經營也減少了。

各派經濟學家如賽弗爾，邁耶爾博士等都想從有關美國農業的材料中做出那樣的結論，即在美國農村經濟內大經營為小經營所排擠。我們倒也願意順便觀察一下有關這地方的統計數字。的確，中等農場從一八五〇年起已降低了。其情形如下表：

1850年.....	203 英畝
1860年.....	199 英畝
1870年.....	158 英畝
1880年.....	134 英畝

但在一八九〇年它又重新增加了，且等於一三七英畝。

中等經營此種暫時的減少，主要，當然是由於南方大的種植場的分散所致，這種分散是黑奴解放的結果。例如從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這個時期，中等農場減少了：在佛羅里達——從四四五英畝減至一〇七英畝，在南卡羅林納——從四八八減至一一五，在阿拉巴馬——從三四七減至一二六，在密士失畢——從三七〇減至一二二，在路易斯安那——從五三七減至一三八，在得克薩斯——從五九一減至二二五英畝。一般講來，中等農場在大西洋沿岸諸州內在同一時期從三五三減至一三四英畝，而在中南部諸州內則從三二一減至一四四。沒有一個懂事的人會在這些數字中把小生產的勝利看做是超過現代大生產之上。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出農場範圍顯著的減少在相當舊式耕作的地方——在北部沿大西洋岸的各州內。那裏（大西洋沿岸北部諸州），最近十年來中等農場不斷地減少下去。但是這種減少主要是由於農場所佔的荒地減少所致，而不是由於經營範圍的縮小。下邊就是有關大西洋沿岸北部諸州的數字：

	農場一般的範圍	其中未耕作的土地
1850年	113 英畝	43 英畝等於 38.44%
1860年	108 英畝	39 英畝等於 36.18%
1870年	104 英畝	36 英畝等於 34.47%
1880年	98 英畝	31 英畝等於 31.77%
1890年	95 英畝	31 英畝等於 32.52%

在最近十年內荒地百分數的增加是和農村經濟衰落同時發生的，這在農場總面積減少中表現出來。農場總面積在上述區域內從六七、九八五、六四〇英畝(一八八〇年)減至六〇、七四三、五二五英畝(一八九〇年)，也就是說減少了五百萬英畝之多。

在中北部一帶各州內——即生產小麥的各州——情形則相反，中等農場在一八八〇與一八九〇年之間從一二二英畝增至一三三英畝。大經營數量的變動，指出在同一方向(中等農場的變動所指示的方向)內的進步。這個數量，自然，在整個聯邦內相對地減少了一些。可惜，一八七〇年的數字與最近的數字不能相比，因為當時農場是按照它們中已耕作的土地面積分類，而在一八八〇及一八九〇年則是按照它們所佔有的全部面積分類。其情形如下：

	農 場	其中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1880年	4,008,907	75,972	28,578
1890年	4,564,641	84,395	31,546
增 加	13.8%	11.0%	10.3%

大經營之增加顯然落後於一切其他的經營之增加，但是這種現象只是從前佔有奴隸的各州進化的結果，那裏進行舊式的落後的種植經營已成爲不可能，同樣也是在貧瘠的東北一帶農業衰落的結果。

在大西洋沿岸北部諸州內，農場計有：

	總 數	其中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1880 年	696,139	4,136	964
1890 年	658,569	3,287	733
減 少	5.4%	20.9%	23.9%

這裏大經營的數量比小經營的數量減少得更快。後者很牢固地維持着自己絕望的地位。這是否為小經營的優點，是很值得令人懷疑的。

在大西洋沿岸的南部諸州內，農場計有：

	總 數	其中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1880 年	644,429	25,037	9,718
1890 年	749,600	21,736	8,030
增加(+)	(+ ) 16.3%	(-) 17.2%	(-) 17.4%
減少(-)			

在中南部諸州：

	總 數	其中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1880 年	886,648	25,872	11,659
1890 年	1,036,772	26,666	12,295
增 加	22.5%	3.0%	4.6%

另一方面，在西部則為：

	總 數	其中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1880 年	83,723	5,299	3,247
1890 年	145,878	9,269	6,020
增 加	74.2%	74.9%	85.3%

最後，在出產小麥的中北部諸州內，計有：

	總 數	其中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1880 年	1,697,968	15,608	2,990
1890 年	1,923,822	23,437	4,668
增 加	13.3%	50.2%	49.4%

這些最近的數字恰恰完全不是表示大生產的衰落。在美洲，現代農業發達的地方，大經營的面積迅速地增加起來。只有在農業衰落，或在前資本主義的大經營出來和農民的經營競爭的地方，小生產才保持着優勢。

如果在美洲，農業的發展直到現在都比歐洲進行得快，而且比平常人所想像的，總是更加促進了大生產，那末這裏並不是說小地產已爲大地產所排擠。

可是若從這些數字中或與它們相類似的數字中做出結論說，在農業中經濟的發展好像走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與工業中不同，那就太輕率了。

數字證明，自然囉，但是要問它們證明什麼？首先它們只是證明直接說到的東西，但是這種情形在統計學的計算時是很少有的。例如，我們可以舉出一些數字，它們當然證明民衆的幸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是增加了。可是，這裏是根據儲蓄銀行存款總額的增加。這些數字是無可爭論的。但是它們無可非難地證明什麼呢？它們證明儲蓄銀行中存款增加了，不多不少剛剛證明這一點。關於增加底原因我們却完全不知道。

幸福的增高可以，但不一定必然隨着這種增加而來。不同的原因都能引起一個同一的結果。

例如，儲蓄銀行存款手續簡便也可以使儲蓄銀行的存款增加。從前印度人把自己的積蓄埋藏在地裏。現在東印度設立了許多儲蓄銀行，印度人就寧可把自己的積蓄放進銀行去。難道這就證明，印度人現在有可能更多地儲蓄，他的幸福就增加了嗎？印度人長期營養不足並不證明這一點。

在歐洲儲蓄銀行發生最早。這裏存款於儲蓄銀行的有利條件也繼續增加，不多費時間，一方面，由於農村儲蓄銀行數目增加，另一方

面由於城市人口繁殖，在城市中對於和儲蓄銀行來往有着更優良的條件。

僱傭勞動者，官吏及其他職員人數的增加，的確也能促進儲蓄銀行存款的增加。小農用自己的積蓄來購買土地，獨立的手工業者則用來改善作坊。爲工資或養家活口而勞作的人，除了把它們存放進儲蓄銀行以外，他不知道有更好地使用自己少數積蓄的方法。

因此獨立小經營爲資本主義企業所排擠，是與儲蓄銀行存款的增加相關聯的。這樣看來，銀行貯蓄的增加是正在增長的無產階級化底結果；它是和民衆幸福的降低同時並進的。

最後，像這類的增加可以發生自經濟行情內的簡單變動。在商品生產方式之下，對於每一種企業，對於每一個家庭經濟，都規定有一定的期限，在這一定期限內要有很多的付款來進行生產，因此對於這樣的場合所必需的金錢，就應當及早從經常收入中儲蓄起來。在銀行及儲蓄銀行制度未發展以前，這些貨幣的數額應該當作死的資金存放着。而現在在不需要這些資金的時候，就可以拿它們去放利。各個企業及家庭經濟爲着定期支付——勞動者在失業期間爲支付房金，——不得不儲蓄的數額愈大，使每天消費所不需要的最小款項增殖的習慣愈加普遍，則儲蓄銀行的存款亦愈多，但幸福並不隨之增加。

所以，關於儲蓄銀行的統計數字，其本身對於幸福增加這一問題，還沒有給以答覆；它們不曾解決問題，僅僅將問題提出來而已。

例如，所得稅的數字（它們當然也明顯地無可爭辯地證明幸福的增加）其情形也是如此。實際上它們自身也只證明它們所要證明的東西，即是說，在一定的情況之下，必須納稅的最小收入的數目及免了稅的收入底數量增加得並不像最高收入的數量那樣迅速。不言而喻，這固然可以表示幸福的增高，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它的必然結果。

如果生活資料的價格、房租等等比收入增加得更快，那末收入的增加是會與幸福的降低同時並進的。

別的情況也可以產生同樣的結果。我們且舉有四百馬克收入的小農為例。他完全不付房租而且自己生產生活資料的大部分。他可以十分優裕地過活。不幸的機會把他推進無產階級的隊伍；那時他不得不移居城市並在城市內找到一個位置，一年可得八百馬克的收入。他的收入增加到兩倍，可是他的處境反而變壞了。他必須支付房金，也許要支付到達工作地的來往車費。牛乳、雞蛋、菜蔬、豬肉，這些東西從前在他不值什麼錢，現在他却必須付出很貴的價錢，孩子們不能再赤腳走路，衛生上不良條件使他多花一些醫藥費。但是在收入底統計學家看來，這樣的人所處的地位比從前好到兩倍，他有現成的無可爭辯的證據，即是人民的福利在不斷的增長。這裏所引的這個情況是較為特殊的；自然經濟轉變為貨幣經濟及城市人口靠農村人口而增加，都是不斷地在完成着。這兩個過程就已經足夠用來說明人民的收入增加，而幸福並未有絲毫的提高。

肉的消費增加也可作如此了解，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另一章內已經說過。

統計資料無可爭辯地證明現代社會已被捲入在不斷的及迅速的變革中，並使我們認識它的一些表面的及無數的表現、徵候及結果。它們給我們許多有價值的指示來探索在整個過程基礎上所有的傾向，但它們還沒有向我們揭露這些傾向。

那些證明小農業經營不是衰落，而是迅速增長的數字，同樣還是沒有給我們以可能去判斷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而是激起我們去深刻地研究它們。這些數字一看就對我們證明，進化過程並不是這樣單純完成的，如像在此以前人們所常想的，但是這一過程在農業中很明顯地比在工業中更其複雜。

## 二 工業中小生產的衰落

現代工業進化的進程已經複雜到最高階段，雖然這個進程比在農業內簡單得多；這裏各種不同的傾向在極不同的方向內相互影響，而且往往在這個漩渦中要費很多周折才能分別出基本的傾向。

大生產不是同時出現於工業的一切領域之內。它征服這一領域再征服另一領域。在大生產成爲支配的生產的地方，它就排擠較小的企業，但是從這裏還不能就說，所有小的企業家都成爲工廠工人。他們往往投奔其他大生產還沒有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領域，並且充滿這些領域。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競爭同樣破壞着那些大工業在其中還未成爲統治的生產部門。但是這一過程並未常常表現在小企業數量之普遍減少的形態內，相反的，這一過程在某些地方却引起小企業數量的增加，因此，根據赤裸裸的統計數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小經營在這裏得到了特殊的發展。在有無數貧窮的小經營的區域內，現代資本主義式地被剝削的家庭工業替自己的出現及迅速的發展，找到最好的條件。資本的出現在這些條件之下，可以引起小企業的總數不是減少，而是大大的增加；但是誰若懂得在統計數字後面隱藏着的許多社會條件，那他就不會看出在這些條件內和大資本競爭能有勝利的可能。

但是同樣在機器已佔統治地位的那些區域內，大工業的進攻也不一定會引起小生產的消滅，機器使它們在經濟上成爲多餘的東西，但是這些過時的工業形態，在其爲自己的生存而鬥爭中表現出何等的倔強，那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飢餓與過度勞動延長着他們垂死的最後鬥爭。西里西亞及薩克森手織工的窮困在一百年以前已成爲話柄，可是他們直到現在還沒有死絕。如果他們已經沒有可能維持生產，那



時他們就轉到對於大生產沒有多大價值的別種活動或者作大生產的代理人及仲介人藉此糊口。

現代國家底民主主義的形式，也可能是有利於保存過時的小生產的因素之一。

國家政權基於政治的理由去支持那些已喪失了自己經濟均衡的社會階層，這沒有什麼特殊性。沒落時代的古代羅馬由功勳士兵組成的守衛部隊，無論怎樣沒有用處，但是由於政治上的理由仍不得不去支持他們。在現時我們也有類似的例子，如“高貴而優秀的”貴族階級，從十七世紀起就更加成爲贅疣，更加無用，但是由於它服從國王的專制政權，於是貴族階級就替自己造成吮吸社會血汗的寄生蟲的地位，要廢除這些階層就需要革命。

但是這種寄生的傳統在東歐還很厲害，我國地主貴族像兩千年前羅馬城市的賤民一樣，也善於誇耀自己的顯貴；就是在自己的要求上，他們並不比那些賤民更謙遜。他們不以乾麵包爲滿足，他們的場面，比國家爲羅馬的守衛隊伍必須備辦的那些東西堂皇得多。由於特殊的等級的尊榮，他們從自己當中提供一些劍鬥士。

在自己向國家提出的要求中，他們找到了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值得重視的門徒。自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已經覺得自己是無產者，靠攏僱傭勞動者，爲的是即使不爲自己，而是爲自己的兒女爭得較好的生活條件。另一部分則想得到較多的東西，替政府服務來保衛國家。統治階級需要這些分子，在普選權之下他們需要那能够抵抗無產階級攻擊的廣大人民階級，他們準備收買可以收買的那部分小資產階級。這不是一些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這些分子向政府叫喊着，說他們是徹頭徹尾的保皇黨人，但如果政府不給他們依靠社會生活的特權，那他們就要變成社會民主黨人了。在這樣的恐嚇之下就表現出真正流氓的思想方式，但是誰要是需要這些御用分子，那他在

選舉中就難取悅於人。如果在一八四八年統治階級囑使浪人去打擊工人，那末爲什麼現在就不會囑使那部分情願幹這種下賤工作的小資產階級去打擊工人呢？所以，實際上小生產的生存，是靠勞動者而不是靠大生產來維持的——如給商人以特權去剝奪消費者，給行會老板以特權去剝奪他們的學徒及幫工，給他們以便宜的貸款，便宜的保險等等去剝奪納稅人。

階級鬥爭愈尖銳，社會民主運動的威脅愈大，則政府更加願意保障在經濟上已成多餘的小生產依靠整個社會過或多或少的寄生生活。小生產消滅的過程，因此，就可以延緩下去，被政府用種種諾言和措施所激勵的，以及鼓動它們去繼續無希望的鬥爭的那些希望，當然也幫着延緩這個過程，假若沒有這種情形，那無希望的鬥爭也許早放棄了。可是任何一個深謀遠慮的人也不會在這裏看出對於說到經濟趨勢的，馬克思的“教條”有什麼矛盾。

如果國家對統治階級的幫助，還使經濟上不能立足的形式，支持一些時候並以此而掩蓋小生產的沒落，那末這些階級的奢侈濫費，在同一方向內所起的作用也不亞於此。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表示剩餘價值總額之增加，不僅是被積累的資本增加，而且也是資本家底收入增加，同時也表示資本家浪費增加。可是，這種情形又會引起在經濟上早已被打敗的封建形式之復活。例如，財政貴族及大地產所有者把狩獵區域據爲己有，其範圍等於中世紀的森林區。從馬克思“資本論”中明顯地看出，這個階級是何等粗暴而驕橫，它不愛惜金錢，就是愛惜人也似乎是可笑的，它把土地所有者從蘇格蘭的廣大區域中驅逐出去，以便起初用羊隨後用鹿來代替他們。現在法國、德國及奧地利個別的地區都發生同一過程。在奧地利根據恩德賴斯（Endres）在“政治學教程”中的材料，森林所佔的面積從本世紀中葉到現在差不多

增加了七〇〇、〇〇〇公頃，爲總面積百分之七·五，其中阿爾卑斯山及沿海區域就佔了六〇〇、〇〇〇公頃。從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開墾了三、六七一公頃林地並且有五九、〇三一公頃又作爲森林地之用。

在法國私人佔有的森林地，其面積在一七八一年約爲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一八四四年減少到四、七〇〇、〇〇〇公頃，現在又增至六、二〇〇、〇〇〇公頃，然而這個數字還沒有把亞爾薩斯—勞倫的喪失計算在內。

可惜，在德國拿一八九五年的戶口調查和一八八二年的戶口調查來比較，是不可能的，因爲在一八八二年所計算的森林地是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反之，一八九五年的調查則將全部森林業都計算在內。

我們在泰芬“論奧地利底社會貧困及統治階級”一書中找到許多個別的例子，即在奧地利，不僅荒地，就是草地及耕地都爲森林所盤踞。有一種情況是值得注意的，即在薩爾斯堡（Salzburg）牛的數量從一八六九年至一八八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一〇·六，而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又減少了百分之四·一，這主要是“由於將阿爾卑斯賣給狩獵地的所有者”（見德里爾：“奧地利土地問題”〔Die Agrarfrage in Oesterreich〕）。

因資本主義收入的增加而復活的封建社會底另一特徵，就是供私人使喚的無數男女僕役，這些僕役的一種服裝使人回想起過去幾世紀的情形並指示出這種現象與十九世紀的精神相矛盾。上層社會對供有錢人個人消費的生產品上，對手工勞動比對機器更有偏好，這種偏好也適合於這些封建的傾向。供大眾消費的機器生產，替大家製造出同樣的東西，它不適合於個人的嗜好及需要，在有錢的貴族看來那是太平凡了。還有一個情況，就是手工勞動和機器比較，手工勞動是勞動力的過度耗費，就使這種工作成爲更有價值並可作爲一種最

好的手段把它的購買者提高到一般平民之上。

這樣看來，最貴族的部門，即高質量的生產品的製造也就由手工業和現代生產諸部門中最可憐的家庭工業一同來担任。但是手工業底這一部門像家庭工業一樣，要受大資本權力的支配。品質優良的生產品之生產，無論是衣服或鞋子，紙或紡織品，菜蔬或水果，都需要特殊的工藝，要費很多的勞動，要有優良的生產工具，而所有這些東西都需要金錢，需要很多的金錢。如果統計家把製造品質優良的生產品的作坊歸到小生產的一類，那末經濟學家就把它們歸到需要花費很多資本與資本主義式的剝削最熟練的手工業勞動者的那一類生產。在許多場合之內，他們是迅速地把工藝降到資本主義工業階段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引起手工業之新的繁榮。

但即使這種情形不是如此，要希望小生產因資本主義浪費的增加而復活，那也是愚蠢的。浪費的增加是以大工業，大量生產之經常的和迅速的增加為前提，因而也是以小生產之不斷受排擠，無產者不斷增加為前提。在個別的地方，在個別的生產品部門內，資本家的浪費可能引起小生產的某些繁榮，但是資本家的浪費，並不能對整個民族都造成這種情形，因為這種浪費本身是其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人民羣衆繼續不斷無產階級化底產物。在過渡到生產品質優良的生產品方面，看出手工業有一條得救的道路，這猶如把那種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佔統治地位的民族回復到狩獵生活的趨勢，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樣。這不難用統計來證明。

所有這些都證明“馬克思教條”的正確性，和各種對立傾向交互錯綜的小生產消滅過程的極度複雜性，這些對立傾向，只是延緩小生產的消滅，在某些地方好像變成它的對立物，但實際上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可能去阻礙這個過程。

### 三 土地的缺乏

在工業中使過程暗昧不明的那些對立的潮流和傾向，在農業中也表現出來；兩者的相似是很明顯的，我們無須對它多說。但是農業中還表現出工業中所沒有的這樣的矛盾傾向，並且整個過程還要更加複雜。

這裏我們要來考察一下只在農業中而不在工業中表現出來的諸傾向。第一，我們看見的是那種區別，即在工業中生產資料之增加不受限制，而農業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則不然，在一定條件之下，土地的大小是經常的，不能任意增加。

就資本關係而言，顯然有兩大主流：積累與集中。積累是剩餘價值底結果。資本家並不把自己的全部利潤花光，而只花費其一部分；在平常條件下他儲存一部分並使之流通，藉以增加自己的資本。這個過程和許多小資本變為一筆大資本的過程，即和資本集中化過程相交錯。

土地方面的情形便完全不同。在舊文明國家內還可以拿來耕作的土地數量是很少的，我們不能拿它來和資本家一年復一年所積累的數額相比。大地主只有用集中的方法，即將許多經營聯合為一，才能增加自己的地產。

在工業中積累底過程可以不依賴於集中底過程，積累過程甚至常常先於集中過程。大資本底形成、大工業企業底創立，不一定同時排擠小資本，剝奪小生產獨立性。後者（排擠小資本、剝奪小生產的獨立性）往往是大工業企業形成底結果，而不是它的前提。要在某個地方創立製鞋工廠，沒有必要去剝奪當地的鞋匠。只有在製鞋工廠存在着而且興盛的時候，它才會引起小的製鞋業的破產，並為大的製鞋廠所剝奪。正是，積累的過程，從未被消費的利潤中增大新資本的

過程，就替製鞋工廠的建立創造出大的資本。

反之，在全部土地已變為私有財產的地方，以及在小的土地所有制完全佔統治的地方，對於農業經營者最重要的工具——土地，只有集中許多小地產，才能轉變為大的生產方式。許多小經營的消滅在此地是大經營出現的必要前提。但是，除此以外，要經過集中來組織大的經營，就必須把許多被剝奪的小地產聯合為一總面積。在抵押銀行內一年中可以積聚起幾百個被拍賣的農民地產；可是它不能從這幾百個農民地產中造成一個大地產，因為這些農民地產分散在各地。銀行仍舊只好個別地將它們出賣，甚至要是小地產容易找到買主，就把它們分碎，把它們弄成更小的地產。

當一切都依着地主的意志而行，他們就很容易把土地用來創立大經營。他們簡單地藉助於多少偽裝的暴力把那些阻礙他們前進的農民驅逐出去。

但是保護私有財產，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是必要的。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過了它的革命時代並堅固地確立了它的統治的時候起，它就只承認一種可以沒收財產的根據，——無力付債。只要農民能償還他對資本家和國家的欠債，他的私有財產就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土地的私有權也牢不可破了。我們甚至看見私有財產權給農民以怎樣不充分的保障，但私有財產權對於大的土地所有權之構成——此種構成乃是農業大生產底先決條件——却成爲一種極其重要的障礙。

現在在小的土地所有制特別居於統治地位的地方，小經營無論處於何種衰落的狀態，大經營無論怎樣勝過小經營，但要形成大的土地所有制就有很多困難。但是在大地產鄰近小地產的地方，前者也往往不易靠後者來增加，因為小經營的土地，是因需要或別種原因而出賣的，並不常常是那些對於地產的“圍圍”或擴大所必要的土地。

農業經營者如果認為他的地產太小，要設法獲得較大的地產時，與其繼續靠偶然的機會去購買他的鄰人的土地，勿寧採取更簡捷的辦法，——出賣自己的地產而購買更大的地產。個別農業企業者經營底擴大，主要是發生在這樣的形式內。在資本主義時代，土地所有權的激烈變動，農村地產的大量買賣，其原因之一也就在此。願意購買的人，總會找到願意出賣的人，——我們往後還要說到的承繼權及債務也促成這種情形。

這裏我們只想確定一下，土地固有的特徵在私有制支配之下，在小土地所有制佔優勢的一切國家內，是農業向農業大生產（無論它怎樣勝過小生產）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障礙，是工業所碰不到的一種障礙。

#### 四 大生產不是絕對優良的生產

此外在工業與農業之間還有一種差異。在工業內在正常的條件之下大生產總是高於小生產。很顯然的，在工業內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存在着一些界限，大生產受到威脅不能越過這些界限，就成爲沒有收益的。市場底大小，現有資本底多少，現有勞動力底數量，原料底運輸，技術底高低，對每一種企業都有一定的界限。但是，那些不能越過此等界限的企業中，最大的企業總是高於最小的企業。至於在農業方面，這種情形實際上只能到一定的程度。差異的發生，是由於在工業內生產範圍每次增大，即等於其本身具有一切優點——時間、費用、材料的節省，監督的便利等等——的生產力之繼增的集中。反之，在農業上生產範圍每次增大，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即是，在同樣的耕種方法之下，等於企業面積的擴大，也就是說，等於在勞動力及物資的搬運上物資的損失，勞動力、工具、時間的耗費之增加。這些條件在

農業內有更大的意義，即這裏說到物資的運輸和它們的重量及容積——如肥料、乾草、稻稈、裸麥、馬鈴薯等的重量及容積——比較價值很小，而運輸的方法和工業比較在這裏又是很原始的。地產愈廣，則監督各個工人亦愈困難，這種情形在僱傭勞動制之下是應當考慮的。

這些損失如何和地產的增大一同增加，——丘寧所製的表就說明這種情形，我們在這裏且引丘寧的這個表，以公尺為單位並化為整數來表示。丘寧計算了各塊土地的地租，這些土地（以公頃為單位）離家各有不同的距離：

土地離家底遠近 (以公尺為單位)	裸 麥 底 收 成				
	25公頃	23公頃	20公頃	18公頃	15公頃
	馬		克		
0	23	19	15	11	7
1,000	17	15	11	7	4
2,000	14	11	7	4	0
3,000	10	7	3	0	
4,000	5	2	0		
4,500	0.5	0			
5,000	0				

從這裏，自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地產愈小則農業經營收入愈多。但這顯然不是這樣。大生產的利益有這樣大，即它們除彌補遠距離所受的損失之外還有很多盈餘，但這也只對於有一定大小的面積才是如此。在某一廣大限度的生產內大生產的優點把因距離的遠近所受損失除去，就增加得不多，假定從這一點開始，地產面積每次繼續擴大就會減少它的收入。

一般說來，我們很難正確地規定發生收入減少情形的那些界限。



對於不同的技術及土質條件以及對於不同的生產部門，它們就各不相同。繼續進化就有一種趨勢把這些界限衝破；在這一方向內，例如，汽力及電力或輕便鐵道當作動力用就有這樣作用。反之，其他傾向則表現出縮小地產的最大限度的趨勢。一種經營，和它自己的面積大小比較，需要人或力畜愈多，肥料、土地生產物、機器及笨重工具等重物的移動愈頻繁，則遠距離的影響亦愈易感覺到。我們可以說，經營愈集約，投入同等地面的資本愈多，則地產之最大限度的擴張——超過這個限度，他的收入就會減少——亦愈小，但是這個規律時時為技術的發展所破壞。

地產內的經營愈是集約化，則在投入經營內的資本底一定數量之下經營所佔的面積亦愈小，這個規律在相同的方向內也發生作用。精耕細作的小地產其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大企業，比粗耕的大地產還大。僅只提到為經營所佔面積的大小，這種統計，仍舊使我們完全不知道，地產面積的偶然減少是否為它的實際變化所引起，抑為經營的集約化所引起。森林業和牧場經營宜於最大的擴張，前者既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中心地點又不需要使木材堆積其周圍的任何木廠，在森林業的粗作形式下，森林的砍伐及運輸乃是森林業所需要的唯一工作。木材並不感受氣候變化，也無須把它藏在倉庫內。在把它運到市場上去的有利的時間和情況未到來的時候，就把它仍舊放在砍伐的地方。將木材沿河漂流的時候，它自己會向前移動。

牲畜放在牧場上，最低限度，在優良的氣候下，像森林中的木材一樣，不大需要人們供給食物，也不需要特殊的安頓；活的牲畜比木材更便於運輸。

在市場充分發展的地方，森林業和牧場業，像我們已經看見的，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底最初形態，目的在於開墾土地。它們既不需要機器，也不需要受過科學教育的管理人，又不需要預先積累資本。

對於它們只需要各個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替自己壟斷森林及牧場的地面並強佔農民的私有財產。在許多情況對此有利的地方，就常常發生這種情形。

同樣在勞動力少而土地多的殖民地內經營林木業，尤其是牧場業，就構成農業中資本主義大生產底最初形態：美國、阿根廷、烏拉圭、澳大利亞，情形就是如此。個別牧場的土地在這裏往往達到和德國侯爵領地一樣大的範圍。在澳大利亞曾經有過這樣的情形，即在一個經營內剪羊毛的羊一年有二〇〇、〇〇〇頭。

農業經營就其範圍而言，比林木業和牧場經營更受限制。

但是在這裏最大限度的和中等的粗耕經營規模都超過精耕中的那些經營底規模。北美洲生產小麥的經營是粗耕達到了最大限度的；在這些經營內可以遇到粗耕經營與高度發展技術應用的特殊結合。

以前，未開墾的土地非常之多，又不歸何人所私有，經營農業者可以選擇最肥沃的土地，從其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收成，隨後，使自己的全部土地枯竭以後，就把它遺棄而轉到別處去。供此種游牧式的耕種之用的，有優良的工具及高度發展的工業機器，因為購買土地沒有任何必要，農業經營者就可以將自己的全部資本用來購買這些補助的技術工具。

像這一類的經營並不需要肥料。這裏用不着飼養許多牲畜，而在氣候許可的地方，也無需將牲畜飼養在廄內。換種制也沒有必要。年年耕種一種同一的生產品——大部分是小麥——這已是真正的小麥製造廠。在這樣條件之下，有些地產達到了極大的範圍。達里姆勃、格賴恩這些先生們的巨大農莊達到了一〇、〇〇〇公頃以上，這是人所周知的。

反之，在英國，由於精耕，需要飼養很多牲畜，由於換種制及強度施肥，五〇〇公頃以上的農莊就為數很少，而一、〇〇〇公頃的地產

則是最大限度的地產。

美洲的小農經營，像資本主義的大經營一樣，就面積的大小而言，也的確是超過歐洲小農的地產。

在德國佔地二〇———〇〇公頃的農民，一般講來就算是富裕的農民。德意志帝國在一八九五年時；在五、五〇〇、〇〇〇農業經營中的情況如下表：

佔地面積	2—5公頃	5—20公頃	20—100公頃
經營數	1,016,318	998,804	281,767

美國一八九〇年時在四、五〇〇、〇〇〇農業經營中的情況如下表：

佔地面積	20—50英畝 (8—20公頃)	50—100英畝 (20—40公頃)	100—500英畝 (40—200公頃)
經營數	902,777	1,121,485	2,008,694

這樣看來，美國大多數農民的地產就其範圍而言，不亞於德國貴族的地產。

一旦全部土地開始變為私有財產，肥沃土地底過剩已消失時，則這樣粗耕經營底基礎也就消失了。農業經營者必須採取換種制來代替換位制，必須以肥料(需要飼養很多的牲畜，並將牲畜飼養在廄內)來代替掠奪式的耕種。對於像從前一樣的土地面積，農業經營者現在就得投下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如果農業經營者既沒有充分的勞動者，又沒有充分的資金，那他就必須縮小生產。許多大企業的規模也就減少，而巨大的農莊也就完全不能提供利潤。美洲現代農村經濟的發展其情況就是如此。在這個方向內無疑是有這些趨勢的，雖然並不像最近幾年人們所斷定的那樣大。因此，我們還不能說美洲大的農業經營已“將近完結”；上面所引的統計數字也明顯地指示出這一點。

雖然如此，我們可以假定，美洲的農業經營，如果最後過渡到歐

洲的生產方式，那它也會採用歐洲一樣大的企業面積。即使技術的發展，例如，農業中電氣的採用，並未創造出新的條件，——這些條件在精耕的時候打破大地產底最大限度的界限，巨大的農場在那時也會完全消滅，大經營也不會超過一、〇〇〇公頃以上，而農民的地產也會降到德國中等經營的程度。總之，面積範圍底縮小，並不表示小企業勝過大企業，而僅僅表示小面積上生產之更加集中，——此種集中，隨着而且必然隨着投入企業的資本之增加而來，隨着從事於這一企業的人數之增加而來，也就是說，隨着生產範圍之實際增大而來。

像從單純掠奪式的生產過渡到全靠土地肥沃之繼續保存的有計劃的耕種一樣，廣泛的牧畜經濟，為農業所排擠，在企業範圍保存或甚至增大的時候，就發展着中等範圍地產減少的趨勢。耕種要是為集約化的牧畜業（此種牧畜業在舊文明國家內還會向前發展）所排擠，在這一方向內也會發生同樣作用。

英國一八八〇年時，中等的牧畜業擴展到五二·三英畝，農業擴展到七四·二英畝。各類就其大小而言，佔有如下的面積：

每一類經營的土地面積所佔百分數如下表：

	50 英畝以下	50—100 英畝	100—300 英畝	300—500 英畝	500—1000 英畝	1000 英畝以上
牧畜業	17.2	18.9	43.7	13.8	7.2	2.2
耕種	9.9	10.2	37.8	21.4	17.0	3.7

很顯然地，如果像英國所發生的一樣，農業縮小了，並代之而起的是集約化的牧畜業，那末這種場合一定會引起農場面積減少的趨勢。但如果根據這一點就得出大生產沒落的結論，那末這一類的判斷未免太膚淺了。其實，新近的數字並未證明農場面積的縮小。一英畝(這樣的面積也只是在一八九五年才登記的)以上的農業企業，其平均數在大不列顛一八八五年時為六一英畝，一八九五年時為六二

英畝，也就是說，這種平均數一般講來，是稍稍增加了。

厄爾巴以東，過渡到更集約的經營，的確也引起大地產耕種面積的縮小。柴林格在其“論德國東部之拓殖”一書中說：“我國大地產，大多數都太龐大，以致不能在全部耕種面積上進行圓滿的經營。它們是在這樣的時期發生和發展起來的，當時一般的經濟條件對於每一塊土地還不需要資本與勞動力的集中，資本與勞動力的集中，現在對於個人經濟或國民經濟才成爲必要。所以邊疆地帶往往佔總面積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現在差不多都用粗耕式的方法耕種着，在這些土地上種植扁豆，或者多年用作牧場。在波美拉尼亞用集約經營方法耕種的地產內（並不是特別豐饒的土地），距離主要田宅在兩公里以上的耕地，據一般的意見，已經得不到什麼利益……，由於地產很大，生產資本的缺乏就成爲普通的現象。

所以，地產面積底減少（將距離最遠的土地出賣或租給小墾殖農）可以在兩方面提高土地底生產率。由於拓殖可以在同一面積上增加經濟中心的數目，即可能將完善的耕種法應用到離地主田宅較遠，直到現在還不能滿意耕種的那些土地上。在其餘的土地上，那時就可能投下大量的勞動力和資本。這樣看來，所有者既減少他的負擔，又可得到同一的或甚至比以前他們耕種自己全部地產時更多的收入”（見該書第九二、九三頁）。

其結果厄爾巴以東，大地產的數目就減少；小農經濟却隨之增加，但不能由此就說大生產爲小生產所排擠。只能說，從前地產的範圍適合於粗耕經營底需要。

## 五 大地產

從整個情況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涉及土地面積統計的

一些赤裸裸的數字還少有證明。第二，土地集中過程，在地產面積擴大情形之下，其本身比在資本的積累與集中情形之下更加困難，除了已有的條件之外，對於每一個個別的企业還有一定的界限。

只有在租佃制佔優勢的地方，大地主才企圖無限制的擴大自己個別的地產。在那裏企業與地產就不一致。每一個擁有大地產的地主並不把它完全讓給企業家，而是把它分成小塊，使其對自己更為有利。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僅要與租地上最合理的經營相適合，而且也要與承租人底資本的實力相適合。在地主自己靠僱傭勞動者來耕種自己地產的地方，在地產與企業相一致的地方，那裏集中的趨勢——也僅僅是地產化為整數並保證有充分數量的土地而已，——表現在不是趨向地產底擴大，而是趨向新地產底獲得。

這種趨勢在某些條件下很有力地表現出來。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在其很有趣味的“論地租之降低”一書中就提供我們一個卓越的例證。他以極大的注意力去研究波美拉尼亞大地產底發展，並發見了當地富有的地主貴族中有六十二個地主在一八五五年時佔有二二九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時佔有四八五個地產，其面積為二六一、七九八公頃。這六十二個地主的家屬，在一八九一年共計有一二五人，在一八五五年佔有三三九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佔有六〇九個地產，其面積為三三四、七七—公頃。其次，有六十二個小康的地主(貴族)在一八五五年佔有一一八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佔有二〇三個地產，其面積為一四七、一三九公頃，最後，富裕的資產階級出身的三十五個地主，在一八五五年佔有二五個地產，而在一八九一年則佔有九四個地產，其面積為五四、〇〇〇公頃，而他們家屬的全體成員，有四十七個人，在一八八五年總共有三〇個地產，在一八九一年有一一〇個地產。此外，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又引用佔有一八二個地產，其面積為一〇九、九五〇公頃的七十六個貴族地主，和佔有二九五個地

產，其面積爲一三一、一九八公頃的資產階級出身的一一九個地主的材料，可是對於他們從前財產的狀況並沒有指明。

這些數字指示出極其強烈的集中趨勢，在少數所有者方面表現得極爲突出。我們在其中可看出：

地主的姓氏	地產數		1891年	
	1855年	1891年	公頃	土地稅 (以馬克爲單位)
貝洛夫—沙勒斯基	1	5	4,047	33,046
杜格拉斯伯爵	—	6	1,592	22,815
克理貝—戴伯呂—狄特道夫	3	8	3,629	24,356
阿拉敏·斯拉根特伯爵	—	8	3,692	25,101
畢斯馬克伯爵	1	9	9,047	31,658
普來瑟—司徒霍夫	4	10	6,214	51,937
海琴—約爾根—卡特諾夫	6	11	4,635	103,969
霍亨佐勒·普馬林根侯爵	—	11	10,993	44,350
皇族	1	12	24,513	128,399
貝爾—涅金達克伯爵	6	12	3,696	104,318
拉金—波爾德維赤	3	13	4,183	95,332
貝爾—巴歇坦克伯爵	3	13	6,576	131,235
克拉凌夫—狄維斯伯爵	5	15	4,613	112,652
拉金·普魯根廷	6	16	2,648	68,355
普拉丁—奧司丁伯爵	3	16	10,520	79,845
佛來敏—貝瑟伯爵	13	24	14,258	107,794
普特布斯侯爵	53	85	17,113	302,892

柯蘭德 (Konead) 教授在其“國民經濟與統計年鑑” (Jahrbü-

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中發表了幾篇有價值的論文，題為“農業統計之研究”，這幾篇論文論述普魯士大地產的範圍。

他計算五、〇〇〇公頃以上的地主的數量：

	地產	屬於他們的土地總額 (以公頃為單位)	耕地及牧場 (以公頃為單位)
東普魯士	11	67,619	34,000
西普魯士	13	105,996	48,000
坡茲南	33	300,716	147,310
波美拉尼亞	24	182,752	102,721
西里西細亞	46	671,649	192,443

一八八七年在西里細亞很著名的四十六個大地產底所有者，他們佔有的合計不下八四三個地產。其中：

	地產	總面積(公頃)	土地稅
佛呂德里赫·威廉太子 (即後來佛呂德里赫帝第三)	19	8,889	118,959
佛里金塔爾(退職大臣)	24	9,090	106,740
阿爾伯特·薩克森親王	50	31,072	271,732
烏耶慈基大公	52	39,742	233,701
勃勒斯侯爵	75	51,112	324,042

所有這些材料無論如何都不是預示大土地所有權之“將近完結”。

關於奧地利大地產的範圍(每個大地產均由一些地產構成)，克蘭佛特在其“生產論”一書中載有如下的材料：

所有者的姓氏	地產之大小 (以公頃為單位)	組成部分
摩拉維亞瓦爾姆慈基大僧正的地產	54,500	?
佛蘭慈約瑟夫大帝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及下奧地利等處的地產	79,300	?



賽波—布赫海姆大公在匈牙利的地產	134,013	有 44 個農莊及 10 個森林區的兩個地產
斯瓦岑貝爾侯爵在波希米亞的地產	177,930	20 個地產
里赫登斯太侯爵在摩拉維亞、波希米亞及西里細亞的地產	180,900	?
阿爾布賴赫特大公在匈牙利及西里細亞的地產	192,181	72 個經濟區，780 處農舍，58 個森林地
愛斯特干侯爵在匈牙利的地產	431,700	35 個地產

這樣的集中，乃是少數地產轉移到一個人手裏的結果，正如經過抵押銀行的集中一樣，一點也沒有改變各個企業的範圍。但是前一形式的集中與後一形式的集中所不同的，就是管理之集中與地產之集中有密切聯系，這樣就發生新的生產形式——大地產。此種大地產，不是各個經營之無限制的擴大，它是現代農村經濟大生產發展的一種形式。而且這種形式也像資本的集中一樣沒有一定的界限。

用這樣的方法達到高度生產率，這只有在現代農業內才能想像。許多企業轉移到一個人手裏，遲早會把它們組合在一個共同的組織內，走向有計劃的分工和各個企業的協作。

我們從克蘭佛特（他因專門研究奧地利的大地產而著名）的“生產論”中（第一六七頁及其他各頁）摘引幾段就可以說明上述的情形。

“大地產（克蘭佛特稱之為 *Latifundia*）是由幾個被聯合的大地產或不正確地也稱為領地的土地構成的。因為大地產採取極大的範圍，若干地產就聯合為一組或一區。”

管理機關建立在下述原則上。所有主為企業的首腦，他或者親自領導全部事業，或者將全部管理權委託（這是常有的事）中央管理局。“一組地產或一區地產的監督則委託經濟顧問，或經濟監督人”（由於奧匈大地產高度的發展，克蘭佛特處處都使用當地的名稱。）——經濟顧問底活動就在於監督由中央管理局提出的或為中央管理

局所贊成的各個地產的組織計劃之執行……他(經濟顧問)主持每年舉行的地產全體代表會議,以便調整各個地產之間的相互關係,批准代表們關於去年盈利的報告,事先審查了這些報告並審查了用於下一年度經營的改善及改變的費用草案;他把這些報告及草案經過中央管理局提交所有主自己處理。

在一個同一組的地產內將一定的組織機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裏更加有效。即如,往往不得不將改善牲畜品種的工作佈置及動物繁殖的一般指導委託特別的專家(如牧羊業等等底監督者),這要看種畜種類之多寡而定。由於這樣的組織,就可以比指導權分散在許多人之間(直接執行飼養牲畜的責任總是要委託他們)的時候,達到無可爭辯的更大的結果。

爲整個集團的地產或全部大領地創立一個中心機關,也正如替已達到極大範圍的大地產底各個經營部門創立一個中心機關一樣。例如在大地產內,不得不替製糖工廠、釀酒廠及其他耕種技術的企業建立建築物,替全部大地產設置建築物建築的總管理處。這個管理局編製計劃及預算並監督建築物的施工。

正如不得不在林務總署下常常替全部地產設置林務視察所,對於全部採礦業則設置礦業視察所。

地產管理底各個部門之行動一致,是大地產組織底一個最有決定性的因素。一個目的就是儘可能榨取更多的利潤……除地產底組織以外還可以用別的手段來增加企業底收入。必須將當地一切社會的、氣候的以及地質的差異溶合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必須組織一切大的土地所有權。這樣的組織目的在使生產低廉,更合理地使用所得的生產品,達到管理的簡化而且更好地利用現有的補助工具。

由於生產資料的廉價,尤其是資本的廉價,即如大企業家容易取得信用借款,採用縮小勞動的機器,機器的採用,只有在大範圍的耕

種面積才可思議；這裏所說的是指農業用的汽犁，現代的運輸工具，爲農事及森林業等等之用的鐵道；應用完善的機器於各種不同的生產內；在各個地產之間分配各種植物的生產以提高它們的生產率等等，就可以達到生產品的廉價。把少數地產聯合起來，目的在替任何一種技術農作物企業在一貫的應用機器能力時能更有利地大規模生產原料，同樣建設苗圃、種子培養所、三葉草及其他草本的培養所於那些能生產出優良的種子的大地產和田莊之內，也可達到生產品的廉價。這些種子須特別仔細種植，因爲它們要被採用到其餘的地產內。藉助壓縮的方法，乾草、稻草甚至糞料也宜於運輸，這些生產物在某些地產內若有剩餘可以把它們輸送到對這些生產品感覺需要的地產內。

要使生產廉價，牧畜業必須照一般計劃組織。爲私人需要的馬匹飼養要在專門適合於這一目的的各塊土地上進行。牛的繁殖要集中在少數地產內，儘可能繁殖到足供其餘一切地產的需要；養肥牲畜在沿鐵路一帶，離技術農作物企業不遠的中心畜養場上，更便於進行。中心畜養場將從遙遠的地產供給未養肥的或甚至——善於利用現有的，但爲數不足的飼草——養得半肥的牲畜。要很好的經營牛乳業，最好是替許多農莊在某幾處設立一些榨油廠。節省管理應用離心的機器的大企業底費用，才能達到這一點。同時必須把動物的繁殖和榨乳業分開。

同樣在牧羊業內也需要劃分它的各個不同的部門，以適合於它們不同的經營目的。小羊缺乏就可以專門養一羣羊來繁殖它們。要想把某些地產內所得到的產品變爲現金，或者用自己的款項來加工或者銷到外邊才有可能，——在私人的磨粉廠、榨油廠、製糖廠、釀酒廠、鋸木廠以及其他工廠內製造它們，或者賣到市場上。爲要使生產品更有利的出售起見，就應當依靠自己或在別的企業家援助之下組

織各種運輸的供應，如：輕便鐵道和主要鐵道幹綫聯結的馬車道、運河等等。

管理底簡化是在一定範圍的地產及各個地產彼此間接近情形之下，可能的分工，來達到的。

合理地使用補助的力量以提高生產率，這當然是大地產組織下最重要的契機。要是某一個人對某一生產部門表現出特殊的能力，那就必把他召到那裏去，在那裏他就會表現出最大的生產效果。由於管理機關定期的更換，就可以預防經營墮落到舊有的形式。

像這類管理原則當然不能應用於無足輕重的（就它們組成的人數而言）管理機關方面。

凡是在大地產底各個組成部分彼此間距離很遠的地方，在組織大地產的道路上就會遇到上述意義上的最大的困難。另一方面，這樣組織底成功要在彼此緊密聯結的地產內才表現得特別有力。

在一切場合內，大地產底組織——人們很少或完全不注意農業底這一方面——是值得積極幫助的，因為在其往前發展的時候，由於農業科學不斷的發達，大地產底組織是被人當作左右大經營高度繁榮的一個因素。

有一個現代農村經濟的權威作家——老“實際家”而同時又是精明的科學理論家——在這樣巨大的企業內，而不是在農民的小經營內，看出現代合理經濟發展底保證。

但是巨大的生產在自己的道路上就遇到許多障礙，這些障礙對於大工業倒是少有的現象，這就是勞動者底缺乏。

## 六 勞動力底缺乏

廣大的市場，擁有資金和必要技術條件，對於資本主義大企業底

發生還是不夠的。即使這一切條件都具備，但如堅沒有被迫出賣自己勞動給資本家的無產勞動者自由流入，那末資本主義的企業就不能存在。

在一切舊文明國家內，城市工業並不感到勞動者的缺乏。無產者不斷增多，並以不竭的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的資本。

除此以外，城市的僱傭勞動，吸收着多餘的小資產者及農民，這些小資產者及農民已經不能成爲獨立的經營者，而同樣吸收着大批以前已被投入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小資產者和農民。大工業把他們拖到自己方面來，不管他們來自何處，來自城市或來自鄉村。

在農村經濟內情形完全不是這樣。城市的勞動條件使勞動者完全不適宜於農業勞動。誰在城市中生長或從小在城市中居住，那他對農業經營就喪失了能力。在現代的條件下穀物耕種不能由城市工業無產階級隊伍中來補充勞動者的缺乏。

但是農業大生產在現代條件下也不能替自己創造並加強僱傭勞動者數量必要的增加。

我們在使農業和現代工業有嚴格區別的特殊情況中發現出這種現象底原因。在現代工業內，它和中世紀的工業不同，生產本來就完全和家庭經濟分離。在中世紀的手工業內——就在現在在它的殘餘形式內，生產和家庭經濟也還或多或少結合在一起。在行會時代手工業工人屬於老板底家庭經濟內，是他的家庭的一員。勞動者在未開始獨立生產，未成爲老板以前，不能安家立業，不能結婚。

反之，在現代工業內家庭經濟與生產是分開的。這裏勞動者可以安家立業，並不要成爲獨立的勞動者，而且我們知道，它大大地利用這樣的可能性，增加僱傭的無產者，僱傭的無產者現在成爲一個特殊階級。但是家庭經濟與生產分離，起初使無產者成爲沒有工作的自由人，並使他有可能具備這樣的特性，這些特性使他能夠奪取和維

持國家政權。

僱傭勞動者從前就有了，但他們沒有任何可能養育自己的兒女，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私有的家庭經濟、自己私有的家庭。他們是手工業老板或小農的兒女，而且只有做了老板才能養育自己的兒女。手工業者幫工像大學生一樣，不受妻室兒女拖累，是一個能同政府和老板鬥爭的階層；但是像大學生一樣，他們很少能設想到要在國家內代表一種政治力量並建立一個和自己階級利益相適合的社會。只有現代的僱傭無產者有私有的家庭經濟，有兒女，而兒女們命定地仍舊是無產者，才能在頭腦裏產生這種思想。

但是在工業方面已經過去的事情，在農業方面却還有它的力量。農業和家庭經濟緊密地聯系着。任何一個農業經營都有私有的家庭經濟，同樣在農村中沒有一個堅實而牢固的家庭經濟不和農業經營聯系的。

這種情形一部分為人口的稀少性所決定——和城市人口集中的情形不同。營造出租的住宅在農村中是不可能的；小經營者並不出租住宅或從事於出租房屋當作一種副業。

首先一眼就看到，正是在小生產內，家庭經濟與農業生產之間有密切的經濟聯系。後者大部分是為家庭經濟的直接消費而生產的。另一方面，家庭經濟的廢物都供作肥料和牲畜底飼料，而對於照管牲畜，就需要被指定做這件事的人經常在場，也就是說，他們屬於家庭經濟的等等。

僱傭勞動者底地位在這樣條件下，在農村中就具有與城市中完全不同的性質。完全喪失了私有財產的僱傭勞動者，有自己私有的家庭經濟，這在農村中是例外的現象。僱傭勞動者在農業大經營內一部分是大經營的家庭經濟的成員——僱農和女僱農；他們要是有私有的家庭經濟，他們一般地就是獨立的農業經營者，在自己的或租

來的土地上進行經營；他們只是拿自己一部分勞動時間去從事僱傭勞動，而其他一部分則在自己的經營內工作。

所謂“代理人”(Deputante)，除獲得常年工資外，還得到一些實物贈予和一塊土地，如經營內的住宅，他們佔有特殊的中間地位。而“長工”(Insteman)，同樣在東厄爾巴大地產內以勞動者資格起着重要作用。他們住在主人的莊園內，可是有私有的住屋，他們獲得自己勞動的報酬，此種報酬，一部分像代理人一樣，是一定量的實物及一塊他們自己必須耕種的土地，一部分是工資，但不是像代理人的常年工資，而是日工資或包工資(收益的一半)。

“完全喪失了私有財產的任何一個勞動者都不能變為長工。首先指定給他的住宅通常都沒有家用器具；而長工就一定要供給必要的勞動工具，如鐮刀及打禾棒。但是要做一個長工正如僱工要結婚一樣，首先要擁有一頭牛或最低限度要擁有一頭或幾頭羊，如果主人不貸款給他們去購買牛羊的話。最後，長工對於分配給他的那塊土地的耕種也必須能夠供給必要數量的種子，至於糞料更不用講，他必須從他自己的牲畜取得這種糞料”(馬克司·威伯博士[Max Weber]：“德國農業工人狀況的調查”[Enquete über die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 in Deutschland]，第三卷，第一三頁)。

長工成為僱工與租佃人之間的中間階級，但大部分都不及僱傭勞動者；這是封建時代底殘餘，當時土地所有者不會用另一種方式從土地中取得收入，如將土地租出以取得一定的貢賦。他不能和現代資本主義農業及高度地租相調和。例如，在薩克森(省)甜菜種植便引起長工階級的消滅。

德國西北部的“僱工”(heiermann)，很接近於東北部長工的狀況。“僱工”是家庭的農業勞動者，他們以相當租金從僱主手裏租得一間住宅和一塊土地，此種租金往往比當地普通租金低一半，因此他

也就不得不在某幾天內任隨主人去支配他的勞動力，至於多少天，這在各區各不相同，“甚至在不同的地產內，每日所付適當的租金往往比當地普通租金低一半”（見凱爾格爾博士[K. Kärger]：“論農業工人底狀況”〔Die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第一卷，第三頁）。但是封建時代底這種殘餘，也像長工階級一樣歸於消滅。

除了勞動者的這些範疇以外，我們又看到被僱於農民的“自由的”喪失了私有財產的日工、“幫工”、“自由人”、“佃農”——只要在他們找到僱主的地方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們更接近於城市的僱傭無產階級，但和城市僱傭無產者總還是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是別人家內的附屬物，而“永遠在別人的屋簷下過活，同樣在農民當中，又是經濟破產的根源”（威伯，同上書，第三八頁）。

這樣的條件不會助長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固定在土地上。僱農大部分一開始就沒有可能結婚和成家立業；在這樣條件之下兒女對他是既累贅而又不愉快的負擔。自然，性的要求並不因此消滅，但性的要求往往用不自然的方法來滿足以便避免生育。但如果自然造化比一切人工預防的方法更有力，那末不幸的母親有時竟不顧犯罪而去打胎。她很知道，——以後，無論是她，無論是她的小兒都不會有光明的前途。私生子的境遇都是最不幸的；他們的大部分早就死亡，而其他一部分，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後來都坐監牢。

在宗法制的自然經濟關係還佔統治的地方，例如在阿爾卑斯山地區許多大農家庭內，女工的兒子像她自己一樣被認為是家庭經濟的成員。他和農民主人的兒女一同長大，和他們一桌吃飯，只有在他去工作的時候，社會地位的差異才表現出來；只有在那個時候，他才像他的母親一樣，成為僱傭勞動者。

但是在商品生產及純僱傭關係已獲得統治的地方，女工的兒童就成為可厭的負擔，她們在最初的可能情況之下就想擺脫他。



土地所有權底集中如何影響於私生子的數量，費克 L. Fick 關於巴威農業人口當中私生子數量的研究曾指示出來（見他的“論巴威法律上規定的農民遺產制度”〔Die bäuerliche Erbfolge in rechtsrheinischen Bayern〕一書）。他在第三〇七頁上說：“如果我們按照私生子的人數加以區分，那末我們就得到如下的結果，這種結果對於確定土地私有制與非婚生育關係之間的聯系不是沒有趣味的。

	一〇〇個非婚生育中的 私生子	一〇〇個居民中有 土地所有權的人
第一類	3.4—5	28.2
第二類	5.1—10	20.2
第三類	10.1—15	17.0
第四類	15.1—20	15.5
第五類	20.1—25	13.3
第六類	25.1—30	14.9

自由的日工，——他們沒有私有的家庭經濟——幫工對於養育後代稍微有較好的條件。

只有在小地產底所有者（或承租人）當中，將獨立的家庭經濟和獨立的農業經營結合起來，在農村中才有最好的條件，來養育多數能勞動的後一代。這樣的所有者不僅有充分的勞動力以備自己的需要，而且還有剩餘的勞動力。他們或者自己像僱工一樣（他們的私有經營並不能耗盡他們的全部勞動力），以日工的身分而被僱於大經營內，或者——這是在所有農民方面、僱工方面可以觀察得到——他們的兒女（是多餘的勞動者，並不將自己的勞力用在家庭經濟內），以僱傭勞動者或日工的資格，準備為大經營服務。

製造新勞動力的這些熔爐在大生產發展而小生產被排擠的地方，就逐漸消滅了。大經營以排擠農民來擴大自己的土地面積，但它却減少了對於土地耕種所必需的人數。單就這一點來說，大經營在

其一切技術的優越條件之下，也永遠不能够在國內達到特殊的統治。大的土地所有制能够從土地上驅逐一切自由的農民，但他們的一部分又會以小的租佃者資格而重新死灰復燃。何況大的土地所有制底獨裁並不能引起大經營底獨裁。

甚至在大不列顛一八九五年時五二〇、一〇六農場中佔地不到五英畝的農場，不下於一一七、九六八個，佔地五一—一二〇英畝的農場，有一四九、八一八個以及佔地二〇——五〇英畝的農場，有一八五、六六三個；也就是說，小經營佔了極大的多數。

在小生產遭到太大排擠的地方，大生產就成爲更少收入的生產並開始衰落下去。現時常常可以看到這一類的現象；這種現象激起許多優秀的農業理論家宣稱“農業大生產將近完結。”但這等於是把嬰兒和髒水從浴盆裏一道潑出去。的確，在某些情況之下勞動力底缺乏引起大經營底沒落，引起小經營數量底增加；小經營底增加或者由於大地主或大農將自己地產底一部分分割出賣，或以零塊的土地分租給小經營者，或者由於一切大地產任意拍賣及分裂爲小地產。

但無論小生產爲大生產所排擠，或是相反的過程，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界限。即如小農業經營者人數和大經營的一同增加，於是受大生產支配的勞動力數量亦隨之增加，而大生產底活力，及其對小生產的優越性亦隨之增加。在許多小經營和大經營一同發生的地方，向大經營發展的趨勢，又重新表現出來，不言而喻，因爲破壞的因素，例如大工業移置到農村內，並不遭到反抗。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我們不能期待大的農業經營底完結，猶之不能期待小農業經營底完結一樣。

這與“馬克思的教條”一點也不矛盾。馬克思早已承認了這一點。在“新萊茵報”（一八五〇年）第四期上他曾評論愛米爾·席拉金的“社會主義與賦稅”（Le Socialisme et l'impôt）一書，在這本書內曾

提議徵收資本稅，他說資本稅“從收入少的土地中抽出資本到更有收入的工業方面，就引起了地價底低落，土地所有權底集中，把英國的大經營連同英國一切發展的工業移植到法國來。”馬克思對這種說法反駁道：“英國的集中，以及英國的農業，其發生不是由於從土地中抽出資本，而是剛剛相反，由於工業資本吸收到農業方面來。”他並且繼續說：“土地所有權底集中，在英國完全掃蕩了整整幾代人。同一集中過程（資本稅自然是促進了集中），由於農民的迅速破產，在法國把大批農民趕到城市，並因此使革命成爲不可避免。最後，在法國如果由碎分轉變到集中，已經開始了，那末在英國大的土地所有權却沿着從前的道路大踏步向碎分的方向走，就確定地證明了：當資產階級關係一般地存在着的時候，農業必然不斷地在土地集中與分碎底這個圈內打轉。”

這種循環，自然不像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時（當時他還重視革命迅速發展底能力及速度）所斷言的那樣迅速和急劇；技術和科學底發明允許經營增加的趨勢，在英國存在得比馬克思所期待的更長久；這種趨勢才停下來不久。另一方面，一些相反的趨勢發展了，我們還得要認識它們，這些趨勢妨礙着已被分碎的土地私有權底集中。

但是馬克思指示的這種趨勢，只要在集中或分碎超過了一定限度的地方，就到處存在着和出現着。

大多數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覺得農業中大經營與小經營底混合，是很有希望的。只有少數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及社會主義者才提倡小經營完全排擠大經營。“佛呂德里赫·李斯特(Fridrech List)及在他之後的席慈(Shitz)、魯謨爾(F. Rumor)、貝恩干爾(Berngard)、漢生(Hasen)、羅賽爾(Roshel)以及許多其他的人已經表示了一種意見，以爲在一定條件之下，——在私有財產統治及自由競爭制度之下——正常財產分配底理想在於大、中、小地產之正確的混合，在這種

正確混合之下,大地產是金字塔的塔頂,而小地產則是金字塔的基礎”(邁斯柯夫斯基[A. Miaskowski]:“德國承繼權與土地所有權”[Das Erbrecht und die Grundeigentumsvertheilung im Deutschen Reich],第一〇八頁)。不久以前布亨貝爾格在其新著“土地政策綱要”(Grundzüge der Agrarpolitik)一書中也發表了這一類的思想。所有這些經濟學家都說,大的土地所有權是必要的,它是技術進步及合理耕作底體現者。大農是很有希望的,就政治方面而言,私有財產底支柱,主要是大農而不是小農。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經營遠勝於小農的經營。小農也是必要的,因為它是勞動力的最好供給者。凡是在大經營過分排擠小經營的地方,有遠見的保守黨的政治家及大地主們現在甚至竭力用國家的和私人的手段來重新增加小經營的數量。

柴林格在“政治學辭典”(補遺一)中寫道:“在大地產極其發展的歐洲各國,不久以前,在工業革命極度排擠農業勞動者到工業區域,農業危機及債務底壓迫之下,發生一種運動企圖有計劃的建立新的並圍圍太小的舊式農民的地產,來增多農村中農階層,使農業勞動者固着在土地上,分配給他們土地。德國、英國及俄國差不多同時頒佈了一些適當的法律,而在意大利及匈牙利這問題也已經擺在面前。”

這裏就涉及一八八六年普魯士所頒佈的獎勵德人移殖波森及東普魯士的法律,和一八九〇及一八九一年藉國家信用貸款及政府幫助組織納租地產的法律。柴林格關於這種立法底成就,說道:“我們可以承認,由於納租地產底組織,農民在這一世紀期間因土地底自由轉換(在東部六省總計有一〇〇、〇〇〇公頃),只有利於大地產,因而失去了的那麼多的土地又回到了農民階級手裏。”

這種人爲的創造小經營並不強迫大地產違反它的意志去加以接受。不,這種人爲的創造是政府和國會底事,除貴族地主底幸福外,沒有什麼事值得他們關懷的。

郭爾慈說：“大地主，只要在自己的周圍有大量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地方就，獲得最大數量的純收入，中小土地所有者以勞動力供給他，並且是他所生產的剩餘生產品底可靠的買主”（“農業參考書”〔Handbuch der Landwirtschaft〕，第一卷，第六四九頁）。

由此我們可以說，在近代社會中大地產要消滅小地產或完全排擠小地產是談不到的。我們已經看見在土地所有權集中進行得很遠的地方，就有碎分的趨勢，國家和大地主自己都幫助它，如果這種趨勢碰到太大障礙的話。

但正是大地產底這些意圖證明給我們，沒有再比那種意見更錯誤的了，那種意見認為小經營底保存是它比大經營有更穩固性的結果。小經營的保存勿寧說是小經營已不是大經營底競爭者的結果，已不是大經營和它們一同生產的那些農業生產品底出賣者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大經營和小經營一同發展起來的地方，小經營已不能起着農業生產品出賣者的作用。這裏小經營從生產品底賣者變為大經營“生產得過多”的生產品底買者；小經營自己生產得過多的商品，正是大經營所特別需要的那種生產資料——勞動力。

在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的地方，大的農業經營和小的農業經營，並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制約，像資本家和無產者一樣，——而且小農業經營者也就更加具有後者（無產者）底性質。

## 第八章 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 一 土地碎分的趨勢

我們在第二章內已經指出，專供自己消費的農民工業底破產，迫使那些不能生產出超過他們自己和他們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底剩餘的農民出外謀生。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小農須有必要的時間，因爲私有的農業經營只是有時需要他的全部勞動力。他不是以出賣剩餘生產品，而是以出賣剩餘勞動力來滿足對貨幣的需要。他出現在商品市場上好像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作爲一個土地所有者，一個在自己土地上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者，他就不是爲市場勞作，而是爲自己的家庭經濟勞作。我們已經看見，他的經濟活動和這種家庭經濟是有着密切聯系的。

但是競爭底規律不適用於家庭經濟。大的家庭經濟無論怎樣優於小的，小的家庭經濟無論怎樣浪費勞動力，我們却從沒有見有傾向於集中底痕跡，傾向於許多小的家庭經濟爲少數大的家庭經濟所代替底痕跡。

自然，家庭經濟不會不受經濟發展的牽動，但是這種情形在這裏僅表現爲一個個的功能從家庭經濟中分離出來並成爲獨立的生產部門。家庭勞動數量顯然因此減少，勞動者人數也隨之減少。因爲就家庭經濟底大小來觀察進化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演進過程，完成

於與商品生產底進化直接相反的方向中，即完成於從大經營到小經營的方向中。

我們發現在中世紀大的農民的家族公社，就在現在還有些民族有這樣的情況，它們的農業還處於中世紀階段。例如，南部和東部斯拉夫人就有這樣的農民家族公社。

如果小農的農業經營處於商品生產底範圍以外，如果小農的農業經營僅僅成爲他的家庭經濟底一部分，那末它仍舊在現代生產方式集中傾向底勢力範圍以外。他的這種細小經營無論怎樣不合理，無論怎樣無利益，他總是牢牢地抓住它，正如他的妻子抓住自己可憐的家庭經濟不肯放手一樣。在這種家庭經濟內費了很大的勞力，而所得的是無限貧困的結果；但要知道這是使他們不用去服從別人的意志和避免剝削的唯一領域。

但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愈往前進展，則農民對貨幣的需要以及國家和公社向農民的徵取亦愈增加。小農對於獲得貨幣愈感迫切，則他亦愈重視謀生而忽視自己的農業。小農底僱傭勞動或資本主義式地被剝削的家庭工業，像工業中婦女底僱傭勞動一樣，會使他的家庭經濟惡化下去，但不致完全消滅。他的農業經營成爲更不合理，同時在他覺得這種經營過大，他不得不將它縮小。

他很容易找到對他不需要的小塊土地的買主。

在強大的農民階層佔優勢的地方，這一階層就調節着人口，這種性質再加上對軍隊的崇拜及保守的情緒構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所讚美的最重要的理由。農民階層對於無數後代底繁殖和教養是很適宜的；在需要勞動力和軍隊的地方，它更有無上的價值。然而它也能限制人口底增加，這一點倒很能中馬爾薩斯派的心意；在農民經濟佔統治地位而沒有其他謀生之路的地方，那裏土地的有限性就不得不限制後代底數量。這種情況在平分遺產的時候，用所謂二子

承繼制 (Zweikindersystem) 實現，而在遺產只傳給一個承繼人的時候，就使其餘的子女失去獲得獨立性，處理私有經濟及生育合法的有承繼權的子女的可能性。

在原有的農業經營以外，還有很多機會可以謀生的地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這裏人口底增加隨着生活條件而更加成爲無產化了；這裏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自立，在這樣條件之下每個小孩一生下地帶來極重要的遺產，就是一雙手。人口迅速增加，同時對於土地的需要亦隨之增加，但並不是把土地當作出賣的生產資料，而是把它當作自己家庭經濟底基礎。如果出外謀生使個別農業經營的縮小成爲可能，甚至成爲必要，而且因此造成大多數小經營同時生存底可能，那末，另一方面它也能引起人口迅速的增加，人口增加又趨向於這類小經營數目底增多。

這裏分碎代替了集中。在這樣情形之下事情甚至會達到大經營底分碎。

我們在第五章中已經看見，供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用的每塊土地底價格是由它的地租來決定的。一般講來，它的買價等於資本化的地租。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不肯付出超過這個數量的價格；否則，他的利潤會降低到普通水平以下。競爭通常並不能將價格提高到這個常率以上。我們在這裏不考慮到那些將地產價格提高到資本化地租以上的非經濟性質底原因。

農民則是另一回事，農民不是資本家，而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者，雖然他出賣農產品，但他並不需要，或在很小限度內需要僱傭勞動者。他自己就是勞動者，他不是靠自己財產底收入而生活，而是靠自己勞動底收入而生活，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僱傭勞動者底生活方式。他需要土地是當作一種手段，以自己的勞動去掙錢過活，而不是當作一種手段去獲取利潤或地租，即使出賣產品得的進款，除了一切開支之



外只剩給他工資，他也可以生存。他可以放棄利潤和地租。所以農民支付地價在簡單商品生產階段上(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時候)會比在資本主義生產階段上所支付的要高些。這樣的打算，自然有時會把農民引到極其困苦的境地，尤其是在他還保存着簡單商品生產者底習慣——支付過多的地價——的時候；其實，他當然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企業家，而是作為被資本剝削的勞動者，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實際上已經經過了簡單商品生產的階段，而進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底階段。在農民購買土地，但並未付清或未完全付清地價的地方，在抵押債務仍舊保留着的地方，他就得從自己的經營中不僅抽出工資而且要抽出地租；太高的地價對於他就如對於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一樣是有害的。地價高對農業經營者有好處，只是在他不再做農業經營者的時候，即在他出賣自己地產的時候。在他想弄到土地的時候或正從事經營的時候，地價高對他是有害的，而且增加他的付款。我們的地主黨人只知道那些能提高地價的方法去拯救瀕於危殆的農業。這些儼然宗法社會的先生們，他們不是像農業經營者去打算，而是像土地投機商人去打算。關於這一點我們還要說到。

在那些小農業經營者方面，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農業經營完全是或主要是供家庭經濟之用，而對貨幣的需要，則以替別人勞動來滿足。這裏地價與商品生產，也就是說，與價值規律之間的一切聯系，至少對於買主是消失了的。資本化的地租對於賣主就構成土地底最低價格；買主只計算自己的購買力而首先計算自己的需要。人口愈迅速增加，人口的移出愈感困難，作為滿足生活需要或社會的獨立底基礎的小塊土地的需要愈受強制，則土地底買價（也就是說租價）亦愈高。農業經營中的勞動和家庭經濟中的勞動為自己消費的都不算作費用；因為這種勞動不值什麼。凡是供給家庭經濟的土地耕作都算是純粹的盈利。要計算生產品底貨幣價值並將它劃分為工

資，資本的利息及地租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都沒有人那樣做，因為貨幣在這種經濟中不起任何作用。

小地產相當地貴於大地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象。邁岑在前面我們講過的關於普魯士的抵押債務的論文中(吉勒：“農業年鑑”，一八八五年)指出，大地產底價格，超過為徵收土地稅而計算出的純收入五十二倍，大農底土地價格為六十五倍，小農底土地價格為七十八倍。

有些小土地所有制底崇拜者引用了地價底這種增高來證明，農業中小經營優於大經營。但甚至在小經營底最熱烈的崇拜者當中，誰都不敢鄭重地說及最小土地所有制優於中等的土地所有制；而這種優越要是存在，土地底最高價格將是土地底最高生產率底結果。

小地產底最高地價，就在城市中，亦可看到類似的情形，大家都知道，城市中的住宅，較一立方容積愈小，則地價愈貴。在依西特爾·新格爾(Isidor Singer)等人指明了這一點以後，蒲希爾(Bucher)用巴西兒(Basel)的數字來證實這種現象。在這個城市中住宅底一立方公尺值：

一間的住宅	4.04法郎
二間的住宅	3.95法郎
三間的住宅	3.56法郎
五間的住宅	3.36法郎
六間的住宅	3.16法郎
九間的住宅	3.21法郎
十間的住宅	2.93法郎

兩種現象——過高的地價與過高的房價——一部分地可歸結到一個同一的原因，即歸結到要求小塊土地或窄小住宅的和對土地壟斷者只能表示微弱反抗的人們的迫切需要；誰把小塊土地底過高價格歸結到它們的較大生產率，他就一定把窄小佳屋底過高價格歸結到

房屋住居者底最高收入。

很顯然地，凡是在人口底增加及在自己農業經營以外出外謀生底條件有利地形成着的地方，小地產底過高價格就成爲大地產細分底強有力動機。地產底分割與土地所有權底分碎在這些地方都能够達到很大的限度。

土地財產愈小，則向外謀生的意願亦愈強；後者愈佔重要地位，則地產亦愈小，但同時它們却愈加不能彌補家庭經濟底需要；還應當注意到，在這種過小的地產內，經營是進行得完全不合理的。牲畜和農具底缺乏使土地合理的耕作，即使深耕成爲不可能；家庭經濟底需要，而不是土地肥沃底保存决定着被耕種的植物底選擇；牲畜與貨幣底缺乏，也就是糞料和人造肥料底缺乏。此外還要加上人的勞動力的缺乏。

爲金錢而勞動愈佔首要的地位，爲家庭經濟而勞動成爲次要的事，則前者（爲金錢而勞動）更有力地吸取着家庭中最好的勞動力，有時正是在自己的經營特別需要它們的時候，例如在收穫的時候。自己小塊土地底耕作，就更加委之於婦女、小孩或殘廢的老人；父親和大孩子們不得不去“謀生”。像無產者底家庭經濟一樣，成爲家庭經濟底簡單附屬品的細小經營的農業，是以女主人勞動底極其浪費及疲憊底代價來達到最可憐不過的結果。

這種極小的農業經營愈加縮小和愈趨窮困，就使它愈加不能補償家庭經濟底需要。掙得的工資現在當然不僅用來繳納國家及公社的賦稅和購買工業生產品或外地的農業生產品如咖啡、煙草等等；而且還用來購買本地的農產品，特別是穀物；自己的經營供給勉強够用的馬鈴薯、白菜、青菜、豬肉、羊肉，或在順利的時候供給牛乳、雞蛋，但穀物供給是不够的。

這種經營爲數不少。根據一八九五年的統計，在德國有五、五五

## 八、三一七個農業經營。

其中可分爲：

2公頃以下的有3,236,397個經營 = 58.22%

從2到5公頃的有1,016,318個經營 = 18.29%

兩者合計有4,252,715個經營 = 76.51%

如果計算，從二到五公頃的農業經營生產出自己消費的穀物，而較小的經營必須購買穀物，那末在德國只有四分之一的農業經營關心穀物稅，而極大半的農業經營即四分之三以上的小經營必須購買穀物，也就是說他們因穀物稅而受到直接的損害。這就是反對穀物稅的重要證據，但是它也證明極大多數農民不是以生活資料出賣者的資格而是以勞動力出賣者和生活資料購買者的資格來到商品市場上。小經營已經不是大經營底競爭者；像上面已經指出的，他們是支持和養活着大經營，供給勞動力並購買它的生產品。

我們已經看見，在一八九五年德國百分之五八的農業經營，有不上二公頃的土地，換句話說，要養活土地的所有者那是太少了。有一樁事實和這些情形相符，就是根據一八九五年的職業統計，在農業中（就農業一字的本義而言，即是除去園圃、牧畜、植林及捕魚——捕魚不知爲什麼也牽涉到農業上來）沒有副業的獨立人數爲二、〇二六、三七四人，而有副業的人數爲五〇四、一六四人。除此以外，有二、一六〇、四六二人獨立地（即是說在自己的經營內勞動，而不是作爲僱傭勞動者）從事農業當作副業。獨立地從事農業當作主業或副業的總人數達四、六九一、〇〇一人（在一八九五年從事農業經營的人數爲五、五五六、九〇〇人）；還有把其他職業作爲主業或副業的獨立的農民人數達二、六六四、六二六人，即佔百分之五六，可以說佔了全數底一大半。我們還須注意到，除了以農業爲主業之外，還從事某種職業的人數迅速增加，可是在其他一切職業內有副業的人數却

減少了。

有副業而屬於 下列職業者	1882年		1895年	
	絕對數	屬於作爲主業的 全體百分比數	絕對數	屬於作爲主業的 全體百分比數
農業	671,404	8.15	1,049,542	12.66
工業	1,693,321	20.47	1,491,865	18.02
商業	397,927	25.34	381,104	16.43
家庭用人	55,980	14.08	31,333	7.24
軍隊、國家的職務、自由 職業	142,218	13.79	115,277	8.08
無職業者	179,679	13.27	201,335	9.40
總計	3,110,509	16.54	3,273,456	14.28

離開自己的農業經營出外謀生大有可能的地方，土地底碎分可以達到不可相信的高度，最低限度也會暫時克服那種相反的走向集中的傾向。

比利時提供了這類演進的例子；那裏總計有：

經營	1846年		1866年		1880年	
	絕對數	百分數	絕對數	百分數	絕對數	百分數
2公頃以下	400,517	*60.9	527,915	71.1	709,566	78.0
從2—5公頃	83,384	14.6	111,853	15.1	109,871	12.1
從5—20公頃	69,322	12.1	82,646	11.1	74,373	8.2
從20—50公頃	14,998	2.6	15,066	2.0	12,186	1.3
在50公頃以上	4,333	0.8	5,527	0.7	3,403	0.4
總計	572,554	100	743,007	100	909,399	100

\* 原文爲66.9，實誤。——譯者

從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六六年各類經營底絕對數都增加了，但是

最小經營數比最大經營數增加得更快。反之，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八〇年各類經營的數目，除最小的經營外都減少了，而最小的經營還談不上是獨立的農業。就是在這一類經營內經營底平均面積之減少，很難將它歸之於經營強度底提高，主要應歸之於土地私有權底不斷分碎及出外謀生底增多。

比利時農業經營差不多五分之四都是極小的經營，這些經營的所有者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或求助於副業；他們已經不是市場上生活資料底生產者。他們的絕對數從一八四六年起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但最大經營數(二〇公頃以上)却從那時起大大地減少了。農民底歌頌者有什麼理由特別讚揚這種演進呢？演進並不是到處都在這一方向內完成的。小經營底過分分碎是以自己的農業經營以外能找得工資為前提。在只有大經營才供給這種工資的地方，那裏土地分碎，一旦開始妨礙大經營時，就會停止。除此以外，像我們已經看見的，小土地所有底碎分是有助於大經營的。這樣看來，就會有這樣的情形，即最小的經營和大經營不僅在耕種面積擴大的地方，就是在這種擴大不可能的地方，兩者也可以同時發展。在那裏土地碎分就靠中等經營來完成。

在法國，演進過程一般是如此。在那裏，像本書一六三頁上所引的統計數字就證明大經營和小經營在數目上同時增加了，中等經營則減少了。在德國這種趨勢早就很明顯。一八八二年時邁斯柯夫斯基(Miaskovski)就得出了一結論，他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流動資本之有力的增加，加上其他的因素，一方面會使土地所有權增加和變大，另一方面又會使它分碎和變小。“自然，這兩種同時被觀察的傾向，初看似乎彼此相互排斥，但是要仔細考察一下，這種似是而非的矛盾解決得完全和協，因為這些相反的傾向是有關於德國底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區的。要是在同時同地呈現出這些相反傾向的地方，它們就

把中等的地產引到滅亡的境地。

“在積聚底過程雖不是特別地而是主要地完成於德國底北部和東北部的時候，地產底碎分便在南部和東南部受到了限制，雖然它還散見於別的地方。

在不同地區兩種相反而又相成的傾向，却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這裏土地所有權範圍底增大，而在那裏它的變小，主要是靠犧牲中等土地所有權來完成的。後者受兩方面的排擠”（見邁斯柯夫斯基：“德國承繼權與土地所有權”，第一三〇、一三一頁）。

我們由柴林格著“論國內墾殖”（Die innere Kolonisation）一書中所引用的關於普魯士的下述數字就證明，大土地所有制與小土地所有制是靠犧牲中等土地所有制而同時增長。這些數字是關於東部各省（如普魯士、波美尼亞、勃蘭登堡、波森及西里細亞等處）以及關於威斯特發里尼及薩克森。從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五九年有聯畜的農民經營計有：

	減 少		由於自由轉賣所得的等於所得的				總 計	
			屬於小土地所有		屬於大土地所有			
	絕對數	百分數	英 畝	根 百分數	英 畝	根 百分數	英 畝	百分數
東 部 各 省	6,990	2.50	1,110,233	4.2	417,123	1.6	1,527,356	5.8
威 斯 特 發 里 尼	810	2.25	95,274	2.6	21,124	0.6	115,398	3.2
薩 克 森	2,183	5.30	87,481	2.3	30,413	0.8	117,894	3.1
總 計	9,873	2.80	1,292,991	3.7	468,660	1.4	1,760,651	5.1

從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四年這一期間關於土地變動的記載是沒有的。

根據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的統計，土地的得(+)失(-)情形如下：

	貴族的地產		有聯合的地產		小地產	
	地塊	莫爾根	地塊	莫爾根	地塊	莫爾根
東部各省	(+)4	(+)81	(-)102	(-)173,746	(+)16,320	(+)167,130
威斯特發里尼	0	(+)5,510	(-)404	(-)28,239	(+)1,904	(+)20,399
薩克森	(-)1	(+)3,206	(-)295	(-)17,889	(+)2,082	(+)13,477

除此以外，有幾千莫爾根的土地歸為城市所有，或作公共場所之用。在這裏也是由中農來承受損失。

最近期間在德國用碎分和增大的辦法來排擠中等的土地所有制，的確已停止了。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上面(第一六二頁)所引的圖表就指出，恰恰是中農的所有地(從二到五公頃)獲得總共五六〇,〇〇〇公頃之多。但如果從這裏就得出結論，說現在已開始了相反的過程，中農的經營排擠很小的經營和大經營，那是不正確的。如果把那些種類的經營在其中顯然看得出有決定性向某一方面變動和別一類的經營在其中看不出有什麼大變動分別開來，就會得到特殊的結果。各類經營如下：

經營	1882年	1895年	增加或減少	
			絕對數	百分比
1公頃以下	2,323,316	2,529,132	(+)205,816	(+) 8.8
從1—5公頃	1,719,922	1,723,553	(+) 3,631	(+) 0.2
從5—20公頃	926,605	998,804	(+) 72,199	(+) 7.8
從20—1,000公頃	305,996	306,256	(+) 270	(+) 0.0
1,000公頃以上	515	572	(+) 57	(+) 11.0
總計	5,276,344	5,558,317	(+) 281,973	(+) 5.3

我們看見從五到二〇公頃的經營有很大的增加，但是最大與最



小經營底增加，其百分比還要高。介於它們之間的中間的經營在數量上幾乎沒有增加；要是和經營已增高的總額比較，那些中間的經營却減少了。

最小的、最大的和中等的經營在數量上能够同時增加，一部分可用耕地面積底擴大，一部分可用那些中間經營底損失來說明。各類經營底耕地面積(以公頃為單位)如下：

經 營	1882年	1895年	增加或減少
1 公頃以下	777,958	810,641	(+) 32,683
從 1—5 公頃	4,238,188	4,283,787	(+) 45,604
從 5—20 公頃	9,158,398	9,721,875	(+) 563,477
從 20—1,000 公頃	16,986,101 <sup>①</sup>	16,802,115 <sup>②</sup>	(-) 86,809
1,000 公頃以上	708,101	802,115	(+) 94,014
總 計	31,868,972	32,517,941	(+) 648,969

從二〇到一、〇〇〇公頃的經營所佔面積底縮減——此種縮減其實更加為一、〇〇〇公頃以上經營所佔面積底增加所補償，——並不是發生於集約化底降低。七十年代前以大地主底口號是更多的土地！而現在他們的口號是：更多的資本！我們已經知道，如果這不是講大地產，那末也往往是表示土地面積底減少。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九七年普魯士農業蒸汽機底數量增加到五倍。另一方面，就在這個時期(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在德國只有在大經營內才僱用的農業職員(管理員、監督員、視查員、會計及其他的人)底人數大大地增加了，從四七、四六五人增至七六、九七八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我們順便還要指出從事農業管理及簿記的女職員人數之特別迅速的增加。在一八八二年時，女職員有五、八七五

① 原文所示數字顯係一六、九八六、三三二及一六、八九九、五二三之誤。——譯者

人，即佔職員全數百分之二，而在一八九五年就有一八、〇五七人，佔全數百分之二三·四。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大的農業經營從八十年代開始如何成爲更集約化更資本主義的經營。

要解釋爲什麼中農經營者能在那時得到這樣多的土地，我們留到下一章再說。

這裏使我們注意到那個事實，即農業人口底無產階級化，在德國，也正如其他國家一樣，在向前推進，雖然在德國中等地產分碎的傾向已不起作用。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全部農業經營底數量增加到二八一、〇〇〇；但是這種增加底大部分，都是不到一公頃的無產者的經營；他們的數量增加到二〇六、〇〇〇。

讀者將會看出，農業底運動完全是特殊的，完全和工業及商業資本底運動不同。在前一章內我們已經指出，在農業方面經營集中的傾向並沒有引起小經營底完全消滅，在集中的傾向發展到極度的地方，却發生着相反的傾向：集中的傾向和碎分的傾向互相交替。現在我們却看見這兩種傾向能夠一同發生作用。小經營的數目雖然增加，但它們的所有者是以無產者的資格，以商品——勞動力出賣者的資格出現在商品市場上，他們的私有地只能在商品生產的範圍以外，在爲家庭經濟生產的領域內才有意義。這些小農業經營者以勞動力出賣者的資格在商品市場上和工業無產階級有同一的利害關係，並不因他們的私有地而與工業無產階級處於敵對的地位。土地所有制多少使經營小塊土地的農民擺脫了糧食商人的壓制，但是不能使他避免資本主義企業家——無論其爲工業企業家或農業企業家——的剝削。

在達到了這個發展階段的地方，小農業經營數量底增加，只是成爲無產者家庭經濟增加底一種特殊形式，此種增加是與資本主義大

經營底增長並進的。

## 二 農民副業的諸形式

最接近於小農業經營者的副業形式就是僱用於農業的工作。在封建時代我們就已經遇到這種形式，一旦在農村中不平等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一些所有地過於縮小而不够養活它們的所有者，而別的所有地則過分擴大，以致耕作土地單靠農民家庭的勞動力已經不够。

現代小農在大地產內的勞動和封建的勞役有些相似，這種勞役在從前是強迫農民在一年內必須替地主做相當日數的勞作。很顯然地，農民更希望在沒有農業工作的時候，即如在冬季，有一種副業。他首先在大森林地帶附近地方去找尋這樣的副業，因為森林地帶在冬季需要許多人手去砍伐和搬運。但是大森林地帶並不是到處都有，而且森林業所付的工資，又常常不能滿足小農對貨幣的需要；他必須找尋農業工作。農業經營對勞動人手的需要很不一定；有些時候，即如在收穫時期，固定的人員對於較大的經營是不够的，它需要額外的勞動者。但是恰在小農替自己容易找到農業工作的補助工資時，他自己的經營也特別需要勞動。對貨幣的需要迫使他不得不忽視自己的經營，這種經營因其範圍的狹小和工具的缺乏必然經營得更不合理。他把自己經營所需的農業勞動委給妻子及年已長成而能勝任的子女去担任，他自己至多在節目前夕或星期日來担任這種勞動。

我們不要把求助於這種補助工資的經營，想像成一定是很小的經營。例如，凱爾格爾關於威斯特發里尼省（察斯費爾德、波爾根、萊克林斯霍生及其他各區）的通訊說：“自己的或租佃的土地（自由的日工底土地），約在一至五公頃上下，而大部分約在一至三公頃上下。誰要是有五公頃以上的土地——在個別的場合內有三公頃以上的七

地，就往往不再去做日工，而專靠自己的經營生活。可是有一個報告說，日工底土地竟有到六公頃的，另一個報告甚至說有到八公頃的。”這當然是要看土地的生產率如何而定（見“農業勞動者的狀況” [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第一卷，第一二六頁。）

凱爾格爾關於奧斯納布魯克 (Osnabruck) 行政區的通訊說，那裏僱工的經濟通常包括有：茅舍及經濟上的建築物，有可以養三頭牛及許多豬羊的廄舍；園圃約有一〇——一五公畝，耕地約二公頃，草地約〇·五或一·五公頃，公共牧場約一公頃以及享有從森林中砍伐柴薪的權利，其面積約一·五至二公頃（見前書，第六四頁）。

有三頭牛和幾頭豬羊的經營，可以算是相當大的了。可是它的所有者還是不能不去做僱傭勞動！但並不是附近到處都有大的經營，可以在它們裏面謀生。這類大經營往往不被認為是競爭者，反而是所希望的。

例如，來自愛仁納赫高原 (Eisenacher oberland) 的通訊說：“在剛剛購買了所需的土地以後來組織一個較大的經營以及在維仁塔爾 (Wiesental) 附近計劃設立製糖廠，對當地農民階級當然有良好影響……許多日工和小土地所有者都可得到較好的工資”（見“農民的狀況” [Bäuerliche Zustände]，第一卷，第四〇、五七頁）。從愛仁納赫低地來的通訊說，許多當地的土地所有者都只有不上五公頃的土地。他們的境況很惡劣。“要給予做日工和一般勞動者的小土地所有者階層以充分的工資，則現有的大地產（貴族的，皇室的和封贈的地產）還是不夠的（只佔耕地總面積百分之一二·五）”（同書，第六六頁）。

又如在黑森大公國內小農當中最大的貧困原因之一，有人指出是大地產的缺乏。庫諾·佛蘭克斯丁博士 (Kuno Frankenstein) 說：“在有承繼權的那些地方，也就是說，在那裏土地就按照兒女的人

數分成幾小塊，因為在土地碎分的時候，老實說，還可能不存在有勞動者人手底缺乏，因為許多小私有者，只有五至十“莫爾根”土地或者還少些，都會提供自己的勞力……但是在有十分小的農民地產的地方，尤其是在沒有大地產存在的地方，對於勞動人手的需要，就非常有限；可見極小的土地底私有者就沒有可能在自己的經營內利用自己的勞動力，或作為僱傭勞動者。因此這些小經營的所有者底境況在大多數場合內是很悲慘的”（見“農業勞動者的狀況”〔Verhältnisse der Landarbeiter〕，第二卷，第二三二頁）。

在前一章內我們知道小經營是大經營的支柱，那末在這裏我們就看到大經營又成為小經營的支柱。

海森地方的小農，由於長期營養不足，以致疲弱到連謀生的可能性都不能利用。“人們因飲食惡劣，已完全不能長久地從事繁重的工作。有些地方，這種情形迫使大地產底所有者不能不從外面去僱用勞動者，雖然當地的勞動者還沒有找到工作的機會”。

但是這般體質瘦弱的人們，雖不能担任那種繁重的農業勞動，却宜於做其他的工作，因此小農在找不到農業勞動的地方，就願意抓住其他的工作——家庭工業或手工業。

家庭工業的萌芽在封建時代就已發生。我們在緒論中已經指出，起初農民是一個農業經營者同時又是一個工業者。後來城市工業底發展才逐漸使他幾乎專門從事於農業。但是還有各種手工業在農民家庭內長期地保存着；在農業不再是謀生底唯一來源的地方，手工業又重新為人所重視。但這不是為訂貨而工作的手工業形式。各自孤立的農民不能和城市手工業競爭，城市手工業擁有最廣大的市場及城市所提供的一切便利。農村工業作為商品生產只有替資本家、商人、或訂購者去生產才能發達，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把農村工業和住在偏僻地區的農民所不能直接達到的遼遠的市場連結起來，農

村工業只有在需要簡單的技術和簡單的工具的部門內才能發展。這樣的家庭工業，首先是在附近有原料的地方發展起來——例如木器雕刻要在森林附近的地方，石板和石筆底製造要在斷層岩石附近地方，籃筐的編製要在富於水源宜於種植柳樹的地方；小的鐵器工業要在鐵礦附近地方等等。然而要推動機敏的資本家用家庭工業的形態去剝削許多閒暇而又廉價的勞動者，往往只要一筆現款就夠了；他自己常常供給原料，例如供給棉紗和棉絨用來紡織。

在土地很瘦瘠而技術條件又不利於大農經營的國家，尤其是在對大農業經營從前或現在還加以政治阻礙的地方，農村手工業就能順利地發展起來。我們在多山的國家就看到農村手工業：如在波希米亞在與西里細亞及薩克森毗連的邊界，在通黎吉亞（Thuringen）、套魯山（Taunus）以及什瓦慈瓦德（Schwarzwald）；而家庭工業在瑞士特別有發展，如西部製造鐘表，中部紡織絲織品，東部刺繡。

這些家庭工業發生時，往往受到極熱烈的歡迎。家庭工業的創辦者們被認為是貧農的恩人，因為他們使貧苦農民在閒暇無事的時候，特別是在冬天有工資可得。他們增多的收入，當然使他們能夠更合理地經營農業，因而又增加了他們的收入。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底交替，使人們和城市的勞動者相反，成為康健而強壯的人；它又能使他們比那些只限於一種農業和空費許多寶貴光陰的農民更豐裕、更有知識。森伯克（Schonberg）在“政治經濟學指南”（第二卷，第四二八頁）中以美妙的色調來描畫那不受機器競爭威脅的家庭工業底利益。全家一塊兒勞作，“父親教育自己的兒女，婦女操持家務和照顧兒童，少女們受到家庭的照管和保護。”勞動時間任隨勞動者自便，勞動者是自由的，“勞動者的全部生活很舒適，很快樂而且很豐富。工業的活動與健全的農業勞動相交替，避免大批僱傭勞動者集中在一個地方，這對於工人及社會都有好處。最後，家庭工業能夠及時利

用一家全體有勞動能力的成員底力量並因此促進——對家庭底各個成員及一家的生活並無危險——家庭收入底提高。”

自然，和這些“無可爭辯的利益”一同存在着黑暗面，森伯克對於這黑暗面也不能閉着眼睛不看。但是最後他還是做出這樣的結論：“所有這些弊害，無論怎樣大，都不能把家庭工業方面對於勞動者底社會地位極其有利的經濟形式底特點抹殺。”

只有在家庭工業不得和工廠工業競爭的地方，家庭工業才沒有容身之處。

實際情況却呈現給我們另外一幅圖畫，甚至就拿那些手工業來說，也還沒有和大的機器工業進行鬥爭，例如編製籃子，製造雪茄煙及製造玩具之類。

首先，任何一種副業都不能這樣有力地促使土地碎分，因為任何一種副業都不宜於十分迅速的擴大。大的農業經營底數目受到限制，正如冶金工業企業數目受到限制一樣；農村中工廠的數目也不能隨意增加。因此在大農經營或農村工廠內工錢勞動，就有它一定的界限，家庭手工業就另是一回事，它只有在現有的勞動力內才遇到限制；它在最小的經營內進行，在最原始的工具幫助之下，不需任何值得這一名稱的資本的耗費；資本家一點也不冒險，在順利的市場情況之下，盡可能迅速地把它擴大；他無須供給不變資本——作坊和機器，這些東西在生產上如不能加以利用，便等於無益地濫費；他無須支付地租和別的賦稅，這些地租和賦稅要是在一般的資本家，那就不管事業興盛與否都必須支付的。這整個負擔是資本主義冒險的極大一部分，現在都由那些被剝削的家庭手工業者去擔負了。這種情形使任何危機對於他們比對於大工業底勞動者更有毀滅性，因為資本家對於家庭工業的關係很容易決定去減縮它的企業；而在極順利的時候更容易擴大它。但是繁榮的時期對於家庭手工業者比不遂意的

時期更有害些。

結婚和組織家庭的數目增加了，同時對小經營的需要也隨之增加，在農村中要是沒有這些小經營，則獨立的家庭經濟不可能。於是土地底價格提高了，土地底細分增加了，個別的地產更加變小了，而這些地產的耕作更加變壞了。因為土地微小不足道，又因為正在繁榮的家庭工業能夠獲得金錢，農業經營就更加喪失家庭底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都投到家庭工業去了。如果這種情形延長相當的時期，那末由於坐着不動的生活方式就使家庭手工業者失去從事農業勞動的體力。他們的田地就不能好好地耕種，於是小規模的經營現在對於他們變成體力上必要的了。

地產變成這樣小，小到已經不可以養幾頭牛了。桌上已經沒有牛乳，高苣汁代替了牛乳。既沒有牛則糞和聯畜也就沒有；田地就愈加貧瘠而不宜於種植穀物。此外，穀物在沒有用作食品以前還需要細磨和烘烤，因此人們寧願選擇那些不甚費力而又能在同一地面上出產，雖不是更有營養的物質，而是收穫量較多的植物，——蔬菜、蘿蔔，尤其是馬鈴薯這些植物可以直接送到廚房去烹調。

這樣看來，家庭手工業者的飲食，就是高苣汁和馬鈴薯，這些東西與其說是供給身體的營養物，無寧說是欺騙肚子的東西。營養不足使工業勞動受到很大的影響，勞動者的體力降低到手指的工作所必要的最低限度。

他們的農業經營更加退化，小的、耕作很壞的、不施肥料的土地年復一年產出同樣的植物。農業回復到少數日耳曼人的農業在民族遷徙結束以前所處的那個階段。

史南培爾—阿爾德（Schnapper-Arnds）在同一名稱的那本書內關於上套努斯地方的五個農村公社說：“有人說，三田制的顯著遺跡，只在柴林堡還被保持着，在其他的農村內，貧困就不顧任何禁令



而要求從土地中年復一年出產馬鈴薯；較爲合理的換種制對於缺乏土地和其他工具的貧苦農民，是不可能的”（第五〇頁）。

在這五個農村內總計七五八個代表納稅單位的家庭經濟，有四六三頭牛；四八六個經營完全沒有牛，一一七個經營每個只有一頭牛。

經濟的衰落，是與人力和地力的枯竭並進的。在家庭工業內技術的進步也只在很小的限度才有可能。家庭手工業者，像剝削他們的資本家一樣彼此間發生競爭，他們有用加強勞動強度和減少工資來對付。這種競爭之所以緩和，是因爲個別家庭手工業者孤立在他們自己的家庭內，他們分散在很廣的地區，以致他們的組織幾乎成爲不可能，在他們的本地又沒有別的謀生機會，並且他們被束縛在小塊土地上——小塊土地不讓他們逃避過度的剝削，而到這種剝削比較和緩的別個地方去。它的家庭勞動者緊緊地跟在包買主的後面。甚至最長時期的失業，也不會把他們驅散。所以在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家庭工業內我們便看到最長期的，最受磨折的勞動，最可憐的勞動報酬，最廣泛的使用婦女和兒童的勞動，最悲慘的工作場所及住宅，一言以蔽之，在現今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最惡劣不堪的條件。這是最無恥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這是更有力地走向退化道路的農民無產階級化的形式。用扶持家庭工業來幫助純粹靠農業勞動不能維持生活的小農人口的一切企圖，必然有一個後果，就是在短時期而且是很成問題的繁榮之後，就沉沒到最深和最無出路的貧困裏面。所以我們應當採取最堅決的方式來和它們鬥爭。

幸而，家庭手工業只是走向大工業的一個過渡階段。對於各種家庭工業喪鐘遲早會敲起來的，在機器使家庭工業在技術上變成多餘的時候，並且家庭工業愈迅速發展，愈趨專門化，使分工愈往前進行，則這個喪鐘敲得亦愈早。

但是這個時刻還不是家庭手工業者得救的時刻，而是他在十字

街頭最痛苦的命運底迅速開始。家庭手工業者就意味着更過度的緊張，更厲害地壓制生活的需要，聲嘶力竭的家庭受更大的折磨，為的是在與機器競賽時不致過於落後。這種競賽無論拖得多麼久，這個更加落後的家庭手工業者終於力竭聲嘶的倒下去了！

家庭手工業者能够這樣長期地支持毫無希望的鬥爭，應當歸功於他的農業經營。

在農業不是着眼於商品生產，而是着眼於滿足家庭經濟需要的地方，那裏農業就不受競爭動力的支配，農業就成為保守的因素，這種因素還給予一切過時的東西以生命底幻影。農業使家庭工業底拚命掙扎苟延到無止境的地步，不讓那種在半世紀以前就已過時了的手工紡織業死亡。

“為什麼工業底這一部門(波希米亞北部的手工紡織業)雖然不斷的起着癱瘓的狀態，可是還維持着原有的規模呢？這原因主要是在於紡織者底大部分都有一點土地：在幸運的時候，這點土地可用來補充工業的工資，而在貧困的時候，就用作勉勉強強渡過危機的一種手段”(見布拉夫[A. Braf]：“北波希米亞勞動者狀況的研究”(Studien über Nordböhmische Arbeiter Verhältnisse)，第一二三頁)。

雖然如此，凡是在大工業侵入農村，不是為着要和家庭手工業者競爭，而是為着要供給家庭手工業者以新的謀生機會的地方，農村的家庭手工業最近期間到處都迅速沒落了。

大批一無所有的、有用的(熟練的而又守紀律的)工人底存在以及廣大市場底接近，對於大工業發展是必要的。大工業首先是在大的商業中心找到這些條件。它的發展本身又吸引着新的工人羣衆並使他們流入工業繁榮的地方。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的趨勢就引起大城市內人口及經濟生活繼續不斷的集中。

但是因為一系列的因數，並不是正在發展的大工業整個潮流都

向於城市，它的一些支流也使鄉村富裕起來。這些原素——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社會的性質。

首先隨着大工業的擴大，而同時增長的對原料與補助材料的需要，屬於前者（自然的因素），原料與補助材料不能在城市生產，而只能在鄉村中生產，而且由於大量的消費就應當在大經營內大量的生產。這首先就是採礦工業。採礦工業的發生，是農村關係革命化底最有力的手段。其次，體積大而價值小的，不堪遠距離運輸的原料就得在當地加工製造。於是在農村內發生了鐵工廠、磚瓦廠、製糖工廠等等。

最後，爲了容易利用很大的水力，有時將一些生產部門吸引到離城市很遠的山谷內。

除這些自然的因素以外，還有社會的因素。城市的生活程度比鄉村高，而且在同一的生活程度之下，維持勞動力的費用也比較大，這是由於住屋的租金比較高，食料運輸的費用以及工人沒有自己的農業經營。因此城市中貨幣工資，當然要比農村高。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勞動羣衆集中在一個不大的地方。這種集中使他們容易交談和組織起來。它使監督和實際懲戒他們更加困難。在工廠林立的地方，被解僱的工人往往可以找到寄身處。在農村內就不然：在那裏工人不大能抗拒資本，他們極其恭順而又極少要求。這對於大工業家是使他把自己的企業移到農村去的一個很大的誘惑，如果在農村內有必需的勞動力；所可惜的，就是這種機會不是到處都有，並且要具備對於事業順利進行的一切其他條件。城市工人運動愈猛烈，則大工業家亦愈願意把他們的企業移到農村去。

交通工具——運河、鐵道、電報之類愈發達，則大工業遷移到農村亦愈早，因爲大工業容易和大市場保持密切的聯系。另一方面大企業在農村中發生本身又構成使近代交通工具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

動機。而這些交通工具的建設、維持以及使用，又給農村居民以許多獲得工資的工作。

工業移植農村的直接結果，對於小農業經營者及他們的土地財產不見得比家庭工業制度的結果更有利些。為市場生產生活資料的最大的經營，最低限度對於他們的商品由於銷售市場底擴大以及直接接近市場當然會賺錢的。但是這種利益由於工業所引起的勞動者底缺乏而愈趨於平衡。可是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別一章再說。

總之，小農業經營者和大農業經營者都一樣因地價底增高而蒙不利。大工業引起人口迅速的增加，不僅，像家庭工業一樣，由於容易結婚和容易建立家庭經濟，而且也由於容易從外面招收勞動者所致。資本主義大企業在農村內單靠它附近供給的勞動力是不够用的。對於住屋及小塊土地的需要增加了，於是住屋及小塊土地的價格也隨之增加。地價愈高，則在其他條件均等情形之下買主剩下的用作經營的資金就愈少，他的農具亦愈簡陋。我們在下一章還要回頭說到這一點。

除此以外，還有工業平常所要求於工人的和家庭工業所要求的不同。家庭工業大部分都是這樣經營，有時——如在收穫時期，全家停止其工業活動，以便從事於農業勞動。自然，這種情形並不是常常如此。有些家庭工業內，工作最緊張的季節也正是農忙的時期。“正是在收穫忙碌時候，農民底工作日往往延長到二十小時，而夜間只休息四小時；製造玩具的工匠要努力工作，沒有一刻閒工夫來做必要的田間工作”（見沙克士〔E. Sax〕：“都林根區的家庭工業”〔Die Hausindustrie in Thüringen〕，第一卷，第四八頁）。

在家庭工業和農業分開的地方，在兩者結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地方，情形就是如此。但這絕不是一般的規則。

在大工業內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大工業底大量不變資本，如果

擱置不用，就等於無益的消耗，這就使企業家盡可能避免生產過程的長期中斷。只有少數大工業在一年中工作一部分時間，即在農事停頓的時候或不特別忙的時候。例如製糖工廠的“活動”開始於秋季，即在收穫甜菜之後，繼續到冬天，這種“活動”，要在四個月內盡可能加快，因為一到春天甜菜就容易變壞。

這樣看來，製糖工廠的工作並不奪去農業勞動者及小農對農業經營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煤礦中的工作有時和農業勞動也可以相容。冬季很缺煤，對煤的需要也很大，然而從另一方面，採用夜班就使一部分工人在白天“得到解放”；他們應當利用白天來休息，可是他們往往用這時間來做農業工作，他們被自己的高工資所慫恿，並且由於他們要想免除勞動力底過剩，可是這在煤礦中過於短促的工作時間，對於勞動力的消耗是不夠的。

凱爾格爾通訊說：“在雷克林格區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動相交替；那些有點土地的自由日工從收穫開始到十一月底都在農村裏勞作，其餘的時間則在礦山內工作”（見“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一卷，第一二四頁）。

在採礦工業區域，如海爾蓀克爾赫(Gelsenkirchen)、波洪(Bochum)、烏特姆德(Dortmund)等地，有土地的農村勞動者幾乎絕跡。“雖然有時沒有土地財產的日工也被僱用，但他們大部分都是礦工，他們在礦山中工作日短的時候，尤其是他們參加夜班的時候，就可以在白天勻出一些時間去從事農業工作；他們向農民租一間住屋而答應在收穫時期幫忙他，或者向農民租一小塊土地來種植馬鈴薯；最後也有這樣的工人，他們由於喪失了勞力，而不宜於採礦工作……人們很少報道日工從自己的經營中所得的收入，這裏，當然是指附帶從事農業工作的礦工而言。他們有時租得一間附有園圃的小屋子。養一

兩頭山羊，有時又可以得到允許在只要他們能夠施肥的土地上種植馬鈴薯”(見同書，第一三二頁)。

最後，還可以舉一個西里細亞東部煤礦區的例子：“在煤礦及工業區域內最常見的現象就是農業勞動者在煤礦中，尤其是在建築業或工廠中工作，一到收穫時期，就回到農村中去了。這種情形特別是在小私有者方面最常見”(見同書，第三卷，第五〇二頁)。

在這樣的情況下採礦工作乃是農民經營底有力支柱。從威斯特發里尼寄來的通信中說：“凡是在所有者靠自己的土地生活的地方，土地的交錯對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是很有害的。在農民——如在西根區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還能在礦山及工廠中有優裕的工資的地方，那裏害處還不會暴露出來”(見“農民的狀況”，第二卷，第八頁)。

但如果在個別的部門內需要季節工作或季節工作是可能的，那末大工業一般地就要求勞動者一年到頭不停的工作。

但是大工業並不像家庭工業一樣需要一家的全部勞動力。剝削十四歲以下的童工已為法律所禁止。主婦在大工業中工作比在家庭工業中更加困難：因為在家庭工業中她無須離開家庭，而在前者則不然。如果說她去參加家庭工業的勞動容易決定，那末要她丟下自己的家庭和兒女就不容易決定了；在農村中要她決定做這種勞動比在城市內還要困難，因為在農村內家庭經濟起着極大的重要作用，並且家庭經濟的功能尚未為大衆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等等所減少。

除了大工業制度給家庭經濟及與之相聯系的農業留下的勞動力外，還留下勞動殘廢者。家庭工業對所有的人，甚至對最軟弱的人都有事可做，而大工業却要求自己的工人緊張的工作，緊張到只有在壯年時才能擔負的，並且很快就使它消竭。在農村內極小的經營却能夠給這樣創造出來的大批工業殘廢階級以適當的工作。

大工業像家庭工業一樣，不過是在另一方式上，使小農業能夠支

種耕作由於‘地勢’高低不平是需要緊張工作的”(第三四九——三五二頁)。

這一幅描畫無論怎樣暗淡，但總比家庭工業的描畫，更多一線希望。兒童們不讓參加工廠工作，生產過程雖不像農業一樣在新鮮空氣中進行，但總是在屋外，在寬敞的場所內進行，這些寬敞的場所，雖然有它的許多缺點，在衛生方面却超過家庭手工業者底茅棚。而且正因為在工廠中勞動者“不是自由的”，他不能開始和拋棄工作，當他想到秩序對大家都是一樣的並且勞動是在比家庭勞動更狹小的範圍內進行的，更容易用法律來監督和限制他。工廠把分散的勞動力結合起來，使他們彼此間容易調協，它使工廠的農村和外界密切接觸，發展了交通工具並且把有知識的勞動力從城市吸引到農村來。這樣看來，工廠就成為使一部分農村居民和城市無產階級接近的一種手段，逐漸喚醒農民的注意及參加鬥爭來爭取較好的命運，而在有利的情況下促使其積極參加這種鬥爭。

農村的工廠增加着無產階級底隊伍，不是剝奪小農業經營者，不是把他們從土地分開來，恰恰相反，農村工廠給予瀕於破產的小私有者以資金來維持其私有財產，還給予人數極多的一無所有的階層以可能在購買來的或租佃來的土地上進行私有的小經營。

這裏所考察的小農副業底三種形態，並不互相排斥。它們能夠同時並存。例如，有人報道說：“作為一種副業的家庭工業，對於愛仁納赫高原的居民，特別是對於極貧苦的地方稍微有點土地的小農們，却有特別的意義……我們可以指出下列的家庭生產：製造軟木塞子、織腰帶和絲絨、編製馬鞭、製靴、造刷子、劃玻璃管——這些副業給每個家庭以一、兩個乃至三個馬克的工資；甚至就是有八、九公頃土地的農民，也往往從事這些工作……。除此以外，砍柴、木材的砍伐及浮運，以及開採豐富的雪花岩礦層，都能給他們相當好的工資，尤其是在

農事閒暇的時候”(見“農民的狀況”，第一卷，第五〇、五一頁)。

對於南部我們可以利用海慈 (Heisz) 關於司徒嘉德、貝布里金、海雷堡等處農民狀況的報道：“如果以為農業勞動能夠供給大多數農村人口以充分的食料，那是錯誤的。外出謀生，尤其對於西部的兩個區域有極重要的意義。這裏首先應當舉出伐木的工作，需要大批的人經常或暫時從事這種工作。研究家庭工業、紡織和刺繡底狀況，那更有意義。大工業和家庭工業一同發生。最近幾年來發生了一些大企業，舊的企業擴大了，依靠賤價勞動的小企業家增多了……。其次就是買賣牛乳、雞蛋、家禽及某些工業生產品的小生意。最後，在某些地方可以舉出日工，除直接圍繞司徒嘉德的農村，如梅林根、波南琴、勃勞特金干爾特、費金根、羅爾、姆斯貝爾格、畢爾卡等農村的日工以外，在當時有許多日工從魯易特、海滿金、凱姆南特、沙干仁、甚至從勃里林金地方來到愛斯林金地方的紡織廠內。”

但並不是到處都有這樣多營生，也並不是這類營生常常能夠彌補小農業經營者對貨幣的需要。如果營生不找到農民，那末農民就一無所有，一旦打聽到營生，即使暫時不得不拋棄了土地也要去找。現代交通工具愈發展，——鐵路便於運輸，而郵政和報紙帶來遠地的消息，——農民亦愈易決定離開(即使是暫時地)自己的農村，而且他也敢冒險到更遠的地方去。很顯然地，小農家庭的一部分，最能勞苦的一部分，爲了要養活自己和賺錢來養活全家就常常定期地離開家鄉。這裏使我們注意的，也只是這一類的外出，而不是長時期的外出；因爲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不是那些在外表上容易認識的農民無產階級化的形態，而是那些最主要的形態，在這種形態之下農民只學習無產者所盡的機能，却保持着自己的本來面目。

自然，農業工作最接近於離鄉去境的農民。有些地方，原來的居民不敷對僱傭的農業勞動的需要，那裏就沒有什麼不足的現象。在



前一章內，我們已經指出大經營內，勞動者的缺乏，我們看到，這種缺乏就在較大的農業經營內也是免不了的。在德國各個不同的區域內，都需要外地的農業勞動者，一部分在整個夏天都僱用他們，一部分只在收穫時期才僱用他們；他們不僅到厄爾巴以東，而且在萊茵河流域、在巴伐利亞、武爾敦堡、斯勒斯威克和荷爾斯丁等處去找工作。

我們且引一個外出到巴伐利亞的例：“在生產穀物的區域與生產蛇麻的區域之間，常常發生勞動力的交換，因此一到收穫時期勞動者從後一區域去到前一區域，反之亦然。除此以外，根據一些報告對於農業勞動者的外出可以確定如下的結論：上巴伐利亞在夏季的幾個月內，主要是從巴伐利亞低窪多林地帶吸引季節工人，並且自己從收穫早已完畢的區域把季節工人遣送到斯瓦比亞去。在斯瓦比亞區內發生上斯瓦比亞與下斯瓦比亞間的交換；除此以外，基羅爾地方遣送大批畜牧者到斯瓦比亞來。下巴伐利亞所需勞動力是從巴伐利亞低窪森林地帶和波希米亞供給的，在收穫時期又把他們從維爾斯郭芬區送出到奧斯頓郭費爾去做六個禮拜的工，而到收割蛇麻的時候又把勞動者從斯特蘭賓格送到種植蛇麻的區域。從上普凡里慈來的男人們在收穫時期從維金區去到上下巴伐利亞，婦女們就去到產蛇麻的區域去收割蛇麻；去到這些產蛇麻的區域的，還有從連斯塔特區去的工人；尼馬爾克與斯塔特塔姆霍夫區從上普凡里慈的東部，巴伐利亞低窪森林地帶及波希米亞地方主要是吸收女工，有時也吸收童工來收穫蛇麻和馬鈴薯。上佛蘭科尼亞(Oberfrankonia)地方把工人特別從巴耶魯特區工人遣送到都林根和薩克森，但在收割時期就從多山的地區吸收婦女和兒童來收割，因為多山地區穀物成熟較晚。在佛蘭科尼亞中部，種植穀物的區域和種植蛇麻的區域之間盛行勞動力的交換；海爾斯堡區在收割蛇麻的時候就從雷恩、斯萊沙爾特及奧

記者從烏特威斯特瓦爾德報道如下很有趣的消息：“在春天在農村裏就出現了許多雜貨商人，並且在成年的青年男女中招募小販。在二月間他們就帶着這些人去到各國：荷蘭、瑞士、波蘭、薩克森及其他國家。那些被招募的人在主要的地方，例如來比錫地方領到商品，這些商品要按照一定的價格出賣，而將賺得的利益交給他們的主人。他們除掉路費之外，還能得到薪金三百至四百馬克，但這要看他們買賣的手腕如何。到聖誕節時他們常常帶着相當大的儲金回到家鄉。”

早就有人看出，在小販們被招募的那些地方，經濟改善了，因為兒女們把做工所得的工資交給父母作為共同的需要。做工所得的工資，用於更好地改善經濟，例如，購買牲畜，尤其是購買牛，用來購置人造肥料以提高收成，用來擴大地產以及存放在儲蓄銀行內。

有幾處地方被招募的人數很大，以致家中只留下最必要的勞動力。在財政方面這種行商是能夠得到很多的利益，可是在道德方面不是沒有黑暗的一面，尤其是對於婦女們”（見前書，第二卷，第二七頁）。

普凡慈地方窮苦山居的鄉村，願意把自己的剩餘勞動力送到外邊去做吹鼓手：“佛克森地方沙礫構成的土壤，出息很少；甚至就是有三、四公頃土地的農業經營者，生活也很苦，常常爲了添補收入不得不藉助於外出營生。在這些村社內‘雇主’(?)<sup>①</sup>不得不在別的地方去找工作。他去到外地或是做吹鼓手，或是做石匠，很少去做僕役。吹鼓手大部分都是很儉省的，他們把這樣多的錢寄回家去，使他的家庭可以無憂無慮地過活，並且還能夠慢慢地得到小塊的農地。石匠們的情形就沒有這樣順利，而賺錢最少的要算是那些在外地當僕

---

① 在考茨基所引的句子中“Arbeit geber”一字帶有問號，這一定是考茨基引用的報告原文有誤。——俄譯本譯者

役的人了”(同書,第二卷,第一九三頁)。

季候工人經常回家,把自己勞動進款投進自己的農業經營內。這裏城市的和鄉村的、工業的和農業的大經營給小經營以新的力量。長期出外的人底工資則給小經營以另一種力量。他們大部分是單身漢,並不全部轉回家鄉。許多人定居在自己新活動的地方,但是雖然這樣,他們却把自己積蓄的大部分錢寄回家,因為他們的家庭不能單靠自己的經營來養活。關於愛爾蘭,據說,那地方小農的租金是由愛爾蘭的女僕在美洲作工所得的工資來償付的;德國有些農民底納稅情形也是如此。雖然農村窮困,但還是有不少的人回到他們所生長的那小塊土地上,以備娶妻生子,承繼祖父的遺產,他們帶了自己的積蓄,暫時挽救瀕於破產的經營,使過小的經營有可能多買點土地,畜養耕牛,修葺破爛的茅舍。

對於這些工人所到的那些國家,他們就成爲發展的障礙。他們是來自經濟上落後的和貧困的國家,所以他們的慾望很小,而且大部分又是無知無識的,富於服從性的……所以愈加缺少反抗的能力,是由於他們在國外,在敵視外來人的居民中沒有根底,並且他們又常常不懂語言。他們對於工資的減低是心甘情願的,他們是工賊,他們極不容易被組織在職工會內。但是這些分子在他們所到的國家中雖是阻礙進步,可是對於他們從那裏來,回到那裏去的那些地方就成了進步上最有力的急先鋒。他們對於新環境無論顯得怎樣矛盾,他們却不能完全避免新環境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吸收新的需要,新的理想,這些新的需要和理想對於新的環境無論怎樣落後,可是對於舊環境却是充分含有破壞性和革命性的。這些分子在所到的國家內是剝削和壓迫底服役者,而在所由來的國家內則成爲不滿與階級鬥爭底促勵者和領導者。

凱爾格爾說:“那些遠行的工人在國外所獲得的智力眼界底擴

張，巨大的敏捷性和易受刺激，往往會有一種結果，即決然降低對現存權威的崇拜，這些人成爲傲慢的、頑強的、目空一切的、很自信的人，並且到處以身作則去促進還存在於西方大部分地產內主人與勞動者之間，存在於與當地經濟的和社會的條件完全協和的宗法關係底瓦解。”（見“論外來的農村季候工人”〔Die Sachsengängerei〕，第一八〇頁）

這樣看來，零工起的作用像大工業移植鄉村起的作用一樣；他們加強小土地所有，這好像是十分保守的成分，但同時他們却完全改變了小私有者底生存條件，傳達給小私有者以絕非保守的要求和觀點。

誰要是以爲用簡單的統計數字就可詳盡地說明社會生活底極其複雜的內容，那他就會從這些統計數字中做出使人安心的結論；即城市中的發展無論怎樣推進，鄉村中一切仍然照舊，並且在任何一個方向都看不出決定性的發展。

但是誰要是看一看，在這些統計數字後面隱藏着什麼，誰要是不爲催眠術所迷而不停留在大經營與小經營之間的關係上，那他就會得出另一種結論；他就會看見大經營在數量上並沒有變動，小經營也並沒有爲大經營所吞併，但是它們兩者由於工業的發達也正是在那一方向內完全受到革命的洗禮，小土地所有更加緊密地靠攏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彼此間的利害關係更加接近起來。

但是這還沒有把經濟發展的影響發揮無遺。

經濟發展的影響還引起許多新因素的出現，根本改變了爲市場而生產商品的農業底本質，也就是說，爲社會而生產剩餘的農業底本質。

## 第九章 商品性農業所遇困難的激增

### 一 地 租

我們已經看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現代的大生產，在技術方面把封建時代末期極度衰落的農業提到很高的高度。但是我們也看到，這同一的生產方式引起一些阻礙大生產發展與推廣的趨勢，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這些趨勢強有力地妨礙此種生產方式在農業內的絕對統治，也就是說，這些趨勢不讓農業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達到最高的程度。我們已經看見，這些阻礙的趨勢，促進了土地底碎分以後，甚至能够在某些地方引起農業方面技術的退步。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農業起有害的作用並不單單是它對大生產所造成的困難。地租底影響在這一方面，也一樣是有害的。我們已經屢次指出，土地的市價，在本質上，不是別的，而是資本化的地租。我們在這裏只說土地底價格而不說地產底價格。建築物、耕畜及農具底價格，像一切其他商品底價格一樣，最後是由對於它們的生產所需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來決定。

工業資本家同樣也要支付地租或購買土地。但是地價只是他投到生產中的貨幣資本底一小部分。

在農業內就不是這樣。所謂土地資本，即是說，資本化的地租，超過農業經營者不得不耗費在地產的耕作上的那一部分貨幣資本，

如果他僅僅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

在歐洲中部中等的和較大的經營內，牲畜都被飼養在廄內，對於經營的進行所必需的資本往往是土地資本的百分之二七——三三，但是這資本有時可以降到百分之一五或增至百分之四〇，這要看經營的集約的程度如何而定。這種生產資本在薩克森，一公頃土地平均為四一〇馬克，而地產的平均買價為一、九三〇馬克（參看“小商販”，載郭爾慈：“農業參考書”，第一卷，第二七七——二七九頁及克蘭佛特〔Krafft〕：“商業經營”〔Betriebslehre〕，第五八——六〇頁）。

布亨貝爾格（Buhenger）引巴金的一個大農為例，這個大農的地產值四六、二三三馬克。這個總額中有六、八二〇馬克（百分之一四·七二）用在農具上，五、四八〇馬克（百分之一一·九）用在建築物上，而那時用在購置土地上為三三、九二三馬克（百分之七三·四）（見“農民的狀況”，第三卷，第二四九頁）。

所耗費的全部資本中只有四分之一真正地 在生產進程中起作用。

這樣看來，農業經營者在自己的經營上，可以當作實際資本利用的，只是他的資本的一小部分。他一定要將他的資本的極大部分——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資本，付給土地的原主，以便得到他的允許來進行耕種。因此他的經營一定要經常地有着較小的規模和較小的強度，比受他支配的資本所能有的規模為小。

但是因為實際家（和理論家相反）在一定的、上面已經指出的限度以內，在資本底同等耗費情形之下，寧願擇取較大的，雖然是負債的地產，而不願要較小的不負債的地產，那末要使農業經營者完全支付了地產價格那就很少有了。他差不多把受他支配的全部資本視為生產資本，並且把他打算進行的經營範圍拿來與他的資本相適合。他並不支付地價或只支付地價的一小部分；地價成為他的債務，地價

以抵押的形式加諸他的地產；換言之，購買者應有的義務是將地租付給他的債主——抵押品的所有者，這個所有者實質上就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

這樣看來，地產所有者底每次更換就是債務底來源。如果認為，所有者的更換是土地所有負擔抵押底唯一來源，認為土地改良的費用上的需要在這裏可以勿庸注意，是言過其實的話，那末說這種更換是抵押債務增長底主要原因，那是完全可信的。

在租佃制佔統治的地方，農業企業家可以把自己的資本完全用在經營上；在這種制度下農業可以更充分地發展其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主義農場經營就是資本主義農業的典型形態。

除企業家的資本底充分利用外，租佃制也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它容許土地所有者從相互競爭的農場經營者中選擇最能幹的和佔有大量資本的，而在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的時候，農業經營者個人則是由他的出身底機會，由承繼權來決定的。

這種情形在小經營之下就沒有多大意義。農民的經營仍舊是很腐敗、很簡陋的。農民的兒女很早就參加經營的勞作，因而得到必要的知識。在個別的農業經營者之間稟賦上的差異在這裏是有的，但這些差異都不怎樣大而且也不會怎樣地影響到經營上來。

大經營則另是一回事。大經營是一個複雜的有機體，管理大經營需要多方面的實際經驗，需要基本的科學的和商業的教育。大地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更加變成具有城市的需要和傾向的一個階級；吸引他們到城市來，他們自己的兒女受到城市的教育。農業方面的教育，對於大地主的兒子，決不像對於農民的兒子那樣必要。他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教育，不是給他一些基本的農業的或商業的知識。此外，大地主雖然帶了一些城市的風氣，但還是深深地沉溺在他們的封建的傳統內。宮廷和軍隊就是大地主後一代人的訓練學校。出身

的機會往往使年青人做了農業經營者，他在跑馬場和上等酒館學習過“功課”，並且成爲酒和馬底內行人。很顯然的，這樣的人在實際上是不會證明大經營優於小經營的。但是他的地產，特別是在地租增長的時候，還可以替他們長期地延緩着行將到來的破產。

租佃者情形又不同。他的地租不能抵補企業利潤上的虧損。他也不能以地產作抵押來幫助自己；他每年必須按時交納租金。如果，一方面，可以選出最有能力的農場經營者，那末另一方面，沒有能力的農場經營者就很快地成爲破產者。競爭對於農場經營者比對於同時是土地所有者的農業經營者起着更嚴重的作用。

然而除此以外，因爲資本主義農場經營者在獲得土地及建築物上並不要花費什麼，因而他可以將他的全部資本用在經營上面；因此在一定數量的資本下他能够以最大的強度去耕種較大的地產：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租佃制可以提供大量的純收入。

但是租佃制也有它的黑暗面。農場經營者所最關切的，是爲了要使土地能够提供較高的收入，他就去創造最優良的條件；可是他並不關心這種收入底經常性，他的租約爲期愈短，則他愈不關心。他使土地枯竭愈速，則經營對於他亦愈有利。契約固然可以禁止他這樣的經營，即使土質惡化和貧瘠的經營；租約在這一點上雖有明文規定，但頂多也只是做到把經營抑制在已達到的水平綫而已。租佃制是不能怎樣促進經營底進步。農場經營者全不關心於生產中的改善或採用新的耕種方法。生產上的改善和採用新耕種方法一開始就需要很大的費用，可是要表現出自己的良好結果——全部或一部分——只能在租約滿期之後；它們是租金提高的原因，也就是說，它們提高地租，而不是提高他的企業利潤。如果農場經營者不相信有可能在他的租期以內把所費的資本和利息一同收回來，那他是不放心去改善生產的。



租約爲期愈長，則租佃制對於農業的進步亦愈有利。但是在地租增長過程發生着的地方，地主就有了一切理由，盡可能縮短租約底期限；這就是將地租底增加完全放進自己荷包的一個最可靠的手段。

這樣看來，在租佃制下，也和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的情形下一樣，地租是有力地阻礙着合理的農業經營。承繼權同樣也是有力的阻礙。

## 二 承繼權

只有實行土地的完全私有制，取消等級的特權和取消出身的特權，才能斬斷束縛農業和工業的封建鎖鏈。並使農業底繼續向前發展成爲可能。資產階級的社會，不僅需要一切公民在法律之前平等，而且需要一切兒童在家庭內的平等，也就是說，在兒童間平均分配父母的財產。但是這曾引起農業迅速繁榮的同一制度，又很快地開始變成農業的新的鎖鏈。

父母底資產底分割是大量資本集中的強有力的阻礙。但是資本的集中——不僅是舊資本集中底產物，而且也是新資本積累底產物。這種積累爲數極大，雖然遺產的分配還在繼續，資本的集中，却大踏步地前進着。

在土地所有權上，還說不上有適合於新資本積累的現象，至少，在舊文明國內，每一小塊土地都有它的所有者。但是我們知道，土地所有權底集中比資本底集中碰到更大的困難。這裏遺產底分配必然強有力地有利於土地所有權底不斷分碎。

但是法律關係無論怎樣深刻地影響到經濟生活，後者總是決定的力量。因此土地所有權的分碎只有在前一章內所敘述的那些經濟關係容許這種分碎的地方才能實現。但是在這種土地細分發生的地

方,遺產的分配,就成爲加速發展的極其真實的手段。

反之,在地產預定爲商品經濟之用,而不是預定爲家庭經濟之用,即是說地產爲競爭所支配的地方,在最大的地產顯然優於最小的地產,土地所有權底細分招致直接的與顯而易見的不利的地方,例如在穀物生產佔優勢的地方,以及在農業經營者不能求助於副業的地方,情形就不同了;這裏地產的分碎自然在分配遺產的時候,就很難而且很少成爲經常的制度。在這些地方遺產的分配,往往實現於這樣的形式以內,即是一個承繼者保留全部地產而付給其餘共同承繼者以他們應得的部分。因爲這個承繼者差不多永遠不會擁有必要的資本來付給其餘承繼者以他們應得的部分,那末要實現這樣一種分配,照例,只有承繼者將地產抵押。這裏付給共同承繼者以他們應得的部分只是上述購買地產而沒有充分資本的一種特殊形態。但在承繼權之下,地產從這一人手裏轉移到另一人手裏是不能隨意所欲的,而且在承繼權之下自然而然地一代傳給一代。這裏承繼權只會達到這樣一個地步,就是承繼者得到自己的經營已經老早就負了債,並且他一定要把從經營獲得的剩餘用來償付抵押利息,因此他就不能集聚資本和改善經營。即使他能償清債務,他的繼承者也會處於同樣的狀況,甚至還要負更多的債,如果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地租底增加或資本利息底減低或兩者同時發生,由於這一個或這兩個因素,地產的價值就增加了。

地產價值底增加對於不再作農業經營的人,對於出賣自己地產的人是有利的,但對於成爲農業經營者的人,並購買地產或和其他共同承繼者一同承繼地產的人就不利了。有一種意見,以爲設法提高地產價格或人爲地保持較高的價格,是增進農業利益的有效辦法,沒有比這種意見更錯誤的了。這只是爲現有的土地所有者底利益、農業銀行底利益以及買賣地產的投機商人底利益着想的,絕不是爲農

村經濟的利益，尤其不是爲新的，行將代替舊的那一代農業經營者的利益，更不是爲農村經濟將來的利益着想的。

地產的細分或債務負擔的增加這是要選擇的兩條路，資產階級的承繼權把農業經營者放在這兩條路面前使之任擇其一。

在某些國家內，特別是在法國，農村居民企圖藉助“二子承繼制”(Zweikindersystem) 以避免這兩條路的選擇。無疑地，這會消除上述現存承繼權底不利，但是這種制度也像企圖幫助農民的其他手段一樣，牽動着整個社會底利益。資本主義社會爲了本身的發展需要人口大大的增加。勞動力極其緩慢增加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底競爭中就要落伍。這樣的國家在互相競爭的國家間就會因喪失自己的政治權力而遭受危險，就沒有可能把首先憑藉宜於武裝的人數的必要軍事力量投到歷史底比重上來。在法國“二子承繼制”的居於支配地位不僅引起國家軍事力量相對的減少——法國人口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九一年只增加了二、〇〇〇、〇〇〇，即從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三八、〇〇〇、〇〇〇，而從一八八六年起甚至毫無增加，當時德國在同一時期人口增加了九、〇〇〇、〇〇〇，即從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它同樣引起國內人口不能供給必要的勞動力，資本家只好從外國去吸取這種勞動力。他們招聘比利時人、意大利人、德國人、瑞士人及其他國家的人。在一八五一年時外國人在法國的，總計只有三八〇、〇〇〇人，佔人口百分之一，到一八九一年時、就已經有一、一三〇、〇〇〇，佔人口百分之三。在德意志帝國內，情形相反，一八九〇年時住居德國的外國人只有五一八、五一〇人，佔人口百分之一。這樣看來，“二子承繼制”損害國家底軍事權力及工業生產率而頂多是緩和土地所有制而已。這就是爲什麼法國的政府人員及經濟學家們一點也不爲挽救農村經濟的這些方法所惑。

### 三 指定繼承制與承繼權

在法國，革命徹底地掃除了封建經濟及封建的承繼權。反之，在英國及德國大的土地所有制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還保存了極大的勢力；這表現在承繼權底一種特殊形態內，大土地所有制替自己或最低限度，替自己最有特權的成員保存了這種特殊形態的承繼權——指定繼承制。照這種制度，土地所有權從個人底自由財產變為一家世襲的財產，轉為這一家的一個人（普通是遺產人的長子）使用，但無權將其全部或一部轉讓。承繼者的兄弟姊妹有同等權利享受遺產人的動產，但有關指定承繼人的地產則不得享受。普魯士從農業危機時期起，指定繼承財產的數量大大地增加了。在普魯士東部七省內，根據柯蘭德所說，已經確定的有：

十九世紀以前	153	1800 — 1850	72
1851 — 1860	46	1861 — 1870	36
1871 — 1880	84	1881 — 1886	135

從一八七一年起最近十六年間，指定繼承財產被確定的比十九世紀的最初七十年多得多。新的指定承繼財產底確立還在繼續着。不久以前在報上登載了一篇通訊，說普魯士在一八九六年確立了十三起新的指定承繼財產，在一八九七年則為九個。很明顯的，這種確立並不是“關心農村經濟”，而是關心少數貴族家庭底結果。

承繼權底特殊形態就是農民指定繼承制的一種變形，這種特殊形式並不把這樣嚴格的限制適用到土地所有權方面來，它留給土地所有者大有自由活動的餘地，但却同樣地取消遺產的分割。在大農佔優勢的德國和奧地利的某些地方，這種形式如果不是在法律上，就是在習俗上被保留下來的。在最近期間曾頒佈了各種法規，其目的在

鞏固這種習俗，並給它以法律的根據，因為保守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在習俗上看出一個最有力的手段用來保護作為私有財產支柱的這個農民階層。

這種承繼形式能夠消除從遺產底分割方面對土地所有權威脅的那些危險，最低限度在這種承繼形式堅決地，毫不動搖地進行着的地方，這在我們看來是不會有絲毫懷疑的。但是在這樣的場合之內，這種承繼形式不是別的，而是使在先參加共同承繼權的人喪失其承繼權，靠犧牲大多數的農民來挽救農民的經濟，剝奪有這種權利的人的承繼權來挽救私有財產，一言以蔽之，這是以增加無產階級數量的手段來建築水閘以防止愈益迫近的無產階級。

在世襲的大的土地所有權之下，取消幼子承繼權，例如，在英國所實行的，並沒有多大意義。教會、軍隊、行政當局都關心着要給予有才智的，喪失承繼權的這一輩人以薪俸優渥的差事。農民就不然。他們對國家和教會沒有這樣勢力，以便為自己的幼子利用國家教會來做慈善機關。有限制的承繼權在這裏不是別的，而是所有的兒女，除一個以外，都註定去做僱農。

但是這種承繼形式還以另一方法促進農民的貧困及無產階級化，這種承繼形式愈接近於家族指定承繼制，即是說這種形式愈是反對土地的細分及因遺產的分割而負擔債務，則促進農民的貧困及無產階級化亦愈迅速。這種形式予土地細分的傾向以決定性的優勢。這樣看來，這種承繼形式有可能擴大經營並將經營放在較為合理的基礎上，但同時却使許多小土地所有者離開他們依依不捨的故鄉的土地。

這種有限制的承繼權形式無論在習俗上，無論在法律上對於小農都沒有用處，這種形式對於小農只是一種鎖鏈：小農的幸福與其說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勿寧說建立在不依賴於土地所有的他們的貨

幣工資上。這種有限制承繼形式的使命，是在保護大農。在奧地利它只是對於“中等範圍的”土地有作用，在邁克林堡對於至少耕種三七又二分之一德畝的農地，在布萊梅對於至少有五〇公頃的地產，在威斯特發里尼及布蘭金堡對於從土地中所得的純收入不下七十五馬克的地產等等才有效。

大農底有限制承繼權不僅使他的年幼的兄弟姊妹，他的年幼的兒女成爲無產者，而且還有一種趨勢，使他的鄰人——小農也變成無產者。而這種有限制的承繼權就用這種方法同樣促進從農村向城市的逃亡，促進農村的荒蕪，也就是說，妨礙着合理的農業底發展。

例如，在黑森關於“有限制的承繼權的地方”，據說：“這裏已經有好幾年對於勞動者的缺乏發出了普遍的怨言。許多年富力強的人，沒有一點私有財產，他們都從這裏移居到工業區域；這裏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農業經營者及大經濟的所有者只好從他們當中去挑選自己所需要的勞動者”（見“農業勞動者底狀況”，第二卷，第二三三頁）。

這種情形在指定繼承制下在極大範圍內還是有力量。指定繼承制對於大地產底構成和擴大是一個強有力的手段。在任何場合要是斷言，在土地所有權內只是非集中化的趨勢佔統治並且只有人爲地障礙才能抵抗這種趨勢，那是不正確的。商品經濟在農村經濟內佔統治的地方，集中和非集中的這兩種趨勢往往一個跟另一個之後出現或兩者同時出現。據柯蘭德所說，普魯士東部各省，在上世紀（十八世紀）末期私人佔有土地在一千公頃以上的，有二、四九八人，所佔總面積爲四、六八四、二五四公頃。這個數字中有三〇八人是指定繼承財產底所有者，所佔的面積爲一、二四五、六一三公頃，即是比超過一千公頃的佔有面積底四分之一還多。在法國沒有任何指定繼承制。雖然這樣，可是在那裏大經營增長得比德國更激烈，像第一六二頁上所載的圖表就證明了。在德國五〇公頃以上的經營在一八九五年時佔全

部農業耕種面積百分之三二·五六；法國在一八九二年時經營面積在四〇公頃以上的佔總面積百分之四三·〇五。可惜在法國的分類統計中，只指出有四〇公頃之多的面積的經營數，而沒有指出它們的總面積。最有趣的，就是增加最多的正是最大的經營數。在四〇公頃以上的經營在一八八二年時爲一四二、〇〇〇，在一八九二年時爲一三九、〇〇〇，減少一一三、〇〇〇，其中：

	1882年	1892年	
40—100公頃	113,000	106,000	減7,000
100公頃	29,000	33,000	增4,000

固然，這是經營的統計，而不是土地佔有的統計，但它總指出了一般的趨勢。土地佔有的統計只會表現出比所引的經營統計還大的集中化，絕不會比它還小。

但如果說只有保護指定繼承制才能產生大的土地佔有是不正確的，那末說這種保護很有利於它的發生和發展，那總是正確的。這種保護同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農業所達到的高度發展創造出必要的前提條件。

廣大的地產首先便能爲每個個別的經濟部門在最能適合於這些部門的特性的範圍及形式內去配給土地面積；它能夠把不同的經濟部門結合在共同的有計劃的經濟組織內；另一方面，指定繼承制便於以加強經濟爲目的的資本積累，因爲指定繼承制使其免於因遺產的分割所招致的負累。根據一八八三年負債的數字看來，在普魯士四十二個行政區內土地純收入一塔勒（德國幣名相當於三馬克）的負債（包括被抵押的建築物方面的債務）爲：

指定繼承財產及根據遺囑特殊條件的地產	從土地上獲得純收入的其他地產		
	500塔勒以上	從100至500塔勒	從30至100塔勒
20.30馬克	84.40馬克	54.10馬克	56.20馬克

保障指定繼承制所固有的所有權，勢必引起長時期的改良，而同樣促進着租佃關係底發展，這些租佃關係，在佃戶相信他的權利不致因地產轉移到別人手裏或在土地所有者破產情形之下而被破壞的地方，最容易發展起來。

所以，由於指定繼承制而被保存的大地產底存在，產生兩種較高形態的資本主義農業，在英國為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在奧地利為連合許多農家成一巨大的經營，這一事實我們不應把它認為是偶然的。

但如果大地產底這一形態甚至表現出比土地所有權底其他各種形態有更大的可能性進行更為完備的資本主義的經營，那末也正是這種為指定繼承制所保存的大地產，比土地所有權底一切其他形態更能消滅在最合理基礎上進行經營的必要性。這種必要性消失，首先是因為大地產底所有者沒有必要在競爭的鬥爭中去保護自己的地產。我們不屬於那些人，他們把市場上的競爭與生存鬥爭混為一談並以自然的必然性來解釋它們。社會成員底某種相互競賽及選擇最適當的，當然是一切社會繼續進步及鞏固已經達到的發展底不可缺少的條件。可是，要是有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底實質既不和這些競賽相容，也不和這些選擇相容，那他就大錯而特錯了。階級差別底消滅，各個社會階級底生活程度底平等絕不意味着任何足以提高各個個人能力的社會差異底消滅。現時在工人聯合會內部，在它的會員間並沒有任何階級的差別，任何生活舒適水準上的差別，我們看到差別是在尊敬上、威信上、個性表現底方式上以及和這些情形相適合的——在選舉代表和管理全工會事務的人時的競賽和選擇，很顯然地，這些差別在如像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複雜的整體內，還要更加增長。生活水準底平等，一點也不壓制互相間的競賽，而且也不會在調換較高的而同時是最負責、最困難的職務的時候，使選擇最適當的人成為不



可能；平等可能是這種競賽底必要的前提條件。馬的競走，若是從跑馬場底不同位置開始賽跑那是不可思議的；一開始就處於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競賽，同樣是不可思議的。然而，選擇最適當的人只有在處於同一條件的人們當中才能實現。

這種競賽和這種選擇並不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意義上的競爭。競賽和選擇現時在資本主義企業內部即已發生，在這種企業內佔支配地位的不是像這些經濟學者所了解的那種競爭，而是有計劃的共同協作。作為經濟生活調節器的這種競爭底統治，是開始於有計劃的協作中止的地方。各個獨立的企業底相互關係在商品生產下是由競爭來決定的。各個企業內部生產有計劃地調節着，在這種情形下就會達到最高的節省；但是在社會內部生產仍舊缺乏一般的計劃，如果生產不是成爲完全混亂的，那只是由於生產過剩的生產品變得一錢不值，而那些在它們上面耗費了極少社會勞動時間和並不滿足需要的生產品，却要在它們的價值以上支付，這是所能想像的最浪費和最不合理的制度了。

個別企業底所有者及管理者底選擇方法也適應着商品經濟內計劃性底缺乏。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統治下，這種選擇首先決定於出身的機會，選擇由競爭來決定，那已經是次要的了；可是這種選擇的作用不是提拔最有能力的人，而寧可把沒有能力的人捧上台，因而不是把沒有能力的管理者辭退出他的企業之外，而是廢棄他的全部企業——這種方法，就其殘酷及無結果的浪費力量而言，在任何場合也可以和自然界中各個有機體底生存競爭互相比擬，姑無論它們在其他方面絕少共同之點。

但是這種方法無論怎樣粗暴而浪費，在商品生產及生產資料私有制統治之下，它是單獨保證着各個企業內部生產底最大節省和最可能的合理配置。雖然指定繼承制並未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

生產資料私有制之下進步只能由競爭的強制力來完成，但是這種強制力量對於指定繼承制是不存在的。指定繼承制所保障的地產底所有者進行事業無論怎樣不好，他只能因此減少他的收入，但不會使自己的地產遭到任何的危險。

幻想着藉助另一種指定繼承制來保障工業資本或商業資本底完整性，那是不可思議的。這種資本極其變動不居，不會忍受這一類的束縛。資本經常處於物質交換過程中：今天它存在於貨幣形態內，明天又存在於生產資料形態內，後天又在商品形態內；它經受各種各樣的縮小和擴大，危機期及繁榮期的交替等等。反之，土地，無論人們怎樣常常拿它來和資本相比擬，它却完全受另一規律支配。土地本身不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不受流通過程的支配。從物質方面說，土地與採取資本形態的生產資料完全不同。生產資料被磨損，土地却不被毀滅。生產資料由於新的發明，往往變成廢物，土地則一成不變地仍舊為一切生產底自然基礎。資本間的競爭隨着資本的積累而增長，也就是說，隨着工業和人口底增長而增長，土地則隨着這種增長的比例而更加帶有壟斷的性質。

因此任何一家企圖把指定繼承制的限制加之於工廠或銀行來保證其佔有自己的資本是如何地不可思議，在土地所有權下要使這種限制去適合一家的利益，也一樣是不可思議，雖然指定繼承制並不如土地所有制底任何其他形式強制進行更合理的經營。現有的土地所有者在經營不良的時候，只是損害其自己，暫時減少自己的地租，但他不會破壞家庭收入底基礎。這種基礎能使幾代人生活下去。

在受指定繼承制束縛的土地所有權之下，經營的不良是很明顯的。現代的指定繼承制是以國家政權極關懷各個土地所有者家庭底幸福為前提，因為這個政權容許並維護指定繼承制。屬於宮廷貴族的這些家庭，於是便處於特權的地位；這一種職業使他們遠離了農業

而且使他們不宜於做農業經營者。雖然如此，但如果指定繼承制的大地產不是屬於最壞的經營，而有時甚至還是模範的經營，那末它們或者應歸功於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因為這一類的地產對於這種租佃制是最優良的土地，或者應歸功於現代的農業學校，提供大批有能力的管理人材，這些人材，爲着低廉的工資就去替大地產底所有者服務，在他們的地產內找到最好的機會去應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

但是疏忽而無能的土地所有者在選擇其佃戶或管理人時頂容易犯嚴重的錯誤。總之在多數大地產內優良的經營，不是證明指定繼承制底優越，而是證明大經營底優越，大經營的優越甚至在最不利的情況下都能表現出來。

指定繼承制妨礙最合理的經營不單是由於它保障土地所有者的地產。指定繼承制或者一開始其本身就是大地產，或者，如像我們看見的，它促成這樣大地產底構成，因爲它排除土地所有權非集中化的傾向，而只許表現出集中化的傾向。但是地產愈大，則它所產生的地租總額亦愈多，土地所有者的生活亦愈奢侈。可是土地所有者們，尤其是指定繼承的地產所有者，他們的封建時代的傳統還很有力，他們極重視那些與土地的佔有相聯系的享樂。地產愈大，地產的某一部分經營愈好，地租愈高，則企圖將地產的其餘部分留着專供享樂之用，建築華麗的莊宅、極其別緻的花園以及飼養禽鳥的園圃等等亦愈大，也就是說，用於生產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地產亦愈小。此外城市中資本主義剝削底發展在同一方向內也有影響。隨着剝削底增長，隨着剩餘價值量底增加，資產階級中的奢侈也就增長，這種奢侈表現在別墅的購置和建築——從財政大王的巍峨高大的莊宅以至小商人及工廠主的別墅——這些別墅其主要用途是在享樂，在這些別墅中農業經營反成一種副業。交通工具愈發達，城市與鄉村間的來往愈便利，則這些別墅位置亦愈遠，而農民亦愈大批地被它們逐出於自己的

土地。

但是剩餘價值量底增加及城市與鄉村間往來底便利，不僅表現在別墅的建築，而且表現在游獵底擴大，這種游獵已不是封建的特權，而且也成了資產階級的享樂。這一方面引起森林的增加靠犧牲農民的地產，另一方面則引起野禽的加意保護和繁殖，甚至並不擴大森林的面積。不是單單森林供給野禽以食料，野禽在田野及草地上都可覓到很好的食物。鳥獸底繁殖，像森林的增加一樣，對於農民的經濟有極大的破壞作用。雖然如此，游獵底擴大有時對於農民也是有益的。這種游獵擴大到這樣的地步，即在某些將自己的田地出租作游獵之用的農村公社內，需要超過供給，租價因之增加。在這樣場合內每隻山兔價值很貴，在農民看來，用自己土地的生產品來飼養山兔和鷓鴣比養牛和人更有利。對某些農村公社因出租獵場而得到很大的收益。但是農業底合理經營往往從狩獵方面碰到許多障礙。

這樣看來，甚至城市中剩餘價值的增加也會引起對農業有害的傾向，像地租的增加及承繼權一樣。至於說到承繼權，那末它的有害的影響，那些經濟學家愈接近農業的考察，就愈容易看出。但是他們以資產階級社會利益底代表者資格絕不會要求取消土地承繼權和將土地變為社會公有。理論上土地社會公有自然不是和資產階級社會不相容的，但是資產階級本能地覺得，資產階級社會底各界都有緊密的聯系和相互影響，因此資產階級堅決地反對土地公有，雖然土地公有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相容的，雖然土地公有能將農業從某些最受限制的而且是隨着每一代增長的慘痛之中解放出來。

資產階級經濟學寧願以學術的方式專心研究徵候，想出特殊的借貸形式，以便稍稍緩和在承繼方面與地產轉移有關的債務。資產階級經濟學大部分在解釋兩種承繼制度——遺產底均分與一家中一

人獨佔遺產——都一樣是有害無益的，並且從這裏做出結論……它們兩者底必要性；這一個作為另一個的解毒劑。如果在英國指定繼承制的各種形式佔優勢，而在法國遺產均分制佔優勢，那末德國却是一個極樂世界，那裏這兩種制度並肩地起着作用。可是我們不能承認，德國的農業所處的地位，由於此種情形，會比英國的或法國的農業好些。

但是上述的一切，還沒有把在資本主義生產影響下發生和加強的對於農業有害的一切因素概括無遺。

#### 四 城市剝削農村

我們已經看見，地租與農業經營者底債務是如何增長的。地租及借款利息只有一部分留在農村被消費着或被積累着；大部分則流入城市，而且這一部分還日益增長着。當農村還保存着自己的家長制的性質時，農民就不得不在鄰近的地方去找出借金錢給他的人。他的債主不僅是農村中的猶太人、穀物和牲畜商人、店主、旅店老板，而且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富農，他們善於盤算並不比別人弱。但是隨着一切關係底發展，借貸已不是一種為不良的經營或特別的不幸所引起的偶然行為，不是一種盡可能秘密進行的行為，因為借款底必要，往往能使借款者結束貧困的處境；由於利用信用借款已成爲生產進程底必要部分，由於城市與農村間商品流通底發展，原始的、秘密的高利貸就爲特殊的機構所排擠，在這種機構內，公開地進行信用借款業務，借貸成爲正常的行為，而不是在絕望中才採取的最後手段。因此借款不是用高利（搶奪式的利息）來償付，而是只用通常的利息來償付。這些機構或者一開始就是在城市設立的，如銀行及許多信用協作社，或者向城市資本家借自己所必需的資本。信用事業底這種

轉變乃是發展底必然階段。但是它對於個別的農民無論怎樣有益，整個講來它只是標誌着農村債務底增長，按照這種債務農村不得不納稅給城市；農村中被創造出來的價值底經常增加的那一部分都流入城市，而沒有任何其他價值來抵償。

地租也發生同樣的情形。資本主義愈發展，則城市與農村在文化條件上的差異亦愈大，農村亦愈比城市落後，生活上的享受和娛樂的手段亦愈使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地位。同時城市與農村間交通底便利亦隨之發達。如果地租十分高，如果地產達到這樣的範圍，可以租給佃戶或委託僱員去經營，那末地主當然寧願把一年的大部分時間或小部分時間消磨在城市內，並在城市內花費他的地租。這種傾向底極端表現，就是走向不在主義，走向地主離開自己的地產，例如在愛爾蘭和西西里亞，一向忽視家務就使無限的大地產回復到這樣荒涼的境況，甚至地主在自己地產內短時期勾留都不能滿足他享樂，而享樂又是這般地主底生活底唯一目的。愛爾蘭和西西里亞的經營顯示給我們為指定繼承制所維護的大地產制度底悲慘結果，這是發生在現代資本主義大生產沒有發展的地方，或者發生在資本主義大生產不能消除這些悲慘結果的地方。但是除了極端的不在主義之外，大地主暫時離開自己的地產已成為平常的現象，同時他的大部分地租從農村流入城市也成為平常的現象。在農村中地主底奢侈生活（打獵、華美的莊宅）也只有損害農業，促成耕種面積減少，及解放農民勞動力，而在城市中，同一的生活方式，却鼓勵工商業底發展，引起各種職業底增加，勞動力底吸引及資本底積累。

日益增長的，且以極重的壓迫加諸農民的貨幣稅在同一方向內也起着作用。

在城市內生產一開始就是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底發展產生貨幣稅。在農村內生產，尤其在最小經營內，甚至就在現在主要還仍舊是

爲自己消費而生產，城市底發展強迫農村接受租稅底貨幣形式，這不是從農業的生產方式中發生的，而起初甚至和農業生產方式，立於矛盾地位的，由於這種情形租稅底貨幣制度就成爲生產方式中變革底強有力的因素。

貨幣租稅在農村中是自給生產發展到商品生產的一個動力。但是貨幣租稅及農民底爲貨幣所補償的其他需要，往往比農村的商品生產及與之相適應的商業及信用機關，增長得更快。這種情形直到現在都常常是農民經常感到貨幣的困難及其依賴商業仲介人和高利貸者底原因。

但是這樣厲害地壓迫着農民的貨幣租稅並不是促進農村底發展，而是促進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底發展。國家的稅收只有極小一部分才用到農村方面：城市中設置兵營，城市中設有兵工廠、政府各部、法院。其次，在城市中有律師，當農民涉訟時，就得酬報他們；在城市中存在着以國家款項開辦的中級和高級的學校、國庫開支的博物院、戲院等等。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要分担文化設施的經費，但是農民却完全享受不到文化底福利。農民不懂文化，並且仇視文化，是不足奇怪的。因爲文化只是以租稅的形式加之於農民；農民對反動的宣傳抱歡迎態度，這種反動宣傳好像體念民艱，要求限制文化事業的費用，它不是設法將文化普及到農村方面去，不是設法消除城市與鄉村間文化的對立。這將是未來社會底一個主要任務。全部政治生活集中在城市並不是因爲對農業的敵視態度，而是由於比政府底願望更有影響的經濟力量底統治。現代的政府很親切地對待農業，甚至如大家所知道的，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如糧食稅、各種的鼓勵及獎金來支持它。

但是在財產關係上，因這樣的方法所產生的變動無論怎樣劇烈，商品資財如沒有城市資財底相當等價物，則其從農村流出底過程，不

僅不停止，甚至也不受阻礙。所有這些補救方法終究只是有利於土地所有權；這是提高地租的一種手段。我們知道，地租加重農業的負擔；地租的作用，在租佃制下是明顯的，可是在抵押制下就隱蔽了，但還是有力的。在租佃下這種支持使佃戶能夠付出更高的租金。在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同是一個人的地方，前者，顯然和後者一同佔便宜，但是地租底增加會引起他的地產價格底提高，這種情形，又會推動現有的土地所有者去增加他的地產上的債務，自然也會引起他的繼業者——不管是買主或承繼者——底債務負擔底增加。經過短時期幫助農業，在這裏就變為幫助實際的土地所有者，即取得地產抵押出借金錢的債權人。

這些債權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內；在那裏大地主消費其地租底大部分；地租底提高，由於賦稅、獎勵等等，並不意味着課城市的稅以利農村，或使價值從城市回復到農村。地租底提高勿寧說是意味着，除農業以外，大量城市居民也被征斂，以利少數的，大部分住在城市內的地主及其城市中的債權人。

農業經營者為支付租稅、借款利息及租金而不得不出賣的生活資料，如麵包、肉、牛乳等等之日益從農村流出，是與它們的等價物底返還不相均衡的，而且不斷增加的資財流入城市相符合。同時因為農村居民供自己需要的家庭工業底不斷衰落，因為農村居民對城市工業品需要底增加，於是這樣的價值（與流入農村的它們的等價物相符）從農村流入城市亦隨之增加。但是從價值律底觀點說，這種流出雖然完全不是意味着農村為城市所剝削，可是實際上它像剛才敘述的諸因素一樣，引起農村物質的榨取，引起土地缺乏養料。農業技術底進步，絕未補償這種損失，而只是迅速地引起從土地中吸取地力底方法底不斷改善，引起每年從土地吸取的和流出到城市的食物底數量之增加而已。



反對這種意見的人會提出一種見解，認為現代農學認定農業的靜態為重心，並且要求從土地中吸取的營養物以適當的肥料重新回復到土地去。可是這種見解絲毫不能動搖上述的意見。土質不斷貧瘠已是牢不可破的事實。在城市與農村目前的關係下及在現代土地耕作方法下，這種貧瘠在短時期內如果不施用補助肥料就會使農業趨於衰落。補助肥料有可能預防土地肥沃度底減少，但是要大規模應用補助肥料，這只是把新的負擔加上許多其他不是自然必需底結果而是現存社會關係底結果的負擔加到農業上。在城市與農村間對立消滅的時候，或至少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與荒蕪的農村間對立消滅的時候，從土地中汲取的東西才能夠完全回復到土地中去，補助肥料在這樣場合內就僅是指以某些物質，使土質富饒而言，而不是抵消土地的貧瘠。農業技術底每一成就，那時也就表示出土地中所含容易溶解的營養物底增加，即使不添加人造肥料。

很顯然地，雖然農學十分進步，在英國從六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麥的收成減少了，在這時期以前麥的收成是增加了的。一英畝年收平均為：

年代	
1857——1862	28.4 普式耳
1863——1868	30.8 普式耳
1869——1874	27.2 普式耳
1875——1880	22.6 普式耳

收成底這種減低在八十年代停止了，這不是由於地肥底增加而是由於海外競爭把不適用於種植小麥的土地變為牧場，因此只剩下最肥沃的土地用來耕種。種植小麥的面積從六十年代起到現在由三、八〇〇、〇〇〇縮小到一、九〇〇、〇〇〇，這就是說恰好縮小了二分之一。

此外還應當提一提家畜流行病及植物病害，由於資本主義文化底繼續發展，益加頻繁地降臨農業，並將極重的負擔加在它身上。有些災害在最近幾十年來已經具有這樣規模，許多國家的農業活動完全陷於麻痹了；關於葡萄蟲及甲蟲、馬口病、丹毒以及豬瘋所招致的毀滅也值得一提。

“葡萄蟲爲害所受的損失，（法國）甚至引起稅收的減少，在一八八四年時估計有一二五、九〇〇、〇〇〇法郎，在一八八五年爲一六五、六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六年爲一七五、三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七年爲一八五、一〇〇、〇〇〇法郎，一八八八年爲六一、五〇〇、〇〇〇法郎……根據新近的材料看來，葡萄蟲爲害所招致的損害還繼續着。從第一次（一八八〇年）出現時起，這種害蟲已遍及六十三區（一八九〇年）而且使幾十萬公頃葡萄園都變成一片荒土”（若累斯喬克〔Juraschek〕：“世界經濟概論”〔Uebersichten der Weltwirthschaft〕，第三二八頁）。

在德國由於馬口病所受的損失其情形如下：

年 代	犧牲畜的戶數	其中損失的頭數
1887 年	1,242	31,868
1888 年	3,185	82,834
1889 年	23,219	555,178
1890 年	99,693	816,911
1891 年	44,519	821,130
1892 年	103,929	4,153,519

一八九二年以後家畜流行病暫時減弱了，但是到一八九六年家畜流行病又延及六八、八七四戶，其中損失的，總計有一、五四八、四二九頭。

這是多麼可怕的數字。

我們覺得，家畜流行病危險底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於從前有用的動植物品種，為“改良的”品種，即為人工選擇底生產品所排擠。自然淘汰引起個體，最宜於保存物種的小農底選擇和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人工選擇，就把這一契機放在一邊；人工選擇的任務就是最宜於變為價值的個體底選擇和培養，它們需要最少的費用，它們成熟得最快，它們的有用器官最為發達，其不能變為價值的器官就會盡可能萎縮下去。這一類“改良的”品種產生的利益比自然發展的品種更大，但是它們抵抗不良條件的堅實性及能力則異常之小。同時由於改良品種底抵抗力底減少，它們就得到更大的傳播。“改良的”動植物，只有在極周到極巧妙的照顧之下才度其幸福生活的，在現時，由於竭力保護和改善它們的經營，才找到通向這些經營的路。同時經營底性質也起了變化，這種變化在牲畜飼養底方法上尤為顯著。牲畜賴以恢復其壯健和能力的夏季牧場已不存在，可是永遠需要貨幣的農民，其放置牲畜的地方並沒有改良也沒有擴大。在農民的這些廄舍內，既狹小又污穢，就是中世紀粗壯的牲畜都很難在它裏面過冬，現時羸弱的牲畜却一輩子關在它裏面。甚至在英國就在高度發達的牲畜業內，廄舍大部分都很難令人滿意。

“威爾遜·弗克司 (Wilson Fox) 在其從郎卡郡 (Lancashire) 寄來的報告中證實，那些不衛生的，和建築不良的安置牲畜的場所，因地方不寬闊和空氣不流通，更促成牛羊間結核病底普遍。在別の場合一頭牛需要六百立方英尺空氣，這裏却只有二百六十立方英尺，而隔離病畜的廄舍則全然沒有。有一個目睹者指出，如果建築廄舍的法律在喬爾萊 (Chorley) 區真正實行起來，那末要有百分之〇·七的牲畜廄舍應當加以取締” (“一八九七年英國農業調查報告”，第三六三頁)。

助長荒蕪(為有害於植物的昆蟲所造成的)的原因之一，就是食

蟲鳥底絕跡，食蟲鳥的絕跡不僅是由於對它們的迫害所引起的，而且是由於農作物底發達使它們在築巢時遇到更大的阻礙所引起的。在森林業方面，現代的大生產——建築用的木料為薪柴所排擠和生長很慢的寬葉樹為生長很快、迅速變為資財的針葉樹所排擠——這都是因害蟲更促成森林底荒蕪。

如果現代經營底選擇和方法減少植物及家畜的抵抗能力，使它們不能抵抗威脅它們的那些小生物，那末交迫底發達便幫着這些有害的生物底迅速推廣，使整個區域變為荒蕪。土地生產物底柔弱性底增長和土地底貧瘠並進。除了肥料上的費用外，還有防止家畜流行病及害蟲的費用，而在害怕花錢或在無力花錢的地方，災荒就常常發生，而家畜流行病和植物底各種破壞者就會完成農業底毀滅。

## 五 農村的荒蕪

大城市底發達和工業底繁榮，像我們已經看見的，引起土地正在增長的貧瘠並將新的，更大的負擔，以防止土地的貧瘠而在肥料上經常增加的費用的形式，加在農業身上；但是城市及工業底影響並不限於此，它們從農業方面奪去了它的勞動力。

在第七章內我們已經看見，農業大生產底發達怎樣把小農及農村勞動力底後備所從農村排擠出去。可是這個過程有它的一定界限。另一方面，我們在前一章內研究了定期的遷徙和暫時的外出，是由於小農需要補助的工資。這種現象往往也會引起從農業汲取對它的合理經營所必需的勞動力；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從農業汲取勞動力，資本從工業中、從城市中流到農業方面，也會促進農業措置在合理的基礎上。可是在城市及工業區域底吸引力影響之下，農村人口底逃亡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

在城內僱傭勞動者比在農村內有更大的可能性得到職業，更容易置備獨立的家庭經濟，更能享受自由和文化底福利。城市愈大，這些優點亦愈多，它們的吸引力亦愈強。

在農村內一個家庭只有獲得(購買或租佃)私有的農業經營才能置備私有的家庭經濟。這種情形在大經營發達的地方，就特別困難，因此在這些地方農村逃亡就特別厲害。但是在土地愈加分碎的地方，備置家庭經濟也常遇到很多障礙。這樣的經濟對於僕役，僱農及女僱農是完全置備不起的，因為他們缺乏充分的儲蓄。他們被命定不僅失去私有的經濟，而且被命定做別人家的不自主的附屬物過一輩子，結婚和家庭沒有他們的份。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面前只有一條到達獨立與自由，結婚與成家的路，而家庭和結婚底維護人，信教的大農或貴族地主是不允許他們結婚與成家的：這條路就是逃到城市去，逃到“無道德的”社會民主黨人，家庭與結婚底這些破壞者那裏去。

從一個一生過着僕役生活且充滿了生活情感的農民底一本小書中，隨便幾段都能表示出，這個動機在處於僕役地位的農村居民方面是如何強烈。我們在它裏面找到如下的話：

“現在自由和人的尊嚴，無論什麼地方都不像在僕役或一無所有的農村勞動者當中那樣受到損害。大家都知道，結婚對於農村勞動者是多麼的困難，因此我們不必詳論這個問題，而直接轉到從這裏所產生的後果。因為，一方面，絕大多數體力上正常發展的人不能完全壓制性的需要，而另一方面，現代的社會條件使這種正當的要求不能實現，於是為保護現代秩序而規定的限制，自然就經常地被違犯了。不正當的性交無條件地是這些困難條件底必然的後果，並且這種不正當的性交在農村的僱農及僕役當中逐漸成為這樣平常的事，以致道德和宗教底說教者無論怎樣努力都不能把它們驅出於現社會之外。現代的婚姻對於這些階級是辦不到的，為什麼他們會墮落到低

級的性交勾當……很顯然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雇農或勞動者底生活當然就充滿了各種卑躬屈膝，做着許多秘密的勾當、欺騙、無恥、強暴及其他和人類尊嚴不相容的這一類事實。此外鄉間的一般輿論在道德問題上還要比法官更嚴厲，因此，許多人寧願在大城市底漩渦裏面避開銳利的惡評。

僅是未能滿足的愛情的需要或與愛情有關的各種限制便把從鄉村逃到城市的大部分人驅到這個墮落的舞臺上，以致在那裏除少數的幸運者外，一代復一代更加陷在更大的貧困和完全墮落的境地。然而農村無產者底後代，在他的家鄉期待些什麼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用幾句話來敘述。對這樣的人的商品雖有迫切的需要，可是這些後代底生存，頂多只是加重他們父母底負擔；他們很少有可能得到父母的教養，因而他們也沒有一點真正天倫之樂的觀念；在絕大多數場合內，最大的光榮，自然是希望他們不要使公社的負擔過於重大。他們的人生行程開始於他們父母底貧困與恥辱；沒有充分的教養，就是人生行程的繼續。最後，僱傭奴隸底苦命，就是他們佈滿了荊棘的道路，往往不是為愛情所粉飾的道路”（約翰·姆·費爾哲〔Johann M. Filzer〕：“人類社會發展及農民特殊問題底研究”〔*Anschauung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Bauernstandes*〕，第一六一、一六二頁）。

私有的家庭經濟，不僅使他們能夠合法的結婚和成立家室，而且使他們在自己職業之外，能夠成為當地的公民，能夠和意見相同的人聯合，——工人羣衆集中在不大的區域內，也促成城市大工業內的這種團結；組織的力量與參加市政的和國家的生活就開闢一條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的道路。這種情形當然也會把農村勞動者吸引到城市中來。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農業愈精耕，則它給予自己

的勞動者的工作亦愈不均勻。其實有些機器大大地減少了從事勞動者的人數，——例如打穀機使原先在冬季工作的勞動力底大部分成爲多餘的，別的機器——例如條播機——却正需要更多的勞動。輪種制經營也有必要種植需要培壟的所謂地下莖植物、馬鈴薯、甜蘿蔔之類，它們在發芽生長時期三番五次地需要人手的勞作，清除雜草和培壟等等。因此農業底精耕一般講來有減少冬季它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底趨勢，其實在夏季在同樣耕種面積上它需要比較多的勞動人手。這種情形，一方面，引起僱工及因特殊債務而與經營聯系的日工——在整年期間不得不養活他們——底人數之極端減少，而同時對於不因任何條件被聯結於經營的日工却成爲職業更不固定的原因。生存日益沒有保障，在農業是工資唯一來源的地方，當然會把農業勞動者趕到城市去，固然在城市中也一樣沒有固定的職業，可是總有很多機會，在一個部門找不到工作，可以到別個部門去找工作。

交通道路發展愈迅速，城市與鄉村間往來愈便利，農村勞動者愈熟悉城市關係，愈易跑到城市去，則遷徙到工業區域和城市底過程發生得亦愈迅速。

城市與鄉村間，生產地與市場間，交通底便利也是農業中強度的商品生產底繁榮底必要條件。農業經營者大家都很熱心地力爭鐵路及郵政底改善和擴大，但同是一個郵政局，它供給他們市場和播種情況的消息和商業信件，它也把逃避了鄉村的奴隸地位移居到城市去的幸福的親戚底信件帶給農村勞動者，甚至帶給他報紙，這固然是“善意的”，但不幸的是，它們愈是好意的，却愈是叫囂着城市工人底幸福和過分的要求，因而使受凌虐的農村勞動者垂涎三尺。就是把機器和人造肥料運給農業經營者而將他的麵包、他的牲畜、他的牛油供給城市購買者的錢路却從農業經營者那裏帶走了替他製造一切生產產品的人。

軍國主義也在這一方面起着作用，它把許多年青人從農村吸引到城市，並且使他們認識城市生活。誰要是去服軍役，那他對於農業不僅是兩年(指服軍役期)而是永久地失掉了。大地主和富農——軍國主義國家底強有力的擁護者，因此而感到最大痛苦這是不足為奇的。

羨慕城市最先只是一無所有的勞動者，而他們當中多半是未婚者。但是由於加在農業上的賦稅的負擔底增加，債務底增加，土地底貧瘠，由於農民經濟和大生產(以及和海外生產，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邊還要說到)競爭底加劇，由於要能夠支持這種競爭只有經過過度的勞動，不使自己滿足一切文化上的，有時甚至必要的生活上的需要，自願退化到最野蠻的狀況，——農民的土地就更加無力維繫其所有者，從農村向城市逃亡更加深入到小農最多的區域內。這種逃亡就其範圍而言，在現時已經超過了人口底自然增加並引起農業人口底絕對減少。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在德意志帝國內，農業經營數從五、二七六、三四四增至五、五五八、三一七，農業耕種底面積從三一、八六八、九七二公頃增至三二、五一七、九四一公頃。但是靠農業為生的人口在這同一時期，却從一九、二二五、四四五人，減至一八、五〇一、三〇七人，即減少七二四、一四八人之多。這種減少在小農人口最多的地方也和在大農人口最多和大地產佔優勢的地方一樣；這種減少在普魯士王國各省及整個聯邦國家都表現出來，只有布魯斯威克(Brunnswirck)是例外，在那裏農村人口從一二〇、〇六二增至一二五、四一一。德國僱傭勞動者的人數如下：

	1882年	1895年	減(-)或增(+)
在農業內	5,881,819	5,619,794	(-)262,025
在工業內	4,069,243	5,955,613	(+)1,886,370
在商業內	727,262	1,233,045	(+)505,783



在法國也有同樣現象。法國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有如下的改變：

年 代	農業人口	非農業人口	農業人口佔人口總額百分比%
1876年	18,968,605	17,937,183	51.4%
1881年	18,279,209	19,422,839	48.4%
1886年	17,698,432	20,520,471	46.6%
1891年	17,435,888	20,907,304	45.5%

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也同樣是農村人口底絕對減少，並且這種減少也同樣是爲勞動者人數底減少所形成。

在法國的農業內參加生產的人數，計有：

	1882年	1892年	增加(+)或減少(-)
自耕農	3,460,600	3,604,789	(+)144,189
僱 農	3,452,904	3,058,346	(-)394,558

在這裏僱農人數底減少比德國更厲害。

在英國這個大的農業經營和大城市最發達的國家內，農業勞動者人數底減少表現得尤爲厲害。在英國農業經營中僱傭勞動者底人數，在一八六一年總計有一、一六三、二二七人，在一八七一年有九九六、六四二人，在一八八一年有八九〇、一七四人，在一八九一年有七九八、九一二人。他們的人數三十年來就減少了三六四、三一五人，即是說減少了百分之三一·三，或者說減少了將近三分之一。

但是這些數字還沒有充分表示出農業經營所受的損失。我們已經指出，最年青而又能自立的人逃亡的特別多，留下的盡是兒童和老人。這種情形，無論就定期遷徙而言，或就徹底遷徙而言，都是的確的。但這只是意味着，由於農村人口數量底減少，同時它的工作能力亦隨之減少。

最近的職業統計，給我們說明了這種現象。德意志帝國在一八九五年時總計有八、二九二、六九二人從事農業，八、二八一、二二〇

人從事工業。在這兩個職業部門內勞作的人數差不多彼此相等。但要是按照不同年齡把他們分類,那是怎樣的不同呵!

14歲以下	14—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歲以上
農 業							
135,125	1,712,911	1,761,104	1,347,206	1,232,989	1,149,404	702,268	251,685
工 業							
38,267	1,770,316	2,321,139	1,750,933	1,206,624	759,403	336,256	98,282
在農業方面增加(+)或減少(-)							
(+)	(-)	(-)	(-)	(+)	(+)	(+)	(+)
96,858	57,405	560,035	403,727	26,365	390,001	366,012	153,403

這樣看來,農業讓給工業一百多萬的勞動力,正是從十四歲到四十歲最有工作能力的幾類年齡;在不大宜於勞動的那幾類,同樣的超額(一百多萬)留給了農業。

我們從巴洛德 (C. Ballod) 的著作(“都市和鄉村居民底生活能力”[Die Lebensfähigkeit der städtischen und ländlichen Bevölkerung], 第六六頁) 中引用的圖表含有更可驚的數字。普魯士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一日公佈的統計,每一千人中:

以年齡區 分的人數	農村公社 及采邑	二萬人口以 上的城市	農 村 人 口 增 減
從出生到十五歲	379	313	(+)66
從十五歲到二十歲	94	100	(-)6
從二十歲到三十歲	143	210	(-)67②
從三十歲到四十歲	122	149	(-)27
從四十歲到五十歲	100	105	(-)5
從五十歲到六十歲	79	66	(+)13
從六十歲到七十歲	54	38	(+)16
從七十歲到百歲	29	19	(+)10
總 計	1000	1000	—

② 原文為七七,必係誤排。

這裏還可以舉出一些數字，這些數字我們是在霍德斯丁“論職業與財富底分配”一書中找到的。霍德斯丁研究了英國各伯爵領地從十五歲到四十歲年齡中人口的百分比。不必詳細列舉，我們只要引用八個最大的和八個最小的農業領地的絕對數字就行了。

伯爵領地	1891年每一千人口中：		伯爵領地	1891年每一千人口中：	
	在農業方面的人數	從十五到四十五歲的總人數		在農業方面的人數	從十五到四十五歲的總人數
根廷頓	232	400	倫敦	5	494
凱布里	199	419	洛加斯特	20	479
蓋萊佛德	186	407	德干	21	455
雷特蘭	183	417	約克	31	475
林柯里	181	421	斯塔弗	34	446
賽弗克	177	406	米里賽克	39	464
勞弗克	167	410	瓦爾維克	40	456
烏愛斯	149	416	姆魯特	49	459
	最高額 421			最低額 446	

在以年齡分類的工業人口與農業人口各層之間的差別，是十分顯著的。農村人口底生活的堅強性、忍耐性自然也促進這種劃分。但總之，這個圖表很明顯地指出，在同一勞動人數之下工業擁有大量最堅強的分子。

但是逃出農村的人極大部分不僅在體力方面是最堅強的分子，而且也是最有能力、最有知識的分子，因為正是他們才很快發現自己有必要的力量和勇氣，而且比別人更早，更強烈地感覺到城市底開通與鄉村底閉塞之間的矛盾。大地主們企圖降低農村居民底學校教育程度來阻撓這種矛盾底意識底覺醒，都是徒勞的。城市與鄉村間，經濟關係極其密切，以致沒有絲毫可能來預防農民，使不受城市底“誘

惑”。地主們無論怎樣努力用中國的長城來堵住自己的工人，可是他們所崇拜的軍國主義却破壞了這個長城，並且把年青的農民引誘到城市去。學校教育程度底降低，沒有任何可能藉報紙書籍底幫助來獲得知識，就只會使農村居民對城市底想像不是常常十分明顯，而同樣使農村中有知識的人更銳敏地認識到周圍環境的粗野，並更迅速地逃到城市中去。

在統計上自然不能確定與農村的逃亡有關的這個現象。但是大家知道，農業經營者抱怨的並不是一般勞動力底減少，而是抱怨有知識的勞動力底減少。

這種情形更增加城市與鄉村間智力的鴻溝，這個鴻溝是城市在教育方法上，在鼓勵智力活動底意義上佔很大優勢底結果。除農村人口底減少和智力的遲鈍之外往往還有體力的退化。體力的退化並不限於工廠的區域。不充分的營養，建築起完全忽視衛生要求的住宅，過度的勞動，污穢與愚昧，有害於健康的副業（家庭工業），在許多場合內也同樣引起農村人口體力的衰落。

最近期間有些統計數字甚至被人用來證明工業人口在現時一般地已經宜於軍事服務，也就是說，他的體力的發達比農業人口還好。但是因為這些數字底證明性仍有待於爭論，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去引用它們。

但如果此刻還不能一般地說農村人口底體力落後，那末在這一方面它當然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優越性。甚至就在像瑞士這樣的農民國家內，它已經不是以體力的康健出色了。在一八八四——一八九一年期間應徵服軍役的二四一、〇七六人中有一〇七、六〇七人是農村勞動者和農民。在這個數目中表現出（以百分數計）：

	得延期者	合格者	不合格者
農 民	18.9	61.7	38.3
受檢定者總數	19.8	63.0	37.0

也就是說，農民合格底百分數小於平均數。

不僅農村人口底經濟的和文化的水準及數量降低了，就是他的體力健康底水準也降低了。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使農業的一切負擔增加，而且使“一切財富之源”——土地和勞動者也枯竭了（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十節“大工業與農業”，上述的思想在這一節內獲得了它的極典型的表現）。

自然，農業生產並不是仍舊不涉及這些變化。首先對它造成這樣多困難的勞工問題，在這裏所具有的意義和城市不同，問題不在於對工人應計劃些什麼，而在於從什麼地方取得他們。在第七章內我們已經指出，大地產在它已經排擠了小經營的地方，又努力人爲地去創造它們（小經營）。城市的引誘愈厲害，則大地產亦愈努力把它所需要的勞動力，固着在土地上。但是在工業有極大吸引力的地方，爲了要拘束勞動者並緊縛他使之作大地主的僱傭勞動，則單是創立小農地還是不夠，在那裏一定要有法律的強制；新的小塊土地被創立，地主就將它們出租，承租者應盡的義務就是做一定量的工作。新的封建制度就發生，但是不會長久。工業繼續發展會結果它的性命。以履行某幾項工作爲條件的新租約，只能保存於附近工業不發達的地方。在工業出現的地方，就是最有誘惑力的也不能鼓勵勞動者約束自己。他們寧可保持自由的處理自己的勞動力，以便有可能利用機會更有利地出賣它。

凱爾格爾宣稱他從德國西北部農村勞動者狀況底考察中所得的結論，是“無可爭辯的”，他說：“對於勞動者和對於僱主一樣，最好的、最有利的勞動關係，就在農業工作底大部分，除用經常的僱農以外，都由特種的佃戶來做的地方，佔着支配地位。這裏僱主經常有充分數量的勞動力供自己支配，以便有條理地完成全部農業工作，而勞動者在物質方面則處於很優良地位，使他們有很多機會去儲蓄並且在自己的意見和情緒上表現出十分的滿意。”

雖然這種滿足說得津津有味，可是有許多區域勞動者很受磨折，以致對這些關係並不滿意。

兩種因素妨礙着這種勞役租佃制底普遍推廣。第一，是人們底頑固的獨立的精神，他們害怕長時期担负任何義務，他們看出這些義務是一種奴役，其結果在威斯特發里尼區域潘德堡、布林瓦爾布及海克特等地方這種租佃制底施行好多次都被認為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礦山工廠及煤炭工業底直接靠近，這種工業（特別是在上連馬克區，以後是在漢堡干布地方）毀滅了舊的勞役租佃制而又不使新的有可能發展起來。

“這種情形底原因主要在於礦業及工業方面有很高的工資。它使訂立長期租約或勞動契約對於每個農村勞動者都成爲不利，在對工業勞動者需要增加的時候，這種契約會使自己失去出賣自己勞動力以獲得利益的機會。”

那就是說，工業所關心的是要打消凱爾格爾先生底封建思想的前途。

從別處招用外來的勞動者，一部分是經常的，一部分是臨時的，外來的勞動者更加普遍了。如果農民意繼續增長的無產化促進這樣勞動力（即外來的）底供給，那末農業勞動者去到工業區域，就引起迅速增長的對他們的需要。在許多區域內要是沒有外來的勞動者，農業的經營就不能存在。但是外來勞動者底勞動無論怎樣重要，它只能將農業因勞動者底缺乏所經受的困難平均分配到整個地方，或者在招用國外勞動者的場合內，分配到幾個地方，但它不能供給整個農業以新的勞動力。從外邊招用的勞動供給這一個地方，那它就剝奪了別個地方的勞動，這些外來勞動者底勞動，是取之於東方的勞動力，以之供給西方：它把勞動者的缺乏推廣到工業底勢力還沒有直接感覺到的地方，並且藉暫時的遠離替經常的遷徙準備下一個基礎。外來的勞

動者任何時候都不能代替到城市去的本地的勞動者。我們已經說過，從農村逃出去的首先是最有能力，最有知識的勞動者。反之，外來的勞動者都是從經濟落後的地方出來的，在那些地方國民教育及農業都很低下；其結果不僅是整個農村工人階級工作能力底降低，而且往往是農業方法上的退化。

例如，凱爾格爾從採礦工業區——威斯特發里尼奇的通訊說：“當地勞動條件底一般特徵就是差不多完全缺乏本地的農業勞動者；甚至所有勞動者底兒女，得到認可以後，就完全獻身於採礦業。因此從事農業的勞動者差不多全是從外地來的。從東部及西部普魯士、黑森、哈諾威、威爾德克以及荷蘭等處招來僱工，並且這些招尋不得不經常進行，因為僱工們在農業方面大部分不會留上一兩年，當時他們還不知道採礦業方面勞動那麼容易，工資那麼高。到收穫時期，外來的勞動者，尤其是從米金區來的，自己就是所謂畢連費德的收穫人。誰能夠，誰就在一切場合內避免僱用這些高價的外來勞動者，並努力用一些固定的勞動者來對付。在瑞姆及漢根兩處領地平均都很小，因之在那裏這些收穫人也很少出現，而在小土地佔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瑞姆地方，這些收穫人出現得更少。

誠然，根據某些報告看來，農業勞動者底真正缺乏在這些地方並不顯著，尤其是在工業內如果情況不好的話；但是固定勞動者底極其缺乏和優良農業勞動者底極其需要，是會被覺察到的。許多報告都說到找尋勞動者的困難，而有一個報告裏面則肯定說，勞動者底缺乏，尤其是優良的勞動者底缺乏，大到這樣程度，以致多數農業經營者都無意經營。”（見“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一卷，第一三三頁）

在黑森大公國（上黑森）的報告中說道：“從前有過年年都出來做工的真正職業化的日工階級；這些日工由於他們的工作證明了，他們學會自己的職業，並且在這種職業上取得經驗，你可以信賴他們。但

是這個階級消滅了；多數的打穀機在冬季奪去了農業經營中的工作，在工業區域內才能整年期間找到工作，於是，在七十年代中葉，就開始向威斯特發里尼、比利時、巴黎等地遷移，隨後遷移到美洲、澳大利亞、阿根廷，以便在那裏‘尋求幸福’。應當承認，他們當中有不少的人，的確在那些地方找到了幸福。現在他們從自己熟人當中拉攏一些可靠的分子跟他們走。所謂結過婚的僱工，——各國各民族底混血種，從瑞士、東普魯士及西普魯士、波斯、上西里細亞甚至瑞典等國來的，出現在他們的地方上；一部分是被招來的或被拐來的，一部分是自由來的，他們一般都是完全墮落的粗暴的，在和放蕩的女工底敗類亂交中過活的，沉於酗酒的一羣匪徒，雖然他們缺乏職業的技能、缺乏知識、缺乏忠實，却往往替自己找到高工資的工作，如在農莊上當馬夫或所謂‘司閘人’（牛乳業中的牧人和工人）。但是這些定居在這裏的勞動力對於大規模種植甜菜的經營還是不夠；於是在春初就從萊茵、愛赫斯費德，從巴伐利亞、什瓦慈瓦德、上西里細亞、波森以及西普魯士等地招來大批新的外來的男女工人，他們得到高工資，一直到秋末為止，這是因為上黑森地方當地的居民不願被僱在農場作長期的工作。”（見“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二卷，第二三〇、二三一頁）

最後，爲了要解釋工業進步所引起的農業底衰落，讓我再舉出第三個例。

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在自己的論文中（“新時代”，第十一卷，第二期，第二八四頁）引證波希米亞地方一個屬於國庫的，有幾千公頃面積，種植甜蘿蔔及穀物的地產的管理者底報告。在報告中，這個管理者說：“在先我們要好幾次用馬拉的培土器來培壟爲條播機所播種的穀物，但是現在我們不這樣做了，因爲不熟練的工人要管理它們，就會損失許多穀物。我們差不多沒有十分熟練的工人做經常駕馭耕畜的工作，而那些少數的，比較適宜的人都很快地換掉了。青年人在軍



役時期一旦熟識周圍的世界，他們已經不願作長期而繁重的勞動來換取低微的工資，他們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於是，本地居民中留到我們名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兒童、婦女，我們只得從塔波爾（Tabor）這個偏僻的地方僱用僱工。他們很羸弱，而且很粗笨，他們不能用機器來做工作，因而馬曳打穀機只好放在我們的棚裏讓它生鏽。”

這些報道告訴我們，在現代農業中要利用那種在蒸汽及電氣時代是最適當的工具——機器來抵償勞動者底缺乏是怎樣地困難。農業經營者並不是到處都能找到宜於做機器工作的勞動力，就是現有的勞動力也一天天地離開了農業。雖然如此，機器在我們這時代在農村中已有很大的成就，雖然它遠遠不能達到足以抵制勞動者缺乏所必需的那個限度。我們找出了這事的唯一指示，就是農業經營者企圖藉機器底採用來幫助自己。我們在這裏不是已經講過，農業機器，就所生產的生產品數量而言，常常節省了勞動，但就耕種面積而言，並不常常節省勞動。在一定的面積上，許多農業機器比簡單的工具需要更多的勞動者。“在某些場合因為採用一些改良了的機器，人手的需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條播機對於一定面積底播種比簡單的播種機或單單用手播種都需要更多的勞動”（見郭爾慈：“農村工人階級”，第一六八頁）。

末了，我們還要介紹抵消勞動者缺乏的第四種手段：充分的提高工資，較優的待遇，更經久的住宅，勞動者底最好的給養。這種手段當然是上述四種中最實際的，但是很顯然地，爲了要保證農業有必要的勞動力，這種手段還是有它的缺點。高工資並不是吸引農業勞動者到城市的唯一因素；冬季找工作底較大的可能性、較大的獨立性，較易備置家庭，以及城市文化之高於鄉村，這些因素除非工資非常提高，才能減弱它們的力量。

格羅斯曼（Grosman）在其著作“農業勞動者的狀況”中寫道：“至

於說到女僱工的缺乏，那末在沿厄爾巴一帶卑濕的沼澤地方人們主要是抱怨女僱工們到城市去。報告底起草人看出這種現象是極其可驚的，在鄰近的小城市內僱用的女工所得的工資比她們在農村中所得的稍多二分之一（僅僅如此？）甚至在漢堡工資平均並不高，而用費却很高。”較優的待遇也一樣無力長時期地拴住工人：“我們知道有許多地方農業經營者幾乎不把僱工當人看待；僱工們往往不得不容忍很平淡的，有時是做得很壞的飲食，他們常常沒有一間稍微舒適整潔而溫暖的房間，可以在裏面消磨閒空的時間；有時他們不得不在垃圾堆上在房子底盡頭收拾一間特別的臥室，那裏沒有地板沒有可坐的椅凳，至於桌子更說不上了。反之，有人也許以為，在某些家庭內把安分守己的僱工們作為家庭成員看待，和他們談及自己經營的事業，談及他們的私事，和他們同一桌吃飯，這在那個地方往往是很平常的事，讓他們在家裏可住的房間內消磨空閒的時間，或者分給他們別的舒適整潔而又很溫暖的房間，同時作為他們的臥室，供給他們可讀的報紙等等，他們就會滿足於自己的命運。可是在這些場合，僱工們就渴望着找到一個郵務員、鐵路職員、裁縫、店員等等職務的工作，或者在大城市內找一個位置，因為在那裏可以過着比僻靜而遼遠甚至常常沒有一家酒店的單調的鄉村較為優裕的生活。安分守己的僱工們在目前高工資的情形下——假定他們不太早結婚，可惜這種情形是很偶然的——就能够很容易賺得一些工錢，以便到了三十多歲的時候有可能尤其在目前地價低落的時候，購置一小塊土地，在這小塊土地上養四條牛和幾頭羊。”（見同書，第四二三頁）

無論是高工資，無論是獨自佔有土地，都不能維繫大批農村勞動者不逃出農村。農村勞動者事實上用什麼別的方法才能得到高工資及較好的生活條件呢！沒有這樣一個企業家階級，它會自願地同意工資底提高，除非強迫他這樣做。農村僱傭勞動者現在還太軟弱，還不

能用自己組織底力量來達到這個地步。農村中工資底提高——只是勞動者繼續缺乏底結果，高工資及勞動者底充分供給，至少直到現在為止，是農村中相互排斥的兩種現象。

所以，意見無論怎樣好聽，要希望工資這樣增高，以阻止勞動者不逃出農村，那是不行的。這種逃亡仍舊循着自己的道路進行，任何障礙都不能阻止它。

安德生·格蘭罕在其“鄉村遷徙”一書中(引自霍德斯丁：“職業組織”，第三九頁)關於這一點說道：“如果他們得低的工資，像在威賽爾地方，那末他們就遷居別處；可是如果他們得到高工資，那末——如在北安伯蘭德地方，——他們也一樣逃亡。如果農場小，如在斯萊佛德(林肯縣)區，那末他們就離開這些農場；但是在農場很大的地方如諾爾弗克區，農村的逃亡，還是繼續增長。農村居民似乎深感悲觀失望，覺得他在農村中已經不會有任何幸福的前途，他不加思索地把鏟子、鋤頭丟在一邊就跑開了。

因為自助是無力的，那末要解救這種不幸，就要有國家的強制。對於僕役採取最嚴厲的懲罰、對於破壞契約的懲罰、結婚的困難等等，當然是保證農業經營者有經常的勞動者；用禁止遷徙的辦法使移居底自由中止或感困難，對移居城市的人造成許多障礙，如火車票價的增高等等，——所有這些情形當然會使那些要想暫時或永遠離開的人滯留在家鄉。但是前一種方法只是使農村生活對於僱農及訂立契約的勞動者更加難以忍受，而這種情形又必然加強他們的逃亡。取消移居底自由，甚至假如工業人口和他們調劑，假如這種調劑能夠實現，那自然是幫助了個別的農業經營者，但不能幫助整個農業。取消移居自由，就等於從無數小農手裏剝奪了補助工資底唯一來源，並使他們陷於極度的貧困。取消移居自由同樣使工業區域內依靠僱傭勞動者經營的各種農業成爲不可能，因為在那裏，像我們已經看見的，要是

沒有外來的工人，農業就不能進行。取消移居自由是會延緩了經濟落後地區農業底破產，而在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則加速了它的破產。

防止農業中勞動者底窮困，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還沒有長出治病的藥草來。資本主義的農業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所處的地位，有如封建時代的農業在十八世紀末期一樣：它已陷入死巷，無力用自己的力量從死巷中拔脫出來，而置於社會的磐石之上。

讀了下面的幾行，就可以想到過去一世紀的情景。“勞動者的缺乏，在進行大經營的地產內，同樣在大農方面，即已存在而且是特別感覺得到的。由於勞動者的缺乏，極大的地產甚至農民的土地都分租出去：這種情形本身就引起不幸的結果：農業改良無法進行，反而引起特種掠奪式的經營，因為很少飼養大的牲畜，而且是專用廁所裏的肥料。這自然是有害於土地的肥沃。結果，多沙的地方，在以前耕種不是沒有利益的，而現在却放作閒田並且整年不復耕種，勞動者自己的田地往往任其荒蕪，勞動者在高工資情形下以僱傭勞動所賺的錢比耕種自己的田地多”（“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二卷，第二〇六頁）。

這樣的消息是從黑森地方來的；而從巴伐利亞來的消息是：“像一般報告中所說的，巴伐利亞有幾處地方勞動者的缺乏不僅引起正規進行的經營不斷的破壞，而且引起經營強度底降低。”（見同書，第一九〇頁）

上面所引的關於外來勞動者底影響那段文字也值得和這些作一比較。我們且置全部技術的進步不談，有些地方，農業底衰落無疑已經開始。如果勞動者底缺乏不停止，那末農業底衰落，會成為普遍的現象。“勞動力數量底減少，必然會有一種結局，就是耕地面積逐年減少而牧場面積逐年增多”（見郭爾慈：“農村工人階級”，第一七六頁）。

凡是使用僱傭勞動者的經營，都經受着勞動者缺乏底壓力，但是在小經營內這種壓力比在大經營內更易感覺到。小經營動用的資金，

如果不是用來消除勞動者的缺乏，那末即使在有些地方用來緩和勞動者的缺乏也是太少。它們沒有可以讓給僱傭勞動者的土地，使其為得到土地使用權而完成一定工作為交換條件來維繫僱傭勞動者。它們對勞動者的要求並不大，只要收入能抵償從遠處招來勞動者的特別費用。它們當然對那些住在附近的人特別照顧；它們完全不能利用機器，而對於充分提高工資，它們的資金也比別人少。

可是這些最小的使用僱傭勞動的經營，正是利用那些最容易從這個地方遷移到別個地方的勞動者，即未婚的勞動者、僱農及女僱農。

在供作商品生產的，而不是專門或幾乎專門供作家庭生產的諸經營之間，只雇用少數僱傭勞動者，而在農忙時期使用自己家庭底勞動力，可是這已足夠維繫所有者於土地上那些的經營，也就很少為農村的逃亡所牽累。五——二〇公頃的經營一般都是如此。逃出農村這種傾向，愈是包括農人口底大部分，則多半正是威脅這些經營的土地碎分底趨勢亦迅速地減弱，這對於他們甚至是有利的。土地的需要因之減少，小地產的不相稱的較高價格因之降低。土地底細分已不是有利的了；地產分碎為若干部分也中止了。這樣看來，在德國正是這些經營在土地所有權範圍內是唯一的，很能獲利的經營，這是不足奇怪的。全部在農業使用中的面積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增加了六四八、九六九公頃，而從五至二〇公頃的經營底面積則增加了五六三、四七七公頃，從一至二公頃的經營底面積則減少了五〇、一七七公頃，從二〇至五〇公頃的經營面積減少了六二、八九八公頃。

農業使用面積每一、〇〇〇公頃中各類經營，有如下表：

年代	1公頃以下	1—2公頃	2—5公頃	5—20公頃	20—100公頃	100—1000公頃	1000公頃以上
1882年	24	83	100	288	311	222	22
1895年	25	81	101	299	303	216	25
增(+) 減(-)	(+ )1	(- )2	(+ )1	(+ )11	(- )8	(- )6	(+ )3

顯著的增加只是在於五——二〇公頃以內的中農經營，而減少最多的則是在二〇——一〇〇公頃以內的大農經營。

這些數字使國家底全體善良公民內心高興，他們把農民看做是現存制度底最牢固的支柱。他們很興奮地叫喊道，不，不，這種農業是不會被動搖的；馬克思底教條對它們毫無用處。在這些數字中非集中的和集中的傾向實際上是互相抵消的，這些傾向在我們這一時代在農業中直到八十年代到處都可以看得出來。很顯然地，農民生新的繁榮到來了，新的繁榮一定會使工業底一切社會主義傾向去醜的。

但是這朵鮮花却開在泥沼裏面，它不是生長在農民生幸福底地基上面，而是生長在整個農業受壓迫底地基上面。它是那些原因底結果，那些原因使已被採用和被試驗過的機器又被拋棄了，勞動契約底封建形式重新恢復了，田地爲牧場所排擠，有些田地空閒着不去耕種。就在替農業很圓滿地解決其特殊的“勞工問題”，並替它開闢出新的繁榮底可能性的那一天，對於中等經營有利的諸傾向立即又變成了它的對立物。農業底興旺與農民經濟制度底繼續存在——這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是兩個互相排拒的概念。不僅是歐洲底經驗，就是北美合衆國東部各州底經驗都有利於這個命題的說明。

我們也不應當希望，目前農業的衰落，影響一個相當時期以後，會使大的和小經營受排擠，會給農業中滿足的中農那個階級以絕大優勢（還在十九世紀初期西斯蒙德就很熱情地將這個中農階級描述給我們了），會使這一階級能够以自己的“不要前進一步”來對抗整個社會的發展。

如果中農階級比佔有土地底一切其他商品生產階級，較少涉及僱傭勞動者底缺乏，那末，同時也正是中農階級比其他階級更感到現代農業所產生的其他負擔的痛苦！中農是高利貸剝削和仲介人的剝削底主要對象；貨幣租稅及軍事服役更加繁重地加在它身上；貧窮底

危險更加威脅他的土地。因為這種經營是屬於商品生產的經營中最不合理的經營，於是它更加不得不在非人的勞動和非人的生活方式幫助之下去進行競爭的鬥爭。我們想起一句俗話，就是說，小農在他們沒有自己的耕畜時，還勉強過得去，“一旦有了私有的耕牛，他們的可憐生活就開始了”。

這些農民的相當大的一塊土地，還可以把他們維繫在土地上。可是這也只能維繫他們自己，但已不能維繫他們的兒女。像僱傭勞動者和小農一樣，逃出農村的傾向也開始遍及於中農的子女，——工業愈接近他們，則這種傾向愈有力。有人從農民保持得很康健而又強壯的那一省，耶斯連茲維—郭里斯廷省報道說：“那些僱農以及農民底子弟在未入軍隊以前是在父兄的經營內工作，在退伍以後，假如他們沒有學會一種職業，才有時長期地回到農村。他們都跑到城市，因為農村生活已經不再使他們留戀。”（“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二卷，第四二六頁）

但是中農底子女愈是很快地開始覺得營養很壞的、大部分直接受敲剝的、僱傭勞動者底境況底慘苦，他們愈是企圖離開農民的野蠻狀態，則中農底家屬就愈加減少，也就是說，他們更沒有可能進行自己的經營，雖然是有困難的，僱傭勞動者在這裏就開始愈加起着很大的作用，並且勞工問題連同其他的不幸，對這個階級就更加感覺沉痛。

在現時，中農就不再是真正保守的，滿意現存制度的分子。恰恰相反，他們也渴望着現存制度的變革，正如最激進的社會民主黨人一樣，但他們所取的方向，自然和社會民主黨完全不同。雖然如此，他們並不進行國家的變革。我們認為他們的行為無論怎樣奇怪，可是不像以前一樣成為現存制度的支柱。農業的危機伸其魔掌於農村居民底一切商品生產的階級；它也不顧惜中農。

## 第十章 生活資料生產中的海外競爭 及農村經濟的工業化

### 一 輸出的工業

最後幾章告訴了我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打斷了封建的鎖鏈並給農業以很大的推動，因之在最近幾十年之內推進得比先前整千百年還遠，這種生產方式造成更加壓迫農業的傾向並更加加劇適應現代生產方式的佔有形式與合理的農業生產底需要兩者之間的矛盾。

這些壓迫的傾向早已顯著，但是它們只在不甚重要的階段上壓制了農業和土地所有者，那時後者還能夠把這些傾向所造成的負擔推到別人身上，推到消費者身上。那時有過這樣的可能性，農業從封建國家沒落開始以後，經過了一個黃金時代，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

邁岑(Meichen)底意見涉及這個時代(見“普魯士國家底土地與農業關係”(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h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s)第一卷,第四四〇頁),他說:“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在農業部編纂促進普魯士農業的國家措施備忘錄的人們,可以有權說:期待着的土地法的實行已不能再等了;農村居民已經從睡夢中覺醒了。幸運底巧合已將一般的幸福普及到農民地產和貴族地產底所有者當中了,並且由於土地能夠無阻礙的耕種和購買者底無限制的競爭,一切地產的買價極度增加了。”



普魯士農業部長此刻却用完全另一種話來說！到七十年代後半期糧食價格不斷地增加了，和工業生產品的價格發生極尖銳的矛盾；糧食價格比工資的增加快好幾倍，勞動者會親眼看見自己的狀況愈趨惡劣，這不僅就他是生產者而言是如此（因為剩餘價值率底增高，即是他們在他們所生產的價值中應得的部分底減低），即使就他是消費者而言也往往是如此。農業底幸福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底貧困上面。根據柯蘭德計算，一、〇〇〇公斤小麥的價值如下：

年 代	英 國	法 國	普 魯 士
1821——1830年	266.00馬克	192.40馬克	121.40馬克
1831——1840年	254.00	199.20	133.40
1841——1850年	240.00	206.60	167.80
1851——1860年	250.00	231.40	211.40
1861——1870年	248.00	224.60	204.60
1871——1875年	246.40	248.80	235.20

一公斤的肉價值如下：

年 代	柏 林	倫 敦
1821——1830年	61蒲菲林	7蒲菲林
1831——1840年	63	7
1841——1850年	71	87
1851——1860年	85	101
1861——1870年	100	113
1871——1880年	125	131

在七十年代才完結了這種不斷的增加。一〇〇公斤小麥價值如下：

年 代	英 國	法 國	普 魯 士
1876——1880年	206.80馬克	229.40馬克	211.20馬克
1881——1885年	180.40	205.60	189.00
1889年	137.00	193.30	192.00

根據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最近的報告，一夸特小麥的官定價格為：

1889——1891年	32先令11辨士
1890——1892	33先令 1辨士
1891——1893	31先令 2辨士
1892——1894	26先令 6辨士
1894——1895	24先令 1辨士

柏林一公斤的肉，在一八八一——一八五五年值一一九蒲非林，一八八六——一八九〇年值一一五蒲非林。倫敦一公斤的肉，在一八八一——一八五五年值一二四蒲非林，一八八六——一八九〇年值一〇一蒲非林。

糧食價格底變動，從七十年代起，就和先前背道而馳。

這種變動底原因，正如現代農業中其他各種大變化底原因一樣，應當在工業底發展中（工業的發展更加使農業受自己的支配）去找。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起生產底不斷變革，這是由於新資本底不斷積累和被資本用來替自己服務的科學不斷進步所產生的技術的變革。因此資本主義式生產的巨額生產品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年年地增加；它比人口的增加更快。

財富底這種不斷增加，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剩餘價值底生產不是供給僱傭勞動階級而是供給資本家階級，同時是大規模的生產，生產品底大量的生產，為大衆底消費而生產反成為資本主義生產者底不斷增加的困難底泉源，這不是很奇怪的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封建的或古代的生產方式底實質的差異就在此。封建主或奴隸主也從自己的勞動者榨取剩餘生產品，但是他自己和他的食客們把這種剩餘生產品消費了。反之資本主義式地佔有的剩餘價值，往往一開始是採取一種應為大多數人民所獲得的生產品底形態，然後才獲得作為資本家消費的生產品底形態。資本家正如封建主和奴隸所

有者一樣，當然企圖限制大眾的消費以增加自己的私有；但是在這種情形下要考慮到——這在封建主和奴隸所有主是不知道的——不斷地提高大眾底消費。這是一種最顯著的矛盾，也是一個最不快意的問題，這些問題底解決已經擺在現代資本家的面前。

純樸的社會政治家以及熱情的社會主義者早已竭力向資本家證明，勞動羣衆底消費愈多，則大量的消費亦愈高，因此爲要維持生產底進程及其不斷的擴大，他只有提高工資。但是這種見地頂多是能够使個別的資本家很高興地看着別個生產部門中工資底增高，但無論如何總不願在自己方面使工資增高。

麥酒釀造者很高興因爲別人的勞動者底工資增高而提高大眾底消費，但無論如何總不願提高他自己的勞動者底工資。誠然，工資愈高，則資本家能够出賣的亦愈多。但其實他生產不是爲着出賣，而是爲着將利潤放進荷包裏。剩餘價值愈高，則利潤亦 *caeteris paribus* 愈高，而在勞動者所供給的勞動的同一數量之下，工資愈低，則剩餘價值亦愈高。

其實資本家早已知道除了增高勞動羣衆底消費以外，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提高資本主義式生產的生產品底大量消費。資本家不是在無產階級的勞動者當中，而是在還沒有無產階級化的羣衆當中，首先便是在農村人口當中去找尋自己的主要銷售市場。我們已經看見，他們怎樣破壞農村人口底家庭手工業並替自己的大量生產品底銷售創造出廣大的市場。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生產力愈是得到極大的發展，僱傭工人階級——就是創造大量生產品，但在物質方面只能消費其生產品的一部分的那個階級，在人口當中愈是佔優勢，則這種市場亦愈益表現其不足。市場擴大到本國以外，爲世界市場而生產及世界市場底不斷擴大，已成爲資本主義工業的生存問題。現代爲擴大市場的角

透，使黑人有鞋穿、有帽戴，以軍艦、大礮、鐵路惠給中國人，這就是現時代的特點。國內市場現在差不多完全依賴於國外市場。事業是否很好進行，無產者與資本家以及商人、手工業者、農業經營者是否能夠更多地消費，這主要是依賴於國外市場。一旦世界市場已無法再迅速擴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走到它的末路了。

## 二 鐵 路

和不斷的企圖擴大工業生產品底銷售市場同時並進的，就是運輸事業底改革。

我們已經看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基於大量的生產之上。但是有了大量的生產，它還需要大量的運輸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單是為輸出自己的生產品。資本主義的大工業消費大批原料，這些原料不是它的鄰近的地方所能供給的；它把這些地方不能養活的大批的人集中起來。但是原料和生活資料只有很小的比價，在很大的重量和容量上，它們只含有少量的勞動；只有特別廉價的運輸工具才能運輸大量的原料和生活資料到遠距離去，不致將成本費提高到最大的限度。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原則上，只有水路才是這樣廉價的大量的運輸工具。這種方法只有在沿海一帶或在特別便利的沿河一帶才能發展起來。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不止是廉價，而且需要大量運輸底迅速和安全。資本的周轉愈快，則在某項企業內用於一定範圍的資本的耗費亦愈少，在一定數額的資本之下，企業的範圍亦愈大。如果我把我的商品從滿徹斯特運到香港，那末我在三個月之內或在一年之內得到貨價，對我不是沒有區別的。如果我的資本在一年之內周轉四次，那末我的利潤在其他條件相等情形之下，就要

比一年周轉一次多到四倍。

另一方面交通愈迅速，則我愈能在遼遠的地方找到自己的買主，我愈能迅速地擴大我的銷售市場而無須延長投入企業內的資本的周轉期，無須增加這種資本。

交通的速度愈高，則為要使我的企業完整地進行，我所需的原料的儲備亦愈少。並且在這方面，運輸事業底各種改善，就可以使一定數額的資本能夠進行大規模的生產，或就原有的規模以少數的資本進行生產。最後，也能夠擴大自己的關係底範圍。

就在這一方面，交通底較為安全也有作用。交通安全可以減少後備資本和原料底儲備；這些是企業主為了保證自己不受銷售和供給底不正常性所應當有的。

但是用帆船、小划船這一類的水路運輸或用馬拉，在交通底迅速和安全底意義上就不見得有多大希望。運河及河流在冬季結凍，海有暴風亦有危險，而風平浪靜或逆風對於急性商人更壞。

只有人類應用汽力才能够創造出那些大量的運輸形式，它們解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水路的依賴，同樣把汽力應用到大陸的內部，於是整個世界就變成巨大繁榮的大工業底銷售市場。

十九世紀初期就已經發明了機車和鐵路，但是它們的應用差不多只限於大工業佔優勢的那些區域內。只有大戰——劃除了舊歐洲與美洲底殘餘的大戰，才替大工業區域以外的鐵路底猛烈發展開闢了一條道路。只有從那時候起，鐵路才不是資本主義發展底後果，而是它的前因。如果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以後，奧匈從一八五九年起，尤其從一八六六年起用盡一切方法獎勵鐵路底建築，那末這主要是因為戰略上的緣故。這就羅馬尼亞、土耳其以及印度的鐵道而言，也的確是如此。但是商業的立場在這種情形下就有了它的意義。政府需要金錢，為的是能夠支持和資本主義國家競爭；而它們的人民能夠

拿到市場上去的唯一的生產品，就是原料和糧食。所以，它們需要創造大量的運輸工具。

美國資本家在內戰以後所建築的，使資本在合衆國內得到普遍統治的鐵路，首先就是爲了這個目的。這些道路底有利的結果，很迅速地引起仿效，並且現在歐洲財政界底主要活動之一，就是在歐洲以外經濟全然落後的地方，甚至往往在人煙稀少的地方，建築和開闢鐵路。這一類鐵路底建築不僅是資本過剩底一條排水渠，因爲資本底過剩反而窒息歐洲的資本家階級，不僅替歐洲迅速發展的工業開闢出甚至往往創造出新市場，而且開闢和創造出供給原料及糧食底新來源。不久以前基芬發表了下面一個鐵路網長度表（各年年底，單位英里，一英里等於一、六〇九公尺）：

地名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1895
歐洲	14,551	33,354	64,667	105,429	141,552	155,231
美洲	9,604	33,547	58,848	109,521	212,724	229,722
亞洲	—	344	5,118	9,948	22,023	26,890
澳洲	—	350	1,042	4,889	13,332	13,888
非洲	—	278	956	2,904	6,522	8,169
總計	24,155	68,373	139,631	232,691	396,453	433,953

在一八七〇年歐洲鐵路網底長度還佔全世界鐵路網二分之一，在一八九五年只佔三分之一。在這個時期歐洲鐵路網底長度差不多增加到五倍，同時美洲鐵路的長度則增加到七倍，而其餘三洲的鐵路網則增加到三十倍之多。

蒸汽在航海方面也引起了同樣的變革，雖然沒有這樣厲害。根據詹南斯(Jannasch)的計算，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參加航海的國家中，來往船隻底排水量，其噸數爲：

年 代	總 噸 數	其中汽船的噸數
1872(38國)	137,226,600	52,908,900
1876(45國)	189,785,300	100,754,700
1889(41國)	360,970,800	287,965,100
1892(41國)	382,480,600	313,393,100

鐵路及海上運輸底費用不斷降低。根據柴林格的統計，從芝加哥運貨到紐約一普式耳的平均運費為：

年 代	水路運輸	鐵路運輸
1868年	24.54仙 <sup>①</sup>	42.6仙
1884年	6.60仙	13.0仙

一普式耳小麥從紐約用輪船運到利物浦在一八六八年運費平均為一四·三六仙，而在一八八四年就已經只要六·八七仙了。

從那時候起，運費更加減低了。根據一八九六年農業部出版的“美國年鑑”(Yearbook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看來，一普式耳小麥從紐約運到利物浦的運費為：

年 代	一 月	六 月
1885年	9.30仙	5.00仙
1890年	11.13仙	3.75仙
1895年	6.12仙	4.00仙

一百磅小麥由鐵路從芝加哥運到紐約在一八九三年運費為二五仙，而在一八九七年則為二〇仙。

運輸業底這種發展完全改變了歐洲農業底狀況。農業生產品像我們已經講過的，其特點就是它的比價不大，即是說它們在體積和比重上雖大，而含有人的勞動却較少，如馬鈴薯、乾草、牛奶、水果之類，

① 一仙為美國百分之一。——譯者

至於小麥和肉也是如此。有許多農業生產品不耐長期的運輸，例如肉及許多水果和菜蔬。在運輸工具底原始狀態下運輸大大地提高了這些生產品底價格，並且它們的運輸超過一定的、很有限的距離以外就完全不可能。供給城市市場的糧食大半都是地方的事，以鄰近的地方爲限。這些地方佔有剝削城市消費者底壟斷權，而且善於利用這種壟斷。離城市最遠的地產——它們也是滿足城市的需要——底較高運費，提高了城市附近地產底級差地租。糧食底運輸超過一定區域以外，其困難底增加，也同樣很有力地提高了絕對地租。

鐵路底建築，當只限於有高度工業發展的國家的時候，這裏只發生了很少的變化。誠然，鐵路替城市市場開闢了糧食供給底新來源，但也只發生於與靠近城市的地方底條件相仿的條件之下。可是這些鐵路首先就引起了城市市場底極大擴張，因爲大城市數目底迅速發展和極大的增加只有靠這些鐵路才有可能，這些大城市就是現時代的特徵。它們同樣並沒有引起地租底降低；恰恰相反，從鐵路建築開始時起一直到七十年代，地租在歐洲各處都迅速地增加了。鐵路促進了享受這種地租提高的土地所有者人數的迅速增加。它們異常地增加了供給農村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底總額。

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內所修築的那些鐵路却有另一種作用。但是這些鐵路未必引起糧食底生產過剩；它們擴大了城市市場，增加了工業人口數量，工業人口在最近幾十年內要是沒有海外糧食底供給，就不能夠在歐洲增加得如是之快。威脅歐洲農業的並不是被輸入的糧食底數量，而是它們的生產條件。生產在那裏並不擔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加於農業的那種負擔，由於這些生產品在市場上出現，就使歐洲的農業不能在將來把由於土地私有制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所加於農業的迅速增加的重負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它不得不自己擔負起這種重負，現時農業底危機也正是在此。



### 三 生活資料生產中競爭底區域

壓迫歐洲農業的國家可以分爲兩大集團：東方專制主義底區域和自由的（現在的或以前的）殖民地，假定，現在這樣的國家，如俄國還可以歸到前一集團。就農村人口的關係而言，這樣的分類，大體上可以說是正確的。

在前一集團內農村人口完全爲國家及統治階級底獨斷獨行而犧牲。這裏資本主義還不會建立起民族的政治生活，民族，至少在農村內，這裏只是農村公社底簡單集合體，農村公社中每個都按照自己的方式過着自己的特殊生活，而且在自己的孤立狀態中，在國家底集中力量面前表現得全然無力。但是當這樣的民族還不曾越過簡單商品生產的階段的時候，農民底境況在這一類的國家內還不算太壞。他個人殆難和國家政權接近；保護農民和在國家面前農民利益底代表者，就是他的民主主義式組織的公社，並且國家政權要過度的榨取公社底血汗也很少有辦法，就是它要這樣做也沒有多少理由，因爲它只能有限的應用以實物形式繳納租稅的那些實物。東方專制政體底殘酷和血汗底榨取在城市內對宮廷貴族、高級官吏、富商比在農村內更厲害。

可是當國家政權用這些或那些方法和歐洲資本主義接觸的時候，這一切情形就完全改變了。歐洲的文明以軍國主義、官僚政治、國家債務等形態鑽進這些國家；它同樣驟然提高國家政權對貨幣的需要，提高它對付農村公社的力量。勞役現在變爲貨幣租稅，而且已經部分地存在過的，但不甚重要的貨幣租稅被提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並且無情地被勒索。農業在這樣的國家內，是生產底主要部門；農村人口愈是懦弱，則租稅負擔即使不是完全加在農民身上，但也就

太重了。農民底愉快生活已去到無何有之鄉了。農民不得不進行着掠奪式的經營，這在自己的勞動力方面與在土地方面都是如此，爲要從它們中盡可能榨取一切。閒暇的時間、做手藝的時間都沒有了，南俄農民底美麗的木刻和刺繡那是以往自給自足時代的事。大量的收穫都被聚集起來，土地沒有休閒的時候；對於貧苦生活底維持不是絕對必要的一切東西，都拿到市場上去。但是在差不多每個居民——農民都準備出賣而完全不需要購買糧食的農村裏面什麼地方去找買主呢？糧食底輸出遂成爲現實問題，從內地去到港口或到陸地的邊境的鐵路底建築，在政府看來是必要的，一旦政府要想能夠向農民徵收貨幣租稅的話。這些糧食底價格，就很難說是由生產成本費來決定。它們的生產並非資本主義式的，並且是在國家政權和高利貸者（向貨幣租稅轉變就使高利貸者出現到舞臺上）底壓制之下被出賣的。

租稅和高利貸的利息愈高，農民底貧困及長期的奴役愈甚，則他愈加不能不按照各種價格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他爲清償債務而必須繳給債主，富農或地主的勞動量亦愈大，他拿到市場上去的生產品底數量亦愈多，他在這些生產品上所得的價格亦愈低，在他的債主底地產上所生產的生產品，亦愈廉價地出售。農民因租稅及高利貸的利息而日益加增的負擔，並沒有在這裏使生產品價格提高，反而使它減低；這種負擔極度地降低小農底地租和工資，究竟降到什麼限度這裏還不能說。

由於這一類的競爭，凡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生產的，且必須計及農村人口底已有的生活程度，已有的工資以及在地價及抵押借款內已規定的地租的農業，凡是不採取掠奪式的經營而是在靜止的狀態中保存土地底肥沃以及供其支配的勞動力並不充分的農業，就不能穩固起來。

美洲殖民地和澳大利亞殖民地底競爭比起和歐洲資本主義接觸

的東方專制政體底國家，如俄國、土耳其、東印度底這種競爭，就完全不同。在那裏我們發現處於世界政治之外的，不知道軍國主義爲何物而且很少負擔貢稅的自由農民底強有力的民主政治。一望無涯的肥沃的土地在這裏不爲任何人所有，因爲土地的原有的主人——少數原始的居民不是被消滅，就是被排擠到小的地域去了。這裏還沒有個人壟斷土地的事，還沒有地租；土地還沒有價值。農業經營者無須像在歐洲一樣把自己資本底大部分耗費在土地底購買上，他可以把資本完全用在經營底設備上。因此在同樣投資量及同等大小的地面上，農業經營者在殖民地比在歐洲能夠達到農業經營底更高階段。農業經營者尤其可以更迅速地成功，因爲殖民者從歐洲來後碰到完全新的條件，他必須適應這些條件，因而把過去束縛歐洲農民的傳統和偏見很快消滅了。

還有一種情況在這裏促進着農耕底發展。土地尚未枯竭，還完全是處女地。它不需要任何肥料和任何輪作，許多年能照常提供一種同一生產品底豐富收成。所以農耕者既不需要購買肥料，又無需替自己製造肥料；他可以完全只限於種植一種生產品，例如小麥；而且交換愈發達，他愈是只生產商品而無需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則他亦愈寧願種植一種生產品。生產底這種單一性使他能夠異常節省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同時使自己的生產資料完全適合於唯一被預定的那一個目的。小麥底種植者，除耕畜外，既不需要牲畜的廄舍，又不需要飼料儲藏所，也不需要飼養牲畜的勞動者；他無需種植各種有根植物，而且他能節省勞動力和材料。因爲地租不存在，這種單一性的生產就使殖民地的農業經營者在同樣的投資及勞動之下，以及同一的地面上，能夠得到比歐洲更多的收入，或者在同樣的投資及勞動條件下能夠耕種更大的地面，每一公頃能夠獲得同樣的收入。人們通常指出勞動者的缺乏以及高度的工資引起向機器勞動的過渡，來解

釋美國農業中技術底高度發展。但是這個因素，若沒有其他剛才指出的兩個因素，就不見得能在這樣的限度內表現其作用，像在實際中所表現的那樣。“勞工問題”在那種意義上，像它在歐洲農業中存在的那種意義上，對於殖民地是不存在的。我們假定，它的人口比歐洲文明國家底人口更少，勞動者底人數就勞動供給底範圍而言也很少。但是依賴於一定數量的勞動者的，並非農業底繁榮，而只是農業經營底方法。在勞動者很少的地方，那裏就進行比較粗放的經營，那裏就盡可能用機器及其他工具來代替人的勞動。但是在現有的耕種方法之下，農業能支配的勞動者人數是否減少或不減少，他們的工作能力是否縮小或不縮小，這對於農業底繁榮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不是沒有區別的。對於農業繁榮底決定因素，並不是農業勞動者底現有數量和技巧，而是這些因素在它裏面發生變化的那個方向。可是在這一方面殖民地也勝過歐洲。

使歐洲農村成爲荒蕪的逃離土地這件事，不僅供給城市而且供給殖民地以新的大批體力壯健的農作人，並且是他們中最有知識和最有能力的農作人，他們在新的條件之下就成爲而且不能不成爲更有能力和更有知識。那些不能適應完全改變了的條件的人，就會趨於滅亡。“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移民經過幾年後就變成很有才幹的人，他在這裏過着格外優裕的生活。他好像從乾燥的土地上移置到潤濕的土地上的植物一樣——這種比擬是對的，就是直到現在，當勞動在這裏比在歐洲得到更好的酬報的時候，這種比擬仍舊是對的”（見邁耶爾：“美洲競爭底原因” [Ursachen der amerikanischen Konkurrenz]，第一六頁。）軍事服役奪去農業勞動者，在殖民地是不存在的。柴林格（“論北美農業的競爭” [Die landwirthschaftliche Konkurrenz Nordamerikas]，第一七九頁）生動地說：“在農場的區域內，常常聽到有人抱怨高度的工資，但很少聽到有人抱怨勞動者的

缺乏。”可是高工資也並不是在一個水平綫上。在那個時候，即如在歐洲要得到充分數量的農業勞動者更加困難，因而他們的工資一般地都提高了，在殖民地，由於新的勞動力不斷流入，工資就有下降的趨勢。根據柴林格的統計（見同書，第四六九頁）一年間農業勞動者底月薪（單位美元）等於：

州名	1866年	1869年	1875年	1879年	1881年	1885年(5月)
加利福尼亞	35.75	46.38	41.50	41.00	38.25	38.75
東部諸州	33.30	32.08	28.96	20.21	26.61	25.55
中部諸州	30.07	28.02	26.02	19.69	22.24	23.50
西部諸州	28.91	27.01	23.60	20.38	23.63	22.25
南部諸州	16.00	17.21	16.22	13.31	15.30	14.25

普遍的降低是很顯然的。由上所引的全部事實，就容易看出，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們給歐洲農業經營者的善意忠告：他們應當像美國人一樣成爲有知識的，美洲的競爭就會失敗，這種忠告是多麼可笑。但是很顯然地，在發展過程中美國人自己並未成爲更有知識的，反而成爲更沒有知識的，就是說，他們開始照歐洲人的樣來經營了。

我們剛才描畫的殖民地農業底景象，對於美國只在相當程度內是對的。這種農業建立在掠奪式的耕種上（關於這種經營底方法可參看本書第一八一——一八二頁）。遲早它就會使土地枯竭。

由於這種情形，農業經營者時常從貧瘠的土地轉移到新的土地就成爲必要的了；爲此，他必須或者更早增添這樣的範圍於自己的地產，即這個地產除保有耕種的部分外，還要有未耕種的部分，或者在他的土地枯竭的時候，他就再去到沒有耕種過的地方，並在那裏把新土地拿來耕種。殖民者底農業就其游牧式的性質而言，很像古代日耳曼人底農業。只有一點不同就是殖民者底農業是用現代技術底全部補助工具來經營，並且不是用來爲自己的消費而是爲出賣而經營。

但是正因為這種情形，現代游牧式的農業其使土壤枯竭比日耳曼人底農業當然更快。被拋棄的土地，當它的肥沃未恢復時，就放着不耕種，或者這種土地轉移到開始學歐洲人榜樣以換種制及肥料來耕種的農業經營者手裏。無論如何舊的土壤遲早會不利於掠奪的粗放經營。接連四十年不斷地在它上面種植小麥而不施以肥料(見柴林格：“論北美農業的競爭”，第一八八頁)的土地，是很少有的。美國農業底變動性，可以從下述的數字中看出；種植小麥的面積(單位以英畝計)如下：

年 代	西部諸州	中部諸州	東部諸州
1880年	6,100,000	23,700,000	5,700,000
1890年	11,400,000	17,600,000	4,600,000
增(+ )或減(-)	(+ )5,300,000	(- )6,100,000	(- )1,100,000

同一時期在東北諸州內農業耕種的總面積大大地縮小了，耕地面積已從四六、三八五、六三二英畝減到四二、三三八、〇二四英畝，即是減縮了四百萬英畝以上。美洲殖民者底土地飢荒在土地如此迅速枯竭的情形之下，當然比古代日耳曼人底土地飢荒更厲害，如果日耳曼變為 *vagina gentium*，變為多數民族底永久生母，變為民族一個緊跟一個一直遷徙到非洲去的時代，那末美洲東部同樣也變為 *vagina gentium*，變為移民者在幾十年之內充滿了大陸一直到太平洋沿岸底出發地。

來自歐洲的強有力的移民促進了西方的這種運動，因為在肥沃的土地上進行農業，沒有地租，沒有軍國主義，沒有賦稅，這一遠景是太迷人了，這一遠景照我國詩人和政治家斷言，使無數農作人拋棄了和他們密切聯系的祖遺土地，而到海外去找新生活。

現在美國全部肥沃的土地都是私有的對象。農場底數目增加得更其緩慢。從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農場數增加了一、三四八，

九二二個，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只增加了五五五、七三四個，即增加百分之一四。土地不再是無主的了。土地提供地租而且有了價格。同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業受私有財產的負擔的壓迫亦已開始。美國的農人現時得要購買地產，因買價付出金額，遂減少他的生產資本，他必須在比先前更小的地而上經營，或靠負債來經營。或者他得要租佃地產。當他臨死的時候，他再不能指示給他自己的兒女在極西還有自由的土地，他的兒女不得不彼此分取他的地產，或者其中的一個出錢從別個手裏購買這份地產；這同樣不能不引起債務或經營資本底減少。於是土地變小，地產底負債以及他們的經濟設備底惡化就會到來。但同時對農業經營者提出的要求亦因此增加。土地已枯竭，新的土地又不能再無代價地得到。肥料、輪作、牲畜底飼養就成爲必要的了，而這些都需要額外的勞動力和金錢。美國從一八八〇年起用在上一年的補助肥料底用費都登記在調查表內。這些費用在一八八〇年爲二八、六〇〇、〇〇〇美元，在一八九〇年爲三八、五〇〇、〇〇〇美元。負債和地產縮小底新的原因也同時出現。

租佃制和債務開始根深蒂固且普遍起來。北美農業的地產出租的，在一八八〇年佔總數百分之二五·五六，而在一八九〇年則爲百分之二八·三七。農場的債務在一八九〇年時在全合衆國內第一次被登記了。那些不是出租而是作爲私有者自己使用的農場，其中在一八九〇年有百分之二八·二二都負了債，在這個數目中，大部分都是在資本主義較發達的各州內。八八六、九五七個負債的農業經營的地產，其中有一七七、五〇八個農業地產是在靠近大西洋北部的各州內（佔當地農場的三四·二二%）有六一八、四二九個（佔四二·五二%）是在北中部各州內，當時在西部諸州內僅有三一、七五一個地產（佔二三·〇九%），在大西洋的南部諸州有三一、〇八〇個（佔

七·四三%)，在南中部諸州有二八、一八九(佔四·五九%)。債務的總額計有一、〇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圓，為農業地產價值的百分之三五·五五。百分之八八負債的農場其負債的原因為：購買、土壤改良、機器和牲畜等等的購置。這些條件在由粗放耕作過渡到集約耕作的那個時期就停止了移民底巨流，而對勞動者的需要增加。一八八二年移入美國的僑民有七八八、九九二人，這算是達到了它的最高點。從那時起移民不斷地減少並且到一八九五年時移民的人數還不到二七九、九四八人。從德國遷出的，在一八九一年為二二〇、九〇二人，而在一八九七年就減至二四、六三一人。

在這種情形下工商業猛烈地發展起來。並且吸引着人口底大部分。生產者底人數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在工業內增加了百分之四九·一，在商業及運輸業內增加了百分之七八·二，在農業內(包括礦業)只增加了百分之一二·六。

勞工問題的時期對於美洲農業也迫近了。但是工業底發展不僅直接奪去農業的勞動者，除此以外，它還促進軍國主義底發展。工業變為輸出的工業，企圖霸佔世界市場並和競爭的國家發生衝突。軍事有很大的需要，國債增加，賦稅也增加起來。工業發展本身引起震動全國的危機，失業工人達到可怕的限度，階級鬥爭更加殘酷，統治階級更需要強有力的手段來制止和預防不利的運動。這種情形也促進軍國主義底發展。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本身更加成為用自己的壟斷權去剝削人民的上層財政界底所有物。這就意味着美國農業底負擔底增加和它在世界市場上競爭能力底評價。

歐俄及印度底競爭屆時也一樣失其尖銳性。掠奪式的農業必然引起佔統治地位的經營方法底破產在歐俄和印度比在美國還早，因為在這裏(歐俄及印度)備用的土地很少，舊的耕種土地已經更加枯竭，並且耕種土地底工具更加惡劣，因此農民更加貧困，更加喪失自



己的牲畜以滿足高利貸者和徵稅吏底慾望。結果就是慢性的、定期性特別劇烈的飢荒。在這種情形之下輸出有時還能增加，那是由於鐵路的建築把所有新的尚未枯竭的土地都捲入循環交換底漩渦裏面；但是最後這種經營或者會引起國家底完全解體，或者過渡到大地主或大農底資本主義的經營；後者（大地主或大農底資本主義經營）在俄國已經有許多萌芽。

農村人口的無產階級化，投到市場上的大批賤價勞動和廣大土地的買賣以及這一過程的反面——積累資本的農村高利貸者底許多階層底發生，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底全部前提條件。正因為有了這些條件，俄國的生產條件才更加和歐洲相似，而俄國的競爭對價格的壓力就更小。但是誰要是從這裏得出結論，說農業危機將要迅速地消滅，那他就犯很大的錯誤。引起危機的過程不停地向前進，並且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殖民地內，在東方的專制國家內開闢出新的區域。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南美洲等地還可以找到無人移居的土地。魯道爾夫·邁耶爾博士在一八九四年時寫道：

“一八九三年九月九日倫敦‘經濟學者’雜誌上引了幾段駐阿根廷的英國領事的報告說：在本年內用於耕種的面積，只有一二又二分之一百萬英畝（五、〇〇〇、〇〇〇公頃），而宜於耕種的面積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或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但是此外，還有在其他拉巴拉他（Laplata）各州、委內瑞拉、巴西一部分，對耕種有同樣條件的廣大面積，因此在南美洲全部宜於耕種的地面，即宜於種植小麥的地面，總計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其價值是很顯然的，如果注意到最近幾年種植小麥、蕎麥、燕麥、大麥的地面，在美國約為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奧、匈為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為四、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德國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法國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公頃，總共為一〇二、〇〇〇

〇、〇〇〇公頃(見“本世紀末期底資本主義”〔Der Kapitalismus fin de siècle〕,第四六九頁)。

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一八九七年)底結論也是這樣說。西伯利亞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頃產麥地在鐵路幫助之下為世界市場而開闢；鐵路很迅速地從東西南北直達非洲中部，而中國的開發在鐵路幫助之下也是最近將來底問題。雖然在中國希望生活資料輸入底增加而不是生活資料輸出底增加，但是中國底經濟結構和印度有許多共同點，所以我們不必在這裏從鐵路建築中期待着在那裏的那些結果：家庭工業底破滅，農民底加速負債，資本主義工業底緩慢發生，可是除這些以外，貧困和饑饉亦同時增長——農業生產品底輸出增加。飢荒永遠流行的印度常常輸出小麥和米——小麥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担和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公担。

俄國的情形也是如此。根據最近的材料看來，農民在這裏每年生產約一、三八七、〇〇〇、〇〇〇普特穀物(除種子不計)。俄國為本國的食用需一、二八六、〇〇〇、〇〇〇普特裸麥，為飼養牲畜之用需四七七、〇〇〇、〇〇〇普特。這就相差三七六、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如果農民自己及其牲畜要得到充分的營養，則這個差數需要向外購買。大家都知道，農民不唯不這樣做，他還出賣穀物。他須不差分毫地繳納捐稅和債款，可是賣給他的却什麼也沒有。

同樣的原因，迫使中國農民出賣米和麥，不管他自己怎樣需要它們。

自然，並不是一切國家都宜於小麥的生產。但也不是無條件地必須用麵粉來營養，過去已經有過若干次企圖用別的穀類：玉米、米、高粱之類來代替麥和燕麥。這些企圖，在小麥底供應增加以及對代用物的需要不存在的時候，就沒有多大成功。但如果有時到了連種

植小麥和燕麥的全部土地都不空，而麵包底價格又繼續不斷地增加，那末發明底志趣馬上就傾向於以熱帶生產物製成的代用品來代替原先的穀物，那時不宜於種植小麥的熱帶地方如美洲中部、巴西北部、非洲的大部分、印度、佐德羣島也就加入歐洲穀物生產者底競爭者隊伍中了。

自然，這種競爭有時一定會停止，而失其破壞的性質。地面是有限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簡直以令人眩迷的速度在推廣着。因此農業危機有時一定會完結，因為這種危機是從落後的農業國家和進步的工業國家競爭中發生出來的。但如果這種競爭停止，那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失去更向前推廣底一切可能性。可是不斷的擴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存的原則，因為技術的革命和資本的積累不停地前進，生產更加變為大量的生產，在那時大眾在其生產品中應得的部分就不斷地降低。因此農業危機只能因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底一般危機而完結。這個時機可以避開或接近，但無疑地，在資本主義社會內農業危機絕不會停止，可以說農業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底骨架。如果迄今壓迫西歐農業的資本主義的重担目前開始壓迫着它的美國、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競爭者，那末這證明並不是西歐的農業危機已臨近自己的末路，而是農業危機的領域推廣得更遠了。

樂觀主義者；即自由派的經濟學者對我們預言農業危機快要完結，已經有二十年了，而農業危機在二十年來一年比一年加深和擴大。我們當然不把它們認為是過渡的現象，而把它們認為是經常的現象，是變革全部經濟的和政治的生活的現象。這裏我們當然不去研究農業危機在工業上表現出何種相反作用的問題。我們只指出工業的發展很有力地為農業的危機所加速。有一個時代，曾有一句諺語：“農民富有，則全世界亦富有”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的任務這裏只在於討論農業中的那些改革，這些改革一部

分是爲歐洲以外的生活資料的競爭所加速。

#### 四 穀物生產底減縮

要求國家幫助，反對“無益的自由貿易學派”，這是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反對危機的最切近和最簡單的手段。這就是說：在歐洲土地佔有制喪失了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底重担轉嫁在民衆身上的經濟權力以後，政治權力當然就用規定穀物稅，改良通貨制度（複本位制），發給獎金等等方法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的重担轉嫁在民衆身上。再一次分析這些方法底理論根據是多餘的：理論的根據已被討論過好多次，有些意見可以說是大家都知道的，它們在這裏當然值得注意，並且我們也很難在這裏再提出一些新的意見來。至於說大地主們自己開始懂得他們如何就近利用這些“小手段”，這種討論更是多餘的。在他們企圖人爲地使生活資料昂貴時，他們在一切文明國家內都遇到工人階級最堅決的反對，較之爲此種物價騰貴所激動的一切人的反對更甚。穀物稅直到現在對於農業毫無幫助。可是如果有時發生一些條件，穀物稅能够在這些條件之下表現出極大的作用並且能够提高穀物價格，那末它們就把極大多數的人口安排在這樣萬難忍受的條件之下，這些條件一定遭到民衆的怨憤。法國一八九一年的歉收，引起了穀物稅立刻減低（自一八九一年七月至一八九二年七月）；在德國歉收也引起了——雖然沒有這樣迅速——穀物稅底減低，並且不僅是暫時的，而且是經常的。在英國就沒有一個認真的政治家敢於贊成人爲地提高糧食價格。工人階級在英國對此非常有力。要和自由貿易的英國競爭，不會容許落後的工業國家過於提高糧食稅。英國固執糧食輸入底自由就迫使大陸的資本家和工人一道反對穀物稅底任何增高以減弱國外糧食競爭底影響。如果在

歐洲農業保護稅並不提得很高，那末我們首先應歸功於英國工人底威力。

但是強有力的農業保護稅政策底諸結果——假定這政策是可能的——並不是有利於農業，而只是有利於土地佔有制，即是說它們保持了較高的地價，維持了原先那樣高的地租，也就是說，它們延長了那種困苦的情況（由於這種地租，農業陷入了這種困苦的情況），這種情形在前幾章內在我們的分析以後就不需要特別證明了。企圖用徵稅和其他“小手段”來保護歐洲的農業，使其不受國外競爭的影響，這在各方面都是無望的；它們只能產生一個結果：即農業對於新條件的適應，為它們所延緩。

可是這種適應顯然在向前推進。海外競爭底主要優點之一，就在於土地異常豐富，容許其擇取優良的最宜於農業的土地來耕種。歐洲的情形就不同。當每一種農業經營，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時，它必須生產所需要的一切，它不問土地對這種生產是否相宜或不相宜。穀物被種植在貧瘠的、多砂石的、極傾斜的土地上面。商品生產代替自給的生產在最初時期很少改變了這種關係；反之，由於人口迅速增加底結果，對於穀物需要底增加，就迫使全部農業轉到不甚肥沃的土地上，迫使全部較大的地面都用來耕種。海外競爭一出現，這種情形就改變了。在不宜於耕種的土地上繼續種植穀物底必要性已中止，在情況較為順利的地方，就把它拋棄或用別種農業生產來代替它。這種趨勢還為下述情況所加強：海外競爭一開始就很明顯地着重穀物市場。穀物的種植極其簡單；較之集約牧畜業，地下莖植物及菜蔬底種植以及果樹底栽培需要較少的準備和勞動力。穀物在食品當中是一種在重量和容積方面有特殊價值的商品。

柴特干斯特（Settegast）的統計表顯明指示出，運輸各種生產品時，每一公担（五〇公斤），每一英里合商品價值的百分率如下表：

商品種類	一公担的市價 (以蒲菲林爲單位)	陸路運費15蒲菲林	鐵路運費2.5蒲菲林
		一公担及一英里(百分數)	
新鮮飼料	50	30.00	3.00
糖蘿蔔	100	15.00	2.50
稻稈	100	15.00	2.50
馬鈴薯	150	10.00	1.66
乾草	200	7.50	1.25
牛奶、鮮果	400	3.75	0.62
小麥	1,000	1.50	0.25
活畜	2,000	0.25	0.25

這樣看來，小麥的價值最高。活畜底運費並不因鐵路而減少，它的運輸底速度自然是大大地增加了。活畜的運費和小麥的運費相等。但是後者能毫無損害地長期運輸、保存、搬動以及海道運輸，而活畜就要大大地受到長期的運輸和海道運輸的損失。把它關在儲藏室或堆棧內自然是不可能。穀物因其對運輸的長期性和有害的影響無感覺，故其價值在大多數其他大量農業產品，如肉、牛奶、水果、青菜、蛋等以上。

這樣看來，國外競爭首先出現在穀物種植底範圍內，這是很顯然的，於是歐洲的農業經營者在他們的土地並未註定他們去從事這種生產時，他們就在過渡到其他上面所指的生產品底生產中去找尋自己的生路。但是這種過渡並不是他們願意的。他們只有在對這些生產品找到市場的地方才能完成這種轉變。經濟的發展往往和他們背道而馳。我們已經看見，由於許多歷史的和生理的因素，城市中肉的消費比農村更多。因為城市人口比所有的人口增加得更快，肉的需

要當然也增加得相當地快。另一方面，直到本世紀，牛奶、菜蔬、水果、雞蛋之類底生產以少數靠近城市的地方爲限。在農村和小城市內，差不多每一個家庭，甚至還不是農民的家庭，都在這樣的範圍內進行農業經營，以便爲自己的消費獲得這些生產品。反之，在大城市內，這種情形就不可能。所以一旦大城市開始容納人口底極大部分，就發生對這些生產品的強烈的需要，那時他們爲市場而生產就會擴大起來，這雖有利於農民的錢袋，但並不有益於他的健康。以前他的一家消費了他的經營所生產的牛奶、雞蛋，現在它們徘徊在市場上並爲咖啡、酒和馬鈴薯所代替。甚至肉食底增加在馬鈴薯底消費同時增加與牛奶及穀物底消費同時減少的情形之下，就會發生有害的影響（參看威伯在“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三卷，第七七七頁上所說的話）。但是統計學家却從這些“奢侈品”消費底增加中，得出人民幸福增加的結論。運輸業底發展，使穀物的種植成爲無利益的，在某些地方却使大規模出賣肉、牛奶等等的生產成爲可能，替它們開闢在此以前和他們隔絕的市場。在這些因素發生作用的地方，它們大半加強着有利於小生產的傾向，並減弱着有利於大生產的傾向。在穀物生產底區域內後者大部分高於小生產，但也正是它更有力地接觸海外競爭。有些區域，農業經營者從穀物市場陣地上被驅逐出來，就在這些區域內找到避難所——正是屬於（肉的生產品除外）小生產還能在它們裏面抵抗大生產的那些區域，但是不必誇大這些因素底影響。這些影響不是到處都能表現出來。牛奶、菜蔬、肉等等的市場不是到處都存在。此外，如被飼養的牲畜數量底增加，需要額外資本和額外勞動力，這不是每個農業經營者都能辦得到的。

有些因素——下面就要說到——在英國出現得更有力而且更早，英國的氣候對於牧畜經濟是很適宜的，並且英國城市人口早已很多。

一八五一年大不列顛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和在农村中一樣多，普魯士則相反，一八四九年在城市中居住的佔全人口四分之一強（即百分之二八）；只是現在德國城市人口在數量上才與農村人口相等。此外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租佃制佔支配地位，它迫使農業經營者一年復一年照數付出租金，使他沒有可能以土地為抵押獲得資金，來繼續進行已不能產生收益的經營，於是就迫使農業經營者立刻去適應新的條件。

當海外糧食競爭已發展起來的時候，英國，由於自己的地理條件及其強度的商業流通，便成了海外糧食競爭的第一個創鉅痛深的犧牲者。小麥和麵粉輸入英國（超過出口）的人超平均數：在一八七三——一八七五年為一二、一九一、〇〇〇夸特（百分之五〇·五〇），在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為一七、九四四、〇〇〇夸特（百分之六四·二〇），在一八九三——一八九五年為二二、八九六、〇〇〇夸特，或為拿到市場上去的小麥總數百分之七六·九二。所以，在英國被消費的小麥只有四分之一是在本國的土地上生產出來的。但是穀物稅的時代，早已過去，這對於英國的農業經營者一開始就已經是很明顯的。英國早已是民主的國家，它的農業人口很弱。它的工業人口很強，因而不敢人為地使其穀物騰貴。農業已站在歧路的前面：或者瀕於破產，或者迅速改變其生產條件。在大多數場合內它找到了後一條出路。英國大地主們必須減低其地租，——在愛爾蘭是在立法強制之下，在英吉利則在佃農階級底全力強制之下。最近幾年租金在較好的地方，降低了百分之二〇——三〇，而在貧瘠的地方，則降低了百分之五〇，有時還要多些。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地主們在建築物 and 改良土壤上不能不用的費用就增加了。已經不止一次提起過的英國土地委員會底報告，對這種情形引了不少的例證；我們在這裏引其中一個關於諾爾弗克地產的例來做說明。這裏以金鎊計如下：



	1875年	1885年	1894年
租金	4,139	2,725	1,793
地產方面的費用	1,122	1,168	1,216
所花費的租金之百分數	27.1	42.8	67.7
純收入	3,017	1,559	580

所以，土地所有者底純收入，從六〇、〇〇〇降至一一、六〇〇馬克。但是農業底這種緩和靠地租底減少還是不夠的。於是從穀物生產過渡到牧畜業就和這些情形一同完成了。在聯合王國內，一年內收割的小麥，以夸特計，平均如下(種子不計)：

年 代		
1852	1859年	13,169,000
1860	1867年	12,254,000
1868	1875年	11,632,000
1889	1890年	8,770,000

從那時候起生產平均降至七百萬夸特。

種植小麥的面積如下：

年 代		
1868	—1870年	3,801,000英畝
1890	①	2,545,000
1894		1,985,000
1895		1,717,000
1896		1,692,957

反之，草地增加了。草地在大不列顛在一八七五年時爲一三、三一、〇〇〇英畝，一八八五年爲一五、三四二、〇〇〇英畝，一八九五年爲一六、六一一、〇〇〇英畝。

在德國，發展的情形又不同。它的大陸的地位，它的穀物稅，農民

① 原文爲一八九九想係一八九〇之誤。——譯者

的保守性,都延緩它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這種發展隨着從落後的經營進到更強度的經營,隨着空地底消滅和從三田制過渡到輪作制的經營的進步而來,這種進步並不是到處都已完成的。後一些因素(指從落後的經營進到最集約的經營,空地底消滅,從三田制過渡到輪作制等)自然促進穀物種植底擴大。穀物種植的減少,穀物種植被牧畜業、菜蔬及水果底種植所排擠,直到現在只限於德國個別的地方,而不是一般的現象。在德意志帝國內種植的面積(單位公頃計)如下:

	1878年	1883年	1893年	1896年	1883—96年
麥和小麥①	2,222,500	2,306,100	2,398,200	2,249,900	(-) 56,200
燕麥	5,950,200	5,817,100	6,016,900	5,982,100	(+) 165,900
大麥	1,623,300	1,754,300	1,627,100	1,576,300	(-) 78,000
雀麥	3,753,100	3,773,800	3,905,300	3,979,600	(+) 205,300

這樣看來,主要穀物底種植面積,只有很小的改變。

種植穀物及豆類植物的面積,在一八八三年共有一五、七二四、〇〇〇公頃,一八九三年爲一五、九九二、〇〇〇公頃,增加了二六八、〇〇〇公頃。在這同一時期中間作爲牧場和空地的耕地面積,從三、三三六、八三〇公頃減至二、七六〇、三四七公頃,即減少了五七六、四八三公頃。

但是在那時候,種植穀物底面積,整個講來,仍舊沒有改變,牲畜底數量則大大地增加了。

牲畜的頭數計有:

年 代	牛	豬
1878年	15,776,700	7,124,000
1883年	15,786,800	9,206,200
1892年	17,355,700	12,174,300
1897年	18,490,800	14,274,600

① 指德國小麥而言。——譯者

是意味着海外競爭一步緊一步侵入到那些受壓迫的歐洲農業找尋避難所的領域內。二十年前輸入英國的全部活畜，都是歐洲產。現在活畜幾乎完全不是從歐洲輸入，大部分是自北美輸入；但是活畜從南美由海道供給，已經更加便利。輸入英國的活牛總數是由以下幾個地方輸出所構成(以百分數計)：

年 代	歐洲	合衆國	加拿大	阿根廷
1876年	99	—	1	—
1886年	43	36	21	—
1891年	16	67	21	1
1895年	—	67	23	9

輸入的牛底頭數爲：

年 代	輸 出 的 國 家				總 計
	加拿大	美 國	阿 根 廷	其 他 國 家	
1895	95,993	276,533	93,494	3,515	469,535
1896	101,591	333,119	65,699	2,143	502,552
1897	123,435	415,299	73,867	1,675	614,386

輸入的活羊底頭數其分配如下(以百分數計)：

年代	比利時	丹麥	德意志	冰島	荷蘭	美國	加拿大	阿根廷	其他國家
1877	24	5	30	—	40	—	—	—	—
1886	—	9	32	3	45	—	9	—	1
1891	—	12	—	7	61	3	9	6	2
1895	—	—	—	6	—	42	21	29	2

在供給活羊底事業內，歐洲被排出英國市場之外爲期較晚，但是發展得極其迅速。

二十年前，肉只有以罐頭的形式，以醃肉的燻製的形式才能由海道運來。從那時候起，可供好幾個星期消費的鮮肉(用冷藏)底保存

方法已經改善了很多，海外鮮肉輸入英國不斷地增加。在一八七六年只輸入了三四、六四〇公担鮮牛肉，一八九五年就有二、一九一、〇三七公担，一八九七年有三、〇一〇、三八七公担。鮮牛肉底最大的數量，是從合衆國輸入的。

鮮羊肉在不列顛的貿易統計內，也只是從一八八二年起才特別加以記載。當時輸入爲一九〇、〇〇〇公担，到一八九五年便爲二、六一一、〇〇〇公担，一八九七年爲三、一九三、二七六公担。這個數量中從澳大利亞輸入的爲一、六七〇、〇〇〇公担，從阿根廷輸入的有七一五、〇〇〇公担。

像小麥底生產一樣，肉底生產在合衆國出口方面顯然已經達到了它的最高點。牧場的粗放經營，只是使牲畜的飼養對於海外輸出成爲有利的一種經營，它需要無限廣闊的土地，可是這些土地因爲人口的增加，而更加減少了。在合衆國方面有如下的統計：

年 代	人 口	母 牛	公牛及其他牛	羊	豬
1870	38,558,000	13,096,000	15,389,000	40,853,000	26,751,000
1880	50,156,000	12,027,000	21,231,000	40,766,000	43,034,000
1890	62,622,000	15,953,000	36,849,000	44,335,000	51,503,000
1895	69,793,000	16,505,000	34,364,000	42,291,000	44,168,000

只有乳用的牲畜，在數目上增加，肉用的牲畜則減少。但是從這種牲畜底飼養中獲得利益的不是歐洲，而是阿根廷和澳大利亞，在那裏對於牧場經營底擴大還有無限的地面。在供給英國羊和羊肉上，這兩個國家現在已經佔第一位；他們的牛和牛肉的輸出，也迅速地增加。在一八九〇年從阿根廷輸出的有一五〇、〇〇〇頭牛，到一八九四年則輸出二二〇、五〇〇頭。

除肉的生產品外，牛乳的生產品，水果及菜蔬的培植以及家禽的飼養也用來幫助貧困的農業。但是海外的食品競爭在這些領域內也多少感覺到。現在這種情形，例如在水果的培植內，一部分已經證實了。

它已碰到美國方面這樣的威脅，即德國必須宣告聖約瑟夫的身殼蟲是它的守護神，它拿自己的盾牌來保護德國的蘋果。

但是海外競爭底時期，對於新鮮菜蔬也必然來臨。在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期間，輸入英國的洋蔥數量平均一年為一、八九三、〇〇〇普式耳，一八九三——一八九五年為五、二三二、〇〇〇普式耳。單西班牙在前一個時期就輸入了四一、〇〇〇普式耳，在第二個時期輸入了一、三〇〇、〇〇〇普式耳。除西班牙外，還從荷蘭、法國、埃及等國輸入。其他新鮮菜蔬輸入到英國的，在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總額為二二七、〇〇〇金鎊，在一八九三——一八九五年則在一、一〇〇、〇〇〇金鎊以上。英國自己用的雞蛋是來自意大利、匈牙利、俄國。在最近幾年，新鮮牛乳從荷蘭和瑞典輸入底企圖，也已經成功。

這樣看來，替雞蛋、菜蔬、牛乳等等生產底海外競爭開闢技術的前提條件，現在已經具備，並且在那些國家——即如在歐洲——由於新的輸出國家之出現，穀物的生產愈受排擠，則海外競爭將會更迅速戰勝農業輸出底舊國家。直到現在，農業副產物運輸底改善只有害於英國的農業經營者，其餘歐洲底非工業區域底農業經營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反成為英國底供給者。但最後在這一領域內，歐洲底經營停止其輸出，而海外競爭却擴大起來，除掉對於海外農業經營者所從事的太不重要的那一類生產不計外。如果這一競爭直到現在主要是戰勝了大生產底領域，那末以後它就會轉到農業小生產佔優勢底領域。農業危機遂因此加劇，關於這一點，無需再多說下去。可是歐洲的農業還有其他防禦手段來抵禦海外的敵人。

## 五 工業與農業的結合

直到現在我們主要是專就英國而言。為要解釋反對海外競爭的

那種鬥爭手段（關於這種手段我們等一會兒要說到），我們就舉出不是在運河方面的——在英國這種反海外競爭的鬥爭手段並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而是在大陸上的材料，在大陸上這種鬥爭手段有其存在的良好條件，首先很顯然就是存在於我們的德國。

租佃制有可能將海外競爭底負擔首先轉嫁到土地佔有制上。在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名義上是一個人的地方，用抵押借款來規定地價就阻礙着這一過程。那裏農業經營者比在租佃制下要先找尋別的手段來減低生產成本費，他們找到一種手段，就是土地所有者自己經營比租佃制更為有利：在前一種制度下某一地方農業經營者底私人組合更是經常的，因而他們的共同行動很少遇到障礙。

我們已經知道，農業生產品大部分只有較小的特殊價值，因而要能夠很有利地把它們實現為商品，往往只限於狹小的銷售市場。假如適當的生產品，不是以原料的形態，而是以製成品的形態輸出去的話，則這種市場在不變的運費之下會大大地擴大起來。

已經屢次引證過的柴特下斯特的表中有些數字很顯明地說明這一點。每一公担（五〇公斤）和每一英里的運費，合商品價值百分率為：

商 品 名 稱	1 公担的市價 (單位馬克)	運 費	
		陸路運輸為15 蒲美林	鐵路運輸為2.5 蒲美林
1 公担及 1 英里(百分率)			
糖蘿蔔	1.00	15.00	2.50
糖	35.00	0.43	0.07
馬鈴薯	1.00	10.00	1.66
酒精	20.00	0.75	0.12
活畜	20.00	0.25	0.25
肉汁	600.00	0.03	0.0004

在食品加工方面，許多生產品，除有較大的特殊價值外，還有別的優點：它們比未製品，如牛油、乳酪、肉的、蔬菜的以及水果的罐頭等等易於保存。

可是，在農業生產品加工方面，有些生產還有一種極為重要的優點：製成品含有少量或甚至完全不含有對於土地肥沃底保持所必要的礦物成分。製成品的輸出並不從土地方面奪去任何重要的元素。而且生產底廢料含有許多物質，可直接或作為牲畜的飼料，供給特種肥料，這樣就使土地變為肥沃。這種情形在釀酒工廠和製糖工廠方面正是如此，釀酒廠和製糖廠把自己的廢料用作牲畜的飼料和肥料，在它們根基穩固的地方，更強有力地促進了穀物生產和牧畜業底發達，它們成了合理集約經營必要基礎。除這些以外，還應當注意到下述的情形：在農業生產品底加工方面，有些生產在冬季給人們和力畜以工作，沒有這種工作，人及力畜就無事可做；大工廠底蒸汽機，正是使動力生產對於農業（對於打穀機、簸穀機、剉桿器、抽水機、鋸子等等）也很便利；當電力傳導在農業中已確定下來時候，動力生產當然就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於是在工廠底汽力幫助之下，就可以轉動汽犁、打穀機、載肥料到田裏的荷車、刈草機。在某些地方，當地條件對於這種情形有利，就會引起農業經營者傾向於在自己地產內開設工廠來改製原料。這種傾向，在歐洲以外減低原料品價格和地租的糧食競爭影響之下得到了特別有力的推動。現在有了兩重動機，用工業企業家底利潤，去補償農業經營者或土地所有者底損失，用增加的工業利潤去補償地租底低落，廉價的原料品，變為高價的工業品。在這裏正如在現時代各種經濟進步情形之下一樣，大生產前進了，並且從各種革新中取得了最大的利益。小生產通常並不擁有足夠的資本，並且並不充分生產原料，以便自己能夠創設工廠來改製自己的生產品。小農業經營者比起大農業經營者和資本家更不靈活、更保守、更

不明瞭技術底成就和世界市場底需要。大地主們，亦即大地產底所有者們，首先在自己的地產內，創立了大的工業企業；除它們以外，資本家創設了農業的工廠，並且購買對於原料的生產所必需的土地。這樣看來，從兩方面替工業與農業底結合開闢了一條道路。澱粉廠和啤酒廠，與釀酒廠和製糖廠一同在大地產內發生了，可是啤酒廠的範圍不大，因為啤酒製造大部分在城市中經營較為有利；工廠（製啤酒的）底原料，一部分具有同樣的價值（大麥），一部分比生產品有較高的（蛇麻）特殊價值，而且比後者（生產品）容易運輸；此外，宜於製啤酒的大麥和蛇麻，只生長在某幾處地方。除上述的農業的工廠以外，還發生了牛乳場、菜蔬、牛奶、水果等等的罐頭工廠。

大地產勝於小經營，其最大優點之一就在於能夠有利的和多方面的結合工業與農業。在大地產對於工業不僅供給原料，而且供給動力——水力、附近森林中的木柴（因此遠距離的運輸就成為多餘的）、煤，——的地方，這種優點就更大。在這種情形下運費和仲介貿易費也能大大地節省！……

在農業生產品加工底這些生產中所達到的優良的結果，誘惑了許多不很大的經營也企圖佔有它們的利益。對於這種生產的適當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已被準備成唯一的資本主義企業，這些企業很大，足以使它們私有的土地能供給它們全部原料，因此它們不得和少數附近的農業經營者訂立供給未製品的契約。如果這樣的企業是由股份公司經營，那末供給者——農業經營者——只要得到股票，合作社就可成立。幾年之間，這些合作社很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尤其是在德國。德國農業合作社（借貸合作社、購銷合作社除外）計有：

	1891年	1892年	1896年	1897年
合作牛乳場	729	869	1,397	1,574
其餘的合作社	131	150	273	484



釀酒廠、磨粉廠、麵包廠、酒窖以及諸如此類的合作社主要歸入後一項目（其餘的合作社內）。我們一點也不懷疑，還剛開始的這種合作社運動還要提供有價值的結果，並引起我國農業諸關係底大改革。

但是當他們在這種運動中看出農業內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過渡階段，在中世紀公有地和公共牧場底殘餘內看出別一個過渡階段，而其他的人則看出保存獨立的，完全有力量的農民的一種手段，那我們既不能同意這些人，也不能同意那些人。現代社會主義底特點，就是勞動者自己，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內，整個社會佔有生產資料。生產合作社，可以作為走向這一形態的一個過渡階段，它必須是生產者底組織，而生產者同時又是生產資料底所有者。反對那種把現代勞動者底生產合作社視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意見——最有力的反駁之一，就是指出那種事實：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有一個時機對於繁榮的生產合作社遲早總要到來，那時合作社社員就開始使用僱傭勞動者、無產者；僱傭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底所有權上沒有他們的份，並且要受合作社社員的剝削。每個生產合作社，在現社會內，只要一繁榮起來，也就是說擴大起來，就有變為資本主義企業的趨勢。那種情形在僱傭勞動者所創立的生產合作社內起初只是一種傾向，在農業經營者底生產合作社內（關於農業經營者底生產合作社我們現在就要說到）早已是它的先決條件。在合作社的製糖廠、釀酒廠、牛乳場、罐頭工廠、磨粉廠之內，勞動者並不是合作社底社員，而是他們所僱用的和剝削的僱傭勞動者。合作社給予農業經營者的利益，除節省運費及貿易費以外，尚佔有資本的利潤。這一類農業生產合作社——而別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沒有——是走向資本主義，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

我們現在轉到在合作社幫助下，拯救小農的問題。這裏首先必

須指出，合作社一開始就不讓最需要幫助的小農和農民無產者參加。本來工業的企業需要金錢，而他卻沒有金錢。他又不能供給企業以所需的原料。生產合作社，只是對於中產階級才有意義。但這裏最大的優點和小生產一比較總是經常地在大生產一邊。大地主即使只有必要的資金在進行有利的工業企業時，也不會遇到任何的阻礙；反之，組織合作社是何等的困難呵！對於大地主，他的農業適應於工業生產底需要是理所當然的，反之，在各種不同的小農業經營者底生產品供給中要規定出一致性和正確性，是多麼的困難！

大生產在農業中很能適應農業大工業底需要。農業大工業往往使這樣的大生產在它還不存在的地方實現出來。糖的生產——農業大工業底這一典型的例子——強有力地促進了農業中大生產底發展；另一方面，巴賽（Paasche）指出，德國南部、法國某幾處地方及意大利北部阻礙大生產擴張底原因之一，應當在當地土地所有權底細分中去找。依恩博士（Ihne）在“將來”（Zukunft）雜誌，第五卷，第三八二頁上發表的“美洲德人製糖廠”一文中，說到東普魯士各地，糖底合理而又廉價的生產。東普魯士大地產底所有者們設立了製糖工廠，並供給製糖廠以他們自己的勞動者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所種植出來的糖蘿蔔，不受那些在自己田地上或菜園中耕種的農民<sup>①</sup>底動搖的而又常常很頑強的情緒底影響，如魯易西安納種植園底所有者，有自己的甘蔗製糖廠，就是這樣做的。

有一些農業的工業企業，提供大經營以特殊的利益。

如果在大地產內有釀酒工廠，那末工廠的廢料就可完全使用在大地產內，並且經營又可經常地得到改善。如果馬鈴薯從各方面供給釀酒工廠，那末情形就不同了。“酒糟運輸很困難，因為它裏面含有多

---

① “Kossathe” 即沒有耕種而只有田宅或靠賣田宅的菜園的農民。——俄譯本註

量的水份，只有在釀酒廠旁邊飼養牲畜，才有利可圖。如果別的經營供給工廠用的馬鈴薯，那末釀酒工廠底土地就利用別的經營供給的這些馬鈴薯而豐饒起來，因為在所供給的馬鈴薯內含有土壤底養料已不再回復到土地去（見克蘭佛特〔Krafft〕：“商業經濟學”〔Betriebslehre〕，第一〇一頁）。根據柴特干斯特很有名的圖表看來，釀酒廠酒糟底運輸，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每一公担、每一英里陸路運費為酒糟價值百分之三〇，而馬鈴薯的運費僅為其價值百分之一〇。在合作社的釀酒廠附近，最靠近釀酒廠的農戶，就增加了自己土壤底豐饒，距離最遠的農戶其土地就貧瘠。

製糖工廠情形也是一樣。除大規模的農業以外，大資本在某些生產內能夠極容易地，而且大部分極有利地利用農業與工業密切結合底優點。

在德勒斯登舉行的德國農業合作社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熱烈地向農業經營者建議創立合作麵包廠和磨粉廠。代替現有的、往往很落後的小工廠，應當是合作大企業，此等大企業不僅供給自己的社員，而且供給大眾以極大的利益。提高農業中的小生產，供給它以麵包廠及磨粉廠這樣大生產底利潤，這種思想無論如何至少對於農業經營者是很能誘惑的。對於小磨坊主和麵包廠主則誘惑較小。小生產是以剝奪小生產者而得救，但這並不使農業經營者惶惑不安，像他們自己聲明的。可是，如果磨粉廠、麵包廠及農業結合在一個人手裏，真正提供這樣的利益像人們斷言的，——我們對這一點，絲毫不懷疑，——那末不是小農底笨重的和缺乏資本的合作社，而是大的資本充足的麵粉廠最先能夠據有這些優點。在小農業經營者佔有大磨坊之前，這些大磨坊已成爲小農業經營者和製麵包者底命運之安排者了。在農民與大磨坊之間，何種關係現在是佔支配地位，從上巴伐利亞產糧的地方寄來的，在一八九七年夏天刊載於德文報上的下述的

信，就說到這一點：

‘兩個麵粉廠，統治着車行七小時的整個地方。農民完全受它們的支配。禮拜六是小縣城一個趕集的日子；但是市場上只有許多燕麥；農民已經不敢把麥和小麥拿到市場上來，因為兩個製粉廠主人是唯一的購買者，並且每一個來到市場上的人，不到他們那裏去，就要受到一種處罰，就是一公担麥，要少給他十個蒲非林。穀物的自由買賣，完全停止了；農民不容分辯地拿出自己的商品，靜靜地等待着他們給價錢。如果他拒絕照這個價格出賣，那末他就得到一個回答：‘好吧，你回家去吧，我剛才買了一、〇〇〇公担匈牙利的小麥。’

但如果在農業工業化底領域內，像在其他領域內一樣，大生產本身有許多優點勝過小生產，那末這當然並不證明，小生產不能從他唯一辦得到的農業大工業底形態——從農業生產合作社得到一些相當大的利益。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夠實現的地方，它就把農民變為資本家，並且讓他用他的資本主義剝削底果實去增富其農業生產，更合理地建立這種生產並將其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只要問一問，使大踏步走向無產階級化的農民，一夜之間變為資本家，這種魔術的戲法，將繼續好久？

合作社成立底最初結果，和使農民變為別人的工廠底供給者底結果是一樣的：他必須使自己的經營去適合別人的工廠的需要。

製糖工廠指定農場，用何種種子種植自己的土地和施何種肥料；牛乳場則規定飼料，擠乳底時間，有時甚至規定乳畜底品種。

從前怕用各種太強的氮氣肥料，因為這種肥料好像很有害於糖蘿蔔裏面所含的糖質。因此工廠大部分規定氮氣與亞磷酸的比例為一與二之比，並且完全禁用智利硝石，於是糖蘿蔔底種植就和用新鮮糞料時一樣。這些規定中只保留了禁用智利硝石和施用聖誕節後澆

在田裏的糞料來種植糖蘿蔔。反之，人們爲了工廠的利益，逐漸日益改進氮氣與亞磷酸的比率，於是現在有些工廠需要氮氣與亞磷酸的比率已經爲二與三之比或三與四之比，而他們的大多數甚至需要一與一之比”（見凱爾格爾“薩克森來的農業季候僱工”，第一四頁）。

在農業已經完全適合於糖蘿蔔生產的地方，這些規定就成爲多餘的了。斯托凱爾（Stöckel）在“合作牛乳場底創立、組織及管理”這一著作中提出合作社牛乳貿易底範例。第四條說：“在這一條內應當包括關於母牛底飼料的一切必要的規定。在出賣新鮮牛奶的時候，尤其是在供給所謂乳母底牛奶時候，關於飼料沒有一定的必要的規定是不行的。

關於飼料底一定規定，即限制用那些足以影響牛油的味道與保存的飼料作爲飼料，對於生產合作社也是必要的。

第五條 擠奶的時間亦應規定，以便牛奶直接從牛棚中和其他地方供給合作社。

第六條 在擠乳時候應當注重清潔。

第七條 監查委員會委員和管理員有權無須預先關照，隨時可以去視察屬於合作社社員的牛棚及保存牛奶底場所，在擠奶的時候，親自到場並且將已擠出的牛奶拿去化驗。這些委員們有權要求合作社社員或他們的代理人正確地說明乳畜底飼料，乳畜底照料以及諸如此類的情形（見第一〇二——一〇四頁）。

在丹麥牛乳合作社關於牝牛底飼料和飼養有一些規定，以便保證質量底一致，保證沒有臭味並保證在冬季牛乳生產底均勻（“一八九七年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報告”，第一二六頁。）這樣看來，農民已不是自己農業生產的主人，農業生產成了工業企業底附屬品，它必須由工業企業底需要來指導。農民成爲工廠底零工。他甚至往往對工業企業陷於技術的依賴，因爲工業企業像我們已經指出的，供給他以牲

畜的飼料和肥料。農民對合作社的純經濟的依賴，是和這種技術的依賴並進的。合作社不僅供給資金來改善農業生產和彌補其偶然的虧空；隨着農業生產適合合作社的需要，它就成爲農民所生產的商品之唯一消費者。農業生產，要是沒有工業生產，就不能再生存；工業生產，成爲它的支柱，工業生產一破壞，農業生產亦隨之毀滅。而這樣的破壞是很容易到來的。

農業的工業所得的利潤愈高，則農業的工業所吸收的資本亦愈多。現時就資本的大小而言，只有在中等以上的企業才能提供較高的利潤，才能在技術方面和商業方面抵抗一切的競爭。再則，較高的利潤要在那些由於生產的性質，或由於特殊複雜的情況，容許獨佔的生產內才能得到，或者最後要在那些爲技術的及經濟的變革所重新創造的，或替資本主義的剝削重新開闢的生產內才能得到，例如現在在電氣技術方面就是如此。但是後一種較高的利潤不能保持長久；新開闢的領域很快被充滿，生產過剩就成爲慢性的。前者剝去乳脂，後者只剩得些去皮的乳汁，——有時甚至連這點乳汁都沒有。在農業的工業內在大地主方面，——尤其他若是資本家的話，——就有勝過小的土地佔有制和合作社的優點：他比小地主或合作社更活動、更大胆、更有先見之明、更易行動，他能够在必要條件具備的地方更迅速去創立在當時還是有利的農業生產。對於各種農業工業，正如對於其他工業一樣，有一個時機遲早總要到來，那時它會陷於困苦的境地，那時價格就會低落，那時競爭就會猖獗並毀滅最弱的和無經驗的農業工業，那時危機就時時震撼着工業底這一適當領域，這些危機一部分是一般的，與經濟的繁榮和壓迫的一般循環相一致的，一部分是部分的，爲特殊的技術的、經濟的、立法的變革所引起的。國家政權愈是保護這種工業，爲農業底利益犧牲全體人民而給予這種工業以特權愈多，則這個時機亦愈迅速地來臨。歐洲酒精和糖底生產明顯地證明

這一點。這兩種東西的生產（酒精和糖底生產）在德意志和奧地利、俄國和法國強有力地為各種特權，輸出的獎勵（以歸還交納的稅款形式）所鼓勵。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八一年在帝國徵稅底區域內，加工改製澱粉質的或糖汁的釀酒廠數，只從七、〇一一增至七、二八〇，而付出一五、〇〇〇馬克以上的火酒稅的釀酒廠數，則從七八九增至一、四九二；它幾乎增加了兩倍。從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年在釀酒廠內，加工改製的馬鈴薯數量從一、九八二、〇〇〇噸增至三、〇八七、〇〇〇噸。一八八四年爆發的危機就是這種燦爛繁榮底結果。在一切場合內這種危機引起俾斯麥政府對困難的工業予以急切的幫助。最後，它終於施行一八八七年的徵稅法，保證釀酒廠每年有四千萬馬克的“小恩惠”，並且竭力遏制生產過剩；在一八九五年又補充了新的法律，更有力地限制酒精底生產過剩，並且還更加提高國內的酒價，目的是把所徵的稅用作輸出的獎勵，每一百公升六馬克。雖然這樣，可是酒精崩潰底幽靈並沒有退出舞臺。

糖因政府較大的關心，比酒精可以有恃無恐，何況它的生產都操在大人物手裏。結果就是製糖業驚人的增長。在德意志帝國內計有：

年 代	糖蘿蔔製糖工廠數	製糖的糖蘿蔔底數量(單位噸)	其中工廠自身所得的數量(單位噸)	獲得粗糖的數量(單位噸)
1871—1872	311	2,251,000	1,504,000	186,000
1881—1882	343	6,272,000	3,432,000	600,000
1891—1892	403	9,488,000	4,644,114	1,144,000
1896—1897	399	13,722,000	5,782,051	1,739,000

同時在德意志帝國內以噸為單位，計有：

年 代	糖的消費量	糖的輸出量
1871——1872	221,799	14,276
1881——1882	291,045	314,410
1891——1892	476,265	607,611
1896——1897	503,078	1,141,097

糖底消費，尤其是輸出，無論增加得怎樣厲害，在最近期間它們遠落在生產之後。在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糖底消費和輸出共計爲整數一、六四〇、〇〇〇噸，而生產達到了一、七四〇、〇〇〇噸，也就是說，生產過剩爲一〇〇、〇〇〇噸。在這種情形下，製糖工業底地位，在最近期間，由於古巴戰爭，糖從古巴輸出殊爲不易，遂成爲特別有利。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德國製糖工業底生產過剩超過國內的消費和輸出，竟達三〇〇、〇〇〇噸之多。

希望改善製糖工業目前的狀況是不行的，勿寧是等待它的衰落。海外競爭底壓迫，引起農業的工業底發展並用不斷增加獎金的辦法人爲的鼓勵這種發展，這在別個國家也有這種情形。以粗糖噸數表現的糖蘿蔔的生產量概數如下表（根據西倍爾〔M. Shippel〕：“糖的危機，輸出的獎勵及糖業卡特爾”，見“新時代”雜誌，第十五卷，第一期，第六二二頁）：

年 代	德 國	奧 國	法 國	俄 國	比利時 與荷蘭	歐洲其 他國家	總 計
1891—1892	1,200,000	780,000	640,000	550,000	230,000	90,000	3,490,000
1893—1894	1,370,000	840,000	570,000	650,000	310,000	110,000	3,850,000
1894—1895	1,830,000	1,060,000	780,000	620,000	370,000	150,000	4,810,000

除英國以外，北美合衆國是我國糖業最好的消費者。從德意志帝國輸出的粗糖、精製塊糖等等，以噸爲單位，計有：

年 代	總 額	輸入大不列顛	輸入美國
1891	784,000	454,000	140,000
1896	974,000	513,000	416,000
1897	1,120,000	564,000	376,000

但是美洲人做過不少努力去創設本國糖蘿蔔製糖事業。前面提及的芝加哥工學會會長依恩，在柏林的“將來”（Zukunft）雜誌（第三八〇頁）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請德國的機械工程師利用現有的可



能性，在美國創立糖蘿蔔製糖工廠。這是多麼愛國呵！種小麥的出息愈少，則美洲人底努力亦愈強烈。但是製糖工業，像上面所引的材料指明的，能够極迅速的繁榮，而美國人也是能够把製糖工業迅速提高的一些人。可是歐洲各國隨着發達的製糖業，輸出的獎金倒被提高，而不是被降低。在德國輸出獎金在一八九六年增加到兩倍（從一又四分之一增至二又二分之一馬克）。用獎勵辦法和用保護稅和軍國主義情形是一樣的：事情一經開始做了，那時要想停止已經來不及了。大家都知道，獎勵制度引起生產過剩，引起可怕的危機——但是每個人都害怕，國家單獨停止支付獎金，危機對於他的國家還更可怕，並且每個人都希望比別的國家更長期地支持下去。這樣看來，人民更加被剝削，而同時糖蘿蔔種植場更被擴大，極其廣大的農業區把自己的命運和製糖業底命運聯系在一起。作糖蘿蔔種植用的面積以公頃為單位，計有：

年 代	德 國	奧 國	法 國	俄 國	比利時與荷蘭
1891	336,000	323,000	223,000	310,000	75,000
1892	441,400	369,000	272,000	331,000	103,000

然而製糖工業底破產就更加不可避免，並且最後必然引起製糖工業毀滅的土地荒廢，就表現得更加可怕。

在德國獎勵牛乳業就不及獎勵糖蘿蔔製糖業。可是像上面所引的關於毀滅的牛乳場的材料指示出，牛乳業迅速發展了，主要是在國外競爭底壓迫下，使穀物的種植更少有利可圖。可惜，在德國還沒有牛乳業發展底精密的統計。但是可以肯定的說，牛乳業底迅速繁榮，只是部分地與牛乳生產底增加有聯系。比牛數增加得比牛油及乳餅底生產更慢。牛乳業底迅速推廣大半是依靠別的條件。離城市很遠的地方生產出的牛奶，因為運輸底困難，直到現在還不能拿到市場上並變為商品。牛乳在生產者自己的經營中，如果有這樣多的牛乳，就

被他的家庭和僱傭勞動者消費了。過渡到製乳業就能够製成乳餅和牛油，它們經得住遠距離的運輸並且可以當作商品拿到市場上，不僅拿到國內市場上而且可以拿到世界市場上。但這從今以後就要使農業經營者自己和自己的家屬失去迄今還是自己及其家屬消費的牛奶。隨着農村中製乳業的發展，農村中牛乳底消費量却減少了。農村居民雖然過度勞動與可憐的住宅條件，雖然肉底消費不足，可是直到現在在體力和耐勞上都超過城市居民，這除了在露天勞作之外，當然是因為有大量的牛奶供他們消費。但是在家庭工業替自己築起堅固的窩巢的地方，露天中的工作就停止了，而在製乳業從農業經營者手裏奪去他們的牛奶的地方，牛奶底消費就停止了。專為在經濟上拯救小農的這兩種手段，就是小農體力退化底最實際的手段。

這種情形在煉乳廠製造乳酪的那些地方尤甚。可是，我們覺得在一八九七年威敦堡的農業經營者在霍亨蓋姆舉行的第四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拉達烏爾—海拉布諾所表示的意見未免有點樂觀，他說，如果像在威敦堡地方所有的情形那樣，牛乳業只限於製造牛油並將去皮的牛乳歸諸農業經營者，則製乳業對於農業人口底有害的影響，就會消失。“自然，這種利用牛乳的方法當然很快就使醫生和製乳業妥協了，以前在乾酪製造廠內，用盡全部牛乳，而農業經營者得不到一點去皮的牛乳，這就是為什麼從衛生學的觀點來說嚴重的懷疑，不是無根據地激怒着醫生們，而有一個軍醫，以前甚至把某些徵兵區內自己對新兵的一些傷感的觀察公開出來。”

去皮的牛奶，無論如何都不能代替純淨的牛奶；去皮的牛奶幾乎失去了裏面所含的全部脂肪。純淨的牛奶含有百分之二·八——四·五的脂肪，去皮的牛乳只含百分之〇·二——〇·五的脂肪。這幾行字底作者同樣回憶起醫生們底報告，他們不能同意去牛乳皮的辦法，並且還看出非常有害的，是在製乳業發達的區域內，用去皮牛

乳來餵養襁褓中的嬰兒。顯然，在農業經營者並不自己消費去皮的牛奶，而是“利用”它來養豬——這是常見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下，豬養得很肥而且獲得很大的價值——的地方，歸諸經營的去皮牛奶，更不能改善農村居民底衛生狀況。小農底生產品愈是變為商品，小農愈是把生產品變為貨幣，則他的營養亦愈惡劣。

但如果製乳業對於經營者底體力康健底有害影響，是無須懷疑的話，那末他們的經濟的提高，若不是因為極片刻的利益起見，要想靠這種手段的幫助，却是很可懷疑的。

當德國牛油底製造迅速地發展時，牛油底輸出，在輸入增加的時候不斷地降低。

牛油底輸入與輸出，以公斤計如下：

年 代	輸 出	輸 入
1886	12,909,000	5,119,000
1891	7,649,000	7,953,000
1895	6,857,000	6,890,000
1896	7,101,000	7,857,000
1897	3,716,000	10,326,000

關於乾酪，我們有以下的材料（單位公斤）：

年 代	輸 出	輸 入
1886	3,409,000	5,216,000
1891	1,883,000	8,392,000
1895	2,212,000	9,348,000
1896	1,840,000	10,196,000
1897	1,373,000	11,937,000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輸出底降低與輸入底絕對增高。

在世界市場上銷售製乳業生產品的競爭不斷增長。差不多在所

有歐洲的國家內限制穀物生產作為製乳業發展底刺激物，在法國及荷蘭是如此，在奧地利，俄國，瑞典及挪威亦是如此。尤其是在丹麥榨油業得到驚人的發展。在這裏出超從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公斤（一八八一年）增至一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公斤（一八九六年）。母牛的數目和人口相比也增加了。其增加數為：

年 代	每一千人有	絕 對 數
1871	448	807,000
1891	452	899,000
1893	449	1,011,000

但是在歐洲以外，製乳業也迅速發展起來。這裏加拿大以製造乳酪著稱，澳大利亞則以製造牛油著稱。加拿大輸出乳酪達到的數字如下：

1891 年	106,200,000(英)磅
1895 年	147,000,000(英)磅

在澳大利亞，除降低小麥價格外，還用輸出獎金（一磅牛油二辨士，一磅乾酪一辨士）來鼓勵製乳業，在維克托利亞獎勵到一八九三年，在南澳洲獎勵到一八九五年，在克維斯蘭德則獎勵到一八九八年。英國國會土地委員會關於澳大利亞牛油製造業的報告說：“在維克托利亞製乳業底進步，其特徵就是工廠制度底發展。根據最近官方的材料看來，在一八九五年維克托利亞有一五五個榨油工廠和乾酪製造廠，而在一八九二年只有七十四個廠，並且全部生產品三五、五八〇、〇〇〇磅牛油中，在第一年內製乳廠的出品為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磅。維克托利亞牛油輸出的增加，在下述數字中就表現出來：

1889 — 1890 年	829,000磅
1890 — 1891 年	1,700,000磅
1891 — 1892 年	4,794,000磅

1892—1893年	8,094,000磅
1893—1894年	17,141,000磅
1894—1895年	35,948,000磅
1895—1896年	21,024,000磅

克維斯蘭德和新南瓦累兩地關於牛乳業底迅速增長也有同樣的報道。在後一殖民地(新南瓦累),牛油底製造從一五、五〇〇、〇〇〇磅(在一八八九年)增至二七、三五九、〇〇〇磅(在一八九五年)。在關於新南瓦累的報告中有如下的敘述:

“很顯然的,製乳業已經不僅像先前一樣在農民方面發展起來,因為許多大的牧畜者,特別是靠近海岸的,在最近期間都注意到這種工業。

在工廠制最初實行的時候,大多數工廠都是合作的,並且乳脂底分離與牛油底凝結過程是結合在一道的。這樣的結構一天天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集中的煉油廠,從許多分離乳脂的工廠獲得自己的原料。這樣改變底利益,據說很大。在每一個中心生產出同一質量的牛油,並且由於高度的生產和採用優良的機器及器具如冰箱之類,生產成本費大大地減少,這些機器和器具只有為大企業所採用才有利。”

像從德國輸出的糖一樣,從德國輸出的牛油大部分都為英國所消費。德國輸出的牛油七、一〇一、〇〇〇公斤(一八九六年)中英國就消費了五、五七〇、〇〇〇公斤;一八九七年,輸出的三、七一六、〇〇〇公斤中,英國消費了二、七六六、〇〇〇公斤。但是這些數字已經表明德國的牛油在英國市場上很快被排擠。英國牛油輸入中各國所佔百分比如下:

年代	丹麥	挪威與瑞典	法國	荷蘭	德國	澳洲與亞洲	其他各國
1887	32.3	11.3	27.5	10.7	10.3	0.4	7.5

1890	40.7	11.3	25.9	7.7	5.1	2.0	7.3
1893	40.2	12.4	20.1	6.1	7.1	7.3	6.8
1894	42.8	11.0	16.5	6.4	5.4	11.3	6.6
1895	41.1	11.5	16.1	6.8	4.0	11.1	9.4

澳大利亞迅速增加的作用，在這裏特別明顯。丹麥的牛乳場也已經受到使價格跌落和銷售困難的澳大利亞的競爭的排擠。

但是德國辦合作社的人們很熱心地努力盡可能迅速增加牛乳場底數目；他們很驕傲地指出牛乳場在最近幾年來的迅速發展；他們這樣做，好像競爭者底人數愈多則企業愈有收益。自然，以農民底拯救者自居，他們當然要這樣做的。合作的牛乳場底數目，無論怎樣大，但和農民人數比較，這數目還是太小，雖然這種手段（合作的牛乳場）對於農民是主要的拯救。但是還在農民底相當大部分靠合作牛乳場回復到幸福時代很久以前，乾酪和牛油底生產也一定遭到生產過剩和危機。在丹麥——合作的牛乳場底幸福國家內，其中有許多現在已處於窘迫的境地。在德國，在討論人造牛油的法律時，牛油製造者底處境，是最陰暗的色彩描畫出來的；可是，例如在德連茲金農業合作社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曾勝利地宣告過的，這並不妨礙在一八九五年組織一七五個新的牛乳場，在一八九六年，組織一七七個。很顯然地，創業者的狂熱病，在一八九七年還在猖獗。有遠見的合作創辦人方面，現在已經發出警告底呼聲。例如前面已經提及的拉達烏爾—海拉布諾在威敦堡農業經營者的第四十二次大會上，在其關於製乳業的報告中曾宣稱：“最顯著的，在現時，尤其是在最近一年，在農村中出現了創立新的牛乳場，這一異常有力的運動。如果這個運動繼續下去，在兩三年之內就可以比現有的牛乳場數多到兩倍，在良好的條件之下，甚至多到三倍。例如，在海拉布諾區，從設立第一個牛乳場的時候起，即是說十六年來不曾創立一個新的牛乳場，後來却在最近

六個月之內出現了不下十個新的牛乳場；此外，在最近的將來當然還希望設立新的牛乳場。上述的運動如是劇烈，甚至合作社底熱烈崇拜者都很困惑地停在它們面前，搖搖頭，並且擔憂着，這樣多的牛乳場底建立對於農業怎能不間接地表現出極嚴重的危險。”

像酒精和糖業的危機一樣，製乳業的危機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工業大規模生產的時候，這種危機在現在是自然而然的。

本來柴林格在其一八九七年二月普魯士皇家農業經濟學院內宣讀的關於合作社的報告中，就已抱怨公營的牛乳場彼此間進行的殘酷競爭。他平心靜氣地想：“可是，人們希望用合作社思想底繼續發展，或者進一步用現時如此特殊地構成我國大工業的那種手段——卡特爾，來克服這些困難。人們即藉此鼓吹各個牛乳場比以前更常與出賣牛油的大公司聯合並且約定只通過大公司才出賣其生產品底某一部分。興旺而穩固出賣牛油的組合，那時就在彼此之間分配了銷售市場並因此消滅了從前混亂的，對價格有着壞影響的競爭；過剩的生產物，雖然是吃虧也被輸出到國外，輸出到英國去。”但是柴林格教授在那篇演說中介紹了這種臭名遠揚的手段之後，他並且多少帶點憤慨地說：“在工業中卡特爾組織日漸發展的時期，就談不到這些購物公司底消滅，因為要抵制經濟力底浪費——工廠主底聯合引起浪費，——除了消費者底聯合以外，沒有別的保障。”（“農業年鑑”，一八九七年，第二二三、二二五頁）

這樣看來，農業的卡特爾乃是“合作思想底發展”，工業的卡特爾乃是“經濟力底浪費”，只有合作思想底發展，才能抵制經濟力底浪費，起初稱讚合作社是和卡特爾鬥爭的手段，隨後却頌揚卡特爾是避免合作社不可避免的破產的手段。教授先生底邏輯和他的道德的憤慨一樣高；但是他的結論底主要興味並不在此。結論值得注意的，是證實牛乳場底缺乏和稱贊卡特爾為唯一的出路，可是卡特爾在農場數

不斷增加的時候是不會實現的。於是在這裏農業科學底光輝在其對於合作社底神秘不可思議的影響的讚辭內就被承認了！

大工業底其他農業部門也和上述的部門一樣，直到現在對於合作社只有很小的意義。自然，要說行將到來的危機徹底破壞了它所接觸到的那一工業部門，那絕不是必然的。危機只在很少的情況內進行着這種破壞工作。危機通常只做到以資本主義的精神去改造現存的私有財產關係，也就是說只做到合作社在抵制危機時必然作為可靠的屏障。缺乏資本的小企業，在危機中滅亡。但是在農業的工業中，一個企業底毀滅就不限於單獨這個企業；一個企業底滅亡會招致依靠它為生的許多農業生存底毀滅，最低限度會招致許多農業生存底動搖。工業的工廠對農業經營者給予的幫助愈大，農業經營者的農業愈是依靠工業，則破產底結果更加無可挽救。

極大的設備完善的企業在這樣的危機下面，能夠支持下去，但它們不得不熬過困苦的時間，這時利潤消失了，這時只有再投下新的資本，才能維持生產底繼續。合作社底社員不能重投新資本就要喪失自己的合作社權利。如果喪失支付能力，是一般的，那末，除了將企業賣給資本家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如果支付能力底喪失不是一般的，那末危機就會把合作社變為幾個少數有錢的社員底私有財產，這幾個有錢的社員就以純粹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經營這個合作社。

這一過程並不一定引起以前合作社社員底無產階級化；在幸運的時候他們還能保存自己的農民私有財產。但是在事情真有這樣幸運的地方，他們對合作社經營的經濟的依賴性就保存下來；對團體的依賴（農業經營者是這個團體底平等的及有同等利益的成員），變為對一個（或幾個）具有相反利益的強有力的資本家的依賴。

勞動者從合作社工廠底參加者一變而為資本家工廠底僱傭勞動者。事情並不因此有所改善，僱傭勞動在這裏正如在家庭工業內一



樣帶有隱秘的形態。這就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底不可避免的結局。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像各處一樣，在這裏，工業畢竟還是駕乎農業之上，資本駕乎各個生產合作社之上。農業的生產合作社，由於它們能給予農業經營者以眼前的利益，遂成爲鼓勵農業工業化的強有力手段，但農業的生產合作社同時也是替投資開闢一條到統治農業之路的強有力的手段；沒有這種生產合作社，投資就碰到極大的障礙。我們一點也不抹煞這些合作社底意義。它們對於農業底變革是重要的；但這不是拯救農民的手段。

但是合作社也有自己一定的界限。對於其他各種工業有效的法則，對於農業的工業亦有效。生產底集中，在農業中不得和相反的傾向鬥爭，在這裏也得到迅速的成功；在農業的工業內和在其他各種工業內一樣，大生產的傾向佔支配地位。製糖工業極其明顯地證明這一點，它雖然人爲地爲國家的法令所鼓勵。在德意志帝國內製糖工業的情形如下：

年 代	製糖工廠	製糖的糖蘿蔔底數量(以噸計)	每一製糖工廠中所用糖蘿蔔的平均數(以噸計)
1871——1872	311	2,250,918	7,237
1881——1882	343	6,271,948	18,285
1891——1892	403	9,488,002	23,543
1896——1897	399	13,721,601	34,389

因此，在二十五年間，平均一個工廠製糖所用的糖蘿蔔的數量幾乎增加到五倍！

在新稅則(其目的在限制生產底擴大)頒佈前，在馬鈴薯釀酒廠內表現出同樣的傾向，誠然，這種傾向不是在極狹隘的形式之內。根據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底材料，用馬鈴薯、穀物或黑糖，在適用同一稅則範圍內，釀酒的工廠數，在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期間從七、〇一一增至七、二八〇。但是繳納酒稅不到一五、〇〇〇

馬克的釀酒廠數則從六、二二二減到五、七八八，反之，繳納酒稅在一五、〇〇〇馬克以上的釀酒廠數則從七八九增至一、四九二。

另一方面，計有：

年 代	馬鈴薯釀酒廠數	釀酒的馬鈴薯數 (以噸計)	平均每一釀酒廠所用 馬鈴薯數(以噸計)
1882—1883	4,180	2,392,000	572
1886—1887	4,069	2,719,000	668

從一八八七——一八八年起在徵收國稅底區域內馬鈴薯釀酒廠底生產在一個工廠內平均數仍舊沒有改變；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小的釀酒廠有很大的減少。其生產情形如下：

	1890—91年	1894—95年	減(-)或增(+)
50公升以下	1,300	513	(-)787
50—500公升	731	720	(-) 11
500—5000公升	632	657	(+) 25
5000—50000公升	1,931	1,983	(+) 52
50000公升以上	1,793	1,758	(-) 35

不言而喻的，牛乳場同樣要服從於近代大工業發展底規律；它們的技術也在進步着；手工勞動在它們方面為蒸汽所排擠，機器增加了，每種機器所加工的生產品數量增加了，用於生產和倉庫的場地增多了，銷售市場以及同時必須求助於受過商業教育的職員——只有大企業才能給以充分的職業，——底服務也增大了。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在新南瓦累，牛乳場都成為更大的經營。人們從比利時寄來的報道也這樣說：柯蘭德·波佛(Colard Bovy)在其對一八九五年舉行的國際農業大會的報告中斷定：設備不良與管理不當的小合作社，在和大合作社鬥爭中更會消滅，“大合作社照最低價格加工製造大量的牛乳，並能經常供給同一質量的生產品。如果有幹練的職員指導生產，那末這些優點就會達到它的最高點”（瓦

德維爾德在“比利時的農業社會主義”一文中所引，見“新時代”，第十五期，第一卷，第七五五頁）。

德意志帝國食品工業底發展，在下述材料（由一八八二年及一八九五年工藝統計中引來的）中表現出來。根據這些數字，每百個企業經理（所有主及僱用職員）中有僱傭勞動者和職員數為：

年 代	代 粉廠	精糖當 製糖的 生產	其他植物 食品製 造①	動物食品的 製造（肉除 外）②	麥芽和 麥酒釀 造	釀酒廠， 甜酒及釀 母製造廠	啤酒及 果子露 製造廠	醋底 製
1882	101	2,831	688	141	364	299	256	162
1895	337	5,764	1,231	315	759	413	315	237
增 加	136	2,933	543	174	395	114	59	75

我們到處都可看到企業日益擴大，在農業的工業底一切部門內僱傭勞動者底人數比企業家和企業管理者底人數增加得更迅速；在蘿蔔糖的製造內，牛乳業內以及在釀酒廠內，相對的增加在百分之一百以上，在植物罐頭製造內，幾為百分之一百。例如連斯特爾公司底企業就指示出，某些農業的工業企業得到了如何的發展。連斯特爾公司在瑞士有兩個大工廠製造代乳粉。後一個工廠每天製出一〇〇、〇〇〇公升牛乳，即在一八〇個農村中收集來的一二、〇〇〇頭牝牛底生產品；這一百八十個農村，已喪失了自己的經濟獨立性並成為連斯特爾一家底隸屬者。這些村落的居民外表上還是自己土地底所有者，但他們已經不是自由的農民了。

這種發展愈迅速地往前推進，為創立能夠支持競爭的企業所必需的資本數額愈迅速增大，想要創立生產合作社的農業經營者底圈子愈緊縮，則新的企業在這些領域內，一開始亦愈迅速地成為資本主

① 罐頭、榨菜、代用品、咖啡、可可、小粉、和通心粉。

② 醃魚類、冰凍牛乳、牛油及乾酪的製造。

義的企業，這種情形在目前已經很明顯地在糖蘿蔔製糖及馬鈴薯釀酒內表現出來。在這些工業部門內還可以談得上有合作社工廠的地方，那問題也只限於大農和貴族地產底所有者底合作社而已。

如果在各種危機之下，轉移到資本家手裏，會威脅着所有農業生產合作社，那末在農業的工業底任何部門內，有一個時機遲早就會到來，起初合作社阻止小農業經營者作自己的社員，隨後就變為資本家和大地主底壟斷。這種發展往往同樣引起大的農業經營排擠小的農業經營。在這種場合內製糖業就給我們很好的證明。在機器所需的動力不必特別生產，而是由地產內的工廠所供給的地方，機器生產底優點在農業中就會更明顯地出現。在這種情形並不引起小生產沒落的地方，小經營底工業化，就在小農業經營者身上烙下一個依靠工廠——他的生產品底唯一消費者，——的印記，完全把他變為工業資本底奴隸，他必須使自己的經營適合工業資本的需要。這就是農業的工業帶給農民生路。

## 六 工業排擠農業

如果農業的工業之發展給農業經營者——頂多是一時的——以新的依靠，那末技術底進步就會促使壓迫農業經營者並破壞其經濟底各部門的諸傾向出現。這種情形第一是為原料之較好的利用所引起，即為由同一數量的原料中製出較多的生產品；後一情形在生產品底消費不變的時候，自然，就促成對原料的需要減低，或者在消費增加的時候，又會阻礙對原料需要的增加。再則工業的進步會引起用廉價的東西——由於廢物利用和代用品底生產，——來代替高價的原料。最後工業開始自己生產從前為農業所供給的生產品，或者用別的辦法來代替它們，於是農業生產品就成為多餘的了。

我們且舉幾個例子來解釋。大家都知道因為碾穀方法底不完善，食物就有很大的損失。製粉業底進步便大大地減少這些損失。“據波巴說，在十七世紀一個人一年的消費幾等於七一二磅小麥，這個數量現在幾乎够兩個人的消費，並且現在由於我國碾穀機底改良，替人類得出大量的食物，價值每年總在好幾百萬；這些食物從前只供牲畜食用，現在對於牲畜極容易用其他完全不宜於人類消費的食品來代替。小麥含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不易消化的纖維素，並且完善的（就這個字底廣義而言）碾穀機並不一定會提出多於這一數量的糠粃，但是我國好的碾穀機，還提出百分之一二——二〇的糠，普通的碾穀機則提出百分之二五的糠，其中含有百分之六〇——七〇的營養素”（見黎比赫：“化學書簡”，第三三四頁）。一八七七年熟練的碾穀者吉爾曾說，他發現了重碾底方法，可以提出百分之九二·六的麵粉及僅百分之七·四的糠和廢物（見吉爾：“蒸氣問題底解決”）。關於糠粃繼續減少的記載我們還不曾見過。不過現在有人企圖用化學的方法，使糠粃底營養素，即蛋白質，成為可以消化的東西。

很顯然地，在麵粉消費不變的時候，在穀物的利用上，製粉業底各種進步一定會引起麵粉需要底減少。但是如果拿到市場上的穀物量同時也迅速地增加，或者比麵粉的消費還增加得更迅速，降低需要底作用，在麵粉消費增加的時候，一定會表現出來。照這樣看來，模範的碾穀機排擠原始的碾穀機必然加劇穀物市場上危機底作用。

剛才提過的使糠粃底營養素轉換為使它們能為人的胃口所消受的那些企圖，已經涉及廢物利用和代用品生產底領域。改進廢物利用，這是現代生產方式底重要特徵之一。廢物利用是大生產底自然結果；大生產將廢物大量地堆集在各處，這就引起將它們移去的必要，使人們企圖為着工業的目的而利用它們並把它們從難於處理的東西及不生產的耗費變為收入底來源。這些廢料對於農業具有很重

要的意義。一方面，大工業底廢料供給農業作為牲畜的飼料和肥料，例如：釀酒廠、製糖廠、啤酒工廠、榨油廠底廢料，所謂湯馬斯燐肥，木屑之類變為使農業靠緊工業的一種強有力手段。另一方面，工業利用農業生產品底廢料，以便經過它們的加工製造又可和農業競爭。從以前被拋棄了的，或頂多用作棉花種植地的肥料的棉籽中製造出油，就可作這種廢物利用底例證。現在人們學會了用棉籽製油，致使由歐洲油類植物製出的油遭到很強烈的並且日益增加的競爭。

在德意志帝國內油類輸入額為：

年 代	棉 籽 油	亞 麻 油
1886	8,067噸	39,743噸
1891	21,366噸	37,385噸
1895	34,460噸	19,863噸
1896	27,047噸	19,693噸
1897	30,227噸	15,548噸

棉籽油尤其在假造橄欖油的時候，在從牛脂、牛乳及廉價油，尤其是從棉油中製造人造牛油的時候，就會被人使用；在味道和生理的作用上很難將它和天然油區別。一八七二年在德國已設立了第一個人造牛油工廠；現在人造牛油工廠約有六十個之多。

這種競爭並未改善了牛油市場底危急狀況，這是顯而易見的。地主階級於一八九六年用以論證自己要求對人造牛油工業必須加以新限制的動人的申訴，自然是言過其實的，但是相反地斷言，說農業經營者完全沒有因人造牛油而受到損失，也一樣是言過其實的。至於指出人造油底生產處於困難境地，這對於農業經營者也很少有可安慰之處。關於這一點，與其根據各工廠虧累情況，甚至根據繁榮的工業部門（擁有管理不善、組織不良、設備不全的企業）發生的虧累情況來判斷，不如用人造乳酪和牛油能夠更自由地使自己在競爭場

上的競爭進行到底的國家的統計來判斷。在大不列顛輸入達到以下情況：

年 代	牛油(由澳大利亞輸入的)		人 造 乳 酪
	以公担為單位	百 分 數	以公担為單位
1886	1,452,000		870,000
1892	2,107,000	4	1,293,000
1895	2,750,000	11	922,000

澳大利亞的廉價牛油不僅排擠天然油底生產，而且排擠人造油底生產。但這種情形，自然引不起它的生產方法底改善。天然油底生產者從這種情形中就沾不到絲毫便宜。

但如果我們不去爭辯牛乳場因人造牛油底製造而受到損失，那末我們無論如何也不願以此去對爲牛乳場的利益而限制人造牛油底生產的企圖表示贊許。我們倒寧願承認，如果合作牛乳場底破產使成百成千的勤苦的農民降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是可悲的，但如果新機器使勤苦的無產者失去麵包，那是更可悲的。在現代社會內，技術底進步，只有經過這樣的道路，才能實現。誰要想排除進步底這個道路，他就必須消滅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反之要希望無論如何保存這種制度而同時又要消滅這制度所產生的後果，那是愚蠢的。這種愚蠢行爲是會令人憤慨的，如果有人要想在實際上只顧到暫時的和等級的利益，而只讓生產者底個別階層享有特權，保護他們不致減少他們利益的各種技術的進步，這種保護一般說來只有靠犧牲其他階層才能實現的。這樣一種特權，在現代國家內，羣衆不能長時期地忍受下去，因此用這樣的方法拯救農業不受工業壓迫的烏托邦思想就表現出來。在這一方面我國地主階級的忙亂的努力只證明，食品和調味品底資本主義大生產底危險，對於他們是何等巨大，後者和農業比較起

來具有何等的意義。

人造牛油以及人造乾酪，直到現在，都是大生產所製造的那些代用品，這些代用品更銳敏地反映到農業上。但是它們在同一的方向內並不是唯一有效的代用品。

啤酒釀造方面，最近幾十年來，差不多在各國都有很大的增加。啤酒的生產量如下：

德 意 志		大 不 列 顛	
年 代	單 位 百 公 升	年 代	單 位 百 公 升
1872—	32,045,000	1873	35,700,000
1882—1883	33,250,000	1881	44,774,000
1890—1891	52,730,000	1891	52,675,000
1893—1896	60,568,000		

奧 地 利		比 利 時	
年 代	單 位 百 公 升	年 代	單 位 百 公 升
1870	9,303,400	1870	7,794,000
1880	10,530,000	1880	9,288,500
1890	13,570,000	1890	10,770,000

法 蘭 西		俄 羅 斯	
年 代	單 位 百 公 升	年 代	單 位 百 公 升
1872	7,131,000	1866	2,200,000
1885	8,010,000	1884	4,212,000
1890	8,490,000	1890	8,490,000



在丹麥啤酒的製造，從一億二千萬公升（一八七六年）增至二億一千八百五十萬公升（一八九一年）；在瑞典從四千一百九十八萬一千五百公升（一八八〇年）增至一億二千四百零八萬一千一百公升（一八九〇年）；在瑞士從二千八百萬公升（一八六七年）增至六千五百萬公升（一八七六年），一億零四十萬公升（一八八六年）及一億二千四百九十萬公升（一八九一年）。

也許有人以為，忽布底生產也以同一比例增加。可是事實不然。忽布的生產增加並不大。一八六七年忽布的收成總額，在歐洲計有五〇、〇〇〇噸。一八九〇年的收成，亦復如是（其中德國有二四、七〇五噸，英國有一五、〇〇〇噸）；在一八九二年收成爲五七、五五〇噸（其中德國有二四、一五〇噸，英國有一九、〇〇〇噸）。

在英國一年生產出的啤酒量，從三十五億公升（一八七三年）增至五十二億公升（一八九一年），即增加了十七億公升，約增百分之五十。反之，種植忽布在一八七一年爲二四、〇〇〇公頃，在一八九二年爲二三、〇〇〇公頃。可是忽布底輸入，據一八九七年國會土地委員會底報告指出：“在最近二十年來實際上仍舊沒有改變”。在一八七六——七八年期間，忽布從各國輸入額平均一年爲一九五、〇〇〇公担，而在一八九三——九五年期間則爲二〇三、〇〇〇公担。

下列的表，表明德國忽布種植底發展情形：

	1884年	1896年
忽布的收穫量.....	28,870噸	25,325噸
忽布的輸入額.....	1,340噸	3,041噸
合 計.....	30,210噸	28,366噸
減去忽布的輸出額.....	11,514噸	9,868噸
忽布的餘額.....	18,696噸	18,498噸
	1884 - 85年	1896 - 97年
啤酒底製造(單位百公升).....	42,287,000	61,486,000
忽布一噸能裝出的啤酒(單位百公升)...	2,260	3,324

這樣看來，啤酒消費增加對於忽布種植者毫無幫助。它只促進忽布底代用品底生產而已。

化學底發展對於葡萄酒釀造者比對於忽布種植者還壞些。化學教人從馬鈴薯澱粉、破布和木質纖維中製造葡萄糖，這是改善價值較小的葡萄酒底著名的方法。此外，化學又教人用葡萄皮及葡萄乾藉助砂糖及農業性的工業底其他生產物來製造葡萄酒。

甚至所謂“天然酒”更加必須施以需要自然科學知識和應用貴重器具底一系列手續，這樣，天然酒更加成爲資本主義大工業底生產物，而葡萄種植者只以原料供給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酒窖變成酒廠。

邁凱爾教授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在普魯士皇家農業經濟學院內所宣讀的他的學術論文“論葡萄酒製造及製造技術的立法概況”中曾作出這樣的結論：“葡萄酒——不完全是天然的生產品；在葡萄樹上，不會長成瓶中的葡萄酒，而是在製造的時候必須經過一段長的路程，否則名貴的葡萄酒就不會從甘甜的葡萄汁中製造出來……”

葡萄酒底這種製造在最近幾年來引起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我們在這些研究中使葡萄酒製造領域內進步很速，逐漸學會了從價值較少的葡萄中製造出品質優良的天然葡萄酒。酵母菌底培植首先佔有了這一領域，“葡萄皮上就有着各種酵母菌，使葡萄液醱酵。“大家都知道，有許多種酵母菌，生長在約干里斯堡，蓋仁蓋姆的酵母菌能製出一定質量的葡萄酒；於是用分別培植某一類酵母菌的方法來得到一定質量的葡萄酒的企圖就完成了。事實上在當時做出了分別培植酵母菌的成功的經驗，熱心家以爲就沒有葡萄酒釀造也可以完全做得到；只要人工地將酵母菌加到砂糖溶液內就可得到極名貴的約干里斯堡或斯丁堡的葡萄酒。”

也許有人以爲，這些遠景是能够使人興奮的；不僅甜豌豆，就是約干里斯堡的葡萄酒，對每一個人——難道不是地上天堂底開端嗎？

社會主義者這樣想，但地主階級就不這樣想。食品及調味品底豐富對於社會底福利來說，是一種幸福，對於地租就是一種不幸。如果每個人都能從糖水中替自己製出約干里斯堡的葡萄酒，那時約干里斯堡葡萄園主底地租就要完結。因此，邁凱爾教授很輕鬆地繼續說：“謝謝上帝，這是不會成功的，只有分別培植純種酵母菌才能製出比沒有酵母菌更好的葡萄酒，同樣也才能在我們的生產品上獲得較好的價格。而且要利用這些純種酵母菌到葡萄酒釀造內，得要經過好幾年。”

這樣看來，這些酵母菌直到現在是奉命唯謹地停止在地租面前。但是這些極渺小的惡漢有朝一日拋棄自己忠貞的品行而變為革命者，這不是很可怕嗎？約干里斯堡葡萄酒從酸味水果中製造開始以後，為什麼不會取消從糖水中製造葡萄酒呢？

但是禁止葡萄酒底改良是不可能的；邁凱爾教授在其學術講演中自己又說明這一點。據統計在十年間只有一年對葡萄酒是特別好的，三年是上等的，三年是中等的，三年是下等的。下等的酸葡萄酒沒有適當的加工就不為文明的國度所享用。禁止葡萄酒底改良，意味着對葡萄種植者是極有害的。

除改良了的葡萄酒及用葡萄皮製的葡萄酒以外，同時發生葡萄乾酒底製造。“從溶解在水中的充分被搗碎了的和醱酵過的，特別是經過純種酵母菌的葡萄乾中，可以製出醇美的葡萄酒。這種在各方面非常良好的，完全宜於消費的葡萄酒，並不稍遜於普通的葡萄酒，並且對德國本土出產的葡萄酒是嚴重的競爭者。從技術的觀點說要抵制它是不行的，但是從經濟的立場說，它就遭到很大的反對，因為它對德國本地葡萄酒造成可怕的競爭。它很能抵抗醱酵並且非常廉價：十二馬克就可製出一百公升。這是嚴重的競爭，應當用立法來堅決地和它鬥爭。”

事實上，你們想一想，如果葡萄乾製的酒成功地排擠馬鈴薯製的

下等白酒，則何等的不幸會落到德國人民頭上來呵！

用純粹培植的酵母菌可以從麥芽中製出像葡萄酒一樣的飲料。在漢堡有一個大工廠就製造出這樣的麥芽酒。

從關於這一論文的辯論中我們可以引用政府的老顧問吉爾底意見，他指出，小葡萄種植者們在葡萄酒製造上自己不能進行改良。此種改良只有大葡萄園主和葡萄商人才能辦得到。在六十年代邁岑就已經寫過同類的話。“只有最大的葡萄園主和富裕的葡萄種植者才自己榨酒和濾酒入窖並且待價而沽。沒有資金的貧窮的葡萄種植者人數（在一八六六年前的舊普魯士內）約為一二——一三、〇〇〇人。爲了要迅速地得到現金，他們就直接在收穫之後把葡萄出賣，他們受定錢的約束往往更早地將它出賣。徵稅吏計算在一八六四年秋季這個葡萄栽培者階級賣給葡萄商人和葡萄酒工廠主的葡萄數量，爲六九、四〇五公担”（見“土地”，第二卷，第二七五頁）。

葡萄收成沒有保障就使小的葡萄種植者更加依賴於葡萄商人，上面我們已經引過邁凱爾底意見，十年之間總有三年不好的收成，只有一年有特別好的收成；但是除了數量外，質量也在波動。邁岑在上述的著作（第二七七頁）內引萊茵省從一八二一至一八六四年這個期間所收的葡萄數量。我們且從那裏引一些數字（以桶爲單位）：

1821年	24,868	1854年	91,299
1822年	469,211	1855年	212,358
1828年	816,228	1856年	175,663
1829年	271,088	1857年	546,545
1830年	41,970	1858年	576,205
1834年	850,467	1864年	320,471

在這樣的情況下，葡萄栽培業就成爲純粹的賭博，在這種賭博中，歸根到底是誰的荷包最肥滿，誰能夠長年忍受損失，誰就一定會贏。一次欠收就把沒有資本的小規模葡萄栽培者變爲破產者或者使

他陷入沒有希望的奴隸地位。

合作社在這裏應當是一個救生籠。合作社的儲存應當使小葡萄栽培者有可能將他們的葡萄酒底改良和仲介商人所得的利潤放到自己荷包裏。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所說的一切也適用於它們：一方面，這些合作社不是很小的，沒有資本的葡萄種植者所能辦到的，另一方面，像其他生產合作社一樣，它們遲早必然會退化為資本主義式或成為資本主義的財產。

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只會加速發展，發展底趨勢就是使葡萄園栽培者更加在經濟上依賴工廠，依賴酒店，使葡萄栽培者變為釀酒工業底零工。

那種技術的發展，不斷地加強葡萄栽培者對葡萄酒工廠主的依賴，同時減弱葡萄酒工廠主對本國葡萄栽培者的依賴。技術的發展大量供給葡萄酒工廠主國外廉價的酒，他把這種廉價的葡萄酒變為上等的葡萄酒。技術的發展又供給葡萄酒工廠主別種廉價的原料用來製酒。

葡萄酒製造底變革在法國最容易追溯。由於葡萄蟲害和別的病害所造成的荒蕪，葡萄酒釀造業底收入就大大地減少了；一年的收入為：

十年內的平均數	葡萄栽培的面積 (單位公頃)	一公頃的收入 單位百公升	總收入	葡萄酒的消費 (單位百公升)	生產的贏(+)或虧(-) (單位百公升)	葡萄酒的輸出 (單位百公升)
1870—1879	2,364,175	22.4	52,935,956	38,100,000*	(+)14,800,000*	3,283,419
1880—1889	2,052,897	16.3	33,499,782	36,400,000	(-) 3,000,000	2,533,199
某年—1887	1,919,878	13.6	25,365,441	34,000,000	(-) 9,000,000	2,402,216
某年—1891	1,763,374	17.0	30,139,000	?	?	2,044,000

\* 此係一八八〇——一八八四年的數字。

雖然從八十年代開始葡萄酒底消費遠超過它的生產，可是輸出差不多沒有減少。這種情形一部分可用前幾年剩餘底貯蓄，一部分可用廉價葡萄酒底輸入來說明，這種廉價葡萄酒在法國自己加以改良，隨後就自己消費或者當作上等的法國葡萄酒輸出。酒底輸入額（單位十萬公升）為：

	一八七八年	一八八九年		一八七八年	一八八九年
從西班牙	1,247	7,052	從英國	9	422
從阿爾及爾	1	1,581	從土耳其	8	194
從葡國	16	0,875	從希臘	0	146

同時人造葡萄酒底製造也因之增加了。甚至根據官方的統計，葡萄酒被製出的為：

	從乾葡萄製的 (單位百公升)	從葡萄皮製的 (單位百公升)	合計 (單位百公升)
一八八〇年	2,320,000	2,130,000	4,450,000
一八九〇年	4,293,000	1,947,000	6,240,000

人造酒底實際製造一定不止此數。這一工業部門只是部分地公開進行。

在德意志帝國內葡萄乾底輸入從一二、九九四、〇〇〇公斤（一八八六年）增至三二、八四六、〇〇〇公斤（一八九五年）。這一增加底絕大部分當然是靠葡萄酒底製造。除此以外，新鮮葡萄底輸入從三、一八一、〇〇〇（一八八六年）增至一九、三七一、〇〇〇公斤（一八九五年）。

可是在這一方面，也有海外競爭，一方面是合衆國、加利福尼亞、智利、烏拉圭、阿根廷、澳大利亞，另一方面是非洲（阿爾及爾、突尼斯、開普蘭）。在阿爾及爾葡萄藤栽培的面積在一八七八年為一七、六〇〇公頃，在一八八九年為九六、六二四公頃，在一八九三年為一一六、〇〇〇公頃，收穫為三億八千萬零一萬公升。在合衆國葡萄酒的

產量在一八八九年爲一億五千萬公升，在阿根廷也有同樣的數量，在智利則爲一億公升。

在此以前還只說到農業所供給的價值較少的原料品底加工製造。但是在有些方面工業的發展終於能够直接製造以前爲農業所供給的生產品，而無須農業底協助。

在這一方面最爲著名的是化學在製造柏油時所達到的成功。從柏油中得到許多完全新的物質，尤其在醫學上起着重大作用的物質，而且這些物質底數量在逐日增加；除此以外，從柏油中也得到很廉價的直到現在專爲農業所供給的東西。

例如，茜草在七十年代以前對於歐洲的某些地方，如荷蘭、法國南部及德國南部是重要的工藝植物。一八六八年格連伯和黎貝爾曼發明了從煤焦油中提煉出茜草色素的方法，從一八七〇年起就更加爲製靛青的工廠所採用並且給茜草底種植以致命的打擊。

從煤焦油底其他生產物——糖精，它是發明於一八七九年，而它的大規模的開採則開始於一八八六年——起初對於甜菜底種植，人們也希望有同樣的結果。但是事情並沒有達到這個地步。固然，糖精比甘蔗糖甜五百倍，但是它只能當作調味品，不能當作食品來代替糖。可是它把甘蔗糖從直到現在還在使用甘蔗糖的許多地方排擠出去，並且阻礙甘蔗糖消費底增加。

酒精也可以從柏油中製造出來，但是這種方法直到現在還不十分完善，關於這種方法在工業中有利的應用還說不上。

電工學底成就，對於農業底某些部門有極不愉快的意義。很顯然的，電工學所能做到，而爲蒸汽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差不多完全把馬匹排斥於經濟生活之外。

蒸汽力只被應用於大量底轉動中和生產底不間斷的時候才能有利。蒸汽力在轉運重物於遠距離的時候就排擠了馬匹。但是給大城

市底發達以有力推動的且使大城市發達首先成爲可能的鐵路就給當地的運輸提出了在不久以前只要藉助馬力就能解決的許多更困難的任務。在農業中蒸汽機同樣不能排擠馬匹，無論蒸汽機對於某些工作有若何的價值。

電力容易分割和傳導於遠距離，它的活動可以隨意間斷和重新進行，電動機佔很小的地位並且容易管理；因此電力在運輸和農業內同樣可以把作爲動力的馬匹底機能取而代之，而且電力在許多場合內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技術底其他成就，也促成把馬匹排斥於運輸領域之外。除電動的公共汽車外又發生別種機械的輕便車輛，而人乘的自行車很迅速地普遍起來，不僅可供滑稽小報和庸人底道德憤慨的材料底不竭源泉，而且是自行車工廠主和商人底優厚的利潤底源泉。

其結果是明顯的：對於馬匹的需要既減少了，養馬業當然成爲無益的了。在合衆國內，電氣鐵道比在歐洲更排斥了馬車道，養馬業已成爲無益的了。有一個很熟知美洲這種狀況的英國農業經營者根據他自己的觀察，關於這種狀況寫道：“在最近期間對於馬匹的買賣怨言太多。在美洲養馬業在我看來是最無出息的；養馬的人對我說，他們往往不能將他們所飼養的馬匹出賣，因爲缺乏買主；供給多於需要。這種情況並不使我奇怪，因爲在美洲每個小城市現時都有有軌的電車道代替了馬車道。重實際的美洲人早已發見了電氣比馬匹底高貴的飼養更便宜；我常常驚異電氣甚至在最小的農村內都很普遍。”（見柯尼格：“英國農業的狀況”，第四〇八頁）

的確，北美馬匹底數目減少了一一雖然該處農業擴大，人口增多，城市發展。馬匹的價格比馬匹數低落得還更厲害。在合衆國馬匹計有：



年代	馬 匹 數	價值(以美元計)
1892	15,498,140	1,007,593,636
1893	16,206,802	992,223,185
1894	16,081,139	769,224,799
1895	15,893,318	576,730,580
1896	15,124,057	500,140,186
1897	14,364,667	452,649,392

合衆國馬匹現有數量底價值，在目前還不到一八九二年它們價值的一半。

在合衆國隨着馬匹需要減少，同時馬匹輸出也增加了。馬匹輸出情況如下：

	一八九二年	一八九六年
總額	3,226頭	25,126頭
輸出到英國	457頭	12,022頭
輸出到德國	28頭	3,696頭

美國官方的統計(農業部編“合衆國年鑑”，“Yearbook of the United State”，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第五七四、五八〇頁)就是這樣說的。根據“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底材料看來，從合衆國輸入德國的馬匹，在一八九〇年爲一九頭，一八九六年爲四、二八五頭，一八九七年爲五、九一八頭。在最近幾年來從美洲輸入的大大地超過了從英國輸入的，從英國輸入的在一八九〇——一八九七年這個期間從一、〇七〇頭增至二、七一九頭。

可是，交通技術的進步，在歐洲境內初期一定引起限制馬匹數底增加，隨後引起馬匹數的減少。首先受這種打擊的是馬匹飼養者，大部分是大的農業經營者；但是馬匹底飼養在某些地方對於大農直到現在還是收入底主要來源。反之，小經營者底利益簡直不受馬匹過

剩的影響，並且在這裏小經營者之勝過大經營者，很顯明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技術的優越。但是馬匹飼養底減少却間接打擊他們的利益，因為馬匹飼養的減少自然而然地會引起飼料生產底減少。自行車、電氣鐵道、機械的輕便車輛、電犁既不消費燕麥，也不消費乾草。何況燕麥比起其他重要的穀物，直到現在都不大受到國外競爭的痛苦。在大不列顛種植的面積(以英畝為單位)如下：

	一八六七—— 一八七二年	一八七八——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種植小麥	3,563,000	2,963,000	1,417,000
種植大麥	2,289,000	2,460,000	2,166,000
種植燕麥	2,746,000	2,777,000	3,296,000

在一八九六年種植燕麥底面積稍稍縮減了。種植面積只有三、〇九五、〇〇〇英畝。這種減少是暫時的現象抑是繼續減少底開端，此刻還不能斷定。總之遲早我們一定會期待着同樣的結果。國外競爭加以憐惜的，本國底工業發展則加以威脅。

農業變為工業的生產還剛剛開始。大胆的預言家，尤其是富於幻想的化學家已經夢想着那個時代，那時從石頭將做出麵包，那時一切食料品將在化學工廠內製造出來。我們在這裏用不着算計這類美好的未來。但有一點是無疑的。農業的生產在許多領域內變成了工業的生產，其他許多變化亦已迫在眼前，農業活動底任何一個領域都不能避免它們。而且在這方面每一進步必然引起農業經營者境況底惡化，引起他們對工業依賴性底加強，引起他們生存保障底減少。我們還不能根據這點就說農業崩潰。但是在現代生產方式立足穩固的地方，農業的保守性就無可挽回地被破壞了。對舊習的偏執會威脅着農業經營者趨於沒落；他必須不斷地追蹤技術底發展，必須不斷地使自己的生產適應新的關係。對於他沒有一勞永逸的可能。那時農業經營者會覺得，他征服了一個敵人，在他面前又站起新的敵人。而

且在農村內直到現在在一個同一的軌道中單調地進行着的全部經濟生活，陷入不斷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這一特徵底狀態中。

這個永恆的漩渦，把一切沒有遇着非常幸運的、不善擇手段的、沒有非常才智的或沒有異常的貨幣資金的人投到無底的深淵裏。

這樣看來，可以說，農業底變革是正式開始迫害他們，無情地趕他們向前，在沒有力竭聲嘶時，他們不會倒下去——有少數粗野的命運寵兒是例外，他們能夠踏着死尸而躋入迫害他人的，大資本家之列。

## 第十一章 前途的展望

### 一 發展底動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其研究農業發展進程中把土地面積上大生產與小生產間的關係問題看成是重心。而且因為這種關係變化得比較緩慢，於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就認定農業與工業相反，具有保守的性質。

反之，在社會主義者當中較為普遍的另一種見解，則把高利貸及債務看成農業底革命因素，高利貸及債務使農民喪失他的財產並驅逐農民於家戶之外。

前一種見解多麼不正確，我們以為我們已經充分地指出來了，但是我們也不能無條件地同意第二種見解。

大家都知道，農民底債務並不表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徵。債務像商品生產一樣古老，而且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希臘、羅馬的歷史是從傳說的時期過渡到歷史上有史可稽的時期。高利貸資本本身只能造成農民不滿和叛亂，但它不能構成向高度生產方式發展底動力。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生長出來的時候，在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競爭的鬥爭發展起來的時候，以及在大量貨幣底所有者能够在高度技術底基礎上極有利地進行生產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高利貸才變為信用，大大地提高着資本底效力並加

速經濟發展底過程。但即使在這樣的場合內，這種情形更多牽涉於工業而少牽涉於農業。在農業內借貸還大大地保存着前資本主義時期底性質。土地所有權底債務，現在僅在很小限度內才為生產底擴大與改善的需要所決定；在更大的限度內土地所有權底債務，是地產底需要與移轉——出賣與承繼底產物。債務本身不僅不促進農業底經濟發展，反而阻礙了這種發展，剝奪了進步的資金；它不僅喪失了任何正常演進底性質或因素，它簡直是保守的，它不能把農民經濟提高到較高的生產階段，它只能使這種生產停滯在原有的不完善的階段上。

土地的債務，對於生產方式的關係，而往往對於所有權關係，與其說是革命的因素，無寧說是保守的因素。凡在農民土地所有制底條件對於正在發生的新生產方式是一種障礙物的地方，那裏債務可以成為加速剝削的一種手段。這種情形在古代羅馬就有過，那裏戰爭中俘虜來的大批奴隸促進了種植經濟底發展；這種情形在英國宗教改革時代也曾有過，當時毛織物貿易底繁盛曾引起牧羊場底擴大。但是債務只是剝奪農民土地底槓桿之一，而不是它的動力。例如我們看到德國南部在宗教改革前後農民對於債務的怨聲遠勝於在英國，而何況在德國債務並沒有引起顯著的剝奪農民。各個農場及其建築物已數易其主，而農場及其建築物則依舊存在。高利貸在這裏引起了極度的剝削，但是沒有引起農民人數底減少。

農業生產條件中的變革，——跟隨在法國大革命及其在其他各國反映之後的變革——替高利貸資本開闢了在財產關係範圍內根本改變底廣泛可能性。這種變革同樣既助長了大生產的傾向，又助長了經營細分的傾向。農民底債務幫助了大地主圈圍自己的地產並擴大自己的森林。另一方面，正在增加着的農村人口對於住宅和土地的極大需要，引起了地產底分割，引起了負債的農戶底分小，這便是多數高利貸者有計劃地努力進行的一箇過程。無論是這一過程或是

那一過程都沒有完結，但是從海外競爭使農業成爲無出息的那時候起，從農村人口底增加停止下來，甚至常常趨於減少的那時候起，這些過程就大大地延緩了。如果不說到地位特別優良的地產如接近城市或工廠，地租和地產價格就不再有什麼增加；地租和地產價格開始低落，並且有更加低落的危險。這種現象愈是繼續推進，則高利貸資本家對於剝奪負債的農民愈少感興趣。公開拍賣不僅威脅着他失去資本的利息，而且甚至要損失一部分資本。爲了不加速拍賣，他們就設法以延期支付利息或往往以付出新貸款等方法把它拖延下去。如像在英國甚至最貪婪的和心腸狠毒的大地主們因農業危機不得不讓租金的欠款分期繳納，以後又把它減少，自己花錢來舉辦農業的各種改良。

例如，威斯特發里尼的地主維凱爾曼在社會政治學會底調查表中關於農民狀況說：“這裏的農民保持其祖遺土地的意志極爲堅強；許多高利貸者強迫農業經營者替自己勞作，並且拿去他所生產出來的全部生產品（除掉爲貧困的生活所必需的以外），他們發見這種辦法對於自己比實行不可靠的拍賣負債土地來得更爲有利。在我國許多貧瘠而多山的區域內這樣的土地，早已沒有買主了。”（見“調查錄”，第二卷，第一一頁）

很快對農村中生產條件底變革成爲一種障礙的農民底負債，並不等於所有關係底變革。目前農業的危機迫使對所有關係方面負債的革命的傾向退居次要地位。可是生產關係底每次新的變化，都被土地佔有底債務利用，作爲所有關係更容易適應生產條件的一個槓桿。

我們在什麼地方去找出使這種生產方式上的變化成爲必要的動力呢？在上面說明以後，回答就不會有什麼困難。在工業內不僅隱藏着工業本身發展底發條，而且隱藏着農業發展底發條。

我們已經看見，正是城市工業破壞了農村中工業與農業的統一，使農村居民變為單方面的農業經營者，變為依賴市場變化的商品生產者，正是城市工業替農村居民創造了無產階級化底條件。

我們更看出封建時代底農業已陷入循環圈內，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跳出這個圈子。城市工業創造了革命的力量，這些力量必然也能够破壞封建制度，並且以此不僅給工業，而且給農業開闢了新的道路。後來工業創造了新的合理的農業底技術的和科學的條件，在機器、人造肥料、化學實驗室中的顯微鏡等幫助之下革命化了農業並因此創造了資本主義大生產底技術的優越超過農民的小生產。但是除了大生產與小生產間這些質量的差異以外，同一的經濟發展還創造了別的差異：即在僅僅用於自己的消費的經營與主要地，或至少大部分為市場而生產的經營之間的差異。無論是自給的經營，無論是為市場而生產的經營兩者都一樣陷於依賴工業的地位，不過各循不同的道路罷了。對於前者——自足的經濟——就發生以出賣勞動力，以僱傭勞動或家庭工業而獲得貨幣的必要，正因為如此，小農就更加依賴於工業，更加靠近工業無產階級底地位。商品生產的經營同樣更迫切地需要副業。自然，縮小生產成本費的傾向因技術的進步而實現，但是這種傾向在資本主義農業內却為相反的傾向所摧毀，這種相反傾向把一切重担加在農業身上：地租底增加，在這裏是租金底增加，在別處是抵押債務底增加；助長這種債務或土地細分的承繼權；城市剝削農村的增長（這是軍國主義、稅收、橫徵暴斂等等底結果）；土地底枯竭；對動植物危害增長的敏感，最後，農村勞動者之不斷為工業所吸引——這就是全部因素，不管技術如何進步，它們以聯合的行動更加提高農業中的生產成本費。這些因素底最近的結果，就是生活資料價格底普遍的和不斷的提高，而且也是城市與農村間，土地佔有與多數消費者之間矛盾底加劇。

但是在農業中創造了這些關係的那種工業的發展，再以擴大世界流通範圍來改造這些關係並且引起海外的糧食競爭。在土地佔有不十分有力的地方，工業的發展就把自己的一切重擔加在土地佔有身上，在英國就是這樣，但是工業的發展正是用這些來減少土地佔有與多數消費者之間的矛盾。在土地佔有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地方，土地佔有就企圖以生活資料價格底人為的提高重新將價格提高到舊時生產成本費底高度，可是在現代世界流通範圍及國際競爭情形之下，這種辦法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會成功，也不能充分地成功，而只能引起土地佔有與多數消費者，亦即無產者之間對抗底加劇，這種對抗早已達到很高的緊張程度。但是農業和土地佔有一同感到痛苦，首先自然是在農業經營者成爲名義上土地所有者的地方；農業採取各種不同的生產方法，以便使它適應新的關係；這裏農業就回復到粗放的畜牧經濟，在那裏農業就過渡到集約的園圃經濟，但最後才承認最合理的是工業與農業的結合。

這樣現代的生產方式，至少，在其兩種形態內——小農底職業僱傭勞動底形態與大農底農業的工業企業底形態內——在其辯證過程底終點又重新回復到它的起點：回復到工業與農業分離底消滅。但如果在原始的農民經濟內，農業在經濟上是一個決定的和居於領導的要素，那末在現時這種關係就改變了。資本主義的大生產統治着，而農業必須聽從它的命令，必須適合它的需要。工業發展底方向成爲農業發展底指標。如果工業是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走，那末農業也一定要照着那條道路走。但是在仍舊是純農業的，由於它們領土內居民底固步自封，對於工業底進程，仍舊是關閉的那些地區內，人民在數量上、能力上、知識上、幸福上都減少了，同時土地枯竭了，農業破壞了。資本主義社會內純粹的農業已不能成爲幸福底因素，同時農民也失去恢復自己幸福的希望。像封建時代底農業人口一樣，這些



分子陷入死巷，他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跳出這條死巷，他們在死巷中更受壓迫，他們十分恐怖而且完全絕望。在這一次正如在十八世紀末期一樣，只有城市底革命的民衆，才能把他們從加在他們身上的很重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並替他們開闢一條向前發展的道路。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農村中強有力地妨礙這一革命階級發展條件底創造，而在城市中却促進着這種發展。它把勞動羣衆集中在城市內，在城市內替勞動羣衆底團結，替他們的智力的發展，替他們的階級鬥爭，創造出有利的條件。它使農村居民稀薄，使農村勞動者散居在廣大的地面上，使他們孤立，剝奪他們智力發展和反抗剝削者的手段。在城市內它把所有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並以此直接剝奪剝削者。在農業內它只部分地引起生產底集中，另一方面，它反而引起生產底分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繼續發展中，在一切國家內遲早總要把工業變爲輸出的工業，不以國內市場爲滿足，而是要爲世界市場而生產。在同一限度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農業降低到甚至不能給自己保證國內市場的那種生產底階段上，農業生產底意義隨着世界的生產而更加低落。

所以資本主義的財產和佔有形式以及資本主義的利益愈是與農業底需要相矛盾，它們愈是將一切重担加在農業身上或甚至把農業壓潰，資本主義形式底破壞，解脫資本主義利益底羈絆對於農業愈是不可避免，則農業亦愈不能從自己本身中發展出必要的力量和組織底萌芽，它愈加需要工業底革命力量方面的推動。

這種推動出現了。工業無產階級如不和自己一起解放出農民，就不能解放自己。

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不是動物的有機體，也不是植物的有機體，而是特殊的有機體，但總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個人底簡單的混合體。並且作爲一個有機體，人類社會就一定要按照一個統一的計

劃組織起來。愚蠢的想法，似乎在社會內一部分可以在某一個方向發展起來，而另一部分，同樣重要的部分，可以在相反的方向內發展起來。社會只能在一個方向內發展起來。但要使有機體底每一部分從自身中產生出對於自己的發展所必要的動力並不必要；只要有機體底某一部分對於整個有機體產生出所須的力量就夠了。如果大工業的發展是向着社會主義方向走，如果這種工業在現社會內是佔統治的力量，那末它就替社會主義征服那些不能從自身中產生出這種變革底前提條件的領域，並使之適合於自己的需要。它必須爲着自己本身的利益，爲着社會團結一致和協調的利益而這樣做。

我們不能做出比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還壞的對現社會的預測，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洋洋得意地宣告：“讓工業底道路走向社會主義，農業底道路走向‘個人主義’。”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如果農業是充分有力的，足以抗拒社會主義，同時又沒有力量把“個人主義”強加於工業，那末這種情形就意味着並不是拯救社會，而是毀滅社會，是不斷的內戰；幸而資本主義剝削底這個最後的救生錨對於人類社會是不可靠的。

## 二 社會主義農業底諸要素

我們是從現代工業底發展必不可免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那個命題出發。要證明這個命題需得整部的書；這個任務在科學社會主義底基本著作中，而首先在“資本論”中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在這裏只想盡可能更具體地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及其必然的結果——工業底社會化——一定會影響農業。

我們故意說“社會化”，而不說“國家化”。我們且把社會主義社會是否保存國家底形式這一問題姑置不論；在其開始的階段內社會

主義社會無疑地要保存這些形式；正是國家一定會成爲社會變革底強有力的槓桿。但是這種變革其本身就要求一切生產及一切生產資料底“社會化”，斷不是它們的“國家化”；生產資料不應當再是私有財產底對象；它們的社會作用決定着那樣一種社會組織，即它們應當轉變爲社會組織底所有。滿足當地需要的生產資料，如：麵包店、電燈廠、馬路等更宜於公共所有而不宜於國有，那時許多生產資料（交通工具當然也包括在內），都具有國際的意義並成爲國際的財產，如蘇彝士運河或巴拿馬運河。

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自然要轉變爲國家底財產，因爲現代的國家只是一個可以作爲社會主義社會之用的框架，一個可以替公社的或合作社的企業轉變爲社會主義生產底環節創造出必要的條件。

如果初期生產底社會化只限於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那末很顯然地，它總是把那些不能單靠農業維持生活而必須靠副業以增加收入的農民變爲社會勞動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點也不觸犯他們的土地所有制。例如礦山或製瓦工廠底社會化把成千成萬爲了要彌補自己農業經營中的虧空而必須在礦山或製瓦工廠中找工作的小農從資本主義底僱傭勞動者變爲社會的勞動者。

另一方面，種植甜菜的，沒有任何剝削的農民，由於製糖工廠底單純社會化，就從資本主義企業底零工變爲社會企業底零工。牛乳業與現在更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榨油工廠及乳酪工廠等等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是一樣。但是大工業企業底社會化，由於它們結合在一起，一定會把那些在現代自由競爭制度下獨立地出現於市場上的農業經營者變爲社會的零傭的勞動者。

一旦所有釀酒工廠轉到一些人手裏，則忽布栽植者與麥芽生產者對於釀酒工廠的關係，就如甜菜種植者對於製糖工廠的關係一樣。穀物供給者的農民與社會化的磨粉廠之間，葡萄種植者與社會化的

酒窖之間所形成的關係，也是相同的。

現在農業生產者對這一類大企業的依賴已經很大，因此把他們從資本家手裏轉移為社會所有就等於農業經營者底解放，尤其是小農業經營者底解放，就如採礦業等事業底社會化對於把自己的僱傭勞動供給這些事業的小農一樣。

地租從資本利潤分離出來，土地私有從農業分離出來——一方面是在租佃制的形式內，另一方面是在抵押的形式內——是和正在增長的農業工業化並進的。無產階級的統治無條件地要使這兩種形式的土地所有變為社會公有，使出租的和抵押的土地變為社會公有。大的土地佔有愈厲害（在佃農制發達的國家內）和抵押的債務愈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則農業經營者亦愈迅速地承認並高興地歡迎這個過程——農業的工業企業底社會化過程，解放的過程。

最後，無產階級的統治必然走向以剝削僱傭勞動制度為基礎的大工業的農業企業底社會化。誠然，農業中的大生產並沒有像在工業內那樣統治的傾向。但要希望農民的經營排擠大生產，簡直是謬妄之至。在資本主義的農業內大生產與小生產是互相制約着的。

獨立農戶已經不可救藥；他們只有依靠大經營才能站得住腳。在附近有大工業企業，能給農民以工作的，正如給僱傭勞動者以工作的或給表面上獨立的，為資本家勞作的經營者以工作的地方，那裏農民就成為大工業企業的奴隸。在沒有這樣情形的地方，那裏他需要大的農業經營，以免墜入極度貧困。自然，大農經營比小經營更感到農村逃亡的痛苦，但是農民的家庭也開始因此衰落下去，即使以增加使用機器稍稍補助勞動者的不足，然亦無濟於事。如果農業的危機迅速剝奪手頭沒有充分資本的大地主比剝奪農民為甚，那末資本底迅速增長的積累，就創造出善於從農業的剝削與工業的剝削相結合中汲取進款的資本家，對於他們，亦只有在大的範圍內——而不是在

農民的經營內——才有可能，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們對農業中大經營迅速吞併小經營所指望的，無論怎樣少，可是我們也很少有根據希望着相反的過程<sup>①</sup>。實際上，統計指示給我們的，只是在大小不同的各個範疇間的關係上的微小變動，這些變動，往往是以生產方式上的變動——以生產底較大強度來說明而不是以經濟的退化來說明。如果在德國五十公頃以上的經營在農業上利用的總面積中所佔份額，在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期間，從百分之三三降低到百分之三二·五六，亦即少於百分之點五，那末在法國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八年，四〇公頃以上的經營在全部耕種面積中所佔份額，是從百分之四四·九六增至四五·五六，亦即多於百分之點五。

這是極細微的差異。但是在德國和在法國一樣，大經營佔土地底極大部分，在德國幾佔三分之一，在法國幾佔二分之一。但是法國在一八八二年時在五、六七二、〇〇〇農業經營者中有一四二、〇〇〇人和這些經營有關，即佔百分之二·五一；在一八九二年時，甚至在五、七〇三、〇〇〇人中，只有一三九、〇〇〇人，佔百分之二·四二。德國在一八八二年時五、二七六、三四四農業經營者中，只有六六、六一四人，即佔百分之一·二〇；在一八九三年時五、五五八、三一七人中，有六七、一八五人即佔百分之一·二一。當僱傭制度底繼續存在成爲不可能的時候，這些經營就轉變爲社會公有的財產，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即此一端，社會就得到農地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歸自己支配。

大農經營所佔的極大的土地面積，大農經營的更加發展的資本主義性質，租佃制與抵押制底發達，農業底工業化，這就是替農業生

---

<sup>①</sup> 即小經營排擠大經營。——譯者

產的綜合準備基礎的諸要素。農業生產同工業生產的社會化一樣，必不可免地要從無產階級未來的統治中發生出來，它和工業生產底社會化更加融合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社會主義農業的技術的要素和社會主義農業底這些社會因素同時發展起來。我們曾看到現代科學及現代技術如何侵入農業領域，並如何在其中完成一種變革，現代大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內如何達到它的最高點，這些大地產我們在第七章內就已經詳細地敘述過了。但是像英國農業底完善的技術，在過去一世紀內，只有在少數從封建所有制底極度壓迫中解放出來的產業內才能發達一樣，現代的技術也只有在個別的產業內才能發展起來。要使技術普遍推廣成為可能並且替發展的道路掃除使農業在短期繁榮後又趨於衰落的那些障礙，就需要再來一次社會革命。

無產階級底勝利，就等於軍國主義及大城市集中化底消滅。大地產底社會化就把大地產從承繼權及不在主義底鎖鏈中解放出來。以公社自由社員底勞動代替僱傭的奴隸就可提供農業大生產以繁榮底要素，這種要素對於農業極為重要，並且在現時缺乏這種要素就更加阻礙農業的發展；如缺乏充分數量的有知識的，自願努力的勞動力。一旦勞動者在農村中找到充分的工作，這種工作又能夠供給他同樣的幸福，同樣的文化條件，像城市工作一樣，農村逃亡就會停止。工業和農業聯系愈有力，商品生產及以經濟集中於大城市為前提條件的商業底地位愈迅速地代之以為社會所生產與為社會而生產，按照全國平均分配生產並結束大城市中人口底有害腐集，則農村逃亡亦愈迅速地停止。我們已經在小農和手工業者底職業的僱傭勞動形態內，碰到過農業與工業結合底第一個可憐的形式；在更為完備的形式內這種結合出現在我們面前是在製造自己原料的農民底工業副業的形態內；在現代大地產內這種結合達到它的發展底最高階段；但

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內這種結合才成爲整個社會生產底共同法則。

獨立的小生產在農業中喪失了自己的最後避難所。我們認識了三種形態——小農生產所賴以維持其生存的三種形態：工藝的副業形態，大農業中僱傭勞動的形態，而在既沒有副業又沒有工資勞動的地方，在小農仍舊爲純粹農業經營者的地方，在他對大農的關係不是以僱傭勞動者而是以競爭者資格出現的地方，則是過度的勞動與不足消費的形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野蠻狀態。由於資本主義的企業轉變爲公有制，小的農業企業無論前者，無論後者都一樣陷於依賴社會的生產，將爲社會生產所吸收或者變爲社會生產底簡單附屬品。但是那時純粹農業的獨立的小經營對於它們的所有主就失去一切吸引力。現在城市無產者底生活已經高於小農底野蠻生活，農民底年青一代逃出農村不亞於農村的僱傭勞動者。但是當社會主義的大農場四面八方的包圍他們，這些大農場已經不是由可憐的僱傭奴隸來耕作，而是由合作社底富裕的社員，自由的、活潑的一輩來耕作的時候，——那時就不是從小塊農地逃入城市，而是開始從小塊農地更迅速跑進合作社的大經營，並且野蠻狀態亦將會從自己的最後避難所中被驅逐出去，它在最後避難所中，至今感覺到圍繞它的文明世界，是難於接近的。

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帶給小農的不是剝奪，而是從地獄中——從現時小農因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受束縛的地獄中解放出來。

社會的發展在農業中走着和工業中同一的方向。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的條件在農業中和在工業中都走向社會的大生產，在其最高的形式內農業與工業融合爲堅固的整體。

# 下 卷

## 社會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策





## 第一章 社會民主黨是否需要土地政綱

### 一 到農村去！

如果根據上卷所述，可以明顯地確定些什麼的話，那末首先便是那個事實：工業成爲整個社會底決定因素，農業相對地說，更加喪失其意義，更加讓位於工業，而在那些留給農業的領域內，農業更加依賴於工業。社會民主黨不僅在無產階級底正在增長着的力量上，而且在工業對於社會的正在增長着的意義內，可以確信自己必然得到勝利。

但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民主黨或者更方便些說，爲自己解放而鬥爭的無產階級不必關心農業底命運，那就等於把嬰孩和水一起從浴盆裏倒出去。無產階級——現代社會底繼承者，總是關心使他儘可能得到更豐富的遺產；但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係無論怎樣，土地總是整個人類生存底基礎；在決定維持社會所必需的勞動底耗費時，土地底肥沃總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在決定居民底物質的及精神的本質時，土地底特質總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但是不僅關心未來的社會，使熱心關切農業底地位對於無產階級成爲必要。這種關切還更迫切地爲目前底需要所引起。食糧價格或漲或落，對於無產階級絕不是不相干的，因爲勞動報酬隨着糧價的漲落而漲落，不是像工資鐵則學說所說的那樣準確。農村居民底生活程度是否低下，農村居民是否無知無識的愚蠢的羣衆，對於無產階

級階級鬥爭底速度絕不是不相干的。

甚至即使社會民主黨願意把自己的注意力僅限於工業領域，可是因爲土地問題在現代一切國家內對於一般的國家生活有了很大的意義，社會民主黨也就不得不關心農業。最顯著的，是農業底政治的意義隨着它喪失自己的經濟的意義（和工業比較而言）而加強起來；這種現象不僅在貴族地主統治的區域內，即在純粹農民的國家內，不僅在易比河以東，即在巴伐利亞，不僅在專制政體底區域內，即在民主政治統治的區域內，不僅在俄國、奧地利及德國，即在法國和瑞士都可觀察到。假如我們回想一下，土地私有制到處都比其他生產資料私有制更早走到與現存生產方式不可調和的矛盾地步，而且更早走到不堪忍受的境地，那末在經濟的及政治的意義之間這種顯而易見的矛盾是容易被了解的。但是接觸這種境況的，正是那些社會階級：他們直到現在都是現存國家和社會秩序底最強固的支柱，他們一部分自身就屬於統治階級，一部分則是被統治階級爲他們自己的利益所保留下來的。在文明國家內，正是政治上的領導集團更加注意土地問題，這是不足奇怪的。可是問題對於他們倒不是在於拯救農業，而是在於拯救“擁護國家的”階級，此等階級底生存條件是與現代的生產條件不相容的。這種拯救自然是不能聯合底聯合，而且由於知識的及經濟的條件，對於更高生產方式在農業中比在工業中更不發達，這種拯救事業就沒有獲得更合理的性質。

因爲這個緣故，常常受到統治階級方面認真接受的一些誇大的、更加狂妄的計劃，都隨着農民運動底加強而表現出來，就不足爲奇了。想在實際上來幫助農業人口，却不容易抗拒這樣農業的雜亂無章；對於這一點需要有思想底明確性和說服力。在土地問題上取堅決的立場，對於社會民主黨是必要的。社會民主黨對於這個問題若冷淡，這就等於把農村中無產者階級底羣衆委之於農業的魔術家和小丑們。

最近幾年來各文明國家社會民主黨對土地問題與以深刻的注意的那種情形就可以用這一點來說明。但是在這種場合內，農業諸關係底特別不發達，也發生影響。不是原則上的考慮，而首先是實際上的考慮，選舉煽動底考慮激動了社會民主黨去從事研究土地問題。這些考慮使社會民主黨有希望向農村居民“作某種建議”，提出一些實際的要求，用這些要求可以使農村居民關心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策底原則尚未作最後確定以前，到處都在企圖擬定社會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綱。但是當在這些原則上尚未達到同意時，草擬土地政綱底一切企圖當然是在摸索着做的，甚至最敏銳的才智在這個場合內，也不會得到堅定而積極的結論。

社會民主黨必須堅決地決定自己土地政策的必要性，是社會民主黨隊伍中大家都感覺到的。反之，在社會民主黨內，對於土地政綱底必要性這一問題，還沒有一致的意見。

特殊的土地政綱往往被了解為替農民謀利益的方法底綱領。保護農村僱傭工人底利益並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綱領。現有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已經處處包含着這樣的保護。但如果人們要想承認保護農民底特殊利益是社會民主黨的事，那末特殊的土地政綱自然是必要的。

大家都知道，社會民主黨內部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表現了深刻的分歧。

保護農民當作保護工人底補充是必要的。農村的無產者就是農民；但是社會民主黨是一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的階級鬥爭底政黨，它的力量並非基於它的最終目的，而是基於它的最近要求。像它保護城市無產者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者——企業家一樣，它應當保護農村無產者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者，——高利貸者；它應當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一切合理的手段去抵抗城市僱傭工人和農民底貧困。

我們首先便研究這種論據。

## 二 農民與無產者

我們不能否認，農民底生活方式在大多數場合內，已成為無產者的生活方式，有時甚至可以說，比無產者的生活方式還要惡劣。但這絕不是說，他們的階級利益同樣就是無產者的階級利益。

現代無產階級底特徵，完全不是在於他們的貧窮。窮人，即使不是永久存在，也總是在幾千年來就已經存在了；反之，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則是最近一世紀底特殊產物，至少作為羣衆現象來說是以前世界未曾見過的無產階級底產物。

現代無產階級在現代生產過程中所起的那種重要作用，是他的顯著特徵之一。現在佔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現代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因此，他們才與新舊時代底流氓無產階級有天淵之別。

同時現代無產者絕不像流氓無產者一樣一貧如洗。後者缺乏一切，但最感缺乏的是用於生活及享樂的金錢。他們缺乏生產資料倒並不使自己發愁。他們被排斥於生產範圍以外並且往往不希望參加生產。但他們雖不願工作，却總願意活着；可是這種情形，只有在有產者把自己的消費品分給他們的那種場合內才有可能。因此，流氓無產者一提高到表示社會願望時，他們的理想就是消費品底共產主義，而不是生產資料底共產主義；是瓜分底共產主義，而不是聯合底共產主義；其目的，在社會條件容許暴力行動的地方，便走上搶劫的道路，而在這些暴力的行動不可能的地方，便走上赤貧的地步。

反之，現代僱傭工人的特徵是無產，但這只意味着他們缺乏生產資料。他們缺乏消費資料，可能，但不是一定和這些有關。現代僱傭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時，雖然作為一個消費者來說他們的地位

是十分滿意的，雖然作為一個消費者說，他們佔有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傢具，甚至自有簡陋住房，但他仍舊是一個無產者。要知道他的地位底改善，作為一個消費者的地位底改善，絕不會使他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的地位的改善往往使他有可能極頑強地去進行階級鬥爭。這種鬥爭——並不是他的貧困底產物，而是他與生產資料佔有者之間的對立底產物。不是消除貧困（即使消除是可能的），而是消除這種對立才能恢復社會的和平。然而這種情形只有在工人重新佔有自己生產資料的那種場合內，才有可能。

這裏我們就碰到現代無產階級底進一步的特徵。現代無產階級不是靠個人的生產資料，而是靠極其龐大的，工人要作為整個的團體才能利用它們，而不是每個孤立的個人所能利用的社會生產資料來工作。這樣的生產資料底佔有，有兩種形式是可能的：個人的佔有，他們在這樣場合內僱用工人，在使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時，必然要剝削勞動者，——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佔有，其他一種就是社會的佔有。但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支配之下，生產資料底社會佔有永遠不能成為普遍的佔有形式；在這方面的一切企圖，即使它們有所成功，遲早總是要採取資本主義的方向。只有在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底形態內，亦即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底形式內，公有生產資料才能成為普遍的佔有形式。引起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還有其他的因素。但是這裏我們所注意的，是由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中發生的及有影響的那些因素，即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自然而然地採取社會主義方向那些因素。

最後，我們還想到現代無產階級底第四個特徵，這個特徵我們在本書內已經指出來過：即無產者脫離自己的企業主底家庭經濟。在先前的時候僱傭工人，照一般的通例，都是僱主的家庭經濟底附屬物：他們附屬於僱主底家庭，不僅是作為一個勞動者，而且是作為僱主家庭的人；除了工作之外，他們在自己的一切行動上都要依靠他；

現代無產者在工作之外就屬於自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消除了封建制度底殘餘以後，愈往前發展，則無產者亦愈成爲自由的人，他在工作之外，是作爲一個平等的人和自己的資本家相見的。

這就是使現代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成爲強有力的創造的力量底諸因素。

絕不是所有這些特徵都可以在農民方面找得出來。人們指出抵押權底所有者，實際上就是他的財產底所有者。但是象我們指出過的，債權者實際上對於農民的關係不是資本家對僱傭工人的關係，而是土地所有者對企業家的關係。農民由於抵押也很少成爲無產者，有如工廠主不是在自己所有的而是在租來的場所上經營自己的企業一樣。農民仍舊還是生產資料底所有者，是自己的工具及器具，自己的牲畜底所有者，簡言之，是自己的財產底所有者。自然，這種財產也可以拿去抵押，但他還是執行着企業主底職能，並且他本身仍舊和無產階級處於對抗的地位，有如靠借貸資本來進行生產並且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工廠主執行着工業資本家的機能一樣，並以此資格來敵對無產階級。

這種對抗在那些不剝削僱傭勞動者便不能進行生產的農民方面，即在大農方面，極其尖銳地表現出來。

自然，當工人運動只限於城市方面並且只在反對城市資本家的時候，大農業經營者有時甚至對工人運動表示十分同情。起初英國的，隨後普魯士的大土地所有者都善意地對待社會主義運動底萌芽，並宣傳工資與地租應聯合起來反對資本的利潤。但是，一旦社會主義運動裹脅着農業工人，一旦工業中工資底提高開始引誘他們到城市中去，而使留在農村中的工人成爲更加需要的時候，這種情形就改變了。現時普魯士的地主貴族是社會民主黨底最兇惡的敵人，較之“曼徹斯特派”（指重商主義者）更甚；他們現在追隨的，不是瓦格涅的旗

幟，而是司徒曼的旗幟。富農也不落在他們之後。

假使在德國還發現了這樣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富農並不敵對工人運動，而且相信兩階級底利益有某些共同性，那也並不證明這些階層可以趨向於社會民主黨方面，即使以適當的方法去爭取他們；這只證明在這樣的地方工人運動還是太弱，以致不能有利地影響農業工人底狀況；這只是落後性底證明，而不是開始進步底徵兆。

無產者與中農之間的對立，其尖銳不及富農與無產者之間的對立，中農或者完全不僱用工人或者頂多只僱用很少的工人，他主要是用自己家庭的勞力來經營，雖然他是靠替市場生產食糧來生活。在這種場合內，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對立，自然就不存在；可是這裏仍舊有對立，存在於為市場而生產食糧的一切生產者與僱傭工人之間的對立：購買者與出賣者之間的對立。

總之應當承認那種意見是一種虛構，它把這兩個階級底利益的調和，說成好像勞動者是農業生產產品底好主顧。工人底工資愈高，則他耗費於食物方面的工資部分亦愈多。這樣看來，農民似乎極關心高度的工資，他們的利益似乎與無產階級底利益一致。

像這一類的論證並不新奇；人們為着要發明利益底調和，曾不止一次利用過這些論據。對工人表示好感的人們曾勸告工廠主將工資提高；他們說，這是擴大國內市場及避免貿易停滯的一個最可靠的手段。反之，工廠主則向工人解釋，從他們方面去強迫工廠主提高工資，這是何等愚蠢，因為工資提高的結果或者會提高了食糧的價格，這樣，工人便會得之於彼而失之於此，或者就會減少了利潤。但是利潤愈高，則資本愈能積累起來，對勞動的需要亦愈迅速地增加，這才是提高工資的最有力的手段。因之，工人就有着重大的理由來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利潤減少的事態，例如罷工之類。他們似乎完全像工廠主一樣要關心高度的利潤；他們兩者底利益好像是一致似的。



這個論證只有在那種關係內才是正確，即資本主義社會，像一切其他社會一樣，本身是一個單一的有機體；在它裏面某一部分每次損壞對於別的部分不無一些有害的影響。可是，這個事實並未消除階級的對立，並且也並未使任何一個階級在和敵對階級作鬥爭時不要堅持自己的利益，甚至破壞他們的利益。不同階級底利益底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在某種限度以內是無可爭論的），與他們的階級利益底無比的極堅決的對立，兩者之間的矛盾，只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是一個怎樣不完善的有機體，爲了要執行自己的任務，它是一定徒然浪費許多人力和物力。

資本主義社會賴以推動的，各個階級底相互地位賴以決定的，——絕不是他們的利益底調和，沒有直接意義的，或即有意義亦無關緊要的調和，而首先是直接的階級對立。

食糧底買者與賣者之間的關係，情形亦是如此。他們的對立太直接了，賣者太不注意買者的購買力就不能緩和這種對立。

農作者希望盡可能高價出賣自己的生產品，工人則希望盡可能廉價購買它們。工人底工資提高，假如只引起人造牛油，美洲脂肪、澳洲肉類及各種罐頭食品底更大消費，試問這對於農作者有何利益？農作者企圖消除對工人有好處的市場上的競爭並人爲地抬高自己生產品的價格。

利益調和（即指農作者與無產者底利益調和）底說教，雖然想得很聰明，但完全不會被感覺的，並不能調和利益底這種對立。

農作者是否會參加戰鬥的無產階級隊伍，——這不決定於他是否飢餓，他是否負債，而是決定於他之出現在市場上是作爲自己勞動力底出賣者還是作爲食糧底出賣者。飢餓與債務本身還不會造成和整個無產階級利益一致。它們甚至會加劇對無產階級的對立，因爲飢餓可以被消解，而債務可以被償清，只有在那種場合內，如果生活

資料的價格被提高，工人就失掉照廉價享受它們的可能。

除了這些對立的利益之外，農民和無產階級，自然有共同的利益；我們往下還要說到它們；有時利益底共同性可以勝過它們的對立性，並引導農民與無產者到政治的合作。但即使他們甚至能夠常常一同作戰，那末，照一般的通例看來，他們一定是分別進行；今天是聯盟者，明天他們可能就是敵人。

然則食糧底賣者與勞動力底賣者兩者之間的對立會不會於後者有害呢？由於這種情形，一八四八年的歷史會被重演，而且有一天農民和農民的兒女會掉轉頭來反對無產階級並用自己釘着釘子的皮靴來踐踏他，這不是應當就心嗎？

我們就進一步考察一下這個靴底釘着釘子的可怕的幽靈。如果我們把它認真研究一下，可以說，像已經有過的許多幽靈一樣，在它裏面並沒有什麼可怕。

關於一八四八年的回憶是會引人注意的，但從那時起資本主義的統治經過了五十年了：這能說沒有留下一點影響嗎？

那時德國的農業人口約為全人口四分之三，現在農業人口約為三分之一，正確些說，為百分之三五·七，即五一、八〇〇、〇〇〇人口中為一八、五〇〇、〇〇〇人。在一八八二年農業人口還要多七十萬人：為全人口五分之二以上，即百分之四二·五一，亦即四五、二二二、〇〇〇人中有一九、二二五、〇〇〇人。

在薩克森王國內農業人口不及百分之一四（一八八二年時佔百分之一九），在次維考區（Tsvikou）僅為百分之一〇（在一八八二年為百分之一四）。在北德意志農業人口在波茲南為數更多（為百分之五八，而在一八八二年為百分之六四），在南德意志——即在下巴伐利亞，這個德國的芬底，是德意志帝國唯一最大的區域，在這個區域內農業人口從一八八二年起在百分比上並未減少或至少減少得令人不

易覺察。在一八八二年農業人口爲這一區域全人口百分之六一·五，在一八九五年則爲百分之六一。

農業人口在法國佔極大多數，可是從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九一年這一時期內法國農業人口從全人口百分之五一·四減至百分之四五·五。

年 代	人 口 總 數	農 業 人 口 之 百 分 數
一八七六年	36,906,000	51.4
一八八〇年	37,672,000	48.4
一八八六年	38,219,000	46.6

我們馬上就說到英國的狀況，英國在一八九〇年從事農業的人數僅爲從事工業活動的全數百分之一〇！

從事農業的人數，雖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減少，在合衆國也發生了同樣情形，可惜，他們在美國是和從事漁業及礦山工業的人數一道計算的。如果將他們單獨地指示出來，那末他們的減少自然會更加顯著。這樣的人數在一八八〇年爲從事工業活動的全人數百分之五〇·二五（即七、四〇五、〇〇〇人），在一八九〇年爲百分之四四·二八（即八、三三四、〇〇〇人）。東北各州在一八九〇年這樣的人數共計僅爲從事工業勞動的全體底百分之二二·六，在南部各州則爲百分之六〇以上。

但不是所有從事農業的人都是食糧底出賣者。除了他們（食糧底出賣者）以外我們還看到大批勞動力底出賣者。一八九五年在德意志帝國的農業內共計有：

	從事生產者	家庭成員及僕役	總 計
獨立的農業經營者	2,576,725	6,900,096	9,476,821
僱傭勞動者（僱工、女工、日工、用人及其他）	5,715,967	3,308,519	9,024,486
總 計	8,292,692	10,208,615	18,501,307

由此看來，在農業中靠僱傭勞動爲生的人口和獨立的農作者及其家庭人數一樣多。

但是這些獨立的農作者並不是全靠出賣自己的農業生產品生活的。專門從事農業的（園藝，森林業及其他的經營不計）獨立生產者二、五三〇、五三九人中就有五〇四、一六五人有了副業。

如果我們拿經營底統計去代替職業底統計，則情形對於獨立的農業經營者並不會更好些。我們在經營統計中看出，五、五五八、三一七個農業企業底所有者中只有二、四九九、一三〇個所有者是獨立的經營者；其次就是七一七、〇三七個非獨立的經營者，其餘的則從事別的職業，其中從事於工業的不下一、四九五、二四〇人。由此看來，一方面我們看出二百五十萬獨立的農業經營者，和他們處於對立地位的差不多就有六百萬農業的僱傭工人；另一方面，除二百五十萬獨立的農業者外，我們看出三百萬農業企業底所有者，他們底主要利益並不是農業。

農民已經不再是農村人口中的大多數；在農村人口當中形成了一個很大的農業工人階層，他們可以和農民相抗衡，他們底利益實際上完全與工業工人底利益一致。

有些地方獨立的農民自然比上述的平均數字所指示的爲數更大。例如，中農土地佔有（由五至二〇公頃）表現得最有力的德國二十個行政區域中，單只巴伐利亞一省就有十三區。在當時整個德意志帝國內每一〇〇公頃農業面積中，中農的經營只佔三十公頃，而在巴伐利亞區，中農佔全面積百分之六〇至七〇，無疑地，在這樣的地方穿帶釘的靴子的農民有時還會刺傷無產階級的感情。但是農民絕不會想到要踐踏他，或甚至嚴重地威脅他，一旦無產階級聯合在一個旗幟之下表現出自己全部力量的時候。無產階級不僅具有城市生活所提供的最高知識底一切優點，具有優良組織底優點，具有鍛鍊自己

能力及工業在經濟上超於農業底一切優點，而且在現時已經具有人數上的優越。

無產階級在德意志帝國已經是一個最強有力的階級。一八九五年德國從事生產勞動的人，職員（服軍役者、官吏及沒有一定職業的人不計）計有二〇、六七四、二三九人；其中屬於無產階級的有：

職員.....	1,339,318
農工商業中的僱傭工人.....	10,746,711
家庭僕役.....	432,491
合計.....	12,518,520

其餘從事生產的八、一五五、七一九人中，二百萬家庭工作成員以及六十萬店員中還有許多人都可以歸到無產階級；五、五〇〇、〇〇〇獨立生產者中有些也只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他們是資本底僱傭工人，例如，在家庭工業內就是如此。

由於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的這些迅速變化的數字，若仍為一八四八年的回憶所困惑那就是時代錯誤。社會民主黨只要把整個無產階級羣衆及所有表面上是獨立的農作者和工業者，而實際上是資本底僱傭工人團結在自己周圍，就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抵抗它。要使這些羣衆傾向到自己方面，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去組織羣衆，在知識上和道德上去提高羣衆，把羣衆引導到能夠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繼承者，——這便是社會民主黨底主要任務。

這種聯合，自然，不是這樣簡單的事，尤其是在農村內。我們不能假定，在農村內無產階級底發展，他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力量底增長，他的知識的及道德的提高總有一天會像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一樣迅速地完成。

在這方面發生影響的諸因素，“共產黨宣言”中已經說得很明白，我們無須再加以說明。還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時期在某些城市內

就已形成了大批無產的僱傭工人。由於城市權力底增加，由於城市中智力底提高，工人底力量和智力也隨之增長。但是手工業的幫工還是一些半自由的人；他們屬於老闆底家庭；工作及家庭經濟底條件使他們彼此孤立。只有逢年過節的日子他們才聚集在一起。反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僅把工人大批地團結在較之封建時代城市更大的各個城市內，而且在城市內部把他們聯合在特別大的作坊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就組織着和訓練着僱傭工人。但是僱傭工人已經不再和企業家底家庭經濟發生聯系。在作坊以外他們在經濟上是完全獨立的，自由的人，他們都有自己的家庭經濟。

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農村內發生的影響就和城市內不同。在農村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把人們聯合起來，而是把他們分散開來。它不僅引起農業人口相對的減少，而且在它發展底某種高度上甚至引起農業人口絕對的減少。它從農村中引誘最有能力的、最強壯的和最有知識的分子。剩下一些最軟弱無力的一些人。農村底知識的空虛是與農村底人煙稀少並進的。

在農村中非常成問題的學校教育底改善以及把書報帶到農村去的交通工具底進步也不足以制止這種情形。自然，在現時農村居民讀書比以前多；尤其在冬天；但是落到農民手中的報紙大多數都是反動派的報紙；反動派報紙照早已過時底老一套來判斷現代社會，報紙面向的讀者愈幼稚愈無知，報紙也就愈加無理地曲解與這些老一套不相適合的事實。他們有的書籍——除了聖經這個數千年前底遺物以外——就是一些對事實加以粗鄙的曲解，超出一切可信範圍以外的，最惡劣的一種低級趣味的小說。

像這一類的文學不僅不能說明現實，對現社會底本質提供一些理解，這類文學在理解上只能產生完全的混亂。孤立底影響往往並不因此減少，反而因此加強。

因此很難組織農村無產階級，向他說明城市無產階級底意圖並喚起他對城市無產階級的注意。但是除這些外部的障礙以外還有更強有力的，更深刻的障礙。

雖然農村無產者 在一切本質上 與城市無產者 有完全 同一的利益，可是上述現代無產者底特徵絕不適用於他們；也就是說，現代無產者底特徵與從地主得到衣食住的僕役和各種家內勞動者是不相干的。

所有這些種類的農業工人還生活在封建的條件內；他們是別人的家庭經濟底組成部分或附屬物。他們在工作之外仍處於主人底“監督”之下；他們的娛樂，他們的閱讀以及他們團結的企圖，都受主人的監督。甚至就在他們不受法律禁止的地方，他們都沒有權利組織職工會，他們不能讀主人不喜歡的報紙；在選舉時他們應當投票贊成誰，都要由主人指定。這樣依人作嫁的工人即使有可能成爲獨立的勞動者（如果他們能有充分的積蓄，他們有可能贖回自由），他們與往時底農奴和奴隸並沒有什麼區別。

這個階級在極端虐待情形之下就趨向於絕望底憤怒，趨向於暴亂，但是他的地位不宜於進行有組織的、頑強的和長期的階級鬥爭。

在這一方面有一點財產的農村工人其情形就比較好些。佔有私有的經營並不把他們提高在無產階級之上，因爲這種佔有只作爲家庭經濟底附屬物，而我們已經看見了，現代無產者底特徵並不在於他缺乏個人消費底資料，而是缺乏爲市場而生產的手段。同樣，例如礦工，雖然他有一小間住宅，一小塊種植馬鈴薯的田地及一頭牛，他仍然是一個無產者，極小的農業經營者，當他使用自己的土地只是爲着自己家庭經濟底需要，他仍舊是一個無產者。

但是佔有私有的經濟雖不妨礙他是一個無產者，可是這種佔有（私有經濟的佔有）總是使他很難感覺到自己就是一個無產者。他的

過去，現在和將來總是鼓勵他站在獨立經營者底一方面。在農村中比在城市中無比地更強固的傳統，使累代相傳的農民的階級意識比剛生長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更親近於家宅及牲畜底所有者。而這種傳統的農民的階級意識是爲現時各種條件所維護的。

在理論上小農作者自然是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的，他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不是出賣自己的農業生產品來滿足自己對貨幣的需要。但是這種情形只是就一般的和整個而言，也就是說，只有在理論上才是正確的；實際生活並沒有劃出這樣狹隘的界限，像我們爲科學的目的所做的。有無數過渡的階段存在着，理論家要想研究作爲現象基礎的諸規律，是可以而且應當忽略這些過渡階段，但是如果要想應用這些規律於實際生活方面來，就不能把這些過渡階段棄置不顧。小農作者底生產足夠供給他的家庭經濟以必需數量的食糧，要是平常也出賣自己生產品的一部分，那他的生產就不十分够了；如果市場——城市或工廠——就在附近，他就養豬、養鵝、出賣雞蛋、牛乳、菜蔬，因之食品的價格在他看來不是毫無差別的，他很希望他出賣的生產品有較高的價格。

在以實物支付工資極爲普遍的地方，農業工人以工資獲得者資格對於食糧的較高價格也就很關心。如果他們獲得一部分工資是裸麥，他們要將麥子出賣，那末他們對於麥的較高價格就很關心，也就是說，他們對於麥子的稅就很關心。他們不僅以自己勞動力底出賣者資格，而且以糧食出賣者資格出現在市場上。

但是除了過去的傳統及現在的利益之外還有未來的利益，可以說是一切利益中最有力的利益，就迫使小農只按照農民的方式去思想和感覺。人類固然是生活在現在，但他却爲未來而工作，這種情形對於農民的感情和行動能有多大的影響，未來底政黨——社會民主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在工業工人還相信手工業有前途的地方，在手工業學徒覺得自己就是未來的老闆的地方，工業工人就比他不希望現代生產方式之下總有一天成為獨立勞動者的地方不同。同樣，已失去總有一天達到獨立地位並成功為一個農業經營者的這種希望的小農和那希望永遠仍為小農並幻想着靠自己積蓄一部分工資，獲得一些土地，成為完全獨立的農民的小農就不相同。雖然他現在只是一家之主並且他不得不購買食糧，但是他覺得自己就是將來要出賣食糧的農民。

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們就以為支持和維護這種希望是最重要的任務，因為這種希望是把勞動階級中最強有力的人束縛在土地所有權上並把他從無產階級分開來的最牢靠的繩索。因此這些經濟學家就請求大地主們不要為着盲目的貪慾去購買全部土地，而應留下一部分土地，這一部分土地倒不是為着要使所有農村工人都成為農民——工人都成為農民，那時到什麼地方去招僱傭工人呢？——而是為着要用總有一天可以成為獨立農民的這種希望來誘惑他們。正是這種希望才使他們更熱心、更慇懃、更恭順。

有些人特別熱心忠告大地主們給自己的工人以獲得土地的機會，郭爾茲就是其中之一人。他說：“但是我的意見完全不是要設法使所有農業工人都成為土地所有者，最低限度，首先就普魯士各省情形看來，不能有這樣的目的……總有一天可以成為土地所有者的這種希望，使僱工們成為勤勉的、節儉的、精打細算的人，可以預防他們無禮的暴亂，而這種情形對於僱主（業主）是有利的”（見“農村工人階級與普魯士國家”，第二一五頁）。

羅賽爾老人也這樣說：“小農地底存在，特別有用，因為這樣在日工與富農之間的鴻溝就可以為許多連續的過渡階段所填平。由於小農地底存在而啓示的對自己命運底改善的希望，就鼓勵他在勤勉、熟練、節儉等條件之下去勞作並且使他很安心地做事”（“農業國民經

濟”(Nationalökonomik des Ackerbaues), 第一七六頁)。

小經營者底心中存在着兩種精神：農民的精神和無產階級的精神。保守的政黨有一切根據在小經營者中鞏固農民的精神。無產階級底利益則是在相反的方向起作用；社會的發展和小經營者自身底利益也要求這一方向。我們想起我們在上卷中即已認識的農民營養不足及過度勞動底許多實例，我們在那裏已經看到，農業僱傭工人底地位在這一方面比獨立的小農業者底地位好得多，——小農業者底貧困隨着“私有的聯產而開始”。不能有絲毫的懷疑，我們應當促進小經營者地位底提高，提高到人的地位，無須使他們從無產階級變為農民就促進他們社會地位提高，使他們從野蠻進入文明；在小經營者中引起對於小農經濟前途的幻想，那是不能再有比這更危險更殘酷的了。

但這件事做起來就得通過許給農民以有效保護的土地政綱。這樣的政綱會在小經營者中撲殺他的無產階級的精神，而使農民的精神在他心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東西。這樣的政綱會打斷使他和工業無產階級聯合的聯系並在小經營者中復活着那些使他和無產階級羣衆分開來的因素。無產階級的此種煽動，在農村內會引起直接與無產階級的鼓動所企求的相反的結果。爲着過眼即逝的片刻的勝利，這種煽動會破壞那些基礎，即在農村中不是簡單的選舉煽動，而是真實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所憑藉的那些基礎。

### 三 階級鬥爭與社會發展

社會民主黨是領導自己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底政黨；但它不僅是這樣一個政黨；它同時還是社會發展底政黨。它是以整個社會有機體從它的現代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更高形式爲目的的。

這兩方面結合為堅固的一體，就是社會民主黨底特殊的表徵；這種結合底奠定，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不朽的歷史功績。大家都知道——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別處已經詳述過——工人運動與空想主義起初是各自獨立地而且常常甚至在彼此敵對關係中發展起來的。自然在某些地方它們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前就已經結合起來，例如在憲章運動中底社會主義一翼內，在法國的平等共產主義內，在惠特林派內。可是在巨大的社會現象萌芽的時候，理論向來就沒有超越過實際。理論只有經過個別的、半信半疑的試驗和已確定的傳統還未切斷精神的聯系，才能發現新現象底基本特點並承認其一般的必然性。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他們把經驗的摸索與感情的願望代之以那種明確的意識：工人運動底最高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的形式，社會主義只有經過工人運動才能實現，這種運動自然而然地一定會力圖脫離資本主義社會，有力量使社會過渡到比資本主義更高階段的唯一階級，就是僱傭工人階級。

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無可爭辯的明確性，論證了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不可分離性，如果現在還提出這些問題：運動或是最終的目的，什麼比較重要，實踐或理論有沒有更大的意義等等，這並不是在理論上超出我們的導師的一種標誌，而是比他們要退步，因為這些問題本身不是別的，而是五十多年以前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底或多或少不明顯的變體而已。

目的與運動溶合在社會民主黨內，彼此互不分離。但如果目的與運動相衝突，那就應當放棄後者。換言之，社會發展高於無產階級底利益，社會民主黨就不能保護妨礙社會發展的無產階級的利益。

一般地說，這自然是不會有的事。承認社會發展底利益與無產階級底利益一致，因此前者即為後者底自然動力，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基礎。

但是在過於奉行“手中之雀勝於空中之鶴”原則的地方，在趨近而忘遠的地方，那裏就表現出各個無產階級階層底較爲重要的特殊利益處於與社會發展相矛盾的地位。

無產階級中有極其不同的階層。如果爲偉大目的而進行的鬥爭不把無產階級的顯貴和無產階級底整個羣衆聯合起來，那他們會很明顯地覺得自己與這些羣衆之間利益底對立。但是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有一趨勢使各個無產階級層底生存條件革命化，並很嚴重地威脅着特殊的工人貴族；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就採用機器，以婦女代替男子，以不熟練的工人代替熟練的工人，使工人階級底各種範疇成爲完全多餘的，從鄉村吸引落後的工人到城市來，從國外招僱工人到國內來等等。社會民主黨和這些現象鬥爭的方法，就在於鞏固整個無產階級底團結，在於組織婦女、不熟練的工人、外來工人，在於以立法的方法替全體勞動者規定正常的勞動日等等。資產階級對事物的理解所固有的行會的方法在於從某種職業中排除其他的勞動者，在於阻滯經濟的發展。工人貴族替自己捏造在特權地位上的既得的權利並進行鬥爭以反對新機器底採用，反對婦女勞動等等；這些工人底鬥爭是不會有結果的；經驗證明，經濟的發展比他們更有力量，他們一定會一步跟一步地退讓不是沒有嚴重損失的。

前一契機是社會民主黨底方法，後一契機則爲那種工人運動所固有，這種工人運動不爲任何最高的目的，任何“理論”所領導並且自身表現爲純粹實際的運動。這些方法中何者值得採用，這還能有什麼懷疑嗎？

社會民主黨自然知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一切經濟的進步對於它所接觸的人民各階層，首先便是貧困與退化底根源，但社會民主黨也知道抵制進步會招致更壞的後果，這種進步不單是引起勞動人口底退化而且也替他的最後地位的提高與解放創造基礎。不待

說，機器制度底發展會把勞動人口導向前所未聞的貧困境地，他的一般的地位比較手工業繁榮時期還要惡劣。但如果拿機器支配的工業部門和那些還保存着手工業生產的工業部門比較一下，那末我們就看出，在前者（機器支配的工業部門）內平均勞動時間較短，工資較高，勞動底衛生條件較好。

在這一節內我們到現在為止僅說到無產者，因為在他們身上可以更明顯地表現出階級鬥爭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這裏全部敘述適用於對農民底保護，是自然明白的。

很顯然地，社會民主黨不能向農民保證，在什麼情況下，它應當拒絕無產階級保護他們的職業地位。社會民主黨要求保護工人不是以保護各個工人底專門工作為目的，而是以保護他們的勞動力及生活力為目的；社會民主黨保護他們的人格，而不是保護他們的特殊職業。

無產階級要求這種保護不是當作自己的一種特權；這種保護應當給予每一個需要這種保護的人，如果農民要想使這種保護擴大到他們自己的經營和他們自己身上，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會找到這樣熱烈的支援像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援那樣；但是，大家知道，他們就不願想到這一點；相反的，他們很失望地反抗這種支援。他們只求保護自己的特殊生產方式不受經濟發展的影響，可是社會民主黨就不能對他們作這種保證。

人們指出，在農業中一切關係和工業中不同，經濟的發展在農業中並不是走向小經營為較高生產方式所排擠，而只是走向農民底沒落和貧困。因此保護農民就意味着不是阻礙經濟的進步而只是阻礙農村居民底體力的退化；這樣看來，在本質上這種保護追求着與保護工人同一的目的，不過手段不同而已。

對這一點也可以有如下的反駁：保護農民首先就意味着不是保

護農民個人，而是保護農民所有制。但正是後者（農民所有制）是農民貧困底主要原因。我們已經看見，農業僱傭工人現在生活得比小私有者農民好得多，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比農民（他的所有制把他束縛在土地上）更迅速地逃開本鄉底貧困。這樣看來，保護農民並不豫防他們的貧困，這種保護只是保護那些把農民牢繫在他的貧困上的鎖鏈。但是這種保護也意味着保護農民的商品銷售並促進這種銷售。農民出賣的商品是食糧。他出賣食糧愈多則自己消費它們就愈少。促進牛乳、雞蛋及肉在坡市出賣就等於促進農村中它們的消費底減少，並以馬鈴薯、火酒和咖啡汁來代替它們。農民底貨幣收入雖因此增加，但他和他的兒女們底體力就因此損壞。農民以自己的、作為人的地位底降低為代價，來購買自己的、作為農民的地位底提高。

自然，我們事先就排除一切的企圖——我們甚至假定以十分堅決的方式和這些企圖鬥爭——這些企圖想將農民所負擔的重負轉嫁於工業和無產階級身上以抵制農民生底貧困。

由這種觀點來觀察保護的農民，一方面意味着糧食品的關稅，另一方面意味着承繼權，勞動者固着在土地上，僱農地位底惡化，國家償付農民債務的利息及保險補助金等等。每一種企圖用這些方法來抵制農民生底貧困，或在這種企圖尚未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前即已註定要完全失敗，或者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就引起對工業底損失和引起無產階級底貧困。但是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主要的生產部門，全人口底幸福依賴於工業的狀況較之依賴於農業底狀況更甚。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毫無損失為自己的幸福使農業為工業而犧牲；英國即其一例。相反的情形就會引起工業與農業底毀滅。任何地方農村居民都不會生活在這樣貧困中像在工業極不發達的現代農業國家內那樣；假如你們要想知道發達的工業對於農民有什麼意義，那你們只要看一看加里西亞、意大利、西班牙、巴爾幹各國。

另一方面，並不是農民，而是無產階級才是現代社會發展底體現者；犧牲無產階級來提高農民就意味着阻礙社會的進步。

其次說農業不會進步，這種論斷也並不完全正確；在純粹農業關係內，農業陷在死巷裏面，這種論斷自然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已經看見，工業並不限於城市，工業已擴張到農村內，並以各種各樣的方法在農村內變革了諸生產關係。依賴於工業的、與工業聯系的農業，也和工業本身一樣，在不斷改造底階段，這些改造創造出一切新的形態。農業革命化底這一過程剛剛開始，但它却迅速地前進着。保護農民，企圖保存舊的獨立的農民經營只能阻礙這種發展。這種保護並沒有停止農業中的變革，這種保護表現得正如工業中保護手工業者一樣的無力，但這種保護必然增加發展底痛苦和犧牲，並且結局由於自己的破產而給那些宣傳保護農民的政黨底道德的權威者以殘酷的打擊。

#### 四 土地國有

這樣看來，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在保護農民的意義上說來不僅是無益的，而且更壞的是大大地損害了社會民主黨。因為這樣的綱領既與我黨底無產階級的性質相矛盾又與我黨底進化的，或者也可以說革命的性質相矛盾。爲着成問題的一時的勝利，一個最有遠見的政黨就不得不付出許多代價，如自己內在體系底攪亂，進攻力量底減少和自己威信底喪失。

但可以要求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綱不單以保護農民爲旨趣。人們說：農業表現出比工業更爲緩慢的發展。農業成爲我們向前運動底制動機。因此我們需要一些方法來加速它的發展，就在這種意義以內，我們才需要土地政綱。

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人類社會是單一的有機體，但是它和動物的有機體之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它的各部分並不是以同一速度發展起來的。有些部分在其發展中較爲落後，爲其他部分所超越，因而在它們統一體底利益上需要藉助外在的作用來推動，以便與整體相適應。這種情形適用於各個國家，也適用於各個階級。有一種思想好像承認社會發展底原則，在排除一切突變，排除一切人爲的，也就是說，排除對社會現象的自覺的干涉，沒有再比這種思想更錯誤的了。這種原則單只排除任意的干涉，排除與社會發展底諸傾向立於矛盾地位的干涉，排除單爲我們的一些願望和欲求所指導而非爲社會的預見所指導的干涉。

歐洲各文明國家對於資本主義比封建制度在它們的各部分內，在生產底各部門內尙未消滅的更早以前就已成熟了，何況直到現在我們還碰到農奴制度底若干殘餘。同樣現代社會對社會主義成熟得比最後的手工業者和最後的農民消滅以前更早，比整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成熟在經濟上組織起來以前更早；誠然這些條件決不會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到來。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底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提高人民底這些落後階層並保證他們有更高生產方式和更高文化的手段。提高農民地位的方法，在使它接近和盡可能容易過渡到社會主義生產底意義內，在一切場合之內，將起着絕大的作用。在這一意義內社會民主黨自然需要土地政綱。

只要問一問這樣政綱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在現存社會基礎上在社會主義方向內促進農業底發展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是否可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經濟發展底主要動力，就是資本家底利益——利潤。因此促進經濟的發展首先就意味着促進利潤底增加。

但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手段適合於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目的。在這樣情況之下社會民主黨對經濟的發展應當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我們不能而且不應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黨也沒有理由來支持它。

我們不能阻礙採用節省勞動的機器，或阻礙男子被婦女排擠於僱傭工人範圍之外，但是我們的任務也不是鼓勵資本家這樣做，或者靠國家的費用來幫助他們。對待農民和手工業者底剝削也是如此。

有時人們責備社會民主黨，好像社會民主黨很高興這些階級底無產階級化。沒有再比這更錯誤的了。社會民主黨痛心於無產階級化，如果政權轉到它的手裏，它就要立刻結束這種經濟進步底方法；但它宣告在現存社會範圍內企圖阻礙這個過程是一樁沒有希望的事情。社會民主黨自己的歷史任務不在於剝奪獨立的生產者，而在於剝奪剝削者。

以擴大世界市場和殖民地政策為基礎的經濟的發展，表現出（雖然不十分明顯）完全類似的情形。這種方法本質上就是剝奪底方法；這種方法即以掠奪殖民地底土人和所有者及破壞他們的原始工業為基礎。如果中國的苦力時常跑到歐洲並造成對歐洲勞動者的競爭，那末讓歐洲勞動者不要忘記，他們早先就被歐洲的資本剝削了。

這一過程也不能加以阻止；這一過程也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先決條件，但是社會民主黨也不能促進這一過程。要求社會民主黨對殖民地國家土人在他們反對剝削的鬥爭中加以幫助，是這樣一種反動的空想，就如要求幫助手工業者和農民一樣；但要求社會民主黨對資本家表示幫助，國家的政權供他們使用，那就違反了無產階級利益。不，這是太污穢的工作，無產階級不能參加到它裏面去。執行這一下賤事業是屬於資產階級底歷史任務，無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必要弄髒自己的手，真算是幸事。它用不着耽心資產階級會忽視自己的任務並因此而阻礙經濟的發展。只要社會的和政治的權力在資產階級手裏，它是會永遠忠實於這一歷史任務的，因為這一任務不是

別的，而是利潤底增加。

既然無產階級干涉資本主義發展底這一過程，那末它的任務就不在於促進這一過程，直接地或間接地（經過國家的政權）給它以自己自願的幫助；無產階級不能阻礙這一過程：它的任務只在於減弱對這一過程所接觸的人民各階層有害的、導致沒落的諸後果，這對於發展多少是可能的而且實現得不致有害的。這樣看來，不是禁止機器和婦女勞動，而是保護勞動的法律，不是使輸出困難，而是拒絕國家方面的各種保護（關稅、獎勵金、殖民地的侵略），而這種情形在實際上是無效的地方，那裏最低限度保護受資產階級政策痛苦的人，例如殖民地當地的居民是可能的。

我們還看見，將這一原則應用於剝奪農民土地的許多方法是如何必要。

很明顯地，促進資本主義意義農業底經濟的發展，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土地政綱底任務。這是從來不曾見過的。不，我們所說的，是這樣的方法，它們現在在農業內已經能夠準備下基礎並無痛地加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

這種思想由於農業中土地私有與生產之間的矛盾——關於這種矛盾我們已經指出過好幾次了——已成爲可能的了。農業生產比工業生產更有落後的性質，離社會主義更遠：當資本主義在工業中，也就是說在社會中佔統治的那個時候，要在農業中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那是完全無望的事。

但是這種說法對於生產是正確的，對於所有制就沒有關係。土地私有已和農業生產底諸條件相矛盾，土地私有對於農業生產底條件比對於工業中生產資料底私有更早而且在更大的程度內已成爲不可忍受的鎖鏈。土地所有已經完全離生產而獨立。在農業生產內集中傾向還不甚顯著，相反的，甚至往往有細分傾向的那個時候，在土

地所有權內集中化底決定傾向却支配着，這種集中傾向特別明顯地在抵押的所有權內，此外在大多數場合內帶有非個人性質的抵押所有權內表現出來。

因此把土地所有制轉變為國有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就已經有可能；這種轉變在保存商品生產和僱傭工人制的時候無須改變現存的生產方式也是可能的。土地國有化的要求已經為資產階級的政黨，甚至往往為農業經營者自己用各種形式很堅決地提出來了。另一方面，我們現在就要說到的那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土地政綱實質上是歸結到土地國有化底這一種或那一種方法。

在現代社會內，我們對於土地國有的態度同樣決定着我們對於進步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綱的態度。

除在租佃制佔統治的國家內已成為很普遍的，在本來意義上的土地國有以外，我們還要考察抵押底國有和穀物貿易底國有。

抵押底所有者事實上就是土地底所有者；抵押的債務人對於抵押底所有者的關係，猶如佃戶對於土地所有者的關係一樣。

穀物貿易底壟斷使那些為出賣而生產穀物的農業經營者，也就是說，使他們的極大多數完全依賴於壟斷底所有者。壟斷的所有者如果不是在法律上，那末在事實上照自己的意見來處理全部耕種穀物的地面。

社會主義者最先提出了這些要求。一八四八年三月共產主義者同盟委員會（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所提出的德國共產黨底要求中第八項說：“農民地產的抵押應宣告為國有，農民應將抵押的利息繳納給國家。”

第七項要求將大地產變為國有。

三十年以後，蘇黎支州（Zurich）工會曾掀起實行國營穀物貿易的運動。

現時在這些要求爲農業經營者所提出的地方，社會民主黨對這些要求往往採取不信任的態度，有時甚至採取直接仇視的態度。從那時起事情有了些什麼變化呢？

無論集體的經驗，無論社會的條件都起了變化。

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底著名的序言中說：

“當二月革命爆發時，就我們對於革命運動底條件和行程的見解來說，我們總是受到以前歷史的經驗，即法國歷史經驗的影響……在當時的情況之下，我們以爲沒有疑問，大決戰是已爆發了，是要在這一個長時期的多變化的革命時期中進行決戰，結果一定是無產階級得到最後的勝利。”

反之，在七十年代瑞士工人運動內民主主義的偏見，還佔支配地位，這種偏見既不顧及階級的矛盾，又不顧及社會的條件，並且這種偏見還相信，要肅清到社會主義之路，似乎只要有必要的民主主義的形式和必要的教育就夠了。

現在看法就完全不同，但是目前的狀況和那時候已完全不同了。現時大聲疾呼要求穀物貿易和抵押國有化的不是無產者，而是有產的農業經營者，並且這樣的國有化底任務不是供給社會以利益，而是將土地私有制底不利轉嫁於社會，爲的是使土地私有制獲得的利益受到保護，得到保證並增大。同樣國家政權不是在無產者手裏而是在地主和資本家手裏，他們當然是這樣來實現國有化。最後，一八九八年農業經營者和無產者底地位也和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七八年完全不同。

一八七八年前穀物價格不斷地上漲；農業經營者獲利，消費者則受苦。國家干涉這一過程可能有一個目的：幫助消費者，也就是說，抵制穀價底提高。

現時穀物價格在向下低落；現在抱怨價格的不是消費者，而是生產者。沒有一個人想到在國家幫助之下人為地降低這樣的價格；在國家權力干涉規定穀價的地方，它這樣做，目的在增高穀價。國營的穀物貿易現在具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這是不足奇怪的。

但對於抵押底國有化也是一樣。自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八年地租不斷地增加了。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抵押底國有化對於地主不能有任何的利益。它只有一個目的——供革命的無產階級作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方法，即作為把土地所有制置於依賴國家政權的地位並剝奪資本家階級的一個剝削領域的手段。

從一八七八年起情形就不同，從那時候起地租底降落即已開始。地租降低，抵押利息底數額並未減少，債務甚至迅速地增加。土地所有者更加難於履行自己的義務；如果意外的變化不到來，抵押銀行就要受到很大的損失。

抵押權底國有化成為保證資本家利息的一種手段，因為他們的債務人將不是個別的土地所有者，而是國家。利息將獲得保障。但在另一方面國家就要負擔起直到現在資本家承受的一切危險。這些資本家佔便宜，地主和他們一同佔便宜——至少是暫時地，如果國有化引起抵押利息底降低。納稅人將要償付一切。

在保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以收買為手段——這是亨利喬治土地改革底資產階級的擁護者所企求的——來實現土地國有化，情形也是一樣。如果這些改革做得成功，例如七十年代末期在英國實行了土地國有化，那末誰都不會由這裏得到這樣多的利益，像被剝奪的大地主那樣。他們很安逸地浪費了國家所付出的資本的利息而國家則承受了現在由大地主承擔的，地租降到百分之三〇以上的一切損失。

土地國有和抵押權國有自然有所不同，土地國有至少使國家有

可能採用優良的生產形式來抵制地租低落底結果：而抵押權國有在經營方法上並不給國家以任何影響。

但是對國家不能有像農業經營者對它抱着那樣信任。國家在現時首先是統治機關。甚至就在國家執行着經濟機能的地方也沒有失去這種性質。而且在那裏有決定意義的是法律家、警察、兵士底觀點，而不是技術家，不是有才幹的人底觀點。事物底這種情況只能在無產階級消滅了階級的差別並廢除國家的統治組織底性質那個限度內和那個時候才會改變。在現時國家處理經濟通常都不及私人資本家那樣節省和老練；資產階級很高興指出這個情況，作為反對社會主義的論證，事實上這種情況並不是反對社會主義而只是反對現代的國家。可是甚至現在有些企業底國有化也能帶給社會以經濟的利益，這是指那些由於自然條件——鐵路，許多礦山或由於社會關係——卡特爾、托拉斯，而具有壟斷性的生產。在幫助私人壟斷的時候，對大眾的剝削在這裏可以達到這樣高的程度，即國家的生產會免於不幸，自然是在政府依賴人民的地方，因而國庫不能任意繼續剝奪私人壟斷者。

但是在從私人壟斷產生的這樣困難並不存在的地方，那裏就沒有經濟的根據把工業企業交給現代國家。相反的，除經濟性質底原因外，還有從作為統治機關的現代國家底性質中發生的政治的原因。增加現代國家底經濟權力——就是增加在它手中壓迫被壓迫階級的手段。這種政治的動機正如經濟的動機一樣在國家受到無產階級影響的那個限度內就會失其意義。但是是一些民主主義的形式並不提供任何保證反對使用國家權力來壓迫無產階級。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佔極大多數的地方，他們自然打算限制大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但是他們尤其熱心於保護小的剝削者底“經濟自由”。瑞士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讓工人在他們的一切政治主張中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在每

一次罷工反對手工業主的時候他們就大發脾氣，藉國家的幫助來報復工人比在不自由的國家內他們的同伴更其殘酷；可是如果說到國營企業的工人和職員們底勞動條件底改善，那他們就很熱心地利用民主主義的自由，即利用全民投票，以便拉攏官吏們。

這樣看來，在無產階級不起領導作用的地方，社會民主黨就沒有理由不需要擴大國營經濟和國家佔有制。在農業領域內有沒有這樣需要呢？

七十年代以前土地所有制，實際上成了一種壟斷，這種壟斷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可是交通工具底發展替農業消滅了這種壟斷，至少是在國家政權對此不與以人為阻礙的地方。另一方面，農業中生產形式還沒有到要求國有化的地步。農業的工業——製糖業、釀酒業、麥酒釀造等等對於國有化成熟得比私有農業為早。目前國家本身就寧願把自己的土地租給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者以代替在這些土地上進行私有的經營。社會民主黨沒有任何理由來增加國家資本主義承租人底人數和減輕在貨幣方面政府依賴國民代表底同意。

## 五 森林與水利國有

農村工業底一個顯著的，而其實與原來的農業無關的部門：森林業，則是例外。森林底合理開發與資本主義謀利底欲求不相容。在資本佔有森林的地方，資本就毀滅森林，因為好的森林業是與資本主義榨取剩餘價值勢不兩立的。資本主義的榨取需要資本盡可能迅速周轉，而在森林業內資本底周轉異常緩慢。“生產時間（本身只包含相對少的一部分勞動時間）底延續以及與生產時間底延續結合在一起的周轉時期底延續，就使森林業對於私人的開發，也就是說，對於本質上保存私營性質（即使是資本家集團出來代替個別的資本家）的資

本主義的開發，成爲不利的生產部門。文化與工業底發展，一般地伴隨着森林底根絕，文化與工業底發展對於保護與培植森林所作的一切在根絕森林面前就相形見拙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第二二六頁）

在上面引證的地方，馬克思從吉爾赫霍弗底“農學指南”中引了如下的幾行：“生產過程（在森林業內）佔這樣多的時間，超出各個私人經營底範圍以外，甚至超出人生底範圍以外。購置土地所耗的資本（馬克思在這下面附註說：“在公社經營的時候，沒有這種資本，問題僅在於公社從耕地和牧場可以拿去多少土地用於森林經營”），只有過了很長時期以後才產生一些顯著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資本只能完成部分的周轉，至於某幾種樹木，資本的完全周轉需要一百五十年。”

此外，生產底延續期間需要保留樹木，其保留量也許要十倍至三十倍超過了它的每天使用量。因此，誰要是沒有其他收入的來源，不佔有廣大的林場，他就不能進行有計劃的森林經營。

在單是從資本主義的考慮作決定的地方，無情地根絕森林底最後一刻就會馬上到來。農民的貧困對於森林也有不少害處。可是森林對於一國底住居與肥沃，對於氣候，對於水利底平均分配，對於洪水氾濫底減少，河流底變淺，對於山地及海岸已耕種的土地底保護等等有這樣大的意義，要是無情的根絕森林，對於農作會招致極大的損害。各個國家不得不多次採取與保護勞動力的方法同樣來反對資本盜竊森林，這種資本以自己盲目的貪慾努力殺死產金蛋的母雞。保護森林的法律業已頒佈，但是，不幸，這些法律是不夠的而且不是到處都有的。在德意志帝國內作爲私有財產的全部森林面積，只有百分之三〇受到法律的保護。在普魯士、薩克森以及許多小國內却完全沒有這樣的立法。

另一方面，國家耗費大筆款項用來擴大自己的國營林莊並把不



毛的山脈和多沙的地方圍起來，以便補救資本主義追逐利潤所造成的那種情形。

這種發展只是爲別的，在別處已經敘述過的，從資本主義收入增加中發生的發展部分地麻痺。如果資本主義的剝削更加毀滅着森林，那末資本主義的奢侈却更加使森林重新出現。但因為問題在此地所指的是奢侈，是浪費的情緒，那末受這些因素限制的森林面積底擴大，就有着不合理的和沒有計劃的性質。例如，在奧國的阿爾卑斯山現在可看到這樣的現象，在一些地方森林面積靠牧場甚至耕地來增加，相反的，在別的地方森林爲防護雪崩和山洪是絕對必要的，森林一消滅，則雪崩和洪水就破壞國家底農耕。如果，一方面，耕地面積縮小，農業因森林過多而成爲不可能，那末，另一方面，森林底缺乏也會引起同樣的結果。這就是資本主義時代底森林業。

這兩種現象同樣是有害的，並且爲着社會底利益應當加以制止。對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森林國有，森林國有最低限度在國家財政未曾破產的地方，在政府不受爲着游獵而認爲取消農業是自己最高貴的一種特權的那些“貴冑和上流人”影響之下的地方，是一個能保證森林業更合理經營的手段。在有健全的財政制度的民主國家內，即使無產階級在那裏還沒有很大的勢力，社會民主黨也毫不動搖地應當要求森林國有。

水利國有與森林國有有密切關係。水利國有不單是對於農業底利益——灌溉和排水有意義；在評價水利國有時，還應當注意到許多其他更爲重要的利益：交通底利益——河川、海洋、運河的航行；工業底利益，工業需要大量的水力，而在電氣技術發達的時候，需要的水力還更多；其次，衛生底利益，——沼澤底排水，飲料底供給，糞污及其他廢物底放出，最後，社會治安利益——即防止水災。合理的水利經營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發展而更加成爲必要，因爲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比一切其他生產方式更加以根絕森林,乾涸沼澤,降低湖內的水位,建設水道、運河,改正航路、建築貯水池等等辦法來干涉水利分配底自然條件。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比在它以前的任何其他生產方式更創造了調劑水流的手段。水利體系愈是人爲的,則結果愈加有害,這些結果可以惹起水利體系在錯誤的方向內發展。在這種情形之下私人利益在這裏比任何地方都更少與社會利益一致。在法律上可以把河流分爲不同的部分並將其中每一部分給與個人作爲私有;可是,實際上河流,甚至一切河流的區域,從發源地到河口,是一個整個的,那末對於河流某一部分底主人有利,對於住居在下流的人就會招致很有害的結果。因此只有從一個共同的觀點,按照一個計劃管理整個河流區域,才是合理的水利經營,在這種情形下合理的水利經營當然要與森林經營並進。河流底主人應當是森林底主人。水利國有的要求可以迅速提出,由河流所產生的地租,不是降低,而是增高,因爲資本主義爲了工業的目的,利用水力在增加着。因此從這樣的國有中不能認爲是居民財政負擔加重,相反的,最低限度在這種方法將被大胆施行的地方倒很可以預期着國家底富裕。在政府不是那麼腐敗,以致國有化底每一法令只會走上掠奪國家的地方,在政府不是那麼爲官僚主義所分裂,以致在一切技術任務之前束手無策的地方,在政府處置適宜並且服從民主方式選舉的人民代表底監督的地方,那裏,現在就可以大胆地要求水利國有。

資產階級的,尤其警察制度的國家在水利和森林方面的經營無論怎樣令人懷疑,可是這種經營現在已經勝過私人底經營。

不能將水利和森林國有與水利和森林底公社佔有等量齊觀。公社佔有水利和森林乃是共同利用水利和森林,共同捕魚、共同狩獵、共同畜牧底結果。現時森林內牧畜幾乎完全被禁止,打獵已成了貴族們底個人享樂,作爲居民食料的河中捕魚底相對意義已大大地降

低。如果森林和水利國有現在已成爲必要，那末關於捕魚、狩獵、牧畜的考慮在這種情形下就不起任何作用；在這裏有決定作用的，乃是其他的考慮，這類考慮底可能性在公社佔有存在底時期是完全被排除的，因爲那時對於它們缺乏一切必要的先決條件。

## 六 農村共產主義

在農村中的國營經濟情況就是如此。但是和國營經濟，“國家社會主義”同時，也發展着公社經濟“地方自治體的社會主義”。公社經濟在農業領域內是不是一個更有希望的槓桿，靠它的幫助就可以加速農業底緩慢發展，把農業導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難道農村共產主義不是原始制度，比對城市住民更接近保守的農民嗎？難道不是從農民方面一直到現在還保存了許多殘餘嗎？

在德意志帝國內一八九五年時計有：

	公 社	經 營	使用面積(以公頃爲單位)
公 用 牧 場	12,492	429,468	441,635
公 用 森 林	12,386	570,846	1,340,160
土地已分但仍爲公社佔有	8,560	382,833	264,309

要把農民的農業引到和社會主義合流，單只擴大農村共產主義底這些殘餘不是就夠了嗎？

這種話聽起來是很迷人的。在俄國，農村共產主義在不久以前還非常有力，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實際上存在過很有一派，這一派相信，俄國由於這種共產主義，比西歐更接近於社會主義社會。西歐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家，如拉維勒，起初幻想到原始的農村共產主義，他們把復活原始共產主義看成解決農村中，而同時解決城市中（禁止新無產階級從農村中不斷流出到城市去）社會問題的手段。不

久以前社會民主黨人爲了尋求土地政綱已表示贊成加強和擴大這種原始共產主義；這種情形恰好發生在飽受經驗教訓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已堅決地和那種認爲中世紀所遺留下來的農村共產主義可以成爲現代社會主義因素的見解相決裂的那個時候。

有這樣的共產主義也有那樣的共產主義。社會民主黨企求的革命，畢竟有着不是法律的而是經濟的性質；這不是財產關係中的變革而是生產方式中的變革。不是消滅私有財產，而是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就是它的目的；社會民主黨企圖消滅私有財產，只是因爲消滅私有財產乃是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手段。社會主義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難不是在法律的領域內而是在經濟的領域內。

從這個觀點看來，單純擴大公社土地所有，當作準備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手段，凡在它不是用來擴大公社經濟的地方以及就現代社會主義的意義而言，公社經濟底前提條件不存在的地方都是無用的。

在馬克公社內土地公有是從現時已完全陳舊的生產方式底需要中發生的。只有消滅了適合於這種生產方式的公社所有制形式以後，才能消滅這種生產方式。在公社，或者即使是它們底殘餘還保存着的地方，它們總是常常阻礙農業底進步。只有在類如瑞士阿爾卑斯山區所形成的那種特殊關係（那裏土地在農業方面只宜於作爲牧場之用），才能給它以經濟的理由。如果同時不回復到舊的生產方式，不回復到三田制在公共牧場上和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要想恢復和擴大公社所有制，那是不可思議的。

在現時竭力設法推廣公社的那些農學家，絕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要求公社爲大地產謀利益，以便長時期把農業工人束縛在土地上，這些工人是因爲有可能獲得小塊地（付地租或有自由所有權）而被吸引到農村來的。因爲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沒有公共牧場，這些工人就不能飼養牲畜得到糞料，因而他們就不能長期定居；被復興的

封建時代底公社必須完成並保證封建農奴制復興的事業（參看郭爾慈：“農村工人階級與普魯士國家”〔Die ländliche Arbeiterklasse und der preussische Staat〕，第二六二頁及以下各頁；柴林格：“論東德殖民情況”〔Die innere Kolonisation im östlichen Deutschland〕，第一三一、二七一及以下各頁）。

但是，如果一方面，公社成爲阻礙經濟進步並促進封建關係底保存的一種手段，那末，另一方面，公社附屬地使用權本身就成爲封建特權。農民馬克公社底世襲成員就變爲貴族，他把自己和大批外來分子分開，高居在他們之上，猶如有全權的公民底公社高居在鄉村居民底公社之上一樣。公社底極端崇拜者，繆斯柯夫斯基說：“因爲附屬地使用權現在不是常常無代價地授予，並且除此以外，往往只對於常住居民底一部分產生利益，於是從當地全體居民都可使用的自由土地構成的公社，經過相當時間變成了某種集體的世襲領地，世襲領地的處分權，在那種情形下不是常常公平無私的，它是屬於近具有私法性質的閉關自守的集團。”（見繆斯柯夫斯基：“瑞士公社所有地”〔Die Schweizerische Allmende〕，第三頁）

在原始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地方，在富裕的農民享受這種所有制的地方，這種原始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像繆斯柯夫斯基正確地所說的一樣，已成爲一種世襲領地，與其他貴族的世襲領地不同之點只由於它不是屬於一個家族，而是屬於許多家族。社會民主黨應當像反對一切其他的世襲領地一樣來反對這種封建的世襲領地。

但是在原始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僅只以可憐的殘餘形式，以小塊公共牧場形式，以有權在森林內採集枯樹枝等等形式保存下來的地方，在窮人享受這種土地所有制的地方，此種所有制就成爲世襲領地底支柱，並且一般地成爲剝削農村無產者的支柱，因爲這種所有制把

農村無產者束縛在土地上。在這種場合內這種所有制就有像許多工廠的慈善機關（例如廠主建築的並租給工人的住宅）那樣的意義。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社會民主黨爲什麼一定要關心於擴大和推廣這種所有制。

但是，另一方面，在窮苦的居民還爲着自己保存了牧場及森林公有權的地方，要求無條件取消它們，自然是不必要的。取消這些權利乃是剝奪民衆以利少數私有者這一大過程底一部分。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現代社會主義生產發展底必要的前提條件。但是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促進這一過程並不屬於無產階級底歷史任務；無產階級要是干涉這一過程，那末他的任務只可以在可能的限度內幫助被壓迫者，減輕自然而必然的發展底後果，使這種情形實現出來對於進步沒有害處並使現有力量的對比和經濟條件一般地容許這種情形爲限。

因此，在小私有者的農民及日工保存了牧場及森林權的地方，社會民主黨就沒有必要去取消這些權利。我們曾拿這些權利根據它們的意義來和工廠主替工人建築的住宅作比較。但是和這種住宅相聯系的，工人底束縛和奴役無論怎樣悲慘，要使這些住宅底居住者遷居出去那總是很荒唐的。

凡是在公社佔有牧場及森林地的權利阻礙着合理的農業或林業發展的地方，社會民主黨可以平靜地讓統治階級去消滅它們。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只在於在這種消滅過程被完成的地方，設法減輕有利害關係的農民底痛苦並且不許欺騙農民（這種情形多半會有的），犧牲他們的可憐的權利。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把開倒車的道路視爲前進的道路。恢復中世紀公社土地所有制擴大和推廣公社、公共牧場、森林，爲農業的目的擴大森林地等等，社會民主黨不應當認爲是

創造了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

可是，如果中世紀的土地公社的共產主義底基礎以及此種共產主義本身無可挽回地消滅了，那末在現代社會內部——不是在農村內，而是在城市內——就發生新型的公社社會主義底條件。城市人口底集中就在公共機關而前提出新的任務，並使許多領域內公有財產排擠私有財產成爲必要。

一方面，大批民衆集聚在小的地方，這一定使得個別的經濟機能（照明、給水、運輸，這些機能在農村內要各人自己料理）轉爲大的集中的機構，這些機構——如：瓦斯工廠、電站、水管、街道等等——在資本手中成爲不可忍受的壟斷，並且遲早一定要轉到公社手裏。另一方面，人口底集中就替市政管理創造出新的任務及解決這些任務底新的手段，這些任務底解決在農村內就不可能。大批民衆聚集在窄小的地方，地租底增長，強使地主們在每一平方公尺土地上建築更高的房屋，這樣就使居民失去光綫和空氣，大量生活品要逐日運到城市去，而大量廢物又要逐日從城市中移出，——這就提出爲農村公社所不知道的許多困難任務，這些任務底解決，需要許多龐大的市政機關來管理溝道、公共場所、花園和市場等等。隨着城市中人口底增加，不僅發生農村所不知道的各種需要，而且創造出滿足這些需要底條件，這些需要是農村和城市同樣感覺到的，但是農村却不能滿足這些需要。這種情形同樣引起爲農村所不知道的許多機構。醫院、救濟院在農村中其必要自然不亞於城市，但是在農村中沒有必要數量的“物質”，何況必要的物質的和知識的手段還更感缺乏。農村貧困的時候，城市中却堆積着許多財富；農村在精神上感到貧乏的時候，城市中精神生活却達到很美滿的繁榮。

這一切就一定會使得城市中公用事業採取極大的規模，並且發展得比公社本身更爲迅速。

但是公社首先是一種管理底機關，而不是統治底機關，最低限度，在它和國家不一致的地方，在現代國家內乃是一般的通例。公社愈是獨立地和國家對立，愈是不受國家權力的支配，則它亦愈不能算作統治底機關。在工業城市內無產階級最先感覺到自己的勢力。他成羣地聚集在這裏，他在這裏發展着自己的階級意識，他在這裏組織起來，他在這裏最先達到政治的成熟，最先獲得充分的力量，在和資本家鬥爭中公開地和堅決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如果市政代表機關建立在選舉權上，那末無產階級在公社充分獨立之下，在許多城市內現在已經能夠達到使公用事業受自己利益的支配，也就是說受全社會利益的支配，在受國家及社會底一般資本主義性質所限定的很狹小範圍內發展市政社會主義，何況在國家及社會內部運用聰明才智，就可以達到極大的結果。

但是公社愈是成爲自己區域內的統治者，土地公有制愈是重要，則公用事業就能更合理更有計劃地進行。在城市內地租增長着；因這種增加所得的利益在土地成爲公社底財產的地方，就歸公社所有，並且——在公社的獨立性，普選權及無產階級發展底一定高度等條件之下，——在公社手裏就不是用來增加統治階級底權力，而是用來促進公用事業和文教政策底發展。土地公有最先也創造出居民住宅條件實際改善底可能性——通過公共住宅底建築，——因爲一些規定、禁令、建築及住宅監督只能消除最可怕的濫費，却不能根絕土地壟斷者底住宅的高利盤剝。

因此盡可能擴大城市土地所有權，成爲現代獨立的民主主義的城市公社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現代的城市行政當然不僅不准許轉讓城市的財產，而且甚至在城市有機會在它所佔據的廣大地面上有利地獲得土地的地方要去擴大自己的所有權。在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在這方面努力，盡可能地擴大城市管理底職權以對付土地



高利貸者，盡可能給城市擴大土地徵用權。

在農村內情形就不一樣。在這裏無產階級，甚至在普選權支配下，一點也不能過問公社的事。他對於這種事情太孤立，太落後，在經濟上太依賴於一小羣僱主們，他們能夠嚴密地監督他。這裏要進行違反土地所有制利益的任何公營政策都談不到。但在農村內不僅“地方自治的社會主義”底政治基礎，就是經濟基礎也都缺乏。現代城市公社底經濟機能就不能移置到農村去。

給與公社經濟以很多活動對象的舊的封建時代的農業已經消滅。關於現代公社的農業，關於農村公社所管理的合作社的大農業生產，現在沒有什麼可談的。甚至在城市內生產合作社都很少有成就；對於農民的大規模生產合作社差不多一切成功底因素：必要的精神力量，必要的規章，必要的資金都缺乏。我們並未看見，在現時會有一個農村公社能夠立即過渡到現代的大生產。但如果是這樣，如果土地共產主義底原有基礎消滅了，按照大城市底形式組織的地方自治的社會主義在農村內是不可能的，那末要使農村公社得到了土地所有權或擴大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權，這種要求有什麼意義呢？當然他們應當得到土地倒不是只爲着要佔有它，而是爲着要合理地使用它。在這樣使用底可能性不存在的地方，土地愈過剩，所得就愈多。在緊要的時候，公社不得不將土地出租，但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地租底降低，他們會長期不能收回自己的成本。

公社土地所有權底創立和增加，可以說，在農村內和在城市一樣，是生產資料社會化方法之一。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一作爲一般的要求，只能在城市提出。這裏我們也只限於一般的要求。由於特殊的地方條件，什麼是必要的，我們且不去管它，因爲我們只涉及社會民主黨的一般的土地政策。

## 第二章 保護農業無產階級

### 一 工業與農業中的社會政策

直到現在我們對社會民主黨土地政策的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結果，這種結果對於尋求社會民主黨土地政綱的人，即對於無產階級應當提出的，要拯救農民的經濟，或者避開資本主義階段，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無痛苦地把農民經濟引導到社會主義生產的那些要求，絕無慰藉之可言。

但由此不是說，從我們的觀點看來，積極的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策為不可能，我們已被注定在土地的虛無主義上面。

如果從社會民主黨底觀點說來，在現代社會內積極的影響在工業領域內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那末這對於農業也是有效的，因為整個社會，這已經重複過多少次了，是不可分割的有機體，社會民主黨在農業領域內的政策，正如在工業領域內的政策一樣，不會有另一種政策。

但另一方面，無產階級不經長時期的考慮就不能把自己目前因工業的生產關係而產生的政策移用到農業方面來；他應當使這個政策適應農業底特殊性。如果社會民主黨要想在農村中進行鼓動，它就應當首先解決這個任務。

社會民主黨在農村中的活動無須去找尋新的原則和新的綱領；

它最重要的是研究，在應用於農業方面它的總綱領底現有基本原則中所得結論是怎樣，並且它的要求在這種情形下會受到怎樣的改變。

這樣的研究是一件重大的工作，在農業關係底多樣性情形之下，它對於每個國家，甚至對於每個地方都得提出不同的結論。理論家只有和一些或少數“實際家”，即是和在不同的國度很熟習各種不同生產方式底農業實際情形的人一道才能完滿地完成這種工作。這種工作自然不會得出最終的結論，正如社會政策的綱領對於工業常常是暫時的一樣，因為生產關係在不斷的改變。

如果我們在這裏也一樣着手這種研究，那末我們的目的，只是提供不容爭辯地證明了的一些具體實例，從我們的觀點說來，積極的土地政策對於社會民主黨是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絕不希望在這裏提供把問題說得詳盡的和確定的土地政策。

社會民主黨底歷史任務，在於要求社會底發展超出資本主義制度底界限以外，這一任務，一方面以整個社會利益的措施為條件，另一方面以無產階級底利益，即能夠將社會提高到資本主義階段以上的這一動力底利益的措施為條件。社會民主黨也指示出社會政策底這兩方面：因此社會民主黨底土地政策應當分為如下的措施：

(一)為農村無產階級底利益；

(二)為：a. 農業底利益，

b. 農村全人口底利益。

農民底特殊保護在這裏沒有它的地位。

前一種措施又分為兩類：(一)從無產階級底自由活動及組織底道路上消除一切障礙；(二)在個別的人及有組織的羣衆底活動不可能的地方，要實行一些措施，要求用國家的權力來保護無產階級底體力、智力和德力使其免於經濟因素底腐化影響。

## 二 結社權及關於僱農的條例

首先，用來取消在德國一直保存到現在的封建隸屬底殘餘的措施屬於第一類。

僱農是這些殘餘中爲衆所周知的，統治階級靠僱農幫助在封建制度崩潰的時候從農奴制中拯救出所能拯救的東西。安東·邁格爾說：“在我們的資產階級社會內沒有一種現象像僱農關係這樣接近於奴隸制和農奴制的。”（“論市民的富有與無產的國民階級。社會立法的藍皮書”〔Das bürgerliche Reich und die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Brauns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第二卷,第四〇三頁）

僱農關係底這一封建性質在通過關於僕役的特殊法律及僱農的條例而得到立法的認可的地方,就會加強起來。

德國民法底創制者在資產階級大革命後一百年仍保存封建制度底這些和許多其他的殘餘,當作神聖不可侵犯,這件事實對於他們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在德國只有帝國的領土亞爾薩斯·勞倫,由於法蘭西的法律,才免除了僱農條例（參看伏爾姆：“大衆百科辭典”〔Volkslexikon〕關於這一問題的一篇頗有教益的論文,一八九五年版,第二卷,第二七六頁,並參看凱萊爾：“德國僕婢制度與僕婢條例”〔Gesindewesen und Gesindeordnung in Deutschland〕）。

但是,除了對付僱農的特殊法律以外,還存在着對付整個工人階級的這樣的法律;工人階級在德國還不曾得到結社權,結社權只適用於工業工人。例如在普魯士對於大批農村工人,僱工、日工、僕役、租佃者像對於海員水手一樣,根據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法律,照預定契約辭去工作要受到禁止,用一年監禁來恐嚇,並且這個法律直

到現在還有效。結社權對於現代無產階級，除普選權及遷移自由外，是根本權利中最重要權利；無產階級沒有這種權利就不能發展，這種權利已成為他的生存條件之一。如果社會民主黨要想喚起並組織農村無產階級，把他聯合到戰鬥的無產階級隊伍裏面來，——那末，社會民主黨就應當替農村無產階級爭取這種權利，雖然這種權利對於城市工人更為重要，因為這種權利並不消除農村工人底孤立性和經濟的依賴性。在英國企圖組織農村工人是開始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但我們在現在看見什麼呢？“大不列顛七十五萬農村工人中在現時有組織的不過四萬人。”（見威伯：“英國職工運動史”，伯恩斯坦的德譯本，第三〇〇頁）

不待說，結社權對於農村工人是必要而有價值的武器，但實際上自由遷徙權對於他更為重要。如果在某些地方他的地位在最近幾年有所改善，那末首先就是由於遷徙底自由，使他能夠從一地方移出，移居城市或工業區域；就為這個緣故遷徙自由在地主黨人看來是現代國家最可憎的一種制度。要公開地侵犯這種權利，他們沒有這樣大的力量，於是他們竭力用一切可能的陰謀詭計去限制這種權利；採取各種手段將工人束縛在土地上，利用土地得到收入，恢復公社和公共牧場，租給日工田地和菜園等等，以至於在地方當局協助之下限制遷徙（這是在加里西亞阻止小農逃出農村所慣用的方法）；更進一步實行增加火車票價，增加到城市去的旅費以及諸如此類的反動計劃。

社會民主黨應當和所有這類手段進行最堅決的鬥爭。

地主黨人很想在工業工人與農村工人之間挑撥離間。為離開兩者，他們向前者指出，工業區要是充滿從農村來的勞動力會使工業工人底生活條件惡化並減少他們在和資本家鬥爭時的反抗力。隨後就說，工業工人自己就很關心於阻止工人從農村流入。這種論調也在工業工人當中傳遍了。

甚至在起草爲布勒斯拉夫大會(一八九五年)所否決的土地政綱以前的討論會上就已指出,工人從農村流入,使援助農民及改善農村工人底命運成爲十分必要,以便把他們留在農村內。有人說,如果大批欲望低、知識水平低的新的無產階級分子要是不斷地從農村流入,在經濟上完全不穩定的無產階級分子要是使有組織的工人底一切努力麻木不仁,那末在工業區中的鼓動就不會成功。

這種論調從個別工人階層底狹隘的眼前的利益底觀點來說,從狹隘的行會手工業者底觀點來說,而不是從整個無產階級——走向新社會制度的動力——底觀點來說,那是對的。如果上述的論證是正確的,那末工業無產階級,爲着自己的利益,就應當和一切增加自己的隊伍作鬥爭,即是說,自己取消自己勝利底必要條件。誠然農村羣衆流入城市會妨礙有組織的工人在無產階級當中佔據特權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這種流入就有可能把勞動人口底許多階層組織到並聯合到戰鬥的無產階級方面來,否則他們就停留在無產階級隊伍之外甚至部分地供作工具來反對他。自然,把新兵引向勝利,比老兵更困難,可是,在法國大革命底軍隊中新兵以其極大的熱誠及其人數之衆多戰勝了沒有辦法來補充自己隊伍底損失的歐洲專制國家底老兵。這樣看來,無產階級軍隊勝利底保證,不在於他的老兵底發展,而在於很興奮地在他的旗幟之下新兵數量底迅速增加。

同樣必須記住,確信無產階級底勝利並不是依據於進行得很慢的、有些地方完全沒有進行的大經營吞併小經營上面,而是依據於社會內工業底統治上面,——這種統治一方面以工業排擠農業爲條件,另一方面則以農業對於工業依賴性底增加爲條件。

要是社會民主黨希望停留這個過程,禁止新的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工業區而人爲地阻礙工業底增長及工業無產階級底增加,那從社會民主黨方面說來就是一種自殺。幸而,這是不可能的。

喚醒農村居民並提高他的慾望之後，同時又把他留在農村內，那是不可能的；在現代社會內農業工人階級底地位比工業無產階級底地位惡劣得多；前者底發展永遠跟在後者發展底尾巴後面，因此就不能消除工業對於農業人口所具有的吸引力，恰好相反，這種吸引力將隨着農業人口的動盪增加，從自己的愚鈍中蘇醒起來，並與工業人口發生更密切的關係。

結社權與遷徙權同是農村無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自由活動和組織底最重要手段。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就在掌握住階級鬥爭底這個武器，確定其爲自己所用並教工人階級各階層來使用這個武器。

爲工人階級謀利益所採取的第一類方法就是如此。

### 三 保護兒童勞動

第二類包括勞動立法來保護一般工人，而特別是保護婦女和兒童。

但是這樣的法律用來保護農村工人有沒有必要呢？這樣問題底可能性不能不令人驚異。但是還更值得驚奇的是竟有一些德國的社會政治家根據在這裏不止一次引證過的，社會政策學會所作的關於農村工人狀況的調查，對這一問題給以否定的答覆。這種調查無論如何乃是以特殊的方法進行的；調查表單是分送給農業企業家；這些企業家被社會政治家認爲是一個來源，從那裏可以得到關於農村工人狀況底極其真實的真理。

在指責這種行動底謊謬時，地方行政廳底一個年老的參事吉爾，他是調查研究所底領導者之一，在其對所發表的結果作的序言中曾反駁道：“如果某個地方僱主們底陳述不需修正就能爲工人所贊同，那也只有農業內，因爲在這裏相互間的關係還很簡單，宗法關係既

未爲多年的工資鬥爭，又未爲罷工及階級鬥爭的號召，也未爲利益底深刻矛盾所毒害。主觀的判斷自然是有的，並且常常可以從僱主底立場得到說明，但那時却很容易區別它們而且它們也不會把任何人引入迷途。”（“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一卷，第一二頁）

換句話說，調查研究者把那種需要調查的和他們要想證明的，誤認爲已證明了的；他們覺得最顯而易見的是，沒有人能比企業家更好地答覆下述的諸問題：“由於過長的勞動日，特別在婦女和兒童方面，是否有力不勝任的工作？婦女的勞動是否引起對家務的忽視？日間勞作是否影響兒童智力的發展？現存的關於僱農的條例是否需要改革？”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如果純樸的農業經營者中有人“主觀地說明”自己的回答，那末這也容易辨別。人們很難容許有學問的人會有這樣奇怪的斷言。

自然，我們並不懷疑，在上述農業經營者當中，有很誠實和明達事理的人，人們可以從他們那裏學得很多；我們應當感謝上述的調查有豐富而有教益的材料，但它（調查）要說明農村工人狀況有改革之必要，那是極其不適宜的；它不但不適宜，且會陷入迷途：沒有一個有理智的人會向那些有理由阻礙改革的人去詢問他們是否有改革底必要。

然而，除了堅定地確信地主貴族對自己的工人宗法式的愛護之外，社會政治家們還有別的理由只去詢問地主貴族。缺乏方法和參考資料，這是我國統治階級和生活有保障的階級底科學興趣之可悲的證明。這些先生們應當向社會民主黨請教：無產階級會提供他們以方法和參考資料，使他們除農業經營者外，還去詢問農村工人。

社會民主黨同樣能夠克服第二種障礙，據吉爾先生的意見，妨礙了詢問農村工人的第二種障礙，能夠克服農村工人底智能的落後性。誠然，由於對膠州比對國民學校耗費更多金錢的那種愛國主義，這種



落後性無疑是存在着的，但我們的同志們在某些地方是可以指出一些農村工人能夠給社會政治家這般先生們敘述出一切的真理。自然，人們不能希望德國的社會政治家們，當問題涉及研究工人狀況時，要他們和勞動者的組織發生關係。誠然，做這種事情的那些人，如沙克斯在屠林根、海爾克勒在亞爾薩斯獲得了豐富的科學材料，但他們一定是在秘密中做的：這是沒有地位和聲望的青年人。另一方面在德國領導純理論的社會政策的，有深謀遠慮的機要顧問先生，他們任何一個人不會要求在某處地方在上流社會以外來研究工人底狀況。

但如果他們關於工人底狀況不願屈就來詢問工人，那末他們可以不降低自己的身分去詢問那些他們的利益和工人底利益不發生直接衝突的人。請想一想，兒童勞動是否妨礙上學，教師們對這一問題比兒童底剝削者提出了更有資格的答覆，關於飲食和住宅底滿足及關於工作底疲勞程度，農村醫生比農業經營者能提供更正確的報道；最後除學校教師和醫生外，在農村中還有極忠實於自己職務的僧侶，最低限度，從他們的某些人中比從企業家自己當中可以希望得到更公正的回答。

如果問題一開始就是關於企業家，而不是關於工人，如果調查是以證明前者底貧困境況並以提供辦法來改善這種狀況為目的，那末社會政策學會底此種行動就有意義。

在修改各種結果時，凱爾格爾博士非常了解這一點並且做出結論：“農業的工人問題，據我的意見，可以歸結到如何開導農村工人，尤其在普魯士東部，願意在家鄉受僱於本地的土地所有者？”

“我願意首先以問題底這樣提法，來表明農業的工人問題，主要是從僱主底立場，而不是從工人自身底立場來說是存在的；除少數的例外，農村工人底物質狀況，無論他們屬於哪一個範疇，在整個德國

並且在最近兩三年來表現出不斷改善的趨勢。這樣看來，關於農村工人的問題，不需要去找尋各種辦法來提高工人底經濟狀況。”（“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一卷，第二一七頁）

因而凱爾格爾所提議的，唯一的立法方法就在於加強對破壞契約的懲罰。這就是關於農業工人狀況底德國科學調查底結果。然而在這個不完備的調查中，無論怎樣素樸地粉飾事實，無論怎樣避免那種不可能染以薔薇顏色的事實，希望看一看事實的人，總可以找出充分事實，指出甚至單從衛生觀點來說，對於保護農村工人階級，都有採取堅決手段的必要。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說，自然不僅要關心預防勞動人口底退化，而且要關心提高他的智力和德性，使其能夠掌握經濟運動的領導權。

從深信農村工人地位很低，深信農村工人對自身狀況問題不能置答出發的，並得出結論說農村工人的情況非不美滿，而一切方法用來改善他的地位都是多餘的那種社會政策，早已被人從社會主義的觀點駁倒了。

保護工人的法律中最重要，是以保護年青一代為目的的那些法律，其實一切社會運動在於為我們的兒孫謀利益較甚於為我們自己。

兒童從事生產並不是資本主義底特徵。自有人類以來他們就已從事生產，也許，更早些，因為野獸在牠尚未成長以前就開始給自己尋找食物。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一般勞動尤其對兒童勞動予以特殊的和不利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家內勞作底地位上代之以供企業家使用的僱傭勞動，兒童從勞作的父母底幫手變為他們的競爭者，使精神和身體發展的各種活動底形形色色的更換代之以使智力和體力疲弱的單調生活，半遊戲的工作代之以疲憊的勞動。這些特徵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各種僱傭勞動所固有的，但它們特別明顯地

表現在兒童勞動領域內，兒童比成年人更不堅強，同時對於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影響更易感受，其結果影響他們的一生。

起初資本主義剝削兒童的破壞作用只表現在大工業內，但這種破壞作用在手工業和在農業內很快就成爲顯著的現象：在這些領域內大生產由於分工而創造出許多簡單的，容易的操作，這些操作，顯然很容易由兒童來完成，於是這些賤價的沒有反抗的勞動力就被使用來做這些操作。

但是無論在工業內或在農業內，兒童底僱傭勞動並不限於大生產；恰恰相反，兒童底僱傭勞動往往用作維持小生產的一種手段，供給小生產以賤價的勞動力。農村逃亡愈是發展，在農村內成年的工人愈少，則吸引兒童作僱傭勞動的需要亦愈有力。

但是兒童僱傭勞動在農業內不會帶來有害的結果，最低限度社會政策學會所詢問的企業家們是這樣相信的。可是有許多人則抱着另一種意見。誠然，田間工作是在露天中進行的並且兒童底工作往往很輕便——如拾集石塊，採摘忽布之類。但在僱傭勞動制下總是需要勞力之極度緊張，勞動之極大的強度和持久性，同時需要工作盡可能的一樣，因爲每一次從這一工作轉到別一工作就伴着時間底損失，且往往發生監督底困難。最容易的及在某種限度以內有益於健康的勞動，如果不斷地繼續下去超過一定限度就成爲有害的勞動。

存在於工業內的夜間勞動，在農業內就用不着耽心，但是兒童夜間休息時間底縮短，恰好在農業內却是最常見的事；農業內的勞作，尤其在夏季（冬季照料牲畜）開始得特別早而完得很晚。如柯蘭德、阿干德敘述到（波森省的里沙區內）從事田間勞作的兒童從早上四點鐘到上學爲止；然後他們到學校去，隨後又工作到黃昏時候（“德國兒童義務教育”檔案〔Die Erwerbsthätigkeit schulpflichtigen Kinder im Deutschen Reiche, Brauns, Archiv〕,第十二卷,第四一三頁）。

布魯格地方農村教師，拉威爾博士關於這種情形說道：“農業的工作對於兒童可能是有害的，就因為農業工作縮短必要的夜間休息時間。僱主們，同樣許多父母們，往往不考慮到睡眠對於兒童是怎樣地必要。人們在早上四五點鐘就叫醒十歲到十五歲的兒童，在晚間九點鐘或比這更晚的時候才放他們去睡覺：這是一種極有害於兒童發育的一種暴行。保護勞動應當禁止未滿十五歲的兒童在早上七點鐘以前晚上七點鐘以後工作；午飯應當保證有兩點鐘休息。要使這種規則達到目的，這種規則應當推廣到學校和家庭工業方面，並且學校的功課應當在這個時間內進行”（“國際大會關於工人階級對農業關係的決議”載“瑞士經濟與社會政治集刊”〔Die Beschlüsse des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es für Arbeiterschutz in Bezug auf die Landwirtschaft〕，〔Schweizer Blätter für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第六卷，第二六九〔I〕）。

不僅勞動底過度持續、緊張及單調有害於兒童的身體，就是在過早的年齡內一切正規的勞動，也有害於兒童的身體。任何一個有理智的經營者都不會用小馬來駕運貨的大車，但同時在農業內常常強令六歲的兒童來作僱傭勞動。阿干德敘述波森的一個學校，那裏有五十五個學生的一班，其中只有兩人不作農業勞動：二十人替別人勞作，父母的家內留下了六歲——二人，七歲——一人，八歲——兩人，九歲——三人，其餘的都是十歲及十歲以上的兒童（見同書，第四一四頁）。這樣六歲的工作者被註定每天勞動在十二小時以上，從家到工作地來回的路還不算，而在農村道路往往是很長的。在農村中剝削兒童時會發展着何等令人憎惡的條件，阿干爾特政府對保護兒童所頒佈的如下的決定就指示出，但就是這些決定許可的情形也是十分可恥的：兒童從八歲起才可以整天勞作，年輕一點的兒童就做這時間底一半或三分之二時間的工作……工作日被規定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六

點，中飯時有兩點鐘的休息。如果在工作之後須要步行，那末工作應當這樣完結，以便歸家至遲不過八點鐘。在用大車送兒童時避免裝載過多並且要照顧到，使兒童不致跌出去。早晨上課前不應勞作，熱天僱主應照顧到充分的飲料（見阿干德引自同書第四二三頁）。

阿干爾特政府底處置，大概是爲我國製糖工廠底甜菜種植場上的工作條件所引起的。西倍爾這樣敘述這些條件：“有些工作專是使用兒童：例如拔出甜菜，即是說拔除小的無用的甜菜。人們可以想像得到，從六歲到十四歲的兒童，繼續坐上十二——十八小時，在地上彎腰曲背，彎曲到這樣地步，血液都往頭上流。成年人都不能支持這樣的狀態到幾十分鐘；如果兒童到一周工作完畢由於坐在潮濕地上而失了常態並完全病倒，那有什麼奇怪的哩。學校對於這種工作，還放幾天假，這幾天假期叫作‘甜菜休假’。有人從邁爾慈堡區寫給‘普魯士學校校刊’的通信說：‘這些假日對於學校真是不幸：半裸體的兒童整天整星期匍匐在甜菜種植地上，在兩性在一道的時候，是非羞惡底感覺全被破壞了，他們轉回學校以後已是疲憊、愚鈍、健忘、低能到這樣程度，開始各種精神的刺激和鼓勵學習，都是無效的。這些兒童的面孔浮腫，目光遲鈍，皮膚因太陽熱力而開裂，兩手因在地下繼續挖掘而破裂，污泥透入傷處和毛孔，就是用肥皂洗過幾次的手也不會變白。四肢繼續匍匐的結果脊椎骨在起立和坐臥時就很難伸直。’如果在某處地方兒童人數不够，那末地主們就僱代理人並派他們到附近的地區去招尋兒童，並且除按僱到一個兒童給予五至十蒲費林的日薪之外，還付給他們工資。此種招尋帶有誘惑和欺騙，答應兒童有檸檬水、點心和啤酒，然後把他們裝到馬車上，前面有一羣樂隊，把他們送到指定的鄉村。兒童一日的工資達到五〇或八〇蒲費林，這是在慘無人道的極長的工作時間之下，——要從早上五點鐘繼續到晚上九點鐘。甚至在節日他們也要工作！如果兒童是從別的村落招來

和誘來的，那末他們要到夜間十一點鐘才能回家，可以想像到這是怎樣的情況”（見西倍爾 [M. Schippel]：“德國製糖業及其補助” [Die deutsche Zuckerindustrie und ihre Subventionirten]，第二二，二三頁）。

然而凱爾格爾說些什麼呢？“農業工人問題只是從僱主的立場說來才存在。”爲要將調查表呈報阿干爾特政府，社會政策學會是有足夠的經費和補助金的。那些機要顧問先生們是可以向社會政策學會請教的！但我們對調查表並不公允。在調查表的某幾處我們發見一些激烈的話反對兒童勞動。例如維貝爾報道說：“從約干涅斯堡區寄來的一個報告中證實，牧童的勞動時間太長並引起德性的敗壞。”（“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三卷，第八五頁）

從拉比·維拉區寄來的一般報告，指出牧童底生活方式在農民中是明顯的，但很難廢除的，引導兒童墮落的濫費（同書，第一二八頁）。這和阿干德所敘述的完全一致：“牧放牲畜對兒童造成極大的損害，波美拉尼亞的教師們做出了這方面的數字材料。”在那裏對“兒童底農業工作”這一題目有五十八個報告者曾斷定，在三、二七五個兒童中，對二、三一〇個兒童德性敗壞底可能性曾表示憂慮，對三一二個兒童則表示懷疑，而對其餘六五三個兒童，這種可能性就被否定了，但除這些以外曾表示出對兒童健康的憂慮。

郭爾慈也說到“牧童生活方式底道德的和經濟的損害”（“兒童勞動階級” [Die Kindliche Arbeiterklasse]，第二六四頁）。

我們的詩人給我們描寫了在詩意境界中的牧童，誠然在古代牧童生活，雖有它的優點和魔力，當時必須把大羣牲畜驅入森林和無人居住的地方，把牲畜集聚在一個地方並保護牲畜免於一切可能的危險。這種情形發展了能力、機警、勇敢、堅忍及明敏。現時牧童的責任則要整天伴着一對牲畜蹲在森林中的草地上並且關心到使牲畜不

月十五日起到十一月半不去上學，爲的是在鄰近地方去做田間工作。累浪斯堡是主要的市場，在春天人們把成百的兒童從提羅爾及佛拉爾堡趕到那裏去，爲的是到夏天把他們賣給肯出高價的人。農村牧師就是幹這種運送軟弱的人的商品的勾當的。

容易想像到，這些不幸的，完全外來的兒童受着何等的待遇。農民的“伯爾尼農業日報”在一篇論文中（一八九六年九月一日“論農業的工人問題”）說道：“農村中缺乏工人，大部分應歸咎於對僱工，尤其是對童僕待遇太惡劣。”

把兒童交給農民使之“對不幸的被棄的兒童負監護之責”，就和在某個時期把兒童出賣是一樣的不人道。“新時代報”（第十七卷，第一九七頁）的一個有權威的撰稿人用魯斯提庫斯這個筆名，報道在瑞士有同樣的制度：這種制度在德國也很顯著。兒童受虐待在農民環境影響之下甚至在教育機關內究如何發展，這在剛才提到的魯斯提庫斯的論文中就有一個顯著的實例證明（第二〇四頁）：“對約爾德的刑事事件（Straf und Sexualmissbrauch von Pflegebefohlenen. 一八九八年一月）調查底偶然結果，發現在貝爾尼高級農業教育學校內對女子施以令人憤慨的待遇。在貝爾尼的凱爾查茲學校的女生在夏天爲要餵牲畜飼料，一定要在四點至四點半鐘起床。然後他們一定要清洗廄舍，收拾糞料，汲出糞汁，在山坡上代替用重犁掘地的工作，在山谷內要清掃苔草叢生的凹坑，掘鬆土地以及諸如此類的工作。

所有這些超出少年能力以上的工作，據貝爾尼地方極爲流行的意見看來，大部分並不屬於婦女工作並且在一切有健全思想的人看來也是一種殘忍，無論人們怎樣說‘勞動神聖’，和聖經中祈禱與格言一致要把‘罪惡底萌芽’連根拔去。”

被賣給農民的兒童，在家長制關係下，他們是農民家庭底成員，他們的處境還勉強過得去，離去故鄉的兒童境況，就壞得多，他們是

拐騙人口底匪徒首領底奴隸，他們在他的殘酷管束之下到處漂泊。在別的情況下我們再回頭來說流浪及一般外出工作底方式，現在我們只指出，就連凱爾格爾先生都不得不說：“最年幼的兒童應當無條件地受到保障以防遭受危險，這不僅就道德方面來說，就是在甜菜種植地上勞動底過度緊張的時候，就纖弱的身體底健康方面來說都應當如此，因為這是去到薩克森工作底必然結果。”（“薩克森遊記”〔Die Sachsehgängerei〕，第二〇七頁）

由於這一類事實，不僅理論家，就是熟悉農業狀況的實際家都極力為農業中兒童底法律保護來辯護，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例如邁耶爾博士在蘇黎支大會上曾宣稱勞動底保護：“報告者似乎以為田間工作有益於兒童的健康。我以為，他從來沒有見過北德意志、波希米亞、匈牙利，極大的甜菜和馬鈴薯種植地。他從來沒有見過，在秋天，在潮濕和寒冷之中兒童從很早的早晨到很晚的夜間匍匐在地上，採集甜菜和挖掘馬鈴薯。這樣的兒童比你們所關心的工廠的兒童多得多。”

實際上，一八八二年在德國從事僱傭勞動的，未滿十四歲的兒童共計四〇六、四七四人，其中一四三、二六二人從事於工業、礦山業及建築業，而二九一、二八九人，即是一倍以上，則在農業內。在一八九五年未滿十四歲及未滿十二歲的兒童才第一次分開計算。從事僱傭勞動的，未滿十四歲的全部兒童共有二一四、九五四人，其中一三五、一二五人在農業內。未滿十二歲的兒童三二、二九八人中在農業方面的不多不少恰有三〇、六〇四人。所有這些數字可以當作最低限度的數字，事實上工作的兒童人數還要多——總在一百萬以上。郭爾慈博士以為單是牧童人數從易比河到東部就有五萬至十萬之多（“農業工人階級”，第二六五頁）。但是無論如何正式統計的這些數字指出兒童底工業與農業工作之間的關係。這樣看來，在農業內剝削兒童更



加普遍，因此保護他們真有必要。

兒童勞動問題並不這樣簡單；伯恩斯坦緊接蘇黎支大會以後，在他的一篇有趣的論文“論社會主義與青年工業工人”（Sozialismus und die gewerbliche Arbeit der Jugend）（載“新時代”，第十六卷，第一期，第三七頁）中，就指出這一點。兒童生產的體力的工作自身就含有許多重要的教育的動機。在發育時期沒有什麼再比單調的智力工作有害的了。充分的體力活動是必要的。誰在這個年齡內不學習體力勞動，他以後就很難習慣於這種勞動，他在工作中就永遠不會得到從少年時代工作的人所具有的那種熟練和那種習慣。但在生產的工作中還有重要的道德的因素：兒童生長為社會底寄生蟲抑或生長為社會的有用的成員，絕不是沒有區別。有產者底子弟，在性格形成底幾年之內不事勞作，如果他將來不得不驟然自立謀生，他往往是軟弱的和無氣節的，是卑鄙的阿諛者和寄食者，他要靠別人底庇護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來替自己開闢道路。相反的，無產者必須有效果地工作並且關心自己，有時還關心別人，很早就激起責任感，而且也認識自己的力量。

社會主義底偉大空想家，同時又是偉大教育家，他們想很早誘導青年來工作。約翰·貝萊爾斯和傅立葉使四五歲的兒童做有益的工作。羅伯特·歐文則使八歲的兒童做工作。

就這一意圖說，他們和工業資本家是相似的。但是在社會空想家底未來社會內作為人類地位提高和改善的那種手段，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中就成為勞動的無產階級底最可怕的退化底原因之一。沒有必要引用這種情況底證明——它們從歐文時代起已被引用過無數次了。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站在進退兩難的前面：讓青年受資本底支配並走上未來勞動者滅亡的道路，而整個工人階級也和他同歸於盡，或者使青年失去生產工作並以此使他的性格和工作能力底養成

遭受嚴重的危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一矛盾底完全解決是不可能的，正如人民大眾底完滿的教育一樣不可能。當資本主義社會的忠誠的和聰明的擁護者戰勝工廠主們底眼前利益的時候，就以妥協爲滿足：資本主義社會從教育計劃中完全刪除一定的年齡（十二至十四歲）的生產工作，以便在這以後宣告正在成長的無產階級底教育已經完成，並任其專做“生產工作”，即任其受資本主義的剝削。

社會民主黨在這一方面在自己的實際勝利中差不多完全站在上述妥協底基礎上。社會民主黨和苦心焦慮的資產階級不同之點，就在於它設法純機械地提高兒童勞動底限制年齡。但是在這一方面它走得愈遠，它愈是接近於使青年只在成年時候才有可能開始生產工作的目的，它就愈加不能對正在成長的一代性格和工作能力形成的影響給予生產工作；避開斯齊爾拉，却跌到哈爾布德方面。<sup>①</sup>

把完全禁止兒童勞動底限定年齡提高到比現在已達到的標準——十四歲以上，不見得是爲工人階級本身的利益。限定年齡被規定得愈低，則對於勞動兒童底保護更應嚴格地加以規定，“兒童”這一觀念應當就最大限度而言，即是說到十八歲爲止。在現時，一方面勞動底強度，另一方面工人對社會活動及教育的需要這樣提高了的時候，並且到處發出對成年人八小時工作日底要求的時候，我們就看出這樣的工作日對於少年是太長了。我們寧可要蘇黎支大會替少年工人要求四小時的工作日而不必將禁止各種工業工作底限定年齡提高到十五歲。現時在英國紡織工業中所施行的：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只做半班工，即一天做四點半鐘工的制度，應當施行於十八歲以下的青年。

---

① 希臘神話：斯齊爾拉與哈爾布德是在意大利與西西里間，對於航海者極爲危險的海峽對岸的兩個懸岩；在古代希臘人的觀念中被人格化了的兩個怪物，消滅企圖經過海峽的航海者。——譯者

兒童勞動底限定年齡愈低，則在這些生產部門內使用兒童和青年底勞動，應當無條件地加以禁止。生產部門及工作種類底立法的區分應當加以嚴格的實施，工作底衛生條件應當加以嚴格的規劃，工場的監督應當更加完備，監督者爲數更多，地位更獨立，尤其重要的，是在檢查機關內除技師和實際工作人外，醫生和教育家亦應有發言權。

不言而喻的，這不僅就工廠而言應如此，就是就手工業和家庭工業而言，尤應如此，在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內兒童勞動所處的地位更爲惡劣。

#### 四 學 校

想在現代社會內盡可能合理地處置兒童勞動的願望，如果想達到目的，就不應當以工作底一些地區爲限；它必須將學校包括在自己的行動範圍以內，使學習和工作彼此聯系，使它們互相適應。這裏就很明顯地表現出社會民主黨與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之間的鴻溝；這些政黨中底每一個都希望限制資本主義的剝削；但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爲的是要阻礙社會底發展，而社會民主黨則是要加速社會底發展；後者爲的是要使無產者即使不回復到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也是要回復到小資產階級的中世紀底思想方式，而前者則是要提高生活水平和思想方式到較高的階段，使無產者能够越出資本主義社會底界限以外。爲此社會民主黨十分需要學校底改革，而基督教社會主義則十分痛恨這種改革。

在任何場合我們都不屬於那些過分誇大學校意義的人。有一種見解，以爲學校屬誰所有，則青年以及青年的將來都一同爲他所有，沒有比這種見解更錯誤的了。

訓練我們的不單是一個學校，而是全部生活，學校只是生活底極

小一部分。在學校的知識和生活底知識發生衝突的地方，總是後者制勝前者；學校無論怎樣敬神和信仰宗教，如果生活教人以唯物主義和民主主義，學校就決不會教出偽君子 and 阿諛者。在學校底知識和生活底知識發生衝突的地方，它們只是有害於兒童，空費時間並因一切教育的影響而達到完全相反的結果；學校當然支持統治階級底政權，但它對統治階級沒有多大用處。

學校無論怎樣好，它沒有力量提高人類底智力的和道德的水平，如果整個環境對此無所裨益的話。社會改造不能從學校出發。每一種社會形態，每一個階級，都需要特殊的教育和訓練方式，沒有這種特殊教育和訓練方式，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在這種關係內學校底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絕不是無差別的東西。

我們沒有根據斷言，現代一個普通人，通過自己的學校知識，在智力和德行方面都超越自然底兒子。首先我們覺得，“荷馬史詩”或“埃丹”底詩人和大衆不僅在審美的感覺上，而且在道德的力量和智能上，對自然與人間底理解上都超出現代民衆詩底創作者之上。爲了要使智能和精神發揚和高尙，爲了要獲得知識，他們並不需要學校。幾千年來在一個方向內進行的公社底社會生活教他們以所需的一切；要使每個普通人得到全部實際的經驗及社會底一切知識，只需口頭相告和個人的觀察就完全够了。

現在，在國際交際時代，在不斷革命，——不僅政治的，而且主要是技術的和商業的革命——時代，在社會生活中常見突變和動搖，誰要是只以口頭相告和個人觀察爲指導，他在這些變動之前就毫無辦法。讀書、寫字、計算、自然科學底原理、地理學、統計學以及政治史——對於每一個要在社會生產中辨別方向的人是無條件地必要的。這些學校知識，尤其是在現在教授這種知識的形式內，其本身需要了解 and 正確的觀點，較之在古代普遍靠廣場上口頭傳述和個人觀

察的知識爲少。學校知識是實物教學底最壞代用物，而普通的國民讀物，廉價的格言報以及無價值的文學不是引人入勝，而是使人愚鈍，那時自然界底觀察，同自然界進行鬥爭，來自遠方的客人底陳述就不斷地刺激智力並增加認識。但反正一樣，如果實物教學用學校的學科來代替並不是以文明人精神和道德優於自然人爲先決條件，學校學科代替實物教學對於文明人爲完成其任務，總是非常必要的。文明人底生活在時間和空間內這樣無止境地擴大，以致個人無論他稟賦和工作能力怎樣豐富，要靠個人觀察來把握這種生活總是不可能；個人觀察無論怎樣重要，它只包括全部生活之一部分，其餘部分只有靠學校的學科才能知道和學到。

在現時無論是個人，無論是整個民族，沒有一定的學校教育，就不能在競爭的場合中佔上風和滿足現代文化底要求。社會愈發展，現時國民學校所教的就愈感不足；必須改善和擴大國民學校，在十四歲以後的幾年間要繼續實施普及教育。

在調整兒童勞動底延續時間，除注意衛生的要求外，還要注意到教育的要求。在十四歲以後的兒童勞動也應當仍在使正常的有效果的就學容易辦到的限度以內。

但學校不僅爲教學服務，而且也爲培養服務。

當社會生活已成爲公共的時候，這種社會生活就提供了對於社會目的所必要的一切教育因素；在遊戲和輕便工作中平等的同輩們底團體，成年人底範例，參加在他們的事業裏面，老年人底教訓，這些對於社會德性底發展是足夠的。在現時對於兒童，尤其在城市內，個人的家庭的生活，佔據了公衆生活底地位。現在不是社會教育兒童，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是父母教育兒童；但是父母們正是缺乏在社會中的生活，在平等的人們當中的生活所具有的那些教育的因素；兒童從父母學到的頂多是服從，而不是學到友愛、思想一致和獨立性。有

幾多個父母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兒童呢？強制的工作完全霸佔着他們。家庭不僅剝奪掉兒童的平等社交，而且特別剝奪掉少年的有益作業；現代的家庭同社會隔離、同工作隔離。如果兒童不去作僱傭工作，那他們就喪失在勞動中和合作中事例底教育意義。學校在這裏就出現了；它把孤立的兒童集合攏來並平等地給予他們一個有力的培養工具，同時在師長指導下給予他們有計劃的，仔細思考的作業；但要使這些作業發生教育的影響，這些作業就應當是多方面的；兒童不僅應當充滿死板的學校知識，而且要體驗人世間底活潑的感情；教師不僅以教員的身分接近他們，而且在遊戲和工作中，即是說在與教學和遊戲不同，而能傳授立刻就可看見的結果的這類活動中，應當和兒童接近；這種活動對於兒童有明顯的目的，並且由所做的活動中得到的愉快可以鼓起兒童們創作底興趣和自覺。

對於較為成熟的青年，學校應當是生產工作底補充，但生產工作在上學底頭幾年也不應當缺少，這倒不是從經濟上着想，而是從教育上着想。

對於僱傭勞動被禁止的那種年齡，教學與生產工作結合，學校與實習工場及實驗農場結合是必要的，在這些地方教以各種手工業及植物栽培底簡單實例並作實習，並且限定的年齡愈高，則這種結合就愈加必要。

我們看見，兒童勞動問題自身包含着複雜的問題；單純的機械的提高僱傭工作底限定年齡，是很少有的。

當我們從工業轉到農業的時候，兒童勞動問題就具有不同的形態。

在農業內兒童為習於勞動並為獲得必要的習慣而參加勞動，比在工業內更加必要。在工業內分工和機器把各個人底勞動歸結到既不需要體力，也不需要靈巧的不多的幾種簡單操作，不過訓練這些動

作要由無經驗的人來担任總是很困難。在農業內存在着許多不同的工作，需要注意力、靈巧，還常常需要體力以及抵抗氣候影響的堅定性，從早歲起就要習於所有這些條件。現在城市的工人就不適宜於做農業的工作。

在農村內就沒有存在於城市內的那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在城市內禁止僱傭勞動就意味着幾乎完全禁止生產的勞動，禁止資本主義的剝削，就等於禁止發展兒童的工作能力，並使兒童受到對社會有益的活動底教育的影響。

現時在農村內每一個家庭經濟都和農業生產相聯系。僱傭工人在農村內部也料理自己的家務，如果他有家庭的話；兒童要工作不必受僱於外人；在這些條件下禁止僱傭勞動就意味着禁止資本主義的剝削。

如果在工業內禁止未滿十四歲的兒童勞動，那末在農業內就需要更早加以禁止。無論如何兒童外出營生凡未達成年都應加以禁止。外出營生特別常見的形式是流浪，即僱傭勞動底最令人憎惡和最敗壞德性的形式。

但是農村中兒童勞動問題，並沒有因這些禁止而得到解決：我們剛才指出，農村中在父母經營內的工作充分提供兒童活動的機會。父母往往濫用這些機會，使兒童担負過重勞動並使兒童疲憊；在手工業和農業內盡可能增加自己兒童底工作，是小經營賴以維持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農村內縮短學校教育底時間，這種強有力的意圖就證明着，這種辦法對於農民是怎樣地重要。無論如何不能對這種意圖讓步；在農村內，為農業本身的利益，學校教育底改善和擴大尤為必要。現代生產方式在工業內已使手的勞動簡單到極點。在農業內我們看見的不是這樣情形，農業極為複雜，它的工具完備，它的方法需要更多智力和細心。這樣看來，正是農業需要更有知識的勞動力；可是最

有知識的勞動力却很少到農業方面來，——它的最有才能的工作者都去到城市；在那個時候，城市以其報紙、聯合會、集會、博物館之類對於進一步的校外教育給予無數的鼓勵，——而在農村內殆難做到防止成年農民的極爲貧乏的學校知識消失。在農村內學校教育不僅十四歲以前就是十四歲以後，都極爲重要——這樣的教育，本身就可作爲進一步自修的一種鼓勵。

農作者需要兒童勞動；在農村內僱傭工人人數愈少，則農作人需要兒童勞動亦愈多。但是他也需要更高的教育。如果代替倫理的、精神的以及對科學無用的宗教教育，而授以那些科學底原理（化學、機械學、植物學、動物學、地理學）的教育，這些科學對農業的合理經營是需要的，並且這些科學的知識能使農業經營者在必要的時候便於繼續學習，那末，在不延長學校教育底時間，甚至縮短這時間到一定的限度，亦可以得到更高的教育。

但正是那些以拯救農業爲己任的政黨，在情況對此有利的地方就企圖縮短學校教育的期間，並企圖以國民學校內佔優勢的那種宗教教育來排擠極爲貧乏的現實的知識。

現存政黨中只有受國家支助的政黨，才爲自己一時的、反文化的利益而犧牲農業底成就。

在奧地利教皇政權擁護者在這方面的行動最爲可惡。但在德意志，甚至在新教徒的教區內，也可看到同樣的情形。

例如，居林根的農村牧師寫了“論農民底信仰與道德”一書，在這本書內說到新制學校對於農民的影響，他很惡毒地批評道：“現在，讀書簡直把人帶進瘋人院內；可是這對於農民是很少有的事，因爲農民還是習慣於在學校讀書。我以爲，這一方面有最大的危險威脅着，人們很少注意到這種危險，這就是：讀書當作教育手段，一部分是多餘的，而主要是，現代學校剝奪農民還在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練習勞動



的可能性，尤其重要的是，奪去對勞動的愛好，勞動的快樂及對自己境況的滿意。一切公正的觀察者都明白，男孩和女孩，從初級小學開始至補習學校為止，即從六歲至十四歲，爲了念書而避開田間工作，他們被各種各樣的科學所填滿並成爲一知半解的人，他們隨後對田間工作，對照料牲畜以及一般地對農業都不感興趣。我常常觀察到，正是勤勞而有能力的女生不願離開學校，並且暗中抱怨幫助父母是她們應盡的本分。十分明顯的，學校教育妨礙正常的，即是早些習慣於農業工作，學校教育還往往鼓勵易於感動的兒童對兒童讀物和國民讀物中所描寫的悠閒的、富裕的和十分快樂的生活，對其他階級底所謂“幸福”懷着熱情的渴慕。結局教育底盲目狂信者就會很可怕地了解，“知識”在農村內有很黑暗的相反的方面。目前一切迅速地發生——這也就是得出的結論，如果不滿意的農民從不滿意轉到自由思想及工人運動，那末社會民主黨就完全合他的“口味”。一個年老而有經驗的村長說：“這種情形現在是懸崖的”，他又加一句說：“從前人們不會想到這樣的事，而是生活是怎樣，他們就怎樣生活，並以此種生活爲滿足，現在他們拿自己的境況和別人的境況作比較並且問自己：‘爲什麼他們應當比我們好些呢？’”

不能再有比這說得更可恥的了：因爲更高的教育會使人們成爲社會民主黨人，那末讓人民仍舊在無知無識的狀態吧。無知無識的農民不及有知識的農民能夠進行合理的經營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富裕的農民，而是恭順的農民，“頌詩和教理問答萬歲，打倒農村學校內深深印入農村兒童頭腦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教育底斷片。”我們的農民的朋友得意洋洋地說到農民對於學校興趣底減退，這是不足爲奇的。（塔林根農村牧師著“論農民底信仰與道德”，第二四、二六頁，參看“教育的欺騙”〔Bildungsschwindel〕，第九七頁）。

在社會政策學會關於農村工人境況的調查表中威斯巴登區的一個報告者也有同樣地說法：“如果學校改善底結果提高了農業工人底教育，那末他們的粗暴性也就增加”（別的報告者則斷定相反）。這種粗暴性是多讀報紙底結果。

從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同一區域寄來的通訊說，在七十年代人們都很熱心去上的農村補習學校，現在去的人就少得多了（“德國農村工人狀況”，第二卷，第五四、六一、六三頁）。

普魯士農村補習教育底概況（見下表）指出在農村補習教育領域內還要做多少工作。

	農村補習學校的數目	經費(馬克)	學生數	從十四歲到十八歲農民兒童數
東普魯士	—	—	—	64,000
西普魯士	8	1,263	91	47,000
布蘭金堡	1	50	26	65,000
波美拉尼亞	3	150	25	45,000
波茲南	21	1,441	213	57,000
西里西亞	33	5,207	910	131,000
薩克森	41	4,932	735	65,000
斯勒茲維格	50	5,027	394	36,000
哈洛維爾	133	14,753	1,982	70,000
威斯特發里尼	8	1,430	138	77,000
黑森納沙	320	27,812	4,518	48,000
萊茵省	206	26,132	3,791	121,000
霍亨索倫	51	8,519	504	2,600
總計	875	91,808	13,317	328,600

所有補習學校的總費用為九一、八〇八馬克，其中國家撥付三

三、一四七馬克。價值差不多和兩發砲彈相等。同時又投出巨額金錢“爲救濟農業之用”。不待說，對於提高地租，補習學校沒有什麼用處。

補習學校使農民面臨困難的絕境：農民愈是無知無識，則他的經營愈不合理，他愈不能採用在他的小企業內可以辦得到的那些技術的改良。但是他的教育愈高，則他愈強烈地感覺到迫使他作力不勝任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慾望降低的生存鬥爭，他亦愈迅速地拋棄自己的職業。

這種情形對於那些要想保全現在的農民的生產方式，當作現社會底支柱的人，是很不愉快的，對於社會進步底擁護者，倒是一件快事。如果農民的經營與更廣泛的合理的教育產生出的文化生活底要求不相容，那末這是前者（農民的經營）的不是，而非後者（文化生活）的不是。學校教育底改善應當引起農民經營更合理的處理，在它還能改善的地方；在情況不容許這樣做的地方，更高的教育必然會刺激人們放下農民的經營。在前一場合同在後一場合一樣，教育是經濟進步底因素。

學校教育還有好的一面。在沒有保護兒童的法律的地方，學校教育直到現在是最好的手段，用以反對兒童在自己的家庭內在農業內以及在家庭工業內的過重的負擔，立法要避免干涉家庭底內部生活，則這種學校教育更其有價值。爲限制農村內兒童底僱傭勞動、義務教育在兒童勞動完全被禁止的時候是必要的。在工作者散處在極大地面上而且相距很遠的情形之下，要監督保護勞動的法律底實施，在農業內比在工業內更加困難。義務教育底毅然決然的施行，就會將兒童僱傭勞動縮減到這樣的範圍，那時兒童僱傭勞動就不會更有利了。

顯然，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的保護農業勞動法，即一八七四年英國的“農業兒童條例”（Agricultural Children Act），只是間接地，通

過義務教育來限制兒童勞動。根據這個法律，不滿八歲的兒童一般地不能從事農業。從八歲至十歲在一年上學二五〇次的條件下可以從事農業；從十歲至十二歲只要上學一五〇次。各種外出工作都被禁止。替自己豫留地步的這些限制無論怎樣有限，它們總使未滿十二歲兒童底工作減少至最低限度。

初級學校同補習學校一樣，在農村內比在城市內有更大的意義。保護正在工作的兒童，這種意圖首先應當歸功於這種學校。

禁止未滿十四歲的兒童作僱傭勞動，沒有例外的禁止一切兒童和少年從夜間七時至早晨七時的工作，禁止少年們底外出工作，禁止以工業目的為動機而排除義務教育，義務補習學校底足夠數量——這就是社會民主黨關於兒童農業勞動的社會政策中提出的要求。

## 五 婦女勞動

關於婦女勞動，可以簡略地說一說。

在農業內婦女勞動的發展並不和工業內的發展平行地進行；這裏我們看見明顯的例子，兩性之間分工如何變化，婦女勞動與男子勞動兩者之間界限如何經常地移動，因此把這些界限認為是自然的，即是說對社會制度的關係而言是永久的，那是如何地不適當。

農事在其發生時專是婦女分內的事，男子則從事於狩獵和牧畜。隨着農業對於社會的意義底增加，婦女對於家庭和社會——婦女是家庭和社會的主要的養育者——底意義也增長了（參看庫洛夫極有趣味的論文“母權制底經濟基礎”，載“新時代”，第十五卷，第一〇六頁）。當農事已使狩獵和牧畜失去重要性的時候，男子就必須從事於農耕。人口底定居和農業底發展平行地發展起來；簡陋的帳棚，代之以擁有頗大家業的堅固而寬大的家屋。

家內工作增多了並且很快地完全吞嚥了婦女，而純粹婦女的技術——農事（希臘人和羅馬人把農事底發明歸功於女神不是沒有理由的），就成了男子底財產。

黎佩爾特問自己，爲什麼在猶太神話裏農事一開始歸功於男子：亞丹、凱恩、勞永呢？他以爲猶太人未曾經過農事發明底階段，而是在征服了哈拉的時候，在很高的發展階段上摹仿來的（見黎佩爾特〔Lippert〕：“文化史”，第四四七頁）。反之，隨着野獸絕了跡，保護牲畜以免野獸侵害，以及在廄內飼養牲畜的時期愈長，牲畜變爲家畜動物，牧畜業就開始過渡到婦女手裏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重新將婦女趕到田裏，一方面造成了多數的農村無產階級，他們的報酬太低，以致靠一個男子的工資難以維持家庭，要增加工資就得把婦女和兒童吸引來工作，這當然又更加降低男子底工資；另一方面，農民底境況更加惡化並使他們爲維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使自己的全部力氣及妻子兒女底力氣到最後的可能。

在農民生活得好的地方，婦女只限於家務，她只要料理家務就夠了。就是日工的妻子也是這樣。美洲雖然僱傭工人很缺乏，但婦女向來就不參加收穫。“在美洲農場經營者底見解和觀念看來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們妻子底地位。農場經營者家庭底婦女成員專一注重狹義的經濟，而粗笨的工作則誘諸男子去做……在美洲很少看見在田間工作的婦女，並且可以相信的，就是婦女都出身於移民底家庭”（柴林格：“北美洲農業競爭”，第一八〇頁）。

這個事實很難用統計數字來證明，因爲職業統計只是列舉出一定職業部門內的工作情況，而沒有指出它的種類。在一切場合內最有意思的，是在德國一八九五年農業工人男子爲三、二三九、六四六，婦女爲二、三八〇、一四八，而在合衆國一八九〇年時“農業工人”計有男子二、五五六、九五七，婦女四四七、一〇四，而單是工

人(其中有許多農業工人)男子爲一、八五八、五五八人，婦女只有五四、八一五人。

但是這種趨勢並不以美國爲限。在英國，由於僑民的關係，農業工人底狀況，在最近十年來，因工資增高及消費品價格降低，大體上已經改善了。農業內婦女勞動底減少和農村工人狀況底改善平行地進行着；通常取消婦女的田間工作證明勞動者地位底改善，我們已經引用的英國關於農業底貧困的最近調查報告(第三七頁)不只一次這樣說的。

在大不列顛(愛爾蘭除外)農業工人在一八七七年時計有：

	男 子	婦 女
	1,060,836	100,902
	873,480	46,250
減 少	187,356	54,652 <sup>①</sup>

男子的數量減少了百分之一八，婦女減少了百分之五四。

德意志農村工人的運命底改善並不顯著；但在這裏婦女底田間工作減少了。即如維貝爾從西普魯士寄來的通訊說：“有些地方婦女的僱傭勞動已完全絕跡；自由日工底妻子差不多在各處都很少和他們一同工作；婦女勞動，顯然是減少了。”

從波美拉尼亞來的通訊說：“婦女勞動之減少，和一八四九年比較是很明顯的。”(“德國農村工人狀況”，第四九、一八五、二〇二、三七七頁)。這樣看來，這裏是向着另一個方向發展和工業內完全不同，若注意到農村內私有家庭經濟底巨大意義，私有家庭經濟在這裏佔據着婦女比在城市內完全不同，那這種情形就十分顯然了。

只有一方面使家務減少到極度，他方面不得不去從事過度勞動

---

① 原文爲54,697似誤。——譯者

的赤貧才把日工或小農底妻子趕到田裏作僱傭勞動。顯然，英國的農場經營者指出對兒童更加關心，僱傭勞動不許他們參加僱傭勞動，這也成爲婦女勞動減少底原因之一。“義務教育使我們喪失了不僅兒童的，而且婦女的勞動，因爲婦女們要留在家內看顧小孩”（見卡布魯可夫：“農村工人問題”，第一〇二頁）。因爲農村內已婚婦女底僱傭勞動顯見得是正在消滅的現象，同時由於農村勞動者境況底改善，於是已婚婦女底僱傭勞動在一般的社會政策還十分有力足以引起這樣改善的地方，就不需要特殊的立法保護。

據我們所知，少女們底僱傭勞動，在其佔優勢的形態內，即以僕婢資格工作的形態內，也不需要特殊的限制辦法，即不推廣到所有僕役或整個農村工人階級的特殊限制辦法。

但是這樣的辦法用來保護從事外出工作的少女們則是必要的。

## 六 外出工作

英國的流浪制是外出工作底典型形態。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這樣地描寫這個制度：“外出工作隊由婦女及男女少年（從十三歲到十八歲，可是已滿十三歲的少年就被排除），以及男女兒童（從六歲至十三歲）十人乃至四十或五十人組成爲一隊。工作隊由隊長率領，至於工作隊的首領通常是普通的農村工人，這種人大部分是壞人、放蕩者、流浪者和酗酒之徒，但他們富於冒險精神和才幹……隊長從這個租地轉到別個租地，並剝削自己的工作隊一年中六個月乃至八個月。這一制度底黑暗面就是兒童及少年男女們底過度勞動，遠距離的轉移及工作隊員底德性敗壞。常常可以看見十三四歲的少女和自己同年的男隊工發生關係而懷妊，是數見不鮮的。供給工作隊人員的農村都變爲蘇丹士和哥摩拉士(Sadoms and Gomorrahs)並且私生子

比其餘各地多一倍”(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三章，第七二六——七二八頁)。

德國的外出工作底某些形式稍微好些。我們且聽一聽這位十分善意的證人，這位外出工作底熱烈讚揚者(這樣的熱烈，只有在一定的場合內才是可能的)凱爾格爾的話。

“外出工人多從窮苦的，在經濟上落後的區域去到甜菜生產的區域，尤其是去到薩克森做挖掘和收取甜菜的工作，因為地主們在附近找不到恭順而廉價的工人來做這類工作。這些工人是由募集人招募來的，這些募集人和英國流浪工作隊隊長極相類似。招募是在下等飯店中用各種各樣的奸猾的詭計去進行的。如果募集人和愚蠢的，很落後的人辦交涉，向他們證明他是官廳所許可的，然後他指示他們在契約上畫押，他最先僱用會說兩種語言(德國話和波蘭話)的心腹的人，要他在工人中間活動，向工人證明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契約是有利的，並且像領導者一樣，第一個在契約上簽字。不幸，在農村內有時也有會說波蘭話的居民，於是募集人就向人們發誓說待遇條件比契約中所明定的條件好得多”(“薩克森的農村季候工人”[Sachsen-gängerei]，第三一頁)。

這些募集人這樣招募了許多人以後，在工作時仍為監督人並利用機會繼續自己的敲詐行為。募集人用各種欺壓手段去剝削被他用契約欺騙的人們：“監督人因為享有優待就庇護商人，在分配工作時挑剔那些不願向他的商人購買貨物的工人並且指定他們去做不愉快的，報酬很壞的工作，這在實際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對流浪工人的危險還要增加，當監督人發放工資的時候，他簡單地扣取工資底一部分，要是在這種支付方法被廢除的地產內監督者就公開地申言，從他的工人底工資總額中給他一小部分利息是合法的，這種情形也是常有的。”在許多地方因為這種情形人們就廢除了這種工資支付的方法。



處在這樣主人底監督之下的工人，尤其是少女們“人數往往超過男子好幾倍”，並且這些少女們多半年紀很輕。在薩克森省的四個地產內凱爾格爾計算工人有三三七個是婦女，一五〇個是男子；前者之中百分之四八·三不滿二十歲，百分之三三·九則由二十歲至二十五歲，百分之八二·二不滿二十五歲，百分之九三·四不滿三十歲；可惜，凱爾格爾不會提到不滿十六歲的少女有多少；的確，即使他去問過，他也不會知道這件事；就連製糖工廠主也不會把自己事業的秘密洩漏給凱爾格爾先生。

一五〇個男子中有百分之三二不滿二十歲，百分之一九·三由二〇——二五歲，百分之七三·三不滿三十歲。

年輕的、獨身的、對一切陌生的少女們，就在這樣如募集人的嚴厲的道德家底指揮之下，成羣地和年輕小伙子們一道在世間漂泊。很顯然的，在這種情形下發展的條件，表現出和英國外出工作制有不祥的相似。

“他們陷入我國基督教愛國主義的地主們底地產後，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危險。工作繁重，工作日長得不近人情。我在契約上看到，在西部毫無例外地，工作到處都在早晨五點鐘開始，並繼續到晚間七點鐘，中間早餐有半點鐘休息，中飯有一點鐘，晚飯有半點鐘。除此以外，額外的工作到處都是事先說定的”，（第四一頁）。這樣看來，年輕女子被剝削總在十四小時以上。至於婦女們怎樣工作，馬克思對此曾指出：“農場經營者發現，婦女只有在男子支配之下才能很好地工作，但另一方面婦女和兒童，一旦他們竭其全力真正獻身於工作——傅立葉已經知道了這點——那時成年的男工就很狡猾，竭力節省自己的力氣”（“資本論”，第一卷，第七二七頁）。

工業剝削者從自己的工人盡可能榨取更多的勞動，其所採取的方法就是盡人皆知的“家長式的”制度。特別是在流浪的工人工作的

部門內，難堪的工作根據“協定”起着很大的作用，從易比河到東部人們發明了特殊的天才方法去鼓勵自己的工人作力不勝任的勞動。維貝爾對這種情形在其許多次為我們所引用的書內（第一二六頁並參看第二八六頁）給我們指出：“不止一次被證實過，人們用‘清涼的飲料’（燒酒）比用金錢更容易使工人同意作額外的工作；從海里根貝爾區來的通訊說到關於額外工作底重要方面就在工人是被‘惡性的酒’刺激起來做額外工作的，雖說現在已不及從前。”

這就是說，我們的基督教德國的貴族有系統地用酒灌醉自己的工人，來鼓勵他們工作，像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在作戰前使僱傭的兵士大喝燒酒，以便鼓舞他們作英勇的抵抗一樣。我們看見，普魯士的惡性燒酒不僅可當作商品，而且可當作款待自己工人的一種手段，來替貴族地主產生利益。

人們愛護流浪的工人總不及愛護本地的工人。他們可以一個跟一個病倒！在整個冬季又不消養活他們和付給他們在醫院的費用。但是最壞的是替流浪工人安排的住所。人們不值得替他們建築堅固的住宅。因為一年之內住宅總要空七八個月，他們的住宿地愈簡陋愈好。凱爾格爾先生對於在某些地產內替流浪工人建築的住所大加讚揚；他指出那一種規定（無論如何在那裏是不可理解的），即兩性分睡的規定，為這些宿舍底特別優點。這是照警察局底要求做的。

從易北河到東部不必走得很遠：“代替可以住人的宿舍（在西普魯士），一部分木板房，一部分廄舍和空的穀倉都被利用了，工人在它們裏面十個人或十多個人睡在一起。無論哪裏都看不見各處曾實行兩性分宿，有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往往更多都是少女；並且就是在先進的領地內情形也和在別處一樣”（見維貝爾：“農業勞動者的狀況”，第二四〇、二七五頁）。期待這種分宿究有多久——從維貝爾早先用好幾頁篇幅抱怨的情形就可看出，維貝爾抱怨道，甚至在本地工人住

宅內並不時常具備兩性分居的必要的條件。“家屬不得和外來工人共居住宅和寢室”(第一八三頁)。

不是在“未來國家”內，而是在現代國家內，基督教德國的謙遜和德性還一點也沒有受到社會民主黨的毒素所觸害，那裏我們的“名門貴族”和“上流人”無阻礙地支配和統治着——我們就看見，家庭與結婚底保護者所引起的混亂的性的共同生活，這些保護者為降低燒酒和沙糖底生產費使自己的兩脚的勞動牲畜不分性別與年齡羣居在廐舍內。

在現時就連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家都承認，這種令人憤慨的狀態真是需要立法的干涉。

首先應當要求禁止未成年的少女們外出工作。凱爾格爾博士自然不願意知道這一點，他有自己的理由：“提議禁止未成年的少女外出工作是發生於想藉此稍稍減少風俗敗壞底危險性，但我想少女失去童貞底百分數，不見得因此種方法而減少，因為受父母保護到二十一歲，一旦獨自謀生的少女，如果她在家鄉還未曾成為誘惑底犧牲品，那她也不見得比更年輕的少女更能抵抗外來的誘惑”(第二〇六頁)。這句話引起很多的反駁，但我們從這句話中可以得出結論說，凱爾格爾博士很冷靜地接受馬克思底敘述，即在外出工作的時候十四歲的少女和十四歲的少年結合而懷孕。這種情形發生之或遲或早，還不是完全一樣。

凱爾格爾反對禁止外出工作，首先是為外出女工底父親底利益着想的。如果不照契約把未成年少女賣出去做奴隸，這些貧農對她們怎麼辦呢？

“例如，小土地所有者——我們且舉一個最明顯的實例——命運使他連續於六年之內每年生一個女兒，當最後一個女兒也滿十六歲的時候，他對這些過多的兒女怎麼辦呢？我們不去爭論這個例子底明

顯性，但如果認為它是證明了的，那末其他同樣隨意舉出的，但自然比較不明顯的例子，也一樣是證明了的；小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六個女兒送進外出工作隊，而每個都帶着私生子回來；他對這些多餘的兒女怎麼辦呢？”

但是凱爾格爾博士還有別的確實的理由：剝削十六歲至二十一歲的少女，對於種植甜菜的農業經營者和製糖工廠主是最有利的，因此禁止使用她們的勞動，爲着甜菜種植底利益，當然要被擱置了。這樣看來，我們的高貴的博士領導着真正文明的鬥爭來擁護甜菜種植底權利而使未成年少女們趨於墮落；但我們，社會民主主義的汪達爾人（意即文化破壞者），不是以人們的墮落爲代價而達到甜菜種植底成功之愛好者，雖然我們也要求禁止未成年少女外出工作。

但這還不是所要做的一切。自然，二十一歲的少女白甘墮落也比十五六歲的少女爲少，因爲她比較有經驗，她的性格比較堅定；但是現時流浪工人底生活條件是這樣惡劣，可以使更成熟的人墮落。可是，雖然如此，不能走得更遠，希望禁止共同的外出工作：這就意味着剝奪勞動人口大部分的自由遷徙並剝奪他們去找尋比在家內獲得更高工資的手段。但是契約奴隸制和流浪制並不構成外出工作底必要條件，因而應當加以取締。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公開的介紹機關，排除募集人及其販賣人口的制度。

在上述一切之後就無須證明值得人們要求的住所的嚴格規定底必要性了。縮短長得不近人情的工作日，也有必要並且這種必要不單是對外出工作爲然。

## 七 正常的工作日。星期日休息

現在我們說到正常的工作日的問題——勞動保護底主要問題。

工人運動底反對者不再爭論工業內正常工作日底合理和必要了，雖然他們反對勞動時間底縮短；但是他們宣稱，正常工作日和農業底條件不相容，因為農業不比工業單調而且要依靠外在的條件：靠風和氣候，靠雨和日光，因而是變動不居的，不能用正規工作日底界限來限制。

實際上，農業比工業需要較少的變動性：在一個地產內工作計劃被規定為一整年，而那時工業企業底計劃則隨情況而改變。

工業企業家更加抱怨，正規工作日使他們沒有可能利用市場底景氣及履行一定要迅速完成的大批定貨。他們比農業經營者更加堅持工作日底變動性，以便適應比風和氣候更變易不居的，市場底變化的需要。可是我們看見，一切都照自己的順序進行：技術的知識和組織的才能戰勝了一切的阻礙。而凡是正規工作日被實行的地方，傷害的不是工業，而是工業中的舊習。

正規工作日在農業中也有自己的熱望者。誠然，我們對於農業沒有用法律嚴格規定工作日底標準，只是在某些地方有過施行正規工作日的企圖，一部分是受憤激的農村工人底壓迫，一部分是由於農業保護者底理想的衝動，這些保護者自然是很知道農業的條件的。邁耶爾在其對蘇馬赫爾·查爾赫林：“正規工作日史”（載“社會經濟史雜誌”〔*Zeitschrift für Soc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六卷，第一期）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對於工作時間底立法限制於一八四八年首先實行於美克林堡。領主的日工們底騷動在那裏引起了仲裁委員會底設置，由政府調解爭端。這個委員會規定了大地產內的勞動時間。從那時候起在一八六九年保守黨人瓦根勒爾和布洛赫特斯施行正規工作日的政策遭到了斯屠姆的反對。在一八七二年我和蘇馬赫爾在農村僱主底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立法規定農村工人底勞動時間；在一八七四年或一八七五年我和瓦根勒爾一同起草了法

律草案，限制城市和鄉村成年人底勞動爲五十六小時半，並將這草案呈報俾斯麥。”這些企圖沒有得到成功。但經濟的發展從那時候起就繼續有利於農村中正規工作日底規定：技術把工作底較大的規則性帶到大經營內，比用於小經營內爲甚，而農村工人底正在增大的壓力在這一方面也發生作用。

我們想起在薩克森替外出工人用契約規定的，甜菜種植場上工作日底時間：這其實不是別的，就是正規的勞動日。維貝爾指出規定正規勞動日這種意圖不斷增長。即如他從里特弗來的通信說：“勞動時間實際上是縮小了：在南部各區一部分經營內工作在日出後一定時間開始。這個時間在這些場合內大約在早晨五點與六點之間。有些地方採取一定的，不以日落爲轉移的工作終止時間，爲晚上七點至八點”（見前書，第四八頁）。凱里格斯堡區來的通訊寫道：只有在小地產內才看到，工作在夏天從日出開始；在大地產內工作底開始大部分都有了一定的時間（五點、五點半、六點）（見前書，第一二一頁）。馬宗里區來的通訊說：“在比較多的場合內工作底開始在夏天都有一定的時間，在許多場合內工作終止也規定一定的時間”（同書，第八四頁）。

在這種情形下維貝爾就斷定，農村工人對超時間工作的憎惡態度在增長着。這樣，我們看見德國農業內正規勞動日底開端；這個開端這樣微弱其原因與其說是農業生產底特殊性，勿寧說是農村工人底依賴地位；要達到勞動時間底縮短及其實行，他們的力量是不夠的。擺在工業中同志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關心立法給他們以用自己力量不能得到的東西。

決定農業的正規勞動日底界限越出本書的範圍以外；無論在工業內或在農業內實際上所達到的界限各不相同，尤其是這種界限不僅爲客觀的技術因素，而且爲強有力的主觀因素所決定。但我們並

未看見有任何根據要在農業內，像在工業內一樣，要求八小時的勞動日，甚至就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只着眼於勞動時間底長短並不能是工人運動底目的。

人們可以反駁我們說，農業中的工作比工業中的工作是在優良的衛生條件下進行的；在工業內單調的機械的勞動是在關閉的，且常常充滿毒氣的屋子內進行的；而在農業內各種各樣的工作是在露天中進行的。在大多數場合內情形的確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僱傭工人的狀況在城市中就比在農村中不同。在農村中家庭經濟，像我們已經屢次說過的，必須和農業生產聯系。日工從僱傭工作轉回來後，還沒有完結自己一天的勞動：他還要關心家務、清掃廄舍、給牛以飼料、掘取馬鈴薯等等。如果僱傭工作從日出到日落佔一整天時間，那末他只有在夜間和星期日來料理自己的經營。

無論對於已婚的工廠女工，或對於農村中的日工，僱傭工作底時間和勞動時間並不完全一樣。農村工人地位每次改善，私有經營中的工作即隨之增加。這種情形不見得能迅速改變。農村工人僱傭工作縮短到八小時還是不會使他比城市勞動者佔優越地位。

如果我們把農業中正規勞動日也認為是可能的，像在工業內一樣，那末還是不能以此為條件，就說正規勞動日在那裏和這裏可一樣地施行。自然的一天底長短在農業中影響於工作日底長短，比起工業中來是完全不同的，在工業中人們是在人工的光綫下工作。另一方面，大量的勞動後備軍供工業之用，比農業為多。因此，大概，必須作這樣規定，在一整年間不用同一的正規勞動日，而是對於一年底不同時期規定不同的勞動日，例如採用八小時工作日為平均標準，決定冬季工作日為六小時，夏季為十小時。在自發現象及收穫時期迅速工作底場合也不得不容許超時間的工作。但不必為這件事去絞腦汁；一旦農業的正規勞動日被確定，當事者自己就會注意到正規勞動日

底必要的伸縮性。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不在於要注意這種伸縮性，而在於注意這種伸縮性不要變爲任意處置，使勞動時間底一切限制等於零。

我們姑且承認，農業中正規勞動日同在工業中不一樣，但我們不知道農業底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才把農業的正規勞動日只宜採用於大地產內認爲是正當的，像蘇黎支國際保護勞動大會決定的那樣。

經營小生產往往比大生產更草率，工作底嚴格調整，是大生產內技術的必然，而在小生產內只有受到外來的壓迫才能實行，這種情形無論對於農業或對於工業都是一樣。雖然如此，如果社會民主黨替手工業也像替工廠一樣要求正規勞動日，那末社會民主黨無論替富農底僱傭工人或替貴族地主底工作者都應當要求同樣的權利；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絕不在於給小生產以比大生產更有特權的地位。

如果正規勞動日實施於農村中大生產內時我們不堅持一些限制，那末也不能由此就說，我們認爲正規勞動日可以同樣地採用於一切種類的農業內。應當有所區別，但不是在大經營與小經營之間。

社會民主黨替一切種類的僱傭勞動要求正規勞動日，除了一種——即家庭經濟內的工作以外。它做出這種例外，並不是因爲家庭用人不需要勞動時間底縮短，而是因爲家庭經濟底需要，不容許以一天底一定鐘點來限制工作。這種情形對於農村的經營與對於城市的經營都是如此；在農村內，家庭經濟和農業生產，或最低限度，和農業生產的某幾方面有緊密的聯系。在農村內生產部門與家庭經濟間的聯系愈緊密，則在農村內使工作日正規化也就愈加困難，於是就不得不在正規勞動日實行的地方明顯地標出那些種類的工作。一般地可以說，田間工作可以說比家內和戶內工作（尤其是照料家畜）更早，受支配於工作日底正規化，而日工底工作日底正規化又比僕役工作



日底正規化爲早。前一類工作大部分是有一定的、同一方式的、而且容易加以測量的——如除草、刈禾、打穀以及諸如此類的工作，後一類工作則變動無常且不易加以管理。

因此，僕役底力不勝任的工作由於工作日底正規化，只是部分地取消了。正規勞動日是勞動保護底一種形式，是最符合於現代僱傭工作底條件的。要保護僕役——中世紀底這一殘餘，就需要採取中世紀的方法。那時候自然的一日符合於工作的一日；一日的工作時間沒有限制，而是一年的工作時間受許多節日的限制，這些節日，依照當時的見解，是根據宗教的傳說自然而然規定下來的。教會的節日爲數很多。

在中世紀，爭取工作時間，就是爭取節日；在手工業內學徒們還把星期一也加到教會的節日上去。民主主義階級戰勝重商主義的封建專制主義，起初是在新教的國家內，隨後在加特力教的國家內引起了節日底減少。但是星期日休息仍舊保留下來。現在星期日休息並不嚴格地遵守，尤其不爲最崇奉宗教的農民所遵守。

我們知道的“屠林根的農村牧師”就抱怨道：“我知道有過一個時期，當時農村中星期日是真正的‘福音’書上的安息日；田間偶爾緊急的工作早晨很早就做完了，最遲到六點鐘做完；只有在歉收的年份，牧師依照村長建議，在星期日早上宣告，午餐後做禮拜取消並代之以田間工作。我活了幾十歲，當時關於星期日的法律，由於當局毫無例外的寬容，成了一紙具文，而沒有絲毫的效力……由於農業底成就，收成底提高，不斷增加的神經急躁及渴望利益，老農對神的指靠、謙遜及恭順也就減少了，而同時星期日工作一年比一年增加了……”（“農民的信仰與倫理”〔Zur bäuerlichen Glaubens und Sittenlehre〕，第二九六頁）。他期待因星期日休息的新法律而有所改善，但一切仍迅速地照舊過去了。

星期日工作不僅在農民的地區而且在大地主的地區都增加了。在這種情形下，正如在超時間的工作情形下一樣，燒酒就是一種刺激力（見維貝爾著前書第二八九頁）。熱烈地力圖支持民衆宗教信仰的敬神的泰斗，却用下等火酒激動民衆去違犯宗教。我們當然不是要抱怨，教堂很少有人去參拜，而是我們要以最堅決的態度去抵制它，爲的是使農村工人從工作歸來後剩下的極少休息時間不致再被減少。

嚴格禁止一切非絕對必要的星期日工作及保證僕役們有完全自由的一天來過星期日，這就在正規工作日已實行的時候都是必要的。嚴格禁止非必要的星期日工作容易達到，因此必須堅決地要求它。

至於說到保護勞動者的其他規定，則在大部分農業部門內比在工業內易於實行。在使用機器時安全設備及禁止使用不熟練的年紀小的工人這在農業內也和工業內一樣的必要。相反在農業內夜工在現時並不起若何作用；農業內採用電氣後，這種情形就會改變，最後田間工作關於工作場所底寬敞、清潔、及通風不需要有特殊的規定。

## 八 住宅問題

農村中在保護勞動面前在住宅問題領域內發生出比在工業內更困難的任務。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在這裏研究整個住宅問題，但我們不能緘默，在城市中住宅的缺乏和在農村中一樣的可怕；工業人口底某些部分住得比農村人口還要壞，這是可能的；例如，根據辛格爾教授敘述，在北波希米亞工業區內住宅狀況堪與居累、克維司托爾、維登貝爾格及其他牧師們所報告的最令人厭惡的農村茅屋相比。

居累所看見的在屋頂下的地方，裏面舖在地上的八張稻草蓆上，睡着四對彼此完全陌生的夫婦，——並不比辛格爾在夜間去參觀過

的特拉烏特卡工人宿舍的房間爲壞。在這個一五·二平方公尺的房間內只擺了一張普通大小的床，五個人(三個成年人和兩個孩子)的一個家庭就住在它裏面。其餘老的少的男女九個人一個挨一個並臥在堅硬的、不蓋稻草的土坑上面(辛格爾 [I. Singer]: “波希米東北部工廠主社會地位底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socialen Zustände in den Fabrikbezirken des nordöstlichen Böhmen), 第一八六頁)。

自然，並不是到處都這樣壞，並不是到處都可以斷定目前工人的“住所與其住居者人數不相稱”；居累牧師在海姆尼茲地方就發現了這種情形(Drei Monate Fabrikarbeiter, 第二一頁)，這種情況就會使夫婦倆不僅和自己成年的和半成年的兒女，而且和外來的寄宿者——男子和少女共住自己的宿舍，大部分是自己的臥室。

這裏所說的不是指一般窮苦階級底住宅問題，而是指構成工資底一部分的那些住宅而言。這樣的住宅在農村內比在城市內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城市內僱傭工人生活在僱主底家宅內是中世紀手工業習慣底迅速消逝的殘餘；在農村內現代大經營最低限度不得不供給自己的工人底一部分以住宅。在手工業內，尤其在大工業內，僕役底工作並不起任何作用，在農業內就不然：在那裏可以把有私有經營的，但從僱主得到住宅的，受契約束縛的已婚的勞動者、僕役、租佃者歸到僱農方面，他們爲自己的住宅必須要照契約做幾天的工作等等。

但是住宅是工人，廣義的說來即執行所謂手工工作的階級底代表最不重視的生活條件一個領域。他在自己身上感覺到營養的各種不足；要仍舊有工作能力，工人就應當吃得很飽，尤其是在露天中做着煩重工作的農村工人；另一方面，要滿足嗜好上的需要，即是不僅吃，而且喝酒和抽煙，這些由於習慣和生理的需要，特別接近於工人，這些嗜好的滿足容易達到而且是很被重視的。

在衣服方面明顯地反映出社會地位和社會意圖。因此一切貴族政治和僧侶制度都極重視一定的服裝及各人出身和職位底區別，武人底傲慢更明顯地在他給自己要求所謂服務的服裝——制服的那種尊榮中表現出來。在軍國主義不佔支配的地方，例如在英國，那裏兵士的制服是服務的服裝，而不是名譽的服裝，每個軍官如果在服務之外穿着制服那是很可笑的。

消滅不同階級間服裝上的差別這種意圖隨着民主主義的成就而增長，這些不同的階級，在法律之前將一律平等，就希望在社會內具有同一的形式。無產者在工作之外不願意戴着自己的經濟的奴隸地位底烙印，不願意在外表上有別於有產者，在星期日他願意穿得像有產者一樣。任何一個無產階級階層底社會地位的提高，我敢說，與其說表現在飲食方面，勿寧說表現在衣服底改善方面。相反，對於住宅就很不重視。壞的住宅在生理上的有害影響並不表現得像營養不足的影響那樣迅速而直接。要考察壞住宅與體力衰退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必須有觀察和認識，這些觀察和認識對於那些全部知識不是依據個人的經驗，而是歸功於國民學校的人是難以理解的。住宅對於現代工作者是什麼呢？就是睡覺的地方。極度疲倦的工人在夜間很晚回到家來就在自己床上一躺，早上很早就離開床鋪而去工作。單是爲了睡覺——一個位置就夠了。

工人在住宅方面要求不高，甚至就連最敵視工人的經濟學家也承認了。無論他們怎樣叫囂着工人熱愛享樂和裝束，石匠舉行香檳酒宴會，工廠女工底絲製衣服，可是對於住宅底奢侈我們却聽不到一點怨聲。

在這一點上無產者的生活方式和有產者的生活方式就有極大的區別，並且在這一點上工人對於使處境惡化的一切企圖更少反抗，正是在這一點上，使處境惡化的這些企圖表現得更有力。製造品和生

活資料底價格到處都在降低，只要是在不是人爲地用保護稅或新提加手段把價格抬高的地方拿它們同工資比較就可以斷定許多無產者階層生活程度底提高。和住宅比較就不然。在農村內地租在降低，但在城市內地租到處都迅速地增高，因此城市內住宅的價格迅速地增加並迫使工人或者把自己工資底較大百分比耗費在房租上或者在住宅問題上大大地抑制自己。在農村內情形也不見得好些，在那裏僱傭工人是以自然物，即工資底一部分而得到住宅的。由僱主供給工人住宅的制度愈是普遍地推廣，減低生產成本費的意圖愈是有力，工人不許縮減他們的用生活資料方式支付的口糧和固定工資愈是頑強，應當支付的工資愈高，則使供給工人居住的住宅惡化的願望亦愈強烈，或在使住宅變壞已經不可能的地方，就反對住宅的改善。

住宅是無產階級生活方式改善最少，而惡化傾向最多的一項；另一方面，這一項更加壓迫着無產階級。不能令人滿意的住宅，有如不能令人滿意的飲食一樣，不僅引起體力的衰退，而且引起精神和道德能力底衰退，引起從親密關係中流露出來的溫柔的感情底完全消滅。誰想了解統治大城市監獄的無恥和粗暴，則研究流浪者底住宅比研究他們的頭蓋骨會提供他以更豐富的材料。

流浪的工人和許多其他正在工作的無產者都住在像大城市底最窮困的流浪者所居住的，同樣的洞穴內；夫婦和自己的孩子們，少女和青年，病人和健康者，大家混雜在一起，而且一個靠緊一個，以便在狹小的地方取暖和居住。白天他們工作着像馱重獸一樣，夜間住的地方比馱重獸廐舍還要壞；在這些條件之下，除了粗暴和無恥之外，還能發展出什麼呢？但是像平常那樣工廠工人底住宅（參看居累上述的描寫），或僕役底住宅絕不適於敏銳的感覺底發展。

可是在這一點上城市與農村之間就有着極大的差異。如果城市內住宅的缺乏使工人墮落並在道德上使其麻木不仁，那末城市却也

發展着一些因素，這些因素抵制着這種情形，並減弱、有時會完全克服住宅缺乏底影響。工作本身把工人聯合起來不僅是爲了勞動，而且在工作之前和工作完結之後以及在休息時間，爲着互相幫助和爲着討論公共的事務。在農村內工作使人們分散在廣大的地面上，並使他們彼此隔離。在城市內生活，除工作以外，提供無數的機關、團體、集會、展覽會、博物館、戲院；甚至飯店也是公共生活底機關並在工人當中推廣着城市的世界觀；在那裏工人讀着報紙並談論讀過的新聞。有些人發展到獨立思考的地步，磨練出自己的人格，在他們能夠爲自己生活的地方，他們在自己的家園需要有自己的娛樂，自己讀書和自己思考。城市的條件，最低限度，在工人階級底個別的、處境較好的階層內，能克服住宅缺乏底惡劣影響，並在這些階層內同時發展着對住宅的渴望並激起工人們對住宅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農村內就不然。那裏沒有任何機關足以抵制住宅缺乏底惡劣的影響。像我們看見的，工作使人們孤立；集會結社，由於農村工人底經濟的依賴性，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廣泛的精神生活並未提高勞動者，——小旅店是公共生活底唯一中心，它反映出農村精神的完全空虛，並使微末的精神生活，沉沒在烈性燒酒內，於是小旅店不僅不是緩和住宅缺乏底壓迫的影響，反而增大着這種影響。

一般說來，住宅缺乏底惡劣的影響，特別是居住在僱主住宅內所顯現的影響，在農村中比在城市中表現得更利害。城市內這種影響爲公共生活所減消。製麵包的人或屠戶可以禁止住在他家裏的學徒把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帶回家來，但他不能禁止在飯店裏讀報紙，不能阻止他們出席會議等等。相反的，在農村內住在地主家裏的工人，不僅在工作時間，就是在工作以外的時間，都不得不無條件地服從他。工人的精神生活，他的政治信念以及私人朋友——全都受監視；在他既沒有言論出版底自由，也沒有結社底權利（甚至就在法律規定他有

這種自由和權利的地方)。即使在有普選權的時候，也往往沒有選舉底自由。他和奴隸不同的，只在於他可以隨時更換奴隸主，而奴隸主當他已不能勞動的時候，也可以隨時把他拋棄。

城市住宅條件底改善，無論怎樣重要，但這種改善在農村尤為重要。農村保護勞動的立法如果不注意到住宅的條件，那就不能完成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務。保護勞動的立法對於僱主供給工人使用的，而作為工資一部分的住宅，應當規定最低限度的衛生條件。

符合衛生原理的，並在這種情形下毅然決然實行的這種方法，對農村是會有良好影響的。這樣的方法不僅大大地改善了農村工人階級大部分底住宅條件，提高了農村居民底生活程度，廢除延續到二十世紀的封建的勞動關係底殘餘，這種方法也是一種強有力的手段，因為它迫使所有的農業經營者把住在他們那裏的工人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以自由的日工來代替他們。用工作以外自由的日工來代替僱農和僕役，乃是社會的大的成就。

雖然這一成就，在技術方面是倒退一步，因為要在自由日工的區域內留着自由日工為自己之用，地主們就不得不設法，使他們進行自己私有的經營，即是說，使他們能夠有一塊私有土地，或租佃一塊土地。這樣看來，僱農人數底減少本身引起了靠犧牲大生產的小生產底增加。但這種增加是這樣不關重要，大可不必加以考慮，因為社會的進步是與自由的僱傭勞動排擠封建的農奴制底殘餘相關聯的。但如果自由的日工在社會方面所站的地位比僱農或僕役高，如果他有一個家和少許的土地，那末他就缺乏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主要武器——遷徙底自由。私有財產把他束縛着。

我們看出能取消這種障礙的，只有一個方法：用公款建築住宅租給工人。這個要求一系列的先決條件是相關聯的；首先，它依賴於公社自治，不依賴於區或地方及選舉代表機關底人員時的普選權。只

有在這些條件存在時，只有在農村工人底獨立運動十分強固，即他們願意而且能够在公社或區以內爭取代表權的地方，——只有在那裏，社會民主黨才能提出要求，要公社，或最好是區（在那裏個別的土地所有者底經濟的優越，出現得較不尖銳）建築住宅，把它們租給農村工人。用這樣的方法農村工人即可達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可以達到的較高階段的獨立。

但是除英國以外，我們並不知道，會有一個國家，那裏爲農村工人底利益提出過這種要求。

## 九 租 金

關於租金的一些問題與住宅問題有着密切的聯系。

我們在前幾章中底一章內曾看見，已耕土地底價格，只有當它供作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之用的時候，才爲地租所決定。在土地只是家庭經濟底附屬物的地方，這種地價可以被提高到地租以上，並且人口底增加與對土地的需要其條件愈有利，則這個價格亦愈高；在個別場合內，供作商品生產之用的土地愈少，土地愈是家庭經濟底附屬物，即是，一般說來，地塊愈少，則地價亦愈高。

這無疑對於農村中勞動的人口有很大的害處，並且是剝削農村人口的一個豐富的源泉。工人爲創立私有的經濟要想得到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底價格愈高，則他爲要積聚買價就得更多地節省自己的工資，更低地降低他的生活水準，他企圖更快地借得一部分購買土地的款項，於是他就淪爲奴隸和債務上的隸屬關係。在他租佃一塊土地，而不是購買一塊土地的地方，他要從自己的工資中，而不是從自己的土地底生產物中〔因爲它（生產物）完全不是商品，或者就是商品也是很有有限的一部分〕付出的租金愈高，則他亦愈益迫切地委身於僱傭工



作，租金愈高，則他更急急於出售自己的勞動力，並且在工資降低的時候他更少有反抗力，他往往延期支付租金，這也是他們依賴和奴隸地位底來源。抵制這種悲慘的境況會大大地加速了農村工人生活程度底提高和獨立性。

在租佃制統治的地方，這種情形是可能的；只要使租金延期支付受特別法庭底監督，這種特別法庭有權將不正當的極高的租金，即超出正規地租範圍以外的租金，減縮到普通地租的程度，即是說，把無產階級租佃者底租金減低到資本家租佃者支付的那個限度。自由派重商主義的格拉斯頓內閣約在一八八一年時在愛爾蘭規定了同樣的制度，這制度產生了很大的利益。

此種法律底作用在某些方面與我們要求的關於住宅的法律相矛盾，後者（有關住宅的法律）迫使大地主以分出小塊土地給自己的勞動者來減少自己的生產；反之，前者則使這種小塊土地底分出比從前成爲更加不利；一個是促進小生產，別一個則促進大生產。但在實際上兩種法律並不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補充並且兩者是在同一方向內起作用，因爲每一個，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却都促進着工人生活程度底提高及獨立性。

在農村工人不是租佃，而是購買自己的小塊土地的地方，事情就不是這樣簡單。我們沒有看見有適當的立法手段，足以強制降低土地底過高價格；但如果有這種立法手段，那也是令人大大懷疑的。土地所有者，——降低地租是可以由他來承當的——往往自己就是勞動者。這樣的降低對於購買土地的勞動者無論怎樣有利，但它却使那個以所有者或共同承繼人的身份不得不出賣自己土地的無產者在困難的日子辛辛苦苦集聚起來的金錢喪失。這裏我們又碰到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內土地私有制使合理的改革成爲不可能。

### 第三章 保護農業底利益

#### 一 社會民主黨並不保護企業家底利益

上述的改革所指的已經不單是農村無產階級底利益，它對於農業也同樣有利。像上面已經說過的，這種改革，自然，只有利於無產者的小農作人；對資本家的農作人，這種改革只有在那種場合內，即租金跌到地租底正常水準以下才能有利。但這種情形也就是一般租佃制底完結，因為在這樣場合內土地所有者自己從事自己土地底耕作就更加有利。無產者的小農作者就有可能使用自己的由於租金減少底結果而增多的收入，不僅用來提高自己的生活程度，而且也用來合理的措置自己的企業，如獲得優良的生產工具、優良的種子、土地底施肥等等。

這樣看來，要求特別法庭縮減過高的租金就構成旨在保護農村工人底利益的一些辦法過渡到為農業利益所引起的一些辦法。

很顯然地，農業的這些利益，在社會民主黨看來，決沒有農村工人底利益具有的那樣大的意義，農村工人底利益在社會民主黨看來應當是特別重要的，社會民主黨在保護農村無產者的時候，是十分孤立無援的。對農業的態度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現時農業底利益和企業家及地主底利益一致，和農業資本底利潤及地租底利益一致，正如工業底利益和工業資本的利潤底利益一致，而商業底利益則和商

業利潤底利益一致。這些生產部門對於我們的全部社會生活，也就是說，對於無產階級，無論怎樣重要，但它們有別的、比無產階級的保護者更有力的保護者。農業遭受損失，其原因自然不在於：在現代國家內農業及土地所有者底利益沒有充分地提出，它們沒有充分地受到政府和國會的注意；原因是在於那些條件，那些條件甚至極其同情農業利益的國家政權也不能加以廢止，當現代社會底基礎尚被保全及其生存條件尚未連根破壞的時候。

從宣傳的立場來和農業魔術師比賽稱讚立即恢復遭受損害的農業的各種奇異手段，這不是社會民主黨底任務，猶之以保存和整個社會利益相和諧的農業底現存制度作為自己請求底根據，不能是它的任務一樣，而保護工業，尤其商業底利益在社會民主黨看來更不能作為自己的任務。這並不是因為社會民主黨不承認這些利益的意義，而是因為這些利益充分受到現代國家的承認，現代國家採取它做得到的一切手段來鼓勵它們，社會民主黨倒可以完全放心。

社會民主黨對工業家和金融資本家，同樣對農業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小的和大的)的態度不是以煽動者的角色出場來鼓動他們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是以觀察者的資格，以監視者的資格出來監視他們，使他們的特殊的利益不超過整體的利益之上，使暫時的利益不致犧牲了經常的利益。

社會民主黨當然是頑強地不屈不撓地為無產階級底利益而工作，在問題是涉及保護整個現社會利益的地方，本質上它就採取消極的豫防的策略；在這一領域內，最低限度，到目前為止在它對國家生活尚未具有決定影響以前，它的積極作用總是落後於消極的作用。

從這一情形已可得出結論，即社會民主黨在大批獨立的，不依靠副業收入的農業經營者與土地所有者當中，是永遠不能戰勝替農業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要求特殊利益，以損害共同利益的農業政黨的。

雖然在理論上有好心來幫助農民，在實際上社會民主黨看出自己不得不常常和農民急切要想得到的那些土地法規作最堅決的鬥爭。

就讓它這樣吧，可是現在總是已經有幾處社會民主黨可以積極地爲農業發展底利益而工作。

## 二 封建特權·狩獵

社會民主黨在這一領域內首先應當把活動指向廢除封建時代底殘餘並且指向在封建殘餘還被保存的地方以及在它們復活地方。社會民主黨對於封建特權，無論是承繼權，無論是世襲財產制，一點也不感興趣。不待說，它雖反對世襲財產的土地佔有底合併，却並不堅持把它們分割爲小塊的農地，像資產階級民主派所做的那樣；我們以爲，這在技術方面是後退一步。

在東普魯士還保存了比世襲財產制更有害的大地主的權利，把自己的地產當作獨立的地主的地區從農村公社分出來，並且將自己應負擔的那部分義務完全由公社去負擔。大地主享受公社的街道和道路，他們的工作人員把自己的兒童送進公社的學校，但他們或者完全不負擔由此發生的費用，或者只負擔一小部分，小到可笑的程度。即如，下述的情況是可能的：“魯美爾堡區(下波美拉尼亞)朱凱爾斯道爾夫村有一個保守派的騎士地產所有者佛·海金斯差不多購買了全部農民的共有地(公社)並將它合併到自己的領地，所剩的一共只有兩個獨立的農戶。他們現在組成一個‘農村公社’，而騎士領地則形成獨立的地主的區域。學校的校舍需要重新建築：但是費用專由‘公社’，即由兩個農戶負擔，地主則以‘一區之主’的資格，免除一切負擔。這兩個農戶想對這樁事提起訟訴，但有人勸他們不要這樣做：反正一樣不會有什麼結果”(見“騎士底後裔”，第四六頁)。

普魯士地主貴族對農民的好意，用他們據為已有的狩獵權來說明，也不亞於上述的情形。這種權利不僅存在於普魯士，而且存在於全德意志、奧地利，並且自身就含有許多封建特權底殘餘。

狩獵底封建特權是兩重性的。第一，狩獵是適合貴族的、雅緻的“封建”娛樂；只有高貴的地主們才能醉心於這種娛樂。法國革命掃蕩了這種特權，像掃蕩許多別的特權一樣，並且以土地所有底特權代替了等級的特權。每個人都有權利在自己土地上自由打獵。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有同樣的結果。但是反動勢力雖然沒有力量恢復舊時封建的特權，可是在這個範圍內却取消了農民和大地主底平等。大地主（在普魯士有七十五公頃土地才算大地主）有權在自己的地產內自由打獵，小的土地所有者只有在被圈圍的土地上才享受這些權利。許多小地主（公社或區底）未被圈圍的土地被聯合為一狩獵區，在這個狩獵區內只有替公社服務的人或獵戶才有權打獵。

狩獵權底這種限制於我們無損。不言而喻的，狩獵不能是無產階級或一般人民大眾底經濟的或道德的提高的一種手段；狩獵對無產者說來是享受不到的，無論它是一切土地所有底特權或單是大地產底特權，全都一樣。

從封建時代因襲下來的，狩獵底其他特權，在我們看來更為重要：即它為法律所承認的超乎農業的優先權。農業，也正是農民的經營供狩獵之用，而不是狩獵供農業之用。

在歷史上經過的封建時代，農民一定要替仁慈的領主飼養野禽。禁止他圍圍自己的田地和從田地上趕走野禽。很顯然地，從一七八九年那時候起，這種情形就停止了，但是野禽對農民的播種來說，還是繼續佔有特權的地位。領主應當將有害的野獸關起來，至於說到野禽，他頂多只是對兇猛的野禽才擔負這種義務。別的一切野禽則享有自由，農民就是在野禽蹂躪他的耕地時也沒有權打死它。自然，授

野禽所招致的損害就由這一區的所有主賠償，對於其他大的野禽招致的損失(小的野禽可以照舊吃光一切而不受罰)就由獵戶賠償。在一切場合內，這個極其穩健的法律，被地主貴族歪曲成那樣的意義，即：(一)完全免除因逃亡的野禽招致的損害賠償的各種訴訟；(二)取消把野禽飼養在閣定地內的義務；(三)賠償損害底義務從獵戶轉到公社身上，也就是說使全體農民對此負完全責任；(四)取締對這些事件的各種訴訟手續；對這種事件發生爭論時，地方警察局就是裁判的機關，其實，大地主或區委員會，也就是說，所有大地主就是裁判的機關。

爲了要把因野禽而發生的這一類損失賠償奉送給農民，就需要有普魯土地主貴族那樣的厚臉皮，普魯士政府以及普魯士的三級選舉制！

在別的地方這個問題處置得稍微好些，但在整個德國和奧地利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滿足農民底利益。大家知道，在民法裏面帝國議會承認兔子到處有自由找尋食物的權利。狩獵底享樂比人民的食物更重要：封建時代底這種殘餘還有待於廢除。

但這應當如何實現呢？一切人在自己土地上自由打獵的權利，很少保障被大的狩獵區所包圍的農民，那時農民就不得不拋棄自己的田間工作，並空費自己的時間：雖然是在富於森林和野禽的地方，但被大的一個和一個連接的狩獵區所圍繞的農民，最後會因野禽底損害而被毀滅，但另一方面也有這樣的農民公社，以出租狩獵益用權而取得利益；大城市附近的公社就是如此，那裏森林和野禽都很少，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以打獵取樂的人，他們爲娛樂忽而在這裏，忽而在那裏射殺一隻兔和鷓鴣，願意花上一大筆錢。這樣看來，打獵完全自由就會從某些公社奪去一筆很大的收入，而同時對於農民，尤其是對於小農，並沒有予以絲毫的利益。

在現代社會內這一問題(狩獵)底最好解決,在我們看來,不是擴大,而是限制土地私有權。構成私有的狩獵區,像構成私有的農場地區一樣,大土地所有底特權應當加以廢止。無論是私有的狩獵區,無論是私有的農場地區都應當歸公社所有,而在這種情形較為便利的地方,則歸區所有,無論在大地主底森林內的打獵,或在農民的土地上,其解決之權應屬於公社或區(自然是根據普遍、直接和平等的投票權組織成的),一般講來,它們是整個狩獵區底狩獵政策底決定機關。

由於一切森林地轉移到國家手裏,——最低限度,在民主國家內如此,狩獵政策的問題就更加簡單了。在各個地方,狩獵合理地適用於農業底需要,那時也就完全辦得到了。我們自然同意在這樣場合內對於當作一種娛樂的狩獵,加以某些可能的限制。

### 三 耕地的交錯現象

在小農所有地廣集的地方,農業從個別小塊土地底交錯現象比從狩獵中受到不是小的,而在目前說還是很大的害處,這種交錯現象也是封建時代底遺物,是具有三田制經營及強制輪種法的中世紀馬克公社底殘餘,像我們在第一章內所描寫的。我們已看見,在這種制度下各個農業經營者底小塊土地並不構成單一的整體,而是照各種不同的界標劃分開的。

封建制度底沒落及土地完全私有制底確立,更其不是廢除了各個所有者土地私有權底細分,反而還常常增大了,這種細分是按照遺囑人底全體兒女有平等承繼權,因而過小農地又再分割底結果。在這樣小而又小的土地上,合理的措置經營事業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從這一塊土地轉到別一塊土地所必需的時間有很大的浪費、大量土地損失在道路、田界等等上面,簡言之,耕地的交錯現象,不僅是阻

礙提高農業的一切企圖，而且甚至促成它更大的衰落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土地所有權底細分在某些地方達到了何種限度，薩克森、美林根的一些數字就可以告訴我們：“在美林根區內，里特爾斯道爾夫平原有五二〇·六公頃耕地，三七·六公頃草地，一·八公頃園地，五五·七公頃牧地，一九一·二公頃森林地，——包括道路、水利、住宅等，一共有八三五·九公頃面積作建築之用，在這裏七十六家(!)農戶，三六三個居民竟有七·七八五塊(!)細分地；海爾普夫區有五九八個居民，在同一區內，有一、八〇八公頃地面，其中八五六公頃森林地，——一〇、九七三塊細分地；貝魯根有六九五個居民，雷姆吉爾德區一、三七八公頃面積的土地分爲一三、九一〇塊細分地；其中有三二〇公頃爲森林地；瓦爾弗拉姆斯干仁區居民，有四二三人，八〇四公頃面積分爲九、五九六塊細分地，其中有一四五公頃爲森林地”（見海恩：“薩克森·美林根大公國內農民底狀況”，載“德國農民問題”，第一卷，第一〇頁，並參看第二八，第一三七等頁）。

把屬於各個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用化零爲整、圍牆、農地劃分等辦法)聯合爲一整塊土地就產生出非常優良的結果。例如，從上愛仁納赫區來的通信說：“雖然常常有很大的款項用來建立新的公共機關，這費用佔百分之四乃至百分之六，可是收成在實行這種聯合之後，比起從前就大大地增加了；那時以前極大面積未被利用的土地，由於土地底各種改良，取消田界，籬笆和境界，就成爲有收入的土地；土地的價格也往往在土地調整後，最短時期內提高到極大的限度，往往提高了三分之一，同時在各塊土地上很快看到經濟狀態顯著的改善”（同書，第三一頁）。

根據邁岑的話，在格羅森和阿爾登霍特區(在慕爾漢森，在屠林根)有一二、九三四莫爾根的土地面積，由於土地底合併，每年收入增



至五九、三三九馬克，即是一莫爾根收入增至四·五八馬克。包括灌溉的溝渠、新的道路、橋樑等等費用，達到了一三〇、九〇二馬克，即一莫爾根土地要耗費一〇·五〇馬克，這筆費用，由於巨大的排水工程，就非常之大”（“普魯士國內底土地及其他”，第一卷，第四三八頁）。

雖然有這樣多的利益，可是耕地底合併還是進行得很慢。其原因之一就是耕地合併所引起的費用。不僅合併的手續，其本身像我們此刻所看見的，需要很多的費用，而且問題在於，耕地底合併大部分要以從附有牲畜牧場的舊時三田制經濟過渡到需要更多資本的更高、更集約的經營形式為條件。在沒有具備充分資金的地方，耕地底合併可以成為農民負債底原因，而在他已經陷於負債地位的那種場合內，就能使他破產。

另一方面，這樣的合併，對於個別的人就辦不到；這種合併需要共同輪種底全體參加者底同意，因為只有在各地段彼此摺合的條件下才能完成。要做到使任何人不受壓制就很難，要做到使任何人不得自己受壓制更難。如果我們一想到農民底保守的和不信任的性格，那末在我們看來是很明顯的，這裏我們所涉及的還是土地私有財產制在這一領域內予進步以不易克服的障礙。

這種情況在開明專制時代就造成承認土地私有制是使前進成為可能的一種暫時現象。可惋惜的是自由主義在這種場合內不得不破壞私有制度底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一部分有利害關係的人就要求耕地化零為整，其餘的人照法律應當服從這種要求並將自己的財產和別人的財產相交換。

可是，農地的交錯現象在現時無論如何還未成為過時的現象，並且在這一方面，為改善農業底狀況還有許多事可做。

社會民主黨有一切根據來贊助從細分的、不合理的、中世紀的經營到更大的更集約的現代經營方法的這種進步，並且在它利用這

種進步的地方，它自然不放棄機會來表示自己的影響，因為這種進步是用適當的方法進一步限制私有制來實現的。

相反的，社會民主黨在關於地主黨人方面所常常要求的，國家補助這種耕地合併的問題上，應當極端慎重。一切程序就意味着地租底增高，——土地價格，像我們看見的，可以增高三分之一。國家的補助金當然是由全體納稅人支付，無產者及在自己事業上受壓迫的小有產者也是其中之一。撥出自己極小收入底一部分，使許多地主將已增的地租取為己有，是否也列入他們的計算以內呢？有這樣的情況，當時這一類的公款補助從無產階級的觀點看來是適宜的，但無論如何不能列為無產階級政黨底任務，使它在自己的政綱上將這樣的禮物許給土地佔有。

在限制土地私有權底條件下無產階級政黨在消滅耕地交錯現象的問題上的任務當然是完全不同。如果經過過渡時期以後，耕地交錯現象底消滅給土地所有者以無可懷疑的極大的利益，那末這種消滅就是剝奪農村無產者方法之一。

田地邊緣、牧地（即收穫後之閑田作牧場用者）供給農村無產者以可能飼養山羊，甚至飼養牛。隔離的地塊底合併就取消了這些公共的牧場——在格羅森霍特和阿爾特霍特公社內，由於邊界和田界底減少，就省出了六三七莫爾根宜於耕種的土地，於是，無產者要飼養在他們的家庭經濟上十分必要的乳用牛的可能性也被剝奪了。

另一方面，小農往往因細分地底合併而受損失。細分地底合併主要是有利於中農和富農，而非有利於少數小塊土地底所有者。小所有者對細分地底合併得要墊出和大農一樣多的費用。往往在這種情形下他會直接受騙：他在農村中無權無勢，在邊地上，也就是說，在不利的，和時間底極大損失相連的地位上的田地，才落到他手裏。

這種情形無論怎樣令人擔心，可是社會民主黨總不能出來反對

消滅耕地的交錯現象。這裏在我們面前有一種情況，當無產階級底某一階層底利益與經濟發展底利益相衝突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就不能去妨礙這一發展。它的作用在這裏，像在取消牧場及森林用益權及諸如此類用益權的時候一樣，要注意到，一方面，權利底取消並不是簡單的沒收，而是以相當的賠償或給以一定數量的土地來補償，另一方面，在執行這種任務時，儘可能不許有不公正的處置，一部分要使小所有者和大所有者一同有平等的投票權，一部分則用費底分配須照土地底累進稅原則。如果我們既不能，也不應當阻礙經濟的進步，那末就應當做到，使經濟的進步儘可能沒有痛苦地實現出來。

#### 四 土壤底培養

我們用來考慮取消耕地交錯現象這一問題的那些原則，當然也指導我們去考慮因企圖鼓勵農業而發生的其他問題。

現時我們已經要求森林及水利收歸國有。可是在森林及水利的私有權尚未被取消的時候，我們將贊助對這種權利加以一切合理限制以保證森林及水利合理的措施。

與水利問題有密切聯系的，就是在本質上不是別的，而是供農業之用的、公共水利底一部分的，土壤改良與土壤培養方面的巨大工程問題：這裏是指土地底排水及灌溉、沼澤底排水，築堤以增大土地底範圍以及諸如此類的工程。

將這些工作的執行給予個別的經營者是沒有可能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萌芽的時候，專制國家就着手做過這一類工作，並且撥款提高了土地所有者底地租，正如專制國家靠公款補助來提高工業企業家底利潤一樣。自由主義的國家把新的原則放進土壤改良的政策內。如邁岑關於普魯士說道：

“現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完全確定地和國家機關底古老制度相反，作為土壤改良的一種根本思想規定出一方面堅決地鼓舞私有的土地所有者積極活動來提高企業底收入，另一方面竭力鞏固和支持這種事業慾和自助精神為目的。為避免壞事情起見，凡是在承認警察的保護，法律方面對強制私有者進行合理的土壤改良工作不加妨礙的地方，保證利益的其他的設備，只要一些指示，準備工作、技術方面的意見以及公款補助底保證就可辦到，而在這些方法付諸實行，但充滿危險和意外的時期，則竭力用金錢的補助和借貸來排除工作上的一切停頓，盡力吸引對這些設備有利害關係的人來行動，並保證合作社適當的，事實上充分發展底可能性，雖然在這上面現在只有一些數字的說明及事業底條件方面的準備而已。”（“普魯士國內底土地及其他”，第一卷，第四六三頁）

社會民主黨在這裏又有新的原則：它要做到水利由國家經營，但不是像專制國家的辦法，費用由國家負擔而將利益給與土地所有者。社會當然仍為水源底主人，水利的收入，亦即土地收入底增高，是水利經營制度底結果，應當歸社會所有。

在這種情形不可能的地方，在土地私有權是一種障礙物而且是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物的地方，那裏只有仍舊抱持自由主義底立場土壤改良的設備不由國家來實行，而由有利害關係的靠自己拿錢的土地所有者底合作社來實行；那時國家方面對農業的幫助，不是表現在對土地所有者贈與，而是表現在限制他們的私有權，表現在克服反對分子底反抗，可是，沒有他們的協助，也就不能進行土壤改良。

只有在土壤改良不是專為土地所有底利益，而且也為社會的利益，如因沼澤底排水而使氣候改善，或因開鑿運河而建築新的交通道路的時候，才能有例外。那時國家可以，而且應當把水利的經營拿到自己手裏。

但在這種場合就必須要求，凡對此有利害關係的土地所有者都担負設備方面的費用，其限度以他們的地租因這種設備而增加的為限，並且在他們拒絕交納相當經費時就要剝奪他們。如果意大利政府要想使羅馬的卡巴尼亞變為乾涸之地，那末羅馬和全意大利都會因此而獲得利益。要是靠貧苦的意大利的人民負担，使這個荒漠的區域變為繁盛之地，而使大財主、羅馬教會、羅馬王族坐享其利，那就是太多餘的事。

應當反對將公共資金用於不是為社會利益所迫切引起的種植事業方面；這不是單從無產階級底觀點來說，就是從這些工作收入底觀點來說，也必須如此。自然，從種植底觀點來說，應當贊成沼澤開墾或將海底變為農業耕作，但顯然，這些工作，除掉像上面所說的，為社會的目的，我們假定，為着衛生上及諸如此類的目的而外，只有在它們保證收入多於支出的時候，才應當贊助。

發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強有力傾向，但很惡劣地作資本主義打算的十六世紀開明專制，為了提高耕地地租的這樣企圖上，曾付了極高代價。在現時，在地租低落底時期，需要特別謹慎。當資本主義積累一天天開闢着歐洲以外極其肥沃的處女地底新的巨大面積時，當歐洲本部肥沃的土地再變為牲畜的牧場，甚至變為森林地時，要花大筆費用辛辛苦苦將幾塊不毛之地變為宜於耕種的土地，那是完全不適宜的。羅賽爾引證一封信，在這封信內還在一八四一年關於巴伐利亞土地培養問題曾說道：“在巴伐利亞森林中，在豐饒土地上，看了三十年戰爭時期農村廢墟以後你對投到多瑙河沼地內的資本和人力，會體驗到極大的痛苦”（“國家農業經濟”，第一二二頁）。自然，要通過土地培養方面這些工作來幫助農業底需要，或一般地說，來幫助農民，那是談不上的；何況他們感到缺乏的並不是土地。

不言而喻，能够產生收入的許多土壤改良工作尚未實行；金錢的

缺乏對於這些工作底實行所加的妨礙不及土地私有制及土地在許多所有者之間的分散。貨幣可以借貸，一旦企業保證有收入，就可借貸，但是大多數土壤改良工作只有在大範圍內才能進行，並不是每個為自己打算的，個別土地所有者都能進行。只有聯合一切土地所有者，才能實現土壤改良工作，可是這種情形却極其困難。懶惰、愚昧、不信任就是這種工作底障礙，此外從大的土壤改良企業所得利益對於每個參加的人也各有不同。

只有限制私有財產，國家底強制在這一領域內才能建立強固的統一。一旦一定的人數有這樣的要求並且計劃被認為是合理的，一切反對分子就應當受到強制，要他們交出土地並分担費用。社會民主黨總是贊成這種保護土地培養的利益的方法。

## 五 和疫病鬥爭

關於和威脅着動植物、威脅着文明人底生存條件的害蟲作鬥爭的問題其重要性不亞於土壤改良工作。

我們在第一章中就已經指出，現代生產方式對於動植物底健康有極大的危險，對牲畜和植物底流行病大開其門。

因此對於牲畜和水果的輸入發生了一切新的困難。對於整個區域底農業，經過某種感染了病毒的標本底輸入而遭受破壞的實際危險無論怎樣大，這些輸入的困難往往只是一種掩飾，在它後面隱藏着並非衛生性質底考慮而是保護關稅性質底考慮，在這種情形下所要注意的，不僅使感染病毒的牲畜底輸入，而且一般地使各種牲畜底輸入有許多困難，甚至使輸入成爲完全不可能。應當要求的不是和國外隔絕，而唯一的是和傳染病發源地隔離，傳染病底發源地是在國內或在國外都一樣；自然，前者的危險最大，因為傳染病發源地是和國家

息息相關的。要是不和他們防止國內流行病一同進行強有力的鬥爭，那末，在國境上一切警戒方法都完全無效。

但是在這裏我們發現私有制乃是最大的障礙。如果防止動植物傳染病的一切鬥爭不是堅決地有計劃地在全部受威脅的地區於同一時候進行，那末，防止就沒有希望。如果牲畜所有者將自己有傳染病的廐舍加以消毒，而其中有一人要是規避，則這一件事就足以使剛被驅除的惡害有重複出現的可能。如果在某一地方所有葡萄園所有者都驅除葡萄蟲，而有一人是例外，那末葡萄蟲一樣會回到葡萄樹枝上。這裏幫助只能是廢除私有權，即使是暫時的，應當以國家方面的強制來代替經營中的自由。

而且這種情形不僅在不得和惡害進行鬥爭的時候是合宜的；在這裏正如在其他各處一樣，最好的政策是預防。不僅必須愛護和培養有時給他們以害處的害蟲之敵，例如，馬鈴薯甲蟲，而且在耕作土地，建築廐舍等等的時候，應當用強制辦法採取各種預防的手段。按照對於人的住宅情形一樣，對於牲畜的廐舍應當頒佈一定的衛生指示，並設置檢察人員以監督這些指示底實施。

要防止牛底結核病，應當施行強制的結核菌免疫注射，將有病的家畜和健全的隔離，並以消毒牛乳飼養幼畜。在丹麥免疫注射得到了優良的結果。在法國全部被輸入的牛都施以免疫注射。我們不是要來考察結核菌免疫注射底功效，但是免疫功效一旦確定了，它的強制實行，自然會為我們所贊同。

社會民主黨絕不因私有權的恐嚇而害怕用強制手段，這些手段是用來和農業底敵人鬥爭的；但是，不用說，社會民主黨關心的，是要使這些手段儘可能合理地實現。

國家政權已經是而且現在也是一種強制的權力，對於和家畜及植物流行病作鬥爭的問題上，不是由於自願，而是由於必要，用強制

手段去干涉財產權。雖然這些手段是有利於農業經營者的，但總是常常碰到頑強的抵抗。其原因不是懶惰和愚昧，而是農民養成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那種不信任；平常這些機關對農民的態度是壓迫和橫征暴斂的機關，如警察局和徵稅官，農民對於自己的農業，不希望從它們的官僚主義的保護中得到半點好處。

在防止流行病時，國家底強制權力推廣得愈廣，則一方面，更應關懷農村人口底教育，不是一時的而是有系統的教育，另一方面關懷到，要使強制手段不是由法官、警官和從前的皂役，而是由在理論上和實際上有教育的明達事理的人來發佈和施行，使之和公社或區底民主自治機關完全一致。

誰應當担負實行這些辦法的費用呢？國家？這就意味着——將農業方面的生產費用底一部分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並且靠他們來提高地租。可是另一方面，把這些辦法的費用使受到傳染病害的生產的那些農業經營者負擔，而這些辦法的實施又是爲着全體農業經營者底利益，那是很不公平的；此外在這裏每個人都有一種有力的動機想把自己牲畜間或自己土地上傳染病的出現隱瞞着。

因此，這些費用常常加在有利害關係的農業經營者底全體，並且在接到即時通知的時候就立即賠償在某些流行病——牛疫、鼻疽、流行肺炎、脾臟脫疽等等發生時，因消滅病畜所受的損失；這種習俗一推廣，所有者就認爲自己有了保障，在某些流行病發生時可以免於損失，並且在賠償成爲家畜所有者全體底義務的地方，可以說，就具備有流行病的義務保險。農村居民希望同時將其他的流行病，牛底結核病及豬瘟包括在這種義務保險內，對這種願望不能不希望其實現(布亨貝爾格：“土地政策”，第一八八頁)。

自然，對這一類的國家保險，不能加以任何反對。

同時我們要說到新的問題，即國家保險對於農業的意義問題。



## 六 國家保險

通常都斷定，保險在農業領域內比在工業內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在個別的工業部門內不能實行國家保險以防一切可能的不幸的災害底後果，那末在農業範圍內却應當做到國家保險：農業完全受自然力的任意支配，在工業內這些自然力則爲人所控制。

但是生產底不斷增長，對於商品生產者，並不單是爲一些自然的因素所制約，也爲社會的因素所制約，而這些因素對於工業比對於農業更多苛求。農業多依賴於自然底變動，而少依賴於市場底變化無常。農業經營者大部分都獨立製造出工業家不得不購買的原料和補助材料，即使在國外競爭出現的時候，銷售市場對於農業經營者總比對於工業家更有保證，更少依賴於流行式樣。自然界底不公道對於農業經營者經過市場媒介往往變爲它們的對立物；災荒本身可以引起價格底提高，此種提高除補償欠收外還有餘。

此外，保險差不多正是不適用於農業中最有破壞性的災害方面，它只適用於通常使多數人中少數個人陷於不幸的這樣的災害——如每個人出很少的費，就足以完全補償受損失的人。乾旱或潮濕的夏季，嚴寒的冬季，洪水，——所有這些都是這樣的災患，它們危害廣大地面，甚至危害全國，它們例如洪水，能引起這樣的不幸，在它面前保險也完全無能爲力。這裏只有增加受公社支配的所有力量才能有所幫助。然而公社並不常常具備那樣的力量。

社會民主黨既然沒有理由要求將城市和農村中全部保險事業交由國家辦理，因而它也就很難有理由將農村內全部保險不分皂白地諉之於國家。

我們不願藉此就說，國家方面對農業所固有的保險部門，加以一定的干涉，現在已經不必要了，即使這種干涉是適當的，如：牲畜保險

和霍災保險。

牲畜保險有兩種：傳染病保險，像我們看見的，早已由國家辦理，成爲國家衛生警察組成的一部分。除這一種保險外，還存在着一種不是爲傳染病所造成的牲畜底死亡的保險。

這一類保險只是對於小的牧畜業才有意義。在大經營內一兩頭牲畜病死算不了一件真正危害企業的大事。生產愈大，則某一頭牲畜的損失愈快，乃是十分正常地定期複現的現象，是生產之不可避免的費用底一部分。大羣牲畜底所有者，像大船的船主一樣，最善於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證自己。

小農則不然。單是一頭牛的問題，在他就已經是很大的損失，對全部企業往往是嚴重的阻礙。他的收入太少，他無力定期地從收入中勻出一部分作爲準備金來購買自己的家畜，並且各個不幸的機會，在他付清買價以前，就會危害及他的牲畜，在這樣情況下不能求助於保險的農民，除了向牲畜商人借貸之外，毫無別的辦法；於是，這個牲畜商人既是商人，同時又是高利貸者，他有可能竭力剝削農民。

很顯然的，這就是爲什麼某個農村內牲畜底所有者——農民，要聯合起來，互相担保使自己免於這樣的災害，並且共同担負災害的費用。這種形式的牲畜保險是企圖用合作的辦法使小生產能得到大生產的益處；但這些企圖無論怎樣有益和必要，它們在這裏也只是大生產之可憐的代用物而已。

自己保險自己，大企業就這樣既不損失資金又不損失利益地盡可能採用適當的預防方法來預防牲畜的損失；農民則不然，不言而喻，他的牲畜有時由於資金底缺乏，有時由於廄舍底不良建築或不足的飼料，常常遭到危險。保險費底償付，在一切情況下，並未改善他在這方面的地位。誠然，農民更大的關懷自己的家畜是可以相當補償資金底缺乏，但是保險正是向他指出這一類關懷之無益，並且常常

是直接的誘惑，使他不妨擊斃壞的家畜，而用保險公司賠償的錢換一個好的家畜。

因此，農民的牲畜保險的經驗開始得無論怎樣早（在十六世紀時我們就發現有這種保險了），資本無論怎樣貪婪着它能夠置於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的新的領域，可是直到現在資本寧願遠離這樣的試驗，這些試驗，在全圖使資本走上這條道路時，總是以完全失敗而結束。在農民當中存在着相互保險的地方，他們就會相當的彼此注意牲畜飼養，但這種情形，在牲畜保險成爲資本主義企業時，就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了；經常的危險威脅着資本主義家畜保險的，就是農民方面的欺騙，他們的利益只能表現在那種情況內，即是他們自己努力欺騙自己的顧主。可是，對任何牲畜商人都可容許的這種辦法，不會引誘大資本，大資本寬宏大量地將保險底這一領域讓之於國家或公社，——這也是特有的……一種社會主義！

一直到現在牲畜保險通常不會越出當地的小的組合範圍以外，這類組合在牲畜受損害時以這一種或別一種方式來援助自己的個別的會員。這些組合是一些彼此很熟識的人底聯合，因此管理監督是一件非常輕而易舉的事，而個人方面底疏忽或顯著的欺騙所生的對於團體的損害，也能及早加以預防。但是這一種組合也有其不利的方面，即限制着參加保險的人數。因此在每個地方牲畜傷亡，例如因飼料缺乏而增加的時候，組合就表現出已經無力完成自己任務，也就是說，全部保險都成爲欺騙的和無望的了。

無疑地，國家應當干涉這一領域。國家或者可以使個別的地方組合相互聯合起來，那時他們就有可能共同擔負起他們當中某一個極嚴重的一時的損失，而不冒組合瓦解的危險，或者強迫個別的牲畜所有者加入組合並以此擴大保險的範圍。

無產階級總是儘可能不選取官僚政治協助下的組織，寧可選取

自由的民主主義的組織，這就對他的保險機關而言也是對的：同樣沒有政府的幫助，無產階級也能建立起自己的職工會以及在全國組織階段上的互助儲蓄會。但是如果農民覺得有必要將自己的地方保險公司聯合為一個全國的組合，他總是認為自己不能夠靠自身努力來實行這類辦法，並在別的情況下轉而求救於他所遇到的不足信任的官僚政治，無產階級沒有理由停滯在中途。此外如果他在這裏也還是有用的，他馬上就予以幫助。

如果向國家呼籲是一種手段供給一些個別的土地所有者以補助金由納稅者來負擔，例如，當國家用豐富的保險儲金使土地所有者能靠公費去改善牲畜業底狀況，那又是一回事。無產階級底政黨絕不贊助這一類小恩小惠。

雹災保險的情形就完全不同。提供漠不關心的和不誠實的經營者以獲得貸款的藉口的那種可能性在這裏完全被排除了。另一方面，雹災的危險以同一程度威脅着大經營和小經營；雹災可以一下子毀滅大經營與小經營幸福底全部基礎。如果阻礙國家的農業發展及加強不合理的土地耕作的小土地所有對社會的依賴常常是國營牲畜保險底後果，那末在雹災保險情形下這一類危險並不存在。

雹災保險和家畜保險不同之點就在：雹災保險注意到受全區甚至全國全部經濟破壞威脅的危險，而家畜保險則在某些地方却可避免威脅着這一種或那一種經濟某幾部分財產的災害。雹災的破壞在這方面有些和水災的結果相似，但雹災的破壞多半只限於比較小的地面，因之和後者相反，雹災保險在足夠的人數時對於參加者就不是特別重的負擔。“雹災保險底組織（如果這種組織包括比較狹小的地面），如何沒有生氣，這從威敦堡和黑森當時爆發的保險公司底破產中，而同樣從那個事實中，即較小的互助社往往不能不付出最高限度的貸款中，就可明顯地看出（例如“柏林柴雷拉公司”在一八八七——

一八九〇這四年期間，付出最初保險金底百分之一七五，九九，一三三又三分之一及百分之百”（布亨貝爾格：“土地政策”，第一七六頁）。

在大多數地方雹子不均勻的降落，以及雹子特別常常降落在同一的地方這一事實都會妨礙由私人企業家經營的保險的普遍性。有些地方，在相當時期以內完全沒有遇到雹災，當地的人就容易有一種沒有危險的感覺，而不要保險，這對於平常沒有過多資金的農民尤其如此；而在特別受雹災威脅的區域內，私人設立的公司或者完全拒絕保險，或者答應保險，但對這種保險，要求極高的保險費。

這樣看來，國營的雹災保險組織就有必要了，這種組織在巴伐利亞和巴登已經實現到相當程度。國營雹災保險組織底必要性是由雹災造成的荒蕪的那種危險性表示出來的，並且此種危險在沒有任何保險的地方就可以引起像水災一樣的災難，因此國家不論願意不願意都得加以干預並予以必要的援助。國家援助底這種必要性在未實行保險的地方，就完全證實國家貸款給保險公司的正當性，因為這正可減輕國家在非常時期救濟的費用。

我們雖然絕不傾向於任何的，那怕最小的擴大警察國家底活動範圍及其社會作用的範圍，可是剛才所述的那種雹災保險在我們看來却是全然合理的辦法。

但不應當把無論是國家保險無論是私人保險底可能結果估價過高。保險對於遭受破壞的人無論怎樣有益，在別人的雙肩上，要別人負擔這些災害，這種保險就被人覺得是一種新的賦稅，保險底面積愈廣，被保險者應當負擔費用的災害底範圍愈大，則這些賦稅增加得亦愈多。

這些災害和現代文化發展底進程平行地增長着，現代文化帶給我們的，是牲畜死亡數更加增多，各種有用植物絕跡，水災以及大雹災，如果亞爾古地方的森林官——呂里凱爾的理論是正確的，雹子的要

常常在無隱蔽的高地上面發作，即是說可以把森林所佔面積底減少認為是雹災底原因。保險完全不涉及災害底原因；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保險用來防止破壞農業的最嚴重的災害的發生是不濟事的。保險頂多只是一種可憐的代用品，代替那些使農業經營者不依賴自然底瞬息萬變，而使自然屈服於人類意志的辦法。減少水災及雹災危險的森林及水利經濟底科學設計的體系，防旱的灌溉設備，以及防止過度潮濕的排水設備，不僅注意生產率底提高，而且注意改良品種底耐久性的有用的動植物底人工選擇，食蟲鳥底保護，廄舍之合於衛生的建築，適當的飼料等等——這些辦法比任何保險更有幫助。不言而喻，這些辦法中很多辦法和地少的農民底整個生活方式立於顯著的矛盾地位！你試試要求他在寬敞的清潔的廄舍內合理的飼養和照料牲畜罷！

## 七 合作社·農業教育

由當地公司承擔的牲畜保險，像我們已經看見的，實質上，乃是企圖利用合作社的組織來獲得大經營底利益。在討論有關土壤改良的諸問題時，我們就已經涉及合作社問題。這裏對這一問題還得再說幾句，當作我們評述農業的那些要求（這些要求是會得到社會民主黨方面的贊助的）的結論。這裏我們簡略地說一說，因為在以前的一章中我們已經充分說過關於合作社在農業中的意義。可以直接了當地聲明，社會民主黨一般地異常同情於合作社，尤其同情於農業合作社。我們完全不把它們估計過高，也不把它們看做是拯救農民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手段，因為它們既適合於大經營，也適合於小經營，而且在它們加強小經營的地方，它們更加把小經營的所有者或者變為資本家剝削者或者變為被剝削者。但我們也並不把農業合作社視為到社會主義王國的過渡階段，除了它們像一切股份企業和每個大生

產一樣，一般地同是這樣一個階段的意義以外。

無論如何，合作社（在農業中甚至比在工業中更甚）是經濟發展底強大力量，並且也可供作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的一種手段，也許，比這一發展——剝奪小私有者——底專門的資本主義手段更好些。我們不能在現代制度底範圍內去妨礙後一方法（剝奪小私有者）底發展，但我們也不願意去幫助這種發展。相反的，對於合作社我們倒應當幫助它發展。

可是，在這裏我們不得不只限於廢除那些妨害這種合作社自由發展的立法的枷鎖。用國家的款項補助合作社在某種場合內只是在無產階級幫助下供給個別私有者貸款以提高他們私人物質幸福水平的一種辦法。發給貸款來促成腐敗的公司的濫設及金錢底輕率的浪費，那不是為合作社本身利益，至於擁有合作社補助金，可以成為每個政府尤其是不民主的政府吸引政治同情到自己方面的一種手段，可以成為收買底手段，有如弗爾夫王底基金一樣。

所以合作社底大部分自己就拒絕國家的補助金（關於這一點可參看克留格爾博士載於“社會實踐”（*Sociale Praxis*）中的論文，第六卷，第三三八頁，第七卷，第二〇三頁）。這可以名之為“自由貿易論派”，但其實國家補助私人為滿足他們私人的慾望也離社會主義太遠。以利潤供給資本家而以危險歸諸國家，亦即歸諸人民大眾來保護農業的商品生產，這種社會改良，無疑是地主黨人底最迷人的理想，但是這種改良或者不能大規模地實行，或者不是為無產階級底利益。此外，還有一個有力的手段來改善農業底狀況，不僅不阻礙經濟的發展，而且還異常地加速經濟中發展。這手段就是普及職業教育。

在這問題上一般可以說到的最重要之點，我們在上而觀察國民學校問題時就已經說過了。這裏用不着多說，社會民主黨盡力促進農業和工業教育，準備在一切場合內比大量初級國民學校底簡單設

備更進一步：當問題涉及中等和高級農業學校，農業實驗室及實驗場底設置和改善，涉及模範農莊、展覽會等等底設置時；社會民主黨是不會吝惜的。

我們相信，我們已經涉及了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對農業底發展有意義的並容許社會民主黨干涉這一過程的一切最本質的要素。

在我們的結論之後幾難有人再斷言，我們的觀點只是“社會重商主義”底表現。可是，我們願意承認，我們的要求並未越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的土地政綱界限之外，而在“急進主義”意義上這些要求甚至比地主黨人及土地改良主義者底別的政綱還略遜一籌。我們從這樣的“缺點”中倒以那種希望自慰，即我們在自己的土地政策中遵守了工業與農業發展底統一性，我們的觀點在兩方面全然一致，並且我們對於農業絕不要求與工業相反的東西。地主黨人和土地改革者在這問題上用不着感到不安：根據他們的意見，農業是一個獨立的整體；社會民主黨人底義務則只是把農業當作一個同一的社會有機體底一部分，即只有完全適應這個整體才能發展的這樣一部分。

會有這樣的情形，即實際家由這裏所提出的要求中，會找出某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但在決定這些要求底目的性時，問題應當是關於它們是否能夠促進農業底發展，不必注意它們是否能夠吸引農民。我們早已同意，這些要求中有些要求（其中不僅是那些關於保護勞動者的要求，而且是涉及限制土地私有權的那些要求）正是會妨礙將農民吸引到我們的陣營來。

但如果說，能夠把農業提到較高的發展階段的那些方法不適宜於爭取農民底同情，那末這絕不是證明這些方法底不合理，而只是證明小農生產方式底不合理。



## 第四章 保護農業人口

### 一 變警察國家爲文化國家

如果社會民主黨在拯救農民的事業上不能和農業政黨競賽一下，那末總還有一個領域，在這一領域底範圍內社會民主黨可以提供給農村人口的，比資產階級政黨中“真正農業的”政黨所提供的更多。

爲說明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稍微離開本題說一說。

現代生產方式有使城市靠農村而致富的這一根本趨勢。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的敘述中已經說過了。這裏我們還要提出一些有重要意義的考慮。城市底富裕是資本積累底自然結果，資本本身以及大量的剩餘價值（農業勞動過程中產生的剩餘價值也在內）更有力地集中在城市內。此種趨勢只能隨着資本主義制度底消滅而消滅，因此農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更有興趣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到來。

工業移置於農村以及農業底資本主義化，在上述的趨勢內本質上沒有改變什麼。只是剝削方法對一部分農業人口有所改變。但是在城市內從農業人口榨取的剩餘價值底集中總是繼續下去。

關於從城市帶給農村利益以損害的思想，是我國地主黨人通常的主題；他們想藉增加消費品和原料底價格，將損失轉移到城市人口身上，來補償這種損失，他們就錯誤了。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們

用這樣的方法只是增高地租和改善土地所有者底地位。而其實不能將土地所有者和所有農業人口等量齊觀，農業人口底大多數不是靠佔有土地私有權生活，而是靠自己的僱傭勞動生活。固然許多農業經營者單就外表上看來好像是土地所有者——其實城市中執有抵押權的人才底真正所有者。而且大地主也愛把自己的地租揮霍在城市內。消費品價格底提高及地租底增長就增加着地產底價格、提高抵押的利息（在財產繼承和出賣的場合內）並且增加着大地所有者及其兒女在城市中所消耗的費用。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僅增加剝削城市人口，而且增加剝削農村人口底大多數，也就是說，歸根到底增加着城市剝削農村的程度，而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降低這種剝削的程度。

既然可以抵制現代生產方式範圍內的這種趨勢，那末努力改善勞動條件及農村無產階級底文化生活環境的社會民主黨，就應設法抵制這種趨勢。

但是不是單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使農村成爲城市的犧牲品。現代中央集權的國家在這同一方向內也起着作用，這種情形甚至在現代中央集權的國家完全在地主黨人影響下並好像傾向於相反方向的地方，也可觀察得到。

現代國家，像過去一切既存的國家一樣，首先就是一種統治底制度。現在國家權力底支持者，議會、尤其是國王，一直到最近時期，都看出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在於使不大的，或多或少獨立的中世紀公社喪失其獨立性，並奪去其權力手段，把它們合併起來進行現代國家底教育。城市和農村公社、馬克公社、封建領域，喪失了自己的自治和它們從前用以支配的權力工具。司法制度、警察、軍隊、稅收機關都無情地集中起來。

但是現代國家，在這裏也正如過去一切既存的國家一樣，只是在

極不重要的階段內才是文化利益底代表者。國家把一切集中在自己手內，這一切只是統治底工具，國家把文化的任務付託公社和各區，甚至付託給私人：這些文化任務底集中化並不引起它的注意。它把初級的國民教育，而一部分中級的國民教育推卸給公社去承擔。高等學校自然是由國家辦理——在大家期望之下它不能強迫公社去接辦，但是高等學校在國家手內主要是爲着統治底目的，而不是爲着文化底利益，並且高等學校的任務是訓練服從國家的官吏，而不是教育自由的研究者。

福利警察一字廣義而言，如：衛生警察、醫療、慈善事業都由公社負責，而有時由私人負責。交通工具底修繕和保養，有時是公社的事，有時也是私人的事。國家平常干預這一領域，只限於改善軍事交通及與軍事工業有聯系的時候。國道都被叫做軍用道路，那是最有意義的。而鐵道到最近時期，變爲國有，特別是在軍國主義國家內，而不是在瑞士、英國和美國。雖然德國皇帝說過，我們的世紀是交通道路的世紀，但是，普魯士國道底標誌，——不是交通底標誌，而是軍國主義和掠奪底標誌。

現代國家予以關懷並與以幫助的科學和藝術的機關，起初也只是宮廷豪華的附屬物，起源於宮廷劇場、宮廷陳列館、宮廷博物館，而且直到現在在萊因東部它們還保存着宮廷的性質。

但是，既然國家除統治工具外，還獲得文化底工具，並引到生活上來，國家就常常把它們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集中在首都。農村居民對此負擔不得不像城市居民一樣，可是只有後者才能享受它們。

在國家生活內必然出現相反性質的趨勢，但這種情形的發生不會早於無產階級對國家生活命運具有影響以前。國家權力是消除一切資本主義制度的強有力的槓桿，而且無產階級必需奪取這個政權，也是自然而必然的。不過不應當把無產階級專政只想像成大城市底

“卑微的和被侮辱的人”在一天黃道吉日用暴力奪取內閣，並利用國家權力底強制手段，去劫奪有錢人。

無產階級不把自己和國家提高到最高的發展階段，就不能順利地掌握國家政權；就不會為自己的利益利用這個政權。只有在這樣的鬥爭中，他才獲得使他達到統治階級地位的道德的和知識的品質，並完全消滅一切階級的統治。但無產階級爭取掌握國家政權，就意味着不單是簡單的爭取這一政權工具：鬥爭底結果，專制的君主政體或寡頭政治應當變為民主政治；同樣就發生國家行政權底縮小和它的文化任務底提高；一言以蔽之，就是警察的和軍事的國家轉變為文化的國家。

其實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也無需進一步的解釋。

可是，如果國家底這樣轉變有利於全人口，那它對於農業人口比對於城市人口還要更有利些。在這種情形下農業人口所得較一切的人為多。

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種情形。

## 二 自 治

社會民主黨要求在國家的、地方的和公社的事業中人民有自治權。後一種自治對於農村居民比對於城市居民尤為重要。國家的官吏就其本質而言都是城裏人，他對城市的需要，比農村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和同情。除此以外，城市居民比起農村居民來，還有一個重要的手段，來對付官僚政治：即強有力的出版物。這當然並不妨礙政府和官僚政治靠城市工業部門的負擔對土地所有制予以明顯的保護。可是，有可能享受這樣有利地位的土地所有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大土地所有者，尤其是他們中的那一部分，即自己是城市階級，住在

城市中靠自己的地租生活，並且對政府和官僚政治具有個人影響的那一部分。但是這些土地所有者底利益和農村居民大眾底利益是矛盾的，他們剝削農村居民，並且他們的影響恰恰引起在國家行政所及的一切特殊場合內，利歸大土地所有，害則屬於農村居民底全體。這種情形，例如在攤派公社捐稅的時候，在估價野禽的損害的時候，就可看出。在這裏也正如在“保護”農業的政策下一樣，國家政權底重農傾向，通過關稅和獎勵，只是造成對農村人口損害的一種手段而已：它們不是減少這種損害而只是增大着這種損害。

省、區和公社底自治應當不僅阻止低能的、專橫的、甚至受賄的官吏們加之於農業人口的監護和暴行，而且抵制大土地所有底優勢，最低限度因為這種自治，是基於政治的勢力，但它在經濟領域內將會有利於農村居民，只要完全取消了一部分城市的官吏，而吸引另一部分到農村來，在農村中他們靠自己的薪資生活，現在他們已經不是發號施令者，而是人民底僕人。

### 三 軍國主義

但是對於農村居民，比約束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還更重要的任務，是限制軍國主義。自然，軍國主義的負擔對全人口都異常之重，可是對農村說來，更其不可忍受。產生出不斷增大的失業後備軍的工業，抽出一部分工人移作常備軍之用，比一般感到工人缺乏的農業要容易得多。從農村到城市去當兵的青年人，往往失去對平靜的農村生活的戀慕，並且永遠拋棄了農業。那些回到農村去的人——並非常常是最好的分子。人們戰戰兢兢地防護兵士使其不受城市文化底影響；老天爺保祐他不要感染一些城市的精神罷！

士兵的飯店和妓院，這就是祖國保衛者在閒暇時間唯一“適合身

份”的地方，沒有一處會引導他到革命的思想上去；兵營的精神和梅毒，這就是他從城市帶回農村去的一切。

用以供養軍隊而從農民身上強制徵收的和農民為供養身穿軍服的子弟而自願繳納的租稅，都交到城市並在那消耗。

一些工業部門，城市居民底許多階層，都靠軍國主義營養。一個農民從軍國主義得到的只是損失和租稅。

因此就很難了解，為什麼農民恰恰是軍國主義底最好支柱？沒有一個人會斷言，民族意識在農民當中比在城市居民當中更有力地發展，農民有更活潑的理想的鼓舞。但是因“國王的制服”而對君主政體的同情和狂喜——也同樣不能解釋這個問題。

我們以為比較接近真實的是那種假定，即農村人口多少明確地感覺到敵人的侵襲加之於他們自己——自然除要塞不算，——比加之於城市居民更慘重和更厲害。

戰爭底恐怖和蹂躪以其主要的力量破壞了農村；由是農民深怕國家沒有防衛，由是他對於拒敵於和平的耕地之外的軍隊深表敬愛。

要將農民捲入反軍國主義的鬥爭，首先就必須明顯地向他證明，問題決不是不保衛“祖國”。

但是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有兩方面，平常是互相混淆的，必須嚴格地加以區別。

首先我們要指出樹立永久和平的意圖。現代各個強國底軍事設備採取這樣瘋狂的範圍，使最優秀的愛國者都因之驚懼。不能再進一步了，——在這點上每個人都信以為真：事情會走向軍事制度底破產，或者走向最具破壞性的，為過去爆發過的一切戰爭中最野蠻的戰爭，這種戰爭一定會被容許的，因為作為和平保證的武裝負擔再也不能忍受了。人們以為只有一個辦法可以防止這個戰爭：通過各個強國相互協商普遍裁減常備軍以及獨立國家自願服從國際仲裁法庭，

服從這個法庭底一切決定。

無疑的，這種思想是漂亮的，但就其對社會而言是空想的，在社會內利益底矛盾十分強烈，甚至在一國之內經濟鬥爭這樣的現象，例如，罷工鬥爭，用仲裁法庭也不能解決。永久和平底前提條件，最低限度應當是那個條件，即各大國首先應當解決它們現有的一切爭端，並預防新爭端底發生。但我們此刻離開這個前提條件比以前任何時候更遠。由於資產階級國家底發展所產生的一切民族問題尚未解決；歐洲底分割尚未完結，而為分割世界的最後鬥爭又已開始。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民族間利益底更深刻的對立，以致不能期待資本主義政府間締結聯盟。這一任務註定是要由無產階級底國際團結來解決，這種團結現在已經是比資產階級的一切和平會議還更可靠的和平的保證者。

以人民武裝即民警來代替現時的常備軍，這種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種代替在現代社會內，甚至在現存各國相互利益極尖銳矛盾情形之下已被實行。這種代替不是要取消軍隊，不是減弱軍隊對付外敵的戰鬥準備，而是企圖使它在國內成為無害而已。現在軍隊不僅是防禦外敵的一種手段，而且是用來壓制“國內敵人”；軍隊是一切統治工其中最可靠的工具，是統治階級底最堅固的支柱，因為他們的政權是依靠政治的因素；軍隊正是這樣一種手段，它作為最後手段來鎮壓被剝削階級和平解放底一切企圖。因此要求實行民警制度乃是高度文化的要求，這一要求對於凡是誠懇希望社會發展盡可能走着和平道路並盡可能使暴力和殘忍少出現的人都是願意的。

歐洲永久和平底理想首先追求着經濟的目的。這種理想要想從資本主義社會去掉它所不能忍受的重担。這種理想只提到政府間的相互關係，而不觸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對外解除武裝無論如何還不是對內解除武裝。剛剛相反：現代各大強國在自己的軍隊數量方

而互相爭勝的傾向最後就會走到軍隊開始逐漸接近人民武裝的形式，指使人民武裝來反對人民就更加困難，那時解除武裝思想所有的意義，即是各國政府都採用由職業兵組成的少數軍隊（這些職業兵是從流氓隊伍中招募來的，他們準備為較好的報酬就可槍殺父母）來代替現在來自民間並回到民間去的大量軍隊。

因此要求解除武裝，或者說得更正確些，希望解除武裝，是和軍國主義鬥爭底一種方式，用這種方式首先是可以說服資產階級各階層的，雖然是在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上一般地不能希望其實現。用人民武裝來代替常備軍不能吸引這些階層，也許是因為，或者可以更正確些說，因為人民武裝乃是只能實現解除武裝的理想的這樣社會狀況底一個先決條件。

民警制這一理想，首先追求的，不是經濟的目的，而是政治的目的。這種理想乃是真正民主主義底必要的先決條件，即是說，是這樣的政治狀況底必要的前提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人民底僕人而不是人民底主人。但是從這種理想的實現中也難於期待經濟壓迫有顯著的真正的減輕。在這方面就不得不偏重於永久和平底思想。

人民武裝這一理想無論如何還不是意味着人民武裝程度底減少，反而是迅速地增加它，因為要把能夠攜帶武器的每個人都要武裝起來。這一情況將引起多大的費用——這一問題要由技術的發展程度來解決，技術的發展不能預見，而且正是在軍事領域內，技術的發展，一直到資本主義國家間利害矛盾繼續存在時，將會慶祝其巨大的和最不祥的勝利。

從全體居民的人民武裝制度發生的直接的經濟利益底多寡，依許多技術的和政治的條件為轉移，這些條件不斷地在變化，並且現在什麼也不能預見。

但這種利益無論怎樣大或是微小，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農村人



口從民警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在人民武裝制度下兵士教育底方法無論怎樣固定下來，然而它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這依賴於許多政治的、技術的、經濟的和教育的條件，——在每個個別的場合內這個制度會使現在存在於兵士與國民間很大的差異歸於消滅。這是民警制度底基本特徵。一方面，結束了自己軍事訓練時期的公民，仍為武裝的人（在瑞士每個能攜帶武器的公民都有武器在自己的家內）；另一方面，盡力設法使兵士在受軍事教育期間仍為公民，使他的服兵役時期（離開其餘居民的時期），即是他住在兵營內的時期，以他對於獲得戰鬥的準備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時期為限，並且使這種訓練底大部分盡可能不在兵營內進行。在青年時代保衛能力底有計劃的訓練在每一種人民武裝制度內都起着顯著的作用。因此兵營內的訓練只消幾個月。然而這種情形意味着不是別的，而是在民警制度下兵士離開自己職業的時期對於工業造成極大的困難，但並不是重大負擔。這對於生產活動底每一個部門，尤其是對於缺乏勞動人手的農業都可以這樣說，對於農業，兵營就意味着軍隊集中在城市內，意味着最壞的不在主義形式——農業的最重要的勞動力底不在主義，這些勞動力不僅從勞動者一變而為剝削者（無疑的，完全是非自願的），而且，除此以外，他們把剝削來的生產品消費在遠離農村的地方。可是甚至就是把從民警制度中所得的直接的經濟利益認為無足輕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制度正是廢除了農業中一個最煩重的剝削形式。

#### 四 國家有辦理學校、慈善、道路等事業的義務

但是社會民主黨渴望把國家從統治的機關變為文化的機構來幫助農業，不僅是在這一消極的形式上，在和官僚政治及軍國主義底全

能作鬥爭的形式上。戰鬥的無產階級也應當設法使國家成爲普及文化和解決文化任務的一個工具，這些任務是私人和公社無能爲力的，而同時對於全體人民却有無可爭辯的需要底意義。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過，有許多文化的任務，它們在現在仍由公社辦理，只有對於城市才有滿意的解決，但是這些任務底執行對於農村正如對於城市一樣的極其必要。甚至有些任務在農村中比在城市中有更大的意義。即如，前者（農村）就很需要優良的國民學校，因爲在農村方面就缺乏其他的教育手段，而農業又是比大多數城市的職業需要更多科學知識的這樣一種職業。救貧事業其情形也是如此。在城市中，財富堆積在那裏，有許多私人，他們毫不困難地從自己的剩餘分出一部分，以便消除貧困底最悲慘的情景。在農村內，私人的慈善事業，在這方面在純粹農業的和少地的居民絕無剩餘以爲生的情形下，差不多什麼都不能做。在能够靠自己的收入來減輕貧困底最尖銳的現象的大地產存在着的地方，又往往有這樣一種不在主義，即是有錢的大地主完全不知道在他們地產的周圍有貧困的現象。就是那些地主，他們大部分時間住在城市，即使他們真表同情，他們也常常只會分一些餘潤給城市的窮人，而不是給農村的窮人。

加特力教的修道院則是例外，修道院本身往往就有大的領地，這些領地的住民並不實行不在主義，而且也沒有兒子或女婿在城市，要他耗費自己的地租來養活他們（兒子或女婿）。修道院多半是爲在農村內從事慈善事業而設的。雖然修道院全是這樣，可是必須指出，如果把它們視爲專門做慈善事業的機關，那末耗費在行政上的費用未免太多。在修道院廚房內爲窮人設置大餐桌，無論如何都比把食物豐富的供給所有的人更便宜，這使修道僧們衷心喜悅。

像慈善事業那樣，在農村內醫療和衛生事業一般說來都不很重要。農村的精神上的荒涼把醫生們都趕到城市去。在農村內更加感到

醫生的缺乏，可是在城市內許多年輕醫生又不容易找到實習的機會，患病對於無產者雖然到處一樣壞，但在農村內對於無產者比在城市內情形更為惡劣。在城市內爲着學術的目的常常把無產者當作實驗的“材料”，收容在公共病院內或者他享受醫生底廉價的診斷。在農村內無產者不得不長期去找醫生，最後他不得不求救於庸醫及巫醫或某個老太婆底感應治療。在這裏關於醫院或隔離傳染病人的地方是談不到的。

這裏要加上農村在交通方面的落後性。

由於農村人口底分散性，由於各個居民點之間極大的距離以及農業生產品底微小價值，這樣的農業生產品只在有優良的運輸工具的時候，才能多少補償遠距離的運輸，因而任何地方良好的道路都不像農村那樣必要。在城市內人口非常稠密，而在農村內我們却往往看到相反的現象。此外在城市內長途交通底發展其資金不斷增加，並且在城市內廉價的交通工具底設置（如公共馬車、電車、馬路、運輸事務所等）已成爲這樣有利的營業，即有力地吸引資本到這方面來。在農村內沒有一個人關心這個問題，而窮乏的農村公社又不能用自己的資金來建立必要的交通。

這樣看來，城市與農村間的對立是很顯著的。

社會民主黨向國家指出了那些非公社力量所能辦到的任務後，並對此加以干涉。國家應當擔負起國民教育、救貧事業、國民健康以及交通的費用。

可是，這樣的要求並不意味着，所有這些部門從某一個時候起都爲官僚主義千篇一律的方法所照管着。公社、區和省底自治不應當縮小；在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國家內自治的範圍還應當擴大。公社、尤其是在普選制原則勝利的地方，並不是像國家那樣堅強的統治制度；公社不願將學校變爲執政者意圖的工具，或爲執政者的利益利用救

貧事業及交通工具來收買選民。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公社具有的進步要素比國家行政具有的更多，國家行政比城市公社更處於反動的——落後的農村，落後的統治階級，士兵、僧侶、貴族的影響之下。國立農村小學，看情形也許是有利的，但對城市而言，決然是一種退步。

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哥達綱領的“國家舉辦普遍平等的國民教育”這一要求時，馬克思在自己的一封有名的信中就指出：“國家舉辦國民教育，是一件辦不到的事。單單用一般法律來決定國民學校底經費，教員底選擇，教學課目等等以及像在美國發生的那樣，藉助國家監督來考察這些立法規定底執行——這完全是另一回事，比把國家變為人民底教養者不同！相反，政府和教會對學校事務的各種影響應當加以排除。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內國家本身正需要人民加以嚴格教育”（“新時代”，第九卷，第五七四頁）。

的確也很少有理由使照顧窮人，關懷病人及交通道路像學校一樣去服從國家官僚政治底陳規舊套。在俄國必須保證人民有醫藥救助就迫使採行病人的公醫制度，這種制度只有在地方自治機關——鄉紳會議底代表們把公醫的組織掌握在自己手裏才具有某些意義，至於在照顧窮人及修築道路時必須充分認識地方的資源、居民需要底範圍，那是用不着多說的。

此外，把國家從統治機關變為文化機關這種意圖是與賦予國家以不必要的新的支配手段不相容的。教會慈善事業是教會權力底基礎之一，至於政府管理大的國有道路的情形如何，每一次的選舉都會指出：忠實於政府的選區比較反對政府的選區常有更多機會看到自己希望新鐵道（寬軌與窄軌鐵道）街道、橋樑等等底建築都已實行，這種情形又幫助政府底許多崇拜者得到自己的委任狀。一旦政府有權支配各地的道路，它在自己手中將獲得何種力量，這是可以想像得

到的。

在所有這些領域內只能使國家政權具有補助資金徵集者的作用，這種資金是經由國家稅收得來，並按一定的標準給與各省、各區、各公社、完全由它們去支配。

## 五 裁判底免費

社會民主黨底要求中還有一個要求，也是使國家離開統治底機能而進入文化的機能並且對於農村居民比對於城市居民更其有利：這便是免費裁判和法律保護的要求。我們十分了解這樣的要求，它絕不是指從這時起一切裁判的事件都應當免費：一切訴訟，無論它們是哪一類，都應當由國家的資金，也就是說由無產者的資金來承擔。如果兩個資本家為一百萬遺產爭吵並互相扭打，兩個股份公司為某種特許權而互毆等等，社會民主黨就不能要求無產階級對這些訴訟負擔一部分費用。

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有權利任意向法庭起訴由國家來承擔賠償虛幻的不公正的費用。如果國家要負擔費用，很顯然的，國家就得有可能來決定，哪些訴訟事件有理由，哪些沒有理由。這一點就已經可以引起這樣的處理民事訴訟事件的組織，這種組織和現時檢察機構底起訟壟斷權有其危險的相似之處。國家獲得了新的政權工具。另一方面，從我國檢察官和法官底行動看來，我們還不能希望國家官吏代替自由的辯護士。

要求司法免費，照我們的意見看來就有那種意義，即應當創設一些機關，使沒有財力的人有可能捍衛自己的權利，因為現在無資產的人還沒有可能來捍衛自己的權利。這裏就是指無產階級在某些地方已經爭得了或實現了的那些機構底組織而言，這些組織能夠使它的

每個成員捍衛自己的權利；這些機構應當成爲公共財產，而維持這些機構的費用，現在是由各個團體和公社擔負，以後應當由國家來擔負，在這方面自治底思想不應加以限制。這裏我們要說一說產業裁判和勞動者的免費法律詢問處。

對免費裁判的迫切需要，誠然可以通過民衆中可資信託的人所組成的裁判機構來滿足，他們在職業裁判所底領導下沒有多餘的形式手續，就能迅速而便宜地解決了各種小事件，正如法律詢問處底機構一樣，在它裏面明達事理的人免費而且公正地予訴訟當事人以關於他們的權利，他們希望訴訟勝利的一些知識並指示他們較好的道路。

這樣的法律事務所底基本好處，在我們看來並不是在於它們給各個人有辦法獨自進行訟訴，而是在於它們減少訴訟案件。因此它們特別對於農村居民說來，是一種善行。

律師是靠打官司的兩造生活，醫生是靠病人生活。從醫生的利益說不是健康的社會，而是疾病叢生，從律師的利益說是訴訟的頻繁。自然，在這兩種職業內也有不爲這類見解指導的正直的人，但是無力抵抗這類見解的人也不少，這類人在律師當中比在醫生當中多得多。律師所談的只是金錢，醫生談的還是生和死的問題。醫生不能以機智勝過自然，而多才的律師却能以奸計勝過偏狹的法官底形式主義。事情一定是已經太壞，才不會剩下半點希望。有些律師，他們在爭論的場合，不管事情有沒有調解的可能，總是勸人打一次大的官司，這種官司有利於律師而有損於他的顧主（訴訟當事人），這是不足爲奇的。而這些官司任何地方都沒有農村中那麼多。這自然不是發生於農民對“訴訟慾”有某種神秘的偏好，而是由於農村財產關係底結果；許多訴訟事件都因財產而起。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多的私有者，像在農村中那樣，在農村中甚至無產者底大部分都擁有土地財產，這種

財產往往小到極可笑的地步，但總是能够影響它的所有者底心理的一種財產。如果農村有許多私有者，那它就有給予頻繁的訴訟以機會的特種形式的財產——土地所有權。土地本身就是一些特別的東西。其他的物件，所有權固然可以推廣到它們上面去，但極不固定，或者有如貴金屬一樣，容易改變其形式和位置。土地總是固定在同一位置上並且甚至在幾世紀期間也很少改變其形式。這是經濟結構中最保守的成分，是一般現象中最不變動的成分。土地所有權本身就表明這種保守主義。和其他物件的所有權比較起來，土地另外還保存着特殊的權利和義務，過去幾世紀舊的權利義務還沒有取消，新的權利義務又加上去了。這樣，一塊土地底所有權就不單包括這樣多平方公尺地面的使用權而且包括許多其他的權利和義務。至於在別的私有財產形式下不可能的東西，——在土地私有制形式之下都是可能的：從十七世紀相沿下來的審判案，在遠古的時候即已喪失的封建時代底權利和義務——大部分都沒有明文規定，完全和現代的權利觀念不能相容，或者很難相容。對於打官司是何等不竭的泉源呵！但同樣對於有充分金錢和勢力的人要毀滅阻礙道路的地主而佔有其土地財產，說來是多麼偉大的手段呵！在貴族剝奪農民財產的時候“法律手腕”促成這種剝奪並不亞於兵士的拳頭。爲大地主底利益公開破壞法律，在現時是用不着擔憂的，他們的錢袋充分優裕使訴訟案件經過各級裁判直到反對者耗竭精力爲止，這種情形一直到現在都還存在着。根本消滅有錢人的這種優勢，其可能性在目前社會關係內，在我們看來還是可疑的。我們所建議的法律事務所却可以減少這種罪惡，但很難使其根絕。另一方面制止在任何場合內不能提高農民經濟的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的訴訟案件，他們也有很多好處。如果農民拿到城市去送給律師和法官的錢少，而用來提高生活水準並用以改善自己的經營的錢多，那末他們由此只會得到更多的利益。這裏所提議的一切改良

對農村居民比對城市居民更有利，但這些改良決不是農村居民底特權，而是土地所有底特權。這些改良是在民主主義及平等的精神內來實行並且它們也不是要保護落後的生產方式和阻止經濟的發展，而是剛剛相反，這些改良用盡一切方法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並發展着新的更高形式的社會制度所必需的各種力量。它們不單是一種良好的願望，而且是站在必然的社會發展的道路上的。例如過渡到國家管理學校已成普遍的必需，每個文明國家都負擔國民學校的費用：法國（在一八九三年）每年總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以上，英國則多兩倍（一八九三年為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普魯士為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一八九六年）馬克。至於醫院由國家管理，像上面所述的，在這方面俄國做了很好的開端。說到國家關懷農村的交通，則現在各處都特別注意到修築窄軌的鐵道。但所有這些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作，只是指出社會發展沿着它進行的一個方向，若要滿足這一發展底需要，那是完全不夠的。

## 六 現代文明國家底預算

這一點並不依賴於政府底善意。它們對無論哪一個人民階層都沒有像對農村居民那樣歡迎；但這要靠款項，靠資本來決定。

不用說，我們所擬具的改革綱領在普遍的和完滿的實行這個綱領的時候，需要有大筆的金錢。

我們且舉學校由國家管理這件事來說。要把全國國民教育提高到現代文化需要底水準究竟需要多少費用，那是不可能正確地決定的。但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現代大城市中國民學校和高等學校所需費用，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近似的數字。如果把普魯士的農村學校提高到柏林市學校的程度，就會得出如下的費用：



一八九六年普魯士國民學校每個學生的費用爲：

在國家內.....35.50 馬克  
在農村內.....29.67 馬克  
在柏林市區內.....67.24 馬克

把國民教育提高到柏林市的水準，其費用就要增加到兩倍。

一八九六年用於國民學校的經費爲一億八千六百萬馬克；其中有八千三百萬馬克由國家資助。國民學校底學生人數爲五、二三七、〇〇〇人；全部初級學校底學生人數爲五、五二〇、〇〇〇人。

按照柏林的標準，這些初級學校的費用就要三億七千六百萬。但是柏林市學校離理想還是遠得很。

在國民學校內平均：

	各班學生人數	一個教師教的學生數
農 村	56	70
城 市	59	59
柏林市各區	53	52

如果一班內學生人數在三十人以下，那末因此增加的費用就要把學校預算編製爲五億。

但我們還未曾列舉現時對合理的國民教育提出的一系列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既沒有免費教材，又沒有供給貧苦學生的飲食和衣服；我們沒有供給工場、園藝場、農業和工業專門人材的學校；沒有專家和必要的資金來爲各勞動部門組織和訓練青年；沒有未滿十七歲和十八歲年齡的人的補習學校。這種情形，一方面，增加了必須就學的人數，另一方面增加了每個學生的費用。

現時普魯士高級補習學校學生要用二百多馬克，大學學生要用八百多馬克。假定對每個學生花一五〇馬克，這也並不太誇大。這種情形使普魯士學校預算甚至在從前義務教育期限至十四歲爲止而不

延長至十七歲時，即爲八億馬克，在延長期限時則爲十億馬克。在這樣大一筆款子面前甚至使普魯士軍事預算底數字大爲減色。

我們且不去計算國家在救貧事業、衛生事業、交通事業、訟訴手續方面所担負的費用。對於這一點我們沒有必需的資料；但這些費用一定很大。在實施上述的改革政綱時節約固是可能，但要滿足我們現代國家預算增至兩倍乃至三倍的這些極大的要求，就太不足道了。省和公社底自治機關代替官僚政治底集中機構還不是要取消公共事業中的有給的官吏。社會公共事務在現時極其複雜、繁多、廣泛，以致非偶爾參與者在其閒暇時間所能辦理。社會公共事務需要專門獻身於此事業的訓練有素的專家和有給的官吏來辦理。

公共的自治，即在公共事務不是由有給的官吏而是由羣衆中在閒暇時和無給地從事這些事務的人來管理的這一意義內，——這樣的思想是可以把它當作一種空想，也可說是反動的和非民主主義的空想，無論這種思想底支持者具有怎樣的民主和革命的情緒。這樣一種自治在恢復原始形態的國家內，只有在貴族政治下——在富農，封建地主，各種食利生活者（他們靠別人的勞動生活，並有閒暇和財力專門獻身於社會事業）條件下才有可能。受人稱讚的英國的自治也不過是貴族階級底特權。現代的大國愈是民主，則它們愈要設法在有自治權的地方以有給的職務去代替無給的名譽職。現代的自治，現代的民主政治和官僚政治底集中主義比較，與其說是減少官吏的人數，勿寧說是很平均地把他們分配到全國，使他們服從人民的意志，並且因此部分地改變他們的羅致和進級的方法。如果民主主義底發展不是使官吏人數大爲減少，那另一方面就使他們的定額工資趨於平均。在君主貴族政治的國家內最高的職位是貴族們的特權，並且是按照他們的生活方式受到極高俸酬，而且最高職位對於貪錢的或缺乏金錢的貴族，懶惰而又無識的貴族愈是帶有冗職的性質，則俸酬亦愈高。

工作都是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來完成並得到與工作相當的報酬。民主主義底發展使最高職位底薪俸減少，反之，使下級官底可憐的薪俸增高，下級官底薪給在現時往往低於為私人服務的無產者底薪給，但是希望好像是有保障的晚年，滿足虛榮和高慢，以及往往從職位中得來的不潔的收入——換言之，各種賄賂——就是對這種可憐的薪給的一種報酬。

民主主義的國家，官吏不是人民底主人，而是人民底僕人，那裏法律不單是為人民，而且同樣並主要是為有公職的官吏，那裏制服不是表示特別的權利，而是單純地表示這一種或那一種任務，——這樣的國家，如果不保證官吏的俸給使之適合於他們所屬的那一階級底生活條件，就很難找到有才幹的官吏。由和許多其他的理由（敘述其他的理由會把我們拉得太遠）有關的這一理由中應當得出一個結論，即是官吏俸給隨着國家進一步的民主化而大大地提高起來。

然而因為現在他們處於可憐的地位並且他們的人數很多，而賺高薪的官吏却極少，因而他們的俸給底逐漸平均倒不是趨向減少，而是使有公職的官吏底俸給增加。

在這一領域內一點也不能節省。

在軍事機關方面，情形就好些。

普遍裁減軍備會省出一大筆款項，這筆款項用來實行上述的改革政綱雖然還是不夠，但總可以提高一般的文化程度。德意志帝國每年用於海陸軍方面的經費為七、八億馬克，這是一個不小的數額。用這筆款項是可以舉辦國民教育，使全世界為之驚異並使德國人民成為文明國家底首領。可是普遍裁軍的希望是很黯淡的。

普遍裁軍的條件可以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創造出來。但是，不能將每一種需費很大的鄭重的改革延緩到普遍裁軍實現的時候。

從常備軍制度過渡到民警制度是會，而且必不可免地會使軍事預算大大地和絕對地減縮。在一切場合內軍事預算不會減少到使省出的款項足夠彌補現代文明國家底費用。

然而，難道我們現在不是在申述下層人民担負着租稅嗎？從軍事改革中所得的大筆節約難道我們不利用來減輕他們的負擔嗎？從何處取得資金把現代國家改造為文明國家呢？資產階級的租稅政策在這一方面而對着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底解決中，資產階級的租稅政策一定遭到破壞。為要了解這一點，我們應當看一看這個租稅政策底原則。

## 七 資產階級的租稅政策與無產階級的租稅政策

任何一種租稅政策，若不願成為單純的掠奪，就應當解決這個問題：國家的稅收要從，並且應當從人民財富底哪些泉源中獲得。各個人應當納多少稅和怎樣納稅，這是次要的問題，只有對前一問題找到答案以後，對這個問題才會給以滿意的回答。

某一社會每年所生產的全部生產品可以分為兩部分：為使社會能夠生存，生產品的一部分作為維持和增大生產的勞動力並且應當歸諸從事生產的勞動者。超過這一部分的剩餘，就成為剩餘生產品，不事生產的階級就是靠此為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剩餘生產品採取剩餘價值的形式，歸資本家所有。

用這樣簡單的圖式來觀察經濟關係那是很明顯的，國家的稅收可以而且應當只有一個來源：剩餘生產品，更正確些說，就是剩餘價值。在封建主義時代這種情形尤為顯著。那時國家的機能，是由國王、教會、地主們執行；他們不是從我們所指的字義上的租稅中取得自己的收入，而是從他們自己的地產，即是從農村居民底勞動中取得

自己的收入。他們以實物貢稅或實物賦稅的形式，將農民的剩餘生產品全部或部分據為己有，他們担負起現時國家政府所担負的那些機能——司法、警察、國防和外界交際等等。

這些貢稅和徭役通常並不超出剩餘生產品限度以外；正如馬克思已經指出，首先是因為自然經濟並不具有貨幣經濟底無限的貪慾；其次是因為在軍事技術發展底最低階段情形下，農民在領主面前並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最後是因為農民若受虐待太甚的時候，他可以逃亡，而由於勞動人手底缺乏，到處——在別的地主方面，在城市內，——都願意收留他。

在城市內首先產生了商品生產，發生了貨幣經濟。生產品成為有一定價值和價格的商品，剩餘生產品也具有價值底形態，而預定作為國家給養的那一部分剩餘生產品，也成為體現在貨幣中的商品價值底一部分；貨幣租稅代替了封建的貢稅和徭役。

在本書開始時，我們就已經敘述過由此發生的情況。和資產階級一同產生的新的國家政權，是以貨幣為基礎的，它首先應當推翻社會生活底原來的主人——教會和貴族領主。但和他們鬥爭的結果不是消滅他們，而是和他們妥協，肯定他們在新的基礎上生存。他們從國家的主人一變而為國家的僕人，隨後國家政權就來保護他們的物質利益。新的國稅並不是取封建的貢稅和徭役而代之，而是和它們並存。有新的軍事技術即槍砲的全副武裝，有新兵組成的軍隊，對貨幣經濟有無限貪婪的中央集權國家，從農民身上榨取的，完全不是像從前地主所榨取的那個數額，農民在國家警察面前，甚至連過去很容易避開小領主的視綫的可能性也完全喪失。封建的貢稅和徭役在新的國家政權保護之下增加得比減少的尤為迅速，此外新的貨幣租稅又無止境地增加。諸侯們盡可能地掠奪了金錢，毫不注意到生產底進步和人民底幸福，而國家幫助在經濟上已經破產的封建地產並不是

引導生產進步，而是引導生產退步。

在這樣條件下就顯現出，剩餘生產品越來越不够滿足國家底需要；就不得不把剩餘生產品底一部分及對於工人階級底維持和繁殖所必需的一部分，最低限度在農村內，犧牲給貪婪的國家政權及其設置的徵稅吏。從前在十四和十五世紀時還是富裕的農民，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時顯然已經貧窮了；生產已經衰落，農民已經飢餓。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應歸咎於封建制度底壓迫，它不讓合理的農業有發展的可能，一部分應歸咎於貨幣經濟底需要急速增長，而農民的自然經濟只是緩慢地採取了商品生產底性質，而另一部分，並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直接由於租稅底苛徵。

這種情形在法國表現得最露骨，法國大革命就是反對這種最可怕的狀態的一個最酷烈的反動。法國新興資產階級底理論家最先追求合理的租稅政策。

重農學派第一個明顯而確定地提出了以國民經濟為依據的租稅政策，並且說明了此種政策對國民經濟的補助作用。由此得出的原則，乃是自然而然的結論：租稅只應由剩餘生產物交付。但是按照他們的意見看來，只有農業勞動才創造出剩餘生產物，因此他們要求取消一切其他的租稅並課農業的剩餘物(*produit net*)以單一稅(*impôt unique*)來代替它們。但甚至連主要是成爲大土地所有者底徵稅的這種租稅，他們並不認爲是過重的負擔，因爲國家的機能已被他們縮小到最小限度；然而因爲國家和領主貴族有密切的聯系，國家已成爲有害無益的吸血蟲，到處壓制經濟的活動，因而經濟繁榮底第一個條件就是廢除這種國家。重農學派說出了這句名言“*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sup>①</sup>。

---

① “讓他們做，讓他們走”，即自由放任政策。——譯者

重農學派所開始的事業，為後來急進的自由貿易論者所繼續，自由貿易論者在本世紀（即十九世紀）領導資產階級和封建國家底殘餘作鬥爭。自然，他們在理論上另有其立場，和英國古典的經濟學派不同。他們像重農學派一樣，傾倒在“讓他們做，讓他們走”這個原則之前，他們也要求國家底機能減縮到最小限度，並且像重農學派一樣，他們力爭與生產底需要相和協的租稅政策。這樣看來，他們的租稅政策和他們前輩底政策是有親屬關係的。自然，他們不會想到，一切租稅都應當歸結到一點，歸結到徵收剩餘價值；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對於他們一般地並不存在。但他們總是排斥間接稅，即一切場合內生活必需品的稅，他們要求除最小的收入以外的所得稅，這種租稅，雖然不完全與剩餘價值底課稅一致，但總與它十分接近。

但是自由貿易學派無論何處都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資產階級國家像封建國家一樣也是好戰的。充滿了重農學派思想的法國大革命把蹂躪整個歐洲並殘酷地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在兩百年以上的許多可怕的世界戰爭中止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即為急進的自由貿易派開闢道路的革命，結束了戰爭的第二個時代。革命底失敗又重新把戰爭推到舞台上來，這些戰爭為當時革命底遺言執行人——三個獨裁者：路易·拿破崙、俾斯麥及亞歷山大二世所進行。在東方鬥爭開始以至結束的二十年戰爭時代之後，跟着來了武裝和平的時代，這時代對人民所加的壓迫不見得比以前歷次戰爭為輕。這種情形在一切文明國家內形成了租稅負擔和國債底經常增加，而國債的利息又一再要求增加租稅。此外，也增長了對國家的要求即對文化要素的需要，雖然政府在這一方面努力實行嚴格“節約”。高等學校、交通機關及許多其他的事項都提出了一切新的不能延緩的要求。

實際上經常的軍事陣營替代了自由貿易派所幻想的和平的國家，在社會生產領域內國家干涉範圍底不斷擴大，代替了放任政策。

用什麼來彌補國家不斷增加的需要呢？是不是用剩餘價值，即是說用所得稅、財產稅和遺產稅，或者用生活必需品底課稅，即間接稅來彌補它們呢？問題是這樣提出來了。但是資產階級——統治階級是永遠會從自己肩上擺脫國家的主要負擔的這樣一個支配階級。我們試舉一個國家為例，如法國，此刻還沒有任何的所得稅，一般講來，這是由於資產階級底威力所致，資產階級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經和貴族決裂，並且利用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不斷地予無產階級以有力的妨礙。同時在法國對人民生活資料底徵稅又非常發達；穀物稅、間接稅——其中鹽稅、糖稅、酒稅及煙草專賣稅也列為它們的租稅——為其主要的收入。

據一八九七年底預算其稅收如下：（單位百萬法郎）

關稅.....	410
間接稅.....	399
煙草，火柴稅及火藥專賣稅 .....	421
共 計.....	1,430

國家的收入總額計為三十三億八千六百萬法郎。交易所稅為八、七〇〇、〇〇〇法郎，從動產徵收的所得稅為六五、八〇〇、〇〇〇法郎，其他稅（印花稅）絕不能代替所得稅。

在許多現代國家中，資產階級在英國佔着優越的地位，在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首先以最純粹的形態發展起來，但是在英國也正因為這種原因強有力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立，工人階級既不受小資產階級的壓迫也不受農民階級的壓迫，同時資產階級還不得不顧慮到強有力的貴族階級。

因此我們在英國完全看不到生活必需品上的任何間接稅。英國的稅收政策建立在這樣的妥協上面：英艦實施了所得稅（收入在一六〇英鎊 = 三、二〇〇馬克以下的，得免徵所得稅），但不是累進的所



得稅(對於從一六〇英鎊至五〇〇英鎊的收入,一八九四年的法律規定了一些等級),這樣看來,許多大的收入被徵的稅和中等收入比較起來就並不怎樣高。遺產稅也是以同一精神制定的。但除這些之外我們又看見供人民大眾用的奢侈品上,即煙草和飲料上的高額的間接稅和財政稅。這些間接稅在一八九六年時提供了四八、七一四、〇〇〇英鎊,約爲十億馬克。所得稅及印花稅提供了三四、八三〇、〇〇〇英鎊,約爲七億馬克。全部收入總計有一億英鎊之多,即在二十億馬克以上。

其他文明國家底政策則介於英法租稅政策之間的中間地位。但是我們在大陸上到處(除民主主義的瑞士之外)都看見對剩餘價值所課的稅比對人民生活資料所課的稅少得多。一般講來,後一種課稅形式——間接稅——有向上增高的趨勢,不僅是絕對的,而且是相對的。頂不合理的是,這種間接稅還常常光顧到人口頗多的貧困家庭,這不僅相對地而且絕對地比富裕的家庭更易感覺得到;例如鹽稅就是如此。它們之不合理還因爲它們的徵收,吞掉他們收益底大部分。另一方面間接稅是便利的:人民覺得間接稅的負擔比直接稅的負擔爲輕,而——這是最主要的——人民羣衆並不堅決地抵制間接稅,像資產階級反對過重地加在它的收入的直接稅那樣。此外,資產階級在現時還是一個具有一定意義的階級。沒落的階級——手工業者和農民自己還在用自己的關稅政策來促進間接稅底發展。輸出的工業其實差不多全是大工業,而手工業者和農民只需要國內市場;他們也願意保證自己有國內市場。因此他們贊成保護稅則,這些保護稅則,自然並不保護他們,而只是成爲新的間接稅的形式,其大部分都是加在他們自己的肩上。

資產階級的政黨無論何處都沒有越出這裏所描述的兩種租稅制——自由貿易租稅制與保護貿易租稅制——底界限之外,資產階

級的民主黨，既非資本主義的又非反資本主義的政黨，調和階級利益的政黨，巧辯資本家與無產者、小有產者及農民有共同利益的政黨，都不曾越出這些界限之外。這種政黨沒有決心對付資本家；它不敢把租稅底一切負擔加在資本家身上，但同時它又企圖替下層階級減輕這種負擔；這樣看來，它的整個租稅政策歸結到要求盡可能縮小租稅，歸結到和現代國家繼增不已的任務不相容的一種理想。立足在這樣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黨要將國家變為文明的國家是不可能的，雖然在這一方面它的意圖是很好的。

無產階級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底租稅政策就完全不是這樣。它的口號不是取消租稅，而是將租稅轉嫁在那些有力擔負租稅的人底肩上。它要恢復重農學派底舊要求，主張專以剩餘價值繳納租稅。自然，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並不這樣容易把握剩餘價值，像對付重農學派底純收入(*produit net*)那樣便當。後者(純收入)在過去一世紀農民自然經濟盛行的時候(當時農民大都以自己的勞力生產出一切必需的東西)，乃是超過農民留着為滿足自己需要的生產物以外的物質的剩餘，農民即將此剩餘供地主去享受。剩餘價值只有在各種各樣的分配及變形以後才會表現出來。因此要直接把握剩餘價值就完全沒有可能。剩餘價值底各個來源或各個部分底課稅容易引起不平衡，而有時會引起不公正的轉移租稅的負擔。即如城市土地所有者享有特權地位把自己地租底支付轉嫁到房客身上。

我們不打算更詳細地敘述這個問題，即剩餘價值的課稅，何種形式為最合理的問題，這會使我們離題太遠。我們倒要充分注意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政綱，此政綱要求把用在社會需要上的一切費用作為徵稅底對象，因為租稅、收入及財產的累進稅，以及按照承繼的財產底範圍和親屬關係為比例的遺產稅，就是社會需要的一切費用的來源。這樣的方法在我們看來是使全部剩餘價值底課稅更有保證

的方法。

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也在追求這樣的租稅，並且已經部分地實行了自己的要求；但它沒有決心用這樣的方法從資本中榨取較大的款項。只有社會民主黨對資本一點也不客氣；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要求國家方面出大筆款來作社會改革，同時注意到用所得稅、財產稅及遺產稅來代替其他的租稅。

資產階級國家由於財政上增長的需要，也時常不得不大量地吸收剩餘價值來彌補國家需要，但爲要彌補需要，它所選擇的不是租稅底方式，而是國家借款底方式。

有時這種借款是爲着經濟的目的，例如建築鐵路或開鑿運河，但通常借款是完全不生產地用之於建造大砲和戰艦，用之於彌補軍費及其他。

最顯著的，就是在一切君主國家內，凡屬國家的一切均被宣告爲皇帝的或國王的，但只有債務不是國王的。兵士的制服是國王底制服，但如果預定爲支付國王的制服之用的借款叫國王的債，國王就會堅決地提出抗議。債務寬宏大量地被交付給國家或人民。這裏甚至俄國的專制主義也顯示它是最高度的共和主義。

人們可以把這些公債拿來和統治階級、貴族和僧侶，在封建時代當祖國處於危急存亡的時候，有時被激發起來而作自願的捐獻等量齊觀。自然這裏也有一些差異：領主們對自己貢獻到祖國祭壇上的供物並不要求利息，可是利息對於資本家却是最主要的。固然，你可以把富裕的領主、僧正、修道院、城市因他們的捐獻而得的永久特權比作我們的國債的永久利息。

償付國債的利息在現代一切國家內構成預算底最大一項，僅次於軍事費用。在英國總預算二十億馬克中，用於海陸軍方面的，約爲八億馬克，用於支付國債利息的，約爲五億馬克。在法國用於海陸軍

方面的，約爲七億馬克，用於支付國債利息的，竟有十億馬克之多！

在德意志帝國內，我們假定，償還帝國債務的利息，僅爲七千四百萬馬克，反之海陸軍費則爲七億馬克。但是德意志帝國還年輕，戰爭——帝國從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給了它幾十億法郎，而從那時候起它就不會進行大的戰爭。就在這同一期間，德意志帝國開始挪用四十億馬克戰爭賠款，使負債額達到了二十二億六千一百萬馬克。英國的國債則從一百五十六億馬克降至一百二十四億馬克，這樣看來，使麵包、肉、火油等類東西免去三十二億馬克的稅！爲比較完滿起見，還應當將聯邦各國底債務加到德意志帝國底債務上去！單在普魯士，國債爲六十五億馬克，利息爲二億二千九百萬馬克（一八九八年），巴伐利亞、薩克森及威敦堡等處的債務合計二十五億馬克。這就是說，對於整個德國的國債我們得到和英國一樣的數字，不過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在我國，國債沿着上昇綫迅速地變動，在英國則沿着下降綫變動。

除軍費之外，國債利息底償付在現代國家內構成這樣一項預算，即取消這一項預算就會提供極大的一筆資金，這一筆資金或者可以用來減輕人民底租稅負擔，或者用來實行巨大的社會改革。軍隊底普遍遣散及國債利息底停止支付，在隨便一個現代大國內在這些方面就省出了好幾十億馬克，而用這些錢隨便幹什麼都可以！

國家的破產一點也不稀奇；我們用不着斷言，現在假定的、在無產階級監督之下的那種制度，沒有體驗到停止支付利息的需要，就不能戰勝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假使只是幾個資本家被任意擄奪，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則平等權利底原則就會橫遭破壞，並且實際上正是最小的資本家佔有絕不是極小部分的國家紙幣，這種情形就更不公道。沒收小民辛苦所得的幾個銅錢這與民主主義政府底意願很少相符。

自然，這種制度應當永遠放棄新借款底締結，並盡可能迅速清償現有的借款。任何一種新的借款都意味着新的奴役國家於資本底壓制之下。國債是資產階級國家把資本化的剩餘價值用於國家底目的的一種手段。無產階級的民主黨對於這些目的，除了課稅之外，不知道有別的辦法。

無產階級的民主黨無論怎樣不注意資本底利益，它終究不能十分任意地課取剩餘價值。我們不能希望這樣的增高上述的租稅，作為沒收剩餘價值。要記住，我們這裏所說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那時候我們的敘述就不會有什麼矛盾，因為自身佔有生產資料的社會，要佔有剩餘生產品，並不需要經過租稅，——而是要說這樣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無產階級固然具有充分的政治權力，以自己的精神去影響租稅制度，但是在這種狀況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是佔支配地位。當情形還是這樣，當社會因各種原因不能將資本的一切機能完全操在自己手內，剩餘價值便演着重要的經濟作用。資本家並不敢消耗他的工人供給他的全部剩餘生產品像領主或貴族——羅馬人那樣。他一定要“節制”，一定要“儉省”。只有一部分剩餘價值用來揮霍，其他一部分則積累起來，並轉化為新的資本。資本底積累隨着自然科學底發達在我們這一世紀對於經濟底進步是一個偉大的力量。我們應當像感謝自然科學一樣，要感謝資本底積累，因為在這個時期經濟的進步這樣突飛猛進，這是過去任何一個世紀所沒有的；因為它創造了極其巨大的生產力，世界一切以往的奇蹟和它比較起來真有小巫見大巫之概；因為在世界歷史上它首先替社會主義社會在更高文化程度基礎上發生的可能性創造了許多條件。當社會本身還沒有佔有生產力並且還沒有把生產組織抓在自己手裏的時候，阻礙資本積累就是阻礙進步，並且成為社會主義前提條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制動機。

幸而資本積累的傾向，對於進步是這樣強有力，使任何粗暴的侵害它的行爲都不能阻礙它。勞動立法和勞動組織一直到現在都顯示自己不是一種妨礙，而是促進經濟進步的一種力量，它們未曾給資本積累以絲毫的損害。資本積累現時已達到了這樣的限度，開始把資本家置於困難境地。年復一年歸資本家所有的剩餘價值量異常巨大，不管資本家怎樣窮奢極侈，而存儲的金錢還是愈來愈多。

最近幾年來發生了一系列個別國家（如阿根廷、葡萄牙、希臘等國）以及巨大的私人企業（這還在巴拿馬破產以前）的破產。這種情形在經濟生活上並未引起厲害的震動，並未縮減資本準備將成億金錢投到完全不生產的國家借款上去，同時耗費在新的工業部門及新的交通事業發展上的也比任何時候爲多。

由此可見，剩餘價值可以不像以前那樣使用，並且也不用害怕會給經濟發展以損害。

這種情形能夠達到什麼限度，即使大概地加以計算，也是徒勞的。

但是用這樣的方法是不會爲國家底財政需要籌出怎樣巨大的款項來的，人們可以更確信地斷言，如果文明國家要想真正滿足全體人民生活提高到現代文明程度之一切要求，那末這樣數額是不夠維持文明國家底一切費用的。這裏應當提出獲得剩餘價值底其他補充方法：國家，——或公社，上述一切都可 *mutatis mutandis*（變通地）適用於它們——一定要自己從事剩餘價值底生產。

此外，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本身也不得不有此要求。我們有許多自然資源的私人的壟斷——礦產、大的交通事業、照明設備等等，這些事業底經營在沒有競爭的時候，不僅剝削工人，甚至還剝削消費者。同時資本集中經過卡特爾等等的組織造成人爲的壟斷，這些組織的作用有類於私人的壟斷。不單是無產階級，就是全體人民都要

起來反對這類壟斷。用立法程序調整它們，這全是一些可憐的補綴；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終止它們對社會的剝削：這便是把它們作為社會的財產，在公有的原則上進行生產。當資本家還像現在一樣把國家把持在自己手裏的時候，這樣剝奪的確是不容易的，但另一方面這樣剝奪是更有希望的。一方面無產階級還不能從對他敵視的國家政權中達到自己勢力範圍底擴大，另一方面，資本家還有充分的勢力，足以在不利於他的場合內阻止將生產資料轉到國家手裏，要把生產資料轉到國家手裏只有在它表現出有利於資本家的時候才能實現。自然，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國家贖買鐵路的時候，鐵路費用是不會照數付清股東們的。

一旦無產階級能够使國家政權對資本具有相當不重視的態度，一旦人民沒有理由害怕國家管理範圍底擴大，因為國家完全操在人民的手裏，則這一切考慮也就不必要了。這裏國家收回私人壟斷的企業就可加速進行——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國家底需要愈繁，徵取剩餘價值的範圍愈狹，則收回私人壟斷亦愈迅速。在一切場合內，壟斷權轉移到國家手裏，是在這些條件下開始，這些條件雖然不是一種沒收，但是保證國家有豐富的收入。國家可以把收入，一部分用來改善工人生活狀況，一部分用於消費者底利益，一部分則用於廣義的文化工作。

這種國家壟斷企業還並不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在商品生產底現有條件下，國家壟斷企業的目的還不是直接為社會需要而生產。但這種壟斷本質上已經和資產階級國家底壟斷有所不同。前者作為無產階級租稅政策底一部分，是將剩餘價值交由國家處理的一個手段；後者作為資產階級租稅政策底一部分，是間接徵稅，使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有利於政府的一個最有效的手段。

生產形式底高度是無產階級國家壟斷的某一生產部門有用性底

標準；官僚主義式地組織成的，由私人手中轉為股份公司所有或新增加所有，而實際上又已經站在一切競爭之外的企業，對這一目的更為有用。

反之，作為資產階級國家壟斷的生產部門底有用性底標準，乃是生產品底價值，即消費者生活資料與享樂品（煙草、酒、鹽等）底價值。這裏完全不考慮到生產發展底高度；這種壟斷也包括小生產形式（煙草）佔優勢的其他的生產；這種壟斷用人為的方法排除競爭，並且用剝削消費者，也往往用剝削工人的辦法來獲得自己的收入，比在私人企業自由競爭的時候達到更高的限度。

如果不能將國家的壟斷和社會主義混為一談，那末同樣不能將無產階級國家的壟斷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壟斷等量齊觀。

在國家或公社內，私人壟斷企業轉移到國家或公社手裏，以收入、財產及遺產的累進稅代替間接稅，停止以借款辦法來進行國營經濟——這就是無產階級租稅政策敢作敢為的地方。這個租稅政策意味着不單是無產階級，而且是全體勞動民衆底負擔大為減輕，這是很明顯而用不着證明的。甚至還可以說，這個租稅政策對於小手工業者、小商人以及小農，比對於僱傭工人更為重要。無產階級，最低限度無產階級底許多階層是處於上昇的進程中，而這些階級則趨於沒落。現時資產階級的租稅制度對於無產階級中上昇的階層阻礙他們的上昇，對於這些沒落的階級則等於加速他們的沒落。租稅加在小有產者和小農身上比加在僱傭工人身上還重；因此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租稅政策比工人還更加注意。

這樣的租稅政策不單是解放了民衆中的工人階層；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達到高度發展的地方，也就是說在大量剩餘價值存在的地方，國家就有可能大力推行以提高民衆幸福和文化為目的的政策，這和資產階級的租稅制度完全不同。對民衆消費品底徵稅範圍，盡可能



縮小，它不應當引起民衆底貧困及降低其生活水準；徵收全部剩餘價值在資產階級租稅政策之下是永遠辦不到的。

只有無產階級的租稅制度才無情地徵收剩餘價值，只有無產階級的租稅制度才能徵收那些款項，即徵收現時資本家階級放置在國內外債務上的，並比用租稅徵集更多的款項，它既不損害工業底發展又不損害資產階級消費底數額；剩餘價值底生產，由於大規模壟斷轉移到國家手裏是服務社會的國家底最重要的生產力，並且讓國家政權給予現在閒散的無數勞動力在文化工作底舞台上以有效的使用。國家和公社底物質資料，由於這種情形，就廣泛地增長起來。資本繼增不已的集中，對於國家底經營提供新而又新的領域，對於國家是收入的新來源，由於生產數量增加，人民沒有一點負擔，收入來源的出現也沒有止境。

還有一個問題，無產階級能不能在隨便什麼時候實際上推行自己的租稅政策？這個政策的前提，是我們作爲推論基礎的、但一向並未實現的那個狀況：即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阻礙的推進情形之下，無產階級有巨大的政治影響。這兩個條件差不多是完全互相排斥的，在一切場合內它們只能短時期一同存在。

但是，雖然如此，我們仍以爲無產階級如果獲得政權，則分析一下他們所奉行的租稅政策是必要的。政治理想底意義與其說是在於它是否實現，勿寧說是在於它是否正確地指出社會運動的方向。理想底意義乃在於這一運動底意義之內，在明顯性和正確性之內，理想即以此明顯性和正確性指示社會運動以適當的方向。只有當你認識這一運動的理想時，你才能向自己說明這個運動。

如果社會關係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時將是這樣的，即特殊的租稅政策在這裏所說的範圍以內成爲多餘的，那末無論如何這個政策現時總還是無產階級民主黨意圖底目標，並且無產階級政治影響底

尺度要以他們的租稅政策在其中實現的那個尺度來衡量。社會民主黨愈強大，則間接稅亦愈少，所得稅、財產稅及遺產稅意義亦愈大，國債及其利息亦愈縮小，資本主義壟斷大企業亦愈迅速而廉價地轉移到國家或公社手裏。

## 八 使農民中立

總括我們研究中得出的要求列舉如下：

### 一 爲農村無產階級謀利益的措施

(1)取消有關僱農的法律；農村內聯合底完全自由；保證遷徙底自由。

(2)禁止未滿十四歲的兒童從事僱傭勞動；對於一切兒童和青年毫無例外地禁止從晚間七時至早晨七時的農業工作；禁止未滿十八歲青年外出勞動；實施小學及補習學校底義務教育。

(3)保護外出工人；禁止未滿二十一歲的少女外出勞動；禁止游牧式的勞動制度；用社會職業介紹所代替招募人。

(4)實行對田間工作按平均年度計算一日八小時的正規工作日，在收穫時期及爲自發現象所引起的工作緊急時期准許額外的的工作；保證僱農星期日休息。

(5)爲健康及道德底利益起見，對於農村工人底住宅規定各種必要的條件；在農村中設置強有力的住宅警察。

(6)特設審判機關以縮減過重租金。

### 二 旨在保護農業的措施

(1)取消世襲財產制。

(2)取消地主的地區；併入農村公社。

(3)取消大地產內的狩獵區，併入農村公社。

(4)限制土地私有權以促進：

- ①土地劃分，消滅地塊零散現象；
- ②土壤培護；
- ③傳染病預防。

(5)由國家辦理雹災保險，有時牲畜保險亦可由國家辦理，但後者無須國家的補助費。

(6)用立法辦法促進在合作原則上建立聯合組織。

(7)國家保障農業教育。

(8)森林及水利事業收歸國有。

### 三 旨在滿足農業人口利益的措施

中止城市對土地的剝削及消滅城鄉對立應實施以下辦法：

(1)在公社和省區內實施最完備的自治。

(2)以民警代替常備軍。

(3)學校，恤貧及路政由國家辦理。

(4)醫療事業由國家辦理。

(5)免費裁判。

(6)以累進的所得稅、財產稅及遺產稅代替現行的租稅制度，有利的私人壟斷企業及卡特爾均收歸國有或公社所有。

為方便起見，也可把這些要求說成是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綱；但我們並不認為這個名稱是適當的。在第一項內列舉的各點已經包括在社會民主黨對保護勞動這一問題上的目前要求底各主要點中，同樣列舉在第三項內的各點也列在它的目前政治要求上。在第二項底各點之中——只有一點特別重要：森林及水利事業收歸國有；這一點不是純農業的，它追求的不單是農業底利益，而且也是工業、人民健康等等底利益。其他的要求，無論怎樣重要，但作為一個大的政黨的綱領底基礎，就未免太瑣碎。這些“小辦法”在許多進步的國家內早

已實行過了，並且社會民主黨在這一方面與其他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在私有制和合理的農業底一般利益發生衝突的地方，對待私有制不加顧惜而已。社會民主黨當然要說明這些“小辦法”對於農業進步的整個必要性，但由於土地私有制及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加給農業以過重的負擔，就得同時說明用這些“小辦法”來拯救農業是不濟事的。

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我們絕不打算擬出一個毫無遺漏的政綱。農業的行動綱領對於個別的場合和個別地方，照我們的意見是要很合適的；但這種行動綱領不是理論家單獨擬得好的，必須和實際家共同來擬定。

如果我們所描寫的農業發展底道路是對的，我們的任務就在具體的事例上指示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策應當採取的一般方向。由此對於每個個別的場合就容易做出實際的結論。

我希望，一旦我們宣稱希望拯救或甚至提高農民經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與我們的原則相衝突的，則我們就已成功地指出，這不是我們方面應有的社會政治的虛無主義。社會民主黨對待手工業和家庭工業的觀點，也可以適用於對待農民的經濟，並且在這種情形下不僅為農村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且為農業及一般農村人口的利益都可以展開豐富而有效的活動。

自然，要使這個土地政策吸引農民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是可懷疑的。根本上社會民主黨永遠是無產階級的、城市的政黨，永遠是經濟進步底政黨；社會民主黨永遠要和保守的農民底頑固的偏見作鬥爭，農民心理上是厭惡城市的生活並且是站在使少女和青年妻子和兒女完全受他支配的家長制家族關係底基礎上的；社會民主黨向來就不像農民政黨那樣迎合農民，這些政黨不僅迎合農民的生活方式，而且能約許農民以更多的希望，因為他們不相信經濟進步底必然性

和不可避免性，因為他們不懷疑從前的關係底恢復，不懷疑農村人口將依靠城市人口而生活，農業依靠工商業來營養。

社會民主黨不論什麼時候未必能使照舊經營的農民傾向到自己方面來；但它可以把農民放在中立的地位，而且這已經就是很大的成就。不待說，經濟的發展會跨過他。並且社會民主黨在農民妨礙它的道路的地方也能對付他；但是當農民還表現出力量時，就不應該輕視這種力量，如果排除這種力量的反對作用是可能的，而又加以忽視，那是錯誤的。

農民敵視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原因，大部分並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實際政策。固然，當社會民主黨不願供給農民以消費者，當它反對人為的提高食糧價格來提高地租的各種企圖時，當它一點也不願過問承繼權、過問對僱農的規定、過問自由遷徙的困難時，農民是不會喜歡社會民主黨的；但是社會民主黨也和加在農民身上的過重的租稅負擔進行鬥爭，和官僚及大地主等等底濫用職權作鬥爭，而農民對於這些是不願忽視的。社會民主黨底勝利帶來的沒收土地底思想會激怒農民；在他們看來，這就是把他們從自己的住宅，從自己的庭院驅逐出去，並把自己的財產分給一無所有的窮人。

如果這一點不弄明白，研究社會民主黨底土地政策就不會充分；本書結尾即企圖說明這一點。

## 第五章 社會革命與剝奪土地所有者

### 一 社會主義與小生產

在第一章末我們已經指出，由資本主義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農業可能不必剝奪農民土地所有者。那裏所講的也足以打破農民底一切憂慮。

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許多論據。

不單是小農，就是一般小企業底所有者，同樣手工業企業底所有者都不應當害怕無產階級底勝利。恰好相反，應當歡迎。

我們已經看見，國家從統治機關改造為文化機關，並且把社會的捐稅轉嫁到剩餘價值上，正確些說轉嫁到剩餘生產品上，首先正是對他們有利。

在社會主義社會確立底時期，他們的地位，將視他們的生產是寄生的或不是寄生的，而各有不同。我們把這樣的小生產叫做寄生的小生產，它們在技術方面早已落後，而在經濟方面完全成爲無用，它們的所有者之所以維持它們，只是因爲純無產階級的生活在小生產所有者看來，覺得比他們自己的生存沒有保證還要更可憐，而且也因爲他們沒有可能靠僱傭勞動生活。像許多小生產一樣，尤其是在仲介商業中，極小的獨立的企業是由因某種原因而仍舊沒有工作的和靠借貸爲生的僱傭工人爲了不致淪落到流浪人的地步而建立起來的。

統計學家只把那些現在沒有任何工作的人當作失業者；這樣的人最多不過幾十萬人。但如果國家有可能供給所有失業者相當好的工資，那時就會驚訝，以失業者資格向國家要求勞動和工資的人數何以增加如是之多。相反的，那時這樣小的企業數就會大大地減少。

在大生產中工人底地位愈優，他的工作日愈短，他的工資愈高以及收入愈有保證，則寄生的小生產底所有者亦愈迅速地拋棄其靠社會負擔的反動的實驗來維持的可憐的生活，他們亦愈迅速地決定結束其陳舊的無用的企業而成爲現代企業中的工作者。這就大大地增加受國家支配的勞動力底數量而同時又消滅了貧困與缺乏底豐富泉源。

除寄生的小生產之外，在還未爲機器所征服的，並非預定爲大量生產的部門內還有一些必要的小生產。何種生產應歸屬於這一範疇，這是可以爭論的，何況技術的條件天天在變化。機器已經侵入到一直到現在還被認爲是小生產底牢固的避難所的工藝的手工業內；機器侵入到麵包房和製鞋廠內。也許，要容許一部分手工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被保留下來，甚至由於大眾幸福底增進，有些手工業又會重新復活。在這種情形下對大量生產的廉價生產品的需要會降低，而對最昂貴的，但最適合於個人需要的手工業生產的生產品之需要會提高。同時由於無產階級的租稅政策（因爲還可以說它是租稅），加在手工業者身上的捐稅底負擔被減輕了。手工業者的一般教育被改善了，他們的最高的技術和藝術發展底機會也增多了。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僅不建立在手工業底完全破滅上面，反而引起手工業的某些部門底新的繁榮。但這種繁榮的手工業的性質和現在完全不同；這種手工業只是一般生產類型中的例外。

正是有決定性經濟意義的大量生產資料成爲公共財產，生產也就成爲社會生產。小手工業者，即使他在自己的作坊內保存着獨立

性，也要完全依賴於社會，社會供給他原料及生產工具並且差不多永遠是他的生產品之唯一的購買者。他不得不適應和順應社會生產底組織，並且雖然在作坊內有他自己的孤立性，他總是社會的工作者。

就是農民的發展也同樣前進。一旦社會主義的大生產給他們以明顯的希望，無數小的企業所有者就會很高興拋棄自己的獨立性和財產的佔有。

不帶有寄生性質的農民小企業，在經濟方面還繼續執行着重要的機能的那些農民小企業，像手工業企業一樣，成爲社會生產底一環，即使它們還保存着自己的孤立的地位。由於農戶所依賴的抵押和農業的工業轉移到國家手裏，農民小生產比手工業企業還要更加加強社會底權力。

但是農民用不着害怕這種依賴；這種依賴並不損害他們。在民主主義制度下依賴國家總比遭受任何一兩個砂糖大王底剝削要險些。此外，國家不僅沒有從農民身上取去什麼，反而給他更多的東西。農民與農村工人在社會從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將是特別有價值的勞動力。

爲世界市場而工作的工業底異常發達，與市場同時爲輸入的穀物所充斥——這兩個互相緊密聯系着的現象，將農村居民，勿寧說是將農村中最有工作能力的分子趕到城市去。國內市場如何迅速地在國民經濟內佔第一位，這首先是在農業底增大的意義中表現出來。羣衆底較高的消費能力需要多量的營養物；輸出減少就減少外來的輸入。那時農業底到處合理的措施就成爲不可免的現象，這種合理的措施就會給我們盡可能多的收入。農業需要優良的生產資料，優良的勞動力，而優良的勞動力絕非這樣簡單。每個農業工人宜於這一種或那一種工業工作，相反的，宜於農業工作的工業工人則爲數不多。當然，可以希望，合理的訓練青年使他們宜於作農業的工作和工



業的工作以及純知識的勞動；但是起初單有這一希望是不夠的。

現時社會生活底兩種被歧視的人——農村工人和小農，在這種情形下就成爲社會底有希望的成員，也就是說，他們會佔有很幸福的社會地位。這裏怎麼能夠認爲社會主義制度把農民從他們的田間趕出去哩！這是胡說八道，甚至比我們的反對者中最吹毛求疵的最愚蠢的人歸咎我們的有過之無不及。

社會主義制度爲人民的營養起見，關心到農業經營者底最有利的狀況。排除商品生產代之以專是使用價值底生產，這使農民有可能將抵押的利息及其他租稅（當它們還存在的時候）從貨幣的支付轉化爲實物的支付，而這對於農民就是大大的減輕負擔。無產階級的制度完全關心到，要使農民的勞動盡可能成爲更能生產的勞動，也就是說，給他安置最優良的技術設備。社會民主黨不僅不剝削農民，而且給農民以他們在資本主義時代完全得不到的最完善的生產資料。

自然，農民只有在大企業內才能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制度力圖迅速推廣這種生產形式。爲了使農民合併他們的耕地，並過渡到合作社的或公社的大生產形式，完全不需要剝奪。如果在合作社原則上進行的生產，證明是有利於參加合作社的工人的，那末國營大生產底實例更足以引起農民的仿效。目前在合作農業發展道路上較爲嚴重的障礙，如模範經營的缺乏、冒險、資本缺乏，到那時就會歸於烏有，並且最強有力的障礙——無限的土地私有制，由於抵押之收歸國有，由於農民更加依賴於國家所支配的工業部門，由於國家在土地種植方面及在人與家畜底衛生方面的監督和干涉權底增大，就被減至最小限度。

因爲這一切的緣故，因爲社會主義制度關心農業生產不斷的進步的緣故，因爲農民階級在那裏獲得那樣巨大的社會意義的緣故，若要以供給農民以完善的生產方式爲目的而選取強制沒收土地的方法

法,那是很難想像的事。

如果往後還會有一些農業部門和一些地方,小生產形式在這些部門和這些地方內較大生產更為有利,那就沒有理由要將小生產置於大生產之下。無論這些部門,無論這些地方,對於全國的生產不會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在最重要的農業部門內大生產形式現在已經佔着優勢。經濟重心由世界市場移至國內市場正是將這些部門,首先將穀物生產提到首要地位。

零散的小生產,在農業領域內,正如在手工業領域內一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要被集合在一起;一些同一的推論對於兩者都有用。至於他們從事耕種的土地是屬於社會或屬於私人,這種情形倒不關重要。問題是在實質上,而不是在名稱上,在經濟活動底性質上,而不是在法律條文底規定上。

不消說,我們並不預言什麼,我們只是立一假設而已。這個假設並不說明所有這些將如何實現,它只是說到實現底可能性。至於過程在實際上將如何完成,我們的反對者也和我們一樣不大明白;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只能依據現時已經確定的事實;而如果我們要將這些事實沿着前進的路綫引伸到將來,那末我們正是來到我們在這裏所描寫的發展道路。

社會民主黨在正式的聲明裏面及在自己的卓越的捍衛者著作裏面提出的意圖和願望,絕不與我們得出的結論相矛盾,因為在它們裏面無論哪裏我們都找不出有剝奪土地的要求。

直接在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規劃了“德國共產黨底要求”。其中關於農業的三項要求說道:

“(七)諸侯的及其他封建主的領地,一切礦山、礦坑等等均收歸國有。在這些土地上,大規模地組織具有科學的最新式補助工具並

對全社會有利的農業。

(八)農民土地的抵押宣佈由國家辦理；農民將此種抵押底利息繳納給國家。

(九)在租佃制發達的地方，地租或租金像租稅一樣繳納給國家。”

這裏沒有一句話說到破壞農民底所有權。只是將抵押，而不是將農民的土地交給國家。

當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所受的創傷已經復元並且工人運動開始照新方式組織起來的時候，土地問題也就提在議事日程上了。這個問題在國際各次大會上都曾討論過。巴塞爾大會(一八六九年)底決議得到大多數的承認，並且具有極大的意義，大會規定了：

“(一)大會宣告，社會有權廢止土地私有權，並使之成爲社會底財產。

(二)大會宣告，它承認爲社會的利益有必要使土地變爲社會公有財產。”

大會並未說及此種轉變將如何實現。它曾作如下的聲明：“大會承認土地公有的原則，至於實施土地公有的實際辦法，大會委託各支部去擬定。”

一八七〇年三月李卜克內西在薩克森關於這些決議作過幾次講演，其中大部分訂成一本小冊子，題爲“土地問題”，於一八七三年刊行第一版，一八七六年刊行第二版。他在那裏面說道：“在法國，甚至在德國，問題解決得並不像英國那樣容易。自然，農村工人或者已經承認土地所有關係改變底合理，或者很容易作這樣的承認。只有小農，雖然事實上已經是無產者或者已無法制止地成爲無產者，但他們大部分還是固執着自己的私有財產，雖然這種財產大部分只是名義上的想像的財產。沒收土地底法令無疑地會激起多數這樣的小農底

激烈反抗，甚至可以激起他們公開的叛亂。因此，國家應當避免在事實上或者只是外表上可以危害農民利益的一切政策。直接減輕農民負擔底實際政策應當和闡明社會主義底優點並進。應當把國家負擔抵押債務，減低利息率，並且用這些進一步貸款方法使農民承擔合理的農業經營底義務放在首要的地位。那時在國家方面的協助之下個別的生產業部門就會逐漸轉變為在合作基礎上的大生產”（見李卜克內西：“土地問題”，第一七二——一七五頁）。

李卜克內西把革命政府剝奪農村居民，叫做明顯的愚蠢行為。

在一八七〇年事變以後，工業及工業中心工人運動底加速成長，已經把土地問題推到末位。而農民底極端窮困狀況又重新將這一問題不僅在資產階級政黨底政綱上，而且在無產階級政黨底政綱上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後來連續討論這個問題時，恩格斯也曾參加。他在一八九四年表示的意見，也和在一八四八年表示的一樣。他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對小農的關係應當怎樣？當我們掌握政權時我們應當怎樣對付他？”他對這一問題答覆道：

“第一，法國的綱領規定：我們雖預見小農底不可避免的沒落，但我們決不從中干涉以加速其沒落，這立論是絕對正確的。

第二，很顯然地，我們有政權在手，不能設想到要強制剝奪小農的土地（賠償與否沒有關係），如我們對付大地主必須剝奪其土地那樣。對於小農，我們的任務在於，要使私人的生產和私有財產成為合作社的生產和財產，但不是用暴力來執行而是用一些實例並為這些目的而予他們以幫助。不待說，我們有充分手段足以使小農希望即在現時都會使他明白的那些利益。”

甚至關於大農，恩格斯就說出如下的話：“在這裏我們大概也將拒絕實行強力的剝奪，不過我們可以期待：即使這些頑固的腦袋，經

濟的發展也應該把它們教育過來的。”（“法德農民問題”，載“新時代”，第十三卷，第一期，第三〇一、三〇五頁）

這裏所引的意見，完全和我們的見解一致。這些見解指出剝奪農民的土地，無論如何都不是社會主義底利益，而恩格斯底意見則毫不含糊地證明，此種剝奪也不應列入社會主義者計劃之內。

農民用不着害怕社會民主黨：他們可以完全信賴它。自然，在現代社會內，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都不能滿足他們的一切願望，但這不是因為它不願意，而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許多希望仍舊是一些極樸實的希望，的確是任何其他政黨都不能完成的。社會民主黨在諾言方面不能和農民的政黨競爭，然而在現代社會內凡是替農村居民做的事，它都去做，而且只有它能夠做得完全，因為它比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更無情地反對資本。

農民從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中比從現代社會制度範圍內的社會改良中可以希望得到更多的東西。剝奪土地是從低級的生產形態過渡到高級的生產形態的資本主義的方法。在現代社會內農民永遠徘徊歧路：或者拚力擁護一切進步，或者為剝奪的資本所擠掉。只有社會主義使農民能參加社會的進步，不遭受剝奪。社會主義不僅不剝奪農民，而且予農民以最有希望的保障使他們不受剝奪，而在現代社會制度下這種剝奪已經逐漸臨到他的頭上。

## 二 私有住宅底前途

雖然我們認為對於農業領域內的很多生產部門，大生產形式將是最優越的形式，經濟的發展在勝利的無產階級從他的道路上排除一切障礙之後，就會走向在合作的、或公社的基礎上的大生產排擠小生產，也就是說，走向耕地底合併，但這絕不會引起私有住宅底消滅。

在這種場合內，目前還爲農業所固有的家宅與經營之間緊密的聯系就會中斷，家宅與經營的庭院分離，但是什麼也沒有迫令將農民底住宅移交社會公有。現代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不是建立在消費資料公有上；它並不排除後者底私有權。維持和添增人類生活底愉快底手段中一個最重要的手段——可以說是極其重要的手段——就是私有住宅。土地公有和這些是完全相容的。

如果我們要想討論一下未來社會的生活方式，我們就會轉到了不穩固的基礎上。未來的人們是否表示寧願生活在傅立葉所想像的類似宮殿的共產團體房舍內或者生活在柏爾所想像的個別的小農舍內——是否在此處將是這一種形式，在別處將是那一種形式，或者兩者一同發展起來，——毫無疑義的，如果對於未來的人們可寶貴的是，每一個家庭要有自己私有的住宅，那末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所依據的基礎上是不會碰到阻礙的。

不待說，技術底發展在現時已經引起家務方面工作底縮小並擴大婦女的戶外工作，這是的確的。如果這種情形完成得很慢，那只是因爲婦女底勞動力低廉的原故。在料理家事上婦女的勞動沒有金錢的報酬；這樣看來，婦女的勞動好像不值什麼；婦女是最熱誠最能忍耐的馱重獸；因此無產者當然保持着技術上落後的處理家務的方法。對於富裕階級，私人家務底處理，它的安樂就意味着蓄養特別的僕婢專供尊貴的我使喚。

無產階級愈是堅強，僕婢就愈少，她們的要求就提高，有錢人要管理自己的家務就感到不大痛快。那些賢良的主婦們，現在很熱心保衛自己的爐竈底神聖性，是在有僕婢可供她們使喚的時候，一旦她們自己不得不做這些工作：自己烹調、洗濯、看護兒女以及——呵，可怕呵！——擦鞋子的時候，她們就竭力要求設法減少家事方面的工作或交給特別的專人去做。

無產階級底勝利，甚至單是加強，在婦女當中在這一方面也會引起別的傾向。貧苦與窮困現在使她們委身於家內非生產的勞動，而無法將家庭工作委諸家外設備完善的機構去辦。工人家庭增長的幸福並非表現於其他僕役担負工作，而只是表現於主婦減輕負擔。現在遠落後於技術進步的家庭工作底縮小，到那時就會加速度地進行。家庭底經濟基礎因此而消滅，但不是家庭自身的消滅，因為它還有另外一個更高的基礎——個性。

人類生來就是社會的存在物，即“合羣的動物”，並且經過了許多時期，他就開始把自己的個性從社會分開並認識個性是一些特別的東西。當人類在生存鬥爭中只是由於與社會有密切聯系才能站得住腳時，當社會的發展進行得這樣緩慢，傳統即積累下來的社會意見完全支配了各個人底精神生活的時候，個人底發展就沒有它的地位。只有在勞動生產力增長及階級分化創造了這樣的階級，他們並未為生存底共同鬥爭，——體力勞動及戰爭——所完全吞噬，而有閒暇時間來發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並且他們由於自己的財富和奴隸，可以不依賴社會，甚至和社會隔絕而獨自生活的時候，那時就會替這一個貴族階級創造了個性自由發展底基礎，尤其是在大災難突然在新的基礎上重建了社會生活並因之克服了傳統底勢力的那些時代。例如，在希臘由於波斯戰爭底結果，在意大利隨着十字軍東征，在西歐在宗教改革和發明底時代，情形都是如此。個性復活了，同非個人的民衆藝術一起，個人的藝術也出現了，同非個人的宗教一起，個人的哲學也出現了。

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從其他人民階層剝去合羣的意識，以更民主的形式裝作貴族外表“超人”的個人。它之能够做到這個地步，由於過去將人民大眾結合在他們的生存鬥爭中的一切衰朽的組織底解體，由於不斷的經濟革命底闡明，當作為生活指導的傳

統完全失其作用，而各人根據自己的觀察建立起各自人生觀的時候，最後由於現代的生產方式所生產出大量剩餘生產品，增加着社會中“飢餓的勞動者”人數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時將他們置於比以前更不安定並且更使他們不滿足的地位。

個人主義即個性自由表現的傾向，在社會主義社會內一定比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更有力更普遍，這要看它在裏面精神的發展，幸福和閒暇成爲共同財產的那個程度而定。

自然，個性自由表現底可能性在很重要的範圍內，在經濟生活底範圍內，會大大地受到社會主義的限制，但另一方面，現時在經濟生活範圍以外個性表現底極小可能性，由於勞動時間底縮短，會大大地擴充起來。

在這種情形下家庭就首先佔優越地位；自己的爐灶就獲得新的意義。個性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會像在自己的家內表現得這樣完滿，不受別人底敵視或傾軋的意志底限制，自己的家宅可以隨意裝飾，在這種情形下限制只是從物質上考慮，在自己家內人們可以和他心愛的人，和自己的朋友、書籍、自己的思想和夢想，自己的科學的和藝術的創作自由地生活着。

個人的性愛和個人主義一同發展起來，性愛只有和異性底某一個人結合和共同生活才會滿足。以這樣的個人的愛情爲基礎的結婚，爲得到永恆性和安定，就需要有自己私有的家宅。

經濟的動機愈從結婚中消失並代之以個人的動機，則兩親的關係，尤其是父親對兒女的關係，其變化亦愈大。當作經濟制度的婚姻，一方面有責任以主婦底嫁粧或勞動力，丈夫底遺產，來創立家庭經濟底必要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就有責任將遺產，有時將父親底職位傳給兒女。在個人主義的結婚內不僅經濟的動機爲夫婦個人相互傾心底力量所排斥，就是在父母與兒女之間的關係也成爲個人主



義的關係。父母之愛兒女，不是把他們當作承繼人，而是當作個人，不是把他們預先指定為他們的身分底後繼者，不管他們是否有能力和志向，而是當作自由的個人使之發展。

這樣的個人主義婚姻與這樣的家庭底萌芽，現在已經是強有力了。但這些萌芽還是很暗淡，因為作為家庭基礎的家庭經濟底孤立的方式還存在，因為此方貧苦與窮困而彼方富裕還常常使經濟的顧慮超乎個人的顧慮。不知道有這樣的極端性並遠離孤立的家庭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社會，正因此應當完全提出婚姻與家庭底個人的性質。此種個人的性質，現時在一般的意識中，在結婚與家庭底評價上，已經作為道德的尺度。現在只以夫婦底人格為準，而不以經濟條件為準的這樣的婚姻，才被認為是道德的結婚；使家庭成員彼此聯結的、個人的、而非物質的聯系，才算是道德的家庭的聯系。兒子只把父親看成是將來他從那裏得到遺產的人，父親強迫兒子服務或結婚，為的是增加或維持家庭底財產，他們兩者照現代的觀念說來，自然，都不是道德的行爲。這樣看來，消滅私有家庭經濟並不意味着結婚與家庭底消滅。自己的家宅沒有必要和自己的爐竈一同消滅。現代文明除廚房和洗衣房以外還知道有另外的家庭聯系。家庭經濟底消滅只意味着家庭從經濟的結合變為純倫理的結合，家庭經濟底消滅，意味着現時由於從現代生產力中發生的個性底發展而已經成熟了的道德的要求底實現。

這樣，社會主義不僅不壓制在自己私有的家宅內完全發展的各個個人底需要，而且使這種需要成為普遍的需要，同時創造出普遍滿足它的手段。

所以，農民不用担心自己的家宅。社會主義制度不會把它消滅得無影無踪；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那些變革，如衛生的和美的變革，並不損害農民的家宅。

可以說，無論何處農民階級底衰落都沒有像在農民的家宅內表現得這樣明顯。我們曾指出工人底貧民窟，但是農民底住宅也並不比齷齪的不潔的廐舍好些。然而農民對清潔和美觀也有愛好，這種情形凡是在農民生活得優裕的地方都表現出來。古時農民的家宅——例如瑞士和俄國農民的家宅——是建築師歡喜底對象。而現在農民底藝術還殘存於城市的別墅中；在農民家宅內藝術原稿早已喪失而且已找不出後繼者。可是要使農民再成爲藝術家，所缺的只是幸福和閒暇。勝利的無產階級將這一切給予農民，他們不僅解放工業的僱傭奴隸，也把土地——現在土地底絕妙的美景和它的住民底不健全，貧困和污穢是這樣可悲的對照——變爲自由的，快樂的和驕傲的人類居住的花園。

